满清共产主义

目录

- 序章　从满洲入关：一具国家躯体为何会易主
- 一、门外核心与旧国家躯体的接驳
- 二、日常照旧与空间里的政治钉子
- 三、第二次入关的现代条件：工业外骨骼与城市网络
- 四、从战前基础到现实能力
- 五、一具身体的两套来历与不可拆分的对象
- 六、兴亡的三重位置与政治生存逻辑的反向调用
- 第一章　不是相似：满清共产主义这一不可拆分对象
- 一、现实功能与批判的出发位置
- 二、不可拆分的对象与生成分层
- 三、满洲渔猎的政治生存逻辑与人工森林
- 四、内化的党组织与工业外骨骼的接入
- 五、统治技术的“优越”与换壳延寿
- 六、完整兴亡链与捕获—重新赋位
- 第二章　捕获—重新赋位：满清共产主义的最小动作
- 一、活下来，不等于还在原来的位置
- 二、捕获不是接纳
- 三、从人口到旗：政治编组压到旧身份之上
- 四、两种路径：包衣与汉军
- 五、保存什么，摧毁什么
- 六、忠诚、资源与外观的连续
- 七、从被看见到可被调用：完整动作
- 八、捕获不是一次完成的命令
- 九、从人到国家躯体
- 第三章　后金：小核心怎样形成
- 一、没有天然存在的后金
- 二、追随必须有持续的方向
- 三、暴力取得选择权
- 四、资源让服从进入日常
- 五、边界不是一条血缘线

- 六、称汗不是魔法时刻
- 七、组织密度与防裂机制
- 八、胜利必须变成下一次能力
- 九、核心形成了，机器还没有完成
- 第四章　八旗、编旗与包衣：人口如何被编成力量
- 一、小核心不能只靠临时追随
- 二、牛录固定的不是人数，而是关系
- 三、编旗把人口放进命令链
- 四、八旗把战争所得带进下一轮战争
- 五、包衣：依附被编进组织
- 六、保留差异，重新安排差异
- 七、强制、奖励、保护与惩罚属于同一机器
- 八、人口成为力量，位置仍不相同
- 第五章　汉军、归附与先来后到
- 一、已经入旗，不等于已经同位
- 二、归附不是一个动作，而是多条入口
- 三、先来后到怎样变成政治信用
- 四、汉军的第一次失败
- 五、技术能力打开位置，却不取消等级
- 六、资源忠诚不是收买，而是持续绑定
- 七、自己人有层级，民族主体没有消失
- 八、从人口差异到国家能力
- 第六章　入关不是过关：旧国家躯体的捕获
- 一、入关不是从零建国
- 二、旧官可以留下，旧主人不能留下
- 三、账册、税粮与地方的可见性
- 四、军事力量的保存、裁撤与重新编组
- 五、城市空间怎样改变主人
- 六、保存并不取消暴力
- 七、国家身体的重新接线不是一次完成
- 八、占有处分权：谁控制身体，谁就是新的政治主人
- 九、从国家躯体到政治钉子
- 第七章　满城：高权重政治节点怎样嵌入主体社会
- 一、政治钉子

- 二、北京与江宁的建置成型
- 三、空间边界的反例与动态调整
- 四、空间固定与组织归属
- 五、资源供给与社会成本
- 六、政治功能与结构边界
- 七、历史限度与现代演进
- 第八章　从后金到中华苏维埃：现代政治核心的形成
- 一、满城之后的问题
- 二、后金首先是一个结构位置
- 三、中华苏维埃不是思想团体
- 四、政治核心不等于国家躯体
- 五、组织、军队与根据地：现代核心的社会承载
- 六、普通政党边界与结构对应
- 七、现代组织承载与“两个国家”
- 八、现代政治核心已经形成
- 第九章　党、军队、宣传与身份：现代捕获机器
- 一、取得能力与改变归属
- 二、党与高权重评价
- 三、干部怎样使命令落地
- 四、军队怎样移动组织
- 五、宣传怎样改变解释位置
- 六、身份与资源怎样相互制约
- 七、被重新赋位者与关系复制
- 八、蠢人制造机制
- 九、从谎言纠缠到暴力强制
- 十、农战神话的遮蔽
- 十一、机器与物质尺度
- 第十章　满洲不是后方：工业外骨骼的形成
- 一、煤不是背景，而是网络的起火点
- 二、钢铁与电力
- 三、铁路与口岸仓储
- 四、车辆维修与军工制造
- 五、殖民统治没有被工业能力抵消
- 六、网络的尺度不在数字相加，而在相互依赖

- 七、战前基础不是战后接收
- 第十一章　六座城市与组织化社会
- 一、工业外骨骼的社会身体与城市节点
- 二、新京与奉天：行政与工业空间
- 三、鞍山与抚顺：钢铁依赖与企业城
- 四、大连与哈尔滨：海陆门户与北满枢纽
- 五、技术人口与知识组织
- 六、人口迁移与身份登记
- 七、殖民统治与能力事实
- 八、组织化社会已经出现，接收尚未发生
- 第十二章　进入满洲：接收、修复与重新赋位
- 一、鞍山：废墟中的接收与复工
- 二、铁路：一台死车与一套新管理关系
- 三、人员不是附属品，而是岗位关系
- 四、从接收对象到管理权变化
- 第十三章　东北野战军与中共入关：强链怎样落地
- 一、外骨骼必须变成行动
- 二、铁路把占领变成持续行动
- 三、军工把工业外骨骼转成军需
- 四、人员进入新组织
- 五、从名称变化到军事能力
- 六、辽沈之后，军事力量越出满洲
- 第十四章　中共其实是两个国家：政治核心怎样占据国家躯体
- 一、两个国家结构与入关接管的性质
- 二、中华苏维埃的中央机构形态与分工
- 三、移动、改组与选择性存续
- 四、中华民国大陆的尸体、躯体与身体
- 五、北平公安的接管程序与命令链替换
- 六、专业器官的捕获：金融、公用与供给网络
- 七、不对称的保留与两个国家的相遇
- 第十五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 / 后清：政治核心占据国家身体
- 一、两个国家不是两个并列国家
- 二、国家身体的空间、时间与运行器官
- 三、从根据地核心到全国中央机关

- 四、地方整合中的翻译权、控制与层级
- 五、选择性保留与重新赋位
- 六、国号的双重作用与后清的生成结构
- 七、旧痕迹、专业逻辑与身体惯性
- 八、现代满城的入口与日常控制
- 第十六章　党委、党校、机关与统战：现代满城
- 一、国家身体内部的钉子与现代满城
- 二、国家机关中的党内组织位置
- 三、同一机关中的不同关系
- 四、干部怎样经过党校
- 五、统战如何进入社会关系
- 六、国企治理中的政治节点
- 七、从节点到制度环境
- 第十七章　制度制造森林：人工渔猎
- 一、从节点到人工森林
- 二、资源怎样成为位置
- 三、工作、身份与住房的连接
- 四、政策窗口与资源方向
- 五、可见度成为资源
- 六、关系如何掌握方向
- 七、规则重估与共同环境
- 第十八章　有机会就捕获：机会渔猎与积累中断
- 一、机会不是普通的可能性
- 二、捕获动作：先取得位置，再谈投入
- 三、判断风向：机会价值不断被重新估价
- 四、投入为什么会围绕窗口重排
- 五、积累为什么中断
- 六、捕获之后仍然处在被捕获之中
- 七、从机会捕获到政治人格
- 第十九章　主体民族满清化：政治人格与政治生存逻辑
- 一、满清化就是渔猎化
- 二、先后次序的重排
- 三、从资源寻找转向权重寻找
- 四、权力感知与主动搜索

- 五、组织依赖与政治生存逻辑
- 第二十章　两面人与表演性忠诚
- 一、多重权重环境与两面人的形成
- 二、语言识别与服从展示
- 三、利益保留与依附重算
- 四、揣摩上意与群体监督
- 五、红旗打红旗与组织进入
- 第二十一章　组织嵌入、借壳、换壳与夺舍
- 一、两面人的组织嵌入与权重转移
- 二、借壳生蛋与墙内拆梁
- 三、旧能力调用与组织动作的区别
- 四、夺舍：外壳仍在，方向已变
- 五、张宏堡、李洪志与体制语言的调用
- 六、跨外壳能力与模型危机
- 第二十二章　模型解释危机：恶意加维怎样摧毁旧外壳
- 一、模型依靠少数有效维度工作
- 二、新增维度与恶意加维的界线
- 三、为什么“更多解释”会反过来保护失败
- 四、摧毁旧模型成为答案
- 五、取得统治以后仍然必须治理
- 六、重建为什么总带着下一次危机
- 七、模型危机与换壳的双向关系
- 八、问题不在维度多少，而在谁决定权重
- 第二十三章　权重优先论：理论源头解释文本，功能源头解释现实
- 一、模型压缩与实际权重
- 二、理论源头与功能源头的区分
- 三、资源配置与组织行动的现实转化
- 四、传播筛选与敌我分类的程序后果
- 五、机会权重：进入路径与依附位置
- 六、五类接口不能机械合并
- 七、A 主义与 B 权重结构
- 八、三层比较、同源门槛与原教旨责任
- 第二十四章　交媾主义——旧权重怎样进入新主义
- 一、交媾发生在终点之前：A 为什么会以这种形式出生

- 二、旧网络、旧节点与 B 的高权重
- 三、生成性收敛：A 尚未完成时，方向如何形成
- 四、A 为什么是真正的 A，却仍从起点朝向 B
- 五、五类接口：从思想生成到现实延续
- 六、接口转换、现实主人与变化中的自主性
- 七、真正独立的起源、后期责任与原教旨退路
- 八、证据边界、反证与旧网络再生产
- 第二十五章　新主义生态——制造、筛选、捕获与换壳
- 一、生态不是孤立外壳的总和
- 二、生态中的版本竞争
- 三、新主义为何会越来越看似独立
- 四、捕获与换壳
- 五、生态反馈：被筛选者也会改变筛选环境
- 六、责任、受益与知情不能混为一谈
- 七、生态研究的最低证据链
- 八、从生态进入连续人物史
- 第二十六章　从政治核心到日常媒介：人物与传播的连续线
- 一、毛泽东：始作俑者与后清第一皇帝
- 二、王洪文——第二节点与满洲渔猎风格
- 三、张宏堡：借壳生蛋、墙内拆梁与神志清醒状态下撒酒疯
- 四、李洪志：公开传播、借壳、换壳与夺舍
- 五、《意林》《读者》：成瘾、安抚与满洲生存理性的文明包装
- 六、张雪峰、周丽峰：丛林降维、红旗打红旗与语言超限战
- 七、“斯奎奇大王”：合成毒品、渔猎叙事与情绪转向
- 第二十七章　中心失去对政治生存逻辑的垄断：全国化渔猎与胜利路径的延时引信
- 一、从位置改写到现代入关：捕获能力如何取得国家规模
- 二、把人工森林写进日常制度：规模治理与生活入口的绑定
- 三、机会捕获、积累中断与主体民族的渔猎化
- 四、媒介可见度与公共语法的扩散
- 五、局部入口、权重稀释与组织生存逻辑
- 六、识别危机、表态机制与结构幻觉
- 七、方向独占性的丧失与反噬的条件
- 第二十八章　满洲反噬：人工森林中猎犬与野狼的转向
- 一、识别死锁与忠诚的重新估价

- 二、合法语言的反向使用与代表权争夺
- 三、借壳、换壳与最高权重的转移
- 四、猎犬与野狼：供能断绝与情绪围猎的内转
- 五、新主义、思想游击队与反向组织
- 六、反向调用的通道与多重结果
- 七、同源代价与兴亡的结构闭环
- 第二十九章　兴于满洲，亡于满洲
- 一、小核心怎样取得并调用更大的身体
- 二、既有现代核心怎样在满洲取得工业与军事能力
- 三、三种不同的身体如何结合为后清
- 四、国家制度怎样使捕获成为社会生活
- 五、解释失效后旧功能的换壳与新身体
- 六、从普及到失去独占，再到实际反向使用
- 七、两次赋位怎样构成兴亡同源
- 八、满洲的历史含义与终局判断

序章　从满洲入关：一具国家躯体为何会易主

一、门外核心与旧国家躯体的接驳

一个政治核心可以比它将要统治的国家小得多。它没有那具国家身体那样多的人口，没有那么密集的城市，也没有同样漫长的行政传统。它最初甚至位于国家边缘或旧国家之外。可在某个历史时刻，它穿过边界，占据首都，把原来属于旧朝的官署、税赋、道路、仓储、军队、技术和地方网络接到自己身上。旧国家并没有像一座被焚毁的房屋那样全部消失。许多门窗仍在，梁柱仍在，房间里的人员也没有一夜之间换尽；改变的是谁掌握钥匙，谁规定门的开合，谁决定哪些房间继续使用，哪些人可以留下，以及留下的人向谁证明服从。

清初的入关首先把这个问题摆在眼前。后金与继起的大清并不是在明朝国家内部按原有秩序逐级成长起来的权力。它从关外形成自己的政治—军事核心，组织自身人口，也不断吸收异质人口与能力。进入北京之后，它面对的绝非一片可以从头绘制的空白。明朝遗留的中央官署、地方行政、赋税册籍、漕运、造船、军事人员、士绅与专业知识，构成了一具规模远大于征服核心的国家躯体。面对这具庞大的躯体，征服者既要压服抵抗、实施强制、改变身份，也要使它继续提供粮饷、信息、交通和治理能力。清初选择性任用旧官，接收和重组中央机构，继续调用财政与漕运网络；与此同时，一些机构被裁撤，人事和服从条件也被改变。

所谓“入关”，首先是门外形成的政治核心进入门内，夺取最高权重，再让门内既有的人员、机构与资源服从新的主人关系。山海关是历史上的真实关口，却不是这一动作的全部。只把入关理解为军队经过某地，便会看见行军而看不见接管；只把它理解为朝代更替，又会看见国号变化而看不见旧国家能力如何被保存、切割和重新接线。

一具躯体可以延续相当多的组织功能，改由新的政治核心支配，这里的“小”与“大”便不能只按人口或疆域计算。小核心的力量，在于它能够比庞大国家更快地判断敌友，更集中地分配安全与资源，更明确地要求忠诚，并把原来互不相同的人放入新的关系。它未必拥有旧国家的全部知识，却可以保留掌握知识的人；未必能立即重造全部官署，却可以决定哪些官署照常办事；未必有足够人员遍布每一县每一仓，却可以控制少数关键位置，使地方网络在新的命令链中继续运转。国家躯体的巨大，反而使它不可能被一口吞下。真正有效的占据，总是从高权重节点开始。

高权重节点也不是地图上最显眼的地方。它可以是首都与中央官署，也可以是能够持续取得粮饷和人口信息的册籍系统，可以是连接内地与城市的漕运和交通，也可以是掌握任命、文书、军械或专业技术的一小群人。征服核心无须同时懂得每一项技术，只要能够控制决定这些技术向谁服务的接口。掌握接口，便能让远多于自身的人继续处理旧事务，同时把处理结果送往新的中心。小核心抓取大身体，关键不在每个末梢都投入同等人数，而在把有限的可靠力量集中到能够放大命令的位置。中心控制忠诚与最高权重，旧机构承担大量日常复杂性；当某个末梢拒绝接入，人事、军政、资源或安全节点又能传导压力。人员较少的政治核心由此可能调用远大于自身的国家能力，但这种节点放大必须在具体历史中逐项辨认，不能脱离官署、交通、财政、军械和专业人员的实际接管过程而成为普遍定律。

然而，这种接管也有成本。入关从来不只是越过一道关口，北京被占据，不等于全国已经完成接管。军事进入、旧官出迎、中央官署接收、兵民空间重新划分，是不同层次的动作。江南的抵抗、屠杀、迁徙、薙发与制度裁撤提醒我们，调用旧国家躯体从来不是温和继承。保留与摧毁可以同时发生，任用与清洗可以前后相接；旧机构的功能可以继续使用，而它原先的政治自主和法统位置却已被取消。节点之间必须保持联系，服从必须被反复确认，专业人员的可用性与政治危险要不断衡量。征服者不能只依靠一次军事胜利，还要持续识别哪些旧关系仍在运转，哪些人员只是表面顺从，哪些地方网络可能脱离。入关不是一个瞬间，而是一连串抓取、筛选、保留、清除和重新接线。首都陷落只是最高节点易主，国家躯体真正归属谁，要看命令能否沿着这些接口向下传递，又能否把资源和信息向上送回。

二、日常照旧与空间里的政治钉子

国家易主最冷酷、也最容易被忽略的一面，是征服并不总以废墟作为完成标志。更有效的征服，往往让多数人第二天仍要去同一个地方办事，让粮船继续走原来的河道，让会造船的人继续造船，让能记账的人继续记账，只在这些活动之上安置新的决定权。清初对明制的处理并不整齐，“完全沿用”和“彻底推翻”都概括不了实际发生的选择。旧官可以被任用，旧军可以被重新编组，财政、税收、漕

运和造船能力可以继续提供现实功能；与此同时，一些机构被废，一些人员被排除，一些地方遭到强制性处置。

所谓“照旧”，从来不是旧制度取得了不受新权力约束的自主生命。它只是新政治核心在当时条件下作出的调用决定。衙门的匾额可以留下，文书格式可以沿袭，熟悉账册的人可以继续工作，但决定任免、惩罚、资源和安全的最高权重已经改变。一个旧官的知识仍有价值，是因为新政权需要这种知识；他的职位能够延续，是因为新的权力关系承认了他的可用性。反过来，一旦某项机构被判断为危险、多余或不再服从，它也可以被裁撤。保存与调用不是对旧对象政治自主的承认，而是把对象的能力从旧关系中剥离出来，接到新的命令链上。表面连续性越强，最高权重的变化反而越容易被遮蔽。人们看见机构还在，便误以为国家还是同一个国家；看见专业人员仍被使用，便误以为他们仍拥有原来的政治位置。其实，能力被保存，位置已经改变。

满城和驻防体系把这种高权重嵌入进一步固定在空间里。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江宁、杭州、西安等地的建置并非在同一天完成，也不是所有驻防都自动形成同一种封闭城市。驻防建立、住地划分、筑墙、土地与银米配置、地方军事功能，是需要分期开列的不同过程。北京首先是首都控制与兵民空间重新安排，江宁的建置经历诏建、布局与围墙完成的过程，西安也有驻防到位、空间划定和后来扩展的时间差。杭州的材料甚至提示，围墙并没有把全部旗人都封闭在墙内，当地同时存在墙内与墙外旗人。这些城市的差异，恰好帮助我们摆脱“满城就是一圈墙”的浅薄理解。墙可以强化区分，却不是政治权重的唯一来源；没有完整围墙，也不意味着驻防失去同中心的组织联系。由此不能推出驻防天然控制地方全部民政，也不能把一座城市的情形强加给所有城市。

尽管存在差异，少数高权重政治—军事节点被放入广阔主体社会之中，并获得独立编制、资源与组织联系，仍是一个稳固的事实。它们既不是普通地方人口，也不能仅凭数量理解其作用。一个节点的政治重量，取决于它同中心的连接、它在军事与安全中的位置、它对资源的取得方式，以及地方在危机时必须如何面对它。这类节点并不需要每天替代地方所有官员。地方官署可能继续处理大量日常事务，税粮与诉讼仍由熟悉旧制度的人承办；可一旦触及政治服从、军事安全和中央意志，空间、独立编制、资源供给与军事功能叠合起来，便能使驻防网络在地方社会中显示另一层超过人口比例的权重。政治钉子的作用，正在于平时不必覆盖每一寸表面，却能在关键处把国家躯体钉到新的中心。国家躯体越庞大，政治核心越需要这类钉子，把自身命令固定到并非由它从头创造的社会空间中。

这些清初事实并不能直接证明三百年后的现代党国与清代属于同一个历史制度。把衙门名称、驻防编制和现代机构一一配对，只会制造廉价的相似。无法回避的问题仍然存在：较小政治核心进入较大国家时，怎样在不重造全部社会的情况下占据最高权重？暴力和清除是一面，保存、调用与嵌入是另一面。后者不是前者的反面，而是征服能够延续的条件。

三、第二次入关的现代条件：工业外骨骼与城市网络

二十世纪的中国再次出现门外核心与国家躯体相遇的问题。中华苏维埃首先形成的，并不是覆盖大陆全部城市、铁路、学校、医院和行政机关的完整国家身体，而是它自身的政治—组织核心。这个内核包含党、军队、干部、根据地、宣传、纪律、身份划分和资源系统；它拥有一套只属于自己的命令链，能够组织人口、规定敌我、要求忠诚，并在战时不断移动和扩张。中华民国大陆留下的是另一种规模的身体：城市和交通线，工矿和学校，医院与行政机关，专业人员与技术人员，以及现代国家多年积累的制度外观。两者并不是同一个东西。政治核心要取得全国统治，不能只靠把根据地在地图上不断涂大；它必须占据这些既有的城市与专业机构，使原先并非由它创造的国家能力转而服从自己。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形成，不能只写成一个政党赢得战争后的建国过程；其中更包含既有政治—组织内核对大陆国家躯体进行占据、调用并重新赋位的过程。

这是一个被称作“第二次入关”的结构判断。清初与二十世纪在军队、制度、意识形态、技术条件以及国际环境上截然不同，朝代循环的旧调也不能代替具体的历史研究。两次入关之所以存在连续性，落脚点在于一个共同的组织难题：在门外或旧国家之外形成的政治核心，究竟怎样获得进入大国家的能力？在进入以后，它又怎样让旧国家的身体继续工作，同时将最高权重交给新的核心？

在这个问题上，第二次入关拥有一个清初根本不具备的现代条件：工业外骨骼。对于一个现代政治核心而言，如果它手中只有宣传、纪律和军队，却没有铁路、电力、煤钢、港口、维修、车辆修造、军工以及城市技术人口与科层能力的支持，其能够调用的行动空间与资源规模仍然非常有限。在这里，战前满洲绝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远方后勤基地，更不只是地图上一块可供周旋的安全区。普通后方的意义，主要在于让政治核心避开前线压力，保存人员、粮食和回旋空间。但满洲所提供的条件远远超过了这种消极的安全。

战前满洲已经存在一套工业结构：煤矿、钢铁、电力、铁路、港口仓储、车辆修造、兵工设施、工业城市、职业教育、研究机构、户籍警察和行政统制网络。在这里，矿产、厂房、动力和轨道被放在同一地区，各项资源不再彼此孤立。煤炭可以进入动力与运输系统；铁路能够将矿区、工厂、仓库和城市连接起来；维修能力可以延长各种设备的使用寿命；行政与研究机构的存在，则通过调查与统计，将复杂的人口和物资转化为可计算、可调度的对象。对准备入关的现代政治核心来说，这片后方因此可能成为一个力量制造场，而不只是一个躲藏处。

满洲的独特性，在于它把局部设施、区域网络和国家尺度紧密接合在了一起。一座孤立的矿山、一间工场或一段铁路，各自能提供的能力都极为有限；但当交通、电力、仓储和城市把这些设施连接起来时，它们便可以互相放大。抚顺的煤炭开采与机械化矿业、鞍山和本溪的钢铁生产、大连的港口仓储与铁路起点、奉天的工业区和兵工设施、哈尔滨的铁路汇聚与教育机构、新京的行政和交通功能，共同表明战前满洲已不是一片等待后来者从零建设的空地。铁路线把矿山、工厂、港口和城市织成了一

张网络；车辆工场提供了制造、装配和修理能力；煤、钢、电构成了更大规模组织行动的基础；各类学校、工程学院和调查研究机构则生产或集中了能够使用现代制度语言的人。

当这种区域能力被放到国家尺度时，只有政治组织能够决定它们是否被重新编组，并将这些力量送入全国战争与国家接管的进程。满洲不会凭地理名称自动产生力量，工业设施也不会自己选择主人；决定性的环节，依然在于政治核心怎样进入、筛选、调用和重新编组这些既有能力。把满洲仅仅写成“比较安全的根据地”，会漏掉工业与组织网络；而仅用“资源丰富地区”来概括，又会漏掉资源究竟是怎样通过交通、科层和人员转化为可用能力的。它在第二次入关中占据的独特位置，恰好处在政治核心与现代国家身体的交界处：一端是业已成型的党、军队、干部和忠诚关系，另一端则是殖民时期形成、来源复杂且状态不一的工业外骨骼。兴起链能否成立，取决于这两端究竟怎样接合。

这副外骨骼内部同样生满了殖民骨刺。在这个复杂的网络中，日本人占据着许多专业管理岗位，而中国劳工在正式岗位与熟练岗位中的比例远低于其在总劳力中的比例，工资存在明显差距；矿区暴力曾引发过抗议，统制商业也没有消除物质上的短缺。工业组织化从来不自动等于平等，更不意味着社会成员都能获得同样的技术与权力。它既制造能力，也制造等级；既能提高调动效率，也能加强监控与强制。伴随种族等级、强制劳动、暴力监督和政治支配的事实绝不值得赞美；但反对殖民统治的明确评价，也不等同于否认它客观留下了现代工业和组织化社会的物质结构。工业外骨骼首先是对某种现实力量的能力判断，它不是一曲文明颂歌。

四、从战前基础到现实能力

尽管战前的满洲积累了可观的基础，但这种战前存在绝不能直接冒充战后的实际接收。现有材料固然可以说明一九四五年以前满洲究竟存在什么，却不能仅凭这些事实，就断言哪些设施后来完整落入了中共手中，哪些没有经历拆运，哪些设备是在何时修复的，哪些日籍人员或本地技术人员最终被留用，又究竟有多少实际产量、军事装备和运输能力真正进入了东北野战军。

在战前基础与战后实际接收之间，隔着一条决定整条兴起链能否成立的界线。设施“曾经存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处于何种状态”、苏军进入后作出了“如何处置”、后来“由谁接收和修复”，以及最终“怎样进入军事与国家能力”，是五个不同问题，任何一环都不能用前一环直接代替。必须对不同维度的独有口径保持明确区分：钢铁厂的战前产量不能等同于战后产量；铁路系统的账面长度绝不是可立即调度的机车与线路；工场的容纳能力也不能混为实际的维修量。同样，兵工厂在战前存在不能冒充某种武器已经交付；技术人员在战前存在，更不能直接证明其战后的去向。这些箭头都不能靠战前的事实凭空接上。只有将设施损毁、拆运、停产、恢复、人员流动与组织接管逐项接驳起来，这副工业外骨骼才会从历史基础转变为可以支配的现实能力。

在这条将基础转化为能力的链条上，工业人口的异质性是另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把满洲的工业人口想象成一个天然等待中共召唤的同质群体，是一种脱离实际的捷径。在战前矿区和城市内部，存在日本管理者、中国正式工、非正式劳工和熟练工，还并存着承包人、商户、警察与行政人员。不同群体

的政治经验与利益考量各不相同。面对动荡与接管，有人可能留下，有人可能撤离，有人可能被迫改换组织，也有人可能凭借专业能力取得新位置。人员的捕获和重新赋位，必须落脚到这些真实的差异上，绝不能用一句“高度组织化人口”就将筛选的过程抹平。

经历了具体的接收、修复与捕获之后，一条兴起链得以成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满洲绝不能被降回当时中国众多普通背景之一。满洲国工业及其庞大的组织遗产构成了现代能力的基础；中共进入满洲后，紧紧围绕这些遗产展开了捕获和重新编组。正是借助这些设施与网络，东北野战军等军事—组织力量由此获得了一个强大的现代支点，中共也由此完成了入关进程。

这条强链的具体环节，无论是设备运转、人员、实际产量、战役调用还是比例，都必须服从历史材料。然而，材料的谨慎约束的是这些具体箭头的证明范围，而非否定整条兴起链所针对的强因果解释对象。在这场门外核心与国家躯体接合的转变中，具体事实链的考据要求不能被想象填补，材料暂缺也不等于决定国家易主的因果链条已被反证。

五、一具身体的两套来历与不可拆分的对象

一九四九年之后呈现出的国家外观，很容易在叙述中把政治核心与广阔的国家躯体看成一个自然生成的整体。沿着这种浑然一体的表象，铁路、大学、医院、工厂乃至各级行政机关，于是被叙述成新政权从无到有的创造物。与此同时，中华苏维埃的组织来历，也被溶解进“新中国成立”这一句话之中。一旦接受了这种叙述，政治核心究竟怎样占据旧的国家躯体、怎样在内部重新排布接线，反而从历史视野中消失了。

要看清中华人民共和国亦即“后清”真实的生成方式，只有把两套来历明确区分开来才能做到。中华苏维埃提供了政治—组织内核：它规定最高忠诚，掌握军队与干部，拥有属于自己的敌我分类和动员语言；而中华民国大陆国家躯体，则提供了大规模现代社会业已形成的组织身体。这里的“两套来历”是一个政治—组织结构判断，不是国际法结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并非在国际法上由两个并列的现存主权国家拼合而成，所有机构也不能被说成在法律上实现了简单延续。要准确理解这种来源差异，政治核心、国家身体、法统以及机构连续性，是四个必须分开的层次。组织内核与被占据身体来源不同，正是这个判断的核心所在。如果把它们混成一体，就解释不了一个原本规模有限的政治核心，为何能迅速调用巨大的国家能力；也解释不了国家外观连续与最高权重断裂为何能够同时存在。第二次入关完成以后，前者直接占据了后者的最高权重，保留并调用大量既有能力，再通过新的组织链条，把政治权重深深嵌入到专业机构和地方社会之中。

这种操作指明了“后清”的实际动作。它不是一场国号游戏，也不取决于服饰、礼仪或复古趣味，而是指向政治核心怎样处理国家身体：识别可用部分，保留运转能力，覆盖旧有身份，改变忠诚关系，在旧外观中安置额外的高权重组织，再让原有人员和机构在新的主人关系中继续运行。清初对旧官署的调用，使这套接管动作获得了历史可见性；现代党组织和工业国家躯体，则把它扩展到了远超清代的规模。正是在这种规模下，国家机器维持着日常与专业的外观：学校仍像学校，医院仍像医院，工

厂仍像工厂，行政机关也保留机关外观；学生仍在学校上课，工人仍进工厂，医生仍在医院行医，工程人员仍继续使用专业知识。

正是因为日常和专业外观继续存在，政治权重的深刻变化便容易被看成普通的行政调整。然而，旧机构并未获得中立地位，它只是被允许在新的最高权重下继续提供功能。党委、党校、机关、组织、统战和单位党组织，并不分别等于清代某座满城或某个驻防衙门；真正的延续性落实在功能层面。这些额外的政治网络进入各类专业组织内部，掌握了人事、忠诚和安全的更高权重，并通过中心—地方的组织联系维持着这种地位。一旦升迁、任命、政治安全、组织资格以及资源方向由这条另设的网络决定，国家身体就已经被重新赋位。如果执着于名称对应，反而会让人看不见权重网络怎样穿透了不同的历史外壳。

顺着这条接管链条，问题落到了满清共产主义这个不可拆分的对象上。答案不能归结为“因为中国传统影响了马克思主义”，也不能停留在“中共像清朝”的普通相似。在满清共产主义现代形态形成之初，党组织、群众动员、宣传、现代军队、政治身份分类和全国资源调动，就已经与捕获、编组、主人—依附关系、入关、满城嵌入、借壳和换壳处在同一个政治—组织过程中。在这里，满清渔猎政治的现代化，与共产主义的满清渔猎化，是这个对象内部同时发生的双向塑形。它是一场紧密交织的内在生长，绝非两套成熟理论在外部相遇后进行的拼装。

六、兴亡的三重位置与政治生存逻辑的反向调用

在这个不可拆分的对象中，满洲在链条上具备三个位置：最初是门外空间，后来成为工业外骨骼，最终以满洲反噬返回。满清共产主义正是依靠满洲，取得了现代化、工业化、组织化和全国化的放大能力，由此完成第二次入关。入关以后，政治生存逻辑被推广到全国：判断强弱，寻找主人，表演忠诚，捕获资源，进入组织，借用合法语言，保留外壳，改变内部权重。原本属于政治核心用来生存的技术，逐渐变成了社会成员和各种组织都要学习的技术。〔见第二十七章注 1〕

然而，政治生存逻辑一旦普及，中心就失去独占。下级可以调用它，新产生的社会组织可以调用它，新主义也可以调用它。人们可以学会比中心更熟练地使用中心语言，用更正确的口号去夺取合法性高地；机构可以在外观上保存原名，却改变内部资源的流向；在旧有理论失效之后，现实的权重依然可以寻找新的外壳潜藏。当年帮助中心兴起的捕获、拟态、嵌入和换壳能力，最终会被反向调用。

这就是“兴于满洲，亡于满洲”的终局判断。“亡”明确指向满清共产主义自身的终结，不是一般的治理压力，不是普通衰退，也不是一句带地域情绪的口号。当这套政治生存逻辑被现代化并扩散到全国之后，中心便不再能够垄断对权重、忠诚、组织和合法语言的操纵。然而，这种扩散与失去独占只是让反向调用具备了现实条件，并不自动等于反噬已经发生；只有当资源基础、利益格局或合法性条件发生改变，体制内外的具体人员与组织切实改变所依附的主人、围猎对象与行动方向，最初使中心成功的整套能力才真正转入对中心的反向使用。因此，满洲反噬并不是指某一天从地理上的满洲发动

一场简单的叛乱；它的真正力量，来自满洲所代表、所放大的政治生存逻辑完成全国扩散以后，对中心形成的结构性反击。

这一终结并不是某种任意的历史类比。若把两次入关仅仅看成两个历史事件的巧合，把工业外骨骼降格为一般的战争背景，或者把中华苏维埃与后金只当作修辞上的相似，整条链就会塌缩成随意的类比。满清共产主义并非清朝和中共两个独立对象的拼接，而是一个不可拆分的对象。它的兴起与终局同源。

序章　从满洲入关：一具国家躯体为何会易主注释

一、清初对明代官署、人员、财政、漕运、造船与军事能力的处理，并非单纯沿袭或彻底废除，而是保存、任用、重组、裁撤与强制并存。清廷留用旧官与令旧内阁六部都察院同满官办事，见《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五顺治元年五月庚寅、癸巳条；南京部院裁撤与留任改设见卷二十四顺治三年二月甲申条；按前朝《会计录》原额征解与卫所官员供职见卷九顺治元年十月甲子条；卫军改屯丁及卫所钱粮漕船事务见卷二十七顺治三年十月乙未条。官修记录体现的是政策处分与制度重编指令，不可直接等同于全部旧官留用或各地实际落实效果。火器营造与技术吸纳见 Nicola Di Cosmo, “Did Guns Matter? Firearms and the Qing Formation,” in Lynn A. Struve, ed., The Qing Formation in World-Historical Tim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chap. 3, pp. 121–166，实际所引 pp. 146–151。

二、北京、江宁、杭州和西安的驻防与满城形成各有分期。军事进入、驻防到位、空间划分、筑墙完成和资源配置不能视为同一时点；驻防的存在也不能直接证明其控制地方全部民政、司法和财政。四城八旗驻防的建立时序、空间隔绝、筑墙工程与旗地银米供给，参见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00–101（北京分居与城区分隔）、105–111（西安、江宁、杭州驻防建置与图表）、121（城外居住反例）、126–127（指挥职位、家眷迁徙与地亩口粮处分）。北京从《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九顺治元年十月甲子诏令已载之官民迁徙（该日诏令系记述此前已迁徙者，不可将记载日认作实际迁徙发生日），到顺治五年后续分隔命令，具有多阶段性。驻防作为军事安全据点，并不等同于直接取代地方所有州县民政、司法与钱粮管辖。

三、战前满洲已经形成煤炭、钢铁、电力、铁路、港口仓储、车辆维修、军工、工业城市、技术教育和调查研究机构等现代能力。相关数字必须区分实际产量、设计能力、计划指标和宣传性材料。抚顺煤矿采掘及销售去向参见 Duncan Money and Limin Teh, “Race at Work: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Mining Labor and Empire on the Central African Copperbelt and the Fushun Coalfields, ca. 1907–1945,”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 no. 101 (2022), pp. 103–106；页岩油及殖民扩张计划见 Manchoukuo Year Book 1942, Hsinking: Manchoukuo Year Book Co., 1942, pp. 556–557；鞍山与本溪生铁历年产量与能力见该年鉴 pp. 492–493；电力现有能力与预期见同书 p. 557；战前铁路里程、主要货运构成见同书 pp. 577–578, 590；大连港区

仓与铁路站仓共同仓储处理关系及南满铁路车辆工场制造修理能力见同书 pp. 268–269, 550；奉天兵工厂军工修理与火药生产见同书 pp. 550, 552–553；主要城市规模、工业区规划及工程、农业高等教育机构目录见同书 pp. 664, 732–733, 740–743, 747–748, 757–758；满铁调查部机构和计划参与见 Louise Young, “When Fascism Met Empire in Japanese-Occupied Manchuria,”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vol. 12, no. 2 (2017), pp. 289–290。战前设施的统计存在、计划指标或宣传表述，均不能直接证明其在 1945 年后的完整继承与实际可用状态。

四、殖民工业所形成的能力与殖民统治的价值评价是两个问题。技术和管理岗位的民族分层、工资差距、劳动暴力与抗议，说明工业组织化同时制造能力、等级和强制。抚顺矿区中日雇员工资差距、双重货币兑换风险、日籍管理职支配、中国工人技术晋升门槛受限及 1916 年工人自发抗议，参见 Duncan Money and Limin Teh, “Race at Work: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Mining Labor and Empire on the Central African Copperbelt and the Fushun Coalfields, ca. 1907–1945,”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 no. 101 (2022), pp. 108–110, 113–114。这些是抚顺矿区实证，揭示殖民企业内部的等级制度、工资盘剥与组织强制，属于矿山微观个案，不构成全满洲所有行业的统一统计。

五、战前设施的存在不能直接证明一九四五年后的完整接收、苏军拆运情况、设施修复、人员去向、装备来源、后勤比例或战役调用。由战前基础进入现实军事—组织能力，仍需依次核实设施状态、处置、接收、修复和实际调用。

六、“中华苏维埃政治核心—中华民国大陆国家躯体—中华人民共和国 / 后清”是政治—组织结构判断，不等同于国际法意义上的两个现存主权国家，也不预先解决法统、法律连续性和具体机构继承问题。

七、“兴于满洲，亡于满洲”属于核心兴亡判断。“亡”指满清共产主义的终结，不以一般风险、压力、衰退或治理困难代替；其现实机制和可观察指标将在后文展开。

第一章　不是相似：满清共产主义这一不可拆分对象

一、现实功能与批判的出发位置

在讨论共产主义治理中参与屠杀、日常强制和程序性失真时，有这样的判断：“所以人们认为，共产主义里面，不是蠢就是恶，没有例外。”灾难既不能借由寻找更纯洁的共产主义版本来免责，不能只归咎为执行者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更不能接受“真正的共产主义尚未实现”这种无限延期的辩护。共产主义不断把现实中的失败转交给未来，把已经造成的破坏解释成道路曲折，再以更正确的理论之名

要求人们继续付出。问题不在于怎样修好共产主义，而在于满清共产主义怎样形成更有效也更危险的统治结构。

共产主义者在不承担实际治理责任时，常能取得一种不对称优势。做事者必须面对错误、成本与有限选择；不做事者则可以不停指出缺陷，把任何不完美都说成整个秩序的罪证。他们先唱衰现实，再鼓吹摧毁，最后许诺从废墟上重建。承诺总是指向尚未到来的社会，现实的反证便可以被解释为“还不够彻底”或“已经走了修正道路”。这套先末日后重建的动员，对承担生活成本的人极不公平，却能持续吸附不满与幻想。

所谓历史必然规律不能为现实苦难提供安慰。社会并不会因为某个理论宣布自己螺旋上升，就自动把每次灾难变成未来幸福的台阶。换一种方式发生的失败，仍可被辩解成“曲折前进”；今天承受痛苦的人甚至被要求相信，哪怕自己死去，后世也会因他的牺牲而幸福。这样的叙述不是解释，而是在阻挡思考。它把不能兑现的未来变成对现在的无限债权。

马克思主义内部关于谁更正统的争论不足以裁定其实际统治现实。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及其后的各种修正与反修正争论，首先是研究对象，不是终审法庭。一个政权自称代表无产阶级，不等于现实资源由无产阶级控制；一种理论宣称消灭压迫，不等于它的组织方式没有制造新的主人关系。理论写给谁看、从哪套文本出发，与现实中谁掌握军队、组织、传播、工作、住房和政治安全，是两回事。判断一种主义的现实功能，看的必须是权重落在哪里，而不能只听它如何自述。

对共产主义的批判，不意味着可以随意夸大或凭空编造，不能捏造历史数字，也不能把每个共产主义者都写成同一种人格。强烈的价值判断与严格的事实边界可以同时存在。具体事实判断的范围由经验材料的证明程度所确定；尚未得到充分材料证明的具体因果箭头，则继续寻找依据。

二、不可拆分的对象与生成分层

“满清共产主义”最容易遭遇的误读，是将其割裂为“满清模式”与“共产主义工具”。这种拆解先预设一套凝固的满清政治文化，再把现代组织、宣传和工业视作事后拼装的构件，看似条理分明，实则破坏了整体认知。“满清共产主义”绝非“清朝与共产主义比较”那样的简单并列，也非“满清影响下的共产主义”这种外在施受，而是一个指向具体政治—组织结构的完整命名。追溯后金、八旗、包衣、汉军、归附、入关、旧国家调用和满城，是在寻找同一对象内部政治动作的历史生成；分析党组织、宣传、群众动员、政治身份、工业国家、户籍、单位、学校和媒体，则是在寻找同一对象取得现代规模的方式。两者的来源固然可以分别追溯，理论上却不能恢复成两个彼此独立的对象。

双向塑形发生在同一对象内部，并且相互放大。现代共产主义组织技术使满清渔猎政治获得全国人口分类、持续群众动员和工业国家调度的规模；捕获、重新赋位、入关与换壳的权重逻辑，又使中国式共产主义以特定方式处理旧人员、旧机构、旧文化外壳和后来出现的新主义。“影响”一词预设了两个完整对象之间的外部作用，因而不足以概括这里的变动：共产主义组织使这一政治生存逻辑中捕获动作可处理的尺度扩大，满清渔猎的权重逻辑又改变了共产主义语言在现实中承担的功能。党不再只

是传播学说的团体，渔猎也不再只是地方经验，识别、编组、嵌入和重置权重已经在同一架现代政治—组织机器中运行。“中国化”所假定的思想传播与文化调适同样偏离了权力的实质运转：谁能捕获人员，谁能决定身份，谁能把旧机构留下，谁能让资源与政治忠诚重新绑定。只要沿着这些动作追下去，满清共产主义便不能被缩成思想史中的一个本土分支。这不是传统影响现代的单向故事，更不是传统残余污染了纯洁的马克思主义。满清共产主义从现代形态生成之初就是不可拆分的对象，无须在此拯救任何“纯洁版本”。

寻常比较往往止于外观类比：两个政权都有精英集团，都使用宣传，都控制军队，也都设有某种驻防或组织网络。但这类过于宽泛的外观类比不能证明同一机制，也不能解释现代对象为什么拥有古代对象不可能拥有的能力；一旦将概念拆解，历史材料就会退化为“八旗像党组织、满城像党委、入关像革命胜利”的相似清单，使该命名丧失理论价值。真正需要识别的是动作次序和权重变化：政治核心先在旧国家之外形成，随后捕获异质人口编入新的政治—军事关系；对象的能力可以保留，主人、身份和资源位置却已改变；核心再进入更大国家，调用旧官署和专业人员，在主体社会中安置高权重节点；现代组织和工业条件把这些动作扩大到全国；旧外壳失效以后，核心又寻找新外壳。正是这一整套连贯动作，构成了满清共产主义。

强调不可拆分，不等于把内容混成一团。完整对象内部包含明确的生成层次：后金核心怎样形成，八旗、包衣、汉军和归附者如何被编组；清初怎样调用旧官与机构，满城怎样成为高权重节点；中华苏维埃的组织内核、共产主义现代工具、满洲工业外骨骼与中共入关；中华人民共和国 / 后清怎样占据国家身体，人工渔猎怎样塑造政治人格，新主义怎样被捕获。各个层次都指向其在满清共产主义内部的运转方式。后金不是一部独立清史，党组织不是一部独立党史，满洲工业也不是一部孤立经济史；核心、动作、外骨骼和社会扩散条件处在同一条链条中，无法拆成各自的历史。

完整对象不可拆解，“入关”“夺舍”“制造”“亡”指向明确的强因果方向，绝非无害的相关性。但具体的人名、数字、设备、机构和时间，则必须受到材料的严格限制，理论不能靠夸大维持，具体材料同样不能逾越证明边界。清初对旧官署的选择性调用，可以说明“保留能力而改变权重”在历史上怎样发生，却不能单独证明现代党国的全部制度；中华苏维埃拥有自己的政治—组织核心，这有助于区分政治内核与国家身体，概念相似终究不能代替组织史；战前满洲的煤钢电、铁路、港口、城市和技术教育可以证明工业外骨骼的存在，战后设施与人员是否被完整接收，仍须战后材料核实。二者的分层体现的是强因果命题与具体链条证明层次的区别：不能仅因局部材料暂缺就将强因果降解为模糊的相关，具体论断同样要接受经验证据的检验。

三、满洲渔猎的政治生存逻辑与人工森林

满洲渔猎是理解这个不可拆分对象的主轴，但它不是一部捕鱼狩猎生活史的代称。真实的捕鱼、狩猎、采参、伐木、冬季移动与山林生活，虽有助于理解某些环境经验，在分析中却只能占据有限位置。我们不能从“善于真实狩猎”直接推导出“善于现代政治”，这种跳跃绝不能替代组织与制度分析。满

洲渔猎在此首先作为涉及政治与组织层面的政治生存逻辑进入视野；至于民族历史经验、群体延续与人工环境各自承担多大具体因果权重，不能提前封死。

作为一套政治生存逻辑，满洲渔猎关注的重心不在于行动者手中握有什么工具，而在于其如何面对不断变动的对象与环境。其行动展开为连贯的次序：先识别谁有用并判断强弱，继而围堵和捕获，将可用对象留住并改变其原有位置；接着寻找能够提供安全与资源的主人，在必要时展示忠诚、进入组织并借用合法语言；同时等待制度窗口，保存外壳，切换身份。面对这套生存逻辑，猎物可以是具体的人，也可以是机构、专业能力、职位、住房、户口、项目、流量乃至一种新主义。

这套政治生存逻辑的关键并不在于消灭所有异质对象。纯粹摧毁会损失可用能力，纯粹同化又需要漫长时间。更有效的办法，是在强制与暴力的背景下筛选对象。有用的人可以留下，有用的机构可以继续运行，有用的语言也可以暂时保留，前提是必须接受新的主人关系和资源位置。经过这一步，对象看似还是原来的对象，实际上已经被重新赋位。

顺着这一筛选与重编逻辑，运动、清洗、大叙事和敌我划分同样可以进入渔猎结构之中。运动能够制造围猎场，把分散社会压缩成可识别的敌我；清洗能够甄别忠诚并重新编组；大叙事则能够为资源重分配和身份覆盖提供正当语言。过去若把这些动作全部交给“蒙古游牧”，把满洲渔猎缩成灵活、拟态和换壳，就会切断满洲渔猎主轴。蒙元共产主义和人工草原可以作为比较接口，尤其用于观察苏联式结构，但不能反过来把中共对象拆成两套并列成分。

现代国家对人工森林的营造，让这套政治生存逻辑获得了更广泛的施展空间。在这片人工森林里，规则频繁变化，资源被放在少数窗口，安全与机会依附于组织，公开语言与私人判断长期分离。身处其中，个人便会学习同样的估价与捕获能力。到那时，满洲渔猎不再只是满洲人的生活史，也成为全国社会的政治生存术；主体民族会被满清化 / 渔猎化：民族名称、语言和社会网络仍然真实存在，但其政治人格、资源寻找方式和社会生存逻辑已经改变。这就是“主体民族满清化”。人工环境能够复制和扩大这种政治生存逻辑。

四、内化的党组织与工业外骨骼的接入

把共产主义仅称为随时可放下的工具，容易引发使用者自身结构毫无变化的误解。现代党组织已经长进满清共产主义的身体，成为它识别、捕获和重排人口的器官；对象的现代形态绝非两套成熟实体的事后组合。

党组织长进身体后，捕获人口的能力落实在支部、档案、干部和军队之中。支部与干部体系使主人关系不必停留在私人依附，它可以进入正式组织，表现为政治可靠、组织关系、档案与任命。宣传使合法语言能够统一复制，群众运动让识别与围猎获得大规模参与，两者配合使敌我命名、忠诚表演和身份重排能够反复进行。政治成分与身份分类将个人的过去、家庭和现实机会连接在一起；军队在战斗之外，也是重新编组人口、训练纪律和生产忠诚的组织。工业、铁路与科层国家扩大了调动资源的尺

度，户籍、单位、学校与媒体则让政治语言和组织关系深入日常生活，使资源、安全和身份持续受到政治权重影响。

在双向塑形中，捕获、重新赋位和主人—依附的权重逻辑，也反过来改变了现代共产主义工具在现实中承担的功能。宣称普遍解放的语言可以成为进入旧机构的合法外壳，用以识别猎物、重排位置、制造主人关系并调用旧国家身体。阶级身份可以用作重新赋位的标签，群众动员也可以用于甄别与清洗，统一组织则可以把专业人员的能力从旧国家关系中剥离出来，绑定至新的政治核心。宣称消灭旧秩序的主义并不需要消灭所有旧知识和旧人员；它可以攻击旧秩序的政治合法性，同时保留旧对象的外壳、专业能力以及技术、城市、机关和文化外观中有用的部分，只改变其最高政治权重。

党组织内化为识别与重排人口的器官，满洲提供的工业外骨骼则是满清共产主义取得现代化、工业化、军事化和国家化能力的外部支撑。这副外骨骼包含战前形成的煤钢电、铁路、港口、维修、军工、城市、学校、研究和科层组织，既包含物质设施，也包含按时刻、岗位、身份和命令运行的人群。政治核心由此进入了一个已经被工业和行政组织过的社会。

在这些外部支撑内部，各项设施与组织原本就交织在一起。煤矿不仅是资源，还包含运输、动力、承包、监督、技术岗位和劳工管理；铁路连接矿山、工厂、港口、仓储和城市；车辆工场意味着制造、装配和维修知识可以聚集；工业城市把工人、工程人员、管理者、学校和行政机关放在可调动的空间里。满铁调查部代表计划和调查能力，表明现代统治不仅需要枪炮，还需要把人口、资源与交通转成表格和决策。

工业外骨骼属于满清共产主义的生成过程，使政治核心的捕获与重新赋位不再局限于人口和官署，而可以伸向铁路网、工业城市与现代科层国家。这一殖民工业结构中存在着明确的等级和暴力：技术职位民族分层、正式与非正式劳工差异、工资不平等、监督暴力以及商业统制失败，共同说明外骨骼本身带有压迫结构。至于中共后来如何处理这些人员和设施，工业外骨骼怎样被接收、修复、调用和重新赋位，则仍须具体的历史证据，战前材料不能替代对这些战后问题的证明。

满洲国工业—东北野战军—中共入关的链条，正是在这里与不可拆分的对象相连。政治核心的捕获与重新赋位，使工业设施和组织能力能够被接入新的权力关系，工业外骨骼则为完成第二次入关提供现代支撑。这是满清共产主义内部政治核心与工业外骨骼的接合，而非两个理论对象的拼装。战后接收、修复、人员、装备、运输和军事调用仍须分别核实；分开核实这些具体箭头，不等于把对象重新拆开。

五、统治技术的“优越”与换壳延寿

说满清共产主义在统治模式上更优越，很容易被误听为赞美。这里的优越只属于统治技术，不涉及道德、文明、民族或制度价值。它不是一份需要在清朝与共产主义之间凑齐的优缺点清单，而是指向一套更有效也更危险的权力结构。这种技术优势集中体现为四种能力：效率、韧性、捕获能力与换壳能力。

效率表现为政治核心能够迅速识别关键节点，不必把全部旧国家清零，就能取得税收、交通、技术与行政能力。韧性使组织在局部制度失效或理论信誉下降时，仍能依靠其他外壳和关系继续运行。捕获面对的是异质人口、专业人员、旧机构，乃至反对旧主义的新语言，这些对象都可能被保留并重新赋位。换壳则发生在旧名称和理论无法继续提供合法性时，现实权重可以进入新组织、新媒介和新主义。

满清共产主义的换壳能力格外强。它不把自己的生命押在某套理论文本永远有效上。它可以把教义本身也当作捕获对象：保存一部分名称，废弃一部分内容，转移现实功能，再寻找新的外壳。借壳、换壳和夺舍不是思想自由交流的诗意说法，而是外观保存、内部权重转移的政治过程。当一种新主义出现时，只要能提供新的合法语言、传播渠道或敌我划分，就可能被捕获。新主义可以有真诚信徒，也可以公开反对旧共产主义，其实际功能仍可能被更早的高权重结构控制。旧口号失去解释力时，组织和资源仍可存在；旧主义可以死亡，高权重的政治生存逻辑却能够换壳继续存在。这种延寿能力，正是统治技术优越的核心之一。

这四种能力越强，受统治者越难仅靠揭穿一种谎言或推翻一个口号摆脱统治。问题不只在口号里，也在组织位置、资源关系和政治生存逻辑里。一个人可以不再相信旧教义，却仍按它制造的权重环境行动；一个机构可以更换名称，却继续以相同方式分配安全与机会；一个新主义可以公开反共，却在现实中复制捕获、敌我重编和夺舍。技术优势直接转化为危险的延寿。

这也解释了为何不能仅满足于指责共产主义的愚蠢。把对手写成纯粹无能，无法解释它怎样取得并维持大权。共产主义的理论可能不断制造解释危机，满清共产主义的组织却能够从危机中寻找猎物，甚至把人们对旧理论的厌恶变成新外壳的资源。只有承认这种统治技术的有效性，批判才不会停留在道德愤怒上。

承认统治技术有效，并不等于可以把每一项具体历史结果写成脱离条件的必然。民族历史经验、群体延续与人工环境分别承担怎样的具体因果位置，仍是未决问题。具体人物、设备、政策和军事结果仍须由材料证明，考证工作尚未穷尽具体环节并不等于理论方向已被反证，而理论同样不能脱离现实条件凭空运转。捕获需要可用对象，换壳需要新外壳；表演性忠诚需要中心仍能分配资源，工业外骨骼也需要维护和人员。更重要的是，这套政治生存逻辑的扩散会削弱中心垄断。越多人学会判断权重、借用语言和嵌入组织，越可能有人把同样技术反向使用。这正是“兴于满洲，亡于满洲”能够从兴起链进入终局链的原因。

六、完整兴亡链与捕获—重新赋位

这一不可拆分对象在历史展开中呈现为一条从兴起到终局的完整链条：后金式政治核心通过捕获和编组形成力量，入关后调用旧国家躯体，以高权重节点嵌入社会；共产主义则使这套政治生存逻辑现代化、工业化、组织化并推向全国。满洲国工业及组织遗产提供工业外骨骼，东北野战军等力量形成后，中共完成入关。中华苏维埃政治核心占据中华民国大陆国家躯体，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 / 后清。制度制造人工渔猎环境，训练主体社会判断权重、寻找主人、表演忠诚、嵌入组织并捕获资源。旧理论发

生解释危机，权重结构便借新主义续命。直到社会和体制内部都掌握同样的政治生存逻辑，中心失去独占。失去独占提供了反用的条件，但并非即时崩溃；当资源基础与合法性条件发生变化时，具体人员和组织重新判断主人、猎物与运用方向，同一能力实际被反向施于中心，满洲反噬由此发生。兴于满洲，亡于满洲。

不能把其中的每个历史箭头都当成已经得到证明。对象的不可拆分性属于理论定义，具体设备、人员、政策和人物因果属于历史论证。“满清共产主义”具有不可拆分的对象边界和可以识别的动作方向。若只停留在名称和总因果链上，概念就可能膨胀成过大的标签，把任何仅凭主观好恶挑出的现象都装进去；要限制口径，就必须找到一个可以辨认的最小动作。

这个最小动作不是宣传、暴力或同化本身。宣传和暴力可以参与其中，同化有时也会发生，但它们都不足以说明满清共产主义最稳定的能力。真正的基础是捕获—重新赋位：先识别对象并决定保存什么能力，再以新的政治名称覆盖旧身份，把人、机构与资源重新编入组织，进而改变其主人关系、忠诚关系和最高权重。对象可能仍然活着，机构可能继续运行，外壳可能保存，原来的政治位置却已经消失。

捕获不意味着全盘保存。无用或危险的部分可以被摧毁，拒绝服从者可能遭到暴力，迁徙、清洗和剥夺也可能伴随整个过程。重新赋位同样不等于被捕获者境遇得到改善。专业人员继续工作，只说明其能力仍被需要；机构继续存在，也只说明它还能被调用。无论是后金把分散人口变成力量、清初把旧官署接到新政权，还是现代党国处理旧国家身体，都必须从这个动作来看。

一具国家躯体发生这种易主，普通类比无法解释，因为行动者是不可拆分的满清共产主义。它的核心动作正是捕获—重新赋位：把一个被捕获的人、一项能力或一个机构从旧关系中取出，再放进新关系之中。

第一章　不是相似：满清共产主义这一不可拆分对象注释

一、关于共产主义煽动机制的原始论述，见未刊对话文稿《古文复兴（政治启蒙）－共产主义煽动机制分析》（成文日期未详）第 3 行。关于“所以人们认为，共产主义里面，不是蠢就是恶，没有例外。”见未刊对话文稿《古文复兴（政治启蒙）－中共与蠢人制造机制》（成文日期未详）第 919 行，前文第 751—753 行讨论共产主义治理中参与屠杀、日常强制和程序性失真。相关论断不把所有具体个人的经历与动机写成同一种事实。

二、“先末日后重建”概括一种动员结构：不承担现实治理成本的一方，可以持续放大现存秩序的缺陷，并把尚未到来的社会作为无限延期的许诺。作者原始文稿见未刊对话文稿《古文复兴（政治启蒙）－共产主义煽动机制分析》第一作者轮第 3—4 行，成文日期未详。具体历史事件仍须分别举证。

三、“满清共产主义”是不可拆分的对象名称。分别追溯后金、八旗、入关、共产主义现代组织技术和满洲工业条件，是分析同一对象内部的生成过程，不是把它还原成两套成熟对象的事后拼装。

四、满洲渔猎首先作为涉及政治与组织层面的政治生存逻辑使用，真实渔猎生活史只作有限辅助；不能以“善于真实狩猎，所以善于现代政治”的一步跳跃代替组织史、制度史和历史传递链。民族历史经验、群体延续与人工环境之间的具体因果关系，将在后文继续展开。

五、“统治技术优越”只指效率、韧性、捕获能力和换壳能力，不包含道德、文明、民族或制度价值上的赞扬。

六、蒙元共产主义与“人工草原”只作为比较接口，用来观察不同政治—组织环境；它们不取代满洲渔猎主轴，也不把满清共产主义拆成满洲渔猎与蒙古游牧的机械加法。

七、党组织、宣传、群众动员、政治身份、现代军队、工业国家、户籍、单位、学校和媒体，是满清共产主义内部的现代构造。它们各自的制度史和具体作用，需要在后续章节中依据材料展开。

八、工业外骨骼的战前材料能够证明满洲存在煤钢电、铁路港口、维修军工、工业城市、技术教育和科层组织，却不能直接证明一九四五年后的完整接收、修复、人员去向、装备来源和军事调用比例。

九、“兴于满洲，亡于满洲”是强因果判断。兴起链中的具体设施、人员、运输、装备与战役调用，终局链中政治生存逻辑的扩散、中心失去垄断和满洲反噬，仍须在后文分别建立证据与观察指标。

十、“捕获—重新赋位”包括识别对象、选择性保存能力、政治命名、组织重编、资源与忠诚绑定以及最高权重重置；它也包含强制、暴力和选择性摧毁，不是温和融合或单纯制度继承。

第二章　捕获—重新赋位：满清共产主义的最小动作

一、活下来，不等于还在原来的位置

第一章确定了命名与因果链，接下来要说明的是：一个政治核心如何将原本不属于自己的人、能力、组织和资源从旧关系中剥离，置入为其服务的新关系中。这一过程不能以“吸收”概括。“吸收”容易掩盖战争、强制、迁徙、惩罚、甄别与依附，暗示平等的结合。政治核心无须先说服对象认同其世界观以换取能力，而是首先夺取决定对象安全、资源、身份与组织位置的权力。即便对象保留原有的语言、家庭、职业、记忆或名称，只要其命令来源、忠诚条件与上升机会改变，其政治位置便已不再如旧。

这一动作即捕获—重新赋位。它不是一句关于“善用人才”的漂亮比喻，而是一条连续的政治—组织链：先识别对象，判断谁危险、谁有用、谁掌握可调用的关系和能力；再以战争、威慑、投降、归附、俘获、迁徙或资源控制，使对象失去原先可以自行决定政治归属的空间；随后不把一切都清零，而是从中区分可保存与须摧毁的部分；最后以新的名称、编制、主人关系、忠诚条件和资源位置，把保留

下来的部分接进新的命令链。它的终点不是“对象被容纳”，而是异质对象被变成政治核心自己的力量。

捕获是发生在敌我划分、暴力能力与资源控制之中的政治动作，而非中性的行政评估。政治核心识别出火器、地方关系、文书知识或军事经验时，面对的不是可自由交易的无主工具，而是嵌在既有关系中的人。要将能力转化为己用，必须改变承载者向谁负责、由谁保护、能否取得资源以及以何种身份存在。能力不能脱离人而转移，人与原有主人、组织、家庭、地域及政治位置的联系，正是捕获所要切断、改写或绕开的纽带。

征服史最容易造成的误会，是把毁灭与保留当作两种彼此相反的道路：仿佛一方若没有把对手全部杀尽，便一定是在尊重对方原有秩序；仿佛一项制度若被继续使用，便意味着旧制度仍拥有自己的政治生命。实际上，保存能力与保存政治自主是两回事。前者可以被新核心有选择地允许，后者却往往正是它要取消的对象。

后金早期材料中，李永芳降后受授总兵官并获得婚姻关系；抚顺降民得到田庐、牛马、衣粮，材料还记载其间仍依明制设置大小官属，由李永芳统辖。这些事实不足以推出一项普遍、稳定而仁慈的降人政策，更不能替具体降人规定内心动机；但它们足以显示一件更冷的事情：旧的职能、家庭关系和部分行政形式可以被保留，保留的条件却已转到新的统辖关系中。旧形式没有自动带来旧主权。官属仍可办事，粮食仍须生产，家庭仍要生活；决定这些人由谁统辖、向谁证明服从的权重，已经改写。

这一点也使“活下来”不再是一句天然带有解放意味的话。一个人活下来，可能是因为他被赦免、被赏给资源、被编入军队，也可能是因为他被俘、被迁徙、被分配或被迫在新主人关系下继续劳动。对象未被消灭，并不说明对象免于强制；对象还可使用旧能力，也不说明能力仍服务于旧的政治共同体。捕获最有效的地方，恰恰在于它不必把一切外观都毁掉。它可以让对象保持足以工作的形态，同时改变对象工作所服从的方向。

这也是满清共产主义不能被写成只会摧毁的原因。纯粹摧毁会一并损失税赋、技术、记忆、地方关系、军事经验和组织能力；纯粹同化则需要漫长时间，且未必能迅速取得可用的力量。捕获一重新赋位走的是另一条路：在强制的背景中筛选，把有用的部分留下，把危险、拒绝服从或不再可用的部分清除、分流、压制或毁坏；让留下来的对象以新的位置继续运转。被保留并不等于获得宽容或政治自主。对有用部分的保存，与对危险、拒绝服从部分的清除与毁坏，完全可以在同一套权重结构中并行、相接，甚至同时发生。

这里所说的“最高权重”，不是抽象的权力总量，而是决定安全、资源、身份、惩罚和命令最终由谁裁断的位置。一个旧官仍可保有文书能力，一支降军仍可保有作战技能，一个家庭仍可延续日常生活；但如果任用、粮饷、保护、奖惩和组织资格均需穿过新的中心，旧身份便不再拥有最高权重。捕获不是把人从一个岗位搬到另一个岗位，而是把其生存条件重新接到新的主人关系上。

二、捕获不是接纳

后金的扩张不是一幅单色的“收编”图景。现有实录材料所呈现的，既有赦免、授职、给与资源，也有攻杀、俘获、迁移和分配。渥集部的材料中，一面有招降、留人护民，一面也有攻城、斩杀和俘获；雅揽等地又可见先招路长迁其家口、后续军事攻击与俘获的连续动作。乌拉战败人口的处理同样显示分流：有些来归者得到归还妻子仆从并被编户，另一些俘获者则被分给军队。这里没有一条可供歌颂的单一路径，也没有一个可以替全部人下定义的心理动机。

接纳预设对象进入新关系时享有协商地位，捕获则强调新核心单方面掌握了决定对象能否存续及如何存续的权力。归附、投降、被俘、早期投靠与被迫服从在经验上有不同动因：出于安全考量、保全家庭或部众生计，或单纯受制于战争结果。在材料不足时，不能代判具体当事人的内心是真诚、伪装、投机还是信仰。这些不同路径可以在一个结构上相交：它们都可能被新的政治核心放入可调用的组织关系中。

把归附全写成真诚信仰，是对战争条件的抹杀；把所有人都写成纯粹机会主义，同样是在替材料没有提供的内心作断言。核心问题在于，不同来源、动机与进入时点的人，如何被安置进同一套可调用的关系。这一生产机制不以统一灵魂或要求一致的情感为前置条件。有人可能为求生而服从，有人可能为资源而靠近，有人可能为保全亲族部众或职业位置而进入，有人可能真正认同新秩序，也有人始终保持距离；历史材料若不能确认，就应当停止在这里。捕获—重新赋位依靠的是对安全、资源与组织资格的再分配，由此使不同的人即使保有不同动机，也被推入同一命令链中持续运作。

捕获也不等于同化。政治核心并不必先把降人变成与自己完全同质的人，才能使用其能力。相反，异质性本身常常带着可用的内容：熟悉地方的关系，掌握原有军队的经验，保存工艺、语言、文书或行政知识。被捕获者可以继续是原来的民族成员、职业者和家庭成员；正因为这些旧身份还保存着能力，才有被重新赋位的必要。真正被改写的是它们在政治链条中的位置：谁能调用这些能力，谁能要求证明忠诚，谁能把资源与保护分配给它们，谁又能取消这种分配。

满洲渔猎在这里不是关于弓箭、山林和服饰的装饰性来源，而是政治与组织层面的政治生存逻辑。特定的满洲历史主体及其政治组织生存逻辑，不同于无主体的文化影响或一般的制度适应。但这套政治生存逻辑不能用“善于真实狩猎”跳过组织史，直接推出一切现代政治行为。它关心的是怎样识别对象，怎样判断对象能否成为力量，怎样在不把一切清零的前提下改变对象的归属。把这套政治生存逻辑缩小成机灵、拟态或换壳，会遗漏其中最硬的部分：围定对象、分辨敌友、实施强制、重新编组、规定主人关系、把安全与资源作为忠诚的条件。运动、清洗、大叙事和敌我划分在后来的现代条件下能够承担何种规模，留待后文展开；在这里首先要看清的是，这些动作并不因外壳不同而失去捕获的结构。

“自己人”并非仅依血缘或族名界定，它由进入组织的先后、归附路径、主人关系、可见的忠诚以及资源分配共同决定。政治核心并非在心理层面辨识真诚，而是在组织中生产可被观察、调遣的自己人。

早归附者、携带部众或能力者、能进入关键关系者，可能取得不同于后来的战败被俘或被迫迁入者的位置；但归附并不是一个无差别的名词，进入时间与方式会影响其组织自主、资源位置与信任程度。

海西战败人口的迁徙与编组体现了这一差异：战败被迁者较少自成牛录，主动加入者则较可能保留同伴组织。现有材料不足以推导出“早来必优、晚来必压”的绝对法则，但能表明归附路径制约着旧关系的保留形态与新组织中的位置。政治核心将进入时点、方式、所携部众、可用性与可信度转化为不同的政治等级。旧身份、家庭与地方纽带并未完全消失；但当个人的安全与机会必须经由新旗分、牛录、主人与统辖者获取时，新确立的政治身份便重写了权重。“自己人”并非温情共同体，而是一种由组织位置、资源资格、保护关系与忠诚证明共同构成的政治身份；它并不抹平差异，而是意味着某些人能更靠近资源与保护，另一些人则要在更低的位置证明自己仍可被使用。

主人并非个体的心理投射，而是统摄保护、惩罚、职位、粮饷、身份与上升机会的权重位置；依附则是对象赖以获取生存条件的结构事实。忠诚既被要求以服从和服务的外在形式展现，同时也被差别化的资源、资格与保护机制持续生产。后来的现代组织会把这些关系扩大、规范化和全国化，但它们并不因此自动变成价值中立的行政流程。

三、从人口到旗：政治编组压到旧身份之上

人被捕获之后，若只停留在一次性的投降或俘获，政治核心只能得到零散的人口，不能得到稳定的力量。重新赋位必须进入组织。名称若不进入编制，忠诚若不连到资源，能力若不被放入可重复调用的关系，一次军事胜利很快会重新散掉。后金的牛录、八旗及其后续分化，其关键并不在于作为任何现代组织的名称对照，而在于它们让人口、军事、家庭、资源、身份和忠诚能够被压进同一政治结构。

现有研究显示，常设军事牛录约在十七世纪初形成；严格意义的八旗形成于 1615 年前后；蒙古八旗至 1635 年形成，汉军八旗则经历更晚的过程，至 1637 至 1642 年才成为独立体系。这一形成过程的阶段性表明，后来成熟的旗制、汉军或包衣位置，不能被静默倒推为努尔哈赤早期就已经整齐存在的一张制度地图。但分期的复杂性并不取消其机制意义：牛录和旗制把战士及家庭登记、训练、管理并置，组织所处理的不只是战场上的单个身体，也是可供持续动员的人口关系。

这正是编旗与普通征兵不同的地方。普通征兵可以把人临时带到战场；政治编组则把人的安全、训练、日常生活、家庭关系和资源取得，纳入一个新的可见秩序。旧关系未必都被切断，有些旧首领和同伴组织甚至可以被保留；但它们被保留的方式，已经不是作为独立力量与新核心并列，而是作为新核心能够分配位置、规定责任的内部环节。Elliott 对早期来归首领及其同伴组织的研究指出，部分主动来投的首领可保留同伴和地域组织，并在世袭牛录职位中得到新位置。这不是所有归附者的普遍轨迹，更不等于平等接纳；它恰好说明“保存旧组织”可以与“改变组织主权”同时发生。

八旗因此不能只被理解为民族标签，也不能只被缩小成军队番号。它是一种将人口、军事、社会、行政和经济关系交织起来的组织形式。组织一旦压到旧身份之上，原有的民族、地域、职业和家庭背景

并不自动消失，却不再独自决定政治位置。一个人属于什么来源，何时进入，是否带来可用关系，能否取得信任，都会在新的编组中获得不同后果。旧身份被保留，并不等于它仍能决定对象向谁负责。

这也说明政治命名为何如此重要。命名并不是给已经固定的人贴上一张没有后果的标签。授官、编户、入牛录、进入某旗、获得或失去独立户资格，都把人放入不同的命令、保护和资源关系。名称在这里不是描述，而是赋位。它说明对象从何处被看见，由谁处理，能否被调动，以及其能力将以何种形式进入新的核心。不同身份不可混成一类：旗人、汉军、包衣、归附者、投降者、早期来投者有不同来源、阶段、法律位置和实际待遇。但这些差异并不妨碍它们共同显示同一个动作：旧关系中的对象被重新命名、重新编组，进入新的政治权重。

捕获—重新赋位最容易被现代语言遮蔽的部分，是主人关系。现代人习惯把各种不对等关系抽象成“管理”“协调”或“行政归属”，仿佛只要关系出现于制度之中，它就不再涉及主人与依附。但在政治核心处理异质人口的过程中，决定安全、资源、身份、惩罚和信任的人，不只是一个普通上级；他处在能决定对象是否仍可存在、以何种位置存在的权重之上。把这种关系称为主人—依附，不是把一切历史关系退回私人情感，而是把其政治结构重新说出来。

主人关系首先决定安全。被纳入者能否得到保护，能否免于惩罚，能否保留家庭，能否在战争后继续拥有田庐、牲畜、衣粮或职位，并不由其旧身份自动保证。它取决于新政治链条是否承认其可用性和服从。其次是资源。资源不是单纯的报酬；在高度不对称的政治关系中，它也决定对象能否维持生活、组织部众、获得上升机会。再次是身份。一个人是否可被称为自己人、是否可信、属于何种编制、由谁担保，都会改变其在新秩序中可做什么、不可做什么。

这里的忠诚也不是一句内心独白。政治核心无法直接进入每个人的内心，它只能通过服从、编制、服务、担保、资源往来、战争表现和日常关系来判断、奖惩和再判断。忠诚因此成为可被组织化的条件：它影响安全，影响能否接近资源，影响对象是否被继续使用。反过来，资源和保护又使忠诚不只是情感，而成为生存关系。主人—依附不是普通职位关系，正因为它把政治服从、可用性和现实生活条件连在一起。

这条关系能够压到原有民族、地域和职业身份之上，并不意味着这些旧身份全部失去意义。恰恰相反，旧身份所携带的能力、网络和差异，常是政治核心需要识别和调用的内容。主人关系的强处不在于把所有人磨成同一张脸，而在于让不同的人以不同位置向同一最高权重提供作用。它保存差异，同时规定差异由谁使用；它允许外观延续，同时取消外观所附带的政治自主。

四、两种路径：包衣与汉军

包衣材料尤其要求避免两种相反的简单化。一种做法把所有包衣压缩为同一种“奴隶”，好像来源、时期、职务和实际位置均无区别；另一种做法则因其内部复杂、有人可承担特殊职务，便把主人—依附的关系冲淡成普通服务。两种写法都看不见重新赋位的核心。

研究所见的 aha 与 booi 包含多种来源：购买、俘获、惩罚性奴役以及不同族群的进入路径都可能存在。旗制形成后，booi 被编入特定牛录，并依附于主人旗。这样的材料可以支持一个有限但重要的判断：非自由身份、组织编组和主人关系能够被连在一起；它不能支持把 booi 等同所有奴隶、所有汉人俘虏，或把每一位包衣都写成处于同一低位。尤其清代后期帝室包衣所承担的特殊任务和重要职务，不能不经区分地倒推到努尔哈赤早期。

但复杂性不等于结构不存在。包衣的关键并不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整齐的身份定义，而在于它把“人还保留能力”与“人已处于新的主人关系”置于同一位置上呈现得格外清楚。服务、资源、亲近政治核心、可被调用的技能和身份依附可以相互连结。一个人能够在制度中承担职务，甚至接近权力，不表示他因此获得独立的政治自主；相反，接近本身可能是依附关系所提供、也所限制的位置。

这也让“保存能力”显出其危险性。被保存的能力可以是家务、生产、文书、工艺、军事后勤或其他专门技能；能力继续发挥作用，不说明其承载者免于等级和约束。政治核心并不需要在每一处都亲自掌握所有技能。它只需要使掌握技能的人无法脱离新的关系而独立调动自己的能力。此时，能力从旧主人的网络中被剥离，又在新主人关系中取得可用性。捕获不是把能力抽象成无主物，而是重新规定能力连同身体、身份和资源应当向谁服务。

包衣也表明，主人关系不是纯粹私人化的、封闭在家庭院落里的关系。它可以经过旗制、牛录、内务系统、资源供给和政治亲近而制度化；恰因为制度化，它才不必依赖每一个主人逐一面对每一个依附者。个人关系可以进入组织关系，组织关系又可以把个人的安全和上升机会重新分配。这种历史关系不能被机械映射成某一现代机构，但它所揭示的结构十分清楚：当安全、资源、身份和可用性被高权重中心统一规定时，依附可以穿过不同的制度外壳延续。

如果包衣使主人—依附与能力保存的关系显形，汉军及相关汉人军事、技术人员的经历，则更直接显示异质对象不必先被消灭或在民族意义上完全同化，便可被转成政治核心的力量。这一过程存在明显的阶段演进与时间差，早期汉军试验、解散、重组和独立汉军八旗的形成并非一次完成：1621 年前后已有试验，1625 年又因冲突和不信任而解散并转向农业劳作；1631 年出现重组；至 1637 至 1642 年才形成独立汉军八旗。不能把这条曲折过程写成一条从一开始就成功的直线。

试验与解散本身表明，能力一旦被识别，并不自动变成稳定的政治力量。新核心需要判断可信程度，处理冲突，重新安排身份和组织位置；一次招降、一次编入或一项技术的存在，都不足以保证持续调用。并非只要看见有用的人，就必然成功地将其完全收编；相反，试验解散恰好揭示捕获—重新赋位的困难：政治核心要的不是单纯人口数量，而是能够在新的权重下持续运作的人口与能力。

1631 年的重组材料则提供了另一面。部分此前降为奴者被恢复独立户，汉人铸炮与火器知识成为重组中的重要条件。这里可以观察到身份调整、军事组织和技术调用如何同时发生：对象不是以抽象的“汉人”身份被使用，而是在具体能力、编制和新的政治归属中被重新安排。此事不能推出所有汉人

待遇改善，也不能凭它补出每个人的后续履历、人数和实际贡献；它却足以反驳另一种误解，即政治核心只有把异质对象变成自身民族的复制品，才可能调用其能力。

汉军的意义不在于提供一个“民族融合”的温和故事。编组没有取消差异，内部等级与来源、出生、职业、法律身份和纳入方式仍会产生不同位置。汉军也不是单一来源、单一身份或同一时点形成的群体。正是这些差异，说明重新赋位的工作不是抹平一切，而是将差异置于新的政治链中。原有军事经验、火器知识、组织能力可以被保存；它们能够转化为谁的力量，则取决于编制、信任、资源和命令的重新安排。

所谓“把异质对象变成自己的力量”，在这里不应被理解为一句无成本的效率口号。它的前提是战争和强制所打开的不对称空间，过程则包括甄别、分层、试验、失败、重组与惩罚。统治技术的有效性正因此不值得赞美。它越能避免把全部可用能力同敌方一起毁掉，越能在不彻底同化的情况下迫使异质对象进入新命令链，越显示出其危险的韧性。反对这种结构，不能靠把它写成纯粹愚蠢；若它只能制造混乱，便无法解释它何以能在更大范围内扩张。

五、保存什么，摧毁什么

捕获—重新赋位包含选择性摧毁的一面。若仅见保存，容易将统治技术误解为包容；若仅见摧毁，则无法解释征服如何转化为持续的能力。后金早期的战争材料表明，招抚、赦免、分编、攻杀、俘获、迁徙与分配并非线性的道德演进，而是可能在同一扩张过程中并行。政治核心对对象的衡量始终综合了归属、可用性、危险程度、可控性以及保留价值等多重判断。

强制与保存并非互斥。恰是在暴力已经改变对象处境之后，政治核心才更有能力决定谁获赦免、安置、保留部众、分流或入编。保存并非强制的退场，而可能是强制取得选择权后的结果。保留家庭，可以是为了稳定人口；保留首领与同伴组织，可以是为了调用地方关系；保留官职、技术或文书，可以是为了使新命令不必从零开始；保留名称与外观，可以使对象更容易继续承担旧有功能。但任何一项保留都可能以纳入新统辖、编制、资源条件和忠诚要求为前提。一旦对象被判断为危险、多余、拒绝服从，或者其旧关系不再容许新核心确立最高权重，清除、分流、惩罚与毁坏便可以出现。

不能将每项具体处置都视作预设的总体计划。历史材料多呈现具体的战事、封赏、迁徙或编组，难以据此还原决策者的完整心理或制度目标。我们既不能从个别赦免案例推及普遍政策，也不能将官修叙述径直视作自由同意，更不可将后期制度形态投射回早期的战争状态。但这些边界并不妨碍提炼其共同结构：对象的存毁不再取决于其原有的政治关系，而取决于新权重下的筛选。

摧毁不局限于杀戮，也包括拆散旧组织、切断旧主人关系、阻止对象自行聚集、取消特定身份资格以及将人口分配到不同编制之中；保存亦非单纯让人活着，而是让被保存者在可被调用、可被看见、可被奖惩的框架下生存。两种动作共同把异质对象从旧秩序中剥离出来。核心越是能在摧毁与保存间建立分层而非实施无差别抹杀，越能将战果沉淀为组织力量。不能凭少数个案断言存在普遍的保存能力政策，更不能说每一位被俘者都被有效重用。现有证据多为部分、个案或组合证据，许多个人的持续

履历、实际贡献与后续待遇仍待补充；官修实录中关于赦免、奖赏与“愿留”的记录，还可能带有追述与程式化问题，不能被直接翻译为自由选择。严格划定这些具体事实的证明范围，既不把捕获—重新赋位缩成模糊的相似性，也不让强命题依赖伪造的全称叙述。

这里也必须拒绝把“有用”理解为纯粹技术性的价值。谁被判定可用，始终与政治危险、服从可能性、主人关系和资源控制相连。掌握能力的人不必因能力本身而得到安全；能力只有在新核心决定接纳、控制并重新安排它时，才可能成为保存的理由。所谓可用性，从来不是对象自己的天然权利，而是政治核心在捕获之后作出的权重判断。

满清共产主义的危险，不在于它总以同一种暴力消灭对手，而在于它能够在摧毁与保存之间不断选择，使保留下来的对象失去原有的政治自主。一个对象仍有自己的外貌、语言、亲属、职业或局部组织，不代表它仍保有原先的最高权重。外观越能继续，权重转移反而越容易被忽略。人们看见旧物还在，便以为旧秩序还在；看见旧能力仍被使用，便以为能力的主人没有改变。捕获正是在这种误认中获得持久性。

六、忠诚、资源与外观的连续

重新赋位若仅停留在名称与编制上，不足以维持长久。只要安全、粮食、住所、家庭、资格与上升机会仍可绕开政治核心获取，新名称就只是浮于表面。捕获的持续依赖于将忠诚转化为现实约束：使对象越来越难在不经过新关系的情况下取得生存与行动所需的东西。

田庐、牛马、衣粮、官职、婚姻、部众安置、是否保有同伴以及能否进入特定编制，构成了具体的控制形态。资源并非纯粹的经济报酬或无条件的福利，而是标定对象是否可用、是否受保护、是否享有组织存续资格的依据。对政治核心而言，资源是检验与塑造忠诚的手段，通过界定何种服从带来保护、何种拒绝会失去位置，忠诚由此获得可被组织核查的外在形态。

安全同样如此。战争环境中的投降、归附、迁徙和被俘，首先是安全被重新决定的时刻。一个人、一个家庭或一群部众从旧关系中脱落后，谁能使其免于杀戮、掠夺、饥饿、惩罚与再次分散，谁就不只是提供服务的人，而占据主人位置。这里没有必要把每一份保护都浪漫化为恩赐，也没有理由将一切资源关系解释成纯粹恐惧。更准确的说法是：保护和风险被集中到新的权重结构中，依附者不得不围绕这一结构重新安排自己的可见忠诚、家庭与能力。

忠诚的生产不以旧身份的泯灭为前提。归附者的地域记忆、汉军的语言与技能、包衣承担的特殊事务、早投首领携带的同伴，均可获得保留，前提是它们只能在新主人关系内运转，成为新组织可管理、可分层调用的组成部分。政治身份凌驾于旧身份之上，决定着后者何时可用、何时可见、何时构成危险。“自己人”作为享有资源与安全的政治资格，不仅关乎谁能靠近核心获得保护、谁的能力被认作有用，还涉及谁必须反复证明自己、谁被安排在更低的位置，以及谁会因旧关系或不可信而遭排除。这种资格会随战争、组织分期与政治判断动态变化，不能被写成永恒不变的身份。但只要资格的分配仍握在

核心手中，自己人就会被不断制造出来。它不是已有同质性自然长出的结果，而是捕获—重新赋位在日常生活中的持续产物。

捕获—重新赋位能够形成一种表面上的连续性。原有技能、部分首领与同伴的附随、未全拆散的家庭，乃至局部沿用的旧官名与办事习惯，常被误判为对旧秩序的认可。实际上，保留外观常常正是为了避免从零开始重造能力。它要的是调用已经会做事的人、已经连着地方的关系、已经能够供养和组织人口的接口，而不需要把每一个接口都改造成同一种外形。外壳的保留并非对旧权重的让步，而是新权重进入旧外壳的方式，后文所说借壳、换壳和夺舍便由此展开；外观的连续与政治位置的断裂可以同时发生。

这也是为什么捕获比单纯消灭更难被辨认。废墟让人一眼看见征服，继续运转的机构却常使人忽略征服已经完成。人还在做原来的事，组织还保有熟悉的名称，生活的表面节奏也许没有立刻断裂；可当资源、任用、保护和惩罚的最后裁断已经转移，原来的事便被放进了另一条命令链。对象之所以能够继续活着和工作，并不是因为它仍掌握原有政治自主，而可能正因为它已经被证明可以在新关系中发挥作用。

对政治名称的认知应避开两种偏颇：既不能认为改名仅是表层宣传，也不能认为沿用旧称即代表旧秩序未变。命名必须与组织和资源挂钩才具备赋位效力。被定为归附者、授予官职、编旗、入包衣或立为独立户，并非字面变更，而是直接对应着特定的保护程度、责任范围、行动边界与服从规范。对象的内心动机往往复杂且难证，但只要对象被放入一套由新核心决定资源、安全和组织资格的关系，其政治位置便已发生事实改变；赋位重构的是组织位置，而非宣告个体灵魂的转化。

服从既非必然出自认同，也不能简单归结为伪装。依附者可以保有判断，甚至在不同条件下重新评估自己的关系；政治核心也必须因而持续进行核验、惩戒与再编组。然而，个人还可能拥有怎样的判断，并不能消除组织位置已经被重写这一事实；依附者的安全边界、资源渠道与行动代价，已更多由主人关系决定。保留对象不仅是调用其现成能力，更是获取其原有网络所携带的接口；利用中介连通地方知识、部众、技能和日常事务，降低了重构成本，但并未削弱其中的强制性、等级分层与权力的剥夺。

从名称、位置到组织、资源与安全，这一连贯路径解释了自主性何以在连续的外观中消解。对象不必被改造成另一个民族，不必立即失去全部家庭和职业，更不必永远放弃旧记忆；它只要失去独立决定自己能力服务方向的权力，便已深陷新的政治结构之中。能力能够继续存在，决定能力服务方向的最高权重却已易手。

七、从被看见到可被调用：完整动作

识别对象之所以必须放在动作链的开端，不是因为政治核心拥有一种超然、准确的“人才判断”。它所进行的识别带着敌我划分，也带着暴力之后的选择。谁掌握城池、道路、火器、文书、人口、粮食或部众，谁的旧关系可能成为威胁，谁的能力可以被转向新核心，谁又须被隔离、拆散或消灭，都不

是在平等条件下提出的问题。识别已经包含权力：只有能够施加后果的一方，才有能力把对象区分为可用、危险、可疑、可留或可弃。

翁鄂洛城中射伤努尔哈赤者后来被赦免、授予牛录并获得供养的个案，使这种识别的尖锐性格外清楚。此例只能作为单一强个案，不能被扩写成普遍制度；但它显示，敌方身份本身并不会永久封闭一个对象的未来位置。政治核心可以在战争敌人之中重新辨认可用者，并通过赦免、授职和组织资源把对方从原有位置拉入新关系。这里的赦免并非仅是道德姿态，它同时改变了对象能否存活、以何种身份存活、向谁承担义务。

不过，被看见不等于立刻可被调用。对象可能掌握能力，却仍与旧组织相连；可能带来部众，也可能带来不信任；可能保存地方知识，也可能保存旧忠诚。于是识别之后总有一段分离与重接：把能力从旧关系中取出，再让其在新编制、新资源和新主人关系中发挥作用。李永芳与抚顺降民的材料之所以重要，不在于它能证明一切投降者都被善待，而在于它让我们看到，官职、家庭、旧制官属和统辖关系可以被同时处理。对象并未被抽象为一项孤立技能，而是连同其可调动的关系一并被重新安排。

这种安排也解释了为何地方知识与中介位置不可忽略。政治核心规模有限时，不可能亲自掌握每一处人口、道路、供给和关系网络。它需要能把命令传入旧社会的人，却又不能允许这些中介独立拥有最高权重。捕获—重新赋位所做的，是让中介保留连接地方的能力，同时把中介取得安全、资源和合法位置的渠道改接到中心。中介越能发挥作用，越显示其不再只是旧网络的代表，而已成为新命令链的一部分。

现在可以把前面的材料压回一条完整动作链。第一步是识别。政治核心并不从抽象的人口开始，而是辨认哪些对象掌握军事、技术、行政、地方关系、组织能力或资源接口；也辨认哪些对象可能构成危险，哪些关系必须被切断。第二步是捕获或迫使进入控制。战争、投降、归附、俘获、迁徙、招抚、威慑与资源控制，为新核心取得这种判断权创造条件。第三步是把能力从旧关系中分离出来：不是把人变成无历史的材料，而是使他原有的能力不再能独立向旧主人、旧组织或旧政治目标服务。

第四步是选择。政治核心决定哪些人、家庭、技术、职位、关系和外观仍值得保存，哪些则须被毁坏、分流、惩罚或排除。第五步是政治命名。授官、编户、入牛录、入旗、取得或失去独立户资格、进入包衣或其他依附关系，都是对象被重新看见的方式。第六步是组织重编。名称要落进实际的命令、训练、资源和日常管理关系，才会把一次性的投降或俘获变成可持续调用的力量。

第七步是主人关系与忠诚方向的重置。对象不必放弃全部旧身份，却要在新的保护、惩罚、资格和资源结构中证明其可用性。第八步是资源与安全的再分配。粮食、田庐、牲畜、职务、家庭保护、组织资格和接近核心的机会，都使重新赋位成为现实后果，而非纸面称谓。第九步是最高权重的改变：保留者所做的事、所掌握的能力和所维持的外观，最终向新的政治核心回流。到这里，异质对象才不只是被控制，而成为核心能够扩张和维持的自身力量。

这条链并不是说每一位被捕获者都会依次经过每个环节，也不是说每个环节都在同一天完成。不同来源、不同阶段和不同身份的人会经历不同路径，制度本身也有形成、失败、解散和重组。它所说明的是一套持续运行的政治—组织逻辑：不是把异质对象简单变成同质对象，而是把其差异、能力和关系重新放进自己的权重结构。八旗、包衣、汉军、归附者和早期投靠者并非没有差别，正是这些具体差异分别呈现了这一逻辑的不同侧面。

这不是说所有中介都会可靠，或所有地方关系都会被核心完全掌握。恰恰相反，识别的持续困难决定了政治核心必须不断观察、奖惩、分层和重编。可被调用并不是天生属性，而是在捕获之后被组织制造出来的状态。一个异质对象被保留，并不因为它天然属于自己人；它是在新的权重结构中被做成可用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满清共产主义所面对的不是“怎样消灭差异”，而是怎样使差异不再拥有独立的政治方向。

八、捕获不是一次完成的命令

捕获—重新赋位并非一纸文书即可落定的机械程序。政治核心必须面对持续的不确定性：昨日归附的人是否仍可信，保留的旧首领会不会重新组织旧关系，技术人员是否只在特定条件下可用，分给军队的人口怎样被维持，新的编制怎样防止再次离散。军事胜利仅仅提供了捕获的契机，无法取代后续的甄别、安置、整训、奖惩与再编组工作。

早期汉军试验的解散表明，单纯占有人口并不等同于完成组织构建。正因为组织必须把能力、纪律、身份和忠诚同时放进新关系，编组才会遭遇冲突与挫败。随后的重组并非抹去失败，而是重新判断哪些能力可用、哪些身份应调整、哪些关系须以新的方式安排。捕获是一个反复将异质对象拉回新权重之下的过程，而非直线上升的发展轨迹。

这种反复性限定了这一机制的经验适用范围。不能将有限的早期个案夸大为无所不能的制度机器，亦不能断言所有入编者均在新关系中稳定、长期而有效地发挥作用；个体履历、地方差异、具体资源数量与后续绩效仍有待核验。但不能因为这些细节尚未闭合，就假装政治核心只做了普通的人员流动。恰恰是反复的招抚、攻击、分流、保留、重组和再判断，使战争所得的人口不只是战利品，而可能被加工为持续的组织能力。对象并非在进入新关系的一刻就完全失去旧联系，旧家庭、同伴纽带、地域记忆与利益诉求依然存续，政治核心也不可能一次看透每个人。重新赋位正是借助编制、资源、主人关系与忠诚证明，在时间推移中持续压低旧关系的独立权重，提高新关系的决定性，使过去越来越难以脱离新中心独立起作用。

满洲渔猎的政治生存逻辑并不赞美所谓“灵活”，它所揭示的是一种持续的围定：对象被反复辨认，位置被反复调整，资源被反复用于区分可用者与危险者，组织关系被反复用来确认谁向谁负责。这种在失败后重组、在异质性中筛选、在保留外观时改变权重的技术，越发不能被写成普通的行政能力，而是一种能够延长统治的危险能力。把对象称为“人力资源”会遮蔽捕获的实质：他们带着旧关系、旧恐惧、旧利益、家庭、技能、地域和可能的抵抗进入新处境；组织力量不是现成物，而是在捕获、

甄别、安置、命名、编组与资源绑定中被制造出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对象都可靠可用；政治核心最终获得的并非天然忠顺的人口，而是经过重新赋位后才可能被调用的关系。

“制造力量”并不等于制造完全可靠的人。任何组织化过程都可能留下不信任、冲突、失败和再次离散的可能。可是，政治核心若能够把这种不确定性转化为持续的分层、考验与再分配，它便不需要等待纯粹同质的人口出现。它可以在异质性中工作：让不同来源的人承担不同位置，让旧能力保留其功能，却使功能的最终方向回到新的最高权重。满清共产主义不是简单消灭异质对象，而是把异质对象变成自己的力量。政治效率并不能把暴力洗白，保留对象也并不等于尊重；相反，正因为对象仍保有可用能力，政治核心才更有必要取得对对象的主人关系。力量越来自异质对象的被重新组织，统治便越不需要承认那些对象原有的政治自主。

九、从人到国家躯体

“融合”一词之所以不够，在于它遮蔽了最关键的问题：究竟由谁决定融合的条件，谁有权把对象留在原地、移到别处、编入此处或排除在外。若这些决定由新政治核心单方面作出，那么对象之间即使发生共同生活、通婚、语言接触或制度协作，也不能替代捕获的事实。共同生活可以在主人关系已经改变之后发生，文化差异亦能在政治自主已被取消之后继续存在。

同样，政治权重的转手也不是抽象术语。它落在具体的生活后果中：对象的部众由谁统辖，家庭由谁保护，粮食与住所从何处取得，职务如何授予，惩罚由谁执行，谁能作为可信者进入更靠近核心的位置。只要这些后果的最终裁断不再来自旧关系，旧对象便已被重新赋位。捕获的完成不要求人人改口称赞新秩序，它只要求旧能力和旧关系无法再以原来的政治方向独立运作。

八旗、包衣、汉军与归附者不是若干等待分类的制度名词；它们分别显示了人口、身份、主人—依附、能力与忠诚怎样被放入可调用的结构。满清共产主义在此不是后加的标签，而是一个不可拆分的对象，其基础动作正是捕获—重新赋位；捕获、重编、主人—依附和最高权重的重置，后来将在现代共产主义组织技术中得到更大的尺度。但不能把眼前的动作缩小成无害的制度调整，更不能以此逾越边界：个人被重新赋位的材料，不能自动证明 1644 年以后每一项旧国家能力都以同样方式被接收；从入关前的机制，也不能直接推出后来的机构调用是其必然结果。现有关于旧官、中央机构、财政、漕运、驻防和满城的材料需要在后文分开处理，具体人物的持续履历、直接决策档案和制度分期也仍须逐项核验。

眼前的材料表明，捕获—重新赋位可以发生在人口、家庭、军事能力、技术知识、身份和组织关系上。若政治核心能够把原先不属于自己的人编入新的命令链，它就可能进一步面对更大的对象：一支军队、一套官署、一座城市、一张财政与交通网络，乃至一具已经存在的国家躯体。在这一过程中，旧官署可以继续处理事务，旧专业人员可以继续使用知识，旧城市和网络可以继续提供功能，但它们是否仍保有原来的政治位置，则必须另行审视。旧对象继续存在，并不等于旧对象仍是自己的主人；只要安全、资源、命令、忠诚和最高权重被重新接线，外观之下的政治位置便已改变。

捕获—重新赋位若要持续成立，关键在于究竟由谁做出这套选择，由谁把一次捕获变成长期编组。只有当内部形成了足以集中命令、承担主人关系并掌控资源分配的政治核心，大规模调用旧国家躯体才具备可能。这一承担者的出现，属于后金政治核心的形成。

第二章注释

一、关于牛录、八旗及其形成阶段，参见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39—42, 58—61。旗制并非在同一天形成：常设军事牛录、严格意义的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各有形成过程，不能用后期形态静默倒推早期。

二、关于早期来归首领及其同伴组织、海西战败迁徙人口与主动来投者在组织位置上的差异，参见 Elliott, *The Manchu Way*, pp. 60—61。该材料只能说明部分路径及其差异，不能证明所有归附者均得到同样安排。

三、李永芳投降与抚顺降民安置见《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康熙本）》卷五天命三年四月甲辰、乙卯条；乌拉战败人口处置见同书卷四癸丑年正月条；东海渥集部雅揽路击取见卷三庚戌年冬十一月条；虎尔哈路扎库塔城攻取及抚民见卷三辛亥年冬十二月条，又虎尔哈部长纳喀答率众来归及留归处置见卷五天命三年冬十月条（以上均据维基文库公开转录定位，纸本或可靠影印本的具体版本及页码均待核）。官修实录能够提供授职、给与资源、招降、攻杀、俘获、迁徙和分配等事件材料，但其关于赦免、奖赏和“愿留”的叙述不能直接证明当事人的内心动机或自由选择。

四、关于 aha、booi、包衣来源及其与主人旗的关系，参见 Elliott, *The Manchu Way*, pp. 50—52, 82—84。购买、俘获、惩罚性奴役及不同族群的进入路径需要区分；包衣也不能与所有奴隶、所有汉人俘虏或同一低位身份画等号。

五、关于汉军的早期试验、解散、重组以及独立汉军八旗的形成，参见 Elliott, *The Manchu Way*, pp. 76—80。相关材料显示，这一过程并非从开始就稳定成功；1631 年前后的重组与火器、铸炮知识有关，但不能据此推断所有汉人待遇改善，也不能补出每一位技术人员的后续履历和实际贡献。

六、关于翁鄂洛城中伤及努尔哈赤者后来被赦免、授予牛录并获得资源的个案，见《满洲实录（标点本）》卷二“太祖宥尔果尼洛科”条。此例只能说明敌方个体被重新识别、授予位置和组织资源的可能性，不能推出一项普遍政策。稳定纸本版本及页码待补。

七、后金早期材料中招抚、赦免、攻杀、俘获、迁徙、分配与重新编组并存。选择性保存与选择性摧毁的共同结构，是基于这些材料提炼的机制解释；这一解释不是史料原句，也不取消具体伤亡、人数、地域及后续效果仍需分别核实的事实边界。

八、Yuanchong Wang, *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 Manchu-Korean Relations, 1616–1911*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8), Chapter 1, "The Jurchen Uprising in

Manchuria" 及 "Chosŏn’ s Role in the Jurchen-Ming War"（所据为重排电子文本，原版页码待核），讨论姜弘立投降开启沟通契机及随后后金派被俘军官向朝鲜递送国书。该材料不足以单独建立一条完整的重新赋位链，故不承担本章的关键论证。

九、从入关前的人口与组织捕获扩展到入关后的旧国家调用，仍缺少若干同一人物的完整履历链及直接决策档案。现有材料建立起从个人、能力和组织通向国家躯体的问题接口；旧官、财政、中央机构、城市与满城的具体接管，应在后续章节分别举证。

第三章　后金：小核心怎样形成

捕获—重新赋位若每次都重新开始，留下的就只是战争的零散结果。一个对象究竟是敌人、归附者、可用者，还是必须被清除的人，不能每次都临时裁断。只有当一个能够持续判断、持续分配、持续惩罚并持续要求忠诚的政治核心形成以后，捕获—重新赋位才会成为可重复的政治能力：一次赦免不再只是战场上的临时放过，一次投降不再只是刀锋前的一刻服从，被保存的能力也才能在下一次战争中继续向同一个方向服务。

后金正是这个承担者开始取得历史形状的地方。后金不能脱离满清共产主义而成为一段普通清史背景，努尔哈赤的具体历史作用也不能被解释为凭个人天才从荒野中创造国家的英雄奇迹。后金核心当时规模尚小、制度尚未全部完成，却已经能够把命令、暴力、资源和政治边界集中起来。它后来会借助八旗、编旗、包衣和更复杂的人口组织扩展自己；但在这些机器完整展开以前，政治核心必须先形成，才能决定机器处理谁、保存谁、惩罚谁，又让谁进入更靠近中心的位置。

一、没有天然存在的后金

从后来大清的疆域回望十六世纪末，很容易把起点写成一幅已经完成的地图，仿佛“满洲”天然拥有一个共同中心，只待一个领袖举旗，分散人口便自动归拢，后金和入关也就成了预先写好的结局。这样的倒叙抹掉了真正需要解释的形成过程。一个后来能够建号、称汗、组织八旗并向辽东扩张的政治中心，并不等于它在一开始就以同样的边界、规模和权威存在。

形成之前，政治关系分散在亲族、部众、村寨、首领、联盟、仇敌以及明朝边地秩序的多重联系中。人们服从谁、在危险中投奔谁、由谁保护、跟随谁作战，并没有被一个稳定中心全部垄断。女真也不能被写成内部无差别的天然共同体。建州、海西和东海诸部的名称已经提示不同地域与政治关系；更细处还有首领与部众、自由与依附、主动来投与战败迁徙等差异。族属具有真实意义，但族名本身不能代替政治核心的形成。

后金小核心不是在真空中成长。明朝边地秩序、贸易、军事压力和封赏体系共同构成持续的外部环境。后金核心一方面与旧国家竞争，另一方面利用边地交通、贸易和政治缝隙扩大资源。后金的形成不是脱离旧国家的纯内部发育，而是在外部国家压力和内部组织重组之间取得方向。

后金不能被写成普通民族起源史，核心也不是由共同民族感情自动凝结而成。民族边界、地域关系和历史经验构成核心的材料，共同身份也可以提供边界，但共同身份本身不能解释谁有权发令、谁负责分配、谁承担军役、谁被保留、谁被降格。小核心不是人口自然集合，政治核心必须通过战争、追随、资源和身份安排把这些材料加工成可行动力量，把人口变成向同一个中心行动的关系。使核心坚硬的，是政治权威、军事行动、资源分配和依附关系互相支撑。民族因素提供历史方向，组织过程提供现实形状，二者不能被任意拆开，也不能简单互换。

后金小核心不是一套能够从满洲历史主体中抽离出来、交给任何群体无差别复制的一般组织技术。满洲历史经验、群体延续和渔猎在组织层面的政治生存逻辑决定了这一核心的历史方向；战争、追随、联盟、惩罚和组织形成，则是这一决定关系在现实中取得政治形状的过程。这并不取消历史过程，也不是基因论或生物学永恒本质论。后金小核心必须在满洲主体内部制造出来，它的民族因果与历史形成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层面。

真实狩猎生活只承担一个有限的历史接口：集体狩猎的临时组织与牛录后来常设化之间，保存了某些组织经验被政治化利用的痕迹。满洲渔猎首先是满洲主体在组织层面的政治生存逻辑：辨认危险与可用对象，围定关系，集中行动，保存可用部分，再把所得接入下一轮行动。真实狩猎不直接等于政权能力，政治生存逻辑也不是可以从满洲历史中抽空的一般隐喻；它只有通过持续发出命令的中心，才从民族历史经验变成政权能力。

二、追随必须有持续的方向

努尔哈赤不能从这段历史中消失，但个人传奇也不能替代结构。没有他的政治位置、战争行动和持续扩张，后金核心无法被说清。1583 年前后的起点处在血仇、边地军事干预和分散权力交错的环境中。官修史书后来把这段经历编入开国叙事，使每一步都仿佛通向既定终点；真实的早期力量并不是从完整国家中继承下来的成熟机构，它要靠战争取得现实位置，靠追随者承担风险，靠一次次结果证明命令是否仍值得服从。个人声望、亲属关系和首领参与都真实存在，却必须不断转化为可重复的政治关系。

关键在于：一批人的追随为什么不再只是一次出征中的临时结伴，而开始有相对稳定的方向；部众、来投首领和被征服人口为什么越来越需要围绕同一个中心重新估计自己的安全与位置。一次共同作战可以产生临时威望，战后若部众仍可随时散去，资源仍由各自旧关系独立掌握，谁应受罚、谁能获得保护也没有稳定裁断，胜利就只会留下名声和战利品。小核心开始出现，是因为追随逐渐带上持续后果：命令来自何处，战利品与保护如何取得，谁能够带着部众进入，谁的旧位置会被承认或改写，都越来越围绕同一政治中心决定。

政治核心首先是一种不对称关系。中心不需要比所有部众拥有更多个人财富，也不需要亲自处理每一项事务；它需要让别人知道，安全、掠获、惩罚、赦免和下一次战争的方向由谁决定。后金的变化正在于，战争结果开始越来越多地回到同一个中心，由中心转译成下一轮组织能力。

研究早期牛录形成的材料提示，部分带人来投的首领能够保留同伴和地域组织，并在新的制度位置中取得世袭首领职务。这显示了核心扩张的一种重要办法。中心没有把每一条旧关系全数毁掉，而是让旧首领继续连接其部众，同时把这条连接重新接到更高裁断之下。追随者保留带人的能力，决定这项能力服务方向的权重却向中心移动。这里保存的是部分旧关系的功能，不是后来旗制完整层级的提前出现。

这不是平等联盟的自然延长。联盟中的各方仍可保留相当独立的目标，政治核心则要求共同行动最终服从同一判断。参与者当然不可能完全没有议价、亲属影响和自身力量；早期决策也不能被虚构成努尔哈赤一人以现代官僚程序独自完成。但只要战争方向、奖惩、接纳与排斥的最后权重越来越集中，中心便不必消灭所有参与者的作用，仍能高于他们。一个稳定裁断中心还要能承受意见不一致。若每次分歧都使追随者回到各自独立关系，核心便只在所有人暂时同意时存在；政治集中真正出现，是在有人拥有不同判断、不同部众和不同利益时，共同行动仍需取得中心认可，最终裁断仍能产生约束。它改变了平行并存的状态，因而不同于普通协调。

这也是个人权威与政治结构的分界。努尔哈赤的判断和行动影响了核心形成，但个人发出的命令只有在他人持续执行、资源能够围绕命令分配、位置能够因命令改变时，才成为政治权力。英雄传把一切结果解释为一个人的性格，结构分析则追问：这个人的判断怎样穿过首领、部众、亲属和新进入者，怎样在他不亲自面对每个对象时仍产生后果。后金小核心并非没有中心人物，而是中心人物的权威已经开始取得超出私人声望的组织延伸。

这种延伸使服从对象逐渐清楚。早期追随者可能忠于亲属、首领和共同利益，新进入者可能首先依附带领自己来投的人；核心不会立刻消灭这些层次，而是让较低层服从越来越不能违背最高方向。部众仍可听从旧首领，但旧首领的位置由更高中心承认；贝勒和亲属仍有政治作用，却在共同政权的名义下行动。服从关系由此不是一根从每个人直接连到努尔哈赤的单线，而是一组有层级、最终向中心回流的关系。

三、暴力取得选择权

政治核心首先在暴力中变得真实。没有迫使对象承担后果的能力，所谓敌我划分只是语言，所谓边界也只是愿望。后金的形成不能被写成各部温和认同一个更有效率的协调者。战争、杀戮、威慑、攻城、俘获、迁徙和惩罚，构成了中心扩大判断权的现实条件。有人可以被招抚，有人可以投降，也有人在拒绝之后被杀或被俘；同一轮扩张中，保存和摧毁并不互相排斥。

战争不是后金形成的全部原因，却是它取得选择权的重要场所。战争使首领必须判断谁可靠、谁可用、谁会倒向另一边；也使部众必须判断跟随谁能取得保护、资源和更高的生存机会。一次胜利如果只带

来短期掠获，关系很快会重新分散；一次胜利若能留下人口、牲畜、武器、道路和新的依附者，并由中心决定这些东西如何分配，战争便开始改变政治结构。

渥集、雅揽等行动的实录，把这种选择的冷酷性暴露得很清楚。招路长、迁家口、留人护民，可以同后续攻击、斩杀和大批俘获并存。后金核心并非只靠吸引力把人聚到一起。它通过战争改变对象可选择的范围，再决定哪些人获得生存和位置，哪些旧关系被拆散，哪些人口被迁走或分配。官修叙述中的人数、动机和“愿留”有自己的叙述边界，却不改变招抚、攻杀、俘获和迁徙同时存在的政治事实。

暴力的政治作用不只在消灭敌人，更在于把选择权从对象手中夺走。城寨被攻破以后，对象能否保有家属、首领、土地、牲畜和组织关系，不再由旧秩序自行保证；赦免也不再只是“不杀”，而成为中心重新规定身份和义务的入口。翁鄂洛城中伤及努尔哈赤者后来被赦免、授予牛录并获得供养，是一个格外尖锐的个案。政治中心在敌人中重新识别可用者，把生死、职位和组织资源绑在一次新的裁断上。“主人—依附”是安全、资源与最高裁断结合后的权力关系；它并不要求所有早期被纳入者先具有同一种成文身份。

这就是捕获—重新赋位在核心形成阶段的表现。捕获不是把一切对象变成同样的人，而是把对象从旧方向中取出，重新确定它的归属、义务和用途。被征服首领可能保有部分部众，也可能被拆散；主动来投者可能得到保护，也可能被纳入更低位置；能提供技术的人可能被保留，但保留并不表示与原有权力平等。核心的力量，就在于能够做出这些差异化安排，并让安排持续发生。

因此，摧毁与保存共同参与核心形成。只会杀戮的力量可以制造空地，却难以把所得延长为下一轮能力；只会招抚的力量若不能惩罚拒绝者，又不能决定被保存者的条件，也无法成为最高权重。后金小核心的扩张就在两者之间建立选择：暴力打开不对称空间，裁断决定谁从中活下来、以何种身份活下来。保存不是暴力退场后的仁慈，而是暴力已经取得选择权之后的一种政治处置。

这种处置并不保证成功。被保存的人可能仍不可信，旧首领可能仍保有重新组织关系的能力，被俘人口也不会因一次分配就自然成为稳定力量。中心必须继续观察、奖惩和调整。正因为暴力结果不能自动等于政治结果，小核心才需要从一次战争的指挥者变成持续处理战争所得的裁断者。

惩罚因此不只朝向外部敌人，也朝向内部边界。一个核心若只能击败外敌，却不能处置拒绝共同命令、破坏新分配或重新把部众拉回独立方向的人，它的集中便停留在战场。服从之所以成为政治义务，正因为违背它会产生由中心决定的后果。没有惩罚权，忠诚只是请求；惩罚权集中以后，忠诚才成为中心可以检验的条件。早期具体惩罚程序与后来的成文法制并非同一件事。

威慑又把暴力延伸到没有实际开战的关系中。归附者可能同时估量先前战果、不服从的代价和新中心能够提供的保护；这种政治选择既不是一律出于恐惧，也不以真心认同为必要条件。核心已经能够让尚未交战的人预先估价不服从的代价，战争的效果由此越过战场，改变周边首领和人口的选择环境。

杀戮、俘获和迁徙还会直接改造旧权力格局。首领死亡、人口被移动、家庭与部众被分开，都可能使原有关系失去继续行动的能力。这样的摧毁不是附带损害，而常是取消旧政治自主的手段。与此同时，

核心又会保留能够传递命令、生产资源或连接地方的人。它摧毁的不必是所有旧关系，而是旧关系自行决定政治方向的能力。

四、资源让服从进入日常

恐惧可以迫使人暂时低头，却不能单独维持一套不断扩张的关系。战争结束以后，人仍要取得粮食、住处、保护和身份；首领要安置部众，家庭要避免再次离散，掌握能力的人也要知道自己的能力向谁服务。政治核心若不能进入这些现实条件，忠诚便会在威胁离开后重新分散。

后金早期材料反复出现资源同政治位置一起分配。赦免者获得供养与组织位置，投降者可能获得官职、婚姻和保护，抚顺降民得到田庐、牛马、衣粮，旧官属还可在新的统辖关系中继续办事。这些处置说明，核心不只发布抽象命令，也在决定谁能安全地生活、以什么资格继续工作、通过何种关系取得资源。李永芳的待遇不代表所有投降者，婚姻与授职也不能替他说明内心；个案有其限度，却不削弱资源重新分配这一事实。

土地、粮食、牲畜、婚姻、爵位、战利品和保护不能被浪漫化为恩惠清单，它们是服从的物质接口。一个来投首领若能保有部分部众，是因为中心允许这条关系在新位置上继续；一个降人若取得官职和家庭安全，也必须接受命令来源已经变化。资源不是忠诚的外部奖励，而是把政治关系延长到日常生活的办法。中心借此让一次性的选择产生未来成本：脱离新关系，可能意味着失去保护、位置和可供部众生存的条件。

没有资源，政治命令会退化成口号。核心需要把战争所得、土地、牲畜、粮食、武器和保护资格分配给不同对象，使追随者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中心的存在。资源不只是奖励，它还是一种让关系可见的标记：谁先得到，谁得到什么，谁必须通过谁取得，谁在失败后被扣除，都会形成组织内的等级。惩罚也不只是报复，它向所有人说明，中心拥有改变位置的权力。

资源分配还使追随关系能够跨越一场战争的时间。战利品若只在胜利瞬间被抢夺，追随者得到的只是一次收益；若中心能够决定分配、保留一部分供养部众，并把未来取得资源的机会同继续服从连接，追随就有了向前延伸的理由。谁掌握分配，谁就在塑造下一次集合力量的条件。核心不只是分掉已经取得的东西，还在决定谁有资格继续跟随它取得更多东西；这一政治作用并不依赖每次分配都已有稳定的成文规则。

服从的动机可以同时包括恐惧、仇敌关系、家庭安全、现实判断和个人野心。政治结构不要求所有人怀着同一心理；它要求的是，无论动机怎样，生存和行动越来越需要经过同一个中心。忠诚由此不只是一种感情，也成为可见的服务、跟随、作战、担保和接受位置。

这种现实绑定使主人—依附开始超出单纯私人关系。主人不是因为受到爱戴才成为主人，而是因为他能把保护、惩罚、资源和身份组织在同一权重位置上。依附者也不等于完全没有选择或判断；他的选

择成本、资源渠道和安全边界，却更多由新关系规定。后金核心正是在这里取得持续性：它不必每天重新征服同一个人，只要能继续决定服从的现实后果。

婚姻和爵位同样不是柔和地包裹战争的礼仪。婚姻可以把新进入者接近核心的机会固定在亲属关系中，爵位和官职则把身份差异公开化，使服从获得可见回报。它们不会取消猜疑，也不会自动制造可靠的内心；它们把人的位置变成中心可以授予、抬高和撤回的政治事实。暴力规定不服从的下限，资源和身份规定靠近中心的梯度，两者共同使核心有能力在杀与不杀之外进行分层。

保护也是一种集中。分散权力格局中，一个人或一群部众可能同时寻找多个安全来源，在不同首领之间移动。核心形成以后，能够提供保护的人也能要求更明确的服从。保护不只是把对象挡在敌人刀下，还包括承认其家属、部众和位置，使其他力量知道这个对象已经接入某条关系。一个来投者由谁担保，一个旧首领的部众是否仍随其行动，一个降人能否免于再次分配，都把中心的裁断写进日常关系。

因此，资源、保护和忠诚并非三条并排发生的线。资源让服从具有现实收益和脱离成本，保护让关系具有持续安全边界，忠诚则成为中心决定是否继续分配和保护的政治条件。后金核心越能把三者扣在一起，追随越不只是对一个强者当前胜利的押注，而成为对一个持续权重位置的依附。

五、边界不是一条血缘线

小核心形成以后，最重要的能力之一是规定谁在里面、谁在外面，以及处在里面的人离中心有多近。这个边界从来不等于把所有女真人放在一边、把其他人放到另一边。满洲主体仍是核心的历史主体；政治边界却还要处理亲族、贝勒、首领、早期追随者、后来归附者、投降者、俘获人口、依附者和被保存的专业能力之间的差异。

核心成员首先接近最高裁断，他们参与战争、分享资源、承担命令，也可能凭亲属和既有政治力量影响决策。追随首领可以带着部众进入，却不因此与最高中心平权；旧组织之所以被保存，正因为它已经被放进新的层级。归附者和投降者可能获得位置，但安全和资源仍更多要靠可见服务来证明。被俘者可能遭到分配、迁徙、奴役或重新编组；掌握特殊能力的人可以被保存和调用，却不自动进入核心决策层。另有一些对象被判断为无法控制或必须排除，等待他们的是惩罚与摧毁。

这种层级依靠持续的判断标准来维持。谁可以保留部众，谁必须交出人员，谁能够带兵，谁只能作为普通成员，谁因能力被使用，谁因危险被隔离，这些判断构成核心的早期分类。分类不是中性的户籍工作，而是政治权力把异质对象放进不同权重，从而使可重复命令获得现实基础。

这些差异表明，“自己人”不是单纯发现出来的血缘事实，而是政治核心不断制造出的等级。来源和族属仍然真实，也会进入信任与位置的判断；进入时间、来投方式、带来的部众、可用能力、主人关系和服从表现，又会改变一个人在新秩序中的等级。确立满洲主体，并不把所有满洲人抹成同一政治层级；政治分层也不把满洲主体降为一般组织变量。

边界还具有时间性。昨日的敌人可以在赦免、授职和资源分配之后进入新关系；今天的归附者也可能因为不服从重新成为危险。进入不是一次永久洗白，外部也不是不可改变的本质。中心通过反复奖惩和重新赋位，持续决定哪些差异可以留在内部，哪些旧联系必须被削弱，哪些对象只能作为可调用者存在而不能接近裁断。

这种边界远比文化认同更硬。一个人可以继续说原来的语言、保有地域记忆，也可能并不真心认同新秩序；只要他取得安全、资源和组织位置的渠道已经接到后金核心，他的政治行动空间就被重新规定。反过来，共享族名也不能保证一个人与中心同权。政治边界处理的是谁能够裁断、谁需要服从、谁被允许以何种位置继续存在。

边界的形成也意味着核心开始拥有命名权。敌人、降人、来投者、旧首领、可信者和可疑者，都不是无关痛痒的称呼。名称决定一个对象首先以何种关系被看见：他是应当承受战争后果的人，是可以被保护和授职的人，还是只能被分配和监管的人。名称未必来自一套一次完成的成文法，却会通过资源、惩罚和行动资格变成现实。一个对象换了称谓而生活条件毫无变化，命名便只是声音；后金核心的命名之所以具有政治性，正在于它同位置调整一起发生。

内部并不是一块没有冲突的平面。亲属、贝勒和带有自身部众的首领既参与核心，又可能拥有不同利益和影响力。小核心不是把这些力量凭空抹掉，而是使它们越来越需要在共同中心内争取位置，而不是各自作为最高权重向外行动。谁能接近裁断，谁能带兵，谁能分得资源，谁的部众获得承认，都形成内部层级。内部冲突仍可能存在，但冲突所围绕的权重中心已经改变。

外部边界同样不是地图边缘。一个群体即使地理上靠近，也可能因为不服从而被当作敌人；一个原本来自外部的人，则可能因为投降、授职或主人关系被纳入。政治核心因此能在地理和族属边界之上再画出一条行动边界。“属于谁”回答的不只是出身，还包括谁能命令、谁提供保护，以及战争来临时向哪一边行动。

六、称汗不是魔法时刻

1616 年称汗、建元，是后金政治核心公开结晶的重要节点。官修实录所记礼仪中，八旗贝勒大臣与群臣按旗序列，显示这里已经不只是一次出征的首领联盟。此前数十年的战争、追随、征服、来投、资源分配和组织积累，已经为称号提供了现实承担者；称号、礼仪和建号又把这些政治关系提高到一个明确层级，使持续裁断获得更稳定的名义，使内部与外部更清楚地围绕一个政权中心区分。它不是凭空创造核心的魔法，却绝非没有政治作用的装饰。

后金小核心的形成必须和后来大清的制度完备分开。核心形成，意味着有一个能够持续裁断的中心，它可以决定战争方向、分配安全、处理归附、奖惩追随，并把不同来源的人拉进一条可重复的命令链；它还不意味着八旗、包衣、汉军和入关后的所有制度已经一次性完成。若把后来的全部制度倒灌回起点，便会把形成过程写成结果的影子。严格意义的八旗形成于 1615 年前后，更早的常设军事牛录、后来的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并不是同一天完成的一套设计。到称汗建号前后，一个能够调动既有组织、

让贝勒大臣与群臣围绕中心排列，并以自身名义处理战争和外部关系的后金核心已经形成。称汗建号这一个节点，并不能同时说明牛录、固山怎样组织家庭、训练和人口，也不能说明八旗怎样承担军政社会功能、包衣如何嵌入主人关系。

称汗并不意味着此后所有决定都由一人独自完成。亲属、贝勒、首领和军事追随者仍然参与政治，早期具体议事程序和职权边界也不能凭后期制度补写。更准确地说，一个高于各条局部关系的政治最高裁断正在稳定下来：它能以同一中心决定战争方向，处理归附与惩罚，分配资源和身份，并要求不同来源的力量把行动结果送回这一中心。

这种集中仍不是现代国家式的完整官僚集中。后金尚没有后来大清那具庞大的国家身体，也没有把所有地方和人口纳入同一套成熟行政系统。小核心之所以是“小”，不只因为人口和疆域有限，还因为它仍要借助亲属、首领和旧组织传递命令。然而，只要这些中介不再以独立的最高权重存在，而要从中心取得位置，规模有限就不妨碍政治核心成立。

称号还改变了对外行动的主体。早期各条关系可以分别面对明朝、朝鲜或周边诸部；建号以后，战争、交涉和投降越来越以一个明确的政权中心为归宿。萨尔浒战后姜弘立的投降为后金提供了开启同朝鲜官方沟通的机会，随后后金派遣一名被俘军官向朝鲜递送国书，留下了外部军事人员被保存并进入后续关系的有限接口。面对姜弘立等人的，已经不只是某次战役中的个人胜者，而是一个能够接受投降、保存俘降者并继续处理对外关系的政治主体。

对外主体的形成又反过来加强内部集中。一个政权若要向外提出要求、接受投降、发动战争并处理使者，就必须让内部不同力量承认谁有资格代表整体。参与者仍有自己的判断，对外行动也还没有后来的完整官僚体系；但当承诺和惩罚越来越由同一中心发出，局部首领便更难各自决定整个关系的方向。

1616 年因此是形成过程中的公开结晶，不是历史起点，也不是成功保证。后金此后仍会遇到失败、内部张力、组织调整和人口扩张的压力。建号说明政治核心已经足以用自己的名称要求服从，却还没有后来清帝国的全部制度；入关也不是从这一刻自动兑现的终点。结果仍未确定，核心必须继续把公开名义转化为持续能力。

七、组织密度与防裂机制

后金形成了一个能够持续裁断、组织战争、吸收人口和分配资源的小型政治军事核心。它不是普通民族人口集合，也不是完整国家的缩小版。它的高组织度来自中心对命令、暴力、资源和身份位置的集中处理。

小核心之所以能够扩大，不是因为它在每一个维度都比周边社会强，而是因为它把有限的政治资源集中在少数高权重关系上。中心必须识别谁掌握武力、谁能提供粮食和道路、谁在部众中有号召力、谁可能成为竞争中心，再把这些判断转成奖惩、婚姻、联盟、征伐、迁徙和编组。组织密度不是人口密度，而是命令、资源和暴力在核心周围叠合的程度。后金核心的“小”不是落后或不完整的同义词；

它把有限人口和资源集中在政治裁断、战争组织和关系重排上，还没有承担旧国家维持广泛税粮、地方官署和城市秩序的全部复杂表面，因此可以先把最关键的安全、战争和依附关系压缩到少数中心。

这种压缩带来速度，也带来危险。核心能够迅速决定敌友和资源去向，却容易依赖少数中介；中介一旦脱离中心，组织便可能松动。因此，核心形成同时是集中和防裂的过程：中心需要扩大追随，又要防止新加入者形成另一个中心。后金后续人口编组的必要性，正从这里产生。

核心形成不等于每次组织都成功。联盟破裂、部众逃散、军事编组失败、资源分配失衡，都可能暴露中心能力不足。重要的是，后金核心能否把失败转化为下一轮调整：重新分配首领位置，改变编组方式，筛选更可靠的中介，或把原本独立的关系压入更强的命令链。后金的形成不是一条没有摩擦的上升曲线。政治核心正是在失败、惩罚、吸收和再组织中变得坚硬；它的高组织度不是天然天赋，而是不断把对象从旧方向中抓出来、重新安排并要求继续服务的结果。

八、胜利必须变成下一次能力

一个军事集团可以连续打赢，却仍未必形成政治核心。真正的区别在于胜利以后发生什么：人口若只是被掠走便再次离散，首领若只在一次战役中服从，战利品若不能维持追随，敌方能力若无法被选择性保存，下一次战争仍要从头集合力量。小核心要做的，是把一次结果变成下一次行动的条件。

这种转化首先依赖持续裁断。谁应被杀，谁可被赦，谁能保有部众，谁被迁徙或分配，谁取得官职和资源，不能在每场战争后交给各自关系任意处理；裁断越能回到同一中心，战争所得越可能保持政治方向。资源回流也在这里发生：人口、粮食、牲畜、土地、战利品和新取得的关系，只有被用于维持追随、奖励服从和准备下一轮行动，才从一次所得变成核心能力。

规模有限的核心不可能亲自进入每个村寨、家庭和旧部众。它需要保留能够带人、传令、熟悉地方或处理旧事务者，却必须让这些中介的安全与位置依赖中心。旧关系因此没有全部消失；它们被压入新的政治方向，成为中心伸向更多人口的接口。后金的扩张能力不来自把所有差异立即抹平，而来自在差异中建立层级，让地方性力量的结果不断向中心回流。

忠诚还要经受反复检验。一次投降不能保证持续服从，一个被赦免者也不会因授职自动失去旧联系。核心必须让战争表现、服务、担保、资源资格和位置调整不断显出谁仍可用。政治边界因而不是建号后一次划定的静态线，而是在每次胜负、投附、编组和再分配中被重新确认。昨日捕获的对象能否服务下一轮扩张，正是在这套选择中决定。

原有组织密度使后金可以把一次局部胜利变成政治积累。被击败的对象会被重新识别：有人失去原有位置，有人保存部分能力，有人带着部众加入，有人被拆分进中心能够控制的单位。中心每处理一次对象，都会增加关于人口、资源和关系的政治记忆。

持续命令离不开这种记忆；昨日授予的位置、惩罚的边界和跟随的义务若不能延续，裁断就会在每次冲突后归零。后金早期尚未形成后来官僚国家那样完整的档案和行政惯例，但职位、称号、部众归属、

主人关系与战功分配，已经使过去的跟随、立功、背离和受罚进入下一次位置判断。这种记忆不是现代档案意义上的抽象数据库，而是由人质、担保、分配、编组和后续义务承载的：今天接受的位置影响明天的资源资格，今天保有部众也意味着以后要以这部分力量承担命令。至建号前后，政治位置与战争关系已能在同一中心下持续积累，而不再随每场冲突结束全部归零。官修史书的追述性质限制我们还原每一项早期程序，却不抹去这种持续积累。

政治核心的标志不是发出过命令，而是命令能够重复。一次战争中的集合可能来自临时利益；若战后仍能重新召集同一批人、调取同一类资源、追究同一类失约，便说明关系已经沉淀。后金核心通过战争、奖惩、迁徙和重新分配，把临时服从变成可重复的组织方向。

小核心因此不是一群人围着一个人的静止图像，而是一套能让过去裁断继续对未来产生后果的权重结构。它可以借助亲属、首领和旧关系运作，却要求这些关系承认同一最高方向；它可以保存异质能力，却要求能力不再独立选择服务对象；它可以允许复杂动机存在，却把动机能够采取行动的条件接到自己的资源和安全上。有了这些条件，捕获—重新赋位才有了持续承担者：后金小核心能够集中暴力、判断对象、决定保存与摧毁、分配资源和安全、规定内外层级，并让被保留的能力回到下一轮命令。它仍会失败，仍会面对不信任和关系离散，也远不是一部无所不能的成熟国家机器，但它已经不再是临时联盟，命令有了持续来源，服从有了可识别对象，战争结果也有了政治化中心。

这是满清共产主义历史生成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共产主义现代工具尚未出现，后来的全国制度更不在眼前，后金也不是现代党国的简单历史别名；这里形成的是同一不可拆分对象最早的政治承担结构：一个小核心怎样在满洲历史主体中形成，怎样把捕获从偶发结果变成持续能力。中共后来利用共产主义提供的现代党组织、干部体系、宣传、军队、身份分类和工业国家工具，复刻、扩大、制度化并优化这种由后金小核心形成的满清式政治—组织能力。满清政治由此被共产主义现代化，共产主义也被满清政治重新塑形；这不是一般现代组织对古代经验的借鉴，而是满清共产主义自身的历史生成。

九、核心形成了，机器还没有完成

后金小核心形成，并不等于人口不断增加带来的全部问题已经解决。裁断可以集中，命令可以有持续来源，资源与惩罚也可以围绕中心分配；可是，被征服者、归附者、俘获者、旧首领及其部众仍然分散在不同关系中。只靠努尔哈赤与若干首领之间的个人联系，不足以长期登记家庭、训练战士、分配责任、识别身份并反复调动越来越多的人。

核心能够决定谁进入，却还需要一种机器决定进入以后被放在哪里；它能够要求服从，却还要把服从变成日常编制；它能够保存旧首领和异质人口，却必须让这些差异在不恢复独立政治方向的条件下继续运转。否则，每次扩张都会把更多不能稳定调用的人口堆在中心周围，战争所得仍会流失，政治判断反而会被自己的战争所得淹没。

后金虽已形成集中决策的小核心，却尚未把不断增加的分散人口完整编成可持续调用的组织力量。要把一次捕获变成下一次能够调用的力量，人口必须进入单位、旗、家庭、生产和供给关系；包衣、主

人—依附和军事义务也必须成为日常组织，而不能只是战场上的偶然安排。八旗、编旗与包衣要把这些人口登记、分层、依附和组织起来，使小核心的战争所得变成能够反复使用的军政力量；只有把不同来源的人口稳定编成可以行动的力量，小核心才能从政治核心变成扩张机器。

第三章　后金：小核心怎样形成注释

一、关于努尔哈赤早期事业、1583 年前后起点及 1616 年称汗建号，主要参见《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康熙本）》相关条目，并需与现代清史研究交叉使用。官修开国史具有追述、英雄化和目的论风险，可用于确认部分事件次序与公开政治动作，不能据此证明人物天命、预定成功或所有具体动机。稳定纸本版本、卷页及异文仍待定点校勘。

二、关于 1616 年建元礼仪中八旗贝勒大臣率群臣按旗序列、行庆贺礼与建元，见《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康熙本）》卷五天命元年春正月壬申朔条（据维基文库公开转录定位，纸本页码待核）。该材料可以说明后金政治中心、称号与旗组织已进入公开权力秩序，不能单独还原早期全部议事程序，也不能证明所有决定均由努尔哈赤一人独断。据此只能确认最高裁断正在形成，不能补写每场争论、贝勒职权或完整议事程序。

三、关于牛录从临时集体狩猎组织向常设军事—社会单位转变、早期来投首领与同伴组织的保留，参见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58—61。相关形成日期和精确过程存在史料限制；这组材料不能支持“善于真实狩猎所以天然善于统治”的生物学或永恒天性命题。满洲渔猎在组织层面的政治生存逻辑并非由这一生活史接口单独推出。

四、关于早期军事牛录、1615 年前后严格意义八旗、1635 年蒙古八旗及 1637—1642 年汉军八旗的分期，参见 Elliott, *The Manchu Way*, pp. 58—63。早期组织是政治核心形成的接口，晚期八旗、内务府包衣或入关后制度不能被用来倒推努尔哈赤早期。

五、关于翁鄂洛城中伤及努尔哈赤者被赦免、授予牛录并获得供养的记载，见《满洲实录（标点本）》卷二“太祖宥尔果尼洛科”条。此例只说明敌方个体可能被重新识别并获得新的组织位置，不能推出普遍赦免政策，也不能补出其后续实绩。

六、关于渥集部四路招路长迁家口与雅揽路俘获，见《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康熙本）》卷三庚戌年冬十一月条；虎尔哈路扎库塔城攻杀、俘获与周边招抚见卷三辛亥年冬十二月条；乌拉败兵编户与俘获分配见卷四癸丑年正月条；虎尔哈部纳喀答率众来归及愿留首领分赐人口牲畜田庐见卷五天命三年冬十月条（均据维基文库公开转录定位，纸本页码待核）。官修数字、时间、动机和“愿留”等程式化叙述仍需交叉核实；机制解释不依赖某一具体人数，官修措辞也不能直接当作自由选择的证明。这些材料可以确认，保存与摧毁能够由同一扩张中心选择。

七、关于李永芳投降（四月甲辰）及大军还都后授总兵官、阿巴泰女妻之与抚顺降民千户编设、授田庐牛马衣粮并依明制设官统辖（四月乙卯），见《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康熙本）》卷五天命三年四月有关条目（据维基文库公开转录定位，纸本页码待核）。单一个案不能代表全部投降者或降民，官职、资源与婚姻也不能直接证明其内心认同；它们能够说明政治位置、保护和资源可以在投降后被重新分配。

八、Yuanchong Wang, *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 Manchu-Korean Relations, 1616–1911*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8), Chapter 1, "The Jurchen Uprising in Manchuria" 与 "Chosŏn’ s Role in the Jurchen-Ming War"（据重排电子文本定位，原版页码待核），讨论萨尔浒战后姜弘立投降为努尔哈赤开启同朝鲜官方沟通的机会，以及随后后金于 1619 年 5 月派遣一名被俘军官向朝鲜递送国书与七大恨。该材料可辅助说明外部军事人员被俘降后可能开启外交交涉或获派送信，但不足以单独建立其完整职位、资源与长期忠诚链。因此，姜弘立投降及被俘人员获派递书只作为后金政治主体形成后的对外关系接口，该个案不承担完整的重新赋位链。

九、“后金政治核心是捕获—重新赋位的持续承担者”，属于政治—组织理论判断。现有材料能够支持政治中心、战争、归附、奖惩、资源和组织形成的若干节点，却没有提供一份完整决策档案，足以把全部历史过程证明为单线必然因果。事实缺口限制人物、程序、数字和具体箭头。

十、满洲 / 满清是历史主体，其历史经验、群体延续与组织层面的政治生存逻辑决定了后金核心的历史方向，这一决定关系通过战争、追随、暴力、资源和政治边界等真实历史过程具体展开，并不等于无需过程。真实狩猎生活只承担有限历史接口，满洲渔猎的主要含义是组织层面的政治生存逻辑。这一历史因果判断不属于基因论或生物学永恒本质，推不出“满洲人天生善于统治”，后金也不能被抽象成脱离历史主体、任何群体都能任意复制的一般技术。

第四章　八旗、编旗与包衣：人口如何被编成力量

后金已经形成了能够持续裁断的小核心，却还没有一部足以承受扩张结果的人口机器。核心固然能够决定谁应被杀、谁可被赦、谁能保有部众、谁取得资源，然而依托临时追随，战场上的共同危险只能暂时压住分歧，战利品也仅在短期内维持服从，单次战争的胜利很难自然转化为不断扩大的持久力量。一旦战事结束、危险退去，旧首领可能恢复自己的政治方向，部众仍可能跟随原来的首领，家庭仍依赖旧有关系，俘获人口面临逃散，来投者也会重新估量哪一个中心更能提供安全；今天得到的战士、家庭、牲畜与粮食，并不能保证在下一次命令中重新出现。随着每一轮扩张引入更多异质人群，对象在增加，不信任也在同步累积。此时若只依靠努尔哈赤与若干首领之间的个人联系，就必须在每次行

动前重新召集、重新担保、重新分配，胜利便无法稳定积累。集中裁断确立了对战争所得的处置权，但只有进一步把这种处置固定为人口的日常位置，才能将其转化为可持续调用的力量。

八旗、编旗、牛录和包衣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出现的。它们不是四个可以并排背诵的制度名词，更不是同一天完成的一套静态设计。牛录的常设化、人口被编入旗组织、固山层级的发展、不同依附人口被安排进专门关系，各有形成过程，也承担不同功能。制度名称本身并不能解释后金小核心怎样借这些逐步形成的关系，把来源不同、进入方式不同、仍然保有家庭与旧联系的人口，放进能够登记、训练、供给、奖惩和反复动员的军政结构。必须考察这些关系如何把分散的依附与生产转化为持续的制度力量。

一、小核心不能只靠临时追随

人口一旦被编组，变化的就不只是名册。一个人属于哪个单位，跟随哪个首领，由谁训练，战时向谁集合，家庭在什么关系中取得保护，资源从哪里分配，失去服从以后由谁惩罚，开始被同一政治机器连续处理。旧身份可以保留，旧首领也可能继续带人，家庭不会因入编立刻消失，但这些关系能够采取行动的最高方向，被接入后金政治核心之下。人口因此不是被简单同化，而是在差异仍然存在时被重新赋位。一次裁断若要延长到日常，必须有相应的组织位置：一个首领在战场上接受命令，不等于他的部众已经长期进入同一命令链；一批人口被迁来，不等于家庭、生产、供给和军事义务已经有了稳定归属；一个俘虏被保留下来，也不等于他的能力能够在下一轮战争中再次调用。核心需要知道自己拥有哪些人，也必须让这些人知道自己归在哪里、受谁节制、承担什么义务，以及保护和资源怎样同这种归属连接。

人口机器与政治核心的区别，就在于政治核心制造最高裁断，人口机器把裁断压进单位、家庭和持续义务。它把“跟随谁”从一次行动中的选择，逐渐变成可延续的政治位置；把“这次得到多少人”改造成“下一次能够调动什么力量”。后金的扩张因此不再只表现为疆域扩大或俘获人数增加，还表现为所得人口能否在旧关系尚未完全消失的条件下被反复组织起来。统治的真实深度正取决于这种把裁断化为日常规制的能力。

编组不是事后才出现的行政整理，它本身就是扩张的一部分。战争取得人口，编组决定其去向；资源维持编组，编组又使资源能够被征集和再分配；首领提供进入旧关系的接口，新的单位则限制首领把这种接口重新变成独立政治方向。战争、人口和组织由此不再是三条分开的线，而成为一部机器的连续动作。

这部机器还改变了数量与力量的关系。在缺乏组织的状态下，一千个分散的人未必比一百个稳定追随者更可用；人口越多，协调、供给和不信任的成本反而越高。编组把数量拆成可识别的单位，让核心能够知道一项命令经过哪些首领和层级抵达成员，也能知道某一单位应当提供多少行动能力。这种假设对比只是用来说明数量与组织的关系，并非早期制度的实际计数；人口是以组织位置而非模糊人群进入政治计算，人数只有被编进责任、供给与惩罚关系以后，才成为力量的尺度。

人口机器因此也是一种时间机器。临时联盟只能处理眼前行动，稳定单位则把今天的归属带到明天。一个家庭在哪个单位，一名首领带领哪些人，一次战功或背离怎样影响以后的位置，都不再随战争结束而完全消失。核心由此得以把过去的裁断储存在组织关系里，使下一次集合不必重新确认每一条从属关系。人口被编成力量，首先意味着政治命令获得了跨越一次战役的时间长度。

二、牛录固定的不是人数，而是关系

牛录常被理解为一个计数单位，仿佛只要知道若干人被划在一起，制度便已经解释完毕。研究所揭示的形成过程却更重要。早期集体狩猎中的临时组织，与后来常设军事牛录之间只存在有限的组织接口；大约十七世纪初，军事牛录已经成为较稳定的编组。战士不是以孤立个人进入，家庭也被一并置于成员关系中，牛录额真承担选训士兵和处理成员日常事务的职责。[一] 这些材料不能证明满洲人因为真实狩猎便天生善于统治，更不能把狩猎队直接等同成熟旗制。它说明的是，一种临时聚合关系怎样被政治核心改造成持续单位。

这种改变首先把家庭带进军事组织。战士需要被训练和调动，却不是脱离粮食、住所、亲属和生产的单独身体。家庭若完全留在命令链之外，军事义务就会不断被旧关系拉回；供给和保护若不能同组织位置连接，训练也难以维持。把战士及其家庭放进同一成员结构，军事行动与日常生活才开始共享同一个政治归属。人口在这里第一次不只是战争现场的人数，而是带着再生产、供给和关系网络进入可持续组织。

家庭进入牛录，也使统治能够越过单个战士。战场服从与日常保护、供给可能来自不同关系：一个人可能在战场服从，却在日常生活中依赖另一套保护和供给；如果家庭、住所和生活维持仍完全掌握在旧关系中，军事服从就可能随时被抽走。牛录把这些条件拉近同一组织位置，核心因此命令的不只是一具战斗身体，也能影响这具身体赖以继续行动的关系。家庭不是被动附属物，它既提供人口延续和生产支持，也是约束成员、分配保护和确认归属的现实接口。

牛录重新规定了首领的位置。部分带人来投的首领可以保留同伴和地域关系，并获得牛录职位。保存这些关系，不等于旧政治自主原样延续。首领仍能带人，正因为这种能力对新核心有用；但他带领的部众已经被置入新的军政单位，他的职位、资源和世袭资格也来自新的最高权重。[二] 旧关系没有被清零，却不再由旧首领独立决定服务方向。后金利用首领连接部众，也把首领编进自己的奖惩和命令结构。

牛录的关键不是抹去中介，而是控制中介。一个很小的政治核心不可能直接面对每个家庭，它必须借助熟悉地方、拥有部众、能够传令和组织生产的人。中介若保持独立，核心仍只是联盟上层；当中介的职位、保护和资源接到中心，核心才有能力通过少数节点进入更多人口。牛录因而同时保存关系和打断关系：对可用首领，保存其带人能力可以减少重建成本；对不可信的战败集团，迁徙和拆分则削弱其重新行动的可能。两种方向看似相反，实际都服务于同一裁断：核心要判断哪些连接可以成为新

核心的通道，哪些连接仍可能保持旧政治方向。编组不是一律保留，也不是一律摧毁，而是把关系本身当作选择和重排的对象。

组织化从来不平均。主动来投者较可能保留原有同伴组织，战败人口则可能被大规模迁徙，且较少获准自成牛录。[三] 进入路径不同，能够保留的自主空间便不同。牛录不是把所有人变成同一种成员，而是让政治核心在保存旧关系、拆散旧关系和重新组合人口之间作出选择。它固定谁与谁一起行动、谁通过谁接受命令、谁可以继续带人，以及这些关系最终向哪一个中心负责。

这种深入日常的能力解释了牛录为什么不能缩成军队编制。牛录把军事义务同生产、供给和成员福祉连接起来，却不等于后期国家已经拥有统一而完备的基层行政。早期功能仍在形成，不同单位的实际运作也不可能完全一致。可以确认的是，政治核心开始通过单位处理成员生活与战争能力之间的关系；不能凭此补造每户如何生产、每次如何征收或所有职责已经固定的完整制度图。

三、编旗把人口放进命令链

“编旗”若只被理解为登记，它的政治含义就会被遮住。名单本身还不是政治编组，只有登记结果能够改变命令、供给和义务，登记才成为政治编组。八旗并不止于把名字写进一张表，登记回答一个人在哪里，编旗还要回答他被放进什么关系：归入哪个单位，接受哪一级首领指挥，战时从哪里集合，平时怎样维持，家庭与义务怎样连接，资源和惩罚落在哪个位置。这些后果赋予名称以真实的政治赋位。

人因此被放入一个能被持续找到、供给、征发和追责的组织位置。家庭被纳入旗，就不再只属于原有地方关系；包衣进入主人关系，劳动、迁移和保护资格随之受到新链条安排；军士编入单位，行动也要通过组织出现。日常的生产与依附被逐一接驳进调遣网络，分散的行动可能被制度结构持续收拢。

这样的编组把“人”变成“可调用的人口”。所谓可调用，并非中心可以随意、无限地支配每个人。中心得到的，是在规则和强制下重新调集、分配和检查人口的能力。能力一旦制度化，编旗便不再停留于临时俘获。捕获对象若仍能在下一次行动中被找到、被分配、被供给，捕获才真正转化为力量。

旗组织并非一次完成，而是在反复编组中形成的。现代研究把常设军事牛录的出现放在十七世纪初，把严格意义八旗的形成放在 1615 年前后；1616 年建元礼仪中，八旗贝勒大臣已经率群臣按旗序列，说明旗组织进入公开权力秩序。蒙古八旗形成于更后的 1635 年，独立汉军八旗则经历 1621 年的早期试验、1625 年的解散、1631 年前后的重组，至 1637 至 1642 年间才形成。[四] 把这些阶段压成一张静止制度图，等于把扩张中反复发生的编组、失败与重组全部抹掉。

牛录之上的固山层级，使多个基层单位能够进入更大的行动结构。不能用后期定型制度倒推每一个早期细节，但组织方向已经清楚：人口不再只通过个人首领临时聚合，而被放进可以逐层传递命令、集结兵力、分配责任的关系。固山让小核心无需直接面对所有成员，也能把同一政治方向向下传递，让下层单位的力量向上汇集。层级也改变责任的落点。命令若只从最高中心直接发给所有人，延误、逃

散和供给困难很难定位；单位和层级则把责任放进具体首领与成员关系。上层要求下层提供行动能力，下层再借既有单位组织成员。这样形成的不是无缝而完美的科层制，却已使服从不再完全依赖最高首领的个人在场。政治中心能够借层级放大自己，也能够把失败和不服从重新带回可处分的位置。

层级首先是权力结构，不是单纯减少管理成本。越靠近中心的首领，越能影响命令、资源与位置；基层成员更多通过中介接触政治核心。不同人口被纳入同一行动，接近中心的距离却因此拉开。后金能够扩大，正因为它没有把所有人置于同一平面，而是用不等位置把分散人口连接起来。

编旗还制造可见性。分散人口可以在地方关系中游移，核心很难持续知道谁属于谁、谁承担过义务、谁在战后被重新分配。编入单位后，成员、家庭、首领和既往位置开始留在组织记忆里。登记不是中性的书写技术，它让奖惩、训练和下一次动员都有了对象。昨日逃散、立功、来投或受罚，不再只靠口头关系保存，更可能影响今日的单位位置和资源资格。可见性也带来约束：被登记就意味着可被集合，也意味着可被追责；获得单位保护，就要承担单位义务；家庭和旧首领关系得以保留，也同时进入新的指挥框架。编旗并不消灭复杂动机，有人为安全来投，有人因战败被迫进入，有人跟随旧首领，有人是俘获和迁徙的结果。政治机器不要求他们先在内心认同同一秩序，只要求行动条件越来越难以脱离新的命令链。

组织记忆也使身份不再只由个人临时宣称。一个人说自己已经归附，不能独自决定别人是否相信；他被放在哪个单位、由谁担保、是否承担过义务、曾经获得什么位置，都会成为日后判断的依据。编旗让忠诚拥有可观察的组织后果，也让怀疑能够落实为降位、调动、拆分或惩罚。政治身份从一句表态变成一串能够影响资源与行动的关系记录。

这并不等于早期后金已经建立覆盖每个成员的完整档案。官修材料不足以还原日常登记的全部程序，现代研究也不能代替同期名册。但组织单位本身就是记忆载体：谁隶属于谁，哪些家庭随单位行动，哪些首领保有部众，这些关系已经使过去不再完全依赖当事人的即时讲述。可见性可以不完备，却仍然改变核心处理人口的能力。

1616 年八旗在公开礼仪中的出现，因而不是制度史上的装饰。它一面表现政治核心的公开结晶，一面表现人口组织机器与政治中心开始互相支撑。建号赋予旗组织更明确的政治中心，旗组织又使称号不只悬在少数首领上方，而能够穿过单位、家庭和军事义务进入人口。核心有了组织身体，组织也有了最高方向。

四、八旗把战争所得带进下一轮战争

战争所得若不能重新进入下一轮行动，就只是一次性财富。人口可能逃散，牲畜和粮食会被消耗，旧首领可能带走部众，俘获者也可能因无人供给而失去作用。基层单位使人口能够被集合，较高层级使多个单位能够共同动作。命令沿已有关系下达，不必重新穿过一张完全分散的人际网络；人员也不必在每场战争前重新确认全部归属。组织缩短了从裁断到行动的距离，使小核心的判断能够变成更大范围的同步行动。

战士进入单位以后，军事能力不再只在临战时召集。选训、集合和承担责任开始围绕持续位置进行。训练本身并不能保证忠诚，却使核心能够反复观察谁可用、谁逃避义务、谁能够承担更高位置。个人能力因此被组织看见，也被组织规定使用方向。

家庭被纳入成员关系，意味着军事力量的维持不能同日常资源分开。粮食、牲畜、土地、住所、战利品和保护需要沿组织关系分配，成员也要在生产和战争之间承担义务。资源不是对服从的温和回报，而是机器保持人口可调用状态的物质条件。谁能取得保护，谁可保有部众，谁得到更多资源，都在制造组织内部的层级。

战争结束以后，所得人口还要经过重新分配。乌拉战败人口中，来归者与其他俘获者出现不同处置，有的被编户，有的被分给军队；渥集、雅揽等行动中，招抚、攻杀、迁家口和俘获能够在同一扩张过程并存。[五] 这些材料不能提供一张完整的早期人口处置表，却足以打破“所有人以同一方式入旗”的想象。机器把战争所得分流：部分关系被保存，部分人口被拆散，部分对象被置入更直接的依附，部分则被杀戮或排除。

重新分配把胜利从前线带回组织内部。战场上取得的人口和物资不会自动知道自己的位置，原有单位也不会自动吸收新增对象。核心必须决定新增人口交给谁、原有家庭是否保持、哪些首领仍能带人、什么资源用于维持新成员。每项分配都可能改变单位之间的实力和首领接近中心的程度；它既是后勤安排，也是政治权重的再分配。

这种再分配还会制造下一轮扩张的条件。得到人口和资源的单位可以承担更多义务，获得新成员的首领也更依赖中心承认其位置；被拆散的旧集团则更难恢复独立行动。战争结果沿单位关系回流，扩张因此既增加外部控制，也不断重组内部层级。核心通过分配管理胜利，同时防止胜利所得形成新的、脱离中心的力量。

人口越多，组织调整越不能停止。研究所据材料显示，1616 至 1635 年间牛录数量明显增加；这一数字不能单独证明全部扩张机制，却说明人口增长与组织单位调整处在同一历史过程中。[六] 后金得到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八旗，而是一部在新增人口、信任危机、战争需要和身份差异中持续重编的机器。正因为它会失败、解散和重组，它才不是一张预先设计好的制度蓝图。

八旗由此把政治核心的选择变成累积能力。今日被保留的首领可以在明日继续带人，今日被登记的家庭可以维持战士，今日分配的资源能够准备下一轮行动，今日的奖惩会改变未来位置。人口成为力量，不是因为人数本身自动产生力量，而是因为人数被放进能够反复命令和再分配的政治关系。八旗机器的运转，让战争所得进入一套能够持续处理人口、资源和义务的结构。

后金小核心经由单位、旗、主人、家庭和供给节点向下传递命令，中心由此得到一种组织身体。这个身体不等于整个社会，却能在社会内部抓住一批可以持续行动的节点。组织身体越强，核心能够捕获的范围也越大；范围扩大以后，编组便需要随之细化。军事、行政、生产和供给彼此并非完全分离，

它们是同一人口机器的不同接口：军队需要粮食和家庭供给，生产需要身份和监督，行政则需要登记和命令。中心正是通过这些接口判断谁仍然可用。

五、包衣：依附被编进组织

八旗并没有把所有人口放进相同位置。包衣尤其显示，人口被组织化可以同强制和不平等同时存在。早期相关身份的研究梳理表明，aha 的来源包括购买、俘获和惩罚为奴等不同路径；旗制形成以后，booi 被编入专门牛录，并依附于主人旗。[七] 这些名称和关系本身也经历着时期变化，不能把旗制以前的依附人口、努尔哈赤时期的具体位置和后来内务府制度压成一种永恒身份。

包衣不是所有奴隶的同义词，也不是所有汉人俘虏的总称。它的族群来源并不单一，进入方式、服务对象、组织位置和职责各有差异。有人因战争被俘，有人经购买或惩罚进入非自由位置；不同主人、不同单位和不同时期，也会带来不同职责。若把包衣写成无差别的低位群体，政治核心如何选择和安排这些差异就会被遮住。

主人—依附首先是一种权重关系，在包衣中，这种关系进入了人口组织，不能被美化成普通服务。依附者的安全、资源、身份位置和服务机会，都接到主人及其所属政治结构；主人能够要求服务、处分不服从，也决定依附者接近资源和组织的路径。依附者可以保留具体技能、家庭记忆和原有民族来源，也可能拥有家庭和工作，其位置却首先由主人链和组织链决定，不能因此保有同等政治自主。政治核心需要保留依附者的劳动和知识，却不因此承认其与主人同等的政治权重。被使用不等于成为平等成员，获得保护不等于摆脱主人，能力被保留下来的同时，位置仍可被压低。

依附关系能够进入人口机器，正是因为它把抽象服从变成具体归属。一个人不是笼统地依附“国家”，而是通过具体主人、主人旗和专门单位进入命令与资源关系。谁能够要求他的服务，谁在冲突中提供保护，谁有权处分和推荐，都有可识别的政治落点。具体主人使控制能够深入日常；旗与政治核心又把主人关系纳入更大的政治方向，因而它不是彼此孤立的私人占有。但主人同样受更高权重约束，可以支配依附人口，却不能把这种人口能力完全变成脱离后金核心的私人力量，其旗属位置、政治资格和资源同样来自上层结构。依附者面向主人承担义务，主人则以所控制的人口和能力面向更高中心承担命令。

依附关系并不排斥位置改善。一个依附者可能因为技能、忠诚或长期服务取得更重要的任务，甚至在后来的清代帝室包衣中出现承担特殊事务和重要职务者。[八] 但位置上升发生在依附结构之内，不能反过来证明依附只是互惠合作。恰恰因为主人能够分配资源、保护和机会，晋升才会成为忠诚与服务的强大约束。保存能力、给予位置和维持不平等，可以由同一结构同时完成。

包衣关系也让人口组织深入政治核心的近处。普通军事编组主要解决大范围集合与义务，直接依附则把部分人口更紧密地连接到主人、家庭和核心事务。没有必要把后期帝室包衣的全部功能倒推到努尔哈赤早期；专门编组与主人依附显示的是另一种人口政治化方式：对象不只是被放进抽象国家单位，而是通过具体主人进入资源、命令和保护关系。

把“包衣”用于现代强类比时，不能抹去这个历史边界。它不是普通职业名称，也不等于任何受雇劳动者，更不能把历史包衣与现代工人完全画等号。这种历史关系呈现出一种政治结构：能力可以被保存，位置可以改善，旧身份可以继续存在，但服务方向、资源渠道和最高权重仍由主人关系规定。只有先拿出相应的组织、资源和权重证据，这一历史结构才可以用于解释现代对象。

这就是重新赋位的核心。对象的命运并非只有两种：旧身份完整保留，或者对象被彻底消灭。更常见的是保留有用部分，拆解原有自主关系，再把能力嵌入新组织。编旗、包衣和供给网络把这种差异固定下来。人口来自哪里、做什么工作、住在哪里、怎样服役、如何取得资源，都可以由政治中心重新解释。

六、保留差异，重新安排差异

满清式编组不要求先把所有对象变成同一种人。家庭可以保留，旧首领可以继续带人，语言和地域记忆不会因一次编旗消失，技能更是政治核心希望保存的对象。若扩张的前提是完全同质化，后金就必须在每次取得新人之后等待漫长的文化转化；它之所以能够迅速扩大，正在于政治机器可以在差异仍然存在时改变差异的行动方向。

抚顺降民的安置把这种做法显露得很清楚。相关官修材料记载，投降后的家庭关系和部分明制官属形式得到保留，同时田庐、牛马、衣粮等资源被重新安排，并置于李永芳的新统辖之下。[九] 这不能证明所有降民自愿或长期受到同样待遇，却能说明保存旧形式与改变最高权重并不矛盾。家庭仍是家庭，部分旧职能仍可继续；谁提供保护、谁分配资源、谁拥有最终统辖权，却已经改变。

来投首领保留同伴组织，同样是在保存旧连接的同时改变它所服从的最高权重。政治核心不必亲自制造每一条基层联系，它可以捕获已经存在的连接，把旧首领的组织能力变成自己的中介。对主动来投者，这种保存可能更多；对战败、被俘和被迫迁徙者，旧关系则可能被拆散。差异不是编组失败的残余，而是机器进行分层和选择的材料。

民族差异也没有因编组自动消失。满洲 / 满清是形成这部机器的历史主体。八旗、编旗和包衣不是任何社会都会自然长出的抽象效率技术，它们的方向由满洲历史经验、政治关系和群体延续参与决定。与此同时，被编入的异质人口不一定真正变成满洲人。民族来源、家庭和记忆可以继续存在，新的政治归属、主人关系与资源位置叠加其上，并在行动上取得更高权重。

这种叠加不会把民族问题取消为个人身份选择。满洲政治核心决定单位的最高方向，也决定哪些差异可以保存、哪些关系必须拆散、哪些人只能停留在依附位置。被编入者可以在组织中承担真实功能，却不因此分享同等的自己人资格。民族主体与组织异质性同时存在：前者规定机器的历史方向，后者成为机器扩张时可以选择、利用和分层的对象。

也不能把这种结构倒过来解释为满洲人天生掌握某种普遍管理术。机器的形成经过战争、首领关系、人口迁徙、资源分配和制度调整；没有这些历史过程，民族主体不会自动产生八旗。历史主体和因果

方向依靠具体组织过程确立，而不是用血统替代历史。民族主体正是通过这些具体组织关系实现自己；若拿“民族性格”四个字跳过牛录、编旗与包衣，真正的机制也就被抹掉了。

这种叠加比无差别同化更能说明满清共产主义的危险。完全同化需要消灭差异，重新赋位则能够利用差异。会带人的人继续带人，会使用火器的人继续使用技术，熟悉地方的人继续充当中介，家庭继续维持成员；但这些能力不再拥有独立政治方向。对象保留得越完整，新核心越能直接调用其现成能力。

这里形成的不是一个中性的满清模式，等待后来同共产主义发生外部接触。人口捕获、分层编组、主人—依附和资源忠诚，是满清共产主义这一不可拆分对象的历史生成机制。中共后来利用共产主义现代党组织、干部体系、宣传、军队、政治身份分类、科层国家和全国资源调动技术，复刻、扩大、制度化并优化这种在差异中重新安排人口的政治能力。满清政治由共产主义取得现代规模，共产主义也被满清式捕获与赋位重新塑形；这不是制度相似，也不是从古代取得管理启发。

七、强制、奖励、保护与惩罚属于同一机器

把八旗写成高效制度创新史，会把它最重要的政治条件删掉。人口能够进入组织，首先因为后金小核心已经取得暴力和选择权。战争、攻城、杀戮、俘获、迁徙和惩罚使对象失去原有选择空间；编户、授职、资源、婚姻和保护则决定被保存者进入什么位置。暴力与资源不是两套相反制度，而是同一机器处理不同对象、不同阶段的手段。

翁鄂洛城中伤及努尔哈赤者被赦免、授予牛录并获得供养，是这种选择的一个尖锐个案。[十] 核心可以不杀一个敌手，把他的能力放进新位置；但赦免并不是双方平等协商的起点，它发生在胜负和处置权已经确立之后。授位、供养和属人资源给被赦者一条生路，也把他的未来连接到新的主人和组织。保存本身就是重新赋位。

同一中心也会摧毁并分流。渥集行动中的招抚与攻杀、雅揽行动中的迁家口与俘获、乌拉战败人口中的编户与分给军队，显示同一中心会根据抵抗、进入方式和可用性作出不同处置。不能把这些人都写成自愿加入者，也不能反过来把所有进入都压成同一种纯粹强迫。政治投靠、旧首领带众来归、战败投降、被俘和被迫迁徙，各自拥有不同的起点；机器的共同作用，是让这些不同起点进入由核心规定的后续位置。

奖励和保护在这种结构中同样具有强制力。获得田庐、粮食、牲畜、职务、婚姻或家庭保护，意味着对象不必被彻底摧毁；但资源渠道越集中于新组织，离开组织的代价越高。保护可以解除眼前危险，也可以使依附持续。奖赏让人看见服从的收益，惩罚让人看见脱离的代价，两者共同规定可行动范围。

资源的不对称分配还制造内部比较。成员不仅判断服从是否能得到东西，也观察谁更接近中心、谁能保有部众、谁被降入更低位置。位置差异把忠诚变成可竞争的政治资格：立功和服务可能扩大资源，不服从则可能失去保护、组织位置乃至家庭安全。机器无需让所有人真诚信仰同一秩序，只要让越来越多的现实机会必须经过它分配。

惩罚也不只发生在处死或公开暴力中。拆散部众、迁移家庭、取消职位、改变单位、收回资源，都能削弱旧关系的行动能力。相反，允许保留家庭、授予职位、给予供养，则可以把可用关系接入中心。强制因此并不总以同一外观出现；它既在杀戮和俘获中打开空间，也在资源、资格和保护的条件中维持空间。

人口被编成力量，同时也失去一部分原有的自由组合方式。单位、家庭、主人和供给关系，会规定人口怎样迁移、怎样服役、怎样劳动，以及怎样取得资源。编组带来的不只有能力，监督和依附也随之增加。政治核心以组织化换取可调用性，人口则被置于更清晰的义务与等级中。

机器也会失败。早期汉军组织曾在 1621 年前后出现，随后因冲突和不信任在 1625 年解散；1631 年前后重新组织时，部分身份又被调整，火器与铸炮能力成为重组的重要条件，独立汉军八旗则到更晚才形成。[十一] 这条曲折过程说明，获得人口和技术并不自动产生稳定力量。组织必须反复检验忠诚、调整身份、安排资源和解决指挥冲突；失败并不取消捕获—重新赋位，反而说明它是一项持续工作。

因此，八旗机器不是一架只会向上扩张的完美装置。成员可能逃散，中介可能不可信，旧关系可能重新组织，资源分配也会制造新的冲突。它的能力在于把这些不确定性重新变成分层、奖惩和再编组的问题。每一次失败都迫使核心再次判断谁可保存、什么关系须拆散、哪些能力值得以新位置继续调用。

八、人口成为力量，位置仍不相同

这些关系接在一起以后，后金小核心拥有的便不再只是一批追随者。牛录把战士、家庭、首领和义务放进较稳定单位；固山与旗组织使命令能够穿过多个层级；登记、训练、供给、奖惩和重新分配，使战争所得进入下一轮行动；包衣等依附位置把部分人口更直接地接到主人和政治核心。分散人口由此成为可以反复集合、维持和调用的军政力量。

这种力量不是人口总数的自然结果，八旗的组织化也没有把所有成员变成同一种人；它来自政治位置被持续制造。编旗把不同来源的人放进同一部政治机器，并不保证他们拥有相同的资源、相同的政治信用，或同样接近中心。编组能够保存差异，中心也正是在保存差异中把不同的人分派到不同位置：有人保留部众、保留首领资格成为中介，有人被编户，有人成为普通军户，有人进入更直接的主人依附，有人因技能被特殊使用，也有人被拆散、分给军队，甚至被杀戮或排除。一个人的家庭、技能和旧身份可以保留，服务方向却转向新的最高权重。组织越能在差异中安排这些位置，政治核心越能把扩张对象变成自身能力。

满洲 / 满清主体也没有在异质人口增加中消失。政治编组能够容纳不同来源，却不是无主体的抽象国家效率。机器的最高方向、自己人层级和主人关系都由满洲政治核心规定；被编入者可以成为可用力量，但不会因此自动取得相同位置，也不必因此获得相同的民族身份和政治身份。编组成功恰恰建立在不平等的差异赋位上。

人口怎样被分层编进军政关系，捕获所得如何从一次性战利品变成组织化能力，已经可以看清；但这并不等于八旗已经完成了一切。八旗提供了组织容器，却不能自动解释此后出现的全部差序；编组虽已伴随赋位，一次入编却并未把此后的长期位置一劳永逸地固定下来，原有安排仍可随条件变化而调整。不同来源的人为什么会得到不同的长期位置，不能由“已经入旗”四个字抹平。早期投靠者与后来归附者有什么差别，投降者与俘获者怎样分流，汉军为何经历试验、解散与重组，技术人员、军人和行政人员怎样因能力获得不同安排，归附时间、来源路径、技术能力和主人关系如何在组织内部重新排列位置，谁更接近主人，谁更容易进入“自己人”，这些差别仍然存在。只有追查谁先进入、谁由谁担保、谁带来何种能力、谁获得何种资源，才能理解“自己人”不是一句情感称呼，而是一个有历史次序的政治位置。

这种内部差序同进入路径、归附时间、技术能力、次序权重、资源和忠诚紧密相连。汉军、归附与先来后到，正是差序显形的地方。八旗、编旗和包衣使人口成为力量；同一部机器又让这些力量永远不处在同一个位置。

第四章　八旗、编旗与包衣：人口如何被编成力量注释

一、关于临时狩猎牛录向常设军事牛录转化、军事牛录及固山的形成解释，参见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58—60。该研究可支持早期组织形式常设化及层级发展的有限解释，不能证明“会真实狩猎所以天生善于组织或统治”，也不能把形成过程写成无争议的一次设计。

二、关于军事牛录覆盖战士及家庭、牛录额真选训士兵和处理成员事务，以及部分来投首领保留同伴组织并取得牛录职位，参见 Elliott, *The Manchu Way*, pp. 58—61。材料说明军政编组能够保存部分旧组织并改变其制度位置，不能推出所有来投首领都获得相同待遇，也不能以较晚形态倒推每个早期单位的完整功能。

三、关于海西战败人口的大规模迁徙、较少获准自成牛录，以及主动加入者较可能保留原同伴组织，参见 Elliott, *The Manchu Way*, p. 61。该材料可以支持进入路径影响组织自主和信任位置，不能建立适用于每一个个体的绝对规则。

四、关于军事牛录、严格意义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的分期，参见 Elliott, *The Manchu Way*, pp. 58—63, 76—80。相关研究把严格意义八旗的形成置于 1615 年前后，把蒙古八旗置于 1635 年，把独立汉军八旗的形成置于 1637 至 1642 年间。具体早期旗单位和制度名目的精确关系仍需同期材料交叉，不能把后期二十四旗或清代定型制度倒推努尔哈赤早期。关于 1616 年建元礼仪中八旗贝勒大臣率群臣集殿前分八旗序立、行礼建元，见《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康熙本）》卷五天命元年春正月壬申朔条（据维基文库公开转录定位，纸本页码待核）；该条只说明八旗进入公开权力秩序，不能单独证明牛录、甲喇、固山的完整形成过程。

五、关于乌拉战败人口中来归者返还妻子仆从编户、其余分给众军，见《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康熙本）》卷四癸丑年正月条；渥集部招抚、迁家口与雅揽路击取俘获见卷三庚戌年冬十一月条；虎尔哈路扎库塔城攻杀及招抚见卷三辛亥年冬十二月条（均据维基文库公开转录定位，纸本页码待核）。官修实录能够确认处置类型的并存，但相关人数、动机、“愿留”及后续效果仍需交叉核实；这些材料不能证明所有编入均出于自由选择，也不能证明所有被俘者都被成功转化为可用力量。

六、Elliott, *The Manchu Way*, p. 63，讨论 1616 至 1635 年间牛录数量由 201 增至 419。该数字可作为人口扩张与组织单位调整处于同一时期的证据，不能单独证明数量增长的全部原因，也不能替代关于训练、供给、动员和资源回流的机制论证。

七、关于 aha 的多种来源、旗制形成后 booi 进入专门牛录及其与主人旗的依附关系，参见 Elliott, *The Manchu Way*, pp. 50—52, 82—84。购买、俘获、惩罚为奴和不同族群来源需要区分；aha 与 booi 也不能跨时期静默画等号。该材料不能支持“包衣等于所有奴隶”“包衣等于所有汉人俘虏”或“所有包衣待遇和法律位置相同”。

八、Elliott, *The Manchu Way*, p. 83，提到帝室包衣在后续清代可能承担特殊任务和重要职务。该材料只说明依附身份与能力使用、位置上升可以并存，不能用后期帝室包衣的功能倒推努尔哈赤早期，也不能把位置改善解释为脱离依附或取得平等。

九、关于李永芳投降（四月甲辰）及大军旋都后授予总兵官、阿巴泰女妻之，抚顺降民千户保全亲属、补给田庐牛马衣粮并依明制官属令李永芳统辖（四月乙卯），见《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康熙本）》卷五天命三年四月有关条目（据维基文库公开转录定位，纸本页码待核）。官修叙述能够说明家庭、旧形式、资源与新统辖可以同时被处理，不能证明全部降民自愿、长期待遇一致或保有原来的政治自主，也不能由此补写李永芳及所有降民的内心认同。

十、关于翁鄂洛城中伤及努尔哈赤者被赦免、授予牛录、配置部属并获得供养，见《满洲实录（标点本）》卷二“太祖宥尔果尼洛科”条。该个案可以直接显示敌方个体被保存、授位并连接组织资源，不能推出普遍政策，也不能补出其后续实绩。

十一、关于 1621 年前后的汉军组织试验、1625 年的解散、1631 年前后的重组及此后独立汉军八旗形成，参见 Elliott, *The Manchu Way*, pp. 76—80。材料可说明人口与能力的编组会因冲突和不信任失败，并经历身份调整与重新组织；不能把 1631 年的六营直接写成完整汉军八旗，也不能推定所有汉人、技术人员或降者都因能力获得待遇改善。汉军、归附路径、技术能力和先来后到造成的差异赋位，留待下一章展开。

十二、“人口被编成力量”，是依据牛录、八旗、编旗、包衣、战争处置、资源关系和主人依附等材料建立的政治—组织理论判断。现有史料和研究能够支持家庭入编、首领组织保留、人口分流、旗制分期、包衣来源及汉军试验等节点，但不能提供一份覆盖所有成员、时期和具体程序的完整档案。事实缺口限制数字、制度细目和个体履历。

十三、满洲 / 满清是牛录、八旗、编旗和包衣这部人口机器形成的历史主体，满洲历史经验、政治关系和群体延续参与决定其方向；这套机器不能被抽象成任何社会都会自然产生的一般军事效率。同时，满洲历史经验、政治关系和群体延续对机器方向的作用通过战争、组织、资源、家庭、首领和主人关系等历史过程实现，不等于基因决定、生物学永恒本质、满洲人天生善于统治或小民族必然战胜大民族。被编入者可以保留原有民族来源，新的政治归属和资源位置叠加其上，并不意味着所有民族差异被消灭。

十四、满清共产主义是不可拆分的政治—组织对象。八旗、编旗和包衣不是一个先已独立完成、后来才被共产主义外部借鉴的“满清模式”。中共利用共产主义现代党组织、干部、宣传、军队、政治身份分类、科层国家和全国资源调动技术，复刻、扩大、制度化并优化满清式捕获、编组、重新赋位与主人—依附能力；满清政治被共产主义现代化，共产主义也被满清政治重新塑形。这些早期编组与依附关系构成满清共产主义的历史机制来源，但历史机构与现代中共机构之间并非一一对应关系。

第五章　汉军、归附与先来后到

人口被编入牛录、固山、旗和主人—依附关系以后，可以成为后金反复调用的力量；但“被编进来”从不等于“被放在同一位置”。同样进入后金政治机器，有人带着旧部与首领资格来投，有人在城破以后投降，有人被俘、迁徙或分给军队，有人因火器、铸炮、行政或沟通能力而被保留，有人则被降入更直接的依附位置。进入路径不同，政治信用、组织自主、资源资格和接近主人的距离也随之不同。

汉军正处在这些差异的交叉处。它不能被当成一个从开始就边界清楚、制度完整的固定群体，更不能同所有汉人、降人、俘虏或技术人员画等号。十七世纪二十年代的早期汉军试验曾经建立，又因冲突和不信任而解散；三十年代重组时，火器与铸炮能力、旧有身份调整和新降者的待遇重新进入政治计算；独立汉军八旗还要到更晚才形成。[一] 这条曲折路径显示，后金并没有变得越来越“包容”；政治核心是在需要异质能力、又不交出最高权重的条件下，反复试验怎样使用人。

“归附”在此并不是一个道德词。它可能包含现实选择、战败后的求生、首领带众转向、强权环境中的利益估价，也可能同俘获、迁徙、奴役和惩罚相邻。政治机器关心的，不是每个人是否出于纯粹自愿，而是他以什么路径进入、带来什么能力、由谁担保、取得什么资源、承担什么服务，以及这些关系能否把他的行动稳定接入新的统治中心。所谓先来后到，也不是一句古老的人情常识，而是进入时间被转化为政治信用和资源次序的过程。

一、已经入旗，不等于已经同位

编组解决的是人口能否被找到、集合、供给和追责；赋位解决的则是谁能够保留多少旧关系，谁可以接近资源，谁必须经过主人，谁只被当作可用对象，谁有机会逐渐进入自己人层级。两者相互关联，却不是一回事：一部人口机器完全可以让不同来源者接受同一命令，同时维持他们之间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不是编组尚未完成的暂时缺陷，它本身就是机器运转的办法。

后金在维持运转中面临着分工与自主的固有张力：旧首领连接部众，地方熟手处理事务，军人负责作战，工匠承担铸炮，普通人口提供生产供给，这些异质能力都有赖于既有协作和经验的存续。然而，若所有被保存的关系都获得同等政治自主，核心便会被自己吸收的对象重新分割。能力可以被保存，组织可以部分保留，资源也可以授予，最高裁断却必须保持不对称。

来投首领较可能保留原有同伴组织并取得牛录职位，战败的海西人口则更多经历迁徙，也较少被允许自成牛录。[二] 这并不构成适用于每个个体的铁律，却表明“带着关系主动进入”和“在失败后被处置”会产生不同的组织后果。前者交付的是一条已经能够传令、集合和作战的关系，政治核心可以用职位把它接入自己；后者携带的旧关系更容易被判断为潜在危险，拆散、重编和降低自主便成为控制手段。

同一战败人口内部也可能被分流。乌拉败兵中，来归者被记为返还妻子仆从并编户，其他俘获者则分给军队。[三] 官修记载无法让我们知道每一个人的真实动机和长期命运，也不能把“来归”直接翻译成自由意志；它至少保留了一道政治区分：表明归附、进入新关系者，与作为战争所得被分配者，并不承受相同的位置。家庭是否保持、人口由谁统辖、是否成为独立户，都是归附状态落到现实中的后果。

“入旗”只是共同命令结构的起点。一个人的位置还要由进入方式、原有关系、可用能力、主人距离和后续表现共同决定。政治机器无需先消灭差异再开始统治，它可以把差异直接编成层级。不同来源者越能在同一行动中发挥不同功能，核心越有理由保留差异，同时把决定差异价值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

二、归附不是一个动作，而是多条入口

归附若只被写成一个人或一个群体从敌方走向后金的单一瞬间，这一瞬间之前和之后分别发生的事情就会被遮住。有人尚未遭到直接军事失败便带众来投，有人在城破后投降，有人先被俘再被选择性保存，有人跟随旧首领进入，有人则在迁徙和资源断裂后重新寻找保护。它们都可能在官修语言中靠近“归”“降”“附”，却不能因此被压成同一种入口。主动投靠者提供的不只是人数，他可能带来部众、地方知识、交通路径、敌情和既有组织。政治核心若让他保留一定关系，得到的便是一条可以立即使用的中介网络；授职和资源把这条网络的未来接到新中心。这里仍有暴力背景和现实估价，不能浪漫化为平等结盟，但进入者保有的议价材料通常多于已经彻底失去选择空间的俘虏。

战败投降则发生在选择范围已被军事力量压缩以后。李永芳投降抚顺后获得总兵官、婚姻关系和新的政治位置，抚顺降民的家庭关系、部分旧官属形式及田庐、牛马、衣粮也被安排在新的统辖之下。[四] 这一材料可以说明旧能力、家庭与行政形式能够被保存，却不能证明投降者获得了与核心成员相同的资格，更不能代替他们说明内心认同。授职越高，越不能忘记授职权来自胜者；保存越多，越能看出最高权重已经改变。

俘获者的入口更直接地受制于处置权。后金的军事行动中，招抚、攻杀、俘获、迁徙和人口分配可以并存。被俘不等于必然被杀，也不等于必然被重用；是否保留家庭、是否编户、是否分给军队、是否进入非自由位置，都要经过新的选择。[五] 捕获—重新赋位从来不是保证对象获得新机会的温和程序，它首先意味着对象失去原有政治自主，然后由核心判断其是否值得保存以及怎样保存。

首领带众进入，同样不同于孤立个人投降。首领的价值来自他能够把一群人一并带入，但这也使他更可能成为潜在竞争者。核心会利用他的担保、地缘和组织能力，也会通过职位、旗属、资源和后续奖惩，限制他把部众重新拉回独立方向。旧关系被保存，正因为它有用；旧关系被降到新中心之下，正因为它仍有危险。归附不会在跨过一条线时结束，而是一条持续被检验的路径。一次表态只能打开入口，后续服务、作战、供给、担保与服从才不断决定位置。昨日的降者可以因能力和表现取得更多资源，也可以因不信任被降位、拆分或重新编组。政治身份不是一张永久洗白的凭证，而是资源与行动后果不断更新的关系。

三、先来后到怎样变成政治信用

先来者并不天然更忠诚，后来者也不天然更危险。进入时间不能读出内心，却能制造政治上的信息差。普通资历描述的只是工作时间长短；政治上的“先来后到”，涉及一个对象进入主人—依附链的时间、担保关系、可被信任的历史、资源取得的资格以及对新核心的接近程度。早期追随者同核心共同承担风险的时间更长，其部众关系、战功、婚姻、担保和资源往来更可能被组织记住；后来归附者缺少同样长的可观察记录，旧联系也更接近当前敌对秩序。核心因此把时间转化为信用差异。

信用不是道德评价，而是对可调用性的估价。一个人是否在危险时仍执行命令，能否带来部众，是否曾在资源不足时继续服务，是否由可信者担保，都会让中心判断把多少人口、武器和位置交给他。先来者的优势不只是“资格老”，而在于更早进入了能够积累记录的关系；组织知道他做过什么，也知道他的家庭、部众和资源在哪里。先后是初始权重和关系记忆，不是替代所有裁断的机械公式：后来者即使能力很强，也可能先被放在试用、分流或受控位置；早期归附者即使能力有限，也可能凭既有关系取得更高的组织信用。

时间优势还会转成资源优势。较早进入者更可能先占据中介位置、取得职务、形成与主人的稳定关系；粮食、保护、职务机会和工作条件的分配，使信用差异具有可见后果。在这个过程中，先来者可能较早取得转递资源或引介后来者的位置。资源让信用有了现实形状，信用又帮助维持资源。后续新增人

口到来时，他们也可能成为担保者、管理者或分配节点，后来者面对的便不只是一个抽象政权，而是一张已经由先行者占据若干节点的具体网络。

共同风险使这种信用具有超出一次奖赏的连续性。在供给不足、战争不利或旧关系仍可回返时继续服务，能够形成比平时服从更有分量的连续记录。这些记录会影响中心对同一担保者、中介及其既有服务关系的后续估价。但现有材料据此只能说明进入次序会改变可观察记录，不能推出家庭、部众或担保关系能够传递政治信用，也不能推出后来者因此取得稳定起点。

政治信用之所以能够延续，不只因为中心记得某次功劳，更因为个体履历被安放在可追责的关系中。担保者以自己的既有位置为后来者作保证；后来者若违命，担保者的判断和管束能力也可能受到估价。担保失败、命令落空或后续表现，都可能改变中心的估价。这种关系为中心增加了观察、信息和追责材料，使后来者的行动更容易进入具体判断。但这并不证明担保会自动打开资源入口，也不证明担保者因此取得稳定的准入权、解释权或处分权。后来者能否获得资源、其行动如何被认定，仍取决于个案材料与中心裁断。

主人距离同样影响着信用转成现实位置的速度。这里的远近不只是空间，而是命令、报告和保护需要经过多少层关系。接近主人者更容易被看见、陈述功劳并在资源争议时获得裁断，也更容易取得任务；距离较远者承担相同服务，记录也可能先经过首领或中介。先来者占据的节点可能影响后来者被看见、被报告或接触资源的具体路径，但这种位置影响同样不等于先来者享有稳定的引介权、评价权或资源转递权。后来者的位置如何变化，仍须由个案关系、可见表现和中心裁断说明。

先来不是不可撤销的护身符。旧功不能保证在新的冲突中永远可信，靠近中心者也可能因违命失去位置。后金政治机器保留的不是固定的贵族道德，而是中心对信用的最终解释权。谁的旧功仍有效、谁的担保足够、谁需要再次证明，仍由最高权重决定。时间提供材料，却不能夺走裁断。与此同时，先后也不是绝对不变的规则。政治核心会因战争、背叛、技术和资源需要重新调整位置。新战争对火器、铸炮、攻城、行政和地方知识的迫切需求，可能让掌握关键能力的后来者迅速取得重要任务并获得提升，先来者则可能因不服从或担保失败而失去信用。能力提供了加速通道，却不抹去来源差异；主人关系和组织身份仍规定着其上升边界，使其靠近资源却未必能进入最高政治信任层。

“自己人”正是在时间、关系和资源的累积中被制造出来的。它同时包含民族主体和族属差异，也包含进入次序、共同风险、主人距离、组织履历与可验证忠诚。满洲政治核心决定着这套机器的最高方向；异质人口可以被纳入并发挥真实作用，却不因作用重要就自动获得同等的自己人资格，更不等于拥有最高政治权重。民族主体与政治信用并不互相替代，而是在同一层级结构中相互作用。

组织会记住谁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进入。担保、资源、职位、婚姻、编制和后续行动把这段历史留在关系中，不需要每次重新说明；“自己人”由此成为一种有历史的关系，而不是抽象的民族标签。这种记忆构成了初始权重，把进入历史沉淀为组织内的差序，也可能被重新改写。新的战争、失败和能

力需求会改变旧位置，但改写本身仍以旧次序为参照。先来后到既是差序的来源，也是核心调整差序时必须面对的历史负担。

四、汉军的第一次失败

若只看后来形成的汉军八旗，早期道路很容易被写成一条平滑上升线：后金取得汉人，于是建立汉军，汉军逐渐壮大，制度最终完成。实际过程却有明显断裂。现有研究把第一次在女真统辖下组织汉军的尝试放在 1621 年前后；到 1625 年，这一试验因冲突和不信任而失败，汉军被解散，相关人口被转向农业劳作。[六]

这次失败说明，掌握相近语言、军事经验或地方知识的人口被集中起来，并不自动成为可靠力量。组织可以把人放在一起，却不能凭名称消除旧敌我、生活压力、指挥冲突和对新中心的不信任。能力若不能被新的资源和忠诚关系稳定约束，就可能成为风险；人口若只在名义上被编组，实际关系仍不足以承担命令，核心便可能选择解散而不是继续维持。这也暴露出“汉军”名称的边界。它不是所有汉人的共同政治身份，更不是一个天然存在、等待后金承认的民族军团。谁被编入、承担什么任务、是否拥有独立组织，会随时期和政治判断变化。把 1621 年的试验、1631 年的六营和 1637 至 1642 年间形成的独立汉军八旗混为一谈，就会遮蔽失败、身份调整和重新组织这些关键机制。[七]

失败之后转向农业劳作，还显示出能力使用并不由对象自己决定。一个人曾被当作军人，并不保证以后仍以军人身份存在；核心可以改变他的资源位置和服务方向。捕获—重新赋位不是一次性授予新身份，而是持续保留重新改写身份的权力。昨日被集合的军事人口，今日可以被解散为生产人口；以后若战争需要和信任条件改变，又可能重新进入军事组织。这里不能把失败解释成汉人天生不可靠，也不能把后来的重组解释为民族差异终于消失。后金核心既需要这个异质而必要群体的人数和能力，又担心其旧关系、聚集和自主指挥。前后变化都发生在满洲核心保持最高权重的统治结构之内。

到 1631 年前后重组时，核心面对的并不是把原组织原样恢复，而是在不同条件下重新选择成员、身份和任务之间的连接。部分此前处于较低依附位置者恢复独立户，使人员能够维持家庭、协作和持续工作；新降者获得奖赏，被接到新的资源关系；火器与铸炮能力成为重要动力，限定了哪些旧经验值得成组保存。[八] 在此阶段出现的六营，不能被静默等同于后来的完整汉军八旗，重组首先呈现的是一套新的调用边界，而不是旧名称的自然成长。

从前后材料中可以观察到平行的结果变化：部分人员由被直接处分的依附人口转为相对独立的服务者；铸造和火器使用所需的协作关系在不同条件下得到保存；人员和关系接受资源、命令与追责的组织形式发生改变。技术并未自行产生新组织，1625 年的解散也没有终止后来对汉人能力的使用；旧组织边界被撤销，后来的重组伴随身份调整和新的调用条件，必要能力没有同早期失败的组织形式原样绑定。谁能够取得身份、资源并进入何种组织，仍处在政治核心的最高处分之下。

这一反例对理论构成了严格边界。捕获不必然成功，保存能力不必然形成力量，重新命名更不能代替稳定的组织关系。政治机器会误判，会因资源不足和冲突而拆散已有组织，也会暂时放弃某种能力。

满清共产主义的统治技术优势，不是每次操作都成功，而是失败之后仍能把对象重新放回可处分状态，等待下一次识别、重组和调用。把 1625 年的解散与 1631 年前后的重组按顺序并置，现有材料只能确认组织边界先后被撤销和重设，没有材料交代后金核心是否总结前次失败，也没有交代 1631 年重组的具体决策依据，因而不能把两者之间的主体心理和决策链写成已经得到证明的历史事实。

五、技术能力打开位置，却不取消等级

汉军并非一个从始至终待遇一致的民族类别。汉人军士、旧明军官、投诚者、被俘者、火器人员、铸炮人员，以及行政和翻译人员，都可能通过不同路径进入新体系。相同族属不能自动说明相同位置；位置差异还要看进入路径、担保人、进入时间和能力。复杂历史不能压缩成单一民族性格。后金及清初政治核心会选择性保存有用对象，改变其身份位置，并把对象的能力接入新的主人关系。具体人物、人数、编制和时段都要受证据限制；仅凭这一机制，不能推出所有归附者都获得同样待遇，也不能推出所有汉军都拥有同一政治地位。

到 1630 至 1631 年前后，战争条件改变了汉人能力的价值。相关研究指出，汉军被重新组织，部分此前降为奴者恢复为独立户，新降者得到奖赏；汉人铸造火炮和使用火器的能力，是重组的重要原因。[八] 这里出现了捕获—重新赋位最清楚的一种形式：旧对象没有被要求先丢掉专业能力，恰恰因为这些能力无法被核心轻易替代，才被从较低位置重新识别出来。技术能力首先改变的是“是否值得保存”的判断。不会铸炮的核心若要在攻城和战争中使用大炮，就必须面对掌握相关知识的人。杀掉、驱散或长期压在无法工作的身份里，会同时摧毁自己需要的能力。于是，恢复独立户、给予奖赏、重新编成军事单位，不是道德承认，而是让技术重新可用的组织条件。

能力还改变资源配置。专业性越强，重新赋位越不能只靠改名，要保存可工作的关系。铸炮者掌握的不是一句口令，而是材料配比、炉火经验、工序协同与失败判断，需要原料、工场、工具、协作人员和持续供给；炮手的能力也要在运输、装填、瞄准和阵地配合中实现，需要训练、编组和指挥接口。它不像一次性战利品，拿到手便能自动发挥作用；资源流向技术，正因为技术已被放到新政治权重之下。若把人员拆得过散，旧知识可能随之失效；若让旧群体完全自主，核心又担心技术成为独立力量。核心必须给技术人员以能够工作的关系，工匠可以继续以工匠身份工作，军人可以继续运用旧经验，允许部分旧知识和协作方式继续存在；同时必须把工场、武器、供给和行动目标接入新的命令链，切断它自行选择政治方向的可能。所谓保存能力，从来不是把一个孤立人才收入名册，而是选择性保存足够多的协作关系，使能力能够继续发生，同时将其置于新的政治控制之下。

但能力不是平等证书。一个技术人员可能取得优于普通俘获者的位置，也可能由依附状态恢复为独立户，却仍处在由满洲核心决定的政治层级中。谁获得材料，谁组织工场，武器交给谁，技术人员能否迁移，仍不是由专业共同体自主决定。位置改善与控制加强可以同时发生：对象越重要，核心越需要保护和奖励，也越需要确保它不能脱离。技术重用因此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自由职业选择。被使用者可能真实改善生活，也可能取得职务和尊严；这些个体结果不能被否认。但从结构上说，待遇改善发

生在胜者取得处置权、重新规定身份和资源以后，不能倒推整个进入过程自愿，更不能把少数被重用者的上升外推为所有汉人待遇普遍改善。

火器、炮术、造船、文书、翻译和行政经验，对扩张中的核心具有现实价值。政治核心可能因需要这些能力而保留其承担者；这不等于保留他们原来的政治自主。李永芳获得职务，抚顺部分旧官属形式被保留，[四] 姜弘立投降为后金提供了开启与朝鲜官方交涉的契机，随后一名被俘军官被派往朝鲜递交国书，[九] 都说明旧军事、行政角色或沟通能力可能继续发挥功能。但现有材料不足以为每个人建立完整的长期贡献链，也不能由几个高位个案推出一套普遍任用政策。个案证明“可以发生”，不证明“人人如此”。能力被抽出，人员被重新组织，资源按新的关系分配，过去的身份只能在新权重允许的范围内继续存在。

能力由此成为一条穿过身份层级的通道，却不是取消身份层级的力量。政治核心能够让一个来源较晚、信任较低的人因技术而获得重要位置，也能让他在完成任务后仍被限制在某种组织边界内。技术回答“这个人能做什么”，主人关系、进入路径和政治信用回答“允许他在什么位置做”。二者共同构成差异赋位。这种关系不是一次性的“收买”。对象要在后续行动中持续证明可用，中心也要不断检查其关系是否可靠。资源、保护和职位形成绑定；失败、抵抗和失职，或关系被判断为不可靠，都可能触发降位、拆散或清除。汉军和归附者因此成为国家能力扩张的接口：他们携带的不是抽象民族属性，而是能被政治核心选择性调用的军事、行政和技术能力。

六、资源忠诚不是收买，而是持续绑定

把资源与忠诚相连，容易被简化成胜者拿好处收买降者。这种说法只看到一次交换，没有看到关系怎样延续。田庐、牛马、衣粮、职务、婚姻、部众、独立户资格和技术工场，并非孤立奖品；它们改变一个人以后从哪里取得安全、怎样维持家庭、通过谁开展工作，以及离开新组织会失去什么。抚顺降民的家庭与旧官属形式被保存，同时由新统辖关系安排资源，说明“保存旧生活”和“改变政治主人”可以在同一动作中完成。家庭越完整，人口越容易继续生产和服务；旧职能越能运转，新中心越少需要从零制造行政能力。但资源来源和最终统辖已经改变，旧形式保存得越多，越能显示捕获并不以清零为前提。

虎尔哈归附者的材料中，部众在去留分组后，愿留者中为首的八人获得人口、牲畜、衣物、田庐和器用，并被纳入新的军事政治关系。[十] 官修文本中的“愿”与感恩语言不能直接量化真实自愿度，战争和强权环境也不能从背景中删除；然而，资源确实使留下成为一种可以维持的现实位置。政治选择不仅由恐惧推动，也由可获得的生活条件塑造。资源忠诚的关键，是资源并不平均开放。谁能够保有部众，谁恢复独立户，谁取得官职，谁只能成为依附人口，谁被分给军队，都在显示核心怎样给不同入口定价。资源越稀缺，位置差异越能约束行动。先来后到可以影响政治信用和现实位置，但这种影响必须落实到具体关系、可见表现与核心裁断，不能自动变成先来者对后来者的稳定担保权、准入权或资源分配权。

保护也属于资源。一个人得到的不只是粮食和住所，还可能是家庭不再被拆散、旧部不被重新分配、技术工作免于中断、在新秩序中免遭再次处置。保护的价值来自中心有能力制造危险，也有能力暂时终止危险。它既可能是真实的生存改善，也是依附关系的来源。被保护者越无法从其他地方取得同等安全，忠诚绑定越牢。因此，资源忠诚不是对内心的直接购买。政治核心无须知道每个人是否真诚，只要能够观察他是否服务、是否交付能力、是否服从调动，并据此继续或停止资源。内心可以保留怀疑，行动却被现实条件约束。后金机器所制造的，是忠诚的可执行外形，而不是所有人的思想一致。

主人—依附关系并不要求所有人以同一种方式直接面对最高中心。旧首领、既有职务和原有组织关系可以在具体个案中被政治核心保留、调用或重新赋位；它们能够承担什么作用、存在到什么程度，仍取决于最高裁断。这里不能据此推出一套自动复制的中介网络，不能断言后来者接近资源必须经过先来者，也不能把个案中的管理、担保或报告写成稳定的跨人资源处分权。忠诚仍然通过资源、保护与服务被持续绑定，但这种绑定的最高方向是政治核心，不是一套由中介自行掌握的稳定资源网络。

资源绑定也会制造背离风险。分配不均、承诺落空、供给不足或中介滥权，都可能使成员重新估价忠诚；1625 年前后汉军试验的失败，正提醒我们资源与组织若无法稳定配合，名称和命令并不足够。机器必须不断重新分配、惩罚和调整，才能把忠诚维持为现实关系。资源忠诚是一项持续工作，不是一次奖赏后的永久结果。

七、自己人有层级，民族主体没有消失

汉军、蒙古旗人、包衣与不同来源的归附者进入同一旗制世界，并不意味着旗制成为一个无民族主体的纯粹组织国家。相关研究指出，旗内等级受到族属、出生、职业、形成时法律身份和纳入方式等因素影响，满洲、蒙古与汉军并不处在相同层级。[十一] 其中部分证据涉及后续制度形态，不能毫无分期地倒推每一个早期时刻；它仍足以否定“编入即平等”的想象。满洲 / 满清是这部机器的历史主体。最高政治方向、核心的群体延续和自己人资格，不能被汉军及其他异质人口的增加解释为自动消失。后金吸收越多外来能力，越需要在组织内部保留谁更可信、谁更靠近主人、谁可进入裁断、谁主要承担服务的区别。异质性扩大机器，主体性规定机器服务谁。

这并不是说每个满洲人都高于每个汉人，也不是说血统能够自动决定每项职务。亲属、战功、进入次序、主人关系、职业能力和法律身份都会改变个人位置；满洲内部也有层级、冲突与依附。这套编组、选择与资源分配首先由满洲政治核心形成并掌握，外来者的能力被接入这一方向，而不是一个无主体的效率系统平等吸收所有人。同样，汉军也不能被写成单纯受害者或单纯合作者的整齐集合。有人可能在投降后获得高位，有人因技术恢复独立身份，有人经历解散和转业，有人停留在较低等级，有人则可能通过长期服务获得更靠近中心的位置。个体路径真实不同，不能用一个总标签替代；但个体上升也不能取消结构上的不平等。

这种结构能够容纳个体例外，恰恰因为它不是一张按族属机械排列每个人的固定表。后来者可以因稀缺能力越过较早进入但作用较小的人，汉人个体可以获得职务、资源或接近中心的机会，满洲成员也

不会仅凭族属免除违命、失职和依附关系的约束。例外处理的是某个人在具体关系中的位置，不是宣布所有来源差异从此失效；核心可以提高一个人的权重，而不把他所属群体整体提升到同一层级。满洲主体之所以仍能保持，关键不在于每一个具体排序都必须让满洲个体居先，而在于谁规定例外、谁解释功劳、谁能够撤销位置。个体上升所依赖的担保、主人接近、任务授予与资源持续，都由既有政治核心掌握。例外越需要特别确认，越显示一般边界仍然存在。被重用者取得的是真实位置，但这种位置不能自行转化为重画组织主体的权利，也不能自动为其他同来源者提供同等资格。

因此，旗内层级可以一面保持满洲政治方向，一面吸收不符合简单排序的个体。它把族属和纳入方式作为通常信用背景，又让战功、技术、长期服务和主人关系修正个人位置，修正后的结果仍接受中心的持续裁断。这样的弹性不是民族主体的消散，而是主体维持扩张能力的条件。若完全拒绝例外，异质能力难以调用；若个体例外自动推翻一般边界，核心又会失去对自己人资格的解释权。层级通过允许有限上升而保持整体不对称，通过保留撤销权而阻止例外固化为平等主张。这一结构中的“自己人”包含着相互交织的层面：既有满洲政治主体所规定的核心方向，又有先来后到、共同风险和长期服务积累的政治信用，也有主人关系、组织职位和资源控制形成的现实接近度。三者并不总是重合，却共同决定一个人能否从可用对象走向可信中介，乃至接近裁断。

这种层级结构使捕获—重新赋位比单纯同化更有扩张力。机器不要求汉军先失去全部旧知识，也不要求降者先获得满洲身份；它让人继续作为能够作战、铸炮、行政和沟通的异质对象存在，同时改变这些能力的最高服务方向。差异被保存，因为差异有用；等级被维持，因为核心不允许有用性转化为平等的最高权重。这也正是满清共产主义的历史机制，而不是一个独立的“满清模式”等待现代共产主义后来借用。捕获异质人口、按入口和信用分层、用资源绑定忠诚、保存技术而重置主人关系，已经构成不可拆分对象的历史生成部分。共产主义现代党组织、干部体系、政治身份、宣传和科层国家以后会复刻、扩大、制度化并优化这些捕获与赋位能力；它不是外加工具箱，而会同满清式赋位互相塑形。[十四]

八、从人口差异到国家能力

只把汉军的作用归结为提高后金军事实力，会漏掉真正的结论。把来源、时间、能力和资源放进同一套位置分析，只是用来说明不同对象为何被放在不同位置；这并不等于后金政治核心已经形成一套主体学习理论。一个对象从哪里来、怎样进入、在具体个案中由谁担保、能够做什么、获得什么资源、是否持续服务，都可作为分析其位置的材料。担保只提供逐案观察、信息和追责依据，不构成自动准入机制。不同入口不必压成同一种身份。来投者可以保留部分旧组织，战败人口可以被拆分，投降将领可以授职，技术人员可以恢复独立户并进入火器组织，依附人口也可能因特殊能力承担重要任务。保存、升位、降位、解散和重组并存，中心对位置的最终处分权始终没有改变。

汉军的失败与重建尤其说明，异质能力不是拿来即用的物品。它需要家庭和资源维持，需要组织边界约束，需要指挥关系承载，也需要核心不断评估忠诚。技术人员带来的不是孤立技能，而是一整套工

场、协作、原料和知识关系。政治核心若要调用这些能力，就必须保存足够多的旧结构；若要控制这些结构，又必须改变其最高权重。先来后到把进入时间写进国家能力。早期追随者和先来中介积累信用、占据位置，后来者带着新能力和新资源进入已有层级；每一轮吸收都接在过去的分配上，不是从空白重新开始。既有履历、担保和资源位置会影响后续估价；但现有材料不足以把这种影响写成已经制度化的记忆机制，也不能证明核心按一套稳定记录总结失败、识别组织类型并据此裁断。

在后金的组织网络中，汉军和技术人员提供异质能力，归附者与旧首领提供地方连接，包衣和其他依附人口承担直接服务，满洲核心保持最高政治方向。不同位置按不同权重协同，共同扩大政权，却不组成平等共同体。能力被纳入，主人没有消失；旧形式被保存，最高权重已经易手。此前政治核心重新赋位的主要还是人口、首领、家庭、军人、技术人员和有限旧官属；在这一过程中，它已经能够保存异质能力、重排资源和重排忠诚。而当捕获对象扩大，面对的就不再只是可以分配的人，而是一具包含官署、税册、交通、城市、军队和地方治理的旧国家躯体。

旧国家不能像一个俘虏那样被简单编入单一单位。这些功能彼此牵连，任何一处调用都可能牵动其他节点。越过关口，面对规模远大于自身的旧国家身体，核心面对的选择是：把全部旧机构清零，还是选择性保存旧官、财政、军事和行政能力？这要求它具体决定哪些机构继续办事、哪些人员可以留下、哪些账册和交通继续运行、哪些城市空间必须重新安排。汉军、归附与先来后到的历史已经证明，小核心能够让旧能力在新主人关系下继续运行；主人—依附关系将在国家层面表现为最高权重和资源方向的改变。关口的意义不在地理穿越本身，而在捕获—重新赋位即将面对一个更大、更复杂、不能从零制造的国家。

第五章　汉军、归附与先来后到注释

一、关于 1621 年前后的早期汉军试验、1625 年解散、1631 年前后重组及 1637 至 1642 年间独立汉军八旗形成，参见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76—80。该研究支持制度分期、失败与重组，不能把 1621 年汉军、1631 年六营和后来汉军八旗静默视为同一完整制度。

二、关于带人来投的首领较可能保留同伴组织并取得牛录职位，以及海西战败人口经历大规模迁徙、较少获准自成牛录，参见 Elliott, *The Manchu Way*, pp. 60—61。材料支持进入路径影响组织自主和信任位置，不能推出适用于每名来投者或海西个体的绝对规则。

三、关于乌拉战役后来归败兵悉还妻子仆从编户万家、其余俘获分给众军，见《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康熙本）》卷四癸丑年正月条（据维基文库公开转录定位，纸本页码待核）。官修数字、分类和动机仍需交叉，不得把“来归”直接证明为充分自由选择；该条可以确认同一战败人口存在不同处置路径。

四、关于李永芳投降（四月甲辰）后于大军还都时获授总兵官、妻以阿巴泰之女，以及抚顺千户降民保全夫妇父子兄弟、给以田庐牛马衣粮器皿并依明制设官统辖（四月乙卯），见《清太祖高皇帝实录

（康熙本）》卷五天命三年四月有关条目（据维基文库公开转录定位，纸本页码待核）。材料支持旧能力、家庭和形式在新统辖下被保存，不能证明所有降民自愿、长期待遇一致或取得同等政治自主。

五、关于渥集部四路招抚、迁家口与雅揽路击取俘获，见《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康熙本）》卷三庚戌年冬十一月条；扎库塔城攻杀、俘获与环近各路招抚见同书卷三辛亥年冬十二月条；乌拉战败人口分配与编户见同书卷四癸丑年正月条（均据维基文库公开转录定位，纸本页码待核）。官修叙述可支持强制与多路径并存，不能提供所有被俘者的后续位置，也不能证明被俘即被有效重用。

六、Elliott, *The Manchu Way*, pp. 76—77，讨论第一次汉军试验及 1625 年前后的解散。该反例说明编组、能力与忠诚不会自动一致，不能据此否认后来的重新组织，也不能将失败归为汉人或任何民族的天生属性。

七、Elliott, *The Manchu Way*, pp. 77—80。1631 年前后的六营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已等同固山—八旗形态，独立汉军八旗形成于更晚阶段。制度名称必须分期使用，不得以后期形态倒推早期。

八、关于 1631 年前后汉军重组、部分此前降为奴者恢复独立户、新降者获奖及汉人铸炮与火器能力的重要性，参见 Elliott, *The Manchu Way*, pp. 77—78。材料支持能力识别、身份再调整、组织重建和技术调用，不能给出所有人员确切路径，也不能推出全部汉人待遇改善。

九、关于萨尔浒战后姜弘立投降为后金提供开启与朝鲜官方沟通的机会，以及随后 1619 年 5 月努尔哈赤派一名被俘军官向朝鲜递送国书与七大恨，参见 Yuanchong Wang, *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 Manchu-Korean Relations, 1616–1911*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8), Chapter 1, "The Jurchen Uprising in Manchuria" 及 "Chosŏn’s Role in the Jurchen-Ming War"（所据为重排电子文本，原版页码待核）。该材料只能支持投降与被俘人员可能被保存并用于开启沟通或传递文书，不能单独建立其完整职位、资源和长期忠诚链。

十、关于虎尔哈部长纳喀答率百户来归后分别聚立愿留与愿归者，以及为首八人各赐男妇、马牛、衣物并田庐器用诸物，见《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康熙本）》卷五天命三年冬十月条（据维基文库公开转录定位，纸本页码待核）。官修引语与“愿”具有程式化风险；原文详列首领所获，不能据此推知全员同额获赐，亦不能量化真实自愿度。材料可以说明强权环境中的去留分组、资源和新政治功能发生连接。

十一、关于旗内等级受到族属、出生、职业、法律身份和纳入方式影响，以及满洲、蒙古、汉军位置并不相同，参见 Elliott, *The Manchu Way*, pp. 78—80。部分等级材料涉及后续时期，不能无说明倒推努尔哈赤早期；它可以否定“编入即同等”，不能替代逐期制度史。

十二、“先来后到转化为政治信用”“技术能力打开位置而不取消等级”“资源忠诚是持续绑定”，是依据归附分流、首领组织保留、汉军失败与重建、技术调用、资源安置和旗内等级建立的政治—组织理论判断。现有来源能够支持关键节点，不能提供覆盖所有成员的完整位置档案。事实缺口限制数字、个体心理和普遍比例。

十三、满洲 / 满清是后金政治核心、旗制层级和差异赋位形成的历史主体；满洲历史主体对政治核心、层级与差异赋位方向的作用，通过战争、组织、进入次序、资源、主人关系和技术调用等历史环节实现，不等于基因决定、民族成员人人同位或满洲人天生善于统治。汉军与其他异质人口可以发挥关键作用，仍不自动取得同等最高政治权重。

十四、满清共产主义是不可拆分对象。汉军、归附、技术能力、先来后到和资源忠诚，不是一个独立完成的古代“满清模式”。共产主义现代组织技术以后会复刻、扩大、制度化并优化这些捕获与赋位能力，同时被满清式政治生存逻辑重新塑形。这些围绕人口、技术与赋位形成的关系，同入关后对整具旧国家躯体的调用存在对象范围与层次区别，历史机构与现代机构之间也不能作一一对应。

第六章　入关不是过关：旧国家躯体的捕获

后金政治核心在此前发展出的组织能力，已经超出单纯的人口编组。它能够把不同来源的人保留下来，将他们携带的军事、行政、技术和沟通能力接入新的主人关系，再按照进入次序、政治信用、专业能力和资源位置重新安排。汉军曾经历的失败与重组、对归附者的分流处置，以及对旧官属的有限留用，都说明捕获—重新赋位并不以彻底清零为前提。

一个已经能够保存并重新安排不同来源人口的政治核心，也可能把同样的动作施加到这些人携带的知识、职位、关系、文书、技术和制度能力上。关口因此不再只有地理通过的含义。入关不是一支军队通过山海关，更不是一个外来集团进入关内以后在空白地带从零创造国家；它首先是一个在旧国家之外形成的较小政治—军事核心，进入远大于自身的定居国家，夺取这个国家的最高政治权重，然后选择性保存、裁撤、捕获和重新赋位旧国家已经存在的身体。

国家身体不是抽象疆域。城市与街区、人口与家庭、官员与胥吏、赋税与账册、衙门与文书、漕运与驿传、军队与工场、地方知识与社会关系，都属于它；使这些部分持续协同的行政习惯和组织能力也在其中。满清并没有重新发明所有这些能力。它是在征服中取得了决定这些能力去留和服务方向的权力，才得以建立统治。此前接受重新赋位的主要是人及其携带的能力，入关以后，对象扩大为官署、账册、职位、城市、税制、军工和地方行政网络。人口编组扩展为国家能力编组，主人关系进一步成为国家资源和命令方向的重新安排。

一、入关不是从零建国

1644 年清军进入北京，面对的是已经运行多时的都城和国家机关。故明官员出迎，清军进入宫城、控制城防^{[1]}，随后发布对内阁、六部、都察院等衙门的处理命令。事情不止于更换皇帝：新的政治核心先控制城防和宫城，

继而处置官署、人员、税粮与城市空间。军事占领和行政接管从一开始就是同一过程的两个面向。但这并不证明全国范围的控制已经同时完成。

北京并非空城，关内也不是等待新国家填入的空白地带。城中已有分化的官署、人员和文书，税粮、漕运和驿传把都城同地方相连；能够继续处理政务的专业群体尚在，持续抵抗和逃亡的社会力量也在其中。清军夺取了已有国家身体的关键节点，并立即开始决定哪些部分继续运转、哪些部分必须改造、哪些部分要被排除，新的最高权重由此在北京建立。

关口之内，州县官、卫所官、胥吏、税册、地亩和地方关系已经构成一套实际运转的网络。中央命令必须借助这些人员和记录送到乡里，再把粮银和信息送回中央。若把旧人员与旧文书同时清除，新核心便会失去识别土地、人口、仓储和交通的能力；它可能摧毁旧秩序，却无法立即得到一个可供自己支配的国家。较小政治核心不可能只凭自身原有人口和组织能力，在关内从零创造出所有城市、官僚、税源、交通和地方社会。征服本身并不等于掌握管理庞大定居国家所需的全部知识。军队能够夺取城池，战斗队列却不能独自完成每一块土地的丈量、每一笔税粮的核算、每一条漕运的调度和每一份地方文书的解释。

入关不是满清带着一套已经完成的国家进入关内，也不是明朝国家自然换牌。较小核心带入自己的政治—军事核心和最高权重，关内则提供已经存在的国家身体，两者结合之后，新的国家形态才获得现实运转能力。但旧国家身体不是一个可以原封不动搬到新主人名下的整体。其中有可以迅速调用的机关、必须重建的财政、需要严密监督的军事力量，也有被新权重直接取消的旧身份。国家接管必须将旧身体拆开、辨认、分层，再接入新的命令链。

拆开以后，各部分国家能力显出不同的政治价值和风险。官署名称可能没有军事危险，却能提供文书和日常行政；旧军队可能熟悉地形，却保留原有将领和旧部关系；税册有助于征收，也记录着原有的地方特权和利益分配；城市能提供仓储、道路和市场，同时聚集着抵抗者、逃亡者及旧政权的关系网络。新核心不能只问旧事物是否保留，而必须逐项判断：哪部分能力值得保存，哪部分关系必须切断，哪部分外壳需要改名，哪部分资源必须转向新的政治节点。

捕获国家能力，必须辨认能力赖以存在的具体载体。文书能力存在于官员、书吏和档册之中，财政能力存在于地亩登记、会计录和征收关系之中，交通能力存在于卫所、漕运、驿传和造船事务之中，地方知识则掌握在熟悉水利、田土、赋役和人情网络的人手中。这些能力不是可以脱离人员和制度关系独立搬运的物品；把它们写成孤立物品，会误解国家接管的实际难度。清初接管所保存的，是若干可以被新核心重新组织的能力节点，而不是一份静止的制度清单。旧官员可能继续办事，旧册籍可能继续提供税基，旧卫所职掌可能继续维持漕运和造船，旧城市街区和房地也可能继续承载人口与行政。每个节点都要经过新的任命、筛选、迁徙、编制和资源分配；旧能力只有进入新主人关系，才能继续作为国家能力运转。

二、旧官可以留下，旧主人不能留下

国家接管由此呈现出一种不同于普通行政继承的选择性。清廷面对的并非一个无差别的“明朝制度”，而是一组可以拆分的人员、职能和关系。旧官可以因文书、核税等能力留用。顺治初年对北京故明官署的处理直接体现了这种要求：诏令要求在京内阁、六部、都察院等官员以原官与满官一体办事；故明内外官民中符合条件者照旧录用，避乱回籍者仍以原官录用，对投诚者则附加薙发、衣冠和服制条件^{[2]}。这些命令不能直接证明所有旧官实际留下，更不能证明留任者保留了原有的政治地位，但它们表明新核心没有将旧官署和旧专业人员整体清除，而是放入有条件的筛选和重新赋位之中。

清廷并未把全部旧机构看作同等有用。南京改省之后，原有部院大部被裁撤，仅保留户、兵、工等部分功能；北京差派满汉侍郎驻江南，故明郎中、主事则被安排承担督粮、屯田、水利和驿传等事务^{[3]}。保存和裁撤在这里同时发生。旧中央机构并未整体延续，粮储、军事、工程、交通等可用职掌被拆出，接入清廷新的省级和中央命令链。新核心追求的是功能在新权重之下可控，而不是制度外观的完整一致。

在具体人员的处理上，钱谦益、王铎等故明官员进入内翰林三院，旧有的文书、经典和礼制能力随之转入清廷的机要组织^{[6]}。新朝需要这些能力，但这不代表明朝礼部或翰林院仍拥有独立政治方向。投诚官分隶八旗、编为牛录。与此同时，清廷明确排斥一部分旧身份：未经新朝录用的前代乡官、监生，其名色被革除，与民一体当差^{[7]}。新核心并不把旧身份本身视作必须保留的资产，它只保存能够转化为新秩序能力的部分，其余旧特权则予以取消。选择性保存和身份清除构成同一套接管动作。

原先由明廷授予的职务，如今必须由清廷确认或撤销，任命来源已经改变。旧官可能与满官并置一体办事，也可能被编入新设机构、旗制或省级命令链，组织位置不复原样；新旧机构可以同时存在，但仍要追问谁处理机要、谁向皇权奏报、谁掌握任命、谁掌握监督。机构并置不等于权重平等。^{[11]}

投诚者须薙发、改换衣冠并服从新国法；旧身份已经不能完整覆盖新的政治要求。一个旧官员可以保留专业能力，却必须用新的外观、名义和服从关系进入新秩序。这里的身份改造不是装饰，而是把旧人员从旧主人关系中切断，并使其能够被新中心识别为可用对象。税粮、文书、军需和行政信息最终向新的中心汇集，资源方向也已改变。

旧官留下，不代表旧主人留下。衙门仍可叫六部，官员还在处理钱粮，卫所事务仍涉及漕运造船，县令也仍要接收册籍；人还在，职位还在，容易让人误以为旧国家只是换了一个皇帝。然而人员连续、职能连续与政治主体连续并不是同一件事；职位连续只是外壳的一部分，政治主体连续必须另行证明。

旧官的专业性被保存，主权性却已被撤除；职位的外壳可以延续，职位的最终担保者已经更换。所谓“照旧”，必须放回谁任命、谁考核、谁惩罚、谁供给、谁决定升降的关系中理解。

行政调用不能被理解为单纯借用。清廷必须让旧官员、书吏和地方人员继续工作，却同时让他们接受新的考核、报告和处罚。调用越成功，旧能力越不像独立的旧国家遗产，越成为新核心已经占有的国家器官。

江南的督粮、屯田、水利和驿传事务，不可能只凭来自关外的政治核心完成。清廷需要熟悉地方地貌、税粮、河道和道路的人，旧官员和地方专业人员因而可以进入新行政链。专业经验具有不可替代性，但这不等于地方社会保留了自主权。熟悉河道的官员可能继续主持水利，熟悉驿传的人也可能继续维持交通。他们的任用、供给、考核和撤换都来自新中心。旧知识进入新链条后，不再只服务地方熟人和旧衙门，转而服务清廷对粮银、兵役、交通和秩序的重新安排。地方知识留在地方，最高权重不留在地方；地方越能继续运转，越说明新核心已将地方能力接入自己的资源与惩罚系统。

三、账册、税粮与地方的可见性

国家躯体并不静止在地图上。它每天要收粮、运粮、修堤、造船，要传递公文、登记土地、处理诉讼、征发劳役，还要在战争中供应军队。新核心即使占领了中央宫城，如果接不上这些日常链条，所拥有的也只是一个短暂的胜利节点。因此，必须将旧国家的可见记录转成新政权的可征资源。

财政层面的捕获最清晰地展现了这一过程。顺治初年，清廷下令地亩钱粮照前朝会计录原额按亩征解，并宣布蠲免辽饷、新饷、练饷等晚明加派；随后展开的核查任务，既涉及在京各衙门收支，也包括直省钱粮、田土和实征额，并要求编定赋役全书；在浙闽地区，税则选择万历旧例，停止天启、崇祯时期的部分加派^{[4]}。这些记录属于政策规定和任务部署，证明新政治核心取得了规定财政记录、税则和征解方向的权力，开始调用前朝会计录、税基和征收路径。至于各地是否完成核查、编书与实征，以及资源实际接入战争与国计的程度，仍须分别寻求具体证据。

沿用财政记录，并不等于承认明朝财政仍拥有自主权。会计录可以留下，但决定征收数额、征收对象以及使用去向的主体已经改变。赋役全书的编定与核查任务来自新朝的授权，税则旧例的效力同样出自新政权的命令。保存账册不等于保存旧主人的资源处分权，沿用税制不等于旧国家继续掌握财政方向。

财政调用还会改变国家对地方的可见方式。旧账册把地亩、人口和应征额变成可以向上汇报、向下征收的对象，新的核查则把地方差异重新纳入清廷判断。账册不是中性的记忆。它决定什么能被登记、征取和追责。控制账册、核查和征解，就能把地方社会从原有关系中抽出，重新接到中央的军需和行政目标。即使某些税额暂时沿用旧例，资源也不再向原来的皇权、官署和地方中介流动。

四、军事力量的保存、裁撤与重新编组

军事能力的处理，最能看出国家捕获不是整体继承。面对庞大的定居国家，新核心既不能放弃一切旧军队，也不能允许旧军队原样延续。旧军官可能有用，炮兵、工场人员以及卫所兵丁也可能有用；但他们原有的指挥网络可能构成危险，原来的忠诚对象也可能构成危险。

清初材料记载，投降的公侯伯、总兵、副将、参游等三百七十四员被拨入八旗；投诚官则分隶八旗并编为牛录^{[12]}。这两个动作将旧军事人员的指挥经验接入八旗组织内部，却没有让降官继续作为明朝军队体系的代表存在。旧军事能力被吸纳，原有的军事主权被拆除；降官获得了新的位置，也被置于新的主人—组织链中。这一数字和安排记录了清初吸收降官的边界，不能被任意夸大为全部旧军队的整体继承。

卫所官员和兵丁的处理则更进一步体现了功能与身份的分离。归顺的京卫、外卫所官员可以照旧供职，部分兵丁则留遣分流；清廷明确命令卫军改为屯丁，而卫所名下的钱粮、漕运和造船等职掌被要求继续维持^{[5]}^{[13]}。一个熟悉运河、船务和粮储的人，可能因其专业能力被保留，但他是否仍属于原来的军事体系，能否自行调动资源、向谁报告以及由谁撤换，都要由新的命令链决定。军事人口可以被重新定为屯丁，职能可以继续运转，组织边界却被撤回。清廷保存的是运输、粮储和地方军事行政等可用功能，而非明代卫所作为独立权力体系的完整存在。

专业火器能力的承接提供了另一条观察线索。1631 年以后后金重组专业汉军炮兵，降将部队和炮厂成为军事组织的一部分；1642 年锦州炮厂以及入关后北京炮厂的管理，显示技术人员、生产机构和新命令链之间存在连续的组织问题^{[14]}。这能支持一个较窄的判断：专业军事能力需要人员、工场、原料、协作和命令接口，政治核心因而会选择性保留并重新安置这些对象；但它不能被扩张为所有旧军队都被平稳继承，也不能证明每一位旧军官都拥有连续的入关履历。

军事重编还包括裁撤。早期汉军试验曾因组织和资源条件不稳定而解散，后来又在不同身份、奖赏和技术需要下重新组织。这个反例说明，捕获不是一次性成功的收编。核心可以集合人口，也可以拆散组织；可以恢复某种能力，也可以撤回原有军事身份。保存能力不等于保存原组织，编入新军不等于获得平等政治位置。

五、城市空间怎样改变主人

对具体能力和关系的估价，会随着战争阶段和地区而改变。北京首先要求迅速接管宫城、城防和中央官署；江南面对的是部院裁撤、地方行政重组和持续抵抗，杭州、西安的驻防安排又有各自的空间和资源条件。北京后来实行的兵民分城，直接显出这种权力怎样改变城市空间。清廷继续使用北京这座

旧都城，却将兵民分置，并以免租赋补偿部分迁徙。城市没有消失，城内空间却被改变，城市空间权重重新分配给新的军政核心。^{[9]} 保存街区不等于保存居民对街区的原有处分权；保留都城，也不等于旧宫廷仍拥有最高政治位置。

接管会改变普通人的生活位置。清廷为驻防配置住房、土地、银米和供给，某些地方通过补偿或减免处理已经改变的民户财产关系；但近京拨地同时改变民户的庐舍田园，造成迁徙流离。若只叙述驻防取得住房、土地、银米和供给，而不呈现迁徙、庐舍田园改变与民户流离，捕获就会被叙述为纯粹的行政安排；反过来，若只叙述迁徙与社会代价，而不说明驻防取得住房、土地、银米和供给，旧国家身体怎样被新核心实际调用便无从解释。

北京、江宁、杭州、西安的驻防建立、营墙、家口配置和土地资源分配，有着不同的时间和形态。杭州部分旗人住在墙外，因而驻防不能自动等同于完全封闭的城中隔离空间；西安的军事和空间证据较强，日常行政权限却不能仅由驻防存在直接推出。^{[10]} 不能把某一城市的命令、某一类官员的任用或某一阶段的政策，扩张成整个关内所有地区的统一剧本。国家躯体捕获把握的是结构方向，而不是把每一个局部事实都写成同一种结果；结构方向与各地的具体差异并存，具体外壳必须按地区、时段和功能逐项核对。

驻防是军事能力进入国家身体后的空间形式。入关后，关键城市逐步形成驻防和空间固定化安排，承担军事控制、区域支援和高权重节点功能。^{[15]} 驻防把政治核心的军事权重嵌入旧国家的城市与地方社会；国家身体被调用后，新核心没有把军事力量完全撤回关外，而是将它安置在关键城市和交通节点，使旧国家的空间成为新政治核心的支撑面。但驻防不能被写成所有城市、所有时期都相同的封闭制度，也不能单独证明清廷已经完成全国控制。北京被占领不等于全国抵抗立即终止，战略驻防也不能独自维持长期统治。^{[16]}

六、保存并不取消暴力

接管旧国家身体同时伴随摧毁。把选择性保存从暴力中抽离，得到的只能是虚假的温和接管叙事。清军并非先取得旧官和地方社会的自愿合作再平稳接过国家，征服过程包含威慑、惩罚、屠杀、迁徙、强制降附、身份重划和财产转移。新核心之所以能够选择哪些对象留下，是因为它已经通过军事力量和惩罚能力规定了对象的选择条件。江南接管伴随抵抗与镇压，南京原有部院大部裁撤而只留下被重新安排的部分职掌，体现的是选择性接管；两者并存说明保存与暴力并不互相排斥：新核心正因为需要国家身体，才一面摧毁阻碍控制的部分，一面保留仍能继续服务的部分。

留任不是温和协商的结果。归服和抗拒的双重政策说明，保存与强制从未分开。官方材料记载归服者可被录用，抗拒者则面临重典、妻子为奴等威慑；地方官员和民户是在战争、迁徙和强制服从的条件

下进入新秩序的。^{[8]}《嘉定屠城纪略》所保存的地方叙述也把新县令、册籍接收、降附和暴力放在同一接管过程之中。^{[17]} 这些材料不允许把地方官员的任用写成普遍自愿，也不允许把少数旧官留任扩张为整个地方社会和平归顺。某些人因专业能力和政治服从获得位置，另一些人则因抵抗、身份或无法被新核心信任而遭到排除。保存发生在暴力已经规定选择范围之后。

江宁驻防面对城内外反抗并进行捕斩和击退，说明驻防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行政背景，而是持续面对敌意和不服从的政治—军事节点。拨地和驻防资源又使民户承受迁徙和财产改变。新核心必须不断在保护旗人节点、供应军队、惩罚抵抗和维持地方生产之间重新分配资源。国家身体越大，接管越不可能只靠一纸诏令完成。

暴力还会造成国家能力的损耗。战争摧毁人口、城市、粮储和地方关系，迁徙会中断原有生产和行政网络，反抗会迫使新核心投入更多驻防和军费。因此，保存不是征服的反面，而是征服者在破坏与使用之间作出的政治选择。新核心保留某些对象，不是因为它承认对象拥有不可侵犯的自主权，而是因为这些对象仍然能在新的权重结构中产生资源和控制效果。

七、国家身体的重新接线不是一次完成

把入关理解为对旧国家的捕获，不能把夺取最高权重与全部接管完成混为一谈。清军进入北京、接管宫城和城防，能够迅速建立中央节点；要让这个节点成为覆盖地方的国家机器，官署、税粮、漕运、卫所、地方官和城市资源还须接入新的命令链。战争留下的断裂、逃亡、抵抗、官员缺位和财政困难，使这些接线不可能在同一时点、以同一方式完成。

因此，政策命令和实际落实必须分开。诏令可以要求旧官照旧录用，可以规定税粮按旧额征解，可以要求卫所事务照旧，可以安排降官拨旗；但命令是否到达地方、人员是否实际到任、账册是否核清、粮运是否恢复、驻防是否得到土地和供给，都需要分别证明。这个区分限制的是完成时点、地区范围和执行程度，不改变入关已经构成国家躯体捕获的判断。

接管的持续性也解释了为什么保存、裁撤和再编组会在不同阶段反复发生。一个旧衙门可以先因粮饷和行政需要被保留，随后又在省级机构和驻省官员能够接替时裁去部分职掌；一个旧军官可以先被招降，继而拨入八旗；一批卫军可以留用，随后改为屯丁；一座城市可以先被占领，再通过分城、拨地、筑墙和驻防安排固定新的军政节点。国家身体不是被一次性搬运，而是在新核心掌握最高权重后持续切割、接线和重新赋位。

国家身体能够继续提供税粮和行政，不等于各地已经接受新主人；驻防压制一次反抗，也不等于地方永久安定。清初抵抗没有因为北京中央节点易手而立即终止，命令与地方落实之间也存在时间差。^{[16]} 新核心必须继续执行任免、供给、监督和惩罚，才能把已经夺取的最高权重变成稳定的国家运行。

八、占有处分权：谁控制身体，谁就是新的政治主人

判断入关是否改变国家主体，不能只看旧机构是否继续存在，也不能只看新朝是否建立了自己的宫廷，而必须看谁控制国家身体的关键开关，谁拥有决定旧部件去留、位置和服务方向的处分权。

最高权重由具体处分权显出。它包括任免官员、决定一个部门留下还是裁撤，也包括把税粮改作军饷，把城市划分为兵城和民城。给旗人拨地并改变民户的庐舍田园，把降官拨入八旗、把投诚官编入牛录，以及以惩罚、迁徙和身份革除迫使对象服从，也都属于这种权力。谁能作出这些处置？这些具体处分权比机构名称更能说明谁是政治主体。

处分权比文化名称和制度形式更深。一个衙门即使继续使用原来的名称，只要清廷能够决定它的长官、职掌、奏报和裁撤，它就不再是明朝政治主体的独立器官。一名官员即使继续使用旧有行政知识，只要他的任命、供给、考核和惩罚来自清廷，他就已经进入新的主人关系。一份税册即使沿用旧数字，只要征收方向和最终用途由新中心规定，它就已经服务于新的最高权重。

这些开关集中到新的政治核心以后，清廷可以命令保留、任用或重组旧官员、旧官署及其财政、漕运、造船、水利等职掌，使部分旧功能成为可被继续调用的国家能力。现有材料能够证明的是这些命令、任命和职掌安排，但不能直接由它们一并确认所有人员实际到任、持续运转与具体效果。凡实际发生的调用，都进入新的任命、供给、考核和处分关系。制度外壳连续不等于政治主体连续，人员连续不等于主人关系连续，功能连续不等于处分权连续。

国家躯体被捕获，不等于旧国家的一切部件都被消灭，也不等于旧国家仍然自主延续。若认为旧国家的一切部件都被消灭，就看不见清廷对旧官、税册、城市和行政技术的调用；若认为旧国家仍然自主延续，就看不见任免、裁撤、薙发、分城、拨地、编旗和惩罚造成的最高权重转移。实际发生的是：旧国家的部件被拆开，有的留下，有的清除，有的改造，有的编入新组织，有的被安置到新政治核心的军事、财政和行政节点上。身体部分延续，主人关系和服务方向已经改变。

较小政治核心由此控制较大国家躯体。它不需要让所有人口都变成核心成员，也不需要亲自掌握每一项专业知识。满清共产主义并不以消灭异质人口、抹去其全部旧身份或把所有人改造成同质成员为前提，也不以彻底推倒旧国家再从零重建为前提。汉人仍然可以是汉人，原有语言、家庭、职业、知识和技术可以部分保留；改变的是覆盖在这些旧身份之上的政治身份、组织位置、主人关系和服务方向。新核心辨认可用对象，保存其部分身份、知识和功能，再把这些对象固定到自己的最高权重之下。

这就是“捕获—重新赋位”从人口层级上升到国家结构层级的时刻。此前，后金把个人和群体编入新的组织；现在，它把由人组成的官署、财政、军事、城市和地方网络接入新的政治核心。捕获对象从人口和群体扩展为国家能力，重新赋位从身份变化扩展为国家身体的服务方向变化。保存越有选择，重新赋位越深入，国家接管就越不依赖外壳改名，而越依赖处分权的集中。

入关不是过关，而是国家结构层级的捕获：小政治核心夺取最高权重，选择性保存、裁撤、改造和调用旧国家躯体。

九、从国家躯体到政治钉子

国家躯体能够继续运转，并不代表小核心已经完成长期统治。接管只是把庞大身体纳入新的最高权重，仍然留下更困难的问题：如何在广阔城市和地方社会中维持忠诚，如何让驻防、官署、财政和人口彼此连接，如何在军事控制距离之外持续识别抵抗与服从，如何让少数核心力量不被更大主体社会重新吞没。它必须把自己的高权重力量嵌入主体社会，使国家接管从一次性的军事胜利变成可以日常维持的结构。

入关后的驻防、营墙、住地、土地、银米和家口配置，已经显示出一个方向：政治核心必须把自己的高权重力量安置进旧国家身体的关键节点。它不能只在宫城发令，还要在城市、交通、行政和军事空间中留下能够持续运转的组织钉子。钉子越深入主体社会，越能把旧国家的资源、人口和信息接回新的中心；也越需要面对财政负担、空间冲突和持续抵抗。

满城问题由此出现。满城不是普通居住区，也不是单纯的民族隔离空间。少数掌握最高政治权重的力量，作为政治钉子嵌入一个远大于自身的主体社会，通过驻守、组织联系、空间区分、资源供给和命令链，把国家躯体的持续运转接到自己的核心位置上。

第六章　入关不是过关：旧国家躯体的捕获注释

[1]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五，顺治元年五月己丑条（所据为维基文库公开转录文本，稳定链接：https://zh.wikisource.org/w/index.php?oldid=5105377；各卷纸本异文未全核，下同）。支持 1644 年清军进入燕京、故明文武官员出迎、多尔衮入武英殿及命将士控制城防；不能用“秋毫无犯”等官方自述证明实际无损，也不证明全国控制已经完成。

返回正文

[2]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五，顺治元年五月庚寅条、癸巳条，同卷稳定链接见注[1]。五月庚寅条宣布故明官民照旧录用、避乱回籍者以原官录用，并初令投诚者薙发改冠服；五月癸巳条命在京内阁、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官员以原官同满官一体办事；五月辛亥条则另令“照旧束发，悉从其便”。上述命令体现出初期具体政策与分期，不能由此推出所有旧官均实际留任或保留了原有政治地位。

返回正文

[3]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二十四，顺治三年二月甲申条，稳定链接：https://zh.wikisource.org/w/index.php?oldid=5107167。条文依据江南改京为省的议案，裁撤南京部院大部，保留户、兵、工部分职掌并差侍郎驻江南，同日随后任命故明郎中、主事承担督粮、屯田水利、驿传等事务；人员职能的续用不证明南京旧制度整体保存。

返回正文

[4]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九顺治元年十月甲子条，稳定链接：https://zh.wikisource.org/w/index.php?oldid=5105726；卷二十五顺治三年四月壬寅条，稳定链接：https://zh.wikisource.org/w/index.php?oldid=5107258；卷二十九顺治四年二月癸未条，稳定链接：https://zh.wikisource.org/w/index.php?oldid=5107590。支持按前朝《会计录》原额征解、蠲免晚明加派、核查钱粮田土并编定《赋役全书》、浙东八府及福建税则选择万历旧例等政策和任务；浙东八府不能推及全省同步，也不单独证明各地执行一致或实征效果相同。

返回正文

[5]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二十七，顺治三年十月乙未条，稳定链接：https://zh.wikisource.org/w/index.php?oldid=5107427。支持卫军改屯丁以及卫所钱粮、漕运、造船事务要求“照旧”；不能由命令直接推出所有地区的实际落实和长期效果。

返回正文

[6]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二十三顺治三年正月乙亥条，稳定链接：https://zh.wikisource.org/w/index.php?oldid=5107078；卷二十一顺治二年十一月癸亥条，稳定链接：https://zh.wikisource.org/w/index.php?oldid=5106845；卷二十五顺治三年四月丙子条，稳定链接：https://zh.wikisource.org/w/index.php?oldid=5107258。支持钱谦益、王铎等任职内翰林三院、降官拨入八旗和投诚官编牛录；不能由个案推出所有旧官均被任用，也不能为三百七十四名降官建立完整个人履历。

返回正文

[7]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二十五，顺治三年四月壬寅条，稳定链接见注[4]卷二十五。支持未经新朝录用的前代乡官、监生名色被革除并与民一体当差；不能推出全国各地执行范围完全一致。

返回正文

[8]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二十一，顺治二年十一月戊辰条，稳定链接见注[6]卷二十一；朱子素《嘉定屠城纪略》（依据六月十四日上册籍、二十四日新县令至，及闰六月抵抗、七月初四城破至后续杀掠之实际段落）。顺治二年十一月戊辰条是清廷招抚四川的诏谕，归服录用与抗拒重惩并列，其对象不能直接外推为全国各地同时普遍执行；《嘉定屠城纪略》支持地方接管中的县令、册籍、降附、抵抗和暴力并行，不采用未经版本交叉校勘的精确伤亡数字。

返回正文

[9]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九顺治元年十月甲子条，稳定链接见注[4]卷九；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chap. 2, pp. 100—101。卷九已记顺治元年东中西三城官民迁徙及南北分

居免赋，Elliott 则论及 1648 年 10 月清廷发布的后续分隔命令；材料支持北京兵民空间分割及其与驻防城市居住安排的关系，但不能据此推出北京城内所有事务均由驻防拥有最高权重。

返回正文

[10]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chap. 2, pp. 105—111, 121, 126—127（含 p. 109 图 7 注、p. 121 正文及表 2.3 等）：支持江宁驻防与杭州建置，西安、江宁、杭州空间形态，杭州旗人自初期即有居于墙外之反例，以及西安与南京土地配置、杭州银米供给与筑墙时序。材料支持四城分期和“驻防不自动等于完全封闭空间”的边界；不支持四城日常全部民政权限。

返回正文

[11]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五顺治元年五月癸巳条（稳定链接见注[1]）与卷二十三顺治三年正月乙亥条（稳定链接见注[6]卷二十三）。前者支持旧官以原官同满官办事，后者支持钱谦益、王铎等进入内翰林三院；两条共同支持旧人员和旧事务被接入清廷组织，不支持把机构并置写成权重平等。

返回正文

[12]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二十一顺治二年十一月癸亥条、卷二十五顺治三年四月丙子条，定位与链接见注[6]。支持降官拨入八旗、投诚官编牛录；三百七十四的数字和后续服务只能按实录记载边界使用，不能扩张为全部降军整体继承。

返回正文

[13]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九顺治元年十月甲子条（稳定链接见注[4]卷九）、卷二十七顺治三年十月乙未条（稳定链接见注[5]卷二十七）。支持归顺卫所官员照旧供职的政策、卫军改屯丁及漕运造船职掌的继续安排；不能写成所有卫所官兵均留任或明代卫所完整延续。

返回正文

[14] Nicola Di Cosmo, “Did Guns Matter? Firearms and the Qing Formation,” in Lynn A. Struve, ed., *The Qing Formation in World-Historical Tim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chap. 3, pp. 121—166，正文所据见该文 pp. 146—151。相关页支持 1631 年后重炮生产和专业汉军炮兵、降将保留部队、1642 年锦州炮厂及顺治初北京炮厂由兵部、工部、造办处共同管理。材料不支持单一人物完整跨关履历，也不支持把军事技术链写成清初国家接管的唯一原因。

返回正文

[15]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chap. 2, pp. 94, 105—111, 126—127。支持西安、南京、杭州等驻防及其军事堡垒、行政中心、居住空间和区域控制功能，以及驻防土地、银米和空间固

定化。材料支持重要城市驻防及资源配置的阶段链；四城逐项权限、财政和人口连续表未闭合，故不能把驻防写成所有城市同型或全部民政全权。

返回正文

[16] F. W. Williams, “The Manchu Conquest of China,” *The Journal of Race Development*, vol. 4, no. 2, October 1913, pp. 161, 166—167。支持北京占领后全国抵抗仍长期持续，以及永久驻防存在但不能单独维持统治。该文只作时间范围和驻防效能的交叉、反例；其早期史学与种族化语言不作为理论依据。

返回正文

[17]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二十四顺治三年二月辛巳条（奏报当年正月十二日捕斩与十八日击退，稳定链接见注[3]卷二十四）、卷二十五顺治三年三月乙卯条（稳定链接见注[4]卷二十五）；朱子素《嘉定屠城纪略》，定位见注[8]。材料支持抵抗、镇压、迁徙、册籍接管和暴力并存；不采用未经版本交叉的精确伤亡数字。

返回正文

[18] “国家躯体”“捕获—重新赋位”“最高权重”“处分权”“政治钉子”等术语属于理论命名，不是历史人物逐字使用的自觉理论。具体历史材料只支持相应事件、政策、任命、机构调用、裁撤、军事重编和空间配置；理论命名用于把这些分层事实连接为国家结构论证，并不等同于清初统治者的心理陈述。

第七章　满城：高权重政治节点怎样嵌入主体社会

一、政治钉子

较小政治核心已经对旧国家实施了“捕获—重新赋位”，将旧国家的官署、财政、军事、城市、人员和专业能力拆开，选择性保存、裁撤、调用并重新赋位。旧国家的身体能够继续运转，决定其服务方向的主人关系却已改变，原主体不再能决定国家的运行方向与服务对象。

支撑这具躯体日常运转的各项职业与专业能力，主要来自主体社会：地方官熟悉地方，胥吏掌握册籍，商人和农民维持生产，工匠、船户和运输人员保障国家的日常运行。新核心需要这些能力，却不可能把所有这些人变成政治核心的原始成员。主体社会必须继续存在，否则国家身体就会失去不可或缺的人口、知识、生产与财政；但这同时也意味着主体社会保留了自己的亲属网络、地方关系、生活习惯、记忆和利益。

然而，夺取中央并不等于完成统治。新政权可以任命地方官员、征收税粮，却不能仅靠一纸任命文书保证每一座城市在战争、叛乱和权力危机中仍然服从中央。一个只依赖旧国家人员转向效忠的新政权，随时可能被旧关系重新包围。因此，它必须解决三个紧迫问题：让高权重力量在征服时刻以后仍持续留驻在主体社会内部；让命令、军力、身份和资源在关键城市保持与中央的联系；并防止庞大的主体社会在日常运转中重新稀释、包围或吞没少数核心。

满城不是普通的居住区，不是单纯的民族隔离空间，也不能被压缩成一圈围墙，而是少数高权重政治力量嵌入庞大主体社会的政治钉子。这种结构体现为人口数量与政治权重的不对称：钉子不需要覆盖整块木材，也不需要成为木材本身，而是要在关键位置穿入、固定，并把更大的结构扣到一个外部施加而又已进入内部的力量上。满城的作用不在于取代整座城市的一切生活，而在于它在关键地点保留了一条不同于地方日常社会的组织链、命令链和资源链，使掌握最高权重的政治—军事核心能够依托这些高权重节点持续留在城市内部。

因此，这个高权重节点不是主体社会消失后的替代物，而是一条嵌入其中的政治网络。城市仍由庞大居民维持，地方行政仍要处理大量民政；市场、街巷、家庭和行业，也不会因为驻防出现就全部改由旗人日常管理。然而，驻防的军队、官员、家口、营地和供给共同构成了一个具有特殊政治位置的节点。在危机处置、城防控制、军令传达和中央安全等事项上，这个节点的权重高于其人口比例。满城嵌在主体社会中，既依赖这具国家身体继续运行，又在关键的开关上保护占据该身体的政治核心。它的最终组织方向，不由主体社会的普通关系决定。

二、北京与江宁的建置成型

北京展示了满城的最高形态。它的特殊性在于，既是旧国家的首都，又成为新政治核心的中心。北京驻防不是普通的边站，也不只是保护地方官署的一支军队。这里也是人口和房地资源汇集处，绝不能只用驻军数量来解释。宫城、城防、中央官署和八旗核心集中在同一空间，向全国展示最高权重，北京因而成为四城中最高等级的样本。理解这里的满城化，必须严格分开不同阶段：1644 年清军进入北京、故明官员出迎、多尔衮进入武英殿并令军队控制城防，这是夺取首都中央节点的事件；顺治元年十月已记东中西三城官民迁徙及南北分居免赋，而 1648 年前后清廷进一步发布分隔命令，则是最高权重逐步固定为城市结构的过程。进入北京不代表分城已经完成，分城也不是入城当天自然生成。^{[1]}

兵民分城把这种优先性落实到了居住空间。顺治元年十月诏令明确记载东、中、西三城官民已经迁徙，南、北二城也有房屋被分居，并以不同期限减免田地租赋。这不是人口的自然迁居，而是新中心能够决定谁留在何处、谁让出房屋、损失如何被计算的处分权。^{[2]} 城市外观保留，居民位置却为八旗核心重新安排。主体社会并未消失，仍然维持市场、行政与对首都的供给，但它被迫围绕拥有更高军事

—政治权重的核心重新排列。这标志着政治核心把自身的军政人口与城市空间锁在了一起；但首都高度叠合的条件属于特殊样本，北京的材料不能证明江宁、杭州、西安复制了同样制度。

江宁的材料最能说明满城是逐步形成的，而不是一纸命令立即完成。它本身就不是普通省城，而是故明南京所在，拥有旧中央机构、城市资源、象征地位和江南交通网络。南京部院被选择性裁撤，部分户、兵、工职掌以及督粮、水利、驿传等能力被重新调用，为驻防落位创造了新的政治空间。驻防并非在空白空间中建立，而是在旧机构、居民、交通和抵抗网络仍然存在的城市中取得优先位置。江宁的建置呈现出明确的时间差：1645 年 12 月前后出现建置命令，1646 年初已有驻防兵力参与守城行动，顺治三年二月清廷又另令调派弁兵及家口镇守江宁，1649 年前后空间布局进一步明确，围墙到 1660 年前后才完成。^{[3]} 文书命令证明决策已经下达而不仅是有政治意图，但这不能代替人员抵达、机构运转和空间筑墙各自的证据。若把它们压缩成单一的满城建立年，便会掩盖驻防落入这座复杂城市时所经历的真实组织过程。

实录记满洲、蒙古官兵驻防江宁，总督洪承畴也驻江宁；随后清廷从济南、临清、德州等处调弁兵及家口镇守，并设置提督满兵与提督汉军、汉兵的昂邦章京。^{[4]} 督抚主导的地方行政链，与驻防主导的军事链在同一省城内并置。并置不是权重平等，也不是驻防全面吞并文官系统。它清晰地说明，同一城市中同时存在地方行政与独立军事指挥，驻防的上达方向和军事—政治权重并未因为文官系统继续运行而消失。

江宁节点的政治功能在抵抗中表现得尤为清楚。驻防曾面对城内外反清力量的联络与进攻，执行了捕斩和击退。^{[5]} 在征服尚未结束、地方忠诚不确定时，它是用来守住省城、压制反抗并维持中央军事联系的实体。带家口的持久驻防、独立军事指挥、逐步固定的空间和区域军事功能，在这里共同形成了高权重节点。然而，现有材料尚不足以重建江宁驻防在财政、司法、民事和旗民交涉中的完整权限；其相对清晰的建置分期，也不能硬套至材料不足的其他城市去预设相同的形成时序。

三、空间边界的反例与动态调整

杭州则提供了最关键的反例。实录可以证明满洲、蒙古官兵驻防杭州，并在后来设置更番驻防；1645 年前后的军事占领与驻防建置，同后续的筑墙和空间固定化需要区分。欧立德（Mark C. Elliott）基于换算假设对地方材料进行估算，杭州营城约四百一十九英亩，约占城内面积百分之十三。^{[6]} 如果只看围墙和面积，杭州很容易被写成一个完全封闭、内部同质的满城模型；但同一研究指出，相当一部分旗人其实住在围墙之外。^{[7]} 这条反例直接打破了“有满城便是所有旗人都住墙内”“墙内空间等于全部驻防人口”以及“驻防必

然形成绝对封闭社区”的推论。空间条件的限制还反过来改变了资源组合。当地可供分配的土地有限，不能简单复制北京或西安的土地配置，部分供养因而通过银米等形式完成。^{[8]} 高权重节点需要资源，但土地、住房、银米与地方供给可以形成不同组合。

杭州驻防的建置发生在江南征服和反抗持续的背景中。现有材料足以确认驻防守城、参与对抗反清力量并维持高权重军事节点；至于更广泛的区域联络功能，目前尚无充分证据证明，更不能说它独自控制整个江南。围墙没有使节点脱离主体社会，住房、银米和地方供给表明，固定空间仍要从更大的城市与国家身体获得资源。杭州因此提出了更深入的观察问题：空间安排是否改变了地方对权力的估价？组织、资源与中央链条如何在其中建立联系？反例不是对政治钉子命题的削弱，而是把命题从粗糙的“隔离区”纠正为真正的嵌入结构：节点可以维持明确的身份与组织边界，却不能脱离主体社会供养。

西安的演进则揭示了建置的动态时序，它同样不能用单一年份概括。1645 年清廷命何洛会从每佐领抽调人员筹建驻防，研究推测其可能于 1645 年末抵达，最迟 1646 年初已在当地指挥守城；顺治三年二月另令调派顺德、潞安、平阳、蒲州弁兵及家口；城市东北部空间在 1645 年前后被划定，1683 年前后又有扩展。人员调动、统兵者到达、家口调派、空间划定和后期扩展属于不同阶段。^{[9]} 相比行政权，它的军事功能更容易确认：不仅地处西北方向的军事枢纽，驻防规模较大；实录又记载分别设置提督满兵和提督汉军、汉兵的昂邦章京。^{[10]} 这不是一支临时借宿的军队，而是有家口、有内部编制、承担长期防务的节点。

空间扩展说明节点也会随军事、人口和城市条件变化而调整。驻防是人员调动、住地安排、资源配置和功能稳定的连续过程，政治钉子的持久性并不意味着形态静止。若把 1683 年前后的规模倒写成 1645 年初建时的状态，就会制造一个从一开始便完整不变的虚假满城。西安军事与空间证据强，但这不足以证明驻防在日常行政中始终拥有普遍优先权。它准确显示的是：国家在西北战略方向上把一条与中央相连的高权重军事链固定到省城，文官行政系统与主体社会则在其周围继续运转。

四、空间固定与组织归属

理解这一机制，需先区分军队进入城市的不同状态。过境军队可能只是作战途经；轮换守城虽比过境稳定，却未必具备固定的家庭、空间和资源。当军队带家口迁入、设置长期指挥职位、获得住房土地或银米，并在城市中形成相对固定的营城时，这些迹象显示驻防正在转化为一个持久节点。^{[11]} 这些层次并不构成一套机械的必要充分条件，而是提供了一组观察维度：是否存在独立编制，是否与中央军事链相连，是否有固定或持续使用的空间，是否获得当地房地、土地、粮饷或银米，是否承担城防、镇压与军事

支援功能。这几项组合得越完整，政治钉子的历史形态就越清楚；但不能因为目前缺少某一项可见材料，就断言某座城市不存在高权重政治节点。

顺治初年关于顺德、济南、德州、临清、徐州、潞安、平阳、蒲州八城驻防的编制命令，已经显示驻防不是无组织的散兵。每城均明文配置协领、满洲章京、蒙古与汉军章京以及兵丁，构成区别于普通州县行政的军事编制。^{[12]} 这一编制命令确立了直接连接八旗组织的编制与指挥安排，但单凭命令本身，尚不能证明各城人员与节点在当时均已实际到位并持续运行。更不能由此断言这八城后来都形成了相同的围墙、家口结构与财政来源，或推断驻防官掌握了全部地方民政。

政治力量如果只停留在命令和身份上，仍然容易随着军队的调动而消失。空间固定化把组织权重写进了城市。兵营、住宅、营墙、城门、街区和土地，使驻防不仅在名册上存在，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占据了可见的位置。这一过程首先把军人、家口、官员和指挥位置集中在可持续使用的区域，防止同一编制与军令因分散居住而消解。谁住在哪里，谁必须迁出，谁能使用哪些房地，谁承担守门和警戒，都在城市空间中落实了人口比例与政治权重的不对称。

征服并没有随着战斗结束而退出日常生活，而是转化为门、墙、街区、住房与供给。满城既是组织容器，也是征服在城市中的持续形态。旧宫址、城内街区、房屋与土地被强制重新划定，高权重节点据此获得空间，原有居民则可能失去住所、田园或位置。补偿、免赋与拨补的存在，证明空间分配已经造成了需要处理的损失，不能使强制重排变为平等的协商。^{[13]} 主体社会继续在城内外生活，保存城市与强制改造同时发生：旧城被继续使用，城内权重却被重新书写，这种固定化绝非中性的城市规划。

然而，墙也不是唯一标准。围墙能够把空间边界物质化，使人员、住房和警戒更容易固定，但墙本身不会自动生成组织链。如果没有独立命令、资源供给和军事—政治功能，围墙仅仅是建筑；反之，在筑墙完成以前，驻防也可能已经承担了实际功能。满城的关键，不是在城市中造出了另一座城的外观，而是高权重组织在主体社会内部取得了持久位置。

真正被固定的首先是一条组织链。顺治初年驻防的协领、章京、昂邦章京以及满兵、蒙古、汉军的分层编制，说明节点内部并非一个无差别的民族群体。它保存的是可被中央识别、任命、调动和惩罚的组织位置。^{[14]}带家口迁入，使这条链具备了跨代延续和日常维持的条件。单身军队可以随战事离开，家口、住房和日常供给则把军队同地方空间长期绑定。但这种家庭化不等于节点失去了政治性质；恰恰因为家口同样需要住所、粮米和保护，驻防不再只是作战单位，而成为需要国家持续配置资源的政治人口。

这种生活上的扎根，是否会自动改变驻防的指挥归属？设想两支同样依赖本地粮食供养的队伍：一支是地方社群雇佣的乡防，另一支是外部上级派驻并听其调遣的武装；决定后者独立地位的是其人事与

指令来源，供养方并不自动等于指挥方。主体社会承担驻防的资源供给，却不能仅凭人口多数改变后者的组织归属。

在城市中，地方行政继续通过督抚、府州县运转，驻防官兵则拥有自己的八旗编制和军事上达路径。两条链在同一城市并置并发生关系，现有材料虽不足以断言它们普遍协同、普遍争夺权限或已形成一套完整的旗民交涉规则，但这仍足以否定驻防只是一批住在当地、最终由地方社会自然吸收的人。中央联系是高权重的关键，节点不只因拥有武器而不同于普通地方军队，其身份、官职和指挥方向更连接着掌握最高政治权重的核心。政治钉子正是通过这条纵向联系，在横向铺展的主体社会中保持不同权重。

五、资源供给与社会成本

高权重节点不能只靠政治身份存在。军队和家口要有住房、土地、粮米、银饷和日常物资，持续的物质供给是节点维持人员和军事能力的前提。把满城写成完全隔绝的民族飞地，会遮蔽它必须依赖主体社会这一事实。驻防的物资并不是社会自然给予的，而是来自国家躯体被捕获后的重新安排：新核心掌握了旧城市、房地、税粮与财政能力，才能通过抽取、分类与配置，用其中一部分资源优先保障新核心的驻防节点。交通、财政、仓储、城市生产和地方行政共同供给节点，驻防不是离开主体社会的孤立岛屿。空间区分与资源依赖同时存在，双方并非权重平等的两块空间，组织独立也不等于物质上的自给自足；高权重由此既是一种组织关系，也是一种资源关系。

顺治初年的材料记载，若干驻防地区的“无主房地”以及故明勋戚等土地，在重新分类后被拨给满洲兵丁。必须注意，“无主”是新政权的行政分类，不是天然无争议的事实。谁有权确认土地无主，谁能决定旧勋戚土地如何处理，这本身就是处分权的一部分。^{[15]} 更直接的材料承认，民间田地拨给满洲以后，造成了“庐舍田园顿非其故”和“迁徙流离”，政府为此规定了钱粮减免或异地拨补。^{[16]} 资源不是从空中产生的，高权重节点获得土地和住房，主体社会中的具体居民就可能失去原有位置，承担迁徙与原有生产、生活关系被打断的成本。

事后的补偿也无法抹去分配过程的强制性。假设一个自愿出让房屋的人，与一个在不可抗拒指令下被迫搬离的人，即使最终获得同等面积的拨补，其性质也有本质差异。获得物质弥补这一事实，不能作为当事人具备平等权力的证据。减免税粮说明损害被国家看见，不说明原有生活已经恢复；邻近拨补说明政府试图重新安排，不说明居民拥有拒绝迁徙的平等权力。满城的资源基础因此同时包含国家供给能力与主体社会成本。

不同城市的供给方式不必相同。西安、江宁可见土地配置的线索，杭州则因土地条件受到限制而更多依赖银米。政治钉子需要稳定资源，却会根据当地房地、人口和财政条件形成不同组合。若把一种城市的供给方式外推所有满城，就会把真实的嵌入重新写成统一模板。

主体社会人数庞大，并不意味着它在所有决定上都拥有最高权重。人口可以掌握市场、手工业和地方知识，却未必掌握武装、任命和安全接口。满城机制的关键，不是宣称少数人口在每个领域都统治多数人口，而是指出政治核心把有限力量放在能够决定安全和资源方向的位置上。但这也不意味着主体社会只是纯粹被动的背景。它具有自身的行动能力，持续承担着供给、生产、税粮和城市运转，也可能抵抗、规避、谈判和重新组织。

江宁城内外的反抗、北京居民的强制迁徙和拨地造成的流离，显示主体社会以抵抗、被迫移动和承受损失的方式进入这一过程。高权重节点能够压制反抗，却不能取消主体社会自身的规模，也不能消除嵌入所制造的冲突。高权重节点必须在这种主体社会中维持自身，因而需要同时使用强制、资源和组织联系。满城的稳定不是把主体社会消灭，而是把主体社会放在新的权重关系之下继续运行。

捕获旧国家躯体不排除摧毁，满城把这种并存带入了城市日常。清廷需要市场、税粮、地方行政和城市生产继续运转，因此保存与压制必然并存。它保存城市、税源与行政网络以维持国家运行，同时又通过兵民分城、居民迁移、房地重分、身份区隔和军事镇压，把自己的核心力量固定下来。若脱离强制区隔与镇压，满城容易被误解为一种温和的城市管理；若只写暴力，又无法解释新核心为什么要长期供养驻防、调用地方财政并让旧城市继续生产。政治钉子依赖主体社会提供资源，也以强制手段保证自身不被主体社会重新安排。依赖与压制不是互相取消，而是同一嵌入结构的两面。

满城的墙因而不仅区分民族，也区分政治位置。空间、编制和资源优先使某些人口成为中央高权重链的组成部分，使另一些人口承担迁徙与供养成本。民族区分在这里真实存在，却不能单独解释满城。决定其理论位置的是民族身份与政治组织、军事功能、资源供给和最高权重结合在一起。清初建置的这种强形态不能自动外推为整个清代始终不变。政治钉子怎样被钉入，与满城在更长时段中的人口、资源和军事功能如何变化，并不是同一个问题；后者需要连续材料支持，清初建置本身不能直接证明更长时期的演变或后期衰落。

六、政治功能与结构边界

满城的政治重量在日常和危机中有不同表现。日常运行中，节点需要稳定供给、维持驻防编制、管理兵民边界，并让驻防人口继续承担军事义务。这使得节点不至于成为一次性的临时军营。危机时刻，它则成为中心可以迅速调用的安全节点，向地方明确展示其并非普通居民区。

北京保护政治核心，江宁驻防面对反抗，杭州与西安各自承担战略方向上的防务。这些事实表明，满城的高权重首先体现在军事与政治事项上。作为整体，现有材料支持守卫首都和省城、控制城防、压制反抗、参与区域作战并保持与中央军事命令的联系。这并不意味着每座城市都具备上述全部功能。各城的实际作用互不相同，具体材料能够证明的范围也各有界限；但这些材料都指向危机时刻的高权重。

高权重来自节点在整体结构中的关键位置，并不要求在每一个生活领域都拥有同样密度的直接控制。地方税收、诉讼、水利、市场、户籍与普通治安，仍需依靠督抚、府州县体系与旧国家行政能力。驻

防与文官链并置，恰好说明清廷没有用驻防替代整个地方政府。政治钉子不需要亲自办理一切，更不必全面控制全部民政才算存在；它只要在决定安全、忠诚、军力和最终处分的关键事项上保持更高权重。

同样，战略驻防不能单独维持全国统治。北京被占领以后，抵抗依然持续多年；重要城市拥有永久驻防，也不意味着城市之间的广大地区仅靠这些节点便自动服从。^{[17]} 高权重节点的运转，仍要依赖旧行政网络和财政征收两项条件，并与持续的军事行动相结合。它能固定关键位置，却不能替代整具国家躯体。

北京、江宁、杭州与西安不能拼成一张无差别的统一模板。四城的共同点并不是“凡有驻防皆为完整满城”。各城在建置形态与空间时序上存在实际历史差异：军事编制与后来的固定营城属于可区分的层次，编制设置不自动等于固定营城已经形成；各城材料的完备程度也参差不齐，有的资源链较清楚而权限材料不足，只见编制材料并不等同于现实中只存在编制，不能把材料暂缺直接等同于功能不存在。城市之间的实际差异与资料参差，要求具体事实必须按照时间、地区和功能分别限定。真正共通的不是整齐划一的外观，而是相应的结构关系：墙与营解决空间定位，家口解决持续人口，土地与银米解决资源供给，军官链解决命令传达。这四组要素在不同城市的组合虽有差异，却共同说明政治钉子作为与中央相连的高权重组织，如何在庞大主体社会中维系高于人口比例的政治权重。

节点的力量来自连接而非单纯封闭。它连接中央命令与地方军事，连接驻防人员与供给网络，连接城市空间与身份区分，也连接危机处置与新主人的安全要求。若供给断裂、编制失去联系或军事功能消失，单纯的居住区并不能自动承担满城的政治作用。

因此，满城的有效性取决于驻防人口、编制、军需、房地和命令链的持续维持。中心通过资源和制度反复确认节点位置，节点又通过军事和安全功能向地方展示这种位置，它们相互支撑，构成入关后国家身体的新固定点。这种持续并不意味着没有变化。驻防规模、空间边界、资源配置和地方关系可以变化，某些城市的围墙也可能扩大、缩小或不完整。历史分析要观察的是机制如何在变化中保持，而不是假定表面形态固定不变。

七、历史限度与现代演进

历史满城说明了一个重要机制：较小政治核心夺取国家最高权重以后，不必消灭主体社会，也不必亲自替代全部行政和生产。它可以让旧国家身体和主体社会继续存在，同时把自己的高权重组织放进关键城市，以空间区分、独立编制、资源供给、军事功能和中央命令链保持长期位置。后金小核心经过人口编组、归附差序和旧国家捕获之后，不能只停留在中央夺取，必须在城市和地方社会中留下能够持续发挥作用的节点。从“入关”到“钉入”由此接在一起：夺取中央是主人关系改变的起点，建立高权重节点则使这种改变不只停留在一道诏令或一次军事胜利上；国家躯体仍然运行，但运行方向不再由原有主体决定。

这也划定了历史满城与现代满城的明确边界。历史满城只说明较小政治核心如何通过驻防、编制、空间和供给嵌入主体社会；现代党委、党校、机关、统战和单位组织节点与清初城市制度不可逐项等同。把比较模型冒充为制度事实，会跳过现代政治核心自身的形成过程。^{[18]} 历史材料不能代替独立的经验证据：现代节点使用什么组织技术、怎样捕获人口与身份，以及现代政治核心从何而来，必须从它自身的形成与运转过程中寻找答案。

现代阶段不是历史满城的简单复制。现代政治核心如何形成，与形成后现代捕获机器如何组织人口、身份和语言，是两个不同的问题。现代政治力量需要先通过新的党、军队、宣传、身份和组织技术形成核心，随后进一步获得工业外骨骼、城市网络以及现代的接收能力。现代满清共产主义若要解决全国性嵌入问题，还需要首先形成自己的现代政治核心，这就是中华苏维埃。

第七章　满城：高权重政治节点怎样嵌入主体社会注释

[1]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五顺治元年五月己丑条载清军进入燕京、多尔衮入武英殿并命军队控制城防，转录见 https://zh.wikisource.org/w/index.php?oldid=5105377；卷九顺治元年十月甲子即位诏已记东中西三城官民迁徙及南北分居免赋，转录见 https://zh.wikisource.org/w/index.php?oldid=5105726。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chap. 2, pp. 100—101，讨论 1648 年 10 月清廷发布的后续分隔命令。进入北京、即位诏所记早期迁居与后续分隔命令是不同阶段。

返回正文

[2]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九顺治元年十月甲子条同时记载北京分城、部分官民已经迁徙及不同期限的免赋，转录见 https://zh.wikisource.org/w/index.php?oldid=5105726。这条材料只适用于北京，不能外推为所有驻防城市的统一制度。

返回正文

[3]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chap. 2, pp. 106—108, 110, 126—127；并参《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二十四顺治三年二月丙申条。讨论江宁 1645 年 12 月建置令、1646 年初守城行动与二月家口调派令、1649 年前后布局及 1660 年前后围墙完成。家口调派令不能单独证明全员即刻到位；该分期主要依靠现代研究对地方材料的整理，不能替代尚未完成的地方志逐页校勘。

返回正文

[4]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二十一顺治二年十一月甲寅条载江宁、杭州驻防，转录见 https://zh.wikisource.org/w/index.php?oldid=5106845；卷二十四顺治三年二月丙申条载江宁、

西安兵丁及家口调派令，转录见 https://zh.wikisource.org/w/index.php?oldid=5107167；卷二十五顺治三年三月丙辰条载江宁、西安分别设置提督满兵与提督汉军汉兵昂邦章京等指挥职位，转录见 https://zh.wikisource.org/w/index.php?oldid=5107258。材料不能推出驻防在所有事务上取代督抚州县。

返回正文

[5]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二十四顺治三年二月辛巳条，奏报江宁驻防当年正月十二日面对城内外反清联络捕斩首谋者，并于十八日击退来犯，转录链接见注[4]卷二十四。事件可用于说明驻防的镇压功能；称谓、规模与战果仍受官修实录立场限制。

返回正文

[6]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二十一顺治二年十一月甲寅条载杭州驻防（转录见注[4]卷二十一）；卷二十九顺治四年正月壬子条载杭州驻防更番调派，转录见 https://zh.wikisource.org/w/index.php?oldid=5107590。关于杭州营城约 419 英亩、约占城内面积 13.25%的数字，见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pp. 110—111（表 2.1）及 p. 418 章 2 注 77；作者根据前人引述方志的记载，假设英译“miles”实为“里”而作出的推算，并非地方志直接实测数据，其版本直接页码仍待校勘。

返回正文

[7] Elliott, *The Manchu Way*, chap. 2, p. 121 及相关图注，指出杭州相当一部分旗人自初期即住在墙外。该反例说明驻防节点不以全部旗人绝对封闭居住为成立条件。

返回正文

[8] Elliott, *The Manchu Way*, chap. 2, pp. 126—127，比较西安、南京的土地配置与杭州的银米供给。现有材料不足以给出四城连续、同口径的资源总量。

返回正文

[9]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chap. 2, pp. 105—106, 109—110, 126—127。讨论何洛会于 1645 年 7 月奉命抽调兵员，作者推测其可能于 1645 年末抵达，而依据守城记录最迟 1646 年初已在当地指挥守城，但统兵者到达不等于所有官兵及家口均已到位。西安初建时划定城市东北部空间，1683 年前后又有扩展。初建状态与后期规模不能混淆。

返回正文

[10]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二十四顺治三年二月丙申条载调派顺德、潞安、平阳、蒲州弁兵及家口镇守西安、卷二十五顺治三年三月丙辰条载设提督满兵与提督汉军汉兵昂邦章京等指挥职位，转录链接见注[4]。住房、饷粮、司法和日常行政权限尚无完整连续材料。

返回正文

[11] “过境军队—更番驻防—带家口持久节点—固定营城”的区分，是依据现有史料作出的事实分层，而不是一套统一的必要充分条件。它用于辨认驻防持久化的不同程度，不能因为暂缺某一项材料，就断言某城不存在高权重政治节点。

返回正文

[12]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二十一顺治二年十月庚辰条，载顺德、济南、德州、临清、徐州、潞安、平阳、蒲州八城驻防的编制命令，转录见 https://zh.wikisource.org/w/index.php?oldid=5106845。该材料可证中央设置驻防编制，不能证明各城后来均形成同型固定满城或拥有相同权限。

返回正文

[13]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九顺治元年十月甲子条载北京兵民分城与官民迁徙（转录见 https://zh.wikisource.org/w/index.php?oldid=5105726），卷二十五顺治三年三月乙卯条载拨地造成“庐舍田园顿非其故”“迁徙流离”（转录见 https://zh.wikisource.org/w/index.php?oldid=5107258）。减免与拨补不能证明损害已经充分修复。

返回正文

[14]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二十一顺治二年十月庚辰条、卷二十五顺治三年三月丙辰条所载驻防编制和指挥职位（转录链接见注[12]与注[4]），证明驻防内部存在可识别的军事组织链；不能据此断言所有驻防的实际到位、持续时间与后期效能完全一致。

返回正文

[15]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二十顺治二年九月己巳条，载若干驻防地区“无主房地”及故明勋戚等土地的处分，转录见 https://zh.wikisource.org/w/index.php?oldid=5106658。“无主”属于清廷的行政分类，不能当作天然无争议的土地状态。

返回正文

[16]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二十五顺治三年三月乙卯条承认拨地造成民户庐舍田园改变与迁徙流离，转录链接见注[13]。减免或拨补的存在，不能把强制迁移改写为无损的资源配置。

返回正文

[17] F. W. Williams, “The Manchu Conquest of China,” *The Journal of Race Development*, vol. 4, no. 2, October 1913, pp. 161, 166—167，用于交叉说明北京占领后抵抗仍持续，以及重要城市的永久驻防不能单独维持全国统治。该文史学陈旧且含种族化语言，只用于时间范围和驻防效能的反例边界。

返回正文

[18] 对满城的结构解释，建立在建置、调派、家口、空间、资源和军事功能等可回查材料之上；这些材料不证明清初统治者已经以同样概念表述其自觉理论。这些材料也不能证明清代满城与现代党委、党校、机关或统战系统之间存在逐项对应关系。

返回正文

第八章　从后金到中华苏维埃：现代政治核心的形成

一、满城之后的问题

高权重政治网络能够嵌入一个比自己大得多的主体社会。满城之所以重要，不在于城墙、街道或驻军营房本身，而在于它把一种不能由人口比例解释的权力关系固定在空间之中：少数节点可以凭借更高的政治权重连接军事、资源、身份与命令，使周围社会在不被全部替换的情况下，仍然受到另一套政治关系的穿透。

但满城只回答了“怎样嵌入”，没有回答“谁来嵌入”。如果现代党委、党校、机关、军队、宣传部门和身份管理系统能够形成一张贯穿全国的高权重网络，那么这张网络必定有自己的政治来源。它不可能从城市、铁路、学校、工厂和行政区划中自然长出，也不能简单归结为任何现代国家都会具有的官僚机构。现代国家可以有机关，共产主义政治核心却要求机关之上还有党；现代国家可以有军队，共产主义政治核心却要求军队的政治归属先于其国家外观；现代国家可以登记人口，共产主义政治核心却要先规定什么人属于人民、什么人属于敌人，以及谁有权不断修改这种分类。

因此，真正的问题不是清代满城能否与现代机构一一对应，而是现代全国性政治网络在占有全国之前，是否已经形成了一个能够独立运转的政治—组织核心。这个核心如果不存在，所谓“入关”就只是一种修辞；如果它已经存在，那么后来对旧国家躯体的接收和改造，就不能再被叙述为一个普通政党在同一国家内部完成的自然成长。这个问题必须从中华苏维埃开始回答。

二、后金首先是一个结构位置

后金首先不是一张等待与现代人物和机构配对的历史名词表。它代表的是一个结构位置：一个尚未占有旧国家完整躯体，却已经在旧国家之外形成自身政治—军事关系的小型核心。

后金之所以构成政治核心，不只因为它拥有武装，还因为军事编组、身份归属、主人—依附关系、资源配置和命令秩序已经结合起来。被俘获、归附或主动投入的人被重新安置在新的关系网络中；他们原有的语言、技术、地方知识和组织能力可以继续使用，改变的是这些能力的政治归属。一个人仍然

会种地、经商、翻译、铸炮、书写文书或管理地方，但这些能力被接到新核心的命令链上。^{[1]}

后金专题材料能够证明的，是这个小型核心已经不只在战场上临时聚众，而能通过归附、编组、授职和资源配置维持较稳定的政治—军事关系。这些材料虽不足以据此给所有军事集团下定义，也不能把后金每一种命令都概括成统一制度，但足以说明后金在取得大清的全国国家躯体以前，已经拥有能够吸收人口、配置位置和延续命令的自身核心。

后金后来能够入关，不是因为它在进入北京以后才突然获得组织能力。恰恰相反，它先在关外形成了能够保持自身、吸收外来人口和扩大命令范围的核心，随后才有可能调用一个远比自己庞大的旧国家躯体。入关改变的是政治核心所占有的国家规模，而不是政治核心第一次出现的时间。核心形成在先、取得全国规模的旧国家躯体在后，这一先后关系本身就是结构语言。

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后金到中华苏维埃”不是寻找两段历史之间的秘密血缘，也不是说后金制度经过某条不间断的组织链直接传给了共产党。^{[1]}它提出的是另一个问题：在现代共产主义条件下，是否也有一个在尚未占有全国国家躯体时便已形成、能够独立维持自己的政治—军事核心？

三、中华苏维埃不是思想团体

中华苏维埃不能被写成一种思想倾向，也不能被缩成一个革命口号。思想团体可以出版刊物、传播理论和争取同情，普通政党可以提出纲领、参加竞争并试图影响国家政策；但一个政治核心要求更多。它必须能够建立自己的组织关系，产生具有约束目的的命令，配置干部，维持军事力量，在一定空间内组织资源，并以自己的语言规定政治身份。

中华苏维埃已经跨过了这条界线。1931 年 11 月 7 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直接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命名政权，并规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及处理日常政务的人民委员会。1931 年 12 月《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告第一号》公布中央机关和主要人事安排；1934 年 2 月 17 日《中央苏维埃组织法》又把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人民委员会的权限及报告关系写成更细的组织规范。^{[2]}这至少证明，它不是若干口号或临时根据地的松散合称，而是公开以共和国名义规定自身政治性质、权力机关和制度目标的政权化组织。制度文本能够证明组织形式和权力主张已经出现，却不能证明每一条规定已在所有苏区同时、完整和无差别落实。

政权的存在与政权的完整有效不是同一个判断。一个制度文本的颁布，不证明其条文已在全部地区无差别实现；一个机关的设立，不证明所有地方机构都稳定服从；一项命令的发出，也不证明执行没有折损、抵抗和变形。可是，这些限制只能约束我们怎样描述它的运行范围，不能把已经出现的组织关系降格为观念。中华苏维埃是否拥有当时中国全部城市、财政和专业机关，是一个问题；它是否已经

形成自己的政治—组织核心，是另一个问题。前者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后者的答案却不能因此也是否定。

共产党后来叙述这段历史时，常把它放入革命正统的连续进步故事中，仿佛组织化、军事化和政权化天然等于人民解放。这个等式不能成立。一个组织宣布自己代表人民，不等于它因此获得不受限制地支配人的正当性。政治核心的形成首先是一件权力事实，不是一张道德合格证。正因为中华苏维埃不只是思想团体，它才必须从组织、武装、政权机关和制度文本来分析，而不能只从理想和口号评价。

四、政治核心不等于国家躯体

理解中华苏维埃，必须把政治核心与国家躯体分开。国家躯体包括城市、道路、铁路、港口、学校、医院、工厂、矿山、银行、税收系统、行政区划、司法机关、技术人员、文官传统、档案、人口登记和地方社会。它不是抽象的“国家机器”四个字，而是一个辽阔社会在长期运行中积累起来的物质、知识和行政能力。中华民国在大陆留下的，正是这样一具仍然包含巨大社会容量的国家躯体。它经历战争、分裂和破坏，并不等于它已经不存在；它的制度有缺陷、统治范围有伸缩，也不等于城市、专业人员、交通网络和行政经验全部化为零。

政治核心则不同。它首先回答的是：最高政治忠诚指向哪里，命令从何处获得优先权，军队服从谁，干部由谁配置，什么语言能够规定敌我，谁有权把社会资源转化为组织资源。一个政治核心可以很小，可以只控制有限空间，可以缺乏大型城市和完整工业，却仍然在自己的关系网络中独立存在。它不需要先复制旧国家的每一座法院、每一所学校和每一条铁路，才能成为政治核心。

这种区分也解释了为什么不能用物质规模直接衡量政治权重。一个拥有大量人口和设施的国家躯体，可能因战争、财政困难和命令分裂而无法形成统一政治意志；一个占地有限、物质贫乏的组织核心，却可能凭借高度集中的忠诚、干部和武装关系，对外部社会施加远超其资源规模的影响。政治核心的力量不只来自它当下占有什么，更来自它能否决定成员如何行动、如何理解敌我，并把每一次扩张转化为新的组织节点。若看不见这一层，就会把中华民国的物质和行政遗产误算成共产主义核心自身早已拥有的能力，也会把共产党后来取得国家躯体的过程误写成同一制度内部的一次普通轮替。

中华苏维埃提供的是政治内核，不是中华民国大陆国家躯体的缩小复制品。它有自己的组织、武装、干部、根据地、命令和合法性语言，但它尚未拥有中华民国大陆留下的全部城市、铁路、工厂、学校、医院、行政机关、专业人员和国家能力。把这两者混为一谈，会产生两种相反却同样错误的说法。一种说：既然中华苏维埃没有完整现代国家的全部能力，它就不算政治核心；另一种说：既然它已经建立政权形式，它就已经等于后来全国范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一种抹去内核，后一种吞掉躯体。

真正的结构恰恰建立在二者分离之上。中华苏维埃构成政治组织内核。中华民国在大陆留下的国家结构构成被接管的国家躯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华苏维埃政治核心与中华民国大陆国家躯体结合后的结果。中华苏维埃能够在未占有大陆国家躯体时形成自己的政治组织内核；中华民国大陆国家躯体也在这一内核之外继续存在。只有承认两者不是同一个对象，才可能解释后来发生的结合：不是一具躯

体自己更换了名称，也不是一个小型核心凭空创造出整个现代中国，而是中华苏维埃政治核心经过战争和扩张，进入、占有并改造了中华民国在大陆留下的国家躯体。

这个判断首先要求把内核从躯体中辨认出来。大陆国家躯体的具体接管，以及二者在战争、接收、行政与工业网络中的结合，是相互关联而又必须分开的过程。

五、组织、军队与根据地：现代核心的社会承载

政治核心不能只靠名称存在。它必须有机关、人员和命令关系，把政治意志变成组织行动。中华苏维埃的组织性，首先体现为共产党组织、苏维埃政权形式、红军和干部并非彼此孤立。正式制度文本已经规定共和国及其权力机关的存在；根据地提供一定的空间和人口，干部承担机关和地方组织的职务，武装保卫这一政权关系。不同地区的机构未必完全整齐，命令也未必无折损执行，但组织、机关、干部和军队共同指向一个政治中心，已经足以证明它不是尚待实现的思想方案。

干部的存在首先表明，政治核心已经有人负责配置人员、维持机关和传递命令。干部怎样被发现、训练、任用和审查，政治资格怎样改变地方社会中的评价秩序，组织又怎样借干部深入人的履历和日常生活，则属于捕获机器的具体运作。

毛泽东可以作为观察这一核心的有限入口，但中华苏维埃不能被归结为毛泽东个人意志。政治核心由党组织、军队、干部、机关、根据地和制度文本共同构成；个人位置再重要，也不能代替这些关系的存在，更不能据此臆造个人秘密动机。

中华苏维埃之所以不是普通政党，军队是一个不能绕过的界线。政党如果另有一支与自身政治核心相连的武装，并以这支武装保卫自己的政权机关和根据地，它与旧国家之间的关系就已经不是一般政策竞争。红军与共产党、苏区政权和根据地相连，使中华苏维埃拥有了维持自身政治关系的军事承担。这里能够推出的是军队属于政治核心的构成部分，不能推出所有部队在所有时间和地区都由同一个中心毫无折损地控制。

这项事实也不能被革命叙事美化。把军队命名为工农武装，不会使武装强制自动获得政治正当性；组织能力和军事胜利同样不能替代对权力来源与使用方式的判断。军队在这里所能证明的，只是现代政治核心已经拥有武装承载。党怎样把军队变成更深入的组织工具，宣传和身份分类怎样进入军事与社会生活，具体军事命令怎样把资源要求转成忠诚测试，都需要可靠底本与执行材料。

根据地使中华苏维埃的组织关系有了可以反复运行的社会空间。在一定范围内，机关、干部、军队、资源命令和政治身份语言能够彼此连接，政治关系因而不再停留于会议、宣言或秘密组织。中华苏维埃及其相关组织形成正式制度文本，以自身政权语言规定权力机关、土地原则、劳动政策和政治权利边界。^{[2]}这些规定未必在各地同样落实，也可能在战争、基层权力和路线变化中发生变形；但文本与机关的出现足以证明，该组织已经建立区别于中华民国的资源命令与身份界定接口。

中华苏维埃有一定领地、政权机关、资源命令和自己的政治身份语言，因而已经具备政治核心所需的最低社会承载。仅凭这些事实，还不能说明阶级名称怎样具体影响权利、财产、安全和政治资格，资源要求怎样成为忠诚测试，分类怎样动员或排除人口；这些属于捕获机制的具体运作。

六、普通政党边界与结构对应

把中华苏维埃说成中华民国内部的普通政党，会同时抹去两件事实：它自身的政权化，以及它与中华民国国家躯体之间的分离。这里不是为所有政党规定一条无例外的普遍定义，而是比较中华苏维埃与中华民国既有国家框架的实际关系。中华苏维埃不仅提出另一种政策，还在共产党领导下形成自己的政权机关、武装、干部关系、根据地和合法性语言。它争夺的不是中华民国制度中的若干议席，而是以自身政治核心否定、替代并最终占有原有国家的最高权力。

从政治—组织事实看，它已经越过普通政党边界。这一判断并不表示国际法、主权、法统和外交承认方面的问题已经全部解决。一个政治核心可以在组织上独立存在，而其国际法律地位仍有争议；它可以发布自己的制度文本，而这些文本的法律效力与实际执行仍需分别考察；它可以把中华民国政府称为敌人，却不能仅凭自我命名就自动获得一切法理结论。政治组织判断必须与法律判断分层。

中华民国政府保护其国家和公民、抵抗另立政权的武装共产主义组织，具有政治正当性。一个组织以武装和另立政权形式争夺国家，不会因为后来胜利，就倒过来使其当年的一切征集、处置和身份分类自动正当；胜利只能证明它赢得了权力，不能证明权力来源和使用方式因此免于批判。

同样，也不能用“人民追求解放”把组织与人民直接画上等号。人民不是一个可以由党永久代理的抽象整体。具体的人拥有不同利益、身份和选择，他们可能支持、被迫服从、观望、抵抗，也可能在不同时间改变立场。政治核心最危险的能力之一，就是把自身意志宣布为人民意志，再把对自身的拒绝解释为对人民的拒绝。中华苏维埃已经具备这样做的组织和语言条件，所以它必须被当作政治核心分析，而不能被放回无害的思想史。

从后金到中华苏维埃，绝不是把历史机构和现代机构排成两列。不能说八旗就是红军，包衣就是党员，满城就是党校，努尔哈赤就是毛泽东，后金某一官署就是中华苏维埃某一机关。这样的对应看似锋利，实际上会摧毁理论。它把不同历史条件中的制度压成外观相似，也把需要解释的结构问题偷换成名词游戏。后金的军事编组、身份关系和归附机制形成于特定的东北亚战争与社会环境；中华苏维埃的党组织、军队、干部、宣传和阶级分类，则形成于现代民族国家、革命政党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条件下。两者没有逐机构直系继承，也不能凭某个历史人物的性格构造跨时代血缘。

但排除机械对应，不等于退回“它们有一些相似之处”。普通相似性没有理论约束，任何两个政权都可以被挑出战争、税收、宣传或官僚等共同点。二者在同一个生成模型中占据政治核心这一结构位置：后金与中华苏维埃均在取得完整国家躯体以前形成自身核心，并在有限空间内建立武装、资源、身份和命令关系。这个判断指向结构先后，不把“取得旧国家躯体”写成两个历史主体已经明确自觉的同一目的。

结构位置不是历史同一性。后金建立的是满清共产主义历史政治核心的结构语言：小核心如何在旧国家之外形成，如何通过捕获、归附和重新赋位扩大自身，如何在入关前已经具备政治—军事内核。中华苏维埃则使这一政治核心获得共产主义的现代组织承载：党、红军、干部、苏区政权、宣传和阶级身份，不再依赖传统王朝的族属与家产关系，却能以现代组织方式完成更深入的政治归属重写。

因此，“后金—入关—大清”与“中华苏维埃—中共入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成一组结构对应。前一条链说明政治核心怎样先形成、再取得旧国家；后一条链则说明现代共产主义核心怎样先形成、再进入中华民国大陆国家躯体。两条链之间没有逐项制度继承，却共享一条不能被普通相似性替代的生成逻辑：核心先于躯体。这里指核心的形成先于它对旧国家躯体的取得，而非旧国家本身晚于核心才产生。入关连接二者，新政权是政治核心占有并改造旧国家躯体后的结果。

七、现代组织承载与“两个国家”

中华苏维埃不是后金的复制品，因为共产主义改变了政治核心的组织材料。这种改变首先体现在组织边界上。中华苏维埃政治核心以政党、路线、组织纪律、干部、政治教育、阶级身份和历史使命界定自身边界；人员可以经由入党、参军、训练和组织生活被吸收，也可能因阶级与政治定性被排除。这些工具使核心不必依赖固定族属繁衍便能扩大组织关系。然而组织怎样复制、忠诚怎样被检验、地方矛盾和资源要求怎样被重写为统一政治语言，不能仅凭这些工具的出现直接推出。

这种现代组织承载不等于更文明或更具正当性。党组织、军队、宣传、干部和身份分类在中华苏维埃时期已经出现，足以证明政治核心具有现代组织形式；它们怎样相互咬合，怎样进入人的履历、家庭关系和自我说明，怎样捕获人口、语言与身份，仍须由具体材料说明。共产主义没有把政治核心取消，而是使中华苏维埃获得可训练、可扩展的现代组织承载。

中共其实是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一个是中华民国在大陆的尸体，二者结合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两个国家”并非指今天并列存在两个获国际承认的主权国家，也不能等同于单纯的两个结构层。第一个国家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已经形成的政治核心，第二个国家是中华民国在大陆留下、后来被这一核心占据的国家尸体。政治核心与国家躯体是解释这两个国家如何结合的分析范畴。1931 年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建国布告也曾公开宣称中国境内已有两个“绝对不相同的国家”，从同时代政权自身的声部证明中华苏维埃并不把自己放在普通政党位置；但那份布告的“两国”是当时的政治自我表述，不能自动当作国际法结论，也不能代替对“中华民国大陆尸体”的结构判断。^{[3]}

“尸体”表达原有最高政治生命被夺取的尖锐判断；“国家躯体”则用来展开这具尸体中仍可被调用的领土、城市、人口、铁路、工厂、学校、医院、行政机关、专业人员和社会能力。“尸体”不是对这些人群的侮辱，也不等于什么都不存在。它指中华民国在大陆的最高政治生命被夺取后，其物质、人员和行政身体仍然存在，并可被新的政治核心接管、调用和重新赋位。

如果只看中华民国大陆尸体 / 国家躯体，就会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叙述成旧国家自然更名后的延续，忽略进入躯体的政治核心早已在中华苏维埃形成；如果只看中华苏维埃政治核心，又会把共产党写成凭空创造全部现代国家能力的主体，抹去它接收、利用和改造旧国家与主体社会的事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形成政治核心，中华民国大陆尸体提供后来被接管的国家躯体，二者结合才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三层关系不能互相替代。

能够确认的只有两点：第一个国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现代政治—组织核心——已经形成；它与中华民国大陆尸体 / 国家躯体原本分离。二者后来怎样经由战争、接收、行政和工业网络结合，党、军队、宣传和身份怎样把人转化为组织对象，仍须在后文分别说明。

八、现代政治核心已经形成

现代全国性政治网络的政治核心，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突然出现，也不是从中华民国大陆城市和机关中自然生长出来。它在尚未占有完整大陆国家躯体时，已经以中华苏维埃及其相连的党组织、红军、干部、根据地、政权形式、资源组织和政治身份语言构成自己的现代政治—组织核心。从后金到中华苏维埃，真正连续的不是国号、族群、服饰、人物或单项机构，而是政治核心先形成、再取得旧国家躯体这一结构。

组织效率不能证明政治正当性，军事胜利不能替代法理，代表人民的宣称也不能取消具体人的权利。正因为这一核心能够把组织、武装和身份解释结合起来，它才具有把社会变成政治材料的危险能力。把中华苏维埃降格为理想主义团体，会遮蔽这种能力；把它直接等同于后来完整国家，又会遮蔽它对旧国家躯体的取得和利用。

它与中华民国大陆尸体 / 国家躯体不是同一对象；两者后来的结合，才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 / 后清的生成空间。但政治核心已经形成，不等于现代捕获机器已经解释完毕。党怎样使组织高于普通社会关系，军队怎样成为政治归属的强制承载，宣传怎样规定可说与不可说，身份怎样把人口分成可以吸收、利用、改造和排除的对象，这些问题仍然悬在核心与社会之间。要看清党、军队、宣传与身份怎样共同捕获人口、身份和语言，就必须进入这台机器的具体运作。

第八章 从后金到中华苏维埃：现代政治核心的形成注释

[1] 关于后金核心在入关前吸收外来人口、重组依附关系与配置资源的过程，可参看官书记录，如《清实录·太祖高皇帝实录》（康熙本）卷四，癸丑年（1613）正月乌拉败兵来归、编户万家与俘获分给众军之条（https://zh.wikisource.org/wiki/清實錄/太祖高皇帝實錄_(康熙本)/卷 04）；同书卷五，天命三年（1618）四月克抚顺、李永芳授官、降民分编千户及按旧制设官统辖之条（https://zh.wikisource.org/wiki/清實錄/太祖高皇帝實錄_(康熙本)/卷 05）。上述实录文本依据公开数字转录，未核对影印原件，其中户口数字与招抚言辞属官书表述，不能直接等同于全部实际效果。这些材料能够支持后金在尚未取得全国国家躯体前，已形成能够吸收专业能力、配置内部位置并延续

命令链的政治—军事核心；但现存线索不足以对汉军、包衣的所有内部演变与人员去向细节作出穷尽证明，更不能证明后金与中华苏维埃在制度、人物、族群或组织谱系上存在直接传承。

返回正文

[2]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31 年 11 月 7 日通过），引据中文维基文库 1931 年版本固定修订 oldid=2599555，题注为“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具体参见前言及第 1—4、10 项，https://zh.wikisource.org/w/index.php?title=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_(1931 年)&oldid=2599555；《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告第一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页面标明 1931 年 12 月），引据固定修订 oldid=2572708，具体参见大会与共和国成立、1931 年 11 月 27 日第一次会议、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设置段，https://zh.wikisource.org/w/index.php?title=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告_第一号&oldid=2572708；《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命令“中字第一号”，1934 年 2 月 17 日），引据固定修订 oldid=8470990，具体参见第 1—7、11—17、23—30、34—43、51 条，https://zh.wikisource.org/w/index.php?title=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蘇維埃組織法&oldid=8470990 。上述三份文本能够证明共和国命名、中央机关形式、权力主张、资源和身份政策的规范接口已经出现；不能证明条文在所有苏区全面、同步、稳定落实，也不能仅凭机关名称推定实际党政关系、控制范围或现代分权意义上的制度效果。维基文库是文本转录平台，不是原始档案扫描；其中 1931 年《宪法大纲》页面质量标记为 75%，个别字形仍应以权威影印复核。

返回正文

[3]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告第一号》，固定修订及发布信息见注[2]。“两个国家”措辞见正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业已宣告成立”之后一段：“从今日起，中华领土之内，已经有两个绝对不相同的国家……”。该段能够证明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开将中华苏维埃表述为与中华民国政府竞争的国家性政权工程；不能把这一自我表述直接升级为外部承认、有效控制范围或国际法地位的中性结论。

返回正文

第九章　党、军队、宣传与身份：现代捕获机器

一、取得能力与改变归属

中华苏维埃在占有中华民国大陆国家躯体以前，已经形成自己的政治—组织核心。党组织、红军、干部、根据地、政权机关、资源命令和政治身份语言，共同指向一个不同于中华民国的政治中心。这个核心已经存在。问题在于，它怎样运转。一个政治核心如果只能发布宣言，却不能把具体的人接进关系网络，就仍是脆弱的中心。它可以宣布敌我，却无法让分类进入地方；可以提出路线，却没有人承担命令；可以拥有武装，却不能把武装带到新空间去建立组织节点；可以要求资源，却不能把粮食、土地、职位、资格和安全同政治身份相连。要从核心运转为机器，必须有一条连续关系把政治方向变成人员安排，把人员安排变成组织行动，再把组织行动沉淀为新的身份、资源和语言秩序。

党、军队、干部、宣传和身份不是五件并列工具。党决定最高政治归属和解释方向；干部把方向变成对具体人的安排；军队为归属提供强制性、移动性和空间承载；宣传把不同地方的经验翻译成统一语言；身份分类决定谁能进入、谁可利用、谁须改造、谁应排除；资源和安全后果使分类名称切实生效；被重新赋位的人又成为新的执行者，使同一关系继续复制。现代捕获机器正形成于这些环节的相互咬合之中。

组织得更严密，不等于权力更正当；能够动员更多人，也不等于真正代表这些人。分析这台机器如何有效运转，是说明一种危险怎样取得现代形态。恰恰因为它能把具体的人转化为组织材料，人民的名义才更容易被政治核心占用，具体人的权利也更容易在宏大名义下被取消。

古代征服可以夺城、占地、收税，但现代政治核心若要持续扩大，仅有土地远远不够。城市被占领，不等于其中的学校、工厂、技术人员、基层组织和语言秩序已经归入新的命令链。人口可以留在原地却拒绝合作；机关可以挂上新牌子却保持旧关系；士兵可以接受编制却仍循旧命令和旧利益判断行动。现代捕获首先要解决的，是人的政治归属。

捕获—重新赋位在这里表现得比单纯征服更清楚。一个人被吸收以后，不必失去全部旧能力。会识字的人仍会识字，会修械的人仍会修械，熟悉地方关系的人仍然熟悉地方关系，有军事经验的人仍然保留军事经验。政治核心真正要改变的，是这些能力向谁负责，由谁评价，在什么身份下使用，通过哪条命令链被调动。原有能力不被清零，反而成为组织扩张的材料；旧能力被保留，最高权重却被改写。

历史满清通过归附、编组和差异赋位，把不同来源的人接入政治核心。现代共产主义不能依靠固定族属繁衍去完成全国扩张。它必须让一个原本不属于核心的人经过入党、参军、训练、任用、政治教育和身份重定，成为可以承担组织命令的人。满清渔猎政治由此获得共产主义的现代承载；共产主义也由此被满清渔猎化。这里没有八旗向党组织的直接制度传递，也没有包衣与干部的名词对应。相同的是捕获以后不必清零对象，而是保存其能力、改变其位置、重新绑定其忠诚。

这台机器还捕获人的语言。一个人不仅要做什么，还要学会怎样解释自己为什么这样做。他的贫困、冲突、服从、拒绝、恐惧和利益，都可以被重新放进阶级、人民、敌人、革命和反革命的词汇中。身体进入组织只是第一层；身份进入组织语言，被捕获者才能够主动说明自己的新位置，并用同一语言识别和捕获别人。

二、党与高权重评价

一个具体人原本生活在地方、行业、学校、宗族和熟人关系中。他的能力可以由同业评价，声望可以来自地方合作，身份可以由家庭与职业说明。党组织将另一套评价压在这些关系之上：一个人是否政治可靠，是否理解路线，是否服从组织决议，能否用组织语言解释行动。专业能力仍可能被需要，但不能单独决定位置；地方声望仍可能被利用，却不能取得最高解释权。政治评价不必抹去原有的社会评价，只要在关键时刻能够压过它们，就已经改变了当事人的社会位置。

党由此与政权机关之外的普通意见团体区分开来。普通意见团体可以批评政策、争取支持，却不能仅凭内部判断决定谁政治可靠、谁可以承担关键职务、谁的专业意见必须让位、谁应被调动、审查或排除。政治方向、组织评价与人事位置汇聚在党组织内部，使其成为现代捕获机器的高权重中心。

1929 年《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把这种高权重关系说得十分清楚。文件反对把红军理解成单纯作战的军队，要求党积极讨论军事工作，规定“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重要决定要迅速传到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形成决议后必须执行。它还要求在行动上服从多数通过的决定。^{[1]}这份文本直接说明，党并非只在军队旁边提供建议，而是要求政治讨论、组织决定和执行关系贯穿军事与群众工作。

但不能把规范文本冒充成毫无折损的现实。决议文本自己就在处理勉强执行、非组织观点、本位主义、流寇思想和单纯军事观点，恰好说明组织内部存在冲突、抵抗和变形。政治核心的存在，不等于每个节点始终绝对服从；地方折损、阳奉阴违和内部争论，也不等于最高政治权重不存在。冲突出现时，谁有权把某种意见宣布为组织路线、把某种行动宣布为纪律问题，才是关键。

党对人的捕获因此不是一次登记，而是要求人把行动接入组织决定，把批评放进规定渠道，把个人判断同政治可靠性挂钩。一个人的能力越有用，政治核心越不必摧毁它；机器只需掌握任用、调动、审查和排除的解释权，就能使能力在新的最高权重下运行。

这种高权重还改变了组织成员证明自己的方式。在普通专业关系中，一个人可以用工作结果、行业规则和同行评价说明自己；在政治组织中，仅有专业结果未必足以证明可靠，他还需说明结果是否符合路线、自己是否站在正确位置、遭遇的困难应当归因于何处。表态由此成为组织读取忠诚的一种外部接口。组织不可能准确识别人心，便只能通过会议发言、执行态度、关系选择和政治词汇判断可靠性；成员也会主动学习这种读取方式，把行动翻译成组织认可的证明。

表态并非一概虚假，政治核心也不能准确识别人心。有人真诚信仰，有人策略性顺从，也有人在使用组织语言的同时保留私人判断。关键不在于内心是否整齐，而在于组织拥有把某种公开表现连接到职位、安全和行动范围的权力。捕获由此从外部服从进入自我说明：人开始预先考虑组织将怎样理解自己，并据此安排可见行为。

三、干部怎样使命令落地

政治路线需要转化为地方命令，决议要进入军队，身份分类也要落实到具体家庭、土地与名单上。这些安排无法自行落地，干部就是抽象方向与具体安排之间的中介。

干部不同于中性雇员。职业说明一个人做什么工作，干部身份则规定他在何种政治归属下承担工作。干部既把上级意图解释为具体命令，又把地方的人口、资源与冲突整理成组织能够处理的对象，再将执行结果送回命令链条。依靠这种双向转换，党才能从中央机关进入县、区、乡、部队和基层组织。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要求加强官兵政治训练，特别加强对俘虏成分的教育，又提出尽可能由地方政权机关选派有斗争经验的工农分子加入红军；重要指示通过活动分子会、支部或纵队党员大会向下传达。^{[1]}这些规定不能证明一套跨时期、全国统一、毫无缺口的干部制度，却能显示现代政治核心已经明确面对同一个问题：命令必须由经过政治训练、组织选择和具体配置的人承担。

干部的关键作用，是重新评价人。一个人在地方上可能有技术、有经验、有关系，却未必被视为政治可靠；另一个人的专业能力有限，却可能因为服从、表态和执行而获得组织位置。这不等于全部干部只凭忠诚任用，也不能据此把所有地方机关写成同质机器。专业评价与政治评价发生冲突时，政治核心仍保留改变位置的能力。它可以继续使用一个人的技能，同时把他的安全、升降和行动范围连接到组织判断。

个人由此从地方社会中的一员变成组织网络中的节点。他仍然生活在原有的语言和人际环境里，却开始代表另一条高权重关系。组织通过干部进入地方，地方又通过干部被翻译给组织。捕获一重新赋位不再只是把人编进名册，而是让人承担命令、解释命令，并把更多人变成可被组织处理的对象。

四、军队怎样移动组织

军队进入新空间时，带入的不仅是作战杀伤能力，还有组织关系。现代政治核心需要的武装力量，既负责在战场上消灭对手，也是一张能够随军移动、在新空间传递命令、编组人口并建立政权关系的网络。它把命令链带往新的地域，为政治归属提供强制性、移动性和资源承载。

1929 年决议明确说，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的任务除作战外，还包括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政权，直至建立共产党的组织。文件同时反对忽视宣传队和地方群众组织。^{[1]}是否接受这套革命自我叙述，

不影响这份文本所显示的组织安排：红军被赋予了作战之外的组织功能。军队不是政治核心的外置工具，而是把党、宣传、人员编组和政权建设带入新空间的移动承载。

军事编组还能切断或削弱旧命令关系。一个人参军以后，日常行动、同伴关系、资源供给、纪律后果和空间位置都被重新安排。他原有的军事经验可以保留，甚至正因为可用而被吸收；变化的是他进入哪支队伍，接受谁的命令，以什么政治身份理解作战。政治核心由此不必从零制造全部战斗能力，而可以教育、编组和重新使用俘虏、投奔者与新吸收人员。

“工农武装”的命名不能消除武装强制。军队自称代表工农，并不使所有被组织、征集或处置的人自动成为自愿主体；军事胜利也不能倒过来证明政治正当性。把军队写成人民意志的自然结晶，会遮蔽党组织、干部、政治训练、资源调用和身份分类怎样进入军队。军队之所以属于捕获机器，不仅在于强制杀伤，更在于它能移动组织关系，使新的命令链在旧社会空间中落地。

一份红四军文件不能证明全部红军在所有阶段和地区都受同一中心毫无折损地控制。决议本身记载的思想冲突和执行问题，正好划出了材料的边界。这份材料仍足以确定组织方向和机器接口：党要求军事服从政治方向，军队承担宣传和组织任务，政治训练面对被吸收人口，强制与语言因此进入同一网络。

五、宣传怎样改变解释位置

地方社会中的矛盾原本具有多种来源：土地、债务、宗族、雇佣、治安、私怨、战争和资源短缺可能彼此交织。宣传把这些差异翻译成统一政治语言，使分散经验能够被党和干部处理。

经由这种命名，当事人不再仅是说明具体的个人争执，而被要求在人民与敌人、劳动与剥削、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类中找到位置。宣传由此超出了普通新闻发布、口号张贴或谎言的范围，它划定了何种冲突可以进入组织视野，让地方经验能够直接对接身份判断与资源命令。

这种语言同时改变了行动的定性方式与申辩空间。在组织一侧，资源调用可以被称为革命需要，服从可以被称为政治觉悟，拒绝可以被重新解释为立场问题，捕获可以被包装成解放、代表和改造。在个体一侧，申辩的路径则被直接压缩。一个人若拒绝某项命令，原本可以从家庭负担、地方习惯、财产争议、程序不公或现实能力说明原因；一旦拒绝被放进敌我和立场的分类，他首先要证明自己不是分类所指的那种人。组织提出的名称因此先占据解释位置，被命名者则承担摆脱名称的成本。越是宏大的词汇，越能把复杂事实压缩成简单阵营，也越容易让对具体行为的讨论转化为对身份的审判。

被吸收者开始用组织语言解释自己时，分类就不再只是上级贴下来的标签。这套分类能够由干部、战士、积极分子和基层执行者反复传播，使组织语言随人员移动。宣传由此不仅向外争取支持，也向内统一组织成员怎样观察社会。干部需要用同一语言汇报，军队需要用同一语言动员，基层节点需要用同一语言区分可用者与危险者。语言成为机器各环节相互识别的通用接口；它不保证信息真实，却能让分散节点以近似方式处理信息，并把处理结果送回政治核心。

一条宣传文本发布，不等于所有受众都接受了同一种理解。文本说了什么、组织希望达到什么、受众怎样回应，是三件不同的事。有人可能真信，有人可能策略性复述，有人可能抵抗或私下保留另一套解释。宣传机器的权力不必建立在所有人内心完全一致之上；只要公开行动、资源申请、组织资格和安全判断越来越要求使用某种语言，它就已经改变了可说与不可说的边界。

宣传与军队因此不能被拆成彼此无关的两个部门。军队把组织带入空间，宣传为这种组织提供解释语言；干部把语言变成具体判断，党决定哪些判断具有最高政治权重。语言捕获的危险，正在于人不仅被要求服从，还被要求用组织给出的概念解释自己的服从与遭遇。

六、身份与资源怎样相互制约

1931 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选举细则》按照政治—阶级类别规定谁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又列举被排除者；细则要求登记选民、公布被剥夺选举权者的名单，规定选举机关、审查关系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解释权。^{[2]} 这份规范文本不能证明每个苏区都产生完全相同的社会后果，却足以说明政治身份已经不只是宣传称呼，而被设计成能够进入权利、名单和组织程序的分类。

身份分类如果只是描述，就还不是捕获机器；当这些名称开始决定一个人的政治权利、资源位置、安全、任用以及被吸收的资格时，分类才取得支配现实的力量。

分类权并不对称。被分类者不能仅凭自己的自我说明，取得对分类者同等的解释权。谁属于人民，谁是敌人；谁可以吸收，谁能够利用；谁必须改造，谁应当排除——这些判断掌握在政治核心及其组织节点手中。身份可以来自既有社会差别，却也能由组织重新制造。一个人的职业、家庭、财产和经历被放进政治语言以后，便可能获得原来没有的权利或风险后果。

身份还可以重新评价。被排斥者可能通过行动和表态争取新的位置，被吸收者也可能因路线、审查和关系变化失去可靠身份。正因身份可以改变，它才适合捕获—重新赋位。机器不是把每个人永久钉死在一个自然类别里，而是保留重新命名和重新配置的权力。身份变化由此成为忠诚检验：谁有权改变名称，谁就能改变一个人的资源、安全和组织前途。

规范与实践必须分开。制度条文规定了分类和程序，不等于所有地方都一致执行；政治身份能够产生后果，也不等于所有人都真诚认同。政治身份机制也不能被冒充成当时全部历史主体自己的自觉语言。现有材料能够确认，现代政治核心已经获得用名称接通权利、资源与强制的制度接口。

干部、军队和机关不能只靠观念维持。它们需要粮食、住所、土地、装备、职位、保护和持续供给。资源从来不是突然脱离社会关系的无主物；政治核心取得资源，意味着有人交出、有人分配、有人获得，也有人被排除。

一旦资源分配由组织掌握，物质位置就能转化为政治位置。谁得到职位，谁获得安全；谁被允许进入组织，谁得到培训和晋升机会；谁能够保留财产，谁必须交出资源——这些后果都可能与身份和可靠性相连。接受、拒绝、交付、服从和表态因此不再只是经济行为，而可以被赋予政治意义。

资源又会反过来筛选忠诚。被组织保护和供给的人，需要证明自己值得继续获得位置；承担征集和分配的人，则在执行中取得新的权力。原先被捕获的人因为资源位置进入组织，随后又帮助组织取得更多粮食、人员和地方关系。资源—身份—忠诚由此形成接口：身份规定资源方向，资源稳定组织位置，位置要求忠诚证明，忠诚证明又影响新的身份评价。

这还不是全国人工渔猎环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工作、住房、户籍、编制、项目、资格、关系和流量如何形成遍布社会的猎物，已经是更大尺度上的问题。机器内部首先形成的是最低链条：任何能够长期组织干部和军队的政治核心，都必须把资源位置同命令和身份连接；现代共产主义使这种连接获得政治语言和组织程序。

七、被重新赋位者与关系复制

捕获机器真正的扩张能力，不在于中心能够亲自处理每一个人，而在于被重新赋位的人可以继续捕获更多人。一个被吸收者保留地方语言、专业能力和社会关系，进入组织后便成为双向接口。他能够向上翻译地方资源和冲突，也能够向下传递组织命令；他知道哪些人可用，哪些关系可接，什么语言能够说服、动员或定性。他不只是被管理的人，也成为干部、战士、积极分子、宣传者、基层执行者或新的组织节点。

复制并不是把中央机关原样搬到每个地方。政治核心只需复制若干关键关系：谁拥有更高解释权，命令经谁传递，资源由谁分配，身份由谁确认，拒绝将承担什么后果。地方形式可以不同，人员来源可以复杂，组织名称也可能调整；只要这些关系重新建立，新节点就能把地方能力接入核心。现代捕获机器因此既具有标准化的一面，也能利用差异。它不是消灭所有地方性，而是选择哪些地方性可以保留，并把保留下来的部分改造成扩张条件。

被捕获者参与下一轮捕获时，中心的成本也随之下降。熟悉地方的人比外来者更容易辨认关系、方言、声望和资源；已经取得组织身份的人，又能用自己的经历证明进入机器可以获得安全和位置。捕获因而不只靠命令推进，还借助被重新赋位者的示范、关系和执行能力推进。

被重新赋位者能够继续参与下一轮捕获，现代政治核心由此摆脱固定族属繁衍的限制。后金的核心可以通过归附和编组扩大，现代共产主义则可以通过党组织、军队、干部训练、宣传和政治身份，在不同地区复制自己的关系。新节点不必在文化、技能和生活方式上完全同质，只要最高政治归属、命令方向和资源接口能够被重建，它们便可承担同一机器的功能。

这种复制也解释了为什么组织内部不需要人人真诚信仰同一套理论。有人信仰，有人因安全和资源进入，有人因旧能力被调用，有人策略性表态。机器要取得的不是心灵的绝对同一，而是行动、评价和

资源在关键时刻服从同一高权重中心。公开语言越统一，组织越容易识别可靠性；身份后果越清楚，人越需要主动证明自己。

这台机器并非始终无摩擦。党内冲突、地方抵抗、军队本位、执行折损、策略性服从和私人保留都会存在。闭环不是说所有节点毫无差别，而是说这些冲突仍被放在一个高权重关系中处理：谁能命名错误，谁能改变身份，谁掌握资源，谁拥有最终强制。机器的现实形态可以不整齐，其政治方向仍然能够连续。

满清渔猎政治在这里被共产主义现代化：捕获对象、保存能力、重新命名、组织重编、资源绑定和继续扩张，获得了党、军队、干部、宣传和身份制度的承载。共产主义也在这里被满清渔猎化：理论不再只解释世界，而成为识别、捕获、赋位和调用人的工具。

八、蠢人制造机制

现代捕获机器不只挑选最有能力的人，也会挑选某些最适合执行其命令的人。这就是“蠢人制造机制”。“蠢人”不是医学诊断，不是智商测验，也不是对某个自然群体的先天人格裁定，而是一个政治—组织功能概念。

中共在系统性制造蠢人。或者说，中共在体制内挑选较蠢的人，并培养人天生的愚蠢特质。这里所谓缺失的纠错系统，由三个部分构成：同理心、办事常理和思维逻辑。同理心使人感知对他人的伤害，办事常理使行动接受现实关系和基本合作规则的校验，思维逻辑使人检查说法和后果是否能够相接。三者共同构成人的纠错能力。

一个拥有完整纠错能力的人，在面对不合常理、伤害他人或逻辑断裂的命令时，更可能停下来质疑、调整或拒绝；缺少纠错系统的人却可以不受这些内部限制地重复口号、执行分类、制造纠缠。对机器来说，这样的缺失会成为组织资源。机器不一定需要他理解全部目的，只需要他在高权重命令与具体公民之间持续出现。

这不是个别用人失误，也不是官僚体系偶尔奖励低效行为。体制会挑选、培养、提拔并让这类人发声，向他们提供生存资源；这些资源又通过体制从正常社会汲取。被筛选者依靠组织获得位置、保护和表达权，组织则获得低成本、可替换、能够反复进入具体空间的执行者。资源供给与人员筛选相互强化，制造因而不是凭空改变智力，而是让某些特质更容易生存、上升和扩张。

机器还以“融入群众”等伟光正语言，要求被筛选者进入公民活动空间。其政治功能不是提供正常公共服务，而是干扰、纠缠、消耗和破坏公民追求自由的行动空间。这是对体制功能的理论裁定，而非源自中共文件公开承认秘密目的的文件证据。“蠢人”属于政治—组织功能概念，既非医学诊断或智商分类，也不指称所有具体党员、干部或基层人员具有同一种人格。

“所以人们认为，共产主义里面，不是蠢就是恶，没有例外。”在机器内部，有意识安排不正义的人，与缺少纠错系统、能够承担谎言和执行的人，构成不同功能角色。这一判断针对的对象范围不能被任意扩张，更不能把复杂历史个体的全部人生压成一句未经举证的心理裁决。

九、从谎言纠缠到暴力强制

蠢人制造机制最容易被误解成对低效人员的抱怨。它真正涉及的是谎言与暴力怎样接成一体。大量执行者首先承担的，不是直接暴力，而是“谎言与类谎言”。他们反复使用不能被正常经验校验的说法，把具体问题拖进无穷解释，迫使反对者不断证明常识、澄清前提、回应重复指控。纠缠本身就是消耗。对方的时间、注意力、判断力和行动能量被持续占用，原本可以用于合作、组织和追求自由的能力，被迫花在无效应付上。

认知消耗之后是同化压力。组织语言不只要求你听见，还要求你用同一语言解释自己。你若接受分类，就可能在组织给出的身份中获得安全；你若拒绝，就必须承担继续纠缠、被定性和失去资源的成本。机器让人在无限纠缠与屈服之间选择，使屈服看起来像一种减少损耗的理性退出。

当谎言、消耗和同化仍不能完成服从，暴力才进一步上场。暴力不是另一套突然出现的工具，而是同一机器的后续层次。少数恶人提供有方向的决定，大量执行者把命令落实为围堵、强制和伤害。前面的谎言已经削弱反对者的判断和行动能力，后面的暴力则处理仍未被同化的人。由此，谎言与暴力不是宣传失败后临时拼接的两种政策，而是捕获机器中的前后关系。

谎言、认知消耗、同化与暴力之间的关系，不是对每一次政治工作的经验归纳，而是对捕获机器内部次序的判断。具体事件是否完整经历这一过程，需要分别核实。若将这一过程简化为“宣传失败以后镇压”，就会遮蔽纠缠、认知消耗、行动能量下降与同化压力怎样为暴力准备空间。

十、农战神话的遮蔽

农战叙事纯粹搞笑。它把分散人口想象成一个能够自动行动的“人民”，仿佛农民只要承受压迫，就会自然形成统一判断、军事纪律、后勤体系、干部网络和政治目标。真实政治斗争不是无组织个人对抽象制度，而是组织网络对组织网络。农民身份不会自己变成军队，贫困不会自己产生指挥链，愤怒也不会自动供应粮食、情报、武器、训练和地方关系。

党、军队、干部、宣传、身份分类和资源组织之所以重要，正因为分散人口不会自动成为现代力量。政治核心要把人从不同地方关系中抽取出来，重新编组，提供统一语言，安排命令承担者，连接资源与安全，再把被组织者变成新的组织节点。所谓“人民自发革命”四个字，经常把这整套机器从历史中抹掉，只留下一个宏观人格替组织行动。

斗争背后还存在复杂的家族联盟、结社和代际积累。这一判断直接反对神兵天降、天降伟人和农战神人；但“所有斗争必然经过数代布局”目前仍不能冒充已经证明的无例外历史定律。

反农战神话也不是否认农民参与，更不是把普通人写成无足轻重。它恰恰要求把具体人从抽象“人民”中解放出来：谁组织了谁，谁提供资源，谁承担风险，谁获得解释权，谁把地方冲突翻译成统一政治语言。只有回答这些问题，才能看见人口怎样被编成力量，而不是把组织机器的成果倒算成群众自然意志。

十一、机器与物质尺度

中华苏维埃政治核心由此获得了一台现代捕获机器。这台在有限空间内运转的机器，通过选择和训练命令承担者，把武装、宣传和组织关系带入新空间，利用身份重新安排权利、资源与安全，再由被重新赋位的人继续扩展组织网络。它不需要先消灭一个人的全部旧能力，只需改变这些能力的最高政治归属。满清渔猎政治不再只依靠传统归附和编组，在党、干部、军队、宣传和身份机制中获得了可训练、可传播、可复制的现代形式；共产主义也不再只是理论和口号，而被捕获—重新赋位结构改造成识别、编组、调用和扩张人的机器。

这套机制能够循环复制，并不等于所有组织节点始终一致，也不意味着规范文本已经无差别地落为各地实践。具体干部制度、地方执行、受众反应和身份后果仍须分别核实。

户籍、单位、学校和媒体后来会成为更广泛的制度承载，使身份、资源和语言深入全国社会；党委、党校、机关和统战会形成现代满城式嵌入；人工渔猎会把捕获能力扩散为社会成员日常的政治生存逻辑。这些属于机器进入全国社会后的形态。

然而，已经成型的机器仍缺少完成现代入关所需的物质尺度。它能编组人群、制造组织节点和建立忠诚接口，仍不等于已经拥有支撑大军运输、装备、维修、城市接管和跨区域战争的工业能力。政治核心可以明确方向并调动人力，但现代入关还需要煤、钢、电、铁路、港口、维修和军工网络提供大规模物质依托。这一工业能力将从满洲进入。

第九章 党、军队、宣传与身份：现代捕获机器注释

[1] 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 年 12 月，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的一部分，见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公开转录：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marxist.org-chinese-mao-192912.htm 。这是一份红四军当时的规范性组织文本，涉及红军政治任务、群众工作、党对军事工作的讨论和决定、决议传达、政治训练等内容；不能仅由这一文本推定全部红军、全部根据地和全部时期均已无折损落实。

返回正文

[2]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选举细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制定。维基文库页面标注该细则 1931 年 11 月于瑞金县制定，1931 年 12 月 1 日起生效，固定版本：https://zh.wikisource.org/w/index.php?title=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選舉細則&oldid=2599558 。

该页面为公开转录而非原始档案影印；细则显示政治—阶级分类进入选举资格、选民登记、剥夺名单和组织审查等规范程序，但不能由一份规范文本推定所有苏区均以同样方式完整落实。

返回正文

第十章　满洲不是后方：工业外骨骼的形成

满洲不是一块只供退守、休整或等待机会的普通后方。一个现代政治核心即便能够捕获、编组和调用人口，也不能凭自身形成足以支撑大军远距离运输、装备、维修、仓储、城市接管和跨区域战争的物质尺度。缺少相应的物质基础，现代捕获机器仍会受制于有限的地理空间。通常所说的后方，往往只意味着前线背后的土地、人口、距离、纵深与临时补给；满洲之所以超出这种普通后方，在于它在战前形成的不是分散资源，而是一套把地下资源转变为持续行动能力的机制。

这种机制即是工业外骨骼。它不是普通工业基础或孤立厂矿的代名词，单一矿山、铁厂或线路各自都只代表局部生产或交通。外骨骼的含义在于，矿物采出之后，动力、加工、运送、储放、维修和防护等环节能够连续接合，把原本分散的能力接到同一具能够承重、移动和重复使用的物质身体上。战前形成的正是这具身体的基础，但它既不等于 1945 年后的原样保留，也不能提前等同于战后的实际接收与调用。

一、煤不是背景，而是网络的起火点

满洲的工业网络不是从钢炉边开始，而是从能源怎样被抽出、运输和分配开始。抚顺煤矿尤其能显示这一点。煤炭开采在当地开始于二十世纪初；到 1937 年，抚顺煤矿的煤炭年产量达到约一千零三十四万吨的峰值。^{[1]}这个数字不代表满洲全域，更不能倒写成 1945 年的生产状态；它所说明的只是，一个可定位的区域能源节点已经能够以相当规模持续输出燃料。

煤的去向更重要。关于抚顺的研究显示，矿煤中相当大的部分售往区域公用事业、铁厂、铁路和航运公司。^{[2]}煤并不是矿区内部的孤立商品。它进入照明与动力设施，进入冶炼所需的高温过程，也进入使机车、船只与运输系统维持流动的燃料链。煤从地下出来以后，并未停留在“资源丰富”这一静止描述里，而是通过公共事业、铁厂、铁路和航运，转化为其他构件能够运转的前提。

抚顺矿区的机械化，同样不能脱离煤炭持续输出所依赖的技术过程来理解。电动或蒸汽钻机、传送带和电动矿车的使用，表明采掘、搬运与动力并不是彼此脱节的手工步骤。^{[3]}机械化本身不是现代化赞歌；它意味着

矿区对机器、维修、能量和组织调度提出更高要求，也意味着煤炭输出已经嵌入一种需要持续维护的技术过程。油页岩的蒸馏利用进一步显示燃料来源并非只限于原煤：采煤废弃物可以被纳入新的燃料生产。不过，油页岩的计划设想、宣传口径与实际产量彼此有别；现有材料能够确认的是存在利用与扩张的方向，并非战时已落实的具体产量数据。^{[4]}

因此，抚顺的重要性不在于可以被夸大为整个满洲的缩影，而在于它显示出工业外骨骼最先需要的条件：能源不是自然堆积物，而是经由机械、运输、企业和用户部门持续接通的流量。没有这样的流量，钢铁、电力、铁路与军工都只能停留为图纸、厂房或局部库存。

二、钢铁与电力

煤炭提供热量与动力，却不能自行变成桥梁、轨道、机器、车辆与工具。钢铁是能源链进入重工业材料能力的关键环节。鞍山昭和钢铁与本溪铁煤的战前生铁记录，能够让这一点摆脱抽象判断：昭和钢铁在 1932 年至 1936 年间的生铁实际产量由二十八万余吨逐步升至四十七万余吨；本溪铁煤在同一时期也有从八万余吨到十六万余吨的实际记录。^{[5]}

这些是实际产量，不是设计能力。产量不能当作储量。同期材料还并列了 1937 年的产能和 1941 年的扩张估计，但后两者绝不能混作已经实现的生产。恰恰是这种区分，让人看清工业外骨骼不是靠夸大的未来数字成立。即使只守住已经记录的 1932—1936 年生产，鞍山与本溪也已表明战前满洲存在持续的生铁制造与扩张方向。煤炭、矿石、动力、设备和运输要在这里相遇，才能把地下资源变成可以用于后续制造的材料支点。

钢铁的意义不在于它单独“决定”战争或政治。没有人可以从几组生铁数字直接推出 1945 年后的资产归属，更不能从钢炉存在推出某支军队取得了多少装备。它所建立的是一个更基础的事实：在煤炭和电力能够供应、铁路能够接通的条件下，重工业材料的生产已不再只靠外部输入。工业外骨骼由此拥有骨架，而不是只有燃料。

在煤炭与钢铁之间，还需要一种能在各环节反复传递的动力形式。1942 年英文版《满洲国年鉴》估计当时满洲现有发电能力约为五十三万千瓦，同时又预期五年计划完成时将升至二百六十万千瓦。^{[6]}这两组数字不能混淆：前者是年鉴所列现有能力，后者只是计划预期，两者都不是实际发电量，更不能据此设想全域已存在无缺口的统一电网。该年鉴出自殖民政权，带有宣传动机，书中所述的前景不能当作独立验证；但即便守住现有能力的审慎口径，它依然证实战前电力已被组织为设施运行与重工业扩张的共同条件。

这表明电力已经不是单一厂矿的附属设备，而是连接矿区、工场、冶炼、维修与城市的动力依托。矿井中的钻机与矿车、冶炼和机器制造、车辆装配与修理、仓储照明以及城市公共设施，都需要持续的动力供应。电力没有取代煤炭，而是使煤炭等能源以不同形态进入工业链条；它也不能保证所有地方

获得同等供给，反而暴露出控制、分配和技术管理的集中化要求。重工业构件正是通过这种动力条件发生联系，而不再各自封闭运转。

三、铁路与口岸仓储

如果能源、钢铁与动力只能停留在原地，它们仍不能成为跨区域能力。铁路使矿区、工厂、城市与口岸进入同一移动体系。战前满洲的铁路并非从零开始：年鉴记载，1931 年、即满洲国建立前，当地已有五千五百七十二公里铁路。^{[7]}这一里程只能证明战前已有线路基础，不能说明 1945 年线路仍然完好，更不能代替战后军运证据；后来的工业网络面对的并不是一片没有线路的空白地带。

货运结构比线路数字更能揭示铁路的作用。矿产和农业产品合计占铁路货运总量一半以上。^{[8]}铁路并非单纯客运设施，也不是城市之间抽象的地理连接；它承担把矿业和生产性资源从产地推向加工、市场与口岸的功能。煤炭进入铁厂，矿石进入冶炼，成品与原料进入仓库，粮食和其他农产进入集散，这些并不必然发生在同一座城市，却能由铁路压缩成可调度的距离。

铁路还改变了工业设施的时间尺度。矿山靠运输取得设备和生活资料，铁厂靠运力取得矿石与燃料，港口则由内陆线路接入稳定货流；反过来，线路、车辆或工场任何一处中断，都会使整个链条失去节奏。因此铁路不是煤、钢、电之外的又一项部门，而是让前三者能够跨过地域、彼此发生作用的骨架。

铁路把资源送到节点，资源却还不能因此随时调用。货物还要经过卸载、分类、暂存和重新分配，并在陆运与航运之间转换；港口和仓储使这些工作成为可以日常反复进行的制度化能力。当时的材料记载得很明确：大连港区及码头建有仓库七十座，面积超过三十八万五千平方米；连同三个主要铁路车站的不少于一百九十九座仓库（面积十五万四千平方米），这些仓库年处理货物超过一千一百六十万吨。^{[9]}

一千一百六十万吨说的是上述港区与主要车站仓库的处理量，不是大连港总吞吐量，也不能专属大连港区的七十座仓库。七十座码头仓库也不能代表港口的全部设施。把口径分清后，数字能够说明的仍然很具体：大连并非只有水面和码头的地理出口，货物可以在港区超过三十八万五千平方米的仓储设施内大规模停留、处理，再作分派。矿产品、工业原料和制成品抵达口岸后，必须经过这样的空间，才能从铁路货物转化为可装船、可等待、可交割、可再次发送的物资。

仓储并不显眼，却决定这张网络能否承受各环节之间的时间差。生产和运输未必同步，列车到站也未必赶上船期，战争与市场还会改变货物的去向。煤、钢和机器若只能在到达的当下立即处理，网络就没有调整节奏、形成库存和重新分派的余地。工业外骨骼并非永不停顿的流水线；让物资有序停下来，同样是它不可缺少的关节。

四、车辆维修与军工制造

线路铺成以后，车辆能否持续使用，仍决定运输网络能不能维持。机车、客车和货车一旦损坏便只能等待外部替换，铁路就只剩下一条一次性通道。南满铁路工场 1908 年设立，1911 年开业，业务目标包括车辆制造、装配和修理；同期材料还记载，它可同时容纳二十七台机车、三十六辆客车和一百三十辆货车。^{[10]}

二十七、三十六和一百三十这三组数字，只说明工场能够同时容纳多少车辆，不能当作年度修理量，更不能当作某一年实际完成的维修数。这些数字能确认的内容很明确：战前交通网络已经设有专门从事车辆制造、装配和修理的工场。维修不是运输的附属服务，而是线路、动力、材料和货流持续协作所需的再生产条件。机器进入煤矿、铁路、港口和兵工以后，维护能力便不再是事后补丁，而成为工业外骨骼本身的一部分。

维修本身把钢铁、工具、电力和技术劳动接在一起。车间需要材料、机器工具和动力，修理人员需要标准、配件与组织；车辆修好后重新回到线路，又把煤、矿石、粮食、机器和仓储货物带回循环。铺好的钢轨只提供通道。工场能够反复使车辆恢复使用，铁路才成为可以延续的运输能力。

工业外骨骼不是军工网络。可若没有兵工和火药制造，材料、动力与运输进入军事用途便少了关键接口。同期材料记录了奉天兵工厂的战前业务：经营武器、弹药、火药及其原料，同时制造和修理各类机器工具。火药主要在抚顺火药厂与奉天相关兵工设施制造；面对工业计划特别是矿业开发带来的需求，两处设施即使处于满负荷状态，仍不能满足需求。^{[11]}

这些材料的证明力止于上述事实。现有材料没有提供武器型号、具体产量、订货数量、交付对象和 1945 年库存；“满负荷”也不能换算成某种确定的成品规模。设施、制造业务和需求压力确实存在，却不能由此倒推出后来已经发生军事调用。边界划清以后，军工的位置反而更明确：战前满洲的网络不只能够采煤、炼铁和运货，也已经出现了把原料、火药、机器工具、修理业务与武器弹药制造置于同一工业体系内的明示接口。

军工不能成为提前写定后续战争史的捷径，它在工业外骨骼中承担的是关节作用。能源和材料支撑机器，机器工具能够制造和修理，铁路运送物资，仓储组织集散；兵工业务由此表明，这套物质网络已经触及明确的武器与弹药生产领域。设施在战后怎样被接收、恢复、改造和调用，仍须由相应证据证明。

五、殖民统治没有被工业能力抵消

工业外骨骼不是从自由交换中自行长成的，它的路线、动力和优先次序由殖民统治的政治目标塑造。南满铁路不只经营轨道运输，还直接进入与铁路发展相连的产业；满洲国行政体系则处在日本官员和关东军的最终监督之下。<sup><a href="#MC010-

n14">[14]</sup>网络连接从来不是中性的技术事实：资源流向哪里，哪些工场优先取得原料，哪些城市被纳入主干线，何种生产被认定为战略需要，都带着殖民权力的方向。

抚顺的劳动结构把这层关系暴露得很清楚。1937 年，中国工人约占矿区劳动力的九成，在正式劳力中却只有三成多，在熟练工中所占比例更是极小；日本人与中国正式雇员之间还有显著工资差距。^{[12]}这是抚顺矿区的证据，不能代表满洲所有行业，也不能扩展成一张无差别的社会总表。它足以证明，工业网络所需的技术、管理和劳动并不是在平等条件下组织的。矿井的机械化、煤炭的输出和企业的扩张，也依赖隔离、等级、监督和对劳工的控制。

殖民工业的“效率”带着暴力成本。承包人招募采煤、爆破、搬运和支护所需人员，这些人受日本坑长监督；专业与管理职位则长期由日本人占据。^{[13]}不能据此断言所有中国工人都没有技术，也不能把日本人员放在同一个权力位置。材料真正揭示的，是更高位置、培训门槛、工资差别和监督链掌握在谁手里。工业外骨骼不是一副自行运转的钢甲，它由具体的人背负；殖民统治通过制度把不同的人放进不平等位置。

统制也从未保证它所承诺的效率。1937 年以后，私营商户被纳入组合，政府试图控制原料和商品分配，短缺、低利润和规避采购却没有消失。^{[15]}这些反例把边界划得很清楚：工业外骨骼不是一台毫无阻力的总动员机器。它可以拥有强大的物质能力，同时受困于瓶颈、资源争夺、行政强制和市场失序。这里所说的是能够接合的能力结构，不是完美秩序。

殖民统制还把人口纳入网络。依照户籍规范，警察须定期记录职业、迁移和身份，实际实施随机构而异^{[16]}；商业组合控制原料与商品的去向，企业与承包链则把劳动力编进采掘、运输和加工。这些机制不是第九章所说的现代捕获机器，也不能据此把满洲社会提前写成另一种政治核心的成品。它们说明，工业设施从来离不开科层、登记、劳动控制和资源分配。煤、钢、电和线路要成为现实能力，必须有人被定位、被监督、被训练、被支付或被剥夺。物质网络始终带着组织的阴影。

这套物质网络形成于日本殖民统治、关东军控制、种族等级与劳动压迫之中，其工场、铁路和发电设施真实存在，也明确服务于侵略、资源掠夺与等级统制。

面对这一历史事实，两种简化都站不住脚：把殖民设施神圣化并视作侵略的辩护，是将能力误作道德；因痛恨殖民压迫而否认工业设施的实体性，则是将道德误作事实。满洲工业外骨骼的历史性质恰恰在于，它是压迫性统治建成的客观能力结构，也是无法被主观愿望一笔勾销的现实条件。

六、网络的尺度不在数字相加，而在相互依赖

工业外骨骼的尺度存在于各环节的相互依赖之中。煤矿离不开钻机、矿车、传送带和线路，设备还要有动力与维修；铁厂需要燃料、矿石、运输和连续供给；电力设施要靠燃料或水力、建设材料、技术管理和用户部门；铁路要有钢轨、车辆、工场、燃料和调度；港口要接住线路送来的货物，并由仓库完成接纳与转运；兵工同样需要原料、机器工具、动力和运输。每一环都要依靠别的环节才能发生效力，不能被当成单独站立的资本项目。比起一串最大产量，这种关系更能说明满洲为什么不是普通后方。

外骨骼改变的还有能力延续的时间。分散的地方武装或地方工场，短期内也许能够取得武器、粮食或劳力，却难以长期承担运输、反复维修、持续供给和城市规模的资源集散。工业网络并非不会损坏，它的不同之处在于，已经具备把损坏纳入修理、把到达纳入仓储、把原料纳入加工、把货物纳入运输路线的组织条件。能力不必每次从零开始，现代物质尺度的核心正在这种重复性。

正是这些环节的连接，缩短了资源从地下、工场和仓库到下一次生产与运输之间的断裂。满洲之所以重要，在于这种可重复的连接已经存在，而不只是因为它位于任何政治核心的背后。

可重复不等于完整，更不等于一套没有摩擦的统一系统。年鉴里的规划带有夸耀和动员目的，现代研究中的区域个案也不能代替整个满洲。煤炭流入区域部门，不足以证明每座工厂都有充分燃料；铁路货运结构显示资源性货物的重要，却不能证明每条线路随时畅通；仓储规模证明集散能力，并不说明所有货物以同一速度出入；兵工业务存在，也代替不了产量和交付档案。工业外骨骼从来不是无所不能的巨人。它是一套战前已经形成的能力关系，同时受瓶颈、等级、统制和破坏风险限制。

战前已经有一组能够彼此接合的物质构件，资源、动力、材料、运输、维护和军工业务由此组成了超出单一厂矿的能力身体。这具能力身体同第九章所写的现代捕获机器相遇以后，满清共产主义的不可拆分性才显露出来。党、干部、军队、宣传和身份，不是一段可以孤立叙述的组织史；煤、钢、电、铁路、港口、维修和军工，也不是一段与政治无关的中性工业史。前一组关系显示政治核心如何编组、命名和调用人，后一组则说明现代规模的能力已经在怎样的物质网络中出现。两者并非事后彼此“影响”，而是满清共产主义得以生成时必须连接的两种条件。

七、战前基础不是战后接收

战前已经形成工业外骨骼的事实基础，并不意味着它到 1945 年仍保持原状，更不意味着它已经完整落入中共手中。1937 年的煤炭峰值不是 1945 年的煤矿状态，1932—1936 年的生铁实际产量不是战后钢厂清单，五年计划中的电力预期也不能替代实际设施；铁路里程、工场容量和仓储处理量同样不能证明战后的线路、车辆、港口或仓库由谁掌握。

苏军进入、拆运、资产接收、电力和铁路修复、日籍技术人员去留、原有熟练工重新任用、兵工产品与库存，以及东北野战军的实际装备来源，都须分别由证据确认。满洲国工业—东北野战军—中共入

关在理论上构成一条强因果链；中间环节尚待证明，并不直接构成对这一链条的反证。战前基线已经确定，接收、修复、人员重编和军事调用仍须逐项落实，不能把部分事实或战前基线直接等同于整条因果链的完全证实。

“满洲不是后方”并不是说它在战后自动完成了全部作用。这个判断指向的是战前已经建成的一具物质身体，正是它使后来军事、工业和组织能力的跃迁成为可能。谁进入这具身体，怎样重新赋位，又怎样把它纳入新的政治命令，必须由战后的证据回答。这具身体本身却并非凭空出现。

组织性已经出现，但还不能把技术人员写成一支已被任何后来政治力量接管的队伍。工业外骨骼不只是物件排列，它依赖专业岗位、劳动层级、教育门槛和行政统制。工业外骨骼不能悬在抽象空间里，煤矿、钢铁、电力、铁路、港口、仓储、车辆工场和兵工设施，终究分布在具体城市之中，也同技术人口、教育训练、研究机构、企业空间和组织化社会相连。不同城市承载的功能并不相同，一个抚顺或一个大连都不足以概括整张网络。

工业外骨骼怎样进入城市，要分别看新京、奉天、鞍山、抚顺、大连、哈尔滨：它们怎样在各自位置上承担行政、工业、资源、港口、铁路、市场与知识组织的任务；技术人员、熟练工、学校与研究机构怎样使物质网络获得社会载体；殖民隔离、企业空间和组织人口又怎样把能力与压迫同时固定下来。把这些关系落到城市，工业外骨骼才不再只是材料、动力和运输的连接；它怎样进入一套组织化社会，也由此显出具体形状。

第十章　满洲不是后方：工业外骨骼的形成注释

[1] Duncan Money and Limin Teh, “Race at Work: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Mining Labor and Empire on the Central African Copperbelt and the Fushun Coalfields, ca. 1907–1945,”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 no. 101 (2022), pp. 103–104, DOI: 10.1017/S0147547921000132。该文将抚顺 1937 年煤炭年产量峰值记为 1,034 万吨；这是抚顺个案的实际年产量，不代表全满洲，更非 1945 年状态。

返回正文

[2] Money and Teh, “Race at Work,” p. 104。该研究记述抚顺煤炭产量的 77%售往区域公用事业、铁厂、铁路与航运公司；销售去向并不等于这些部门的实际产量。

返回正文

[3] Money and Teh, “Race at Work,” pp. 105–106。文中所列电动、蒸汽钻机、传送带和电动矿车说明抚顺矿区存在机械化采掘与运输设备；不能外推整个满洲矿业。

返回正文

[4] Money and Teh, “Race at Work,” p. 104；*Manchoukuo Year Book 1942*, Hsinking: Manchoukuo Year Book Co., 1942, “Petroleum Industry,” pp. 556–557。前者说明采煤废弃

油页岩经蒸馏形成燃料来源；后者属殖民政权同期官方资料，所述商业化与扩张计划不能直接当作实际产量验证。

返回正文

[5] *Manchoukuo Year Book 1942*, table on pig iron production and capacity, pp. 492–493（英文原表）。该同期官方年鉴分别列出鞍山昭和钢铁与本溪铁煤 1932—1936 年的实际生铁产量、1937 年的能力和 1941 年的扩张估计；实际产量、设施能力与扩张估计属于三种不同统计口径，不得混同。

返回正文

[6] *Manchoukuo Year Book 1942*, “Electric and Gas Industries,” p. 557。殖民政权同期年鉴将约 53 万千瓦的现有发电能力与五年计划完成时 260 万千瓦的预期并列；二者不是同一统计，更不能等同实际发电量。

返回正文

[7] *Manchoukuo Year Book 1942*, “Railways,” pp. 577–578。该同期年鉴记载满洲国成立前已有五千五百七十二公里铁路；这一里程只证明战前线路基础，不能说明 1945 年线路状态或战后可调用程度。

返回正文

[8] *Manchoukuo Year Book 1942*, “Railways,” p. 590。年鉴所列货运分类显示，矿产与农业产品合计占铁路货运总量一半以上；原表具体吨数存在残损，资料能够稳定辨识的是分类比例，而非完整吨数。

返回正文

[9] *Manchoukuo Year Book 1942*, section on warehousing and Dairen port facilities, pp. 268–269。同期官方材料分别列出大连港区七十座仓库、面积逾 38.5 万平方米，以及三个主要铁路站不少于 199 座仓库、面积 15.4 万平方米；一千一百六十余万吨为上述仓库的年处理量，不能只归给大连港区七十仓，也不是大连港总吞吐量。

返回正文

[10] *Manchoukuo Year Book 1942*, section on South Manchuria Railway workshops, p. 550。材料说明工场的车辆制造、装配与修理业务及同时容纳容量；容量不等于年度维修量。

返回正文

[11] *Manchoukuo Year Book 1942*, sections on military industries and explosives, pp. 550, 552–553。同期官方材料支持奉天兵工厂的武器、弹药、火药、原料与机器工具制造修理业务，以及

相关火药制造的需求压力；不能据此推出型号、产量、库存、交付或战后使用。 年鉴第 553 页所说的是火药主要生产地点，并非这些设施全部业务中火药所占比重；该段需求背景包括工业计划，特别是矿业开发。

返回正文

[12] Money and Teh, “Race at Work,” pp. 108, 113–114。作者讨论抚顺劳力中的正式、熟练岗位与工资差异；这些是矿区个案，显示殖民等级，并不构成满洲所有行业的总表。

返回正文

[13] Money and Teh, “Race at Work,” pp. 106–107, 113–114。研究记述矿区专业管理职位和承包劳动控制的结构；材料说明殖民劳动关系，不推断战后人员去向。

返回正文

[14] Prasenjit Duara, “The New Imperialism and the Post-Colonial Developmental State: Manchukuo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Japan Focus*, vol. 4, issue 1 (2006), article 1715, DOI: 10.1017/S1557466006003925；*Manchoukuo Year Book 1942*, “Railways,” pp. 577–598。前者说明满洲国行政体系处于日本官员及关东军监督之下；后者记载南满铁路对铁路系统的经营及其相关产业活动。二者支持殖民统制下的网络方向，不支持任何战后接收结论。

返回正文

[15] Qiunan Li, *Everyday Life in the Puppet State: A Study of Ordinary People’s Experiences in Manchukuo*,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2018, pp. 136–138。该研究根据地方志、报刊和制度资料讨论 1937 年后商业组合、原料与商品分配，以及短缺、低利润和规避采购；统制目标不能等同实际供给效果。

返回正文

[16] InYoung Bong, *Destabilizing “Racial Harmony”: Hybridity, Nationality, and Spatiality in the Law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of Manchukuo*, PhD dissertation, Cornell University, 2010, pp. 44–46，尤其第 46 页注 82。该论文转引 1937 年《满洲国法令辑览》中的户籍规范及说明，讨论警察定期记录职业、迁移和身份，以及治安、居住证明和身份证件的关系；论文明确指出，实际实施随不同机构的应用而异。规范要求不等同于具体执行，制度文本本身也不构成全境一致落实的证明。该材料为论文对规范文本的转引，非 1937 年法规原件。

返回正文

第十一章　六座城市与组织化社会

一、工业外骨骼的社会身体与城市节点

工业外骨骼要成为现实能力，不能仅凭上一章讨论过的煤、钢、电、铁路、港储、维修与军工等物质构件；物质构件不会自行开采、冶炼、调度或运输。任何工业网络都必须取得社会身体，把人放进岗位，把岗位放进企业，把企业放进城市。矿工、炉前工、司机、检修人员、工程师、绘图员、仓储人员、教师、研究者、职员、警察和管理者等角色进入不同环节，由训练、记录、工资、等级、交通和行政命令维持运转；学校提供训练入口，企业规定正式雇佣与晋升，研究机构生产调查与计划知识，铁路和城市则不断吸收、筛选和移动人口。城市不是工业之外的背景，而是外骨骼取得空间位置、人员承载、技术分工、交通接口和行政方向的具体节点。

工业能力的持续存在，要求具体的空间落点与分工安排。煤矿需要工人进入井下，也需要工场、住宅、运输和管理部门围绕矿区聚集；钢铁生产需要炉体、矿石、燃料、铁路和技术劳动在同一节点持续相遇；港口需要仓库、车辆工场和学校，使货物可以停留、机车可以修理、人员可以训练；行政统制则需要机关、档案、警察和交通，把命令送入不同企业和城市。机器安装之后，必须将操作、保养、配件、检验和训练一同组织起来，才可能反复进入生产；车站建成之后，也必须依靠货物、时刻、仓储、换装、维修和人员调度形成相互依赖的安排，地图上的线路才会变成流动能力。城市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使工业能力取得社会化的形式，而不是在工业之外另加一层抽象的社会影响。

这种社会化同时让工业网络的权力方向变得可见。工业外骨骼从来不是中性的钢铁结构：行政机关决定规划和许可，企业划分正式工与合同工，学校设置进入技术岗位的门槛，警察和户籍制度记录人口与迁移，企业住宅又把不同身份的人分进不同空间，殖民统治的等级由此被嵌进岗位、居住、教育和资源分配之中。组织化社会在这里仅指一个受控事实：工业网络已经不只依靠物件，还依靠被安置在城市、企业、学校、研究机构、交通部门、技术岗位、行政层级和劳动关系中的人口。这不表示整个满洲已经被一个中心完全控制，不表示所有线路与城市无缝协同，更不表示战前人口已经等待后来政权接收。组织化可以同短缺、流动、抵抗和失序同时存在；被登记、被雇佣或被监督，也不等于真诚认同殖民秩序。

新京（今长春）、奉天（今沈阳）、鞍山、抚顺、大连和哈尔滨不能被排成六个同质的“工业城市”例子。它们的产业规模、交通地位、行政权力和教育能力各不相同，也没有共同完成一条整齐的六阶段流程。行政、能源、钢铁、机械、军工、港储、维修、市场和知识组织被放置在不同空间中，使工业外骨骼获得了功能各异的节点。^{[1]}六城的历史意义正体现在这些差异之中。

这些功能分工表明六城具备接合条件，却不等于它们已经组成一个完美协调的统一系统，也不意味着网络中的权力分布均匀。铁路能够连接城市，线路也可能中断；行政首都能够发出命令，仅凭首都身

份却不会自动取得对每个工业节点的有效控制；仓储可以缓冲运输时间，不能消除短缺；学校提供训练入口，也不保证培养目标实现。决定行政规划的城市未必掌握煤与钢，生产钢铁的城市未必拥有港口，承担港储和维修的城市也未必决定资源最终流向。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独占整具外骨骼，掌握线路、计划、技术标准和资源分配的机构则会取得更高影响。现有材料能够确认这种不对称分工、功能位置和依赖关系，不能据此画出一张已经完成的中央控制图；正是摩擦、限制与差异，使它们成为真实的物质网络节点，而不是宣传模型。

二、新京与奉天：行政与工业空间

新京是一座政治—行政城市。同期殖民政权年鉴把它列为满洲国首都和南满铁路主线北端，记载这里的线路分别通向图们、哈尔滨和白城子；机关目录中，宫廷、国务院系统、司法、经济、工业、交通、金融机构以及关东军司令部等设施也集中在这里。^{[2]}行政方向、铁路连接和机构空间由此汇到一处。材料能证明这种集中，却不能据此断言首都已经对全部工业网络实行有效而均匀的控制。

年鉴把截至 1941 年 7 月底的新京人口记为五十二万七千四百四十五。这个同期数字受殖民政权采用的城市边界和分类口径限制，只能说明材料记录中的城市规模，不能当作无争议的完整常住人口。^{[3]}人口数字之外，更能显示城市位置的是年鉴对其功能的记载：新京并非重工业城市，而被预期成为轻工业中心；商业学校、女子职业学校、工业补习学校等教育设施也被列入目录，新京又处在多条铁路的交点上。^{[4]}

新京在工业外骨骼中不直接承担鞍山式的钢铁生产，也不围绕矿井组织抚顺式的劳动力；行政、交通、轻工业和训练入口在首都空间相遇，才是它的作用。机关需要职员和记录，铁路离不开调度与通信，学校构成进入某些职业的制度门槛，轻工业和市场则把行政城市同日常物资联系起来。学校存在并不能推出毕业规模，机关集中也不能证明每项政策都被顺利执行。新京是行政—交通—教育节点，不是一个能够自动支配全满洲的万能中心。

奉天的城市结构不同于新京。同期年鉴把铁西标为重工业活动集中的区域：工业用地约二十四平方公里，进入其中的大型工业企业超过一百家；城市产业还包括豆油、纺织、武器、机械和化学制造，并由奉天—大连线及支线网络连接。^{[5]}这些数字出自殖民政权年鉴，不能证明所有企业都在持续、高效地生产，也不能代替企业档案；但它们足以把奉天确定为重工业、机械、化学和兵工设施并存的城市节点。

按该年鉴口径，奉天 1940 年人口为一百三十万七千九百九十三。这个数字只显示年鉴记录的城市规模，不说明工业人口比例，更不能拿城市人口反推技术人员数量。^{[6]}铁西的关键，在于它把工业土地、企业、铁路和城市劳动力放进同一空间。重工业区不是厂房数量的简单堆积：机械制造需要材料、动力、图

纸和工人，化学工业需要原料和安全控制，兵工设施则需要机器工具、修理和铁路运输。钢铁、交通、维修与军工接口由此在奉天取得了城市承载。

大型企业离开厂门，仍然需要住宅、市场、运输、治安和行政服务，铁西的城市意义也在这里。企业数量不能直接证明劳动关系已经稳定，更不能说明工业周围已经形成平等的城市生活；它只表明生产设施密集到了必须依赖城市尺度的土地安排、人口供给和交通组织。奉天的重工业节点既是生产空间，也是大量不同岗位被放进同一城市节奏的社会空间。

殖民年鉴还记载，奉天兵工厂经营武器、弹药、火药及其原料，同时制造、修理机器工具。^{[7]}现有材料不能支持任何具体武器型号、产量、库存和交付对象，战前的业务记录也不等于战后实际调用的证据。能够确认的是，奉天的重工业城市空间中存在明确的军事制造接口，这一接口依靠机械、化学、铁路和技术劳动共同维持。奉天因此不是一般的“工业城市”，但也不能把整座城市写成一座没有民用生产、市场和社会摩擦的兵工机器。

三、鞍山与抚顺：钢铁依赖与企业城

鞍山的中心不是行政和港口，而是矿石、铸造与钢铁。同期年鉴估计当地铁矿储量约六亿吨，并记载 1909 年发现矿藏、1917 年建成铸造设施，后来由昭和钢铁经营。^{[8]}六亿吨只是当时材料中的储量估计，不是实际产量，也不等于全部可开采资源。1932 至 1936 年的生铁实际产量另有记录；钢铁生产怎样塑造鞍山这座城市，还要从随之形成的一整套组织依赖中看。

炉体不会孤立运转。矿石必须被开采和运入，煤与电力必须持续供给，设备需要检修，工场需要技术劳动，成品又要通过铁路离开。围绕昭和钢铁形成的鞍山，因而不是“有一座钢厂”的地理名称，而是矿山、冶炼、运输、企业空间与劳动分工相互牵制的城市节点。任何环节停顿，都可能让高炉、运输和后续制造同时失去节奏。

这种依赖也划出了证据边界。储量估计不能替代实际生产，战前生产不能说明 1945 年的设备状态；城市围绕钢铁形成，也不能据此断言设备后来是否被拆运、工人是否留在原岗、生产何时恢复。鞍山呈现的是工业外骨骼的钢铁构件已经取得城市形态：材料生产不再只是统计表上的数字，而要求一整套空间、岗位和技术关系持续存在。

工业能力怎样同时生产城市、技术岗位和殖民等级，在抚顺表现得最清楚。煤矿开采吸引人口进入矿区，扭转了当地人口下降的趋势，也使中国矿工把前进寨从村落扩展为城镇。满铁接管煤田后，又设计、建设了新城和永安台企业城；永安台 1924 年开工，1932 年完成，并以分隔的居住区把日本人与中国工人放进不同空间。^{[9]}

企业城不是平等的工业共同体。研究显示，满铁只为正式雇员提供住房，而多数中国工人属于合同劳工；日本雇员自动取得住房资格，中国雇员则须工作三年以上并保持所谓“模范行为”，即使获得住房也住在分开的建筑中。^{[10]}企业空间在这里同时承担生产、筛选和隔离：它把劳动者拉近矿井和工场，也用雇佣身份、行为评价和种族等级决定谁能获得住所、福利与稳定位置。

抚顺的技术结构不能被压成“中国人没有技术、日本人掌握全部技术”的粗糙二分。1921 年的分类数据显示，中国工头四十二人、日本工头二百三十四人；低级技术岗位有中国人一万七千五百八十四人、日本人二千三百七十八人。到 1937 年，中国中级技术岗位由 1926 年的零增加到三千六百四十八人。^{[11]}这些数字只适用于该研究采用的抚顺矿区分类。它们既说明中国工人确实进入了技术岗位，也说明技术位置的增长没有消除监督权和职业阶梯中的殖民偏向。

正式雇佣是关键门槛。研究指出，参加监工考试、获得内部晋升以及取得技术教育资助，都以正式雇佣身份为前提；大多数中国工人却被置于合同劳动。1937 年，中国工人约占抚顺劳力总数九成，却只占正式劳力三成四和熟练工约百分之七。^{[12]}熟练工比例不能代表全部技术人口，中国中级岗位人数增加也不等于权力平等。工业扩张确实需要更多中国技术劳动，殖民企业却仍能通过正式身份、训练机会、住房、工资和管理职位，把这种增长锁在不平等结构中。

劳工控制还通过承包关系进入日常生产。中国承包人负责招募采煤、爆破、搬运、支护和非熟练工，受日本坑长监督；企业教材甚至要求承包人依照日方指令管理工人，并与劳务部门一起监督他们的行为和思想。^{[13]}这些材料只涉及矿区劳动控制，不能充当全满洲劳工制度的总表；但它们已经清楚显示，组织化不等于自愿认同。工人可以被编进高度细密的劳动科层，也可以流动、抵抗和离开。企业可以把管理伸得很深，并不等于它也获得了人的内心。

抚顺由此成为一个重要反例：工业能力可以增长，城市可以扩张，技术人口可以形成，而技术权力、居住条件和晋升机会仍由殖民等级塑造。否认这种能力，会看不见工业外骨骼的社会身体；把它写成文明恩惠，又会看不见这具身体由谁背负、谁被排除在高位之外。

四、大连与哈尔滨：海陆门户与北满枢纽

大连的城市功能来自海陆转换。同期年鉴把它写作贸易港和自由港，并记载南满铁路主线由此起始；同一材料还列出技术学校等教育设施。^{[14]}“自由港”只是一种港口制度定位，绝不表示大连是自由社会。港口、铁路和学校都处在日本殖民统治与关东州制度之下，贸易能力不能抵消统治性质。

港储同铁路维修、人员训练的结合，构成了大连的复合节点。货物由内陆线路抵达，需要卸载、分类、暂存和转运；机车与车辆要持续使用，需要工场承担制造、装配和修理；技术学校则为人员训练提供制度入口。^{[15]}材料支持大连的码头仓库与仓储面积，而年处理量统计还涉及铁路站仓，不能当作大连单地的仓储量；仓储处理量不是港口总吞吐，工场同时容纳容量不是年度维修量，学校存在也不是毕业人数。

同期年鉴把大连 1941 年人口记为六十九万零八百四十六。^{[16]}这个数字只能说明年鉴记录中的城市规模，不能拿来推算港口工人、技术人员或学生人数。港口把满洲工业网络接上海运，仓储使货物流动能够停留和重新分派。这些能力在同一城市相遇，使大连区别于鞍山式的钢铁城市或新京式的行政城市，成为工业外骨骼的物流、维护与训练关节。

哈尔滨的功能不能用重工业产量来衡量。同期年鉴记载，五条铁路在这里汇聚，分别通向新京、绥芬河、满洲里、黑河和吉林；松花江航运又把城市接入另一套交通方向。年鉴还把哈尔滨列为北满大豆和高粱的重要集散中心，并提到油脂、面粉等生产。^{[17]}这些事实能够确定哈尔滨的交通—市场节点位置，却不能证明线路始终畅通，也不足以构成北满完整经济总量的证据。

哈尔滨的知识机构又把它同大连、奉天区别开来。同期院校目录列有哈尔滨农业学院、工程学院、医学院及其他高等教育机构。^{[18]}这些学院的存在说明工程、农业和医学训练在城市中有了组织入口，却不能据此推出招生、毕业、技术成果或就业去向。仅凭校名，无法判断知识机构实际发挥了什么作用；现有目录只能证明，这座城市除了运送货物和聚集市场，也把某些专业知识的训练放进了制度空间。

哈尔滨由铁路、江运、农产品市场和学院共同构成北满节点。交通带来货物与人口，市场使农产品进入交换和加工，学院则提供专业训练的可能。它与奉天的重工业、鞍山的钢铁、抚顺的能源和大连的海港功能不同。六城网络的意义正是在这种不对称中出现：没有哪一座城市拥有全部能力，也没有证据表明一切差异都被某个中心无摩擦地消除。

五、技术人口与知识组织

城市人口增长不会自动生成技术人口。人进入矿区，可能只是短期合同劳工；进入工厂，也可能长期停留在被定义为非熟练的岗位。技术位置要求训练、考试、正式身份、工作经验、语言能力、图纸和标准知识，也要求企业愿意开放晋升通道。谁能够取得这些条件，不是纯粹由个人能力决定，而受雇佣制度与殖民等级支配。

抚顺材料把这种差异展示得最清楚。至少百分之八十的中国熟练工在 1940 年的企业调查中已在矿工作五年以上，而非熟练中国工人的平均雇佣期仍不足六个月。^{[19]}这说明同一矿区同时存在长期积累经

验的熟练群体和高度流动的短期劳力。人口移动不是稳定定居，长期工作也不是平等晋升；但工业能力要延续，确实需要某些人把经验留在岗位上。

技术人口因此是一种制度性位置，而不是城市人口中的天然类别。工程师、坑长、冶金师、地质师、司机、绘图员、检查员和维修人员拥有不同知识与权限；正式工、合同工、熟练工和非熟练工又被放进不同福利、工资和晋升通道。若把所有人笼统称为“工业人口”，便会同时遮蔽真实能力和真实等级。

技术人口也不是政治上同质的队伍。掌握机械、工程或管理知识，不会自动带来相同的政治立场；在殖民制度中取得岗位，也不证明个人认同殖民统治。现有事实只能确认这些岗位、经验和训练关系在战前存在，不能把其中的人预先写成后来任何政治力量的现成资源。

技术能力不只在工场内积累，学校和研究机构也为它提供制度入口。同期年鉴在回顾 1929 年教育统计时，列出职业学校五十六所、学生三千五百二十三人，大学和学院九所、学生三千六百一十七人。^{[20]}这组数字是殖民政权年鉴对前政权教育的同期转述，材料本身带着贬低旧教育、抬高自身政策的宣传方向。它只能作为教育机构与在校人数的单源基线，不能用来证明工业技术教育的实际效果。

满洲国时期的院校目录列有哈尔滨、奉天和新京的工程学院，大连有技术学校，新京和哈尔滨另有医学等高等教育机构。^{[21]}新京 1933 年设立的教师训练学校实行三个月课程、每批一百人，但这只是教师训练，不能被改写成工程师培养规模。^{[22]}学校存在、课程长度、招生人数、在校人数、毕业人数、能力形成和就业去向属于不同事实，不能互相替代。

研究机构以另一种方式组织知识。现代研究记载，满铁调查部在高峰时期约有二千三百名研究人员，并因承担日元区经济计划而急剧扩张；一些左翼学者为关东军和满洲国政府提供研究，并参与五年计划制定。^{[23]}约二千三百人只指满铁调查部高峰时期，不是全满洲研究人口；来源没有说明时，也不能把他们固定到某一座城市。参与计划不等于计划完成，左翼身份也不能说明研究者拥有共同政治立场或共同战后去向。

工业网络要运转，除了操作机器，还必须了解资源、运输、市场、人口和生产条件，调查、统计和计划知识由此进入工业外骨骼。研究机构把区域对象转化为报告、分类和规划，使行政与企业能够据此分配注意力和资源。这样的知识生产处在殖民权力之下：研究可以有专业价值，也可以服务关东军与殖民政府。

六、人口迁移与身份登记

六城的组织人口并非都在当地自然增长。二十世纪前期，铁路、矿山和工厂就业与火车、轮船运输推动华北人口进入满洲。研究指出，大量迁移者为修铁路、进矿山和工厂、开垦土地或种植大豆而来，多数乘火车或轮船；他们常以合同劳工或私人关系网络移动，最终落点更多受雇主而非个人自由选择影响。^{[24]}

这类迁移既不能写成单纯城市化，也不能写成稳定定居。有人进入城市，有人进入矿区或农村，许多人季节性往返。抚顺非熟练工雇佣期很短，正说明人口可以被迅速吸入生产，又迅速离开。组织化社会并非把所有人永久固定，而是能够把流动人口暂时放进合同、工种、线路、宿舍与监督关系。

人口流动也改变了城市与企业的边界。矿山和工厂取得劳力，不只依靠固定居民；承包人、亲缘和同乡网络把远方人口接入特定岗位，铁路和轮船则让这种接入得以反复发生。企业由此获得可补充的劳力来源，迁移者面对的却常是雇主决定的落点、短期契约和不稳定居住。城市规模不能直接等同于稳定的社会整合：一座城市可以迅速吸收人口，同时保留高度流动、分层和排斥。

登记制度还试图把人口变成可识别对象。关于满洲国户籍制度的博士论文转引 1937 年法规及其说明，指出警察定期记录人口、职业、出生、死亡、迁移和其他社会状态，并将这些记录用于治安管理，同时作为居住证明和身份证件签发的基础；一般检查与特别关注对象的检查频率并不相同。^{[25]}这些规范文本显示了身份技术，却不能证明所有地方都以同样方式执行。该研究也明确指出，具体实施会因不同机构的应用而变化。

户籍、身份证件、企业合同、正式雇佣和住房资格共同显示，工业网络中的人不只是一个总人口数字。他们被记录为职业、迁移者、正式工、合同工、熟练工、学生、职员或特别监督对象，并据此获得或失去某些资源。可是，被分类不等于完全被控制；规范存在不等于实践一致；人口被组织也不等于接受组织为自己规定的政治意义。

七、殖民统治与能力事实

如果把学校、工程师、研究机构和城市规划单独抽出，满洲很容易被写成殖民现代化的展示厅。六城中的工业和组织能力形成于日本侵略与殖民统治之中，行政体系处在日本官员和关东军的最终监督之下；抚顺的管理职位、住房、工资和训练机会沿种族等级分配；企业承包链监督劳动者的行为与思想；户籍和警察把人口、职业与迁移纳入治安控制。^{[26]}

因殖民统治的罪恶而将城市、学校、技术岗位和研究机构一概判定为虚构或宣传幻象，在事实上并不成立。前文所考察的各城能力、工业依赖、企业城分层、交通维修、重工业区以及知识机构，都有具

体可定位的事实基础。否认这些实体，就无法解释工业外骨骼如何获得人员、知识和空间，也无法解释后续历史为什么必须面对这些客观存在的遗产。

工业能力与组织能力真实存在，却不为殖民统治提供正当性。铁路可以提高运输能力，也可能被用于资源掠夺和侵略；学校在训练人员的同时，也能设置政治与种族门槛；研究可以积累知识，也可能为关东军和殖民计划服务；企业城既能维持生产，也能把劳动者放进隔离和监督。能力是事实，不是道德；谴责是政治判断，也不能替代事实。

共产主义的革命正统叙事不能替殖民统治作选择性的历史清洗。对一种压迫结构的反对，不能要求把另一种压迫结构留下的物质和组织能力说成不存在；同样，承认这些能力，也绝不意味着接受后来任何政治力量对其占有和调用具有正当性。把附着于侵略、资源掠夺与等级压迫的工业能力赞美为文明，会抹去殖民统治的压迫事实；而把政治批判变成对既有物质和组织能力的事实失明，则无法解释满清共产主义历史生成的现实基础。

组织化社会更不等于高效率社会。商业统制没有消除短缺，劳工可以流动和抵抗，线路可能中断，计划可以落空，企业还要依靠承包人与警察弥补控制缺口。^{[27]}它是一种不完整、带有摩擦和强制方向的组织能力：能够把物件和人口接进重复运转的关系，却不能消除人的逃避、市场失序、资源瓶颈和殖民统治自身的矛盾。

八、组织化社会已经出现，接收尚未发生

现代捕获机器与殖民机构之间仍不构成逐项对应。满洲国户籍不等于中共身份分类，工程学院不等于党校，满铁调查部不等于宣传机关，企业城也不等于后来制度。现代政治核心编组身份、资源与忠诚，是一条关系；现代规模的物质能力依赖城市、岗位、知识机构和组织人口，是另一条关系。战前，二者尚未自动结合；中共这一现代政治核心对这套满洲工业网络及其城市、组织人口的接收与捕获—重新赋位也尚未发生。

满洲国工业—东北野战军—中共入关在理论上是一条强因果链，而非普通相关性。战前的工业外骨骼不只有设施，也已经以城市和组织人口为社会载体，这是因果链中不可缺少的一层。强因果链仍须由中间事实建立，不能从结果倒写过程。现有材料虽已证实局部的接收、修复与复工，但对 1945 年以后这些城市、铁路、工厂、学校、研究机构、技术人员和熟练工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拆运、损毁、接收、修复、撤离、留用和重新编组，证据尚未将各对象的完整接续过程贯通起来。

历史断层仍在这里。战前组织化社会已经出现；后来谁进入这些城市，哪些设施仍能运转，哪些人员留下，哪些岗位被重新命名，哪些能力又被新的政治核心捕获并重新赋位，都必须依靠战后材料逐项核实。局部节点与设施的接收修复固然存在，却不能被直接扩充为全域贯通的完整链条，更不能用一句“完整继承”草率替代具体的接合过程。

第十一章　六座城市与组织化社会注释

[1] 来源总览：*Manchoukuo Year Book 1942*, Hsinking: Manchoukuo Year Book Co., 1942，“Provinces and Cities”：奉天 / Mukden，pp. 732–733；鞍山 / Anshan，p. 733；新京 / Hsinking，pp. 741–743；哈尔滨 / Harbin，pp. 747–748；大连 / Dairen，pp. 757–758；“Cultural Activities”：文化与训练背景，pp. 650–652；table 9，“Higher Educational Organs,” p. 664。该书是满洲国殖民政权的同期英文年鉴，能够提供城市、交通、机构与教育目录的同期官方记录，但具有宣传方向；抚顺的具体城市、住房、技术分层和殖民劳动事实由以下 Money / Teh 等注释分别定点支持。上述材料与后续注释分别支持六城在具体条目范围内的功能，不足以证明全域无缝协同。

返回正文

[2] *Manchoukuo Year Book 1942*，“Hsinking,” pp. 740–743。材料记载新京为首都、南满铁路主线北端，列有行政、司法、经济、交通、金融机构以及关东军司令部；交通条目列新京—图们、新京—哈尔滨及新京—白城子（Paichengtzu）线路。机构存在不等于对全部工业节点的实际控制效果。

返回正文

[3] *Manchoukuo Year Book 1942*, p. 741。年鉴记载新京截至 1941 年 7 月底人口为 527,445；这是殖民政权同期单源统计，只能显示其统计口径中的城市规模，不能视为无遗漏的最终人口总量。

返回正文

[4] *Manchoukuo Year Book 1942*, pp. 742–743。材料称新京并非重工业城市而被预期为轻工业中心，并列商业、职业与工业补习学校及铁路连接；“预期”不等于完成，学校存在不等于培养成效。

返回正文

[5] *Manchoukuo Year Book 1942*，“Mukden (Fengtien),” pp. 732–733。年鉴记载铁西工业用地约 24 平方公里、大型企业逾 100 家及武器、机械、化学等产业；这些是殖民政权同期表述，不能推出全部企业持续有效生产。

返回正文

[6] *Manchoukuo Year Book 1942*, p. 732。年鉴所列奉天 1940 年人口为 1,307,993；该单源数字不支持工业人口比例、技术人员总量或战后可调用人口。

返回正文

[7] *Manchoukuo Year Book 1942*, “Manufacturing Industry,” p. 550。材料支持奉天兵工厂经营武器、弹药、火药及原料，并制造、修理机器工具；不支持具体型号、产量、库存、交付对象或战后调用。

返回正文

[8] *Manchoukuo Year Book 1942*, “Anshan,” p. 733；table 12, “PIG IRON PRODUCTION CLASSIFIED BY COMPANIES,” p. 493。年鉴记载约 6 亿吨为铁矿储量估计，并记录 1909 年发现、1917 年建设铸造设施及昭和钢铁经营；储量、实际产量、能力与扩张估计必须分开，均不能推出 1945 年设备状态。

返回正文

[9] Duncan Money and Limin Teh, “Race at Work: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Mining Labor and Empire on the Central African Copperbelt and the Fushun Coalfields, ca. 1907–1945,”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 no. 101 (2022), pp. 100–117, esp. p. 109, DOI: 10.1017/S0147547921000132。作者说明煤矿吸引人口、前进寨由村落成长为城镇，以及永安台 1924—1932 年的建设；这是抚顺区域个案，不能代表全满洲城市化。

返回正文

[10] Money and Teh, “Race at Work,” p. 109。研究记述永安台的种族居住分隔、正式雇员住房资格和中日雇员不同标准；企业住房不等于平等福利共同体。

返回正文

[11] Money and Teh, “Race at Work,” pp. 113–114。研究列出 1921 年中日工头与低级技术岗位分类，并记载中国中级技术岗位由 1926 年的 0 增至 1937 年的 3,648；分类只适用于抚顺矿区，人数增长不证明技术权力平等。

返回正文

[12] Money and Teh, “Race at Work,” pp. 113–114。作者指出正式雇佣是考试、内部晋升及技术教育资助的前提；1937 年中国工人约占总劳力 90%、正式劳力 34%、熟练工 7%。熟练工比例不等于全部技术人口，也不能外推满洲全域。

返回正文

[13] Limin Teh, “Labor Control and Mobility in Japanese-Controlled Fushun Coalmine (China), 1907–1932,”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vol. 60, Special Issue (2015), pp. 95–119, esp. pp. 96–97, DOI: 10.1017/S0020859015000346；Money and Teh, “Race at Work,” p. 107。前者依据企业材料讨论承包人官僚化、行为和思想监督，后者说明承包人受日本坑长监督；这是矿区劳动控制机制，不是全满洲统一制度。

返回正文

[14] *Manchoukuo Year Book 1942*, “Dairen,” pp. 757–758。年鉴记载大连的贸易港 / 自由港定位、南满铁路主线起点及一所技术学校；港口制度地位不等于社会自由，学校存在不等于毕业规模。

返回正文

[15] *Manchoukuo Year Book 1942*, “Warehousing,” pp. 268–269；“The South Manchuria Railway Works,” p. 550。仓储材料支持码头仓库和仓储处理能力，车辆工场材料支持制造、装配、修理业务；仓储处理量不是港口总吞吐，同时容纳容量不是年度维修量。

返回正文

[16] *Manchoukuo Year Book 1942*, p. 757。年鉴所列大连截至 1941 年 7 月底人口为 690,846；该数字只表示同期年鉴口径，不支持港口工人、技术人员或学生数量。

返回正文

[17] *Manchoukuo Year Book 1942*, “Harbin,” pp. 747–748。材料记载五条铁路汇聚、松花江航运及大豆、高粱集散；交通集散不等于线路始终畅通，也不等于重工业产量或北满完整经济总量。

返回正文

[18] *Manchoukuo Year Book 1942*, table 9, “Higher Educational Organs,” p. 664。目录列有哈尔滨农业学院、工程学院、医学院等机构；机构存在不能推出招生、毕业、技术成果和就业去向。

返回正文

[19] Money and Teh, “Race at Work,” pp. 107, 113。作者分别记载 1940 年非熟练中国工人平均雇佣期不足六个月，以及至少 80%的中国熟练工在矿工作超过五年；两者说明同一矿区内流动性与经验留存并存，不支持战后人员去向。

返回正文

[20] *Manchoukuo Year Book 1942*, “Cultural Activities,” pp. 650–651。年鉴转录前政权 1929 年职业学校 56 所、学生 3,523 人，大学与学院 9 所、学生 3,617 人；该殖民政权材料随即以宣传语言贬低旧教育，所载数字仅构成单源教育基线，本身不能作为教育质量结论，其宣传性评语亦非质量证据。

返回正文

[21] *Manchoukuo Year Book 1942*, table 9, “Higher Educational Organs,” p. 664（哈尔滨、奉天、新京工程学院目录）；“Hsinking,” p. 743（新京教育机构条目）；“Dairen,” p. 758（大连技术学校条目）。同期材料列哈尔滨、奉天、新京工程学院及大连技术学校等；校名和机构存在不证明培养目标实现、毕业人数或工业就业去向。

返回正文

[22] *Manchoukuo Year Book 1942*, p. 652。材料记载新京教师训练学校 1933 年开设三个月课程、每批 100 人；它是教师训练记录，不能当作工程师培养规模。

返回正文

[23] Louise Young, “When Fascism Met Empire in Japanese-Occupied Manchuria,”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vol. 12, no. 2 (2017), pp. 274–296, esp. pp. 289–290, DOI: 10.1017/S1740022817000080。Young 记载满铁调查部高峰约有 2,300 名研究人员，并讨论左翼学者为关东军和满洲国政府研究、参与五年计划；人数不能固定到单城，参与计划不等于计划完成，政治背景不决定战后去向。

返回正文

[24] Thomas R. Gottschang and Diana Lary, *Swallows and Settlers: The Great Migration from North China to Manchuri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2000, pp. 3–5, DOI: 10.3998/mpub.22808。作者将铁路、矿山、工厂机会及火车、轮船运输与迁移增长相联系，并指出多数迁移者经合同劳动或私人渠道移动，落点受雇主影响；迁移不等于稳定定居或熟练化。

返回正文

[25] InYoung Bong, *Destabilizing “Racial Harmony”: Hybridity, Nationality, and Spatiality in the Law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of Manchukuo*, PhD dissertation, Cornell University, 2010, pp. 44–46。该论文转引 1937 年《满洲国法令辑览》中的户籍法规及说明，讨论警察记录人口、职业、迁移和签发身份证件；材料身份是学位论文对规范文本的转引而非直接查验法规原件，且作者明确指出实际实施因机构应用而异，该材料不能证明全境一致实践。

返回正文

[26] Prasenjit Duara, “The New Imperialism and the Post-Colonial Developmental State: Manchukuo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Japan Focus*, vol. 4, issue 1 (2006), Article ID 1715, DOI: 10.1017/S1557466006003925, pp. 8–9；Money and Teh, “Race at Work,” pp. 108–114；Teh, “Labor Control and Mobility,” pp. 96–97；Bong, *Destabilizing “Racial Harmony”*, pp. 44–46。四项材料分别支持关东军最终监督、种族化岗位与住房、劳工科层和身份登记；均不支持把全满洲写成单一无差别机制。

返回正文

[27] Qiunan Li, *Everyday Life in the Puppet State: A Study of Ordinary People’s Experiences in Manchukuo*,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2018, pp. 136–138。该研究根

据地方志、报刊和制度材料讨论 1937 年后的商业组合、原料商品分配、短缺、低利润及规避采购；统制目标不等于实际供给效果，也不支持“组织化即完全控制”。

返回正文

第十二章　进入满洲：接收、修复与重新赋位

一、鞍山：废墟中的接收与复工

战前满洲形成的工业外骨骼，不能用一句“后来被接收”轻轻带过。组织化社会曾经出现，并不等于战争结束时还能原样站立：机器可以被拆走，图纸可以被烧毁，厂房留下而生产能力可能已经中断；人员可以撤离，管理关系可以崩解，原来能够调度资源的机构也会随着政权瓦解而失去效力。1945 年以后留下的是遭受战争、拆运、停摆、撤离和管理断裂的遗产。连续性并未消失，厂房、铁路、设备基础、技术知识、工人经验与城市位置仍是可以重新调用的对象；但连续性不能反过来遮住断裂。对象留下不等于能力还在，岗位曾存不等于马上就能运行，战前的组织网络更不会自动转入新的政治核心手中。

在这里，“捕获—重新赋位”是用于解释接收过程的分析概念，不是 1945 年历史主体自觉使用的词汇，也不等同于“完整继承”。面对残缺对象，新的权力必须辨认哪些东西还能使用，清理不能运行的部分，重新组织人员和管理，再把旧有对象放进新的命令、计划和资源关系。这一解释基于具体的历史过程：谁进入、接收什么、做了什么，以及管理权怎样改变。

鞍山的经历把接收与继承之间的差别摆得很清楚。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关于鞍山钢铁厂早期建筑的材料记载，1945 年日本投降后，苏军把鞍钢七万余吨机械设备作为战利品拆卸运走。1946 年，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在鞍山成立办事处，接收昭和制钢所等二十三处日伪工厂；1948 年，东北行政委员会批准成立鞍山钢铁公司；1949 年 7 月 9 日，鞍钢举行开工典礼。^{[1]}

鞍钢旧址材料留下的残缺图景更为具体：大型轧钢厂的设备被拆空，图纸被烧毁，机械被盗卖，厂房里只剩破败的架体和杂物。这样的遗产，不能凭一个厂名自动恢复生产。厂房仍在，不代表高炉、轧机、配件、图纸、燃料和人手已经齐备；公司名称重新出现，也不代表生产秩序随之恢复。^{[1]}

新华社关于鞍钢复工的实录，接着记录了修复怎样展开。1948 年 11 月东北全境解放一个月后，李大璋带着东北局调令进入鞍钢厂区时，铁水已经凝固，设备残缺，材料和工具匮乏。老工人孟泰带领工友刨开冰雪，搜集机器零件；厂里发动工人献交器材，数千职工肩扛、担挑、车推，把能够找到的东

西送回工厂。短短半年多，鞍钢炼出第一炉铁水和第一炉钢水，并在 1949 年 7 月 9 日举行开工典礼。^{[2]}

从旧接收框架转向新的行政与公司体系，企业关系经历的是管理权置换而非无缝继承。生产资源在新的行政和公司关系中获得了新的使用方向。这段历史没有从战前直接滑到战后，中间隔着设备损失、管理断裂和生产准备。军事和政治进入者、企业管理者、工人组织与技术人员随后共同推动修复和复工。

这一过程不能被宣传语言中的“奇迹”所遮蔽：新管理人员进入现场、老工人组织搜集与清理、残余设备重新接合、生产准备在厂房内启动，这一系列具体动作才最终形成复工。鞍钢并未自动兑现战前能力，而是在断裂遗产上完成了一次重新赋位。这个案例证明了代表性工业节点能够被重新组织，却不能被推广为全东北所有工厂都以同一速度、同一机构和同一方式恢复。

二、铁路：一台死车与一套新管理关系

铁路比工厂更容易显出“恢复”一词的尺度问题。轨道长度的抽象总和，不能单独代表铁路的运行能力；线路、机车、机务段、检修材料、司机、调度、桥梁、车站和管理机关必须共同运转。任何一个环节断裂，即使线路仍在，也不能据此说运输已经恢复。

关于东北财经和陈云东北工作的研究材料记载，1946 年 7 月，东北局成立东北铁路总局。旧交通系统留下的铁路由此被纳入新的财经、后勤和战争组织框架，东北铁路总局也开始集中处理铁路事务、组织运输和调度资源。统一管理由此开始，却不等于所有线路已经同时畅通。^{[3]}

北京市文物局转引的中国铁道博物馆材料，留下了一台机车的具体修复记录。1946 年，为缓解铁路运力不足，铁路工人从滨洲线肇东车站拉回一台破损严重的蒸汽机车。没有材料，就从废铁堆里翻新；工具不够，就从自己家里拿。工人连续奋战二十七个昼夜，终于把这台“死车”修复成功，随后投入支援前线的运输。^{[5]}

这台机车不能代表整个东北铁路，却让“有限运输能力恢复”的具体过程变得可见：破损机车被找到，修理者被组织起来，材料从废墟和私人生活中重新聚集，修好以后，机车又进入运输链。铁路恢复首先表现为这样的节点，不能被一纸“全部恢复”的总判断取代。

吉林西站的地方志材料又显示了管理权怎样改变。1946 年国民党政府占领吉林市后，成立交通部吉林区铁路管理局，吉林西站划归其管理。1948 年吉林解放后，吉林西站划归东北铁路总局驻吉林办事处领导，同年 9 月又由吉林铁路管理局管理；此后相关线路继续修复并进入新的铁路分局体系。^{[6]}

吉林西站经历的两次归属转移，反映的不仅是管理机构的名义更替，负责站点、线路和运输安排的主体也随之发生实质改变。东北铁路总局及其驻吉林办事处，把原来分属不同旧政权和地方机构的铁路

对象纳入新的管辖关系，集中管理能力由此开始形成。这种集中管理并非没有摩擦的全域控制，而是将计划、调度、修复和运输责任，纳入一个能够下达命令、调配资源的组织框架。“接收—修复—有限运行—集中管理”构成了理解这一过程的解释机制，它辨认的是相互关联的工作与管理关系，并不规定每处铁路必须经历同一先后次序；集中管理与修复、运行可以交错推进，各地也并非按照固定日程同步完成。吉林西站的局部证据不能证明全东北在同一日期实现恢复。

三、人员不是附属品，而是岗位关系

工业对象被接收之后，必须解决人与岗位的对应问题。旧企业内部的工人、职员、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及各层级熟练劳动者，在政权更替后不可能自动获得相同的政治身份、工作关系和组织位置。“留用”仅意味着未离开或未被排除；真正的“重新赋位”，则取决于他们进入何种岗位、服从何种管理关系并承担何种功能。

关于陈云东北财经工作的研究材料记载，接收日伪和国民党企业后，工人与职员之间存在尖锐矛盾。旧有中高级职员曾以官僚主义方式管理工人，其中有人对旧政权抱有正统观念；但若只重视工人，不加区别地打击职员，生产和管理又会陷入混乱。陈云主张把接收企业的职员分类处理：旧管理人员的思想和作风可以批评改造，经济建设却仍可能需要他们的专门技能和业务管理知识；同时还要提拔优秀工人和职员，培养新的生产、业务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并在人民企业中建立新的严格管理制度。^{[3]}

这种做法既不无条件继承旧人员，也不把他们整体清除，而是把人的过去、技能和新的岗位关系拆开处理。旧职员不能再凭原有权力继续支配企业，技术和管理知识却可以进入新的制度；工人不再只是生产对象，也被组织进修复、管理和生产；新干部则把政治命令、计划和组织纪律带入企业。重新赋位正发生在这样的区别、筛选和再编组之中。

鞍钢复工材料让老工人的作用落到了具体行动上。孟泰和工友不是“群众支持生产”的抽象符号；他们实际搜集零件、清理设备、参与恢复高炉，是复工中的生产主体。新华社还记载，1950 年初有近两万名干部、技术人员、大中专毕业生和各类技工奔赴鞍钢。这份材料不能当作战后全部工业人员的完整名单，却说明新的工业组织需要多类人员同时进入：干部负责组织关系，技术人员处理生产与设备，技工和工人承担操作、修理与现场劳动。^{[2]}

旧技术人员可以从旧企业的职员关系转入新人民企业的技术位置；老工人可以从被管理者转为修复和生产组织者；新干部则把企业纳入新的计划、统计、报告和管理制度。工业外骨骼能够再次运转，靠的是这些人被重新塞入岗位、等级和命令链条，不是一台机器自行恢复生命。

四、从接收对象到管理权变化

战后接收不能只看工厂名义上归谁所有。谁决定生产顺序，谁调度铁路，谁组织人员，谁制订计划，谁又把厂房和车辆纳入新的资源方向，才真正决定管理权落在何处。

陈云相关材料显示，东北财经委员会要求加强生产计划性，调查企业情况，建立计划机构，把工业、农业、运输、财政、贸易和金融联系起来。^{[3]}^{[4]}管理权之所以能从名义落到实际，靠的正是计划、统计、报告、财务和运输管理这些制度接口。但这套计划要求属于管理建立的步骤，不能被直接视作全域已经完全控制的既成效果。

资源重新赋位，并不只是给旧机器换一面旗子。资源必须进入新的计划，人员必须进入新的岗位，企业必须进入新的行政关系，铁路必须进入新的调度体系。旧对象的来源越复杂，重新赋位越需要制度动作。捕获首先把对象从原来的权属、用途和管理网络中剥离出来；重新赋位再把它放进新的政治核心能够调用的企业、铁路、计划和组织关系中。

战后满洲最重要的遗产，并非一台完整运转的工业机器，而是一批经过断裂仍可能被重新调用的对象：残余厂房、设备基础、铁路节点、机车、工人经验、技术知识、管理人员、城市位置和制度接口。这些对象来源复杂，却没有全部消失；它们曾经属于旧政权，并不意味着它们会自动保持原位。新的政治核心必须在废墟中重新筛选、清理、修复、组织和命名。代表性案例能够证明具体工业和铁路节点经历了接收、修复、人员重编和管理权变化，却不能证明整个东北的所有企业、铁路和人员都在同一时间以同一种方式完成这一过程。鞍钢不能代替全东北，肇东机车不能代替全部铁路，吉林西站也不是所有城市的模板。代表性案例让机制落到具体对象上，不能拿局部经验冒充全域档案。

工业外骨骼由此进入新的调用阶段。伪满洲国的存在，实际上给这些渔猎群体的后裔加上了“工业外骨骼”。战后政治过程没有把它原封不动地搬走，而是在断裂遗产上重新装配仍能使用的部分。铁路、军工、技术与行政人员构成的历史层，只有经过接收、安排和调度，才可能从旧有结构中的对象转成新政治核心的资源。〔见第二十九章注 1〕

现有材料呈现了工业、铁路、人员和管理权从断裂走向重新赋位的具体过程。这些关于局部接收、修复与人员管理的材料，尚不足以单独证明这些资源怎样进一步转化为东北野战军的军事、后勤和组织能力，也不能据此直接推导军队形成、现代入关或对国家躯体的最终占据。1949 年的开工与 1950 年的人员调配属于后期的恢复与重建，不能倒推为此前战时行动的既有能力；因果链条中的连续性仍须由各阶段材料继续证明，拆运、损毁、停摆、撤离与管理断裂这些实际差异，也须在接续过程中予以辨认。

第十二章　进入满洲：接收、修复与重新赋位注释

[1]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鞍山钢铁厂早期建筑》，https://whly.ln.gov.cn/whly/wlzt/lnww/zdwwbhdw/CFB45506B063492A93271704FF1366BC/index.shtml。

返回正文 · 返回正文 2

[2] 新华社：《一曲壮丽的钢铁史诗——鞍钢与共和国风雨同行 70 载实录》，2019 年 7 月 9 日，https://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7/09/c_1124728659.htm。

返回正文 · 返回正文 2

[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陈云与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财经工作》，https://www.dswxyjy.org.cn/n1/2023/0110/c423731-32603549.html。

返回正文 · 返回正文 2 · 返回正文 3

[4]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陈云在东北的革命贡献》，https://www.dswxyjy.org.cn/n1/2022/0217/c423731-32354218.html。

返回正文

[5] 北京市文物局 / 中国铁道博物馆：《永远的“毛泽东号”》，https://wwj.beijing.gov.cn/bjww/362760/362767/bwgxh/spzl/326103881/index.html。

返回正文

[6] 吉林省地方志：《吉林西站：吉海铁路上的睡狮》，https://dfz.jl.gov.cn/jgdg/201910/t20191025_6120129.html。

返回正文

第十三章　东北野战军与中共入关：强链怎样落地

一、外骨骼必须变成行动

关键在于这些遗产怎样转化为行动。工业外骨骼若只留在厂房内就只是历史遗存，铁路若仅是一段修复后的线路也尚未成为军事能力。资源必须能够移动部队、运送弹药、修理装备、组织人员、维持补给，并在战场上形成持续的行动能力。“满洲国工业—东北野战军—中共入关”这条强链的成立，依赖于铁路、军工、人员和战役行动之间的具体联系与相互支撑。

遗产转化为行动仍须经过“捕获—重新赋位”。重新赋位并非原样继承旧对象，而是将可用部分置于新的政治—军事关系：铁路被放进军运，工厂被放进军工部和前线补给，技术人员与工人进入新岗位，干部和部队则把各节点接入能够持续发出命令的组织。工业外骨骼的关键，不在于其原有的现代外观，而在于权力更替后能否继续被调度。厂房、线路与技术经验彼此分散时，孤立对象无法独立产生战效；只有命令、人员和资源沿着同一链条共同流动，遗产才成为行动。因此“捕获”不等于占有：占有只是取得节点，行动则要求将节点嵌入时间表、补给表和战役计划。历史材料证明的是这些具体联系；“工业外骨骼”与“中共入关”的总体解释，则将这些事实贯通起来。

伪满洲国的存在，实际上是给这些渔猎群体的后裔加上了“工业外骨骼”。这不只是一句漂亮比喻，它指出的是能力怎样叠加：原有社会中的行动经验、地方关系和人员来源，并没有自动变成现代军队；工业、铁路、机修和技术岗位也没有自动产生政治方向。只有当政治核心接收这些对象，并把它们放进统一的时间表、命令链和资源排序中，外骨骼才开始承重。工业外骨骼提供的是放大器和连接器，不是替代人行动的机器。〔见第二十九章注 1〕

工厂、车站与技术人员的相互作用，必须放进行动链中观察。工厂生产的弹药经过包装、装车和运输，铁路依托机车、桥梁、通信和站段人员，部队则把弹药、粮食和兵员纳入具体战役的先后次序。任何环节单独存在都只说明对象被保留；数个环节被同一命令系统反复接合，才表明旧遗产被重新赋位为军事能力。由此，遗产接收、组织调度与地域推进构成了连续链条。

二、铁路把占领变成持续行动

铁路首先改变的是距离。东北铁路总局的成立，不只是为一套已经恢复的线路补上行政名称。吕正操回忆，1945 年日本投降后东北铁路遭到严重破坏，线路、桥梁、涵洞、通信和站舍都受到损害。到 1946 年 6 月，铁路抢修后已有相当里程通车，但仍由地方铁路局分散管理。为了加强铁路管理、统一指挥并更好地支援前线，东北局于 1946 年 7 月决定成立东北铁路总局。^{[1]}

铁路工人承担的远不止日常维护。材料写到，他们在器材不足、粮食缺乏的条件下抢修铁路，修复机车和车辆；随着战事推进，铁路员工提出“解放军打到那里，铁路就修到那里，火车就开到那里”。这句话带着回忆材料特有的政治声调，但它指向的动作很清楚：线路向前延伸，机车重新运行，车站和站段被纳入新的运输组织。到辽沈战役前，铁路总局接收和修复了大量线路，修复机车八百八十五台，铁路成为能够支援大兵团行动的物质接口。^{[1]}

铁路能否转成军事能力，关键落在组织层。1948 年 8 月下旬，东北铁路总局接到东北野战军总部命令，要把东线的三纵、炮纵、二纵五师和六纵十七师迅速运到辽西前线，同时从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运送粮食和作战物资，并把后方独立团送往吉林、四平地区。东野总部和铁路总局联合组成临时军事运输委员会，在梅河口和郑家屯设立运输分委会，装卸站和主要中间站派出特派员，统一指挥车辆

调配和装卸作业。^{[1]}

这并非简单的军队使用铁路。铁路总局处于系统层，临时军事运输委员会承接组织层任务，列车、线路和车站落在对象层。总部提出任务并给出部队与物资的优先次序，铁路总局据此将任务化为编组、机车、通信、车底、站线与装卸安排；临时军事运输委员会及梅河口、郑家屯分委会把命令分解下压到具体站段；干部和技术人员进入前线站段，成为军事行动的组织接口。特派员、干部添乘和装卸组织，则把命令落实到每一次编组、交会和发车。这样形成的系统，既依赖旧有铁路技术，也改变了铁路技术的服务对象。线路、机车、站段与人员被重组为一个可反复调用的层级系统，命令层层落实到现场。

1948 年 9 月的运输让这套组织关系显出了具体规模。九月十二日至二十一日，铁路按计划完成三纵、二纵五师、炮纵等主力向西阜新的运输，在九天内运送六十四个军列，把近十万大军送上辽西前线。这个数字来自吕正操的回忆材料，属于具体来源中的战时回顾；它可以证明一次大兵团运输的规模和组织结果，不能被扩写成东北全部铁路在任何时段都拥有同等能力。^{[1]}

运输也不是在安全条件下完成。敌机轰炸造成通讯中断、线路破坏和车站堵塞，铁路部门组织抢修、特别运输机车大队和单向连续发车。柳河大桥在十月一日被炸坏，铁路员工、家属和铁道纵队战士连夜架设便桥，随后恢复军列通过。铁路能力不是一条抽象的“基础”，而是在线路被炸毁之后仍能把行动继续下去的组织能力。^{[1]}

三○○五次军火列车进一步说明，铁路怎样成为战场能力。九月下旬，锦州前线急需弹药，东北野战军总部和铁路总局在昂昂溪组织秘密军火列车。十六名乘务人员冒着轰炸运行四昼夜，十月二日凌晨抵达西阜新前线。列车不是战争的背景；它载着弹药，在空袭和线路风险中运行，把军工与前线直接连接起来。^{[1]}

十月四日和七日，东北铁路总局与东野后勤部召开紧急联席会议，重新排列运输次序，以部队、弹药、汽油为先，规定装载数量和运行安排，决定哪些人员和民工下车徒步，哪些作战部队、军火和被服列车继续向前。这时，铁路管理权已经不只是占有线路，而是能够在有限运力中决定什么先走、什么后走，哪些对象进入前线，哪些对象被暂时留在后方。铁路由分散的交通遗产转成了新的军事—组织调度系统。^{[1]}

这些实践表明，连续行动依靠的是反复修复与重新排序，而非一次性占领。线路受损后的持续运行，不是依赖站点临时自发应对，而是依靠能够在破坏后重新排定次序的调度关系。铁路由此成为把时间、空间和资源排序压缩为军事行动的组织骨架。

三、军工把工业外骨骼转成军需

铁路使资源能够移动，军工则使资源能够持续补充。东北军事工业的形成并不是把战前工厂完整接回去。1945 年 10 月，东北军区决定成立临时军工部，接管沈阳兵工厂、文官屯坦克修理厂和孤家子火药厂。随后战局变化，军工单位被迫迁移，设备分散，生产从工厂搬到各地，军工生产则由不同部队和军区中的军工处组织。^{[2]}

1946 年秋冬以后，东北军工在珲春、鹤岗、鸡西、丹东、齐齐哈尔、牡丹江、吉林、哈尔滨和大连等地建立生产基地，生产子弹、手榴弹和炮弹。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引用《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稿》和东北军工部统计，称这些生产及时解决了前线军火补给问题。能够确认的事实是：具体军工机构和工厂组织生产，产品进入前线补给，生产由分散状态逐渐转向能够统一安排的体系。^{[2]}

1947 年 9 月至 10 月，东北军工会议召开，东北军工部正式成立。1948 年 4 月，东北军工部把原有生产基地改编为九个办事处，统一生产计划，撤销各军区和部队的军工处，上交修械厂和机器设备，并实行成本核算与正规化、规模化生产。这些调整使管理权发生了实际变化：军工生产不再只是各部队各自修理、各自制造，而被纳入一个能够制订计划、分工协作和集中分配设备的组织。^{[2]}

军工接收同样经历了断裂与转换。接收并非完整继承，战争迫使军工单位迁移设备、工人与技术人员；工厂可以被放弃，机器可以随部队转移，分散基地必须在新的地点重新生产和维修。军工能力的确立，在于干部、职工、技术人员、机器与原料被重新编入能够行动的组织。军工体系统一以后，维修、制造、原料和运输不再是互不相干的孤立环节。分散基地保留了战时生存弹性，统一后的办事处则把这种弹性纳入计划、统计与分配。设备集中、维修安排、质量控制和产品分配也由此接入共同的组织接口。前线需求反过来塑造生产；产品进入仓库、装车，经铁路或海运送达部队，才完成其军事意义。

军工产品的去向必须落到具体运输链上。材料记载，东北军工生产的子弹、手榴弹和炮弹投送到前线，并有大连军工产品经海运到山东，再转往关内战场。这些材料至少能够证明军工资源从生产单位进入军事补给链，且这一链条并不只服务于东北本地。至于每一种武器究竟在哪一场战役中占多大比例，材料不足以支持精确比例；但“机构—生产—运输—前线用途”的闭环已经成立。^{[2]}

武器并非只有一个来源。东北部队的装备并不全部来自满洲工业外骨骼，相关材料还涉及苏军转交、日军和日伪遗留、战场缴获、自行生产、易货交换以及关内等其他输入。满洲工业和组织遗产在这条强链中占据高权重位置，但并非装备的唯一出处。^{[5]}真正需要解释的是谁把不同来源的武器纳入生产、维修、配

发和运输秩序。满洲工业承担着把生产、维修、计划和外运组织起来的连接作用，并在多来源装备结构中承担了组织化放大的作用。

四、人员进入新组织

军事—组织能力从来不是机器自己产生的。铁路工人、军工职工、技术人员、干部、部队和地方人员必须进入新的岗位和命令关系，资源才会获得行动方向。

铁路运输材料把这一过程写得很具体。为完成 1948 年辽西大规模军运，东北铁路总局从后方铁路局抽调工人和干部，齐齐哈尔局调出一千二百多名具有业务技术经验和政治可靠性的人员，分派到西线各站段。每个站派干部指导，每趟列车都有干部添乘，重要地点由铁路局负责人亲自组织。旧铁路岗位没有被简单消灭，而是被重新置于军运和前线组织中：站段人员以及调度、机车、线路和通讯人员共同承担了军事运输功能。^{[1]}

军工系统中的人员同样有不同来源和位置。东北军事工业材料强调，老解放区军工干部和军工职工参与军工体系建立；军工部、办事处、工厂和修械厂把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放入生产、维修、计划和质量控制的位置。“东北人民”这一笼统称谓，并不能抹平人员来源、组织位置和作用的差异。能够确认的是不同来源的人员进入了新的组织位置，并承担了铁路军运、军工生产和维修保障等不同作用。^{[2]}

还有一类人员来自关内和原有军事组织。罗荣桓资料记载，抗战胜利后，山东成为进军东北的主要前进基地和兵员基地，山东主力部队六万余人进军东北；罗荣桓先后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政治委员、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并建议和主持建设东北二线兵团，一年多组建一百六十四个独立团，为主力部队输送兵员。材料至少确认了两条人员流向：关内主力和干部进入东北军事组织，东北本地及根据地兵员被编入二线兵团和独立团，再向主力输送。^{[3]}

谭政资料则显示，东北民主联军和东北野战军曾组织以诉苦、三查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并在辽沈战役和入关准备中开展政治动员。这能证明一种组织化的政治工作进入军队，但不能据此把普通基层武装与满洲国军事头领视为同一对象。由于缺乏对象级历史材料，现有证据尚无法确定军事头领的具体姓名、数量或整体去向。^{[4]}

人员的重新编组也有层次差异。铁路工人依凭线路、机车、调度与装卸经验承接军运；技术人员针对设备、维修与生产工艺维持运转；军工职工在制造、修械和质量控制中保障军火交付；干部则把这些专业岗位逐一接入军队命令链和政治工作。山东部队及其他关内部队则以成建制兵员和干部输入东北；二线兵团与独立团承担的是补充和扩展，也承担训练和向主力输送的任务。不同来源的人员并没有被抹平为同一种身份，而是在统一的命令、训练、政治工作和战场任务中形成协作。

诉苦运动所涉及的普通基层武装，与满洲国军事头领并不是同一对象。谈到诉苦运动，很多人只看那些没有土地的渔猎底层武装，却刻意忽视满洲国的军事头领。军事头领当然是选择加入，但诉苦运动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后面中共得到他们助力，成为他们的领导。”这层助力与领导关系已经在满洲阶段进入组织行动，但“他们”的具体所指、选择加入的经过以及领导关系确立的历史过程本身，在现有材料中仍未获实证核验。^{[10]}

五、从名称变化到军事能力

名称变化不是装饰。1945 年东北人民自治军处在接收和建制初期，1946 年东北民主联军承担更大范围的作战与整合，1948 年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其野战部队称东北野战军，显示的是一个军事—组织体系在战争环境中的调整和扩展。1949 年则出现第四野战军这一更大编制，罗荣桓资料已经明确出现第四野战军政治委员的职务^{[3]}。从这些名称的先后看，组织扩张并非一次完成，1945 年的建制尚不能等同于后来形成的东北野战军^{[5]}。名称变化标出组织关系和阶段边界，但不能代替能力证明。

真正的军事能力，取决于组织规模、运输系统、军工供应、维修、兵员补充、政治工作与指挥系统能否共同扩大。辽沈战役前，东北野战军已经拥有大规模野战兵力，东北解放区控制相当比例的土地、人口和铁路线；这些规模信息来自党史院战役材料，却只能显示组织规模的一个层面。^{[6]}这支军队的能力同时依托于关内干部和部队、地方动员、战场缴获、苏军因素、日伪遗留及其他军事资源；然而多重来源并不意味着满洲工业只是寻常背景，这些具体组织能力使军事规模能够被维持、移动和扩大。

工业外骨骼的转化，正是把部队、弹粮、干部、技术人员、维修单位、铁路线与军事命令接成连续行动的外部支撑。资源先经接收、修复与重新赋位，才能转化为运输、补给、扩张与实战效能。组织的真实能力，并不写在编制名称上，而是体现在列车运行时刻表、弹药库存配发、二线兵员补充、装备维修效率以及政治动员之中；其真实的组织边界，正看它能否把不同地域、不同背景的人员与设备，整合进同一套可执行的具体任务。

如果没有铁路，部队规模无法按战役计划移动；如果没有军工和维修，缴获与遗留装备不能持续使用；如果没有二线兵团和独立团，主力无法补充；如果没有干部和政治工作，不同来源的部队也难以服从同一套任务。工业外骨骼提供的是支撑大规模组织连续行动的外部结构，而不是机器自动作战。^{[11]}

六、辽沈之后，军事力量越出满洲

辽沈战役是这条强链第一次转向全国战局的节点。党史院材料记载，战役自 1948 年 9 月 12 日在北宁路打响，东北野战军攻克锦州，长春守军通过起义、投诚、放下武器等不同方式结束抵抗，中共取得长春控制，东北野战军于 11 月 2 日占领沈阳、营口，战役结束；11 月 9 日锦西、葫芦岛残部海撤后中共取得对东北全境的军事控制^{[6]}。辽沈的结果不仅改变了东北本身的控制关系，也使东北野战军成为全国战局中的战略预备力量。

辽沈战役并非工业能力自动生成的结果。锦州、塔山、黑山、大虎山、长春和沈阳的战斗涉及指挥、兵力、政治、地方动员、装备来源和战场选择。历史材料能够证明的是：到战役前后，东北野战军已经具备把大兵团集中、运输、补给并连续投入战场的能力；这种能力来自铁路、军工、人员和组织几条事实链的汇合。

辽沈结束以后，军事力量没有停留在满洲。1948 年 11 月 17 日，中央军委发出提前进行平津战役的指示电，连续电示东北野战军火速隐蔽入关^{[8]}。1948 年 11 月下旬，东北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指示迅速入关，会同华北部队推进；平津战役于 11 月 29 日开始，至 12 月 21 日东北和华北部队完成对北平、天津等地五十余万国民党军的战略包围与战役分割^{[7]}^{[9]}。

这一步构成“入关”的事实基础：有明确部队，有明确命令，有明确时间，有从东北向华北的推进，有平津战役中的具体行动。1949 年 1 月 14 日，人民解放军对天津发起总攻，15 日攻占天津^{[7]}；军事压力、切断退路和政治争取共同作用，北平守军接受和平改编，1 月 31 日中共取得北平控制^{[9]}。

进入关内的不是一支凭空出现的军队。它背后连接着对既有资源的接收和修复，也连接着铁路、军工、人员、政治工作和组织名称的变化。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资源都单一来自满洲国工业，满洲工业也不是普通背景。满洲国工业—东北野战军—中共入关构成一条高权重强链；历史证据则分别证明了铁路、军工、人员、组织和行动这几条事实链。强链的作用不在于抹掉其他因素，而在于说明满洲阶段为什么成为政治核心获得现代军事—组织外骨骼的高权重阶段。

辽沈至平津之间存在一个不能跳过的过渡：东北野战军先在东北完成集中和持续补给，再在命令下隐蔽进入华北，最后把包围、分割和政治谈判结合起来。入关不是一个战役名称换成另一个战役名称，而是既有军事—组织能力跨越地域后的新检验。部队能否快速转移，取决于铁路、粮弹、干部和指挥系统是否同时运转；平津的结果正是在这种连续性上展开。

从满洲到华北，最重要的变化不是地图上的箭头，而是政治核心对资源的调用半径扩大了。此前铁路和军工主要围绕东北战场组织，入关以后，同一套人员、车辆、军需和指挥关系必须适应新的线路、更长的补给距离和不同的城市攻防。能够移动并不等于能够长期维持，入关行动把运输、补给、政治工作和战役指挥同时置于更高压力下，也因此检验了满洲阶段形成的组织能力是否已经脱离地方性。

平津战役中的包围、分割和天津攻占，说明军事组织能力已经可以在华北城市群中展开；北平守军接受和平改编，中共随后取得北平控制，则说明军事压力与政治谈判共同构成接管过程。东北野战军并非全部结果的唯一来源；华北部队、地方力量、战场形势和谈判同样进入事实链。但东北阶段形成的运输和军工能力，使这支政治核心拥有了把大规模部队带出满洲并持续投入华北的条件。

这里的“中共入关”不是历史人物当时自觉使用的理论词；“入关”指的是政治核心携带满洲阶段形成的军事—组织外骨骼进入关内。它不是山海关地理意义上的重复，也不是把历史清军入关和 1948 年东北野战军推进简单画等号。它的结构含义是：一个在满洲阶段获得工业、铁路、军工、人员和组织外骨骼的政治核心，已经进入关内，并开始面对更大的国家身体。历史材料证明部队、命令、路线、战役和接管结果；“入关”这一理论线索则说明这些事实怎样连成同一结构。

随之出现的是新的问题：中华苏维埃政治核心将怎样占据和调用中华民国大陆国家躯体，“中共其实是两个国家”的模型又怎样展开。现代满城、人工渔猎、民族历史经验与群体延续同人工环境的关系、满洲反噬以及“兴于满洲，亡于满洲”，也都还有待展开。现在能够确认的是：在满洲被接收、修复和重新赋位的资源，已经转化为能够运输、补给、扩张和入关的军事—组织力量。历史民族主体及其群体延续与人工环境机制处于不同的分析层面，人工环境的运作不能替代对历史主体的考察，这一线索仍然是后续理论展开的入口。

这要求把政治核心、国家机构、人口、铁路、工业和法统分开分析，而不是把军事推进直接等同于国家生成。

第十三章　东北野战军与中共入关：强链怎样落地注释

[1] 吕正操：《回忆辽沈战役中的铁路运输》，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网站，2015 年 11 月 5 日，分页 1—5（网页注明摘自欧阳淞、曲青山主编：《红色往事：党史人物忆党史》，济南出版社），主链接：https://www.dswxyjy.org.cn/n/2015/1105/c244516-27782123.html。该文属于当事人战后回顾材料，带有回顾性综述性质，而非同期逐日调度清册或经多方互证的原始记录。第 1 至 4 页主要记述战役期间铁路总局统一指挥、抢修保通、战时运力优先重排及军列开行情况；第 5 页涉及辽沈战役结束以后沈山线恢复后铁路员工、器材随军入关的行动，但该页叙述不足以证明东北野战军各部均于 11 月上旬同时开拔入关，亦无法对整个战役期间全部物资运输总量形成独立于回忆叙述之外的统计互证。

返回正文 · 返回正文 2 · 返回正文 3 · 返回正文 4 · 返回正文 5 · 返回正文 6 · 返回正文 7 · 返回正文 8

[2] 《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的东北军事工业》，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24 年 5 月 6 日：https://cpc.people.com.cn/n1/2024/0506/c443712-40229355.html。

返回正文 · 返回正文 2 · 返回正文 3 · 返回正文 4 · 返回正文 5

[3] 《罗荣桓》，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资料中心：https://cpc.people.com.cn/GB/64162/126778/126780/7490430.html。

返回正文 · 返回正文 2

[4] 《谭政》，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资料中心：https://cpc.people.com.cn/GB/64162/126778/127855/7537065.html。

返回正文

[5] 郭永学：《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东北部队武器来源考》，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17 年 7 月 6 日：https://www.dswxyjy.org.cn/n1/2019/0621/c428059-31174522.html。

返回正文 · 返回正文 2

[6] 《辽沈战役》，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15 年 4 月 15 日：https://www.dswxyjy.org.cn/n/2015/0415/c244520-26848188.html。

返回正文 · 返回正文 2

[7] 《平津战役》，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15 年 4 月 22 日：https://www.dswxyjy.org.cn/n/2015/0422/c244520-26885948.html。

返回正文 · 返回正文 2

[8] 《1948 年 11 月 17 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提早进行平津战役的指示电》，人民网 / 中国军网资料页，2015 年 11 月 17 日：https://photo.81.cn/tsjs/2015-11/17/content_6773501.htm。

返回正文

[9] 《北平为什么能够和平解放？》，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15 年 4 月 15 日：https://www.dswxyjy.org.cn/n/2015/0415/c244514-26848260.html。

返回正文 · 返回正文 2

[10] 东北部队通过诉苦、三查开展整军动员，见《谭政》（本章注 4）。普通基层武装与原政权军事头领属于两类对象，两者的组织化路径不可混同，“他们”的具体所指亦不能由后裔概念代替。满洲国军事头领的具体人员身份、选择加入的历史过程、在新体制中的实际职能，以及助力与领导关系的确立过程，均属有待核验的具体历史陈述，目前缺少名册、人事档案等对象级实证材料予以证实；关于诉苦运动对该群体“没有任何意义”的论断，以及相关评论者“刻意忽视”该群体的心理动机判断，同样缺乏实证材料佐证。

返回正文

[11] 围绕铁路运输、装备生产维修、二线兵员补充、干部与政治动员四个环节提出的反事实假设，界定了大规模军事组织连续行动的支撑条件，并赋予工业外骨骼在战时体系中的高权重解释地位。已有战史材料记录了这些要素的实际作用：东北铁路总局承担了战时大规模军运调度（本章注 1）；东北军工系统开展了军火生产、修械与装备供给（本章注 2、注 5）；罗荣桓主持组建二线兵团并向主力输送兵员（本章注 3）；谭政资料记录了部队开展新式整军与政治动员的实际过程（本章注 4）。但记录其实际作用，不等于证明若缺少某项要素则战役任务必然落空的绝对必要性。要严格确立不可替代性，尚需对同期的铁路公路运力、装备生产与消耗、人员补充规模、替代编组及战役推演路径进行系统比对。缺乏上述比较材料并不构成对工业外骨骼高权重解释的反证，其论断仍受制于既有的经验验证边界。

返回正文

第十四章　中共其实是两个国家：政治核心怎样占据国家躯体

一、两个国家结构与入关接管的性质

满洲留下的工业、铁路、工厂、技术人员和组织化人口，经过接收、修复、调度和重新赋位，转化为东北野战军的军事能力，推动这支力量进入关内并继续前进。然而，军事推进不等于国家生成。一支在满洲完成组织化与军事化的政治—军事力量推到城市门口，并不自动回答谁掌握城市内部的命令权、印信权、人事权、财政权和业务权。军事力量能够占领一座城市，却不等于已经拥有这座城市作为国家身体的全部能力。要把战场的推进变成国家的接管，必须把新的政治核心放进旧有国家结构之中，重新排列其中的权重，决定哪些机构继续运行、哪些人员继续工作、哪些程序被保留、哪些印信被收回，以及哪些对象被登记、审查、改编或替换。

入关不是军队从一个地理区域到另一个地理区域的单纯位移，而是一个较小的政治—组织核心进入一个比自身复杂得多的国家躯体。这一核心不能随身携带原有城市、铁路、学校、银行和行政系统，也不可能在每一座城市从零制造专业人员、账册、办事规则和公共设施。它所做的是把自身的命令链、组织链和政治权重嵌入已经存在的国家身体，接管其中能够利用的部分，并将它们改造成服从新最高权重的对象。因此，能够移动、转移、重建并在战争中发出命令的政治—组织核心，与主要固定在城市、道路、机关、企业、学校、医院、银行和公共设施中的国家躯体，具有明确的结构差异。前者来自长期的政治组织、军队、干部系统和动员结构；后者则是一个复杂社会多年运行留下的机构、人员、

程序和物质设施。二者来源不同、能力不同、位置不同，前者不是后者的自然产物，后者也不是前者原有组织的放大版。

所谓“中共其实是两个国家”，首先是在区分这两种结构。它不是把一个国家拆成两个管理层或两种传统，也不是表面上的两面修辞，更不是两个平等并列、长期共存的国家实体。它的实际含义是：中华苏维埃提供政治—组织核心，中华民国留在大陆的国家结构提供被接管的国家尸体、躯体和身体。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既不是中华苏维埃单纯更换名称，也不是中华民国大陆身体的自然延续；其完整形态要等到两个结构发生叠合之后才会出现。进入城市后，核心与身体不会自动同质化：旧公安不会因改名而失去全部业务，银行职员不会因新接管者到来而变成完全不同的人，档案、账册、道路、学校和供水也不会因最高权重改变而从物理世界消失。

接管绝非中性的建国史，不是农村组织走向城市的合理化叙事，更不是自然、合理、无冲突的现代化过程。接管意味着权重改变，意味着旧机构被重新安排，人员被登记、审查、留用或排除，档案和印信进入新命令链；它意味着国家身体仍在运行，但不再由原有的政治中心决定方向。两个结构已在同一国家空间中同时出现，但这并不等于复合国家已经完成。

二、中华苏维埃的中央机构形态与分工

中华苏维埃如果只是若干根据地中的地方管理经验，就无法承担后来那样强的政治功能。地方性行政试验可以在局部地区修路、分田、征粮或组织民兵，却未必具有中央机构、行政分工、军事指挥、财政管理、司法审判和跨区域命令的组织容器。要成为能够随军迁移、在新地点重建并持续发出命令的政治核心，必须先形成一套能够把不同事务集中到同一权力结构中的机构。

1931 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通过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和经济政策文件，选举 63 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1]}中央执行委员会由此建立，并被规定为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政权机关。它把来自不同苏区、红军部队和工会组织的代表放进同一套中央安排中，使分散的武装区域获得一个能够提出全国性主张的组织中心。同年 11 月 27 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负责人，并决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组织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会被安排为中央行政机关，外交、军事、劳动、财政、土地、教育、内务、司法、工农检察等事务被分别纳入人民委员部的分工，中央政府还下设国家政治保卫局。^{[2]}这些机构表明，中华苏维埃已在努力把战争、财政、土地、劳动、教育、司法和安全纳入一个持续办理事务的政治组织。

这套机构的规模不能与后来占据大陆的国家机器直接等量齐观。瑞金的中央机关可以在祠堂的房间里办公，各部门人数很少，设施简陋，电话和桌椅都极为有限。然而简陋并不等于没有国家性组织功能。政治核心不需要一开始就拥有巨大的城市、铁路和银行网络，它首先需要命令能够集中、事务能够分

工、人员能够归属、军队能够受令、资源能够被分配。随着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设立，军事指挥进入中央机构，红军被放进能够代表中央权力进行军事安排的组织链中。财政和经济机构也逐步出现，苏维埃国家银行于 1932 年成立，二苏大会后又设立了最高法院和中央审计委员会等机构。它们所处的具体环境十分有限，面临战争、封锁和物资匮乏，但它们分别承担金融、司法和监督功能，说明政治核心并非只有军事行动这一根骨架。^{[2]}

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和经济政策决定等法律文件，把土地、劳动、经济和政治组织写入了同一套中央语言。这些法条未必在所有地区得到同样执行，不能证明中央政府已经控制全国，更不能证明后来的国家法统已从这里自然延续。但它们表现出一种组织能力，即政治核心能够把不同事务命名、分类、规定，并以法律和行政文件的形式向下传递。

工农检察、国家政治保卫、财政、土地、教育和司法等部门处理的对象各不相同，却同属于一个中央政府结构。政治核心的能力，不仅在于发出一条命令，还在于把命令拆解为不同业务，并通过机关与人员持续办理。这样的分工使政治组织获得了从军队向行政、财政、司法和社会管理扩展的可能。因此，“根据地”是它所处的有限空间条件，而“政治—组织核心”是它在整体结构中的功能。后来的进入、接管和重新赋位，绝非一支没有政治结构的军队突然跃升为国家，而是这一业已形成的组织内核将命令与人员推向更大的国家空间。

同时，中华苏维埃并非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完整蓝图。蓝图预设了后来的要素早已齐备，而材料仅能说明中华苏维埃形成了一套政治组织核心，并在战争中训练了中央机构、军政分工、干部和命令系统。它提供的是能够迁移和扩张的内核，而非包含后来国家全部对象的完整身体；国家身体的巨大部分，此时依然留在别处。

三、移动、改组与选择性存续

长征使政治核心与国家躯体的差异变得清楚。1934 年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时，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随军行动，公章、油印机、桌椅和其他办公设施也被带上转移路线。^{[3]}浪漫化的“马背共和国”叙事容易遮蔽其实际的组织动作：政治组织正是将办公、命令和身份确认所必需的物件视为能够随身移动的核心资源。政治核心能够带走部分人员与设备，保存文书制作与命令发布的能力，但它无法搬走瑞金的道路、学校、仓库、田地、地方行政和所有居民。核心的移动与留下的固定社会物质环境形成了明确对照。

政府工作没有因空间转移而立即停止，工作人员在队伍中继续承担机关任务。政治核心是由人员、文件、印信、命令和工作关系构成的组织链，只要这些关系能在新地点重新连接，核心就有可能继续运行。到达陕北后，中央苏维埃政府于 1935 年 11 月在安定的瓦窑堡设立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原有中央组织以新的机构形态继续活动；1937 年，西北办事处改组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原中央机关人员

转移、办公与印信关系继续、设立西北办事处、改制为边区政府，构成了连续的组织承接。但组织上的承接不能自动推导出法统的延续，机构名称的变更也并不意味着原有人员、命令和政治经验的彻底丧失。^{[3]}

政治核心的迁移能力不依赖一座固定建筑，也不要求每次改制都重新训练全部人员。它能够把部分机关、干部、文书和命令关系带到新的地点，再在新的环境中重新排列。进入更大的国家空间时，它因而不必从零建立组织。它已经有自己的人员、命令、纪律、干部、军队和政治语言；等待它的是一个更大、更复杂、更丰富的国家躯体。

迁移能力存在边界。迁移不是组织不死，持续办公也不等于每项功能都完整保存。长征中人员、物资和设施都有损失，机关必须在极端匮乏中缩减、改组和重新分工。能够随军带走的只是核心的一部分，能够维持的也是经过筛选的部分。正因为政治核心会选择性保存、选择性移动和选择性重建，它后来接管国家躯体时才会沿用同一套动作：不是把一切原样保留，而是寻找可用对象，改变其位置，重新配置其最高权重。

四、中华民国大陆的尸体、躯体与身体

国家躯体不能只停留在一个国号、一块疆域或一段政治记忆上，也不宜停留在“中华民国遗产”这种过于抽象的说法里，而必须落实为可以被接管的具体对象。上海市档案馆公布的国民政府时期上海地方行政机构档案指南，使这些跨时期的对象清晰呈现出来：上海特别市政府于 1927 年成立，1930 年改名上海市政府，1945 年恢复，至 1949 年 5 月 27 日由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4]}从这套跨期档案可见，战前市政府下辖公安、财政、工务、教育、卫生、土地、公用、港务、保安以及社会局等部门；战后市政府内部设有秘书、人事、会计、统计、总务、调查、民政、新闻等机构，下辖警察、民政、工务、公用、教育、卫生、地政等局。这并非一张 1949 年当下的同步机构清单，却展现出不同时期逐步成形、得以被接管的组织构架。

秘书处处理文件和行政联络，人事处保存职员名册、履历、任免、迁调、甄审和奖惩材料，会计处和统计处处理账目、报表和城市数据，民政处处理户籍和区域事务，新闻处处理公共信息；下属专业局则分别处理警务、财政、道路和工程、学校、医院、土地、给水、煤气、电话、供电、轮渡、港口和交通。国家能力分散在这些不同机构中，又通过市政府、会议、规则、训令和档案连接起来。

在这些具体部门背后，是各自的程序与业务网络。公安不是一个抽象的“治安”词，上海档案中的指纹制度、警管区制、水上警察、经济警察、消防机构、警察电台、警察人员名册和月报表，组成了识别人、划分区域、登记活动、处理案件和调动警务力量的程序网络。财政也不是一笔笼统的总账，而是税种、公债、金融管制、汇兑、账册和财政统计；工务和公用同样不只是几栋建筑，而是建筑执照、拆屋执照、道路、码头、桥梁、仓库、给水、煤气、电力、电话、轮渡和车辆登记等具体业务。

教育、卫生和工商体系同样各有其组织结构。上海的教育档案涉及学校、教育经费、学校规则、教员登记和学校管理；卫生档案涉及卫生局、医院管理委员会、卫生机构、医疗人员登记和公共卫生规则。它们未必在战争中完好无损，也未必每一所学校、每一家医院都持续正常运行，但作为专业机构、人员和程序已经存在，是新的接管者必须处理的对象。社会局档案则记录了工商企业登记、企业章程、工厂、商号、技术员工、工会名册、复工申请和劳资争议。企业不只由厂房组成，还包含职工、专业技能、账目、章程、登记关系、供应和劳动安排。新的政治核心接管城市时，不能只宣布“所有权已经改变”就让这些对象自动运行，它必须面对工厂怎样开工、人员怎样登记、企业怎样处理、工资和劳资纠纷怎样安排的问题。^{[4]}

上海档案的层级分布显示出国家躯体内部的相互依赖。市政府纵向连结局、处、委员会、区公所与直属事业机构，横向关联银行、学校、医院、工厂、工会、商会、码头、邮政和粮食机构。每个机构都有自己的负责人、职员、账册、会议和办事规则，同时又通过市政会议、财政拨款、训令、公报和统计报表与市政府连接。财政运转依靠各局的登记与统计数据，学校开课有赖教育经费拨付与教员到位，医院运转离不开卫生规程与药品调拨，工厂复工依赖交通运输、金融与劳动关系安排，城市物资供给则取决于仓储、转运与配售网点的协同。这种层层嵌套的关联意味着接管并非割裂的单点占领，触动其中一个环节往往会牵动多个节点。

地方社会和公共生活同样属于这具身体。市政府档案中有区民代表名册、区公所职员名册、户籍登记规则、民政会议记录、报刊和广播管理、慈善团体登记、医院和学校管理、难民和失业工人救济材料。这些对象不一定都能被新的接管者完整保留，也不一定都按原规则继续，但它们构成了国家身体与普通人生活的大量接口。户籍、粮食、学校、医院、工作、交通和居住，都是政治核心进入城市以后必须处理的具体关系。

档案本身也是国家躯体的一部分。上海市政府全宗保存有组织规则、办事细则、市政会议录、训令、公报、工作计划、职员录、任免文件、统计旬报、财产移交清册、部门报告，以及市长更替移交清册、总务处财产移交清册、各局任免文件和市政府来电发电底稿。档案不只是历史学者后来查阅的遗留物，它们当时就是行政机关证明自己能办事、能命令、能登记和能交接的工具。^{[4]}

尽管档案指南中的常规市长交接材料并不直接证明 1949 年接管的每一步都已照此执行，但它们揭示了政权转换必须面对的行政机制：谁掌握档案，谁就能知道机构怎样运作、人员是谁、财产在哪里、命令如何下达、业务怎样衔接；谁掌握印信，谁就能让文书从旧程序变成新程序。政权转换至少要经过交接、清点、登记、签发和确认等程序。谁接收房屋、车辆、账册和印信，谁核对人员，谁保存文件，谁承认旧命令的有效范围，都不是抽象的制度问题，而是每天必须处理的行政动作。国家身体正是在这些日常动作中继续运行，也是在这些动作中被新的政治核心改写。

交通、邮电与公用事业同样构成了维持城市生命的管网。档案指南中记录了公路交通、船舶登记、码头仓库、轮渡管理、邮政管理局以及邮电复员计划，公共事业档案则涵盖给水、煤气、电话、供电与车辆登记。有关上海战事的资料记录，邮政工作人员在战事期间留在邮政大楼内，报道引上海市档案部门研究者的话称，水、电、煤气供应在战斗期间没有中断。^{[9]}这些记录表明，城市在战争中仍需依赖既有人员、专业设施和既定程序来维持给水、供电、供气与交通。新的政治核心进入关内面对各大省市行政区域时，面对的不是一片等待命名的空地或任由书写的白纸，也不是仅余地理疆域的空壳，而是一整套已经存在、长期运转且积累了复杂专业分工的国家身体。这些机构和网络即便受到战争破坏、陷入混乱或处于不同力量争夺之中，也并不等同于化为乌有，更不是新政权自身肌体中自然生长出来的产物。

因此，“中华民国大陆的尸体”并不是一具什么都没有的尸体。“尸体”“躯体”“身体”三种词形之间存在着不能抹平的冲突：它是已经失去原有最高政治权重、被夺取和被重新命名的身体，却不是没有器官、没有骨架、没有记忆和没有运行程序的空壳。尸体之所以还能被占据，是因为其中还有城市、机关、人员、设施和能力；躯体之所以能够被重新牵动，是因为这些对象没有在一夜之间消失；身体之所以成为接管对象，是因为它仍然承担着人口生活和国家运行。

这具国家身体同样不能被缩成“制度遗产”四个温和的字。遗产听起来像无人拥有的财产，接管听起来像一种中性的管理动作。但现实中的机构、人员、档案、印信和业务，都有原来的归属、命令关系和政治位置。新的核心进入时，改变的不只是名称，而是谁可以决定、谁必须服从、谁能够签字、谁控制印章、谁审查人员、谁决定资源流向。正因为中华民国留在大陆的国家尸体、躯体和身体不是彻底腐烂、什么都不能使用的空壳，而是仍有器官和运行能力，政治核心才需要进入、接管、选择、保留、改名、重编和重新赋位。

五、北平公安的接管程序与命令链替换

北平公安接管把这个过程具体呈现出来。1948 年，接管北平的保卫干部训练班提前结业北上。学员事先学习《北平概况》，材料涉及北平的军、政、农、工、商、学，也重点涉及国民党警察机关、特务机关和城市中需要重点保卫的部位。这些准备表明，政治核心在进入城市以前，不只准备战斗人员，也在准备一套关于城市机构、人口、治安和接管对象的知识。

1948 年 12 月，北平市委宣布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市政府公安局，并任命了公安局负责人和各分局局长。1949 年 1 月 21 日，在正式入城前拟定的《入城后初期工作计划》中，业务被具体拆分为肃特、治安、接管敌伪警特党团机构、机关保卫和分局工作五项，以此逐项对应并处理各项治安与管理事务。^{[6]}

北平和平解放后，1949 年 2 月 2 日，军事代表正式接管国民党北平市警察局，向旧警人员宣布政策和守则。2 月 17 日，新旧工作人员参加共同会议，公安局宣布对旧警察局所属单位已经正式接管。同日发布的布告明确宣告取消原警察局名称，改设北平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并正式启用公安局新印。^{[5]}

与市级层面的接管相呼应，1949 年 2 月 10 日发布的第 0001 号文件进一步针对各分局做出规范。当时市级警察局已于 2 月 2 日被接管，而该文件针对的是尚未奉到正式接管命令的原各分局长。文件规定，在此过渡期间，原分局长应与公安军事代表共同办理事务；凡对外行文一律由公安军事代表签字；各分局名称统一改为人民政府公安局分局；分局印信则由公安军事代表或指定人员负责管理。^{[6]}

这一制度规定不能被等同于各项要求在基层瞬间落实，它首先确立的是一种过渡期的管辖结构。新的军事—政治核心取得了警察机构的最高命令权，旧机构名称被取消，新名称和新印信随之启用。旧警人员并未被整体清零或直接排除；接管者向他们宣布政策，他们参加会议并进入新的管理安排。警察局原有的城市治安业务和分局网络，也没有因名称变化全部消失。接管不是把警察、案件、街道和分局一起清零，而是把原有业务放入新的公安命令链。

这些规定说明，捕获不是把对象从世界上抹掉，而是把对象从旧主人关系中取出，放进新的主人—组织关系中。旧分局长仍然可能处理事务，但不能以原来的政治权重对外签字；旧业务仍然要办理，但必须经过新的军事代表；原印信不再是旧机构自主权的证明，而成为新组织控制下的管理工具。能力保留，身份和最高权重改变；程序继续，命令来源改变；机构外壳部分延续，政治方向已经换位。

六、专业器官的捕获：金融、公用与供给网络

中国银行的接管展示了对专业机构能力的另一种捕获方式。中国银行拥有商股、海外机构网络和长期历史积累，包含行产、账册、文件、职工队伍、分支机构以及成套业务程序。接管方据此提出保留原名、保留原机构，原有员工原则上留用的方针。1949 年 5 月 28 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代表正式接管中国银行总处；6 月 4 日宣布了“原封接管、稳步改造、尽快恢复营业”的方针和新总经理，随后于 6 月恢复营业。^{[7]}

将中国银行保留原名原机构的做法，与北平废除旧警察局名称改建公安局的做法对照，可见控制权的转移并非采取单一模式。“原有员工原则上留用”不是旧国家人员全部自动获得新身份。原则上留用意味着存在政策筛选和组织处理，实际人员仍要进入新的管理关系。中国银行的原名和原机构被保留，也不表示原有政治权重原封不动。军管会取得接管权，新的总经理人选已经宣布，原有行产被保护，业务恢复按照新命令推进。能力得到保留，主人关系同时被重置。

在更广泛的城市管理领域，上海的接管同样呈现出对具体行政器官的分别处理。1949 年 5 月 27 日上海市政府由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后，军管会于 5 月至 6 月间先后发布了六件不同领域的“第

一号布告”，分别涉及敌产、金融、地区政权、工商、文教和盐税等领域，以此确立相应板块的接管规则与管辖范围；但颁发接管布告本身仅确立了管辖框架，并不等于各领域的每个专业板块已经在具体运作中逐项完成纳管。^{[8]}

上海市公用局的沿革尤其能显示“旧能力继续存在”和“最高权重变化”如何同时发生。这个机构长期管理给水、码头仓库、水陆交通、煤气、电话、广告、供电、轮渡和执照等业务，抗战后恢复建制，1949 年 5 月由军管会接收。直属和监理的事业机构数量不少。军管会接收它，并不意味着城市从此不再需要原来的水厂、码头、船舶登记和车辆登记；相反，越是需要城市继续运行，越要处理原有的技术人员、设备、线路、档案和规章。接管方真正改变的是这些能力为谁服务、由谁批准、由哪一条命令链排序。^{[4]}

社会局系统所处理的工商企业登记、工会组织、粮食与燃料配售、劳资争议、复工申请、失业人员救济及社会团体管理，都要求新的权力进入旧有业务。原有的登记与仲裁规章可以被批判、修订或取消，但前提是必须由新的组织先行掌握其底册与网络，进而将工厂复工、劳资协调等事务纳入新的政权秩序。^{[4]}

城市民食供给也呈现出高度制度化的依赖关系。上海市民食调配委员会和粮食部粮食紧急购储会留存有成套组织规程、职员名册、采购办法、配售计划、会议记录、总账与分类账，以及仓库、运输和配粮日报。1949 年 5 月，军管会财经处接管了这些机构，随后由新的粮食机构清理债权债务。接管不只是把一个机构的名字换成另一个名字，还要处理账册、仓储、债权债务、配售规则、运输和人员。^{[4]}

七、不对称的保留与两个国家的相遇

接管并非整齐划一的机械进程，不同对象并未全盘经历相同的步骤，而是至少体现为六类相互区分的动作。将北平旧警察局改为人民政府公安局，属于更改名称并启用新印信；允许原工作人员参与办事，但对外文书改由新派军事代表签署，属于签字权和行文权的转移；将旧有人员、企业、机构与资产列入册籍并按新规加以清理，属于登记和审查；对于中国银行的原有员工原则上予以留用，在保留其专业技能的同时变更组织隶属，属于选择性留用；停办后的银行重新营业属于恢复业务，而保持城市供给不致中断的继续运行则属于既有业务维持；而将旧有的分局、派出所、专业部门依循新行政区划与规章重新编组，则属于重编。

这些动作共同构成了现代接管中的“捕获—重新赋位”。捕获不仅是夺取一处建筑或占领一座城市，而是取得对机构、人员、档案、印信、账册与业务的管理权；重新赋位也不是单纯替换名义标签，而是改变对象在组织链条中的从属位置。

军队可以控制城门、桥梁和重要建筑，不能凭一纸命令让所有学校重新开课、让所有银行恢复账目、让所有工厂重新安排工人、让所有医院找到药品、让所有区公所马上掌握户籍。新的组织必须派出干

部、军事代表、会计人员、公安人员和专业工作人员进驻各个旧机构，逐一实施登记、检查、接收和分配。

在这一过程中，接管的先后次序与轻重缓急本身就是政治权重的重新排序：优先进入公安、金融、粮食、交通和市政中枢，并非获取普通行政职位，而是占据了决定其他部门能否维系运转的中介节点。由此，命令权、印信权、人事权、档案权、财政权与业务权被重新排列。身体继续存在，主人关系改变；人员继续工作，政治身份和组织位置改变；程序继续使用，批准程序和最终决定者改变；城市保持供给，资源分配和强制力量进入新的中心。

这种机构与业务的继续运转不等于“温和继承”。虽然公用设施在运转、银行在营业、旧人员仍在办公，但由谁任命负责人、由谁掌管印信、由谁批准公文、由谁决定人员去留、由谁解释纪律并界定敌我，已经可能发生变化。原有能力被保留，新主人关系和忠诚关系被重新安排。学校与医院依赖财政，财政依赖税册与工商业统计，粮食配售依赖户籍与仓储运输，银行需要账册和人员，工厂依赖交通、金融和劳动安排。关键节点上的控制一旦确立，政治核心便能通过系统内部的相互依赖，扩大自己的控制范围。它不必同时改造每一项业务，却可以先控制能够决定其他业务顺序的部门，再把新的命令向下传递。

政治钉子的意义就在这些节点上。党校、党委、组织部门、统战部门和机关体系之所以成为政治节点，不是因为它们在建筑外观上像某种古代城池，而是因为它们能够进入既有组织的神经和关节：干部从哪里来，负责人如何任命，人员如何审查，资源向谁倾斜，谁能被解释为可靠，谁被划为危险，谁能够代表机构发言。北平公安接管中的军事代表、印信和签字权，上海金融工商接管中的军管会布告和财经组织，已经提供了这种嵌入的入口。这些材料不能代替对全国化现代满城的完整论证，却足以确认：国家身体并非被一次性占有，而是在关键节点上被逐步牵动。

北平和上海的材料能使国家身体变得具体，却不能由此推出大陆所有城市完全相同。北平公安体现的是警察接管、分局重编和印信权转移，上海市政府和金融工商材料体现的是城市行政、多专业机构和接管规则。它们共同显示接管逻辑可以处理不同对象，但每一座城市的机构、人员、战争状况和业务结构仍然需要分别核验。

同样，旧机构被利用也不意味着旧政治中心仍与新核心拥有同等位置。保留专业人员，是因为城市需要业务能力；保留档案和账册，是因为新机关需要掌握对象；保留道路、银行、邮政和公用设施，是因为人口生活不能停止。能力被留下，权重却被重新排列。正是在这种不对称的保留中，政治核心获得了国家身体的现实支撑，而国家身体也被迫在新的主人关系中继续运行。

“接管”与“生成”必须分开。接管首先改变的是对象的归属、命令、印信、人员位置和资源排序；生成则要求这些被重新安排的对象在更大的国家范围内形成稳定的日常结构。北平警察局改名、上海银行恢复营业、粮食机构清理账册，能够显示新核心怎样进入既有器官，却不能单凭一个机构的变更

说明整个复合国家已经完成。接管是进入身体的动作，生成是身体在新的高权重下长期运转的结果。完整复合国家的形成，还要求核心、身体、组织节点和全国制度连成日常运行结构。

中华苏维埃不是后来国家的全部，中华民国大陆也不是后来国家的全部。把政治核心直接等同于后来的国家，会看不见接管；把民国身体看成空壳，会看不见接管所需要的对象；把二者看成普通融合，会看不见最高权重的转移。少了前者，旧身体不会按照新核心的方向运行；少了后者，政治核心也无法突然获得大陆国家所需要的全部设施和专业分工。

中共其实是两个国家。中华苏维埃是政治—组织核心，中华民国大陆是被接管的国家尸体、躯体和身体。前者取得入关能力后进入后者，保留其中可以调用的机构、人员、程序和设施，改变其最高权重，使它们在新的组织链中继续运转。两个结构已经相遇，核心已经占据身体；二者如何叠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 后清，仍有待完整论证。

第十四章　中共其实是两个国家：政治核心怎样占据国家躯体注释

[1] 瑞金市人民政府，《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瑞金市人民政府，访问日期：2026 年 8 月 22 日。支撑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临时中央政府成立等机构事实；不直接证明本章的“两个国家”理论。该原页面当前尚未重新定位；大会、63 人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临时政府成立可参注 2 交叉核对，四类文件通过情况的原件证据尚待核对。

返回正文

[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故事》，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访问日期：2026 年 8 月 22 日。支撑人民委员会、中央机关、国家政治保卫局、最高法院、中央审计委员会和苏维埃国家银行等机构事实；不承担法律法统判断。本文为胡昌勇撰文，党史院网站 2021 年 11 月 12 日转载《人民政协报》；网址：https://www.dswxyjy.org.cn/n1/2021/1112/c219000-32280851.html。

返回正文

[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马背上”的共和国》，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访问日期：2026 年 8 月 22 日。支撑中央机关及工作人员随军、办公设施和政府工作继续等事实；不证明国家法统自动连续。党史院网站于 2016 年 8 月 31 日转载新华社报道（原文电头为 8 月 30 日）；网址：https://www.dswxyjy.org.cn/n1/2016/0831/c396980-28680828.html。

返回正文

[4]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时期上海地方行政机构档案指南》，上海市档案馆，访问日期：2026 年 8 月 22 日，网址：

http://www.shda.gov.cn/daly/gczn/202509/t20250919_74648.html。支撑上海市政府、专业局、人员、档案、程序和公用事业等国家躯体对象，以及 1949 年接管时间；不证明上海经验代表大陆所有城市。指南包含跨时期、跨全宗资料，不能当作 1949 年单一时点的机关组织表；目录列有某类材料，不等于逐件核实其保存完整程度或接管执行结果。

返回正文

[5] 北京市公安局警察博物馆，《北京市公安局成立前后》，北京市公安局，访问日期：2026 年 8 月 22 日，网址：https://gaj.beijing.gov.cn/jcbwg/yjcg/jsyj/202006/t20200628_1933167.html。支撑北平警察机构接管、旧警政策、名称取消和新印启用等事实；不证明旧警人员全部留用或全部消失。

返回正文

[6] 北京市公安局警察博物馆，《历史的足迹——北京市公安局建局初期的若干个第一次》，北京市公安局，访问日期：2026 年 8 月 22 日，网址：https://gaj.beijing.gov.cn/jcbwg/yjcg/jsyj/202006/t20200628_1933244.html。支撑原分局共同办事、军事代表签字、分局重编和印信管理权变化等事实；不直接证明本章的理论模型。《入城后初期工作计划》于 1949 年 1 月 21 日拟定；2 月 10 日第 0001 号文件所称未奉接管命令，针对原警察局各分局。文件规定不等于各分局均已同步落实。

返回正文

[7] 中国银行，《各地职工迎接解放，中行被顺利接管（1949 年）》，中国银行，访问日期：2026 年 8 月 22 日，网址：https://www.boc.cn/big5/aboutboc/ab7/200809/t20080926_6908.html。支撑上海中国银行总处接管、原名原机构和原员工原则上留用、保护行产及恢复营业等事实；“原则上留用”不等于每名员工最终去向相同。1949 年 6 月 4 日宣布新总经理，与 1950 年 4 月 9 日新董事会正式组成属于不同时间层次；页面以图片说明记载 1949 年 6 月恢复营业。

返回正文

[8] 上海市档案馆，《【红色档案】上海市军管会关于各方面接管工作第 1 号布告》，上海市档案馆，访问日期：2026 年 8 月 22 日，网址：https://www.shda.gov.cn/dawh/hsda/202509/t20250919_74953.html。支撑上海军管会对金融、地区政权、工商、文教、盐税和敌产等方面的接管规则与对象范围；不证明所有机构采用完全相同的接管方式。证据基础为介绍 1949 年 5—6 月六件布告的网页导言，六件影像全文未核，这六件布告并非一份统一布告。

返回正文

[9] 上海市人民政府英文网，《After 75 years, PLA's 'miraculous' liberation of Shanghai remembered》，上海市人民政府英文网，访问日期：2026 年 8 月 22 日，网址：https://english.shanghai.gov.cn/en-Latest-WhatsNew/20240527/7374bb72330d4d9e9efef7ad5e67e636.html。报道记述邮政工作人员在邮政大楼中，并引上海市档案部门研究者 Zhang Yaojun 的话称上海战斗期间水、电、煤气供应未中断；未据此证明邮政业务全程未停。该报道支持关于邮政机构、人员及城市公共服务能力的分析，但不独立证明本章的政治理论结论。

返回正文

第十五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清：政治核心占据国家身体

一、两个国家不是两个并列国家

一个最容易被掩盖的事实是：中共其实是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一个是中华民国在大陆留下的尸体、躯体和身体。1949 年以后发生的事情，既不是一个政府替换另一个政府的普通政权更迭，也不是旧社会凭空消失、新国家从零建立。实际发生的过程，是一个在根据地和战争中长出来的政治—组织核心，进入了一个比自身庞大得多、设施密集的旧国家身体，并把自己的最高权重置于其中。

这并不是说 1949 年以后的两岸在法律意义上必然并存两个完全并列的主权国家，也不预先裁决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全部法统、国际承认或国家继承争议。“两个国家”指向的是这套国家生成模型：政治核心的来源与国家身体的来源处在完全不同的层级。中华苏维埃提供的是在动员、财政、干部、军事与敌我划分中淬炼出的政治核心；中华民国留在大陆的，则是疆域、城市、行政区划、交通、金融、工业、学校、档案、专业人员、公共服务和人口构成的国家身体。两者绝非平等合并，却在入关之后被缝合进同一个国号之中。

中国的政治前身不是中华民国，而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斯大林扶持的买办政权；中华民国在大陆留下的国家尸体则参与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一句指明支配方向的组织中枢从何而来，后一句指明被调用的物质与制度承载从何而来。“PRC 就是后清”，正是在这一入关型结构上确立的强判断：边缘形成的核心在旧中央秩序崩溃或失去控制之后进入中心，接收旧身体中的可用部分，并重新安放组织方向与身份秩序。决定国家最高权重的政治核心，不是从民国旧行政结构内部自然长出来的。

国家接管绝不是中性的机关沿革交接，也不能将中共视作战争结束后接管办公楼的普通行政团队。这是一场政治重排：在旧国家留下的设施与人员之上，由新的政治核心最终决定国家资源的方向、重新

划分敌我、审查并决定何种人员可用、以及何种历史记忆必须被改写。两个来源不同的结构相互叠合，最终支撑起全国统治，复合国家才真正成形。

政治前身不是行政材料的总和。一个政权的政治前身，首先表现为它的组织纪律、干部关系、军事权威、政治身份、动员方式、敌我分类和领导核心。中华苏维埃并不是一个只有旗号而没有结构的短暂实验。1931 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选举产生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成立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于 11 月 25 日通令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并在 11 月 27 日第一次会议上决定在其下组织人民委员会作为中央行政机关。人民委员会设置外交、军事、劳动、财政、土地、教育、内务、司法、工农检察等部门，并设国家政治保卫局。此后，苏维埃国家银行于 1932 年成立；1934 年 1 月召开二苏大会后，又相继成立最高法院和中央审计委员会^{[1]}。这些机构在不同时间形成，并不等于 1931 年同日全设，也不直接证明后清理论；但它说明中华苏维埃确实形成了一个能够承担政治、行政、军事、财政和司法功能的组织核心。

中华苏维埃的核心性还表现在：它不是固定在某一块土地上的普通地方行政。第五次反“围剿”之后，中央机关随红军长征。官方材料记载，中央政府机关及工作人员随军行动，公章、油印机、桌椅等办公设施也被携带，政府工作继续进行，因此形成了“马背上的共和国”这一说法^{[2]}。这件事的意义不在于浪漫化叙述，而在于它显示出政治核心能够把机关、人员、文件、印信和工作程序作为可迁移的组织联系加以维持。尽管长征途中存在物资损失和缩减，但它证明该政权不是依赖一座固定城市才存在的市政府，而是能够在军事运动中维持组织自身。

政治前身与国家身体的第一重差异正在这里。国家身体需要城市、道路、银行、档案、学校、工厂、人口和行政区划；政治核心则必须在失去原有空间后，继续保持自己的命令、身份、组织和目标。这套核心并非到 1949 年才突然出现。官方材料没有使用“政治核心”一词，却记录了一个能够在局部区域建立中央政权、组织多层级政府、配置军政资源并维持干部运行的结构。中华苏维埃的中央机关可以从瑞金出发，转移到陕北，却不等于政治核心就此消失。此后，它可以调整名称、在抗日战争中改变政权形式、在解放战争中扩大军政范围，却始终不是从零开始寻找如何统治一个国家。中华苏维埃是政治前身，说的正是这一组织核心的延续方向，而不是说 1931 年的每一个部门都原封不动地变成 1949 年后的同名部门。

这种组织连续性并不表现为前后机构逐个对应的继承关系，不能把中华苏维埃的某个部直接等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某个部。1949 年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新的司法、军事机关相继出现，也不能据此断言法律法统自动连续。历史事实表明：此前已经存在能够处理国家事务的政治组织核心，此后又建立了新的中央国家机关。连续的是进入更大国家身体的政治组织核心，并不意味着前后机构名称逐字相同。

二、国家身体的空间、时间与运行器官

只看政治核心会遗漏既有国家实体的功能与惯性，把 1949 年后的国家简化为中华苏维埃的放大；只看行政机关、城市和基础设施又会遗漏新中枢的夺取与占据，把新政权视作民国国家机器的自然延续。这两种一源论构成了偷换。中华苏维埃需要一具国家身体，中华民国在大陆留下的国家身体则需要一个新的最高权重。二者结合不是平等互补的自愿协商，而是处于被占据关系之中：政治核心占据身体，是因为身体有不可替代的运行价值；身体承受新的最高权重，是因为其原有的政治中枢已经瓦解。

国家身体首先表现为空间。这里的空间不是抽象疆域，而是由道路、铁路、港口、城市、县制、省制、学校、医院、银行、工厂、邮政和电力网络共同构成的生活网络。政治核心即使拥有军队和干部，也不可能只凭命令在一夜之间复制这些对象。粮食、货币、交通、治安、供水、供电、档案和行政手续要继续运转，人口要维持生活，新核心就必须进入既有城市的设施和人员网络。正是这种物质与生活网络的不可替代性，迫使入关不能只是占领领土，而必然包含对国家躯体的利用、接管和重新编码。

国家身体也是时间。旧机关留下的档案、账册、印信、人员经验和行政程序，承载着过去的历史与记忆。新核心可以改变它们的归属和解释，却不能假装这些对象从未存在。银行知道怎样结算，邮政网络具备递送能力，电力机构维持供给，公安机关掌握城市登记与管理程序，地方行政人员熟悉税收、户籍与具体事务。正因为这些经验与程序先于新政权存在，接管才有现实意义。若完全不存在既有身体，所谓接管就只剩下单纯占领和另起炉灶。

上海的材料把这一点落到了具体机构上。市档案所呈现的旧行政机构，不能用抽象的“国民党机关”一语概括；它包括市政府、专业局、工作人员、档案、程序、公共事业和城市管理对象，是一个复杂网络。军管会的接管也不是把一面旗帜换成另一面便告完成，金融、工商、文教、盐税、敌产和城市公共服务都是必须面对的具体对象。对象越具体，国家身体并非空壳这一点就越清楚。^{[3]}^{[6]}

北平公安接管说明了同一件事：政治权力发生变化，旧机构却不会自动从现实中消失。警察机构可以改名，分局可以重编，印信管理权和签字权可以重新安排，军事代表也可以进入原机关共同办事；但这些变化都得在原有城市治理空间之内完成。新政治核心只有借助旧机关的地址、档案、人员和业务对象，才能把军事胜利转成城市秩序。“身体仍在运转，但最高权重已经改变”的结构，在这里已经出现。^{[4]}

中国银行的接管更清楚地显出了这种身体性。上海总处被接管后，原名、原机构和原员工原则上保留，行产受到保护，业务恢复营业。这个案例不能代替所有金融机构的历史，也不能据此断定每一位员工最终去向相同；它至少证明，接管者面对的是一个拥有业务能力、专业人员、资产、账目和社会功能的运行机构，而不是一座只等着拆除的空房子。新核心可以改变控制权和政治方向，同时调用既有的专业能力。^{[5]}

革命胜利不会凭空生出城市公共服务。城市人口要生活，工厂要开工，金融要结算，交通要恢复，邮政业务需要维持，供水、供电与煤气更不能停顿。上海市政府英文网的报道引述档案研究者 Zhang Yaojun 的话称，上海战斗期间水、电、煤气供应未中断^{[6]}。邮政机构同样面临维系通信运转的现实任务。上海材料记录的城市服务连续表明，接管并不以摧毁所有旧功能为目标，而是要把这些功能纳入新的控制关系。政治核心之所以要占据这具身体，恰恰在于其器官依然拥有不可或缺的运行价值。

“中华民国大陆国家尸体”不是空壳，也不是可以随意书写的白纸。尸体、躯体与身体这三个词形并存，正体现了这一理论张力。使用“尸体”，指向的是原有国家政治生命的断裂：旧政权的中枢失去控制，发号施令的政治灵魂被新核心夺取；但它不是对生活于其中的普通人的指称，也不意味着所有现实基础归于乌有。

“躯体”与“身体”则标明这具遗存绝非无用残骸，而是保留着器官、记忆、损伤、功能、惯性与日常生活的真实载体。道路、工厂、银行、档案、行政区划与专业人员并未随旧中枢的崩溃而消散。如果只称其为“壳体”，便容易将其误解为一副任由新代码随意写入的空囊；如果只谈“躯体”，则可能磨平政治生命被切断的冷酷事实；若单言“身体”，又极易将政治核心的占据混同于中性的国家建设。政治核心进入的，正是这样一具带着沉重历史惯性与复杂组织的身体：既要借用其运转维持统治，又必须切断旧的中枢连接，使其在新的最高权重支配下继续承载国家生活。

三、从根据地核心到全国中央机关

国家身体被接管，并不会自动按照新核心的方向运行。军队进入城市控制了地理空间，接管印信掌握了公文凭证，机关更名获得了政治名义；但这些孤立动作本身，并不能证明全国范围的支配过程已经完成。政治核心还必须把最高权重放进国家身体内部，使关键资源、人员任用、组织忠诚、政策解释和安全判断最终服从一条新的组织链。

根据地机关进入全国国家，绝不是把一座小房子按比例放大。根据地机关原先面对的是有限人口、有限地域和高度战争化的环境；全国国家机关面对的，却是数倍扩大的行政空间、不同城市的专业分工、复杂的交通和金融网络，以及大量没有参加根据地政治生活的人口。要占据这样的国家身体，政治核心必须把在根据地形成的组织能力，转化为能够处理全国复杂性的国家机关。

这场转化不是换个名称就能完成的。中央机关必须有稳定的职能边界，能够向地方发出命令并收到报告，也能分配干部和资源，处理财政、交通、粮食、金融、公安、教育和司法等不同事务。根据地政权时期形成的“党—军—政”联系，给出了核心方向；全国国家机关仍须面对新的对象和规模。把根据地机关机械搬到全国，无法处理国家身体内部的巨大差异；完全切断根据地的组织经验，政治核心又会失去自己的命令链。

政治核心进入全国空间后，必须建立正式的国家机关，使原先在根据地形成的组织能力取得全国国家形式。《共同纲领》第十三条规定，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定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7]}。正式中央机关为政治核心提供了合法化的国家外观、行政分工与全国命令通道；中华苏维埃及其后续党军组织，则为国家机关提供最高方向、干部来源、军事支撑与组织纪律。国家机关构成身体的中枢系统，中枢的最高方向却来自政治核心。

国号的宣告并不能代替中央机构的实际成形。以最高人民检察署的建立过程为例，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任命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10 月 22 日检察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宣布该署成立，11 月 1 日启用印信、正式办公^{[8]}。国家名称只是结果的标志，不能代替全部过程。新政权既不能脱离真实行政功能仅仅依靠口号发号施令，国家机关运转的背后也始终受到政治核心的权重统辖。

这种结合并不意味着国家机关完全等于党组织，也不意味着所有正式机关只是装饰。国家机关需要处理真实行政事务，专业人员需要解决真实问题，财政和交通需要实际运转，司法和公安需要形成程序。政治核心如果只会发出政治口号而不能让机关运行，就不能占据国家身体。恰恰因为它必须让机关运转，才会有选择地保留旧国家的行政能力、金融经验、城市管理知识和专业人员。

新核心要成为全国政权，就必须把自己的组织系统放进去；它不能只在根据地保留一套小国家，也不能只靠军队驻扎在城市外部。机关能够运转，并不说明政治核心已经退到幕后。新机关的重大方向、人员边界、敌我判断和资源排序，仍受政治权重控制。国家机关由此呈现双重结构：行政部门、金融机构、公安系统、教育机构和地方政府构成正式层面；在更深处，政治组织链决定谁能控制这些机构、哪些命令拥有最终效力、哪些人员能够进入关键位置。这种双重结构只是政治嵌入的起点，尚不足以说明政治组织链已经怎样深入每一种日常机构。占据国家身体，就是把政治核心从一套可以迁移的组织，转化为一套能够支配巨大国家身体的全国结构。

四、地方整合中的翻译权、控制与层级

政治核心进入国家身体以后，中央机关仍只是身体的一部分。国家能否真正运行，还要看中央命令能否到达地方，地方机关能否把命令翻译成行政事务，地方人员能否进入新的组织关系。“全国解放”不会自动完成中央—地方整合；从军事占领、军管接收、地方重编到常设行政，每一步都属于这一过程。

这一过程首先显出国家身体并不均质。不同地区的城市规模、交通条件、原有机关、战争状态、人员结构和地方社会各不相同。政治核心不能在同一时刻用同一把尺子处理所有部位，而必须先控制关键节点，再把新命令逐步传入更广区域。有的地方先军管，有的地方先改组；有的机构强调人员保留，有的机构强调政治审查；有的业务优先恢复，有的对象需要长期清理。北平和上海的接管材料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它们能够代替全国，而是因为它们显出了军事胜利转为行政运行所必须经过的动作：谁进入旧机关，谁掌握印信，谁负责签字，旧人员怎样共同办事，分局怎样重编，公共服务怎样继续。

中央—地方整合还涉及干部。中央机关即使有完整组织法，也必须有人把它带到地方。干部的派遣、训练、任用和考核，把中央的政治权重转化为地方的执行秩序。旧地方人员可能熟悉当地账册、人口、道路和事务，但他们未必拥有新核心要求的政治身份；新派干部可能拥有政治忠诚，却未必熟悉地方业务。两者的组合，就形成选择性保留和重新赋位的现实过程：专业能力可以被调用，政治位置必须重排。

地方整合也涉及翻译。中央命令不能直接等同于地方生活，必须被翻译成征粮、治安、金融、交通、教育、卫生、户籍和司法等具体事务。谁负责翻译，谁就拥有相当重要的权力。旧地方机关掌握的知识可以帮助新政权理解地方，但新政权必须建立新的命令和监督关系，防止地方专业知识重新变成独立的政治中心。国家身体越复杂，政治核心越需要借助地方知识；它依赖地方知识，也就必须通过组织和干部关系控制知识的归属。

从规范层面看，《共同纲领》第十四条至第十六条明确了地方制度的过渡秩序：在初解放地区实施军事管制，取消旧政权机关，由军管会与地方人民政府建立秩序；在普选前由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逐步代行代表大会职权；下级政府一律服从上级与中央人民政府，并由中央法令划分职权范围^{[7]}。1949 年北平各界代表会议的召开，以及随后中央关于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的颁布，均体现出地方权力形态是经过具体代表会议阶段逐步过渡的^{[9]}。

中央—地方整合既不是中央简单替代地方，也不是地方自然服从中央，而是中央政治核心把地方机关、人员、档案和业务逐步纳入新的权重结构。这个过程可能有差异、摩擦和延迟：可能出现机构名称已经改变、实际人员仍在适应，也可能出现城市服务先恢复、政治重编随后才完成。正因为这一过程不能在一夜之间结束，复合国家才显出真实的生成形态——它不是由一次宣告造出来的，而是在国家身体的不同部位逐步完成接管和重新赋位。

后清，不是一个只存在于中央首都的比喻。入关型政权真正完成入关，必须让地方身体也接受新的核心。若中央有自己的组织、军队和机关，而地方仍完全按照旧国家的权重运行，政治核心就还没有真正占据国家身体。它只能算取得了首都和名义，不能算取得了国家。中央机关建立、城市接管和地方整合，因而共同构成国家身体被占据的三个层次：中央建立中枢，城市接收器官，地方把新权重传入日常。战争组织还要转成常设国家。入关真正完成时，核心已经不只是进入城市，而是进入国家身体的内部循环。

五、选择性保留与重新赋位

接管在叙述中容易滑向两端：要么被理解成将旧国家彻底抹去、新政权从无到有建立全部机构；要么被看作中华民国的既有机关、人员和规程未发生实质改变，只是换了旗帜与国号。前一种倾向是假定推倒重来，后一种倾向是预设原样继承，二者都脱离了真实的接管机制。接管之所以是一种政治动作，

就在于保留、排除、审查、改名、重编、调用和重新赋位同时发生。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已经被占据，城门上的旗帜和新发布的国号都不够。还要看国家内部的高权重方向是否改变：什么被算作重要事项，谁被认定为敌人，什么人可以进入机关，哪一个组织拥有最后解释权，资源优先供应什么目标，哪些历史得到保存，哪些又被重新命名。正是这些决定，显示国家身体究竟受谁支配。

被排除的部分，则由政治关系决定。机关、人员、档案和程序并非一概可以继续使用；政治身份、军事关系、敌我归属、财产来源和组织忠诚，都会影响一个对象能否留下。接管在这里不是技术维修，而是重新分类。有人可能因专业能力被留用，另一些人可能因政治身份受到审查；有的名称因行政需要暂时沿用，有的必须立即取消；有的档案要保存以供管理，原有叙述却可能被重新解释。器官可以留在身体里，支配器官之间关系的中枢却会更换。

原有机构一旦进入新结构，边界和权力位置就会随着改组而变化。北平公安材料中的原分局共同办事、军事代表签字、分局重编和印信管理权变化，表明原分局并非完整搬入新秩序。机关是通过签字、印信和编制的重排，被接入新的命令链的。建立这条命令链不必先摧毁每一张桌子，只须让桌子后面的人明白，谁有决定权，谁有签字权，谁能够解释规则。^{[4]}

中国银行总处的原名、原机构和原员工原则上留用，是为了让金融业务恢复；行产受到保护，是为了维持国家身体的资产基础；恢复营业，则是为了让城市经济继续。被保留下来的，从来不等于原银行的政治地位和员工旧有权力也原封不动。新核心借助接管命令、人员审查、组织关系和业务方向进入机构：专业能力得以留下，最高权重已经改变。^{[5]}

因此，不能把“旧人员被调用”理解为旧政治权力继续存在，也不能把“新印信被启用”理解为旧国家身体完全死亡。接管的核心动作恰恰是把能力与权重拆开：能力可以留下，权重必须转移；程序可以调用，解释权必须重排；人员可以选择性保留，忠诚和安全判断必须纳入新的组织链。这个过程既不是全部推倒重来，也不是原样继承，而是政治核心对国家身体的重新赋位。

中华民国留下的国家身体，原本已经具有行政、金融、工业和城市服务的程序与专业逻辑。新政治核心需要这些程序，因而不会把它们全部摧毁；但它也不允许程序以自身为目的，脱离政治组织的最高权重。于是，继续使用程序的同时，功能次序被重新安排；专业能力被调用，独立中介被压低；机关照常办公，命令来源却已经改变；公共服务仍在运转，它所处的国家政治关系已经不同。

“重新赋位”就是这种变化的准确说法。它不把人和机构一刀切成旧、新两类，而是重新规定它们的位置、权限和用途。旧政府的内部记录、记录旧合法性叙事的档案，可以成为新控制体系的管理材料；一名专业人员从旧行政体系的成员变成新国家机关中经过筛选的技术人员；一座银行从旧国家金融体系的节点变成新政治权力可以调用的金融机构；一套城市公共服务从旧政府的行政功能变成新政府证明自身能够统治城市的运行基础。同一个对象仍然存在，但它在国家结构中的位置已经不同。

所以，接管不是给旧国家换名字，也不是把旧国家完整保存。它是改变对象的归属和权重。新核心不必消灭所有旧能力，因为消灭所有能力会让自己失去统治身体；但它必须消灭旧能力作为独立政治中心的可能性。人员可以留下，独立忠诚不能留下；档案可以保存，旧解释权不能完整留下；机关可以运行，旧命令来源不能继续占据最高位置；城市可以恢复，城市政治不能回到原来的中枢。

在接管与国家整合的机制中，保留旧机关、人员与设施，未必意味着占据程度的减轻；当旧国家的能力能够在新中枢的指挥下继续运转时，政治占据反而可能更为深入。有效的占据并不以将既有国家机器彻底砸碎为衡量尺度，关键在于这具身体是否听从新的中枢调遣。若政权清除全部旧行政人员、关闭全部工厂与银行、焚毁所有档案并废止全部程序，换来的只是一片陷入瘫痪的废墟；废墟足以说明旧国家已经战败，却不能说明新核心取得了国家能力。只会清零的政权可以完成破坏，未必能够生成国家。

入关型政治的重点，在于对旧国家身体进行精确的甄别与分类：明确何者必须摧毁，何者需要保留，何者可以暂时留用但必须改变政治归属，又有何种对象应留待日后由组织节点实施控制。

旧能力被调用，并不等于政治妥协；调用本身就是占据技术。银行继续办理业务，为新核心保存金融身体；公安维持运作，提供治安身体；邮政、水、电、煤气还要继续供应，城市生活需要这些基本功能；档案与专业人员留下，知识和管理能力才可被接收。每一项保留下来的能力，都可能成为新的控制对象。它们的归属已经从旧国家中枢转入新国家的命令链。

衡量制度与机构的新旧，因此不能单看建筑、面孔或表格的更换。只要旧对象进入了新的权力关系，便已发生结构性位移：银行继续营业却执行新政权的金融指令，旧警察机构沿用原有业务却在新印信与新编制下运转，旧专业人员在新的审查体系中履职。被接收调用的旧身体能力越多，新核心就越可能深入国家的各个角落；而新核心对最高权重的掌控越牢固，旧身体依循原有政治逻辑复活的可能性也就越小。在这一特定条件下，保留能力本身成为了深化占据的重要路径。

六、国号的双重作用与后清的生成结构

国家名称在复合国家的形成中有特殊作用。新国号不是贴在旧身体表面的标签；它既要完成政治核心的全国化，也要给国家身体重新命名。原有国家的政治生命已经断裂而留下尸体，新的政治核心却还要让这具身体以新名称继续运转。这个名称一面宣布旧政治中枢失去统治，一面把旧国家的疆域、人口和设施纳入新的全国国家名义。

正因如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不直接等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谓“直接变成”，等于取消身体与核心的分离，把根据地国家描绘成只要扩大疆域便自然成为全国国家。“两个国家”所指明的是：中华苏维埃原有的政治核心没有足够大的身体，而中华民国留在大陆的身体又不能靠自身的政治生命继续支配。新国号将二者缝合在一起，却没有消除它们来源上的差别。

也不能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理解为中华民国只换了一个执政党。若只是换党，中华苏维埃的政治组织、军队、干部、敌我分类和根据地经验何以取得国家最高权重，便无从解释；城市机关、印信、人员和命令关系为何必须重新安排，同样无从解释。执政党更替只说明表面的权力易手，而实际发生的则是另一套政治核心占据了国家身体。

“二者结合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的“结合”，不是两个相等部分的平滑相加。中华苏维埃与中华民国大陆结构不是各拿一半，然后共同组成一个中性的共和国。政治核心取得的是方向权、命令权、身份权和最高权重；国家身体提供的是运行空间、机关材料、人口规模、城市网络、财政金融、交通工业和专业能力。一个决定怎样使用身体，一个使这种使用成为可能。二者结合的结果，因而是复合国家，而不是平等联盟。

因此，该过程不同于单纯的“现代化接续”。现代化接续关注制度、工业、城市和行政能力怎样延续发展；核心命题则直指谁占据这些能力，谁重新规定它们的次序和用途，它们转而为谁服务，以及原有国家的政治生命怎样被切断。城市和银行继续营业，不等于政治生命继续；机关和专业人员得到保留，也不等于旧中枢仍然存在。身体的运行与政治生命不是同一回事。

只说“中共像清朝”，分析便只剩一层宽泛的类比。中央集权、军事征服、官僚制度和宣传控制，都能制造表面相似，却无法构成结构分析的核心。这里存在两组完整生成链的结构对照：后金—入关—清朝，与中华苏维埃—入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明朝和中华民国则分别处于被取代的旧中央位置。“满清共产主义”所指的，正是核心先在边缘形成、继而进入旧国家身体的政治方式。

这构成了明确的结构对应。后金对应中华苏维埃，是因为二者都处在入关前核心的位置；清朝对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因为二者都处在入关后占据中心、接收旧国家、建立全国统治的位置；明朝对应中华民国，是因为二者都代表被新入关集团取代的旧中央国家。这里的对应不是服饰、礼仪、族名或朝代名称的相似，而是小核心进入旧国家并重新组织国家身体的政治过程。后金和中华苏维埃都代表入关之前的小核心：在中心之外形成自身的纪律、军队、财政、身份和统治能力，然后等待或制造进入中心的机会。清朝不是后金简单改名，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是中华苏维埃简单扩大。

结构比较并不以共产党人与满洲人在族群上天然同一为前提，亦不预设清朝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制度细节上完全重合。“后清”也不是朝代复刻。清朝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当然存在时代、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但这些差异并不取消二者的结构对应。正因为条件和语言已经不同，结构对应才有意义：不同的思想语言、军事技术和现代组织形式，仍可能完成相似的入关动作。“满清共产主义”并不是说中共照用了清朝的全部制度，而是指出，它把边缘核心进入本部、接收旧国家、改变主体社会的结构推进到了现代政治中。

这不是两个传统的相遇，不是两个制度因素的相加，也不是一个全新国家从白纸上出现。它是一个入关型政治核心对旧国家身体的占据和重新赋位。身体没有被完整清零，核心也没有被旧身体同化。正

是在保留与改造、连续与断裂、调用与清洗、运行与重权之间，中华人民共和国 / 后清作为复合国家形成。

结构判断和具体史实呈现为不同层面的问题。史料能够证明中华苏维埃设有中央机关，也能证明北平、上海发生接管，银行、公安、行政和公共服务经过重新安排；但史料不会自行说出“这就是后清”。“后清”属于理论命名，并非 1949 年历史参与者的官方自称；它所指向的正是这套入关型政治结构，而非轻飘飘的修辞。“后清”这一理论称谓表明：该结构不是普通共和国，而是入关型核心对旧国家身体的重新占据。反过来，理论也不能代替史料：入关模型成立，不等于直接证明某一机构的具体继承关系、某一群体的全部命运或得出确定的法律结论。理论判断再强，也不能任意扩张事实细节。材料与理论不能直接画等号，也不能彼此拆开。只剩史料，接管便成为一叠档案；只剩理论，国家身体又会沦为无法落地的比喻。历史事实构成了理论得以成立的中间层。

将中华苏维埃政权定性为“斯大林扶持的买办政权”，断定“当时的中共在搞分裂国家的实质性行为”，以及认为“站在民国政府的角度，反共和剿匪一点没错”，这三项命题交织着事实前提、政治评价与法律问题。其中，“斯大林扶持”与分裂行动的具体史实前提、“分裂国家”与国家继承所涉及的全部法律含义，在经验材料与法理层面均尚未穷尽核验，无法由现有九注独立确证；而“买办政权”与剿匪正当性则属于政治与理论判断，不能等同于已核定的事实。经验材料的暂缺不等于相关政治结构分析已被反证，但理论判断的明确同样不能在缺乏依据的情况下扩张事实细节。

政治核心与国家身体各有自己的生成史；两条线在 1949 年前后相遇，形成新的复合结构。把它们压成一条自然连续线，“中共其实是两个国家”的核心判断就会消失；把它们拆成彼此毫无关系的对象，又无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什么能在一个庞大的旧国家身体上迅速展开。本质上中国现在是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一个是中华民国留在大陆的尸体、躯体和身体。中华苏维埃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大陆身体也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核心进入国家身体，接收它的能力，重新安排它的器官，改变它的最高权重；二者结合，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PRC 就是后清。

七、旧痕迹、专业逻辑与身体惯性

政治核心占据国家身体之后，旧身体留下的历史痕迹并不会随即消失。道路依然沿着原有的走向延伸，铁路连接着既有的枢纽与站点；银行离不开原有的账务体系与专业知识，行政区划照常承担日常管理功能，档案系统也保存着过去的行政与社会记录。学校在接管初期同样面临教学秩序维系的现实需求，原有的课程设置与师资力量在机制上承载着长期的知识积累与教学惯性；尽管具体学校、具体地区在不同时期的延续程度与调整范围仍有待结合专门史料深入核实，但这套知识和人事沉淀绝非随着政权交替便能凭空抹去。新核心拥有了命名权，能够重排各项制度的权限与意识形态解释，却不能直接让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物质与社会材料化为乌有。

旧痕迹没有消失，复合国家便始终带着内在张力。政治核心要求新的身份和忠诚，国家身体里却留着旧人员、旧知识、旧城市和旧生活习惯；政治核心要求新的历史解释，档案和建筑却留下不能完全服

从新叙述的痕迹；新的组织方向还会碰到专业系统自身的操作逻辑。所谓叠合，不是抹平差异，而是在差异仍然存在时建立更高权重的控制。

这具国家身体也不是任由摆布的材料，它有惯性、有阻力，也有自身的复杂性。新核心要占据这具身体，就必须不断处理它的反应：哪些旧制度可以调用，哪些旧人员需要改造，哪些地方经验必须保留，哪些历史记忆要重新排列，哪些专业逻辑会同政治要求发生冲突。接管不是一次签字即可结束的仪式，而是持续发生的动作。

身体有惯性，并不表示旧政治中心因此复活。最高权重、命令链和组织控制一旦转移，留下的旧痕迹便会进入新的国家结构：旧银行照常营业，却受新政权支配；旧城市交给新机关治理；旧档案在新的解释框架下管理；旧专业人员则进入新的组织关系。对象继续存在，已经不能再决定国家的最高方向。

“两个国家结合”从来不是将两个完整国家原样并排保存，而是让两个来源不同的结构在不对称关系中叠合。中华苏维埃这个政治核心不能脱离国家身体，中华民国留在大陆的身体也不能再由原来的中枢支配。二者共处于新的国家名义下，却不是平等伙伴，而是核心与身体的关系。

八、现代满城的入口与日常控制

中央机关的建立、城市接管的展开与地方制度的逐步过渡，标志着政治核心已经跨过门槛，确立了对国家身体的最高权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政治嵌入已经抵达终点。由高层机关发出的命令，不会自动落实到每所学校、每家医院、每个工厂和每一个基层单位；宏观上的政权叠合，尚未天然转化为日常维度的社会控制网络。

“通过党校、机关、统战部等钉子，扎进中华民国的尸体，就像满城。”这里的钉子不是整个身体，满城也不是整座城市。它所体现的政治逻辑在于：无需占满全部社会空间，也不必将全社会改造为单一的民族居住区，而是通过在战略要害处设置少数体量较小却权重极高的政治节点，以驻防、隔离、控制与身份编组的方式，改变整个庞大空间的权力结构。

将党校作为干部训练的基地、在机关内部设置承接领导关系的节点、依托组织系统管理干部与人事判断、借助统战部联系整合不同的社会阶层与政治力量，并通过单位体制向基层传导政治权重——这些组织形态为政治核心深入国家身体提供了通道。取得国家身体，掌握中央机关、干部、组织和国家命令的支配权，是这些组织节点得以立足的前提；而“后清”也绝非在 1949 年宣告成立那一刻便已停滞的终点。这些高权重钉子如何向日常组织进一步穿透，构成了现代满城向深处展开的后续机制。

党委、党校、组织部门、统战部门和单位党组织构成的全国网络，其在日常机制中的具体作用仍需材料展开；现代满城概念也不能在此替代人工渔猎、主体民族满清化或两面人的完整理论。国家生成的门槛到这里已经跨过，能够确定的是政治核心对国家身体的占据；至于政治权重如何沿着关键节点进入身体各处，则有待结合具体材料进一步说明。

政治核心进入国家身体，是后清生成的关键动作；政治节点进入机关、单位和社会组织，则使后清成为日常结构。现代满城必须安放在这个先后关系中：没有核心对身体的占据，现代满城无处安放；没有节点向日常组织扩展，后清的身体也无法在日常层面被观察。

第十五章注释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故事》，发布机构：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发布日期：2021 年 11 月 12 日，访问日期：2026 年 8 月 22 日，网址：https://www.dswxyjy.org.cn/n1/2021/1112/c219000-32280851.html。支撑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中革军委、人民委员会各部、国家政治保卫局、最高法院、中央审计委员会、苏维埃国家银行以及乡、区、县、省和全国多层级政权等事实；不直接证明“两个国家”或“后清”理论，也不承担法律法统判断。本文为胡昌勇撰文，党史院网站转载《人民政协报》；所列机关分期形成，不表示同日全部建立。

返回正文

[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马背上”的共和国》，发布机构：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发布日期：2016 年 8 月 31 日，访问日期：2026 年 8 月 22 日，网址：https://www.dswxyjy.org.cn/n1/2016/0831/c396980-28680828.html。支撑中央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公章、油印机及办公设施随军、政府工作继续等事实；不证明政治组织与后来的中央国家机关之间存在自动法律连续。原报道由新华社发出，党史院转载；同文记有物资损失和缩减，组织关系延续不等于全部人员、设施无损迁移。

返回正文

[3]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时期上海地方行政机构档案指南》，发布机构：上海市档案馆，访问日期：2026 年 8 月 22 日，网址：http://www.shda.gov.cn/daly/gczn/202509/t20250919_74648.html。支撑上海行政机构、人员、档案、程序、公用事业及接管对象等事实；不证明上海个案代表全国所有城市，也不直接证明作者理论。该指南为跨时期、跨全宗资料，不能作为 1949 年同一时点的完整组织图，也不能仅由目录证明每项接管均已实际执行。

返回正文

[4] 北京市公安局警察博物馆，《北京市公安局成立前后》及《历史的足迹——北京市公安局建局初期的若干个第一次》，发布机构：北京市公安局，访问日期：2026 年 8 月 22 日，网址：https://gaj.beijing.gov.cn/jcbwg/yjcg/jsyj/202006/t20200628_1933167.html；https://gaj.beijing.gov.cn/jcbwg/yjcg/jsyj/202006/t20200628_1933244.html。支撑北平公安接

管、共同办事、军事代表签字、机构改名、分局重编和印信管理变化等事实；不证明所有旧人员全部留用或全部消失。《入城后初期工作计划》于 1949 年 1 月 21 日在入城前拟定；2 月 10 日第 0001 号文件的未奉接管命令条件针对各分局。规定与各处实际执行须分开，且北平的个案材料并不代表全国各地呈现同步转换。

返回正文 返回正文 2

[5] 中国银行，《各地职工迎接解放，中行被顺利接管（1949 年）》，发布机构：中国银行，访问日期：2026 年 8 月 22 日，网址：https://www.boc.cn/big5/aboutboc/ab7/200809/t20080926_6908.html。支撑上海中国银行总处接管、原名原机构、原员工原则上留用、保护行产及恢复营业等事实；“原则上留用”不等于每名员工最终去向相同，也不代表全部金融机构。1949 年 5 月 28 日上海总处接管、6 月 4 日宣布方针及新总经理、1950 年 4 月 9 日新董事会成立，属于不同节点；恢复营业见页面 1949 年 6 月图片说明。正文对保留措施的用途、人员审查与最高权重的分析属于作者的机制解释，不表示这些动机与程序已由该银行页面逐项直接证实。

返回正文 返回正文 2

[6] 上海市档案馆，《【红色档案】上海市军管会关于各方面接管工作第 1 号布告》；上海市人民政府英文网，《After 75 years, PLA's 'miraculous' liberation of Shanghai remembered》，访问日期：2026 年 8 月 22 日，网址：https://www.shda.gov.cn/dawh/hsda/202509/t20250919_74953.html；https://english.shanghai.gov.cn/en-Latest-WhatsNew/20240527/7374bb72330d4d9e9efef7ad5e67e636.html。前一网页导言介绍 1949 年 5—6 月六件、涉及不同领域的第 1 号布告，支撑接管对象范围；未核六件影像全文。后一报道记载邮政人员在大楼中，并引上海档案部门研究者 Zhang Yaojun 的话称上海战斗期间水、电、煤气未中断；不能据此证明邮政业务全程未停。不证明全国所有城市同型，也不承担作者理论结论。

返回正文 返回正文 2

[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 年 9 月 29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黑龙江省政协网站转载，网页显示题名《中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标注 2009 年 3 月 14 日；网址：https://hljzx.gov.cn/contents/73/7476.html。第 13 条涉及中央机关产生的制度安排，第 14—16 条涉及军管、地方代表会议、上下级政府及中央地方职权；条文证明规范安排，不证明所有地区同日同型落实，也不直接证明作者理论。

返回正文 返回正文 2

[8] 《与共和国法治同行——新中国 70 年检察大事记》，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来源《检察日报》，2019 年 10 月 1 日；网址：https://www.spp.gov.cn/spp/zdgz/201910/t20191001_433520.shtml。1949 年 10 月 1 日任命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10 月 22 日宣布成立，11 月 1 日启用印信并正式办公。此为后出历史大事记，不等于完整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任命状影像逐字核验或全部机关同步形成的证明。

返回正文

[9] 王海娟，《【追光人大·足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云南人大网转载《法治日报》，2025 年 1 月 14 日；网址：https://www.ynrd.gov.cn/html/2025/zgrd_0114/4031268.html。支撑 1949 年北平各界代表会议、北京第二届会议代行职权及 12 月 2 日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等过渡节点；此文不是三项通则全文，也不证明全国所有地区同步完成相同转换。

返回正文

史料说明：本章论证依据现有网页与资料缓存，未核查完整原始档案。斯大林扶持等命题的具体史料前提、分裂国家及国家继承所涉法律问题，仍属待核范围；买办政权、民国剿匪正当性与后清命名等理论与政治判断，不作为已经由以上九注独立证明的事实。学校课程、师资等旧痕迹延续的具体地区、时期和程度仍待专门材料核定，现有材料不足以推出其在全部范围内原样保留。

第十六章　党委、党校、机关与统战：现代满城

一、国家身体内部的钉子与现代满城

后金不是清朝，但清朝从后金入关而来；中华苏维埃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中华苏维埃入关而来。明朝被清朝接收尸体，中华民国大陆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接收尸体。

国家身体被占据之后，最先出现的并非一套凭空拔起的新建筑，而是旧有器官继续运转，政治方向却被重新接上。正因如此，“满清共产主义”构成一个不可拆分的政治组织对象：满清式的渔猎政治没有停留在边缘劫掠；入关之后，它住下来，接收、改造并利用旧制度。共产主义同样没有停留在抽象教义；沿着从中华苏维埃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条入关线，它取得了现代组织形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继承的是渔猎的内殖民风格。这里的“继承”无关血统，指的是政治组织方式和国家改造方向。

党校、机关与统战部，不是后来附加在国家身体外面的普通部门，而是政治核心进入既有国家空间时选择的钉子。钉子无须铺满全部空间，满城也无须等同于整座城市；只要扎进决定干部形成、机关方向和社会关系的高权重位置，就能牵动仍保有原来名称、机构、专业人员和行政程序的国家身体。这

一变化并非一次普通的政府更替，而是共产主义组织体系在旧国家身体内部建立第二政治中心、反对国家主权独占，并借助现代制度形式把自身方向变成国家生活的方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政治核心凭空捏造的空壳。它的政治核心来自中华苏维埃所积累的组织、动员、干部和战争体系；它所进入并占据的国家身体，则来自中华民国在大陆留下的城市、机关、道路、金融、学校、工厂、档案、人口和公共生活。二者在入关后被缝合进同一个国家名称之下，才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 后清这一深层叠合结构^{[1]}。

国家身体被占据，不等于每个机关、每所学校、每家工厂和每类社会关系都在同一天发生同一种改变。取得决定国家方向的最高权重，只是占据的一端；政治核心还必须找到进入日常结构的节点，把这一方向传到机关、单位和具体人群。中央政府可以在法理和宣告中成立；如果政治核心没有进入国家日常运行的关节，它仍只是一个居于上方的统治中心，不会自动形成一套能够持续穿透国家身体的组织结构。

这正是“钉子问题”的实质所在：通过党校、机关、统战部等钉子，扎进中华民国的尸体，就像满城。

这不是温和的制度比喻。“中华民国的尸体”表明旧国家身体没有凭空消失，并非中性的“制度遗产”；“钉子”表明政治核心对旧身体的占据未必依靠全面拆除，也可以依靠关键位置的嵌入，并非普通的“组织资源”；“像满城”则确立了结构形态，表明政治核心无须占满全部空间，只要在战略节点形成驻防，就足以改变整座城市的权力方向。城市原有的街道与建筑仍在，许多旧人员仍可在其中工作，但决定方向的最高权重已经换了主人。

满城首先是一种具体的历史统治结构，指向驻防、隔离、编组与高权重位置，不能泛化为抽象的民族性格。它的支配力来自体量与权力的不对称：体量较小的高权重政治节点嵌进更为庞大的城市，无须将全空间同一身份化，便能改变权力分布。

将这一结构置于现代政治分析中，并不意味着把清代满城当成可以逐格对照的图纸。现代党委不是八旗驻防的原样复制，党组不是旗分的现代改称，党校不是旗丁训练所，统战部也不是带有城墙的驻防城。“像满城”的判断之所以成立，在于满清共产主义在现代组织条件下重现了高权重嵌入的支配逻辑：面对规模更大、关系更复杂的现代社会空间，政治核心无须消灭全部旧结构，旧器官得以保留和调用，方向、编组和政治归属却被改换；政治核心无须赋予每个人相同的政治身份，便能改变哪些关系更靠近权力中心，哪些人更容易被训练、安排和联系。

现代满城不是用一座新城在地理上替换旧城，而是一组高权重节点嵌进旧城内部。党委、党组、机关基层党组织、机关纪委、党校、统战部以及国企党组织，各自承担不同职责，所处层级各异，彼此不可替代。领导、业务、干部、教育、监督、代表人士联系以及单位内部的党组织关系各有其位，共同构成政治核心穿透国家身体的复合通道。这些节点不能压成一个含混的“党委网络”。这种机制不是

一张封闭的机构名册，也不靠机构数量，必须在具体制度运转中辨认清楚：哪些旧器官被保留，新节点安放在何处，谁进入了这些承重位置掌管方向，使政治核心在国家身体内持续存在。

二、国家机关中的党内组织位置

辨认政治核心进入国家机关的过程，需要同时考察国家机关本身的形成步骤与党内组织位置的建立。相关的历史材料既包含当年的规范文本，也包含后出的历史叙述，两类来源分别记录了不同维度的组织事实。

根据 1949 年 9 月 29 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十三条，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定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4]}。在地方层面，《共同纲领》第十四条规定，“在普选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逐步地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4]}。从政协全体会议到组织法，再到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与地方各界代表会议，这些规范文本表明了国家机关的生成步骤，但这并不等于各项制度在当时已全部落实。

在中央机关的设立上，国家机构的成形依赖具体的组织环节。以最高人民检察署为例：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任命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10 月 22 日，检察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宣布最高人民检察署成立；11 月 1 日，该署启用印信正式办公^{[5]}。从职务任命、机构宣布成立到启用印信履职，国家机关依靠实际步骤逐步建立；国号的宣告本身并不等同于机构的实际成形。

这些事实不能被推成“所有机关都在同一天以同一种方式完成嵌入”。地方代表会议的材料显示，地方政权经历了过渡。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以及随后关于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制度安排，都说明中央与地方的组织关系是在不同时段、不同层级和不同制度场景中展开的。地方代表会议可以代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部分职权，不等于全国所有地区同时完成完全相同的制度转换。^{[6]}

正是在国家机关逐步成形的过程中，党内组织位置被置于行政系统内部。1949 年 11 月，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政府内建立党组，并在政务院所属的各委员会、部、会、署等机构中设立分党组或党组小组^{[3]}。伴随这一设置，请示报告制度被嵌入行政系统，使政务院及其所属各部门承担起向党内“事前请示、事后报告”的组织义务，行政职能由此与党内请示报告关系相接^{[3]}。

历史材料所记录的这一节点，反映的是政治核心进入国家机关的机制：它无须在形式上废除政府机关，也无须立刻替换全部原有的行政与技术人员，机关仍旧承担常规业务；但其内部已经生长出承接政治

领导、履行请示报告的党内组织位置。这一位置的建立，改变了行政机关向谁请示、由谁形成政治判断，以及决策依赖何种组织关系传递。机关的实际业务与党内组织关系由此叠合在一起。

后出的党史叙述将 1949 年 11 月 9 日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组织中国共产党党委会的决定》和《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建立中国共产党党组的决定》，视为党对国家政权实施组织领导的重要节点，并记载各级政府机关普遍建立党的组织以加强领导^{[7]}。这一后出叙述并非 1949 年两个决定的原始全文，不能据此断言所有机关在同日以同型方式完成覆盖；但它支撑了中央政府内部建立党委会与党组这两个关键组织节点的事实。至于分党组或党组小组的设置与请示报告义务，则主要见于前述关于请示报告制度的历史考察材料^{[3]}。

1949 年的国家形态并非在行政机构之外悬浮着另一套不相干的实体。随着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及各部门的建立，党组织进入了国家机关的领导与信息传递链条。留存下来的不是“党直接取代国家”的单一口号，而是行政机关依循法律、印信和程序维持运转，党组织则在政治方向、组织领导、请示报告和干部管理中占据特殊位置。这正是占据进入日常结构的第一条可见路径：政治核心确立于中央，指令与政治方向向下传导，下级则通过自下而上的请示报告向上负责，经由中央政府、各级机关延伸至具体的干部、单位与部门。原有国家器官仍在运转，机关内部却已建立了新的组织骨架。

三、同一机关中的不同关系

机关最容易让人误以为国家身体已经“全部改变”。牌子、印信、办公室和行政职能都清楚可见，于是机关仿佛成了一个内部毫无差异的完整器官。真正的嵌入却往往落在机关内部的组织关系，而不只落在名称更换上。如果用笼统的“党组织”抹平党委、党组、机关党委、机关纪委与党支部之间的差异，政治节点如何进入国家身体便无法解释。它们在制度中所处层级各异，面对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企业与基层场景时的权责边界也大不相同。

党委是党的地方或基层组织体系中的重要组织形式。党组不是党委的简称，也不能作为一切机关党组织的通称，其设立有着具体的范围与条件。依据 2019 年《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第二条，党组是党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和其他非党组织的领导机关中设立的领导机构，在本单位发挥领导作用^{[10]}。与之处于不同制度位置的是机关基层党组织，依照 2019 年《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第五条，机关党的基层委员会由党员大会或者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11]}。两类组织处于不同的制度序列，既不能把基层党组织的选举产生方式套用于党组，也不能脱离具体设立范围将其泛化为普遍的机关形态。

“机关”这个词也不能替代全部具体对象。中央部门、地方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机关内设部门，党组织的设置与领导关系可能各不相同；机关党委、机关纪委、党支部和党组也可能同时存在于同一机构，却承担不同任务，处在不同层级，连接不同对象。把它们合成一张没有分工的网，既会误读制度，也会看不见“钉子”究竟怎样发挥作用。

机关基层党组织并非行政机关本身，也不同于承担本单位领导作用的党组。根据 2019 年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第二条，机关基层党组织在上级党的委员会或者党的机关工作委员会和本单位党组（党委）领导下，协助本单位负责人完成任务，改进工作，对包括本单位负责人在内的每个党员进行教育、管理、监督，不领导本单位业务工作^{[11]}。

依据该条例第十条，机关基层党组织的职责还包括密切联系群众、了解群众诉求并维护其正当权益，同时监督工作人员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11]}。机关基层党组织承担党员教育、管理、监督和服务，并以组织生活、思想政治工作和基层组织建设把党组织关系带进机关内部。它不是脱离机关业务的外部驻军，也不是一个可以替代行政机关全部职能的政府。这个组织位置嵌在同一机关空间中：行政业务与党内组织关系并存，并通过领导、协助、监督和组织生活等不同关系相接。^{[11]}

不同层级节点的连接并非单向同质关系。具体说，党组可能在机关领导关系中发挥作用，机关基层党组织可能承担党员教育和组织生活；党委可能在地方、国企或高校等场景履行领导职责，基层党支部则更接近具体单位和党员日常。它们彼此连接，却不能互相替代。政治核心正是通过这些不同节点进入国家身体，并由节点差异形成不同的传递路径。

2021 年《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条例》为组织部门提供了另一条制度线索：组织体系、干部、人才、党员队伍和基层组织建设。现代政治节点因此不只包括机关内部的党组织，也包括承担组织工作和干部人才工作的部门。此类部门确有现代满城中的结构位置，但非万能的人事控制中心。现有材料能够确认的是组织工作的正式制度位置；具体的人事运作仍须分别举证。^{[14]}

组织部门的结构位置在于，它连接组织体系和人员体系。一个政治核心如果只占据机关楼宇，却不能进入干部任用、组织建设和人才管理，它就很难持续形成高权重的内部传递。但这种连接有自己的制度边界、时间条件和具体规则。2021 年条例说明的是该版本制度文本中的正式职责，并不自动证明 1949 年已经存在完全相同的组织部门结构，也不证明后来七十多年没有发生变化。

旧国家器官正因这种结构而能在新政治核心进入后继续运转。部、委、厅、局、学校、工厂、银行和铁路无须全部拆除，行政人员与专业人员也无须全部替换，新的组织节点仍可进入其中。政治核心所

需要的，不是把每一个外部形式都砸碎，而是掌握能够传递方向、组织干部和维持关系的关键位置。旧机关仍以国家机关的形式工作，内部关系却已改变，它也就不再只是原先意义上的行政机关。

这种进入也不是一次完成的。组织位置可以先表现为领导关系，再借培训、组织生活、干部管理和单位制度进入日常；同一机关内，也可能并存行政业务、党组领导、机关基层组织和专业岗位等多条线。线条彼此不等同，政治核心便无须用一个机构替换整个机关，而能从不同节点反复接续。现代满城的结构性不在建筑整齐划一，而在不同节点于承重处彼此连通。

一个机关的组织设置不能代表全国机关完全同型，某一时期的条例也不能抹去不同时期的差异。材料能够支持的是一个范围较小、却十分关键的判断：政治核心可以通过组织部门、党组和机关基层党组织等制度位置进入国家机关内部。国家身体由此不只在中央机关层面被接管，日常机关结构中也出现了新的权力传递方向。

四、干部怎样经过党校

在构成现代满城的诸节点中，党校直接承担着干部的政治塑造。它既非普通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学术机构，也非单纯传授行政技能的职业培训所。根据 2023 年《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党校（行政学院）是干部教育培训的主渠道，承担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发挥“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作用^{[12]}。

2023 年条例第五条至第十二条明确规定，干部教育培训在党中央领导下，由中央组织部主管、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工作部门分工负责，实行中央和地方分级管理的体制；其对象涵盖全体干部，重点是县处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和优秀年轻干部^{[12]}。

机关干部进入党校，获得的也不只是专业知识；组织安排、课程内容、培训资格、学习考核和干部管理在这里接成一套政治教育过程。党校因此成为政治核心进入干部形成的节点。它无须替代原有行政机关，便能影响哪些理论被反复学习、哪些政治原则成为干部教育的基本内容，以及哪些人经组织选调进入集中培训。

党校的力量也不只在课程。谁被组织选调，谁必须参加，干部接受哪一层级的培训，培训结果怎样进入干部管理，党校又怎样同组织部门及干部教育培训主管部门分工，都会影响这个位置的实际作用。2023 年《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规定，主管部门负责规划、组织和管理，干部所在单位按权限实施和管理本单位培训；干部接受教育培训的情况，还会同考核、任职和晋升发生联系。教育节点由此通向组织节点，却还不能直接推出完整的人事和忠诚机制。^{[12]}

党校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作用：课程、教材、班次、讲授、研讨和考核，把抽象政治方向变成干部反复经历的教育过程。政治核心若要进入国家身体，不能只靠中央命令，也要有持续训练干部的制度位置。党校把政治理念写进教育内容，把组织安排落实为学习经历，并使干部身份进入持续塑造和评估的关系。

这仍不意味着党校已经包办全部人事控制；但把它当成与政治无关的学校事务，同样会错过它的制度位置。钉子的含义也正在这里：体积不必很大，位置却必须承重。党校不等于全部国家教育，更不等于所有人的日常生活；对干部队伍和政治训练而言，它仍处在高权重位置。政治核心借此持续进入干部形成，国家机关中的人员也不再只按行政职务被理解，还被放进组织经历、政治训练和干部管理关系中。

五、统战如何进入社会关系

统战部与党校、机关一样，都是扎进中华民国尸体的钉子。统战部不是普通的社会联系部门，但它也不等于把异质对象完全收编；它的锋利在于进入关键关系，而不是占满社会空间。

统战部的历史位置至少可以追溯到 1948 年 9 月。相关历史材料记载，为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城工部改名为中央统战部，并由它具体承办新政协筹备。此后，代表单位、代表名额和代表人选经过多次协商、审核与调整，最终形成参加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名单。在新国家政治结构正式形成以前，统战部已经处在联系党派、团体、区域和代表人士并组织政治协商筹备的位置。^{[2]}

1948 年的历史位置不能同 2020 年条例列出的全部职责画等号。七十余年间，组织形式、制度任务和政治环境都可能变化。历史材料能够证明统战部在新政协筹备中承担了具体的组织和协商工作，但不能据此证明 1948 年已经具备后来条例的全部工作范围，也不能证明此后的制度形式未曾改变。

2020 年印发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将统战工作置于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的格局中。条例第八条规定地方党委对本地区统战工作负主体责任，负责政策实施、队伍建设，以及发现、培养、使用、管理党外代表人士。作为主管统一战线工作的职能部门，条例第九条将统战部明确为党委在统战工作方面的参谋机构、组织协调机构、具体执行机构和督促检查机构，承担起了解情况、掌握政策、协调关系、安排人事、增进共识、加强团结等职责。从制度属性上看，统战部既非行政机关的普通业务部门，亦非直接驻军，而是作为连接党委统一领导与社会力量的枢纽，为政治核心提供了一个持续观察与统筹协调的专门位置。^{[8]}

条例第五条明确统一战线工作对象为党外人士，重点是其中的代表人士。依照第九条规定，统战部门在职责上具体表现为联系民主党派、开展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协调民族和宗教工作，统筹开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并推进港澳台及海外统战事项。条文所设定的分类协调机制，并不意味着既有社会差异因此消失；制度运行无须将所有人塑造成同一种身份，而是借助代表人

士、组织关系、政治协商、单位联系与政策安排，将不同对象引入政治核心牵头的关系结构之中。^{[8]}

条例第十条并未将基层工作构建设为模糊的任意选项，而是按任务比重确立了具体的组织义务：统一战线工作任务重的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党委设置统一战线工作机构，其他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党委应当明确相应机构；任务重的大型国有企业党委（党组）明确机构和人员负责；其他任务重的单位党组（党委）也明确相关机构负责。^{[8]}

统战工作规范的确立，并不意味着现实中异质对象的态度、利益和行动差异已经消除。条例列出的工作范围、对象与职责，不代表社会差异被抹平。条例写入“大团结大联合”“坚持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坚持尊重、维护和照顾同盟者利益”，所确立的是以政治核心为中心、对差异对象进行分类、联系、协调和安排的组织框架，而非直接同质化。^{[8]}

把 1948 年的历史位置与 2020 年制度放在一起，看见的不是一条毫无变化的直线。1948 年，统战部参与新政协筹备；2020 年修订的条例，则把它置于范围更广、制度化程度更高的统一战线工作格局。其间制度和政治环境发生过变化，但通过专门部门连接党外人士和社会关系这一结构仍清楚可见，并成为现代满城向国家机关之外伸出的一根钉子。^{[9]}

六、国企治理中的政治节点

国有企业提供了一个观察政治节点如何进入国家机关之外具体单位的样本。制度对国企党组织的设置、职责和治理关系有明确规定，提供了党组织嵌入一个包含生产、资产、管理和职工关系的实体的具体路径。

2019 年《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第四条规定，国有企业党员人数 100 人以上的，设立党的基层委员会；党员人数 50 人以上、100 人以下的，设立党的总支部委员会；正式党员 3 人以上的，成立党支部。党员人数不足相应规模、确因工作需要的，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可以设立党委或党总支。经党中央批准，中管企业一般设立党组，中管金融企业设立党组性质党委。第十条规定，为执行某项任务临时组建的工程项目、研发团队等机构，党员组织关系不转接的，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可以成立临时党组织。第十三条明确国有企业应当将党建工作要求写入公司章程，写明党组织的职责权限、机构设置、运行机制、基础保障等事项，明确党组织研究讨论是董事会、经理层决策重大问题的前置程序。^{[13]}

条例第十五条规定，企业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落实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举措、发展战略与重要改革方案、资产重组与大额投资中的原则性方向性问题，以及涉及安全稳定与职工权益等重大经营管理事

项，必须经党委（党组）研究讨论后，再由董事会或者经理层作出决定。党组织由此进入公司治理规程、重大决策前置程序、领导人员管理和基层组织，将治理机构与职工队伍接入既定的制度关系中。^{[13]}

国企党组织的规范不能无条件推广到其他组织形态。依照条例第三十九条，该规范适用于国有独资、全资企业和国有资本绝对控股企业；国有资本相对控股并具有实际控制力的企业，结合实际参照执行。条文适用范围明确划定了界限，不能将国企的治理安排等同于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或社会组织。^{[13]}

国有企业的组织形态将国家资产、公司治理、干部管理和生产经营属性结合在一起。党组织无需替代企业的具体生产业务，而是通过章程规范、重大事项前置程序、干部人事管理、基层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进入企业内部。董事会、经理层与生产专业分工继续运转，但其运行被置于党组织的政治与治理程序之中。

这并不表明企业过去仅由经济效率单一逻辑支配，而是表明政治组织逻辑通过规范进入了资本、干部、职工与治理程序的关系结构。国企样本证明了党组织进入具体法人治理的制度路径，但不能推导为所有企业都具备相同设置，也不能证明政治核心已经取得对人事、忠诚、安全和资源的全部控制。

七、从节点到制度环境

党校、机关、统战部与国企党组织等节点，并非孤立存在的办事机构。党校承担干部理论训练，组织部门管理干部与组织体系，党组与机关基层党组织嵌入机关内部，统战部联系党外代表人士，国企党组织进入企业治理。这些节点相互连接，形成从政治核心延伸至干部、机关、单位与社会对象的组织路径。

这种“共同形成”并非一张已经封闭、完整的机构图，而是指向具体的制度位置：钉子、尸体和满城提供理论入口；1948—1949 年前后的历史材料显示政治组织进入新国家机关和政治协商结构的节点；2019—2023 年的条例则说明相应版本中不同党组织和职能部门的正式制度位置。三层材料各有自己的证明范围，不能相互冒充。

现代满城不能简化成“党组织到处存在”。普通存在并不等于高权重嵌入。要看的，是一个组织是否位于干部训练、机关领导、单位治理、党外人士联系或政治安排的关键位置，能否把政治方向传给其他制度对象，能否把不同层级和不同类别的人纳入有组织的关系，又能否使旧有国家器官在新的权力方向下继续运行。

这也是为什么“钉子”比“网络”更有力量。网络容易让人想到平面的、均匀的、没有中心差异的连接；钉子则提醒我们，嵌入从来不是均匀分布的。一个钉子扎入木头，力量集中在一点；一组钉子扎入一座旧城，改变的不是每一块砖，而是承重、方向和连接。现代政治核心不需要把所有社会空间都变成同一种形式，它需要在关键位置建立能够承接、传递和维持方向的组织关系。

机关基层党组织进入机关，不等于机关的专业业务从此消失；党校是干部教育培训的主渠道，不足以据此推论所有干部形成同一种人格；国企党组织进入公司治理，同样不等于所有企业都能用国企条例解释。

人事、忠诚、安全和资源，是组织通道继续向下时必须面对的四个方向。谁被发现、培养、安排和管理，相关人员被要求遵循哪些政治方向，哪些对象和关系进入风险判断，组织节点又怎样同单位、资格、职位和机会相连，都需要具体材料。这些关系沿四个方向继续展开，现代满城便不再只是一张机构分布图，而成为全国制度结构的问题。

上述制度通道的存在，并不等于在所有时期和所有地方具有均匀的覆盖强度。中央机关、地方机构、国有企业和统战领域的运作深度与时点各有差异。建立进入渠道，不等于已完成对社会生活所有维度的覆盖；只有当组织关系向人事、忠诚、安全和资源深度展开时，制度网络才扩展为更为广泛的支配环境。

“后清”由此在日常层面显出具体形状。后清不是 1949 年的官方自称，也不是官方条例中的历史结论，而是对一种入关型结构的理论命名：政治核心进入旧国家身体以后，不只接收国家名称和中央机关，还通过组织节点进入干部训练、机关关系、代表人士联系和单位治理。两个结构的叠合，就在这些日常关系中继续展开。

钉子已经扎入承重位置并改变了权力运行方向，但这些节点间的关系如何进一步展开为更广阔的制度环境，仍是需要深入分析的问题。

第十六章 党委、党校、机关与统战：现代满城注释

[1] 参见本书第十五章《中华人民共和国 / 后清：政治核心占据国家身体》，该章重点分析政治核心与国家身体的宏观叠合关系，本章则转向该结构在科层、机关与社会网络中的日常嵌入机制。

返回正文

[2]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毛主席口中的“天书”是如何炼成的？》，2024 年 11 月 11 日，https://www.zytzb.gov.cn/zytzb/2024-11/11/article_2024111115175068812.shtml。材料记载 1948 年 9 月中央城工部改名中央统战部并参与新政协筹备。

返回正文

[3] 共产党员网：《新中国请示报告制度的历史考察》，2024 年 4 月 8 日，https://www.12371.cn/2024/04/08/ARTI1712557903242494.shtml。材料记载 1949 年 11 月中央政府内建立党组，并在政务院所属委员会、部、会、署设置分党组或党组小组。

返回正文 返回正文 2 返回正文 3

[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黑龙江省政协，1949 年 9 月 29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https://hljzx.gov.cn/contents/73/7476.html。支撑政协在普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前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制定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以及地方代表会议的过渡性职能；不支撑后清理论或法律法统连续。 所据网页显示题名《中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正文会议名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本文使用文献通行题名。第 13 条有关主体为政协全体会议，第 14 条规定地方逐步代行；规范安排本身不能直接证明实际落实情况。

返回正文 返回正文 2

[5] 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共和国法治同行——新中国 70 年检察大事记》，2019 年 10 月 1 日，https://www.spp.gov.cn/spp/zdgz/201910/t20191001_433520.shtml。 网站来源标注《检察日报》。有关节点为 1949 年 10 月 1 日任命、10 月 22 日宣布成立、11 月 1 日启用印信并正式办公，任命、宣布成立与启用印信正式办公分属不同时间节点。

返回正文

[6] 云南人大网：王海娟：《【追光人大·足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职权》，2025 年 1 月 14 日，https://www.ynrd.gov.cn/html/2025/zgrd_0114/4031268.html。 云南人大网转载《法治日报》；此为后出文章，不等于省、市、县三项组织通则原文全核。

返回正文

[7] 共产党员网：《毛泽东执政党建设思想述论》，2013 年 12 月 19 日，https://news.12371.cn/2013/12/19/ARTI1387442421928276.shtml。支撑关于 1949 年 11 月 9 日两个决定和政府机关建立党组织的后出历史叙述；该后出叙述非 1949 年决定原文。

返回正文

[8]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共产党员网全文，2020 年 12 月 21 日发布，https://www.12371.cn/2021/01/05/ARTI1609846534159360.shtml；生态环境部转载备份，https://www.mee.gov.cn/zcwj/zyygwj/202101/t20210106_816208.shtml。重点为第五条至第十条，尤其第九条统战部定位与职责。

返回正文 返回正文 2 返回正文 3 返回正文 4

[9] 生态环境部转载：《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2021 年 1 月 6 日，

https://www.mee.gov.cn/zcwj/zyygwj/202101/t20210106_816208.shtml。页面转载新华社 2021 年 1 月 5 日电，为同一统战条例的官方备份，不构成另一份独立实证。

返回正文

[10] 《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共产党员网，2019 年 4 月 6 日起施行，转载网页 2019 年 4 月 15 日，https://www.12371.cn/2019/04/15/ARTI1555329326744121.shtml。支撑党组的制度位置及其与党委、机关基层党组织的对象区分；不证明 2019 年制度文本与 1949 年完全同型。机关党的基层委员会由党员大会或者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依据另见注 11 所引条例第五条，不能笼统归到党组条例。

返回正文

[11] 《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共产党员网/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党建转载，2019 年 11 月 29 日修订，https://www.spp.gov.cn/dj/c100027/202001/t20200105_452133.shtml。支撑机关基层党组织在上级党的委员会或者党的机关工作委员会和本单位党组（党委）领导下协助本单位完成任务且不领导本单位业务工作的有限事实；不证明机关基层党组织等于国家行政机关。 第二条的教育、管理、监督对象是包括本单位负责人在内的每个党员；第十条另规定党员服务、群众联系及监督工作人员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等职责。不能合成对党员和群众一律施行相同管理。

返回正文 返回正文 2 返回正文 3 返回正文 4

[12] 《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中共中央发布，生态环境部转载，2023 年 9 月 19 日，https://www.mee.gov.cn/zcwj/zyygwj/202310/t20231016_1043194.shtml。支撑党校（行政学院）在干部教育培训制度中的主渠道位置及干部教育培训管理；不支撑《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的文本身份，不倒推 1949 年同型制度，条例条文亦不直接证明“复制忠诚”。2023 年 9 月 19 日是文献发布日，生态环境部网页为 2023 年 10 月 16 日，载新华社 10 月 15 日电。具体所据条文为第 5—13、23、28—29、48—51 条。

返回正文 返回正文 2 返回正文 3

[13] 《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中国政府网，2019 年 12 月 30 日发布，https://www.gov.cn/zhengce/2020-01/05/content_5466687.htm。重点为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关于国有企业党组织设置、职责及公司治理关系的规定。现有核读依据同条例共产党员网转载缓存（新华社，2020 年 1 月 5 日）：https://www.12371.cn/2020/01/05/ARTI1578224710962548.shtml；中国政府网原链接未重新

在线核查。第 4、10 条组织设置有规模、批准与具体任务等条件；第 13、15 条涉及章程和重大事项前置，第 39 条划定适用及参照范围。

返回正文 返回正文 2 返回正文 3

[14] 《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条例》，2021 年 4 月 30 日审议批准、5 月 22 日中共中央发布；共产党员网转载新华社，网页 2021 年 6 月 2 日：https://www.12371.cn/2021/06/02/ARTI1622638294027912.shtml。第 2 条说明组织工作内容，第 5—8 条规定领导体制和组织部门职责。本条作为组织部门总体职责的规范来源，与规范党组职责的《党组工作条例》适用范围不同；不证明 1949 年同型制度或全部现实人事运作。

返回正文

史料说明：所引法规条文依据既有网页缓存，未取得在线更新，亦未完成各法规截至 2026 年的效力沿革核查；正文以具体版本年份说明。1949 年两项决定尚未核到原始文件全文，所引仅为后出历史论述。官方条文支持组织位置和规范职责，不等于每项规定处处实现；“满清共产主义”“后清”“钉子—尸体—满城”是理论和价值判断，非官方结论。

第十七章　制度制造森林：人工渔猎

一、从节点到人工森林

新的高权重节点扎入承重位置，使政治核心无须拆毁旧国家全部器官便能改变运转方向，但钉子扎入机关还不等于森林已经形成。党校、机关、党组、统战部和国有企业党组织，分别连接干部训练、机关关系、社会联系和单位治理。它们不是同一种机构，也不能彼此替代；共同显示的是，满清共产主义怎样在现代国家中占住承重位置。钉子先改变方向和连接；当政治核心的组织关系沿机关、单位、公共服务、住房、身份和平台接口向社会展开，方向和连接才扩展为一种制度环境。资源不再只是自然存在、均匀可得、能够由个人长期经营的东西，而是被放进可见或不可见的制度接口，附上条件，再按组织位置和政治权重排序。人面对的也不再是一片原样保留的社会土地，而是一组由制度制造出来的资源位置。

这就是制度制造森林。^{[3]} 森林不是自然生态的复原，也不是市场竞争的另一种名称。这里的“森林”是一个政治—组织环境的理论名称：它由现代制度制造，却把资源呈现为分散、离散、有条件、可移动、可重新赋位的猎物位置。猎物也不是鹿、鱼或山货的自然替代物，而是工作、住房、户籍、编制、项目、资格、关系、政策窗口、流量、补贴、晋升以及其他能够改变人的生活位置的制度接口。它们只有在制度入口、资格边界、组织排序和关系权重中，才成为人工渔猎意义上的资源猎物。

满清共产主义不可拆分。“满清”并非单纯的古代文化遗产，“共产主义”也不是中性行政技术，渔猎性绝非局部传统残余。人工渔猎是满清共产主义的一条主要解释轴。满清式政治的渔猎逻辑并不只存在于边疆、战争或历史叙事中；满清式政治渔猎逻辑与共产主义的组织、制度及全国化能力深度绑定，现代组织本身就是它把森林制造进国家内部的工具条件，而非仅仅是一层外壳。满清提供以捕获、依附、重新编组和资源方向为中心的政治生存逻辑，共产主义提供现代组织能力，二者共同使全国资源呈现为离散位置、条件接口和政治权重，不能拆开解释。人工森林因此不是中性的治理副产品。

自然森林里，哪些树能被看见、哪些动物能够进入某片林地，并不先由一个中央组织规定，猎物也不必由政治核心逐一重新命名。人工森林却不同。它之所以显得“自然”，只是因为制度已经进入日常：表格、证明、名额、审核、名单、窗口、平台规则和单位关系反复运转，使人容易忘记，资源并非单独在那里等候取用，而是被安排成可以接近、可以排除、可以排序、也可以转换的制度接口。

因此，人工森林与“市场更灵活”或“竞争更充分”并不等同。所谓灵活竞争，仍假定主体可以凭借能力、价格或长期经营，在相对稳定的规则中改善位置。人工渔猎所强调的却是另一层先后：规则、权重和组织位置先决定资源怎样被看见、谁能进入哪条通道、哪些关系能够打开入口。市场化语言只看见交换，却容易遮蔽资源入口怎样被政治组织化、资格化和排序化。猎物不一定通过价格出售，也不一定能被个人直接占有；它可能是落户资格、公共服务接续、住房保障接口、财政奖励、投资倾斜或平台内容的可见路径。它们共同改变人在制度森林中的位置，并依附于规则、身份、组织和政治权重。

人工森林也不能被自然生态化。那会把制度结果说成环境本来如此，把政治选择说成物种适应，把主人—依附关系说成生物竞争。满清共产主义的人工性恰恰在于：森林不是先验存在，而是由现代国家的组织、资格、资源与传播接口制造出来。人在其中不断辨认资源位置，但身处已被这样构造的环境，人的即时行动并不能直接作为判定完整人格的依据。

二、资源怎样成为位置

资源一旦被制度组织，就不再只是一个抽象的“有”或“没有”。它成为位置。“资源位置”这个词，比“资源分配”更能说明人工森林的结构。分配容易让人想象一个中心把已经完成的物品逐份发下去；位置则指出，制度同时安排了接近资源的路径和人在路径中的相对位置。一个人即使没有立即得到住房，也可能取得申请保障性住房、承租市场住房、领取租赁补贴或缴存使用公积金的制度接口；一个城市即使没有直接获得现金，也可能因吸纳落户人口而在财政奖励、投资倾斜、基础设施和保障性住房专项支持上获得政策资源方向。位置不是结果本身，却决定了结果如何可能出现。

这便是捕获—重新赋位的前提。捕获不是简单接触，不是看到一个机会，也不是普通的人际帮助。它意味着某个主体、组织或身份进入资源位置之后，原有的连接方向被改变，资源接口被重新安排，人的制度位置因此发生变化。重新赋位则不是把所有人安放到同一处，而是把人、单位、资格和资源重

新编入不同的层级、通道和依附关系。没有先行的资源位置，捕获便无从发生；没有制度制造的森林，捕获—重新赋位只能停留在抽象的夺取想象中。

资源从物变成制度位置，不是一步完成的；在结构关系上，它至少可以被辨认出入口、资格、排序、维持和退出五个环节。入口把某种资源变成可以申请、登记、接入、检索或被看见的对象，但进入可能性并不等于已经获得。资格规定谁可以进入、凭什么进入以及哪些条件能够被承认；它不是道德奖赏，而是资源位置的边界。

排序体现为候选范围内对象之间的相对次序。时间先后、轮候、条件比较、优先级、检索位置和展示位置，都可能构成相对次序。排序不必然来自政治命令，也不必然只是价格竞争；首先，它是一种把多个对象放进相对位置的制度动作。只有具体组织节点能够改变通道方向、对象范围或相对次序时，政治权重才适合用来解释这种排序；它不能代替所有制度细则。

维持说明资源位置具有持续条件。居住、就业、材料效力、身份状态、服务规则、平台选择或其他条件，可能影响一个接口能否继续存在。退出则说明位置具有边界：资格可能失效，规则可能调整，服务可能转接，用户可能主动关闭，政策窗口也可能结束。退出不是惩罚的同义词，更不是对个体失败的先验判断；它只是表明制度位置不是脱离条件而永久固定的物。

入口、资格、排序、维持和退出，在不同资源中并不按同一种方式组合。住房可能突出申请、审核和轮候，公共服务可能看重身份与居住条件，政策资源可能围绕对象与方向展开，平台可见度则可能落在推荐、检索、展示和用户选择上。这五个环节构成了辨认制度组织方式的共同结构，而非各类资源共享的同一套具体办理程序。五个环节分别清楚以后，才能看见制度如何组织资源，而不把住房、户籍、工作、政策支持和流量压成同一种猎物。

对这些材料的分析依赖于三种不同性质的表述。事实层只陈述文件直接载明的内容，包括落户条件、配套支持方向，以及针对推荐、检索与选择所设定的规章接口；至于文件中未予载明的历史沿革、具体财政金额、地区结果与合规状况，则不能在这一层中直接认定。制度解释把这些事实放回运行机制。条件构成资格边界，配套安排结成接口组合，排序和展示产生相对位置，持续条件与退出方式又让位置具有时间性。到了理论层，才使用“人工森林”“人工渔猎”“资源猎物”“政治权重”“捕获—重新赋位”和“主人—依附”这些命名。它们解释资源为何不能只被看作物品，接口为何会形成有方向的环境，以及满清共产主义为何不可拆分。这些术语并非来自官方政策表述，也不能被视为已由行政文件直接证实的结论；事实、机制与理论彼此紧密相接，但在论证中不能互相冒充。

三、工作、身份与住房的连接

工作是人工森林中最容易被混同于普通竞争的一类资源猎物。若只把它看作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位，工作同身份、单位、资格、组织位置和生活保障之间的连接就会消失。在满清共产主义的结构中，一个工作位置除了收入，还可能意味着进入某种单位关系、取得某种身份、接触住房或公共服务接口，并

形成同组织权重相连的可见度。把工作称为资源猎物，并不是说每个岗位都由同一个中心直接发放，而是说制度可以把工作组织成一组带有资格、门槛、排序和依附关系的接口。

同样，身份资格不是一个抽象的荣誉词。户籍、居住状态、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住所、社保和连续居住年限等条件，可以在 2016 年的政策文本中看到它们如何成为落户及公共服务衔接的制度接口。国办发〔2016〕72 号提出，除极少数超大城市外全面放宽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条件；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以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参加城镇社会保险年限、连续居住年限等为主要依据，分类制定落户政策。文件还安排财政、土地、住房、医保、养老、教育和居住证等配套方向。^{[1]}

工作、身份和资格由此连成一个三角。工作可能成为落户或公共服务衔接的条件，户籍或居住状态又可能接上住房、教育、医疗、养老和公积金等接口；资格条件则把一种资源从开放的公共想象变成有边界的制度位置。这不等于所有人的生活都由工作单位完全决定，单凭一份政策文件也不足证明历史单位制的全貌。户籍是资源位置的重要维度，却不是全部资源的唯一来源。这不能证明所有城市门槛相同，也不能证明户籍自动带来全部资源，政策目标也并不等于每个个体都已经获得的结果。

这些连接并不意味着历史单位制已经完整复活。这也不意味着每个工作岗位都由单位分配，每种身份都由组织授予，或者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都是同一个工作单位的附属品。不同接口可能分别来自法律条件、行政规则、地方政策、市场安排和组织关系。接口之间可以相连，连接的强度、范围和持续时间却必须由材料说明。理论可以提出连接模型，事实只能确认文件已经明确的接口；两者不能互相冒充。

在人工森林里，住房最能说明资源何以成为“位置”，而不只是一件物品。它当然是居所，却也连着公共服务和家庭再生产；住房保障、租赁补贴、公积金、子女教育、居住证等制度安排，又把住房同户籍、居住状态和资格条件接在一起。因此，“由某个中心分配的猎物”这一概括不足以覆盖这种复合的接口关系。现有材料能够支持的是多种配套政策和办理接口，并不能证明所有住房都遵循同一种分配机制。

国办发〔2016〕72 号提出将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住房保障逐步实行实物保障与租赁补贴并举，支持符合条件者承租市场住房；文件还提出扩大住房公积金缴存面，纳入农业转移人口，支持异地转移接续和使用。^{[1]} 这些规定至少说明，身份转移与住房、租赁、公积金之间可以被制度性地连接起来。住房因此不只是市场上的一件商品，也成为政策资格、公共服务和城市身份的复合接口。

“符合条件”是这组规定不能略去的边界。制度森林并非无条件开放，进入城市也不会让住房保障自动落到每个人身上。相关条件可能涉及身份、居住、就业、社保或地方政策；至于各城市怎样申请、审核、轮候和配租，仍要分别查证。中央政策写明的是目标和方向，不能由此断言各地都按同样门槛兑现，被“纳入体系”并不等于“已经平等获得”。

人工渔猎正是在这些连接中显出形状。这里的猎物不是孤立的住房或户籍，而是住房、户籍、公共服务和资格结成的接口组合。对进入城市的人来说，问题也不只是“有没有一套房”，还包括什么身份条件能够打开什么服务，哪些服务各自需要什么证明，哪些资源可以转移接续，哪些资格仍受地方规则限制。资源因而呈现出斑块化和接口化的形状：一块通向住房保障，一块通向教育或医疗，另一些则连着居住证、公积金、养老和社保转移。

这种斑块化并非市场竞争的自然结果。市场仍在其中，租赁和购买也仍然存在；人工森林所强调的，是政治—制度关系会决定哪些资源进入公共接口、哪些条件得到承认、哪些位置受到政策倾斜，以及哪些对象能够被组织化地看见。脱离这些连接，住房只是物；进入资格和公共服务结构以后，它才成为资源猎物的位置。

编制、职数、岗位管理与晋升同样属于资源猎物的理论列举范围。职位上升可能重新组合组织位置、政治权重、住房、身份、流量、关系和其他接口，因此它可以成为资源猎物。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规定》为这种组织接口提供了具体的正式规范例证^{[4]}。在该规定中，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的实施工作由各级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分级负责。职级职数按照各类别公务员行政编制数量的一定比例核定；在核定机制上，职级职数一般按照各机关分别核定，职数较少或者难以逐机关核定的职级，由县级以上地方党委及其公务员主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和审批权限分级统筹核定和使用。行政编制的规模与分级负责的权限，共同构成了职级设置的名额约束。

规范设立了层级审查门槛。公务员晋升职级须在职数内逐级进行。第十七条将政治要求列于首位，规定须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并与实绩、能力、公认度及品行并列。第十八与十九条设定任职年限，规定每有 1 个年度考核优秀的缩短半年，每有 1 个年度为基本称职或不定等次的该年度不计入年限；条文同时明确晋升应当根据工作需要、德才表现等多方因素综合考虑，并非达到最低任职年限就必须晋升，也不能简单按照任职年限论资排辈。在程序上，第二十条规定了方案制定、民主推荐或测评、考察了解、公示及审批等环节；其中中央机关晋升一级、二级巡视员应当进行考察，其他职级可综合考核等情况确定人选，省级以下机关的考察了解方式则由省级公务员主管部门结合实际研究确定，不同层级和职级在考察程序上并不完全同一。

职级晋升带来的资源重组有明确边界。第二十四条将职级作为工资、住房、医疗、交通补贴及社保等待遇依据。第二条与第二十五条划清权力与待遇界限：晋升职级不改变职位与指挥关系，不担任领导职务的职级公务员依隶属关系接受指挥，且不享受相应职务层次的政治与工作待遇。该安排区分了物质待遇与指挥权力；同时第二十九条明确，根据工作需要和对应关系，领导职务与职级可以互相转任、兼任，通道间保持动态连接。

这一建立在 2019 年文本上的规范，呈现了机关职级晋升的正式筛选机制，不能等同于现实具体个案，不能推论全国所有岗位采用同一接口，亦不能证明个体的实际心理。在本例中，具体的政治拥护与维

护条件、党委及组织人事部门的程序审查与待遇挂钩，展现了政治条件如何接入资源分配的制度入口；但这仅说明本规范所见的入口连接机制，不能由条文直接断言全国组织资源的实际主导程度。职位上升作为资源猎物的理论关系依然成立，而历史单位制沿革、编制岗位总量与各地具体执行，仍属待证的经验范围。

资格具有政治性，并不等于一切资格都由政治中心直接授予。具体接口的资格来源可能是法律条件、行政条件、地方政策、申请顺序、公共服务规则或平台规则。政治权重仍是解释资源环境如何被满清共产主义政治化的主轴，但它不能抹掉这些条件。技术、行政和专业规则也没有因人工渔猎而消失；它们进入政治核心已经取得高权重位置的制度环境以后，资源位置可能同身份、组织和方向发生连接。每一条连接仍须有相应证据，不能由理论预先抹平差异。

四、政策窗口与资源方向

政策窗口是人工森林中的另一类重要猎物。它既不是一扇始终敞开的门，也不是已经落地的项目成果，而是特定政策阶段里出现的资源方向、资格条件和制度倾斜。把它称作猎物，并非假定所有人在同一时刻争抢一个项目。政策可以在特定条件下把财政、土地、住房、基础设施或公共服务导向某些地区、对象和行动，由此形成新的资源位置。

国办发〔2016〕72 号提供了一个边界清楚的实例。文件提出，中央和省级财政转移支付规模、结构动态调整；东部发达地区和大城市、特大城市承担主体责任，依靠自有财力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与当地户籍人口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中央财政根据其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人数等因素，适当给予奖励；中央预算内投资向吸纳落户较多的城镇倾斜；城市基础设施、运行维护、保障性住房等专项资金对相关地区给予适当支持；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吸纳落户数量挂钩。^{[1]} 这些规定可以支持一个有限判断：政策文件能够把财政奖励、投资倾斜、专项资金和土地安排与特定政策目标、地区条件或人口吸纳因素连接起来。

资格意味着某个制度接口承认了进入者，补贴则是政策安排中可能出现的资源支持；两者都有具体条件。本文件未提供完整的项目申报、评审、立项和验收链，现有材料亦不足以补齐，因而既不支持普遍申报流程与确定评审主体，也未提供个人可直接领取专项资金的依据。在这里，项目只能作为政策资源窗口的实例：制度可以规定资源流向的条件和方向，却不能证明全国所有项目都按同一种具体的运作机制与申报流程运转。

财政奖励和投资倾斜也不能只用市场胜负来解释。若只说某地因为“表现好”而得到更多资源，资源方向就仿佛只是中性的效率反馈。人工渔猎追问的是另一组关系：政策设定了什么目标，哪些条件进入计算，哪些地区被纳入倾斜范围，哪些资源进入专项接口，地方组织又怎样围绕政治目标调整自己的位置。政治权重不是可以随意填入的万能答案；它要解释的，是资源方向为何会同政治目标、组织位置和身份资格发生结构性连接。

政策窗口也有制度意义上的先来后到。政策目标一旦形成，前期准备、既有条件、吸纳人口的数量、基础设施承载力和地方配套能力，都可能变成进入窗口的次序或资格。较早进入通道的地区，可能先取得资源位置；后来者面对的，则可能是已经被占用的配套空间。但这种可能性本身不足以证明存在普遍的资源争抢。只有政策文本或个案材料明确给出条件与次序，才能判断某个窗口中的先后关系和权重。

政策窗口之所以是人工的，还因为它会改写“什么算资源”。人口落户原本可以只被理解为人口流动，政策文件却把它同财政、土地、住房、教育、医疗、养老和居住证等配套安排连接起来。一个行政目标由此生成一组可供争取、准备、承接和分配的制度位置。资源猎物并不是预先存在的自然物；政策目标和制度接口形成以后，它才以可捕获的形态出现。

五、可见度成为资源

流量很容易被理解为纯粹市场竞争的结果，仿佛内容只要足够好，就会自然获得相应的可见度。人工森林中的情形没有这么简单：推荐、排序、精选、检索、过滤、展示和分发等技术—制度规则，也在组织内容被看见的方式。由此能说的只有一点：可见度会受到制度化接口的塑造。平台不能直接等同于政治核心，算法推荐规章也不能替代每个平台的具体权重证据，更不能由此断言所有流量都是政治分配。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布、2022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明确其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应用算法推荐技术提供互联网信息服务的情形，其中规范的生成合成、个性化推送、排序精选、检索过滤、调度决策等技术应用，表明平台呈现机制已被纳入明确的规章秩序。规章要求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坚持主流价值导向，建立完善人工干预和用户自主选择机制，在首页首屏、热搜、精选、榜单、弹窗等重点环节积极呈现符合主流价值导向的信息，并制定、公开算法推荐服务相关规则；规章同时鼓励服务提供者综合运用内容去重、打散干预等策略，优化检索、排序、选择、推送、展示等规则的透明度和可解释性。对于干预呈现的行为，规章禁止利用算法屏蔽信息、过度推荐、操纵榜单或检索结果排序、控制热搜或精选等手段，实施影响网络舆论或者规避监督管理的行为。这些条款表明，公共规则内部同时包含了价值导向设定、人工干预要求与反操纵规定，共同构成了平台信息流动的制度轮廓。^{[2]}

规章在设定组织要求的同时，也赋予了用户权利和选项。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用户其提供算法推荐服务的情况，并以适当方式公示算法推荐服务的基本原理、目的意图和主要运行机制；在交互设置上，规章要求向用户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或者向用户提供便捷的关闭算法推荐服务的选项，用户选择关闭算法推荐服务的，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应当立即停止提供相关服务；规章同时要求提供选择或者删除用于算法推荐服务的针对其个人特征的用户标签的功能。这些法定权

利与选项的存在，说明可见度环境并非毫无规范边界的全能支配。^{[2]}

然而，规则确立了法定接口，并不等于权利在现实中已经充分实现。用户能够选择关闭算法推荐，并不等同于关联系统停止了全部数据处理；能够选择删除用于算法推荐服务的特征标签，也不意味着内容就能在平台整体分发中获得同等展示。具体的实际使用、平台执行和纠纷处理仍要分别核验。

规章至少让平台可见度的规则接口变得可辨认：推荐、排序、检索、展示和分发，并不是一个完全无法描述的自然过程。流量之所以能够进入资源猎物的理论范围，是因为它会改变内容、账号或主体在社会中的可见位置。这个判断也有清楚的边界。规章没有给出任何具体平台的排序权重、数据集、模型参数或某个账号的实际分发结果，也不能证明所有平台已经完全合规。理论能够解释可见度为何成为位置资源，却不能由此断言某个账号已经被政治中心捕获。监管要求不能当作已经实现的事实，平台算法更不能直接等同于满清共产主义的政治生存逻辑。

流量能够进入人工渔猎，并不只因为它有数量。更重要的是，可见位置会决定谁更容易被看见、谁的语言能够扩散、谁能够接近下一层关系和资源入口。内容在检索、推荐与展示中的位置，会改变它进入公众视野、组织注意和政策讨论的可能性，可见度也就成为一种位置资源。流量不是从森林外吹来的风，而是森林内部的一块资源斑块：规则规定它怎样被发现，排序决定它在哪里出现，展示与分发又决定它能否继续接近其他资源接口。人工森林包含多层制度和组织接口，平台规则、监管要求、用户选择与内容生产者的行为，都可能同时发生作用。

平台因此与住房、户籍和政策窗口形成有区别的类比。它们都具有入口、条件、排序、维持和退出，但入口的性质不同：住房可能以申请和承租为主，户籍涉及身份与服务衔接，政策窗口涉及地区和对象，平台则涉及内容、账号、用户和分发规则。流量与住房、户籍、政策窗口不同，却共享一个结构特征：它们都不是仅靠个人拥有某种自然属性便自动取得的资源。内容创作者、组织、账号和政策议题要进入可见位置，必须经过接口、条件、标签、排序和分发。共同结构不取消差异，差异也不破坏人工森林的总体解释。

六、关系如何掌握方向

“关系”是资源猎物清单中最容易失去边界的词。认识、交往、合作或求助，并不会因为存在人与人的连接，就自动成为关系猎物。这里讨论的也不是普通人脉或私人友谊，而是关系同政治权重、组织位置、身份资格和资源入口相接以后形成的非对称制度连接。这样的连接可能使一些人更接近资源、信息、政策窗口或组织安排，也可能把另一些人排除在外；至于某一具体关系是否真有这种作用，仍须由相应事实证明。

在人工森林的脉络中，“主人—依附”是对非对称资源通道的理论界定，与对所有社会关系作出道德判断并非同一回事。主人不是自然意义上的强者，也不是能够随意支配全部资源的个人；依附同样不是所有弱势者的固定身份，并不意味着任何社会联系都带有奴役性质。这种结构不能简单泛化至同事、

朋友、亲戚或邻里之间的日常往来。普通的日常人际交往虽然能够互通信息、提供支持或开展常规交易，却未必能够决定资源入口何时开启、维持、转向或关闭。

主人—依附的实质在于：资源位置、组织保护和政治方向集中在某些高权重的制度节点之上。当特定节点掌握了工作、住房、身份、资格、流量或政策窗口的通行方向，其他主体为了维持相关通道的有效性，需要与该节点保持可识别的连接，并接受其重新赋位；依附者通过符合条件、保持联系或进入组织位置来维持自己的通道。只要资源入口与政治位置相连，生活的稳定性就不再完全由个人的长期经营决定，而会受到制度权重和关系方向的牵引。

在人工森林里，关系的价值往往不止是直接取得一项资源，更在于它能否打开下一层接口。组织位置可以带来信息，使人知道什么资格正在开放；身份位置可能使一项申请进入公共服务通道；政治权重较高的单位可能得到投资倾斜或专项支持；平台上的可见位置也可能引来更多传播和组织注意。关系由此成为一条林间通道。这条通道的价值取决于它通向哪块资源斑块、由谁维护、在什么条件下有效，以及规则变化以后是否还存在。

捕获—重新赋位落到关系层面，表现为连接结构被改写。捕获一个资源位置，并不是拿走一件物品；它可能把某个人、某个单位、某种资格或某项政策重新接入组织关系，使其由边缘进入中心通道，也可能从原有通道转进另一种依附关系。重新赋位不一定通过公开的人事任命完成：资格得到承认、政策对象被纳入、资源向特定方向倾斜、内容被置于更高可见位置，都可能成为它的具体形式。共同之处在于连接方向发生变化，原有资源位置随之取得新的政治和组织含义。

关系结构中的先来后到尤其复杂。既有组织位置可能形成先占优势，较早进入某个接口的人也更容易获得连续信息和稳定连接；政治权重却可能在特定时刻重排顺序，使原有位置被重新估价。森林预先形成的只是具有顺序、条件和权重的关系位置；人在窗口变化以后究竟怎样行动，仍不能由环境结构直接推出。

共同的政治方向，并不意味着每一次办理都直接听命于政治命令。专业标准、行政程序、财政条件、技术规则和个人选择，都可能真实存在。满清共产主义的制度制造能力，不是把这些中间规则一扫而空，而是把它们嵌进权重更高的组织方向；政治需要发生变化时，原本分散的资源接口便可以重新连接、重新解释、重新赋位。因此，日常程序的真实性与高权重方向在制度中并存，日常程序不全属于伪装，其存在同样不能构成否认高权重组织方向的理由。

不同资源斑块之间还可能相互牵动。身份条件一变，公共服务通道可能随之变化；工作位置可能影响居住和社保的连接；平台可见度可能打开新的关系入口；政策支持也可能改变地方承接其他资源的能力。这些联动不能证明所有接口都归一个部门控制，却提醒我们，人在制度环境中面对的常常不是一项孤立资源，而是多个位置彼此牵动的组合。人工森林既分散，又可以连接：分散保留了差异，可连接性则让政治—组织权重得以沿接口扩散。

共产主义政治组织正是通过连接各种资源接口，建构起这种可连接的不对称结构。若把资源接口拆成彼此孤立的技术事项，“主人—依附”就会退化为普通人脉，“捕获—重新赋位”也会被说成一般流动；若反过来把全部程序都归结为同一意志的直接命令，理论又会越过事实边界。人工渔猎所指的，正是这样一种双重结构：现代制度真实存在，同时又能够被政治核心组织起来。

七、规则重估与共同环境

人工森林并非只安排资源去向，它还会改变资源怎样被估价。这里的估价不只是价格升降，也包括制度重新定义资格、顺序、可见度、政策目标和组织位置。个人原先具备的条件，可能在规则改变以后不再足以打开某个接口；地区原有的政策位置，也可能随着人口、土地、财政或专项目标的变化被重新安排。

资源位置还有自己的时间。政策文件可能规定阶段性的目标、条件或配套，平台规则可能调整排序和展示要求，住房保障可能设有申请、审核和轮候程序，落户政策也可能按城市类型，以及合法稳定就业、住所、社保或连续居住等条件作出区分。这种时间性表明，资源位置不是恒定背景：它由规则设定，靠条件维持，也可能随规则变化而重新估价。资源窗口之所以能够出现，正因为制度森林并非静止背景：资源斑块可能扩大、缩小、迁移或关闭，资格可能增加、减少或转接，平台可见度也可能上升或下降，推荐服务亦可能被用户关闭。规则先改变资源位置的估价，随后才可能诱发人的行动；环境变化本身并不足以直接推断个人的具体行动。

持续估价还意味着同一资源在不同主体眼中并不必然等值。住房对于一个家庭可能连接教育和养老，对于一个城市则可能连接落户承接和基础设施，对于财政部门则可能连接奖励和投资倾斜。流量对于个人可能意味着收入与声誉，对于组织可能意味着传播、动员与代表性，对于平台则是排序和分发体系中的一个量化位置。人工森林把这些不同的价值连接到制度接口中，形成多重权重。

人工森林里的先来后到，并非单纯的自然排队。申请时间、居住年限、社保年限、连续条件或既有组织位置，都可能形成制度顺序；不同资源接口采用的顺序又不相同。政治权重、组织位置和身份资格可能改变进入某条通道的优先程度，但没有具体规则和证据，便不能把一切排序都归因于政治权重。先来后到属于制度安排，政治权重则是满清共产主义将资源位置政治化的解释轴；二者怎样在具体接口中结合，只能依材料逐项判断。

政治权重存在，不表示其他权重已经消失。它是满清共产主义把资源环境政治化的解释主轴，却不能取代财政、行政、技术、资格和时间条件。资源接口实际上由不同规则和组织位置共同形成；政治核心占据的高权重位置，则能够对接口的方向、对象和重新赋位施加组织性影响。节点的政治权重越高，越可能成为主人—依附关系汇聚之处，但这种影响仍须由制度文本和事实链证明。

一个中央政策可以提出共同方向，地方仍可能按照城市类型、人口承载、财政能力和已有制度安排形成差异化入口。差异意味着申请条件、证明材料、服务衔接和等待顺序可能不同，也意味着资源位置

在不同地方具有不同的实际厚度。全国性并不把地方差异抹平，恰恰是通过共同的政策语言、行政接口和组织目标，让差异化林地被纳入同一个国家尺度的资源环境。

全国性的制度环境也不会让每个人同样暴露在同一套资源结构里。工作、居住、身份、家庭责任、组织位置和平台使用方式不同，人所能看见和进入的资源斑块也会不同。森林可以在全国尺度上形成制度覆盖，但某项政策或规则究竟覆盖哪些对象、哪些地区和哪一段时间，仍要逐项证明。全国性说明的是解释尺度，不能代替对实际覆盖范围的事实证明。

人工森林由性质不同的接口拼成，差异本身并不能推翻理论。各地落户条件不一，住房保障路径各异，财政支持面向不同对象，平台规则也不相同。这说明制度工具多样，却不能据此断言资源已经脱离组织位置、身份资格和规则边界。问题最终落在两处：这些工具是否把生活资源接入可识别、可排序、可维持、可退出的制度通道；高权重政治节点又能否改变通道的方向与对象。

同样，不能把一切制度稀缺都归入满清共产主义。公共服务可以有普遍目标，住房保障可以有救济功能，算法规章也可以设置透明和关闭选项。真正需要追究的，是满清共产主义对这些现代制度能力的占用：政治核心把接口纳入高权重的组织方向，使资源位置同身份、关系、排序和重新赋位发生结构性连接。

到这里，能够确立的结论是制度环境本身的形成：资源已被组织成离散、有条件、有规则、有权重的猎物位置，人工渔猎的制度森林已经成立。然而，在政策与资源窗口出现之后，身处其中的人究竟会采取何种动作，这些具体行动又怎样改变生活的长期连续性，仍属于开放的问题；环境结构的存在本身，也不能直接换算成人格结论。制度森林既已确立，其间的捕获动作如何具体展开，则留待后文进一步分析。

第十七章 制度制造森林：人工渔猎注释

[1]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推动 1 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6〕72 号，2016 年 9 月 30 日成文，10 月 11 日发布，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10/11/content_5117442.htm。文件涉及落户条件、财政奖励、投资倾斜、土地、住房保障、医疗、养老、教育、居住证和公积金等配套安排；相关引用仅限于其明确的政策接口与边界，政策目标并非所有地区同等兑现的结果。第（五）项就业、住所、社保及居住年限条件有超大、特大城市的对象范围；第（七）项奖励按东部发达地区和大城市、特大城市承担主体责任的语境理解；第（十二）项实物保障与租赁补贴并举有“逐步”限定。本项作为 2016 年政策实例，官方网页旧缓存已标注“失效”，失效时间与依据未核，不能当作现行办理规则。

返回正文 返回正文 2 返回正文 3

[2]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四部门令第 9 号，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

布、2022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中国网信网页发布日为 2022 年 1 月 4 日：https://www.cac.gov.cn/2022-01/04/c_1642894606364259.htm。该文件确认推荐、排序、精选、检索、过滤、展示和分发等规则接口存在，不推定具体平台参数、实际分发结果或所有平台完全合规。第七条公开相关规则与第十二条鼓励优化透明度、可解释性应区分；第十四条所述操纵榜单、控制热搜等行为，须连同“实施影响网络舆论或者规避监督管理行为”理解，不能视为禁止一切人工干预。第十六、十七条规定告知、公示及用户选项，其中非个性化选项与便捷关闭选项为“或者”，选择或删除个人特征标签另有规定。第六、十一条确立了主流价值导向、人工干预和用户自主选择机制的规范要求，条文本身不直接等同于平台实际结果或政治生存逻辑。

返回正文 返回正文 2

[3] “人工森林”“人工渔猎”“资源猎物”“捕获—重新赋位”“主人—依附”均为本章理论语言，不是相关政策或规章的官方用语。2019 年《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规定》可作为公务员职级管理与晋升资格的正式文本例证；更广泛的历史单位制演进、编制与岗位总量、单位等级序列、完整项目链以及各地考核制度的具体实施，现有材料仍不齐备，该规定不能证明全国所有体制岗位或历史阶段均适用同一种实施机制。

返回正文

[4] 参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规定》，共产党员网转载新华社，网页发布日期为 2019 年 3 月 27 日，https://www.12371.cn/2019/03/27/ARTI1553687940495670.shtml。该规定第三十四条载明自 2019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引文具体对应第二条（职级不具有领导职责，不担任领导职务的职级公务员接受领导指挥）、第五条（各级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分级负责）、第十一与十三条（职级职数按行政编制数量比例核定，一般分别核定与条件统筹并存）、第十七至十九条（政治要求列于首位，包含拥护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及维护核心与党中央权威，能力实绩、群众公认度、作风品行与任职年限并存，并非达到最低任职年限就必须晋升，也不能简单按照任职年限论资排辈，年限与考核等次按年度挂钩）、第二十条（工作方案、民主推荐或测评、分层分类考察了解、公示及审批程序）、第二十四、二十五与二十九条（职级作为工资、住房、医疗、交通补贴、社保等待遇依据，职级晋升不改变工作职位和领导指挥关系，不享受相应职务层次的政治与工作待遇，允许职务与职级转任兼任）。该规定职级设置与比例以综合管理类为具体展开，第三十二条规定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单位）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参照执行；这一规范不能推广至全部单位与全部编制体系。本条依据 2019 年文本核验，未完成截至 2026 年的效力沿革核查，且正式规范与实际执行、个人信念及代际结果不可混同。

返回正文

史料说明：本章所引 2016 年国办发 72 号与 2022 年算法规章依据官方网页及缓存核对，内容一致，其中 2016 年文件页面标明失效，具体失效日期与依据未核；2019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规定》全文已核得。相关制度截至 2026 年的效力沿革未作全面核查。地方住房申请、审核、轮候与配租细则，平台算法参数与执行实态，历史单位制演变、编制与岗位总量、单位等级、完整项目链以及各地具体晋升考核的落实结果，仍处于待证范围。现有材料支撑规范文本与制度机制层面的分析，理论命名不扩充官方规章内容或已证事实。

第十八章　有机会就捕获：机会渔猎与积累中断

一、机会不是普通的可能性

制度能够制造森林：它先把资源切成位置，位置再把人的行动分出先后。人工森林不是自然生态的复原，也不是普通市场竞争的另一种说法；它是政治组织把资源切割成可接近、可排除、可排序、可转换的一个个位置以后，社会成员所处的环境。工作、住房、户口、编制、项目、资格、关系、政策窗口、流量、补贴和晋升之所以成为可以捕获、重新命名和重新赋位的资源，不是因为它们天然属于某种猎物，而是因为它们被放进了入口、条件、名单、审核、排序和依附关系。

位置并不总是固定的。某项资格如果长期有效，行动者还可能围绕它安排连续投入；一旦资格变成时间条件，资源变成窗口，关系随着权重变化，位置跟着风向移动，行动者就得先判断什么正在出现、谁正在变强，哪一道入口正在打开，又有哪一道入口快要关闭。森林只说明资源怎样被做成猎物，真正的行动发生在猎物以机会出现以后。

森林里的猎物并不静止。制度把它们分散到不同时间、不同入口和不同关系网中：一项资格在一个时期可能意味着真实的上升通道，在另一个时期可能只剩下手续意义；一个单位位置曾经连接住房、身份和收入，后来可能只剩下必须服从的外壳；政策窗口对一类人打开，对另一类人关闭。资源还在，资源作为位置的意义却已经换了。机会也就不能和资源混为一谈。资源可以长期存在，机会却是某项资源被规则、项目、权重、名额或关系暂时照亮的时刻。人工森林不只是把资源做成猎物，还把猎物做成时隐时现的机会。行动者反复面对的不是一项能否持续经营的资源，而是眼下有什么可拿、谁能给、靠近谁才有资格，以及这条通道是否还来得及进入。

资源被制度切成离散机会，机会便把行动组织成捕获。这里的捕获不是普通人看见机会后的中性选择，也不是创业者对市场信号的灵活响应，而是满清共产主义制造的政治猎场中的行动。资源的位置取决于政治权重，机会的可见性取决于制度入口，机会的价值取决于谁能够赋位；捕获以后能否获得暂时安全，又取决于捕获者能不能进入一条主人—依附链。

2014 年的户籍制度改革意见针对不同规模城市，把落户与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住所、社会保险年限、连续居住年限或积分等不同条件连接起来；2016 年的落户方案则作为历史实例，提出存量优先、重点群体、因地制宜和分类施策，并规定了财政、住房与公共服务等配套机制。^{[1]}这些文件属于规范性安排，不能证明所有社会机会均由户籍决定，也不能证明政策目标已在全国同型实现；它们显示的是资源入口被拆解为具体条件并按城市与人群分类排列，通达方式也会随政策调整而改变。

机会因此带有制度造成的时间性。它不是凭空冒出的好运，而是某个位置被暂时变得可接近；它的短暂，也来自资格、名额、名单、项目、关系和权重的变化。能否进入，不只看能力，还看是否落在当前资格范围内，是否有能让自己被看见的关系，是否站在合适的排序位置，以及所依附的主人是否仍有赋位能力。资源成为位置之后，还必须进入人的视野。可见性不是简单的知道或不知道，而是制度入口、组织关系、资格条件和传播路径共同造成的相对状态。岗位可以公开存在，却只有处在某种单位关系中的人知道它真正值什么；政策可以写在文件里，却只有读懂条件、拿到证明并找到承接组织的人，才会把它认成机会；平台规则可以向所有用户开放，真正持续被排序、展示和分发的内容，才会进入可捕获的视野。

看见只是第一道门。之后还有能否申请、接近、维持和转换的制度位置。普通机会叙述常把发现归于个人眼光，把获得归于个人能力，跳过这段组织条件；机会渔猎则把它放回行动本身：看见不等于进入，进入不等于保留，保留也不等于把资源化成连续建设。捕获需要敏锐，也需要依附。敏锐让人辨认窗口，依附提供进入窗口所需的资格、证明和保护。有人看见机会却没有通道，有人已在通道中却没能判断权重变化；人工森林把这两种差异保存为不平等的资源位置，迫使行动者把许多注意力用来寻找能够补足自身缺口的关系。

普通机会还保留着开放性：人可以把它当作未来行动的可能，通过准备、训练和长期投入，逐步提高实现它的能力；普通机会主义至多是利用手边的一切机会，甚至可以被当作一种脱离具体制度的性格描述。人工渔猎中的机会更像猎物露出水面、林中出现踪迹，或者某个主人暂时指向一个位置。机会的出现本身已经包含排除，机会的可见性本身已经包含排序，捕获本身也包含重新赋位。没有制度制造的猎物位置，就没有政治机会的特殊形态；没有政治权重和依附关系，就无法说明同一资源为何在不同人手中价值不同；没有捕获—重新赋位，也无法说明资源为何不按长期能力自动流向，而按进入时的关系、资格和次序被重新命名。

这不能归结为创业精神、风险偏好或一般人性。那些说法预设行动者面对中性的价格信号，满清共产主义的机会渔猎却把人放在政治猎场里。行动者要观察需求和价格，也要看谁掌握资格和窗口，谁能替自己证明，谁能把自己从名单外移进去，谁能在规则改变时保住自己的位置。脱开这些关系和权重谈灵活，最后只会把政治捕获说成个人美德。

“有机会就怎么怎么样”因此有了明确的动作含义。机会一出现，先看能不能拿；能拿，就围绕它行动；需要靠近谁，就靠近谁；身份要改，说法要换，也都服从这次捕获。这里的“怎么样”没有固定

样式，捕获者会随猎物、权重、主人和风向即时调整。每一次调整却都把当前能否捕获放在能否连续建设之前。

机会渔猎成立，需要四件事同时出现：资源被制度组织成有门槛、可接近的位置；位置价值随着政治、组织或关系权重变化；行动者把进入和保留放在连续建设之前；捕获后的安全性系在能够重新赋位的节点上。少了其中任何一项，面对的就只是机会竞争、资格申请或一般转向。

公开考试、专业训练和长期经营可以带来相对稳定的能力，不会因为存在竞争就自动变成渔猎；有明确条件的政策也不会因为有期限就自动成为政治猎场；平台有排序，同样不能由此推出单一中心直接分配全部流量。普通职业选择或政策申请同样可能需要竞争、准备和判断，也可能有期限，但行动者的生存安全不必永久系在某个主人和权重上。

只有当入口、权重、捕获优先和依附安全彼此连成一体，把窗口化变成常态，把机会的价值同政治位置、关系保护和重新赋位绑在一起时，机会渔猎才呈现出它的特殊形态。满清共产主义借助高权重接口改变资源的可见性、方向和持续性；已经形成的连接，不能和仍然只是可能的联系混在一起。没有这种绑定，就不能直接称为渔猎。

二、捕获动作：先取得位置，再谈投入

捕获先取得位置，再谈生产和经营。制度接口把户籍、住房、单位、项目、资格和流量做成可接近、可排除、可排序、可转换的入口，划定了谁可以进入、谁只能等待、谁有资格留下、谁还在门槛外。当资源以机会出现，行动者最要紧的是成为能够接近猎物的人，先进去才有下一次赋位，被主人看见才可能把短暂机会变成暂时安全。

积累从已有的连续性出发，把时间、技能、信任和组织经验沉淀为更稳定的能力；捕获面对的则是尚未拥有的位置，它争夺入口，把行动压缩在窗口之内。积累需要时间保留下来，捕获要求机会在关闭之前被抓住。两者并非在任何环境中都互相排斥，但资源越是随权重移动，捕获就越容易压过积累。行动者因此要判断风向，寻找强者，追逐仍然有效的资格，并在窗口关闭以前把自己转成可用对象。

行动者还得判断什么才算猎物。普通岗位如果连着住房、户籍、身份和晋升，可能成为高价值资源；看似庞大的项目若不能带来长期位置，可能只是一次性猎物；平台流量不等于生产能力，却能改变谁被看见、谁被调用、谁有资格继续。资源位置的价值不由名称自动决定，而是在权重、关系和重新赋位中显现。捕获取得的是可用位置，不必然是可以独立支配的物。岗位被捕获，可能只是进入某个单位，岗位的方向仍由别的力量决定；项目被捕获，可能只是得到一次承接资格，资源不能任意使用；流量被捕获，可能只带来短期可见度，不能由此形成不依赖平台规则的公共能力。把位置说成拥有，会遮住重新赋位中的依附和风险。

占据位置以后，还要证明自己值得留下。证明可以是维持条件、重复组织语言、回应评价、接受新的排序，或者把自己的经验翻译成制度仍能识别的形式。这些动作还不等于公开服从与私人保留，也没

有自动形成完整的壳体机制；机会位置本来就不是无条件的仓库，占据者必须不断证明自己的可用性，而证明标准会随权重移动。

人工渔猎中的先来后到，不只是时间先后，而是机会窗口和资源位置共同造成的秩序。谁先进入入口，谁可能先拿到身份；谁先被主人收编，谁可能先取得解释权；谁先站住位置，谁就可能把后来者定义成竞争者、依附者或不合资格者。资源不会永远属于第一个人，后来者也不等于没有机会。只是机会从来不是平面地向所有人敞开：它被放进次序、名单和已有关系。先来者的优势不只多占了一段时间，还可能已经写进资源位置，成为后来分配时的参照。捕获者常常赶在规则变化之前进入某种关系和资格结构，而不是先证明自己已经拥有最完整的长期能力。进入之后，位置又制造新的资格，给他继续捕获的条件。自然森林里的猎物不会因为某个猎人先登记过，就在制度上更适合被同一个猎人再次捕获；人工森林的资源位置却可以被组织写入、被关系确认、被身份保存。

“主人—依附”构成机会捕获的安全结构。孤立的捕获者即使短暂取得资源，也未必守得住；进入主人—依附链以后，资源才可能重新赋位成身份、资格、编制、项目或稳定流量。主人不是抽象保护者，而是能在规则变化时继续制造可用位置的人。依附也不只是个人服从，而是把自己的行动能力嵌进他人掌握的入口。距离强者越近，资源位置可能越值钱；同样因为靠得近，自己的位置也越依赖强者继续拥有赋位能力。捕获同时带来取得和依附、收益和风险，也带来进入森林与被森林重新编码。行动者借助政治权重把自己变成某种可用对象，而不是以自由主体的身份单独利用机会。

机会的价值常常来自多个接口的连锁。住房连着居住、教育和公共服务，工作连着社保、公积金和身份，项目连着财政、组织和可见度，平台流量连着传播、合作和新的资格。一个入口变化，其他入口的可接近性也会跟着变化；捕获一个位置，因而可能牵动一串资源。政策、行政、单位、市场和平台规则可以共同构成这个环境，但并不意味着所有接口都由同一中心直接控制。满清共产主义在其中拥有能够改变方向和权重的高位节点，使原本不同的接口进入共同的政治—组织估价。不同接口之间究竟怎样相连，要看具体事实；可能存在的联系不足以证明统一控制。连锁也会放大机会的风险。一个入口关闭，失去的可能不只是一项资源，而是多个相关位置同时失去承接条件。行动者因此更依赖能够保持接口连续性的主人和组织；接口越相互牵连，单次捕获就越难被看成孤立的个人收益。

三、判断风向：机会价值不断被重新估价

机会渔猎要求判断风向。风向不是抽象舆论，也不只是市场趋势，而是权重正在怎样变化：哪种语言开始被认可，哪种关系获得保护，哪个位置升值，哪个主人失去调用能力，哪种资格正从入口变成障碍。资源的价值不能只看眼下的名称。一个人有技能，不代表技能会持续换来位置；掌握经验，也不代表组织会替他保存经验。技能、经验和资格只有接上当前权重，才会再次成为可调用的资源；权重一变，原有投入就得重新寻找出口。并非每个人都时时重估全部关系，政策调整也不会让所有积累一律失效。可在制度窗口、组织关系和政治权重制造机会的环境里，行动者确实得拿出一部分精力判断资源位置怎样变化，长期建设所需的稳定预期便会让位给“现在什么有用”。

如前所述，落户条件与配套机制展现了制度对入口的分类设置。而在算法治理方面，《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第二条涵盖了生成合成、个性化推送、排序精选、检索过滤和调度决策等应用类型，第二十条则针对向劳动者提供工作调度服务的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明确要求保护劳动者取得劳动报酬、休息休假等合法权益，建立完善订单分配、报酬构成及支付、工作时间、奖惩等算法。^{[2]}这些规定显示劳动调度与资源接口能够被制度化地设定与调整，但规范本身不等于满清共产主义的全部理论，也不能据此推论现实中每个人都会以同一种动作行动。

当判断风向成了长期生存条件，捕获就由一时投机变成训练。行动者训练的不是如何把位置建设成可以传递的制度，而是如何在位置变化前看见变化，在旧位置失去价值前转到新位置，把旧身份留下的东西变成新入口的证明。机会渔猎的连续性，正建立在不断转向上。转向首先是重新估价资源位置，不是简单换一份职业。旧位置还值不值得投入，旧关系是否仍有权重，旧语言还能不能换来资格，旧主人还能不能保护依附者，这些问题决定行动者会不会寻找新的入口。位置一旦不能继续被赋位，人就要另找能够承接行动的地方。在捕获—重新赋位的行动过程中，机会出现，捕获者取得的不只是资源，还要尽快把资源改写成新的身份、关系或资格；窗口变化，失去的也不只是一个资源，已经投入其中的经验、说法和依附都要重新安置。资源移动带来人的移动，位置变化牵动关系，关系变化又逼着行动者改变自己的可用形式。

窗口一旦关闭，资源往往还在。住房还在那里，岗位还在那里，项目还在那里，技能也还在那里；失效的是原先通向它们的资格、关系和解释方式。原来的入口不再打开，原来的主人不再能够赋位，原来的资格也不再能把投入兑换成位置。真正摆在行动者面前的，是已经投入的时间能否转入下一条路径，形成的关系能否被新规则承认，积累的技能能否在新的排序中重新出现，建立的信任能否脱离旧主人而独立存在。只要这些问题没有确定的答案，继续投入就未必是最安全的选择，寻找下一次可捕获的机会反而可能更稳妥。

这种环境并没有把人变成没有判断力的被动者。机会渔猎要求人具备判断力，知道何时靠近、何时等待、何时转向，也知道何时该停止把时间投在已经失去权重的位置上。但等待本身也是一种捕获行动，其内容变成了对窗口、名额、关系和权重的计算：等条件满足，等主人表态，等规则变化后重新进入，或等竞争者退出。等待期间位置是否保留、资格是否持续、关系是否有效，决定了等待本身的价值。它不同于旨在学习、准备和建立稳定能力的积累性等待；等待捕获首先要保持在场与可捕获状态，让自己不被排除、保持联系、维持可见，并随时能够转向。

因此，机会捕获并非盲目冲动，而是包含对窗口关闭的预期、对主人权重的判断，以及对自身位置风险的估价。机会渔猎不能被贴上懒惰或投机等道德标签；它是在不稳定资源环境中训练出来的生存理性，而这种适应性生存理性，又反过来巩固了制造不稳定的制度森林。

把机会渔猎解释成短期逐利，会漏掉它与人工森林的关系。短期逐利假定行动者面对一张已经存在的选择地图，只是把眼前收益排在长期收益之前；机会渔猎面对的却是地图本身不断改名、改线、改入

口。行动者不是在稳定地图上选择远近不同的道路，而是在地图变动时寻找下一块能够站住的土地。捕获者可能有长期愿望。他可能想要稳定，想把技能、关系、资产和身份带到下一阶段，也可能知道连续建设比一次性收益更有价值。可是，当重要资源集中在短暂窗口和政治权重中，愿望不能直接变成行动。行动先要解决能否进入、能否留下、能否被承认，以及投入能否在下一个规则周期继续有效；这些条件系在窗口上，长期愿望就得先服从即时入口。人工渔猎和一般市场竞争的差别也在这里。市场竞争至少可能让某些能力、产品和信誉沉淀为相对独立的竞争资源；人工渔猎中的资源位置却更容易被重新赋位。今天证明资格的东西，明天可能只证明曾经属于某个名单；今天能够保护一个人的关系，明天可能要求他用新的表态证明自己仍然可用。

四、投入为什么会围绕窗口重排

长期投入之所以能够积累，靠的是对未来的信任：学习技能、建立信任、训练组织、形成工作方法，都要相信明天仍会承认今天的投入。机会渔猎改变的不是投入是否存在，而是投入与未来之间的连接。未来入口由新的资格、关系和权重决定，今天投入的价值就会反复接受重新估价。投入会围绕窗口重排。能直接帮助捕获的投入被迅速加重，不能立即换来位置的投入被推迟、放弃或降为次要。有人突然学习资格规则，突然靠近某个单位，突然改变职业叙述，突然把时间集中到一个项目或政策通道上。这样的动作可能正是对制度窗口的准确反应，不能简单说成缺少规划；它也谈不上自由灵活，因为反应来自不稳定入口的压力。

转向也改写积累的意义。长期投入原本希望今天的经验增加明天的能力，今天建立的信任支持明天的合作，今天形成的组织记忆明天仍能发挥作用；机会渔猎却要求投入跟着窗口移动。投入是否值得保存，不只看它是否真实有效，还看新权重能否继续识别它。经验曾经有效，如果新位置读不出它，也可能很快失去制度上的调用资格。时间因此不再只向前累积，而是被横向搬运。过去的时间要被解释成新位置的证明，过去的经验要包装成新资格的材料，过去的关系要重新确认当前权重。投入没有彻底消失，却不再自动成为下一阶段的基础；它还得重新进入制度入口，重新获得排序，重新找到能够承认它的主人或组织。

机会之所以会压过积累，并非长期投入毫无价值，而是投入必须得到一个能承认连续性的环境。今天的经验若不能保证明天仍被同一套规则读取，今天的关系若要随主人转向而重新定位，今天取得的资格若只能在短窗口内生效，时间就会被切成更短的单位，被切短的每一段时间都必须先证明自己能换来下一次入口。“积累中断”也不是停止学习、工作或生产。人可以很忙，可以取得大量经验，可以迁移、转岗、转向、重建关系，但每一次转换都要求重新解释过去，过去便难以成为无须再次证明的基础，积累也就没有沿着已经形成的连续性向前延伸。

积累于是背负着被审查、被读取与被确认的压力。行动者不仅需要积累，还要积累当前规则读得懂的内容；不仅要建立信任，还要建立当前主人或组织能够确认的信任；不仅要形成技能，还要形成能在

当前排序中换来位置的技能。读取方式一旦改变，原有投入就可能需要重新包装。这种重新包装有时是必要的现实适应，却也表明过去的投入并未直接、稳定地通向未来。

连续建设需要相对稳定的时间承诺。行动者要相信，今天的学习、劳动、组织和信任不会因为入口改名就在明天完全失去意义。人工森林不必然取消一切稳定性，而是把稳定性放进条件和接口之中。2014 年与 2016 年的户籍政策按城市规模分类设置了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住所、参加城镇社会保险年限和连续居住年限等不同条件，并在 2014 年意见第 13 项中规定了养老和医疗保险关系的转移接续。^{[1]}这些条文旨在规范准入门槛与转移接续，不能据此推断已获户籍者仍需靠反复审核来维持，更不能把旨在保障接续的条文直接视为连续性业已断裂的既成事实。

同样，《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第 20 条要求向劳动者提供工作调度服务的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建立完善订单分配、报酬构成及支付、工作时间、奖惩等相关算法。当资源位置的保持依赖这些规则接口时，接口的调整便可能要求原有通路重新连接，但这属于规则接口所构成的条件机制，而非规范条文本身已证明的实际结果。^{[2]}这同样不能推导为所有人的技能与资本都必然归零、所有职业均发生转换，或是全部流量都由政治中心直接分配。

窗口要求速度，连续性要求耐心。在窗口关闭之前，等待可能意味着失去机会；而在连续性建设过程中，频繁转向又可能使前期投入无法成为后续基础。制度环境把这两种相互冲突的时间要求压在同一个行动者身上，迫使其在即刻捕获与长期建设之间反复权衡。

这种张力来自资源入口与规则接口的设置，而非单纯的心理矛盾。前述户籍准入与平台调度条文展示了制度层面的规范接口，而投入能否兑换成稳定位置，则取决于接口能否给予承认。一个人即便付出了全部时间与真实努力，若长期路径的入口由另一张关系网络控制，其投入就未必能获得制度承认；没有被制度承认的投入，即便在个人生活中真实存在，也难以转化为公共意义上的连续资源。但这属于机制层面的入口约束，并不等于所有现实就业或平台现状都已被文件条文完全证实。

在这种环境里，政治权重比单纯的能力排序更重要。能力要先被看见、命名并纳入当前规则，才会成为资源；资格要得到规则承认，才是入口；信任若经不起关系切换，也难以成为长期资产。人工森林让这些东西能够移动、重新赋位，于是连续性成了每次窗口变化后都要重新争取的政治条件。短期捕获和长期建设并不是作出一次选择后就固定的两条道路。每次窗口变化，它们都会重新冲突。资源越稀缺、越受政治权重控制，行动者越容易先去取得位置；组织越依附密集，个人的连续计划越容易改写成对主人和入口的连续回应。结果不是没人行动，而是行动很多、路径很多、位置不断变化，却难把前一阶段沉淀成下一阶段的独立基础。

五、积累为什么中断

“没有积累”并不是说一个人从未拥有财物，也不是说任何地方都没有技能、资本、信任或组织经验。人工森林生成了围绕机会捕获与转向的政治生存逻辑，让投入在机会出现时先去捕获，在机会改变时又去转向，投入不断被重新放置，难以稳定沉淀成不依赖下一次窗口的连续性。

“没有积累”比“积累较少”更强。后者仍假定方向稳定，只是数量不足；前者指出投入同后续之间的连续转换被打断，时间没有稳定沉淀成下一次行动的基础。一个人可以做过很多事、抓住很多机会，在不同窗口中取得短期位置，这些事却未必连成一条能够不断增厚的路径。这个判断不等于所有投入都失效：当捕获先于连续建设，社会行动会越来越擅长追逐位置，却越来越难保存位置之外的能力。机会仍会不断出现，行动仍会不断发生，成果也可能不断显现，但成果之间不一定形成可以传递的连续性。

积累的关键不在于拥有得多，而在于前一阶段的投入能否成为后一阶段的基础。今天学会的技能，明天仍能被识别并转化为能力，才是技能积累；组织今天形成的经验，明天不因主人变化被抹去，才会留下组织记忆；家庭今天建立的信任和资产，明天仍能作为下一代行动的起点，才有跨代连续性。技能、资本、组织记忆、制度记忆、长期规划和信任，是积累可能寄托的不同承载方式，并不自动组成一套固定的分类。^{[3]} 机会窗口把行动压向即时捕获，入口变化要求投入重新证明，关系要重新确认，位置也要重新取得，这种重新证明又使连续性变得脆弱。技能、资本、组织记忆、制度记忆和长期规划分别在哪些范围中断，仍要由相应材料说明，不能用一套未经材料支持的解释包办。

“有机会就怎么怎么样，而没有积累”，描绘的景象首先是行动很多、反应很快、捕获欲望很强，但行动之间缺乏接续。它不是对捕获次数的统计，也不是对短期偏好或个人性格的描述，更不是说每个汉人、每个时期、每个领域在统计意义上都绝对归零，而是对一种制度形成的政治生存逻辑的强判断。机会渔猎可以把敏锐、转向、依附和捕获训练得很强，却不让这些能力稳定转换成脱离窗口和主人的建设能力；窗口关闭之后，迅速转向反而成了最有价值的能力，建设便难以成为不依赖下一个窗口的基础。

捕获能够带来位置、收入、住房、资格、流量、关系和暂时安全。只看一次结果，机会渔猎甚至显得有效：资源重排时仍能迅速行动，组织能在窗口变化中重新聚集，权力也能把旧关系转成新用途。单次成果却不会自动变成积累，短期位置不会自动长成长期能力，暂时安全也不会自动变成不依赖下一次捕获的制度保障。

“没有积累”不等于无能，捕获者也不等于懒惰者。捕获者可能极其勤奋、聪明，拥有丰富经验；勤奋被分配给窗口，聪明被训练成判断权重，经验则不断适应新的入口。问题不在行动数量，而在行动难以沿同一条连续性沉淀。适应能力只有转化为自主能力、公共能力和长期建设，才会形成积累。在人工森林里，适应首先服务于捕获和依附。一个人越能适应当前权重，越可能在下一轮变化中被重新

调用；只要能力还必须通过外部入口取得价值，行动者就没有真正脱离猎场。捕获能力越强，越可能成为人工森林更新自身的帮手。窗口一开，行动者迅速聚集；权重一变，行动者迅速转向；旧资源失效，新的关系重新建立。森林不断更新猎物，猎物也在训练新的捕获者。

机会捕获会遮住机会成本。一个人为抓住某个窗口放弃的，可能不只是一份收入，还可能是另一条技能路径、另一段关系、另一种组织经验和另一种长期建设。在当前这套分配理论中，机会成本被理解为不能被简单抹除的劳动和风险承担。人工森林要求行动者反复在窗口之间选择，每一次捕获都可能意味着放弃另一条尚未形成的连续路径；机会成本因而可能与机会捕获发生连接。捕获有其代价：进入当前资源位置，会失去其他积累方向的机会；留在一条主人—依附链中，要承担不能自由转换关系的代价；风向变动时迅速转向，过去的投入也可能难以延续。当这些代价一次次被新的捕获所掩盖，社会表面虽有大量行动，个人也可能不断取得短期位置，长期连续性却越来越难保存。

在这套分析中，机会成本、农村男性、婚配、性垄断和中共女权主义各有自己的脉络、材料和因果条件。它们可能分别与资源捕获发生具体连接，现有材料却不足以将这些支线合并为解释“没有积累”的统一原因。

六、捕获之后仍然处在被捕获之中

机会捕获还有一个反转：捕获者在取得猎物的同时，也可能被猎物所在的制度位置重新捕获。一个人为了进入某个岗位而接受某种身份，为了保住住房而服从某种关系，为了获得项目而把自己的能力翻译成某种政策语言，为了维持流量而持续迎合平台规则；他看起来是在捕获资源，实际上也在让自己的行动适应资源接口。捕获不是一次完成的占有，而是进入一个会继续要求服从、证明和转向的结构。这就是人工渔猎区别于自然猎获的地方。自然猎人捕获猎物之后，猎物不会反过来要求猎人改变名字、加入新的名单、接受新的排序；政治猎物却会把捕获者带入新的关系链。一个位置越有价值，越可能要求捕获者证明自己为何配得上它、属于谁、能够为谁服务、下一轮变化时是否仍然可用。人在捕获资源的同时，被资源位置规定了行动边界。

行动者只能不断把自己翻译成当前环境能够识别的对象。这种翻译是政治位置的自我重排，不只是个人表达方式的变化。捕获者要知道自己哪一部分能被当前权重调用，哪一部分需要暂时隐藏，哪一部分可以换成更有用的语言，哪一部分要跟随主人移动。这还不等于完整的壳体机制；机会捕获已经要求人把自己当作资源位置的一部分来经营，而不是一个能够脱离入口持续成长的独立主体。

人与猎物于是形成反向关系。人取得位置，位置也取得人的时间、语言和行动方向。越依赖窗口，计划越要做成可转移、可替换、可再解释的形状，这能提高短期存活率，却会削弱长期建设的独立性。如果这种反向捕获持续发生，行动者的长期计划就不能只按自身目标安排，而要不断预留给制度转向的空间。计划不是没有，而是被切成可随时转移的片段；建设不是完全不存在，而是必须先证明它能在下一次权重变化中继续存活。“没有积累”正体现在这种反向捕获中：行动者不是没有努力，而是努力被反复纳入新的猎场，难以脱离猎场而形成自主的连续性。

机会捕获的矛盾在于，行动者越擅长捕获，越可能失去把捕获转成自主积累的机会。人获得了位置，也变得灵活、敏锐、能够转向；环境需要这种灵活，权重调用这种敏锐，制度又把转向能力吸收为下一轮运行的材料。机会渔猎不是没有能力，而是把能力组织成不断追逐机会的形式。

七、从机会捕获到政治人格

“满清共产主义把汉人渔猎化”所面对的是汉人这一历史政治民族主体，而非若干无名个体、某些群体、偶然个案或范围不同的“主体民族”。这是一种集体理论判断，而不是一张覆盖每个人、每个时期和每个领域的统计表，统计边界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民族分析范围被缩减为部分人。与此同时，“汉人渔猎化”不属于血统、遗传或生物学决定论，而是对历史政治主体的理论判断，绝非凭空添加的生物学解释。

民族主体与最终结果之间，隔着一条不可跳过的人工环境—机会捕获—连续性断裂的中介链。满清共产主义制造人工森林，人工森林把资源拆解为机会，机会捕获又训练行动者，使其行动遵循渔猎式的政治生存逻辑。这条中介链说明了规则怎样进入行动并导致连续性断裂，构成了汉人这一历史政治主体满清化的具体机制。

机会渔猎开始改变人看世界的方式。世界不是一片可以长期耕作的土地，而是一片不断出现窗口、不断移动权重、不断要求寻找入口的政治森林。人会先判断什么位置正在形成，谁能把自己带进去，哪种关系能保存自己，什么时候该停止原来的投入，什么时候必须转向新的猎物。当机会捕获成为反复发生的生存中介，主体就会逐渐把自己的时间理解为窗口序列，把关系理解为可用通道，把能力理解为等待重新认证的材料。人不只在制度森林中行动，也在行动中学会把自己制作成适合被看见、被调用、被重新赋位的对象。

> 满清共产主义把汉人渔猎化，使其变成“有机会就怎么怎么样，而没有积累”。

机会渔猎与积累中断已经构成一种政治生存逻辑，行动者的感知也已逼近政治人格，但单凭机会机制尚不足以得出完整的人格结论。追逐资源位置所迫使的投入重排，还不等于借壳、换壳、夺舍或组织拟态的完成，也不足单独证明主体民族满清化、两面人和表演性忠诚业已达成。

在这一进程中，民族名称仍然存在。反向捕获留下的，不是对个人的道德责备，而是对政治生存逻辑的判断；人格变化有其形成过程，并非民族性格凭空发生。机会、捕获、依附、重新赋位与转向构成了制度中介，反向捕获是其中不可绕过的一环，却不是解释人格的单一原因；政治行为、资源寻找、权力感知和组织依赖究竟怎样在这一连串机制中走向满清化，仍是下一章需要展开的问题。

第十八章 有机会就捕获：机会渔猎与积累中断注释

[1]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发〔2014〕25 号），2014 年 7 月 24 日成文、7 月 30 日网页发布，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07/30/content_8944.htm；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印发推动 1 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6〕72 号），2016 年 9 月 30 日成文、10 月 11 日网页发布，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10/11/content_5117442.htm。两份文件所列落户条件、就业/住所/社保/居住年限、积分、公共服务和配套政策接口，能作为制度规范的依据，但政策目标不等同于全国同型的现实结果，亦不足以据此推导出完整历史户籍沿革。2014 年第（四）至（八）项按城市分类规定不同条件，第（十）项涉及居住证及公共服务，第（十三）项含养老与医保关系转移接续；相应准入或服务年限要求不意味着取得户籍以后仍须反复审核才能保留。2016 年文件作为历史实例，所据既有缓存标注“失效”，未核失效时间和依据，不能视为现行统一办理规则。

返回正文 返回正文 2

[2]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四部门令第 9 号，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布、2022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中国网信网页发布于 2022 年 1 月 4 日：https://www.cac.gov.cn/2022-01/04/c_1642894606364259.htm。第二条所列应用类型包括生成合成、个性化推送、排序精选、检索过滤、调度决策等。第二十条针对向劳动者提供工作调度服务的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要求保护劳动报酬、休息休假等合法权益，建立完善平台订单分配、报酬构成及支付、工作时间、奖惩等相关算法。相关条文仅确立规范接口，不足以推定具体平台权重、实际分发结果或全部流量由政治中心直接分配；第十七条非个性化选项与便捷关闭选项为“或者”。规范要求、实际执行与政治生存逻辑判断分属不同层面。

返回正文 返回正文 2

[3] “人工森林”“机会渔猎”“资源猎物”“捕获—重新赋位”“主人—依附”属于理论分析概念，并非上述制度文件的官方用语。技能、资本、组织记忆、制度记忆、长期规划和信任在这里只作为可能的积累层次与受控连接，并非已经固定的完整分类；“没有积累”指向的是制度形成之政治生存逻辑的具体范围。

返回正文

史料说明：2014 年户籍改革意见依据原文件，2016 年落户方案及算法推荐规定依据既有网页缓存；涉及的全部效力沿革、地方执行与平台参数尚未完成核实。政策文本只提供制度条件与规范接口的依据，不能单独证明全体人的积累中断或完整的政治人格变化；各积累层次、机会成本及相关支线的具体因果与事实范围，仍须分别补证。

第十九章　主体民族满清化：政治人格与政治生存逻辑

人工森林里的行动链最后落在一个绕不开的结果上：资源以机会出现，机会来了就得立即捕获；人要判断风向、寻找权重、进入依附，才能取得位置。窗口一关，此前的投入又被迫另找出口。满清共产主义就这样把汉人渔猎化，使其变成“有机会就怎么怎么样，而没有积累”。问题并不停留于几次孤立的机会选择。同一种政治生存逻辑长期进入工作安排、身份核定、组织归属、教育培训、住房分配、公共服务乃至公共空间的能见度接口，改变的究竟只是一些孤立行为，还是主体民族的政治人格与政治生存逻辑？

一、满清化就是渔猎化

满清共产主义所改造的，是真实存在的主体民族，而非抽象的“社会成员”。发生的变化既不是某些个体偶然学会了适应技巧，也不是外在制度施加的浅层影响。统治确立之后，汉人并没有消失，民族名称和外壳依然存在；但主体民族仍然存在，绝不等于其政治人格与政治生存逻辑未曾遭到重塑。

主体民族满清化，就是渔猎化。这里讨论的机制，并不以族称更改、改穿某种服饰、改换日常语言或搬用边疆生活史为发生条件。它落在政治—组织生存逻辑的维度上：满清共产主义将这套政治生存逻辑扩散进主体社会的制度接口，汉人依然被称为汉人，但在辨认资源、识别主人、感知权力、依附组织、安排忠诚、安排投入与理解安全的方式上，却越来越由人工渔猎环境规定。民族名称和外壳保留下来，并不妨碍其内在的政治人格被重新训练，进而服从另一套政治生存逻辑。

汉人历史主体承受的政治人格变化，有别于无历史身份的一般制度影响。《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第二卷 民族”表目中官方统计依然设置民族项目^{[1]}，但这仅能证明该次普查存在此类分类，既不能推论所有年代分类的连续性，更不能反过来证明民族的政治人格保持原样。

捕获—重新赋位的治理技术并不要求消灭旧对象的外壳。它完全可以在保留既有身份和称谓的同时，重组这些对象在政治结构中的最高权重：什么能够带来安全、什么能够打开资源、什么语言能获得组织承认、什么连带能维持生存位置，已经越来越由这套人工森林所规定。

历史分析所面对的是具有明确历史身份的汉人主体民族，其实际承受的变化是主体民族在政治生存逻辑层面的满清化；人工渔猎环境解释的则是这一政治生存逻辑得以周而复始复制的制度接口，两者并不构成替代关系。

这一判断并不诉诸生物遗传因果，不等于基因、血统纯化或不可改变的生物学宿命。它确立的是民族作为历史—政治主体的真实性，以及该主体在政治人格上遭到塑造的理论判断；人工渔猎环境这一概念，则是用来解释这套权力生存逻辑究竟怎样借助现代组织、制度与资源接口完成周而复始的复制。

论证中拿掉民族主体，变化就会缩水为无历史身份的一般适应；拿掉人工环境，民族的改变又会失去现代政治—组织的运作机制，二者各司其职而不相互替代。这两层解释并未构成解决民族本质、历史

形成与环境塑造之间全部哲学关系的更高统一理论，亦不假定每一个体在每一个时刻都做出完全相同的动作。地区、代际、阶层和组织位置产生的差异真实存在，体现为具体事实和比例的边界，而“主体民族满清化”所指向的始终是这一整体历史政治主体的生存逻辑转变。

这里的“渔猎”不是随意的文学比喻，而是一整套运转于政治生活中的组织生存逻辑：辨认猎物，判断风向，寻找高权重节点，靠近能够赋位的主人，抓住窗口，取得位置，保存可用对象，改变身份和关系，并在权重发生变化时迅速重新估价、重新转向。

将这一过程简单称为“适应”，会把权力施加的主导方向掩盖起来。主体民族所面对的并非自然气候，而是由捕获—重新赋位、主人—依附、政治权重与机会窗口构成的人工政治猎场。若说成普通适应，改造者就会在因果链中隐形；若缩减为一般“影响”，被改造的主体民族这一强判断就会退场；若斥之为“机会主义”，制度造就的生存条件便会被挪作个人的道德缺陷。“满清化”同时指明了改造者、政治生存逻辑、民族主体与结果方向。汉人主体民族依然存在，政治人格却越来越依凭对主人、风向和资源位置的判断来运转；这并不是同化完成后的无民族状态，而是民族外壳与后清生存逻辑并存的现实。

二、先后次序的重排

制度先把社会做成森林，资源随后以机会的形态出现，并开始压过连续积累。当这条行动链不再只发生在一两次选择里，而成为人们取得工作、身份、住房、公共服务、组织承认和社会可见度时反复面对的规则，渔猎就从行为进入了政治人格。人在这样的环境里，渐渐把世界看成一片由入口、资格、排序、关系和主人组成的政治猎场。

政治人格不是可以直接窥见的内心本性，也不是某种不可改变的固定性格；外在行动同样不能原封不动地当成内在信念。能够观察的，是资源、权力、组织和安全这些现实接口：行动者怎样估价入口与关系，怎样应对规则变化，又怎样判断语言会带来什么后果。观察不以所有人表现出同样强度为条件，制度入口的存在亦不足以单独证明民族人格已获完整实证。

渔猎化不能归结为普通机会主义。机会主义把原因推给个人道德，好像只是有些人天生爱占便宜；渔猎化看到的却是，政治结构能够把捕获机会变成生存条件。这种有利于存活的灵活与随风转向，源于机制的塑造而非个人的美德或单纯聪明。长期建设一旦不能脱离权重得到保存，资源入口又同组织位置相连，规则还会随政治方向重新排序，善于迅速判断和捕获的人便更容易存活；做不到的人则更容易失去位置。

满清化的强度就在这里：它不是在原有民族人格表面添上一点影响，而是改变了判断现实的先后次序。原本可以围绕长期经营、稳定合作和连续建设安排的行动，现在被迫先拿机会、入口和权重来估价。时间不再首先是一条可以积累的线，而成了一个个必须及时抓住的窗口；组织不再首先是共同完成长期事业的结构，而成了分配安全、资格和资源的位置；语言除了表达判断，也开始承担让人进入、证明自己和保护自己的功能。

2019 年修订的机关基层党组织条例把政治教育、管理、监督和组织生活放进制度入口，明确规定对包括负责人在内的党员进行教育、管理、监督，同时另行规定对机关工作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在干部人事上，条例明定其职责是协助党组（党委）、配合组织人事部门进行考察考核并提出意见，且明文写定机关基层党组织“不领导本单位业务工作”。^{[2]}政治教育、组织生活和评价意见由此具有了正式位置，业务领导权的界限并没有取消；至于机关工作人员是否由此形成同一种内心信念，条文本身无法证明。

在不同领域，制度所设定的接口并不相同。2023 年的干部教育培训条例将党校（行政学院）规定为干部教育培训的主渠道，同时保留其他培训机构的分工；2019 年试行的国有企业基层组织条例确立了党委（党组）的领导作用，规定重大经营管理事项须经党委（党组）研究讨论后，再由董事会或者经理层作出决定，这与由基层支部包办企业经营并非同一回事。^{[3]}这些制度适用的对象各有边界，不能把所有单位压成一种模样，条文上的规范规定也不等于实际生活中的履行程度。它们表明的是，政治训练、评价机制和资源决策正是通过这些彼此有别的组织接口建立起运转依据。

人工渔猎环境不是一层可以略过的背景，但这些接口反复出现，并不意味着参加一次培训就会立刻造出一种人格。真正起作用的是制度长期把某些判断放在高权重位置。想进入组织、留在组织或继续上升，人就得懂得识别政治方向，知道什么能得到组织确认，哪些举动会影响考评，又该用何种语言同组织接轨，并围绕这些规则安排外部行动。这一过程并不要求每个人都读过同一部教科书，也不以人人真诚信奉同一套理论为前提。

机关、干部培训、国企治理、身份服务与公共可见度各有其制度范围，不能压成一套统一程序。政治人格的满清化，不会由一次宣传或一项政策单独造成。工作与组织接口为政治关系确立正式位置，训练接口反复训练政治语言，身份安排与资格机制划定准入边界并规定资源的通达条件，公共服务的获取要求维持特定的连续条件，评价接口既标明政治方向的权重又影响行动的可见后果，可见度接口则影响表达怎样进入公共空间，而机会窗口则训练对资源的及时捕获。每个接口只承担一部分制度功能，但当这些有差异的接口在日常生活中长期交织叠加，人便不得不反复依照它们的分工与导向来调整自己的生存策略。

一个环境若反复提高判断风向、靠近权重、抓住窗口和维持组织关系的现实回报，拥有这些能力的人就会处在更有利的生存位置；它若又让脱离组织的长期投入失去兑换通道，连续建设的成本便会升高。理论判断的是制度筛选朝哪个方向发生，而不是一项已经完成的代际统计。

现有材料能够确认若干制度入口、训练安排、评价关系、资格条件与可见度规则，尚不能由此断定在不同地区、代际以及组织位置上都呈现出完全相同的结果。更不能说这种政治生存逻辑已经按同一种方式跨代传递。政治人格并非固定性格。跨区域比较、代际追踪和实际行为测量，仍需要更充分的材料。这一理论命题所阐明的改变判断次序与塑造生存逻辑，本身超出了浅层影响的范畴。

三、从资源寻找转向权重寻找

政治人格的满清化，最直接地表现在人怎样寻找资源。物品、职业或收入不再足以说明资源的全部价值，人还要看它能不能接上身份、组织、保护和下一次机会。岗位意味着的不只是工资，它把人放进哪种单位、接通哪些资格、带来什么关系，同样重要；身份也不只是一种名称，还关系到哪些公共服务能够打开；公开表达除了内容本身，还牵涉能否获得可见度、组织认可与安全位置。

身份与公共服务接口提供了另一种具体的制度训练。以 2016 年的非户籍人口落户方案为例，文件提出的是制度安排与工作要求，而非已在各地完全兑现的现状。按其规定，除极少数超大城市外，全面放宽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条件；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则以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住所、参加城镇社保年限和连续居住年限等为主要依据，分区域分类施策；大中城市均不得采取购买房屋、投资纳税等方式设置限制。

在配套措施上，政策要求将进城落户农民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并推进公积金覆盖，落实医保跨制度、跨统筹地区连续参保与转移接续，加快落实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政策，保障落户农民子女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利；同时推进居住证制度覆盖全部未落户城镇常住人口，保障其享有国家规定的基本公共服务。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情况及相关配套政策实施情况被纳入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审计结果及整改情况作为有关部门考核、任免、奖惩领导干部的重要依据。^{[4]}

这里既有落户限制的放宽，也有分类施策与地方差别，不能把它概括为一道全国统一、封闭的门槛，文件本身更不足以证明所有资源都由户籍决定。但它确实展示了身份、居住、就业、公共服务与组织评价如何彼此咬合。行动者面对的并不是某种孤立的单项资源，而是一组必须辨认地方规则、看清分类条件并维持相关连续性的制度入口。

注意力于是从资源本身移到它背后的赋位者。人会先看谁能打开入口、证明资格，谁能在规则变化时保住位置，评价和分配又掌握在谁手里。资源寻找就这样逐渐同寻找主人重合。主人未必是某一个具体的人，也可能是组织、部门、单位、平台，或者任何能够改变规则方向的高权重节点。依附同样未必表现为公开的私人效忠；维持组织关系、使用规定语言、保持资格连续性、主动靠近资源入口，都可能成为它的形式。

满清共产主义把资源做成位置，再把位置接上组织权重。资源的现实价值从此不能脱离主人—依附关系来判断。同一种能力，在一个位置上可以得到承认，换一个位置就可能失去兑换通道；当能力的使用机会直接系于具体位置的认可时，寻找能力的发挥空间便连向了寻找能够赋予位置的节点。同一种经验，在旧主人仍有权重时是资本，权重一变，却可能成为必须重新解释的负担。对这些接口依赖越深，人就越需要把资源寻找变成权重寻找。

这并不意味着专业能力、市场交换和个人努力完全失去作用，满清共产主义也不必消灭其他一切规则。它只要在关键位置拥有更高权重，其他能力便必须经过政治—组织入口，才能取得较稳定的现实位置。

专业、机构和民族名称都可以保留，问题在于它们能否被调用、怎样被调用，以及谁有权赋予最高位置。这些事情越来越受人工森林的政治方向支配。

满清化并不止于表面上多说几句政治语言，它改变的是整张资源地图。组织成了通道，关系成了保险，语言成了钥匙，身份成了可转换的资源，窗口则成了必须及时捕获的猎物。行动者一旦以这张地图安排日常生存，渔猎化就不再只是外在策略，而会成为判断现实的默认起点。

四、权力感知与主动搜索

人工渔猎改变了人对权力的感知。在稳定秩序中，权力可以被理解为受规则约束的职权；到了人工森林，人首先感受到的却是改变入口、资格、排序和解释的能力。谁能让一个位置升值、让一种身份得到承认，谁能把某个人从名单外放进名单内、改变某种语言的安全性，谁就掌握着现实权重。

这种权力感知使人不再只看正式名称。职位写进组织图，不等于它就有最高权重；规则公开存在，也不等于纸面含义会自动成为每个时刻的现实解释。行动者还得辨认正式制度背后，究竟哪些节点能够决定资源方向。判断风向不是附带技巧，而成了识别现实权力的基本方式。

公开信息空间里，平台可见度把这套环境往前推了一步。在境内算法推荐服务中，相关规章把个性化推送、排序精选、检索过滤、调度决策和展示列入规制范围，同时也规定了向用户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或者提供便捷关闭推荐服务等用户选择。^{[5]}凭这些条文，既不能证明所有公开表达都由单一中心完全控制，也不能从排序结果直接倒推出说话者的内心动机，规章本身更不足以直接推断各平台在现实中的具体运行效果。它们能够支持的判断是：可见度并非纯粹自然生成，表达总要面对已经规则化的推荐、排序和展示机制。

人不只要想自己说什么，还得判断什么更容易被看见，什么能进入下一层传播，什么可能被规则压低可见度。假定两段同样合规的陈述，若一项被规则纳入展示队列与分发流，可能触达更广节点；另一项若未获展示调度或被置于边缘位置，便可能停留在发出端。

权力一旦被感知为不断变化的权重，忠诚也就不再只是对固定原则的忠诚。人会先看现在谁能提供保护，什么语言能够得到承认，哪一种身份更安全。这还不是两面人和表演性忠诚的完整形态，却已经给它们准备了前提：政治人格先学会区分公开语言与资源权重，在名义规则和现实赋位之间寻找通道，之后才会发展出面对不同权重使用不同语言的完整技术。

满清化不能只用恐惧政治解释。恐惧可以迫使人服从一次，却解释不了长期的资源判断。人工渔猎训练出的是一种更主动的权力感知。人不仅要躲避惩罚，还得预判谁会变强；遵守规则不够，还要摸清规则怎样被解释；保住眼前位置还不够，窗口一开，他还得靠近新的主人。危险就在这种主动性里：满清共产主义让被统治者自己承担搜索、估价和转向的成本。

五、组织依赖与政治生存逻辑

组织依赖不能同一般的人际合作混在一起。复杂社会当然离不开组织，真正的分界在于，一个人离开组织之后，是否还能保有稳定的权利、资源和连续性。当工作、身份、服务、评价和可见度被人工渔猎环境接进组织接口时，退出就不只是失去同事；一旦脱离组织，人还可能同时失去证明、资格、关键信息、保护以及下一次机会。

在这样的结构中，组织不再只是协调行动、完成共同事务的工具，它本身转化成了生存位置。人必须设法进入组织、维持组织关系、听懂组织语言，并通过组织去获取资源。组织掌握的信息优势，让内部成员能够更早知道哪些机会窗口即将打开；组织参与评价，在专业表现之外，加入了一项政治可用性的考量；组织连接着资源接口，将个人日常生活的连续性同组织承认系在一起。

这种依赖并不需要组织直接占满私人生活的全部。现代满清共产主义更擅长保留外部形式：个人依旧可以拥有职业名称、家庭生活和私人选择，各类机构也照常保留着专业章程。然而，在决定资源流向与安全界限的高权重节点上，组织却能改变现实方向。正因为社会外壳与制度形式没有消失，依赖才不必总以赤裸的强制出现。在日常理解中，主动靠近组织可以被解释为个人的正常发展，使用组织语言可以被当作职业能力，而在变化中维持关系也可以被说成现实成熟。渔猎生存逻辑就这样进入日常。

组织依赖还会改写什么算作能力。能够在组织内被识别、证明和调用的能力，才更容易换成资源位置；一种能力即使真实存在，若进不了评价接口，也可能很难沉淀为稳定位置。于是，人既要学习做事，也要学会让组织看见自己以正确方式做事；专业经验之外，还得积累一种能被主人和组织解释的身份。能力的生产，逐渐同可用性的生产连在一起。

这条链不能证明所有组织成员都认同组织。参加培训、遵守规则或使用政治语言，都不能直接算作内心的忠诚。组织一旦掌握了资源、证明、评价和安全这四项接口，人就会被迫把自己能否被组织看见纳入行动考量。内心的认同尽可以保留差异，但在外部行动中，人的选择却越来越围绕组织权重重新排列。公开服从、私人保留和表演性忠诚，也正是在这道差异中成为可能。

这种状态内部必然存在差异、抵抗和不完全。有人可能更依赖组织，也可能有人保留较强的独立建设能力；不同地区和行业受资格与组织接口支配的程度可能有别，有些位置也可能拥有更多退出空间。现有证据给不出统一比例，也定不下明确的年代边界。理论讨论的是支配性的政治方向，表明整体政治生存逻辑的塑造，而非断定所有个体都符合统一模板。

机会捕获会中断积累，它背后的机会生存逻辑还会进入主体民族的政治人格。汉人仍然作为汉人存在，民族名称与外壳也继续保留；资源寻找却转向权重寻找，权力感知转向风向判断，组织合作转向生存依赖，长期投入转向窗口捕获。这些转向合在一起，主体民族满清化，就是渔猎化。

满清化也把一道张力推到眼前：正式名称与现实权重、公开位置与私人利益、组织语言与内在判断，不能再被当成天然重合的一体。两面人与表演性忠诚的问题，就从这些不重合之处生出来。此时露出的还只是问题，机制并未展开。公开服从怎样同私人保留组合，人怎样揣摩上意，忠诚又怎样变成可

表演、可交换、可用于进入组织的生存技术，仍须继续追问。已经能够钉住的是主体和生存逻辑：真实存在的主体民族没有消失，却在满清共产主义制造的人工渔猎环境中发生满清化；它继续拥有自己的名称，却越来越按照后清的方式生活。

注释

[1] 依据国家统计局编《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入口：https://www.stats.gov.cn/sj/pcsj/rkpc/7rp/zk/indexch.htm；目录页面：https://www.stats.gov.cn/sj/pcsj/rkpc/7rp/zk/left.htm）。其中包含“第二卷 民族”及“2-1 全国各民族人口及比重”等表目，未核查表内具体数字。卷名与表目本身证实该次统计产品中仍保留民族分类设置，不能以此推论此分类在现代所有年代的连续性，亦不能证明相关群体的政治认同、民族网络、政治行为或人格状态未发生改变，或此类状态一直延续至今。

返回正文

[2] 中共中央：《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2019 年 11 月 29 日修订，最高人民检察院转载，https://www.spp.gov.cn/dj/c100027/202001/t20200105_452133.shtml。该条例第二条规定对包括本单位负责人在内的党员进行教育、管理、监督，同时明确“不领导本单位业务工作”；第十条第（七）项规定协助党组（党委）管理并配合组织人事部门进行考核并提出意见；第十七条亦包含对机关工作人员思想政治工作的职责。上述规定确立了组织生活、日常监督、考核意见等制度入口，但条文本身不足以推断所有机关工作人员的内心信念或非党员的同等经历。

返回正文

[3] 中共中央：《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2023 年 9 月 19 日，生态环境部转载，https://www.mee.gov.cn/zcwj/zyygwj/202310/t20231016_1043194.shtml；中共中央：《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2019 年 12 月 30 日，https://www.gov.cn/zhengce/2020-01/05/content_5466687.htm。两份文件分别确立了党校（行政学院）在干部教育培训中的主渠道定位，以及国企党委（党组）对重大经营管理事项前置研究讨论后由董事会或经理层决定的制度程序，但条文本身不足以推断实际培训效果、个人内心信念或所有企业模式均同型。

返回正文

[4]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推动 1 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6〕72 号，2016 年 9 月 30 日成文，2016 年 10 月 11 日发布，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10/11/content_5117442.htm。该文件作为历史实例引用，其既有缓存标注“失效”，未核具体失效日期及依据，亦未作最新在线效力核查。文件包含

放宽重点群体落户、分类施策、地方差别及住房、公积金、医保、养老、教育、居住证等配套规定。政策目标不能直接视为全国同型的实施结果，不能由资格条件推断申请者个人的内心态度，亦不能从本文件规定推导出对居民个人的政治忠诚考核。

返回正文

[5]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布，2022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https://www.cac.gov.cn/2022-01/04/c_1642894606364259.htm。依据既有历史缓存，未核最新在线效力与实际执行状况。该规定第二条界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应用算法推荐技术提供互联网信息服务的适用范围，列举生成合成类、个性化推送类、排序精选类、检索过滤类、调度决策类等技术；第十六条规定以显著方式告知用户提供算法推荐服务的情况，并以适当方式公示基本原理、目的意图和主要运行机制；第十七条明确规定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应当向用户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或者”向用户提供便捷的关闭算法推荐服务的选项，用户选择关闭算法推荐服务的，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应当立即停止提供相关服务。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应当向用户提供选择或者删除用于算法推荐服务的针对其个人特征的用户标签的功能。上述规定确立了推送、排序、检索过滤、展示等规则环境，并保留法定用户选择机制；但规范接口不能等同于具体平台的实际运行效果，亦不能据此推定全部公开表达由单一中心完全控制，或从中倒推用户的内心动机。

返回正文

第二十章　两面人与表演性忠诚

主体民族并没有消失。民族名称和外壳还在，资源寻找、权力感知、组织依赖和政治生存逻辑却已经发生满清化 / 渔猎化。捕获机会、判断风向，只是这种变化的一面。在这种环境里，正式名称不再必然对应现实权重，公开位置不再必然对应私人利益，一个人使用的组织语言更不能直接当成他的内在判断。两面人从这三种分离中产生，表演性忠诚则把分离变成取得身份、信任和组织入口的生存技术。

“两面”不能只当作个人道德骂名。若仅归因于个人品行，就会遮住满清共产主义如何奖励语言切换，如何让公开姿态成为进入资源的前提，以及人为何被迫反复确认谁是当前能够赋位的主人。政治人格不仅要判断名义上谁有权力，还要判断谁真能决定安全、资格和资源。

一、多重权重环境与两面人的形成

满清共产主义制造了一个由多重权重叠加、接续和竞争构成的政治猎场。名义上的主人可能仍在，资源却已经流向另一处；旧组织也许保住了名称，决定职位与安全的管理关系却换了。同一句忠诚表态，在旧权重尚存时是一份证明，等新权重出现，又可能变成一笔必须重新解释的旧账。熟悉正式规则并

不妨碍一个人继续寻找现实里的高权重方向；他即使把组织语言用得十分熟练，也不让它覆盖自己的全部内在判断。要在这里生存，政治人格便得把语言、身份和利益分开估价。

两面人不是一种道德选择，而是一种进化后的生存技能。所谓进化，与基因改变、血统遗传或民族生物性格无关；政治环境长期筛选并训练的，是另一组能力。谁更会识别权重、切换语言、展示服从，同时保存自己的利益取向，谁就更能在权力变化中维持可用性。满清共产主义制造了这种政治人格，但并不意味着每个汉人、每个满洲居民和每个组织成员都整齐划一。地区、阶层和个人经历差异客观存在，但这些差异并不取消制度筛选与政治训练本身的方向性，这种方向仍有别于普通的社会适应。

满洲的多重力量环境，并不意味着所有力量始终同时在场。复合统治、彼此竞争和先后接续，都会改变现实权重。1930 年代至 1945 年，日方军事力量与满洲国政权形成复合统治。在抚顺煤矿，1935 年矿山教材所呈现的劳工管理方式显示，“把头”等劳工承包人被纳入招工、监督和劳动控制的科层链，承担日常管理、训练与思想引导职责^{[1]}。1937 年以后，私营商户被编入统制组合，原料采购与商品分配受到当局控制^{[2]}。户籍调查、身份证明和人口分类，则使居民的身份、居住和流动进入警察与行政组织的观察、登记和处理范围。^{[3]}

这种组织化统治并不满足于一次服从。它把人口、企业、劳动、身份和资源接进持续运转的制度接口，使人在日常生活中反复面对分类、证明、监督和配给。人必须以制度能够识别的方式出现，也得寻找保住生计和位置的缝隙。公开语言与现实利益便更容易在这种处境中分开。

1945 年日本投降后，权力结构迅速断裂。鞍山的昭和制钢所先遭苏军拆运部分设备；1946 年，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在鞍山接收昭和制钢所等二十三处日伪工厂；到 1948 年，东北行政委员会批准成立鞍山钢铁公司^{[4]}。同一组厂房与设备就这样进入不同的权力关系。旧外壳可以留下，决定管理、资源和人员位置的主人却已经换了。

铁路节点也经历了同样的转换。1946 年，吉林西站归国民党交通部吉林区铁路管理局管理；1948 年吉林易手后，车站又转入东北铁路总局驻吉林办事处和吉林铁路管理局的组织关系^{[5]}。留下来的还是车站、轨道和技术功能，组织归属、指挥关系和资源方向却已经重排。

旧人员没有被一概清除。东北局处理新接收企业中的职员问题时，对旧职员分类处置，保留所需的专门技能和业务管理知识，同时培养新的生产、业务管理人员与技术人员^{[6]}。材料没有记录某个具体人的心理自白，但权力变化怎样重新规定组织归属、岗位和能力价值，已经显露出来。在这样的环境里，

一个人若能迅速理解新语言、重新解释旧经历，把自己的可用性提交给新主人，就更可能继续占据位置。

二、语言识别与服从展示

这套生存技能有三个彼此咬合的动作：迅速领会官方话语，表现出绝对的服从，最重要的是私下保留自己的利益导向。只会背诵官方语言，却判断不出权重，便难以及时转向；只会服从，却不知道利益落在哪里，只能被动执行；只保留私人利益，却不能取得公开身份，也很难进入掌握资源的组织。

两面人的第一项技能，是迅速领会官方话语。官方话语不是普通修辞，组织用它确认成员、解释行为并分配资格，处理不同意见与施加纪律后果也与它相连；领会这种话语，就是辨认哪一种语言能够打开当前的组织入口。《中国共产党章程》要求党员对党忠诚老实、言行一致，反对阳奉阴违的两面派行为；入党誓词要求“对党忠诚”；申请、介绍、支部大会通过、上级批准和预备期考察又构成正式的资格程序。^{[7]}组织由此规定了能够识别和审核的语言与行为形式。领会官方话语不仅是懂得词义，更要辨清什么说法会得到承认，什么说法会让人失去资格或增加风险；行动者若想进入组织，就得把表达放进组织能够识别的格式。

这种能力不排斥真诚信念。真诚者和表演者可以使用同一套外部形式，正确展示忠诚本身也就成了一项独立的政治技术。组织可以观察申请、誓词、会议表达、执行和组织生活，却不能直接占有一个人的全部内在判断。无法由外部行为直接判定具体人物的内心，但这不能证明所有忠诚都是假的。真诚者与表演者共用外部形式，且这套技能持续受到制度的识别与奖励。两面人是进化后的生存技能，熟练掌握组织语言的人，能够取得比沉默者和表达失当者更有利的位置。

在掌握语言的基础上，行动者还必须表现出绝对的服从。一般配合不属于这里的“表现”，程度较强的服从也不等同于这里的“绝对”。行动者不仅要执行指令，还必须让执行过程清晰可见、被权力确认为可靠，并用组织语言证明自己没有保留危险的距离。在制度规范层面，党章第四条规定，党员对党的决议和政策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声明保留，并且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第十六条规定，下级组织如果认为上级组织的决定不符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可以请求改变，如果上级组织坚持原决定，下级组织必须执行，并不得公开发表不同意见，但有权向再上一级组织报告。^{[8]}规则把执行、公开表达和意见保留放在不同位置：私人判断可以存在，公开行动却必须服从组织决定。

绝对服从首先以外部姿态出现。一个动作里可以同时有信念、纪律和利益，组织真正能够审核的却只是姿态与执行。资格、位置和后果一旦同可见的执行连在一起，压力便不会止于服从本身：人还必须把服从展示得完整、清楚，不留歧义。表演性忠诚不是说一次谎就结束，它要求人持续掌握何种语言

才算正确，知道该在什么场合开口、该把忠诚展示到什么强度，还要让组织相信自己未来仍然可靠、可用。忠诚由此形成了可以学习、展示和交换的外部形式。

三、利益保留与依附重算

两面人的第三项技能最关键：私下保留自己的利益导向。公开语言用来取得眼前的承认，利益导向考虑的则是另一回事——这种承认能维持多久，旧经历在新权重下究竟是资产还是负担，现有关系在主人变化以后是否仍然有效。在人工渔猎环境里，岗位、资格和资源一旦依赖组织权重，今天得到了什么便不是全部。人还得看谁能继续保留这些资源，谁有权改变解释，又要通过谁让自己的能力重新获得兑换通道。公开姿态与私人估价可以并存；权重一变，两者未必仍朝向同一处。

新接收企业对人员的处理，把这种结构落到了具体岗位上：旧职员可能失去原有的支配位置，专门技能和业务知识却被新组织保留；优秀工人和职员又被培养为新的生产、业务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6]}能力可以延续，但最高权重已经换了；它决定这些能力怎样被调用，也决定掌握它们的人能够取得什么位置。对利益导向的结构分析，不能直接等同于证明具体人物的真实想法。组织可以规定语言、资格和纪律，却不能只凭一份表态，就让成员的全部利益判断与组织完全重合。公开忠诚不会自动消灭私人估价。两面人就在这道缝隙里保存自己，并准备下一次重新估价。

当主子变了，他们会迅速调整依附对象，并以最忠诚的姿态出现。这种转向涉及主人—依附关系的重新确认，不同于环境变化后的普通社会关系调整。现实权重一旦改变，忠诚便要重新计算：旧语言、旧身份和旧贡献，都必须迅速翻译成新主人能够识别和使用的证明。工厂、车站和旧企业人员的接收，摆出了忠诚重算的外部条件；这些材料不能替具体人物证明内心，但表明了赋位权力的更替。旧组织还留着某些外壳，原有人员若想留下，就必须在新的解释和管理关系中重新取得可用性。

最忠诚的姿态不能停在口头上。人得迅速掌握新主人的语言，把旧经历改写成新秩序能够调用的资历，还要在公开行动中拿出超过最低要求的可靠性证明。这里可能同时有真正的信念变化、纪律服从和利益计算。但在多重权重反复变化的环境里，最会把自己翻译成新主人所需形式的人，也最容易保住位置。这就是表演性忠诚的现实锋芒。它不要求一个人始终反对所有主人；它要求一个人能够在主人变化以后迅速重做忠诚，把依附对象的改变表现成从未迟疑过的绝对忠诚。

四、揣摩上意与群体监督

表演性忠诚不是开会时说一句正确的话就算完成。它把官方语言、身份资格、组织信任、现实位置和风险后果接到一起。党章规定的党员资格程序、组织生活、执行义务和纪律处分，使公开语言与行为能够影响成员身份和组织位置；纪律后果包括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和开除党籍。^{[9]}忠诚既然要靠外部形式来识别，行动者就不能只等明确命令。命令划出的只是看得见的边界，表演者

还会揣摩上级偏好、评价尺度和风向变化：怎样说最安全，怎样执行最醒目，又怎样把自己同可疑对象区分开。

这就是揣摩上意。它把服从从命令之后推进到命令之前，把执行从完成要求推进到猜测要求。行动者不再只问“上级让我做什么”，而是问“怎样做才能被看成最忠诚”。揣摩上意还会催生主动加码：表态更早，语言更强，执行更快，敌我边界也划得更醒目。并非每一次严格执行都叫加码。这里说的是在忠诚竞争中主动抬高强度，用超过明文要求的姿态，争取把自己放进更可靠、更有资格、更接近主人的位置。

到了群体关系中，这套厚黑逻辑就表现为拉一派打一派。人群里的嫌隙、利益补偿、身份分类和安全焦虑，都被转成了动员资源。一部分人被确认为“自己人”，因而取得位置；另一部分人则被规定为斗争对象。参与斗争的人靠打击少数人获得安全感，也借这种行动证明立场、争夺新的位置。这不是中性的组织协调。它先制造不同的风险和回报，再迫使各方围绕主人重新站位。更早站队、更愿意主动加码、更能把私人利益翻译成组织需要的人，也更容易进入“自己人”的范围。两面人到了这里，不再只是对外说两套话，也开始在内部分类中寻找利益。

拉一派打一派还把表演性忠诚变成相互监督。人要向主人表态，同时还得看别人有没有表态。只证明自己服从仍不够，还得指出谁不够服从，以此增加自己的可靠性。忠诚就这样越出了个人姿态，成为切分群体的工具；公开语言也从身份通行证变成了分配安全、资格和资源的武器。

五、红旗打红旗与组织进入

表演性忠诚走到另一端，红旗打红旗这种反向动作就会出现。它进入冲突时并不公开反对，而是使用更官方、更正确、更难被指责的语言，占据比普通服从者更高的合法性位置。组织原本用来识别忠诚的语言被推到极端，维护、模仿和消解也就在同一种形式中重叠。

体制能够识别“不服”，却更难处理“太服了”。当一种表达比最低要求更正确、更忠诚、更接近口号本身时，组织面临的困难不在于判断字面意义，而在于判断这种过度一致究竟是在维护权威，还是在借权威自己的语言消耗权威。

红旗打红旗不是普通的话语博弈，更不能泛化为一切批评。这种动作能够发生，靠的是表演性忠诚已经建立的接口：官方语言拥有最高可见合法性，行动者又学会把忠诚当作可以调节强度的外部形式。同一种语言于是能帮助人进入组织，也能替人遮蔽意图，甚至能让人从内部反占组织的合法性位置。

主体民族满清化使人对多重权重和权力变化格外敏感。这不是对一般人性的议论，也不能拿普通职场里的圆滑来解释。这里形成的，是满清共产主义制造的政治人格。人工渔猎环境迫使主体民族不断判断主人、切换语言、表演忠诚；公开姿态摆在前面，私人利益仍在背后计算。

两面人和表演性忠诚不会只停留在个人的语言和姿态上。行动者带着这种生存技能进入组织，一旦越过资格、位置、信任与资源的门槛，转换链条成立，就会产生占据节点、利用旧组织外壳并改变内部权重的组织后果。问题也由此从个人转入组织：嵌入、借壳、换壳和夺舍。

第二十章　两面人与表演性忠诚注释

[1] Limin Teh, “Labor Control and Mobility in Japanese-Controlled Fushun Coalmine (China), 1907–1932,”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vol. 60, Special Issue, 2015, pp. 95–119，尤其见 pp. 96–97 及相关劳工承包、监督和科层化论述，DOI: 10.1017/S0020859015000346。

返回正文

[2] Qiunan Li, *Everyday Life in the Puppet State: A Study of Ordinary People’s Experiences in Manchukuo*, PhD thesis, School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2018, p. 136 及后续页。该处记载 1937 年 12 月以后私营商户被编入组合、原料和商品由当局分配并实行价格管制。

返回正文

[3] InYoung Bong, *Destabilizing “Racial Harmony”: Hybridity, Nationality, and Spatiality in the Law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of Manchukuo*, PhD dissertation, Cornell University, 2010, pp. 44–46。该处讨论 1934 年户籍调查规程、1937 年户籍法、警察调查、身份证明、人口流动和身份分类。

返回正文

[4]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鞍山钢铁厂早期建筑》，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网站，2020 年，https://whly.ln.gov.cn/whly/wlzt/lnww/zdwwbhdw/CFB45506B063492A93271704FF1366BC/index.shtml，访问日期：2026 年 8 月 23 日。该资料记载 1945 年设备拆运、1946 年国民党资源委员会接收二十三处工厂、1948 年东北行政委员会批准成立鞍山钢铁公司的节点。

返回正文

[5] 张海川：《吉林西站：吉海铁路上的睡狮》，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地情笔记》2019 年第 2 期，2019 年 10 月 25 日，https://dfz.jl.gov.cn/jgdg/201910/t20191025_6120129.html，访问日期：2026 年 8 月 23 日。文中据地方志材料记载 1946 年和 1948 年吉林西站管理关系的变化。

返回正文

[6]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陈云与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财经工作》，2023 年 1 月 6 日，https://www.dswxyjy.org.cn/n1/2023/0110/c423731-32603549.html；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陈云在东北的革命贡献》，2022 年 2 月 17 日，https://www.dswxyjy.org.cn/n1/2022/0217/c423731-32354218.html，访问日期：2026 年 8 月 23 日。相关记录见 1948 年《关于公营企业中职员问题的决定》所载职员分类、专门技能与业务知识保留、培养生产和技术管理人员等内容。

返回正文 1 · 返回正文 2

[7]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部分修改、2022 年 10 月 22 日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及第一章“党员”第三条、第五条、第六条，中共中央组织部共产党员网发布。所涉内容见忠诚老实、言行一致、入党资格程序和入党誓词等条款。

返回正文

[8] 同上，第一章第四条、第二章第十六条。第四条规定党员可以在坚决执行决议和政策的前提下声明保留不同意见；第十六条规定下级组织请求改变上级决定的程序及在上级未改变决定时的执行要求。

返回正文

[9] 同上，第七章“党的纪律”第四十条至第四十二条。条文规定了纪律处分种类及其对党内职务、权利和党员资格的正式后果。

返回正文

第二十一章　组织嵌入、借壳、换壳与夺舍

一、两面人的组织嵌入与权重转移

两面人掌握了官方语言，懂得怎样表现绝对服从，公开姿态背后仍保留着对私人利益的估价。但个人表演不等于组织力量。一般的机会主义可以发生在组织之外，或只追逐单次利益；组织嵌入则要求行动者进入一种能够持续分配资格、信息、资源和后果的关系结构。绝对服从先扫掉的，是进入组织的障碍。组织看不见人的内心；它判断成员，依据的是申请、誓言、执行、组织生活、纪律记录和公开言行。^{[1]} 在这里，官方语言不只用来掩饰，还是通行证；表演性忠诚也不只是一种姿态，

它还是组织判断可用性、可靠性和风险的接口。谁能熟练使用组织语言，提前回应组织期待，并在风向变化时迅速调整，谁就更容易证明自己可供调用。

危险在于，公开服从与私人估价能够长期并存。两面人的技能若要从个人表演变成组织力量，必须越过资格、位置、信任和资源的门槛。一个人先要让自己显得可靠，才可能用这种可靠换来内部位置，再借助位置作用于人事、资源、传播、敌我划分和决策权重。用姿态通过门禁，按估价选择主人，凭位置积累关系，再沿关系接近资源。只要这条转换链成立，个人的生存技能就开始产生组织后果。不能把组织嵌入混同于就业、入会、宣传、正常人员流动或普通人际关系。仅在机关、企业、学校、军队、宗教团体或社会组织中拥有名义身份，只说明行动者身处组织之内；名义身份不等于高权重，能否真正嵌入决定组织方向的关键节点，仍须依凭实际权力链条来检验。

判断有没有嵌入，要先看组织入口，再看内部位置。入口决定谁有资格被接纳、谁需要证明忠诚，也决定谁能把旧经历翻译成新组织认可的能力。进门以后，还要分清行动者只是外围执行者，还是已经进入能够接触人事、信息、资源和解释权的节点。没有这样的内部位置，许多关系只能停在外部影响；取得位置，影响才可能变成持续的组织能力。具体而言，人事接口管谁被选进来、谁得到晋升、谁遭到排除，也管谁有权安排下一批成员；资金、岗位、住房、设备、项目、渠道和保护怎样分配，由资源接口决定；传播与解释接口规定什么语言可以公开出现，什么行为被解释为忠诚，什么问题被命名为敌情，什么材料能够取得可见性；资格与纪律再把这些判断变成正式后果：获得身份、保住位置、失去职务，或者被排除在组织之外。

再往深处，是敌我划分和决策权重。一个组织的名称、章程和办公场所可以原样留下，方向却可能在另一些问题上改变：谁算自己人，什么值得保护，什么应被打击，哪一种风险排在前面。如果这些变化只停留在个别人的意见上，它仍是内部争论；只有进入人事、资源、传播和处分，成为可以反复执行的组织选择，内部权重才算真正移动。因此，组织嵌入既不能被说成无处不在的秘密阴谋，也不能因为有人参与内部事务便宣告成立。证据必须钉在看得见的接口上：谁取得位置，谁能配置资源，谁控制解释，谁决定资格、划分敌我，谁的判断最终进入行动。如果这些都无法落实，只有概念相似、口号相近或人员接触，就不能证明组织已经受另一套关系支配。

满清共产主义之所以能够嵌入组织，就在于它把外壳和权重分开处理。外壳可以留下，人员可以留用，专业能力也可以继续发挥；真正要改变的，是这些对象向谁负责、由谁解释、为谁配置资源。它无须先把旧组织全部摧毁，再从零建起；只要先取得能够重新赋位的节点，便可让旧身体服务新的最高权重。表演性忠诚为什么会成为组织嵌入的门口，也就清楚了。公开以异质语言出现的力量，容易被组织识别并排除；熟悉组织语言、能够表现出更高忠诚，甚至能以更正确的口号占据合法性位置的行动者，却可能被当作组织自身的加强。红旗打红旗之所以锋利，正因为进入者并不降低官方语言的强度，反而借更高强度的官方语言取得解释优势。

二、借壳生蛋与墙内拆梁

两面人的最高境界：借壳生蛋。借壳既不是站在组织外面向它提出请求，也不是临时借一个名义行方便。壳最先给出的，是一副合法性外观。尚未取得独立资格的关系、语言或组织内容，借此可以用既有制度认可的形式出现。名称和身份可以是壳，场所、出版渠道、工作单位、专业资格乃至官方话语，也都可以成为壳。

更要紧的是位置。身在组织之外，批评至多影响态度；有了内部位置，才可能接触名册、资源、信息和执行程序。行动者不必一次次从外面撞开边界，可以借日常工作、常规会议、资格审查和资源分配持续发挥作用。借壳真正借到的并非一个招牌，而是旧组织已经积累下来的通行能力。语言也是壳的一部分。组织总要用一套词汇说明自身何以正当，也要借某些表达区分忠诚与危险。进入者若直接否定这套语言，就会把自己暴露在门禁之外；若能用组织认可的逻辑表达不同内容，异质关系便可能藏在字面服从之下生长。官方语言原本用来维持组织边界，也可能反过来帮助进入者遮蔽方向上的差异。

壳里还有实际资源：场所、人员、刊物、设备、身份、培训和组织保护。这些都不是抽象符号，它们决定一种关系会停在偶然接触，还是长成可以复制的网络。“借壳生蛋”中的“蛋”不是一句不同意见，而是在旧壳内部能够继续生长的新关系、新解释、新忠诚或新组织内容。借壳真正锋利的地方不是“借”，而是“生”。临时用过一个旧名称，却没有留下关系、位置或可复制内容，至多算利用。只有当新的成员、解释和资源连接在旧壳内部形成，借壳才开始具有组织意义。

另一句话更加直接：不是在墙外推墙，而是在墙内拆梁。墙外推墙，是拿外部力量同组织正面相撞。双方边界清楚，组织也可以调动防御、纪律和排斥机制。墙内拆梁却要先取得内部可以接受的身份，再从里面作用于支撑组织方向的节点。这里的“梁”不泛指任何规则，更不是说一切内部改革都是破坏；它指向的是维持人事、资源、解释、敌我划分和决策权重的结构连接。

旧壳被借用，不等于它已经受到完全支配。一个人即使进入组织、使用官方语言、发展出若干关系，也仍可能拿不到资源和决策权，更不能据此断定夺舍已经完成。借壳所能说明的，只是旧外壳被用来承载新的内容；这些新内容有没有改变组织的最高权重，还需要另外证明。同时，借壳也不是一切组织变化都要经过的起点。具体案例可能只有嵌入，没有借壳；也可能已经换了语言外壳，却没有取得组织位置。借壳、换壳和夺舍在理论上彼此相连，但不能排成每个对象都必须依次通过的机械程序。

三、旧能力调用与组织动作的区别

历史满清调用旧国家的过程，清楚显示了旧壳怎样留下、内部权重又怎样改换。清廷进入北京后，没有把故明遗下的中央和地方行政能力一笔清零。内阁、六部、都察院等官署，部分名目和职掌继续被调用；故明官员、投降军官、投诚人员，以及文书、财政、水利、交通等方面的专业能力，也被选择性保留。人员的去向并不相同：有人以原官或新职继续办事，有人被拨入八旗、编入牛录，还有人进入新的机要与行政关系。<sup><a href="#book-ch21-

note-2">[2]</sup> 东西留下来了，原有的政治关系却没有跟着原样留下。旧官员继续办事，服从的是新的国法和忠诚链；降官、投诚官一旦进入八旗或牛录，组织位置也随之改变。原有专业能力仍然有用，但已经转移的最高权重，会重新决定这种能力为谁服务、在新关系里被放到什么位置。这不是简单的“沿用旧制度”，而是在保存可用身体的同时，重新规定它同主人的关系。

旧国家的资源也被重新调用。前朝税册、地亩钱粮记录、赋役和征收网络，经过删改、重编，可以进入新财政；卫所、漕运、造船等事务，也有部分职掌和技术能力继续使用。北京及驻防地的房屋、土地和城市空间，则被重新配置，用来保障新的军政核心。^{[3]} 外观仍在，并不表示这些旧对象还保持着原来的政治方向。

满城和驻防节点使这种变化有了固定的空间和组织位置。北京、江宁、杭州、西安等地的驻防建置、住地配置和空间固定化过程，证明新的军事—政治力量能够在旧城市身体中取得持续位置，并得到房地、土地、银米等资源支持。^{[4]} 这些节点并不漂浮在城市之外，而是嵌入了城市和区域控制结构。但驻防、空间固定和区域军事功能有材料可证，不等于满城在事实上享有支配一切民政、财政和司法的普遍最高权重，也不能证明每一项地方事务都由驻防决定。现有材料并不支持将历史满城同现代党委、党校或单位组织作机构上的机械配对；真正可以比较的，是高权重网络怎样进入更大的专业组织和主体社会，而非建立名称与机构的形式等同。

再看现代满洲的工业和铁路接收，不同组织动作之间的区别就更清楚了。战争与政权变化过后，工厂、铁路、车站和设备不会随之自动消失，人员掌握的专业能力也不会。昭和制钢所等工厂被接收后，重组进新的企业体系；鞍钢经历接收、设备受损和修复，随后重新组织生产。铁路站场和管理机构进入新的管理关系，旧职员、技术人员和工人则受到分类留用、培养和岗位重排。^{[5]} 这些材料能证明接收、修复和重新编组确实发生过。厂房设备的外观与生产能力都有一部分延续下来，人员技能也继续发挥作用；转入新体系的是管理权和资源调度。同清初对旧国家的调用放在一起看，满清共产主义的另一面便显出来：它不只摧毁对象，也会保存那些能够转化为自身能力的对象。

历史满清调用故明遗下的官署与专业能力，以及现代对昭和制钢所、鞍钢和铁路站场的接收与重组，共同证明了捕获、选择性保留和重新赋位确实可以发生。较小的政治核心取得最高权重以后，无须重新制造一具庞大的国家身体；它可以改变旧人员、旧机构和旧资源的组织归属与服务方向。外壳连续由此不能被当成权重连续：名称、职掌和技术可以延续，忠诚链、资源流向和政治位置却可以改变。历史满清留下的不是一套可以机械搬到现代的模板，而是一种可观察的政治技术：“保存外观、调用能力、改变归属、重排权重”。

但政权更替、旧官留用、资源重新配置和工业铁路设施的接管修复，还不足以构成一个得到完整证明的“夺舍”案例。要证明内部网络取得了传播、解释和决策权，还需要连续的证据。组织嵌入、借壳

和夺舍只要落到现实，就绕不开这些接口；零散的接口环节不足以建立同一对象的完整链条，某个具体对象是否已经完成全部变化，仍须逐案证明。夺舍不是精神性的神秘替换，它要落实到谁进入关键位置，谁取得资源，谁控制传播和解释，谁重新划分敌我，谁使组织行动转向。离开这些接口，夺舍只是空洞比喻；经过这些接口，外壳是否保存、内部权重是否变化，才可能被分别辨认。

接收、接管、重编和组织嵌入，不能只因前后相连就混成一件事。接收首先改变对象的归属；接管转移管理权；重编把人员、机构或技术放进新的关系；组织嵌入则要求某种关系进入组织内部能够持续作用的接口。四种动作可以彼此连接，却不能互相代替。尤其不能因为管理权从一个政权直接转到另一个政权，就仅凭结果把它叫作夺舍。夺舍所看的不是管理权有没有公开交接，而是旧外壳可能仍在，另一套关系却从内部取得了高权重。直接接管可以明白更换最高权力；夺舍则可能保留原组织的自我表述，把变化留在谁控制人事、资源、解释和敌我方向之中。企业被新政权接收，并不需要装作旧权力还在。组织若被夺舍，名称和自我叙述却可能继续造成原有方向尚存的印象。

现代组织的门禁比单纯的管理关系复杂得多。党员资格、组织生活、执行义务、纪律处分和上下级组织关系，会把人事、言行、位置与后果接在一起；党委、机关、学校、企业和社会组织，也各有自己的专业外壳、资源流程与传播渠道。^{[6]} 组织嵌入可以作用于这些接口，但接口存在本身，不能证明某个网络已经控制了它们。一个人使用体制语言，不足以证明他完成了借壳；一批人员进入组织，不足以证明组织已经被嵌入；管理层更换不自动构成夺舍，口号相似更不能直接推出功能同源。组织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必须回到位置、资源、传播、资格、敌我和决策的实际变动中判断。

所有接收都叫夺舍，夺舍便失去边界；所有组织参与都叫嵌入，嵌入也会变成空话。排除这些一般变化以后，满清渔猎政治生存逻辑真正独特的地方才显出来：旧壳可以保留，旧能力可以调用，决定方向的权重却被转移到新的主人和关系之中。

四、夺舍：外壳仍在，方向已变

夺舍不同于继承、融合、接收和一般适应：继承可以公开承认权力已经更替，融合意味着双方共同发生改变，接收可以直接取得对象，适应只说明行动者随环境调整自己。夺舍说的是另一种情形——原组织的外壳和自我表述仍然存在，决定其现实方向的内部高权重，却已经被另一套关系改变。

夺舍首先表现为对原有组织形式的模仿。进入者不以全然异质的外观出现，而去复制组织熟悉的层级、纪律、仪式和身份关系。形式上的相似降低识别成本，也让新的关系能够借用旧组织已经训练出来的服从习惯。体制能够接受的逻辑和语言，也会被借来使用。夺舍者不必一开始就公开宣布另立组织；他可以用原组织认可的概念解释自己的活动，再以原组织能够理解的目标证明自己有用。体制语言原本用于识别忠诚，被反向调用以后，也能够为异质内容提供保护。只有形式和语言还不够，内部信任与位置同样关键。没有位置，模仿仍停在组织外部；取得位置以后，新的关系才可能接近组织中坚、

解释权和资源接口。内部信任会降低组织的警惕，也让进入者获得安排人员、传播内容和连接非正式关系的机会。

夺舍看重的不是成员数量，而是谁握有更高权重。人数再多，如果不能改变组织选择，也只能说明形成了群众；人数即使不多，只有能够影响关键人事、资源、传播或敌我划分，才接近夺舍真正关心的方向。满清渔猎政治生存逻辑并不需要把所有人变成同一种人，它要捕获的是能够改变其余对象位置的高权重节点。外壳可能在这种变化中继续存在，会议仍以原名称召开，成员仍使用原术语，组织也仍声称延续原有目标；真正转向的，是谁受到保护、什么资源被优先分配、什么声音取得解释权、什么对象被划为敌人。夺舍并非把旧身体扔掉，而是让这具身体转而服务新的最高权重。

“墙内拆梁”说的正是这种组织变化。梁不在墙面上的标语里，而在支撑组织方向的关系中：人事任用、资源流向、传播控制、资格认定、敌我分类和决策程序。只改墙面，或者只换掉一批普通成员，都还不能叫夺舍；内部高权重的方向发生变化，夺舍才真正落到现实。同时，某些入口并不是外力强行撞开的，体制也可能主动开放它们。一个有待具体个案材料检验的解释是：中共并非每一次都只是被外部力量突破；出于自身需要，体制在特定节点会允许某些能够填补组织、信仰或社会空缺的力量进入，却没有意识到这些力量取得位置以后会反向改变内部权重。开放的动机不一定相同，行动者的具体认识也不能一概而论。被允许进入不等于夺舍已经完成，但体制主动开放入口，仍可能为夺舍准备条件。

夺舍作为一种组织能力，已经有了明确的理论含义；某个对象是否真的完成这种变化，则要由历史事实检验。现有历史材料还没有围绕一个具体对象，把外观、人事、资源、传播或解释权、决策或敌我方向以及可观察后果连成完整的夺舍证据。这不影响夺舍的理论定义，却限制了人们能够对具体案例说到哪一步。不同案例的零散环节不能被拼成一个确定故事，普通接管也不能冒充夺舍。个案证据尚未闭合，未定的只是该对象是否符合夺舍定义，夺舍的概念含义并不随之变成另一个概念；理论定义的存在，同样不能证明个案已经发生。

五、张宏堡、李洪志与体制语言的调用

张宏堡和李洪志都被放在满洲渔猎与人物连续线之中，二人的出现并非偶然。真正需要看的，不是二人的教义在逻辑上是否严密，而是另一组更接近组织能力的问题：大胆与厚黑、强烈的确定性、对体制语言的调用，以及从接近体制走向反向影响体制的路径。张宏堡和李洪志把借壳、体制语言调用与夺舍带进了现代人物线。二人早期同体制接近，后来又反向影响体制，显出一条“先被允许进入、再形成另一套关系”的清楚路径，满洲渔猎政治生存逻辑怎样反过来使用体制能力的问题便由此出现。

“逻辑和理性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大胆和厚黑”，并不是说事实与逻辑真的没有价值。这句话批判的是一类政治—组织动员得以成功的条件：组织未必依靠严密论证，也能凭权威姿态、确定性语言和可以复制的归属关系取得追随。若只从教义漏洞出发反驳，就解释不了这种组织能力是怎样获得的。

“神志清醒状态下当场撒酒疯”，说的是一种表演的强度，不是医学诊断。人在清醒状态下输出极端

确定性，以气场压倒犹豫，由此形成一种公开风格。它同表演性忠诚相接：表演原本用来向强权证明可靠，进入新的信仰和组织外壳以后，又可以用来向追随者证明一种不容怀疑的权威。

公安网络、军队网络和官僚网络究竟怎样，多少高级将领或高干受到影响，“哥们义气、利益分成、精神控制”是否构成完整机制，信众数字又是多少，现有材料都不足以回答；方向相近的叙述不能仅凭相似性被当作事实。张宏堡和李洪志所牵涉的具体人物关系、语言风格、组织形态、信仰形态以及满洲反噬意义，并非组织机制之外的装饰，在缺乏更完整事实支撑、尚未逐项核实以前，无法给出确定结论。

既不能预先替张宏堡和李洪志分配固定功能，也不能将二人视作同一主体，更不能凭空制造组织师承；二人各自的经历、组织形态、语言风格、传播条件以及同体制关系的可核事实，仍须分别回到材料中确证。完整的人物与媒介连续线还包括毛泽东、王洪文、张宏堡与李洪志、《意林》与《读者》、张雪峰与周丽峰、斯奎奇大王。这些节点处于同一功能连续线上，不等于彼此存在师承关系；时间相邻，也不能直接证明存在组织继承。每个节点为什么属于这条连续线，都要由具体原话和材料证明，一张排列整齐的图表代替不了这些证据。

六、跨外壳能力与模型危机

借壳是在现成外壳中找到入口；到了换壳，原有外壳已经失效，旧政治生存逻辑要另找活路。旧语言不能用便换语言，旧主义不能用便换主义，旧的敌我划分失效便重新划分敌我。语言从来不是装饰，哪些问题能被看见、哪些要求可以说出口、哪些关系能够取得合法性，都受它规定。旧语言失去号召力，并不表示支撑旧组织的资源和关系会同时消失；只要这些现实能力还能被译入新语言，旧政治生存逻辑便能脱离原来的表述继续运行。

主义同样不只是一个名称，它还提供对现实的整体解释、正当性和未来承诺。旧主义一旦解释不了现实，组织便要在两条路之间选择：要么承认支撑它的结构也随之失败，要么寻找新的主义，重新说明原有组织、资源和政治生存逻辑。满清渔猎式换壳走的是后一条路。忠诚不被固定在某一套教义上，教义本身反倒成了可以随环境重新选择的外壳。连敌我划分也可以更换。某个对象在旧阶段还是主要敌人，组织进入新环境后，若这个敌人已不能继续提供动员和解释，就需要转而寻找新的敌人。换掉的并不只是一句口号。谁能被组织、谁可以被捕获、谁来承担失败责任，资源又向哪里集中，都会随之重新规定。

共产主义提供的现代宣传、组织和身份分类能力，使换壳越出个人改口的范围，进入大规模组织和社会传播。模型解释陷入危机以后，换壳便不只更换语言，还包括寻找新理论、改换合法性来源和重新包装。旧理论的概念可以退场，新的理论家、媒介和真诚信徒也可以出现；判断风向、捕获资源、划分敌我、组织依附、保存最高权重的政治生存逻辑，却仍能在新外壳下活下去。所以，换一个品牌，或者让宣传部门改一句口号，都还算不上换壳。品牌变了，组织方向可以不变；真正的换壳要求新语

言、新主义或新的合法性外观接过旧政治生存逻辑的生存功能。媒介变化也是一样：从报纸转到网络，从长文改成短视频，本身不构成换壳。只有新的媒介外观重新承载原有的现实功能，判断才能成立。

满清渔猎政治生存逻辑之所以能够延寿，正在于它没有把生存押在一个永恒的壳上。它可以向当前强权表现忠诚；强权和语言失效以后，又可以迅速重新翻译自己。旧主义的死亡，并不等于旧政治生存逻辑也随之死亡。共产主义的理论外壳可以失去解释力，组织、资源、敌我分类和捕获机制却能等待另一套语言；原有口号可以放弃，合法性可以重新制造；旧主人失势以后，依附关系仍可重新计算。满清渔猎政治生存逻辑就这样越过外壳的死亡，继续存在。两面人的生存技能到了组织内部，作用也随之改变。两面人不只对不同主人说不同的话，还能让不同外壳先后承载同一种政治生存逻辑；表演性忠诚不只保存个人位置，也可能成为进入组织、取得信任和反向调用官方语言的工具；对私人利益的估价也不再只计算个人得失，而开始判断哪一种组织、主义和合法性更适合继续生存。

借壳、换壳和夺舍是满清渔猎政治生存逻辑能够组合、也能够分开使用的几种跨外壳能力，但不能排成一条所有案例都必须依次通过的固定道路。借壳是在旧壳有效时借用其合法性，换壳则由旧解释和旧合法性失效的压力推动；有的组织借到了外壳，却没有换壳的能力；有的结构可以直接更换语言，并未先在某个组织内部生蛋。换壳同样不是夺舍完成后必然出现的结果：夺舍要看组织内部的权重有没有改变，换壳要看解释和合法性外观有没有替换。一个结构即使改变了内部权重，仍可能继续使用旧语言；它也可能换了新语言，却没有取得某个组织的内部控制。两者各自需要独立判断，只有具体材料把两方面同时证明出来，才能认定二者在同一个案例中相连。

满清共产主义比固定教义更难死亡，原因正在于它不把自己锁死在一个组织、一种主义或一套语言里，而是让旧身体在新的关系支配下继续运转。然而，满清共产主义靠这套跨外壳能力续命，其最终遭遇反噬的条件也埋在这里。组织内部人员、新组织或新主义一旦掌握借壳、换壳和夺舍，中心就不再独占这些手段。它曾借此进入旧国家、调用旧身体、保存有用对象；后来者也可能反过来进入它，调用它的语言，改变它内部的权重。

反噬的条件还藏在理论外壳自身。换壳最终会碰上模型解释危机。一套原本能够划分敌我、解释现实和动员组织的模型，在不断增加解释维度以后，反而会抹平对象之间的区别，失去原先的判别力。旧理论反复失去判别力，周期性地制造出换壳需求；但理论失效并没有带走旧政治生存逻辑，恰恰因为旧外壳不能继续完成划分和动员，这套政治生存逻辑才被用来寻找新的语言、新的敌人、新的理论和新的外壳。换壳不是偶然修辞，而是满清共产主义让旧政治生存逻辑越过旧主义之死、继续生存的组织能力。要理解这种续命，必须回到模型本身：解释危机为什么没有杀死这种政治生存逻辑，反而迫使组织再换一层外壳。

第二十一章　组织嵌入、借壳、换壳与夺舍注释

[1]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部分修改，2022 年 10 月 22 日通过），第一章第三至六条、第二章第十六条及第七章第四十至四十二

条。党员义务、资格程序、组织执行关系与纪律后果等条款，表明组织入口、资格和位置属于可观察的制度接口，但这些外部接口无法直接证明具体成员的内心。

返回正文

[2]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顺治初年相关记载：卷五顺治元年五月庚寅（故明官员照旧录用条件）、癸巳（旧内阁六部都察院同满官办事）；卷二十一顺治二年十一月癸亥（降官拨旗）；卷二十三顺治三年正月乙亥（钱谦益王铎入内翰林）；卷二十五顺治三年四月丙子（投诚官编牛录）。亦参见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Frederic Wakeman Jr., *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材料体现了选择性调用、重新编组和忠诚链变化，但现有记载不支持断定某一个具体旧机构已完成夺舍。

返回正文

[3]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关于经济与军事接管的记载：卷九顺治元年十月甲子（前朝税额、卫所官员留用及北京兵民分居）；卷二十顺治二年九月己巳、卷二十五顺治三年三月乙卯（驻防房地处分）；卷二十五顺治三年四月壬寅（核财赋、编赋役全书）；卷二十七顺治三年九月乙未（卫军改屯丁、卫所钱粮漕运造船）；卷二十九顺治四年二月癸未（浙东八府及福建税例）。亦参见 Nicola Di Cosmo, “Did Guns Matter? Firearms and the Qing Formation,” in Lynn A. Struve ed., *The Qing Formation in World-Historical Tim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4, pp. 146–151，关于汉军、炮兵和技术组织连续性的讨论，该讨论着眼于技术与组织连续性，并不足以直接证明全部财政项目。

返回正文

[4]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第 2 章，pp. 100–101、105–111、121、126–127。北京、江宁、杭州、西安的建置与空间固定化进程各有差异；驻防建置与空间分隔的存在，不等于普遍封闭的满城，亦无法据此推定驻防机构控制了全部地方民政。

返回正文

[5]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鞍山钢铁厂早期建筑》，2020 年；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陈云与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财经工作》，2023 年 1 月 6 日；《陈云在东北的革命贡献》，2022 年 2 月 17 日；张海川：《吉林西站：吉海铁路上的睡狮》，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地情笔记》2019 年第 2 期。上述记录反映了工业与铁路设施的接收、修复、人员分类留用及管理关系更替，并不构成夺舍的充分证明，不能将政权接管直接等同于夺舍。

返回正文

[6] 《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七章。相关条款表明现代组织存在正式的人事资格、执行、纪律与组织关系接口；接口存在不等于某一网络已经取得控制。

返回正文

第二十二章　模型解释危机：恶意加维怎样摧毁旧外壳

一、模型依靠少数有效维度工作

满清渔猎的政治生存逻辑并不被固定在某个组织、某种主义或某套语言里。行动者借现成外壳取得入口；进入组织以后，又保存有用对象、调动资格和资源。等到旧壳失效，组织便寻找新的语言、敌人、理论和合法性来源，重新包装自己。外壳可以改变，政治生存逻辑却未必随之死亡。

换壳发生，是因为原有解释已经撑不起它所面对的现实：旧语言说不通，旧敌我划分失去动员力，旧理论解释不了新的资源分配和组织关系，旧的合法性来源也在不断耗损。这已经不是一次宣传口径的更新。更深的问题出在模型上——组织已不能依靠原来的少数关键维度，分辨现实中真正决定方向的差异。模型一旦失去判别力，外壳的危机会先在语言上显现，随后进入组织，最后侵蚀合法性。口号还可以照旧重复，机构也照常开会，名称甚至原封不动，可它们已经答不上几件最要紧的事：什么对象决定现实，什么关系改变资源，什么力量规定敌我，哪一种方向能让组织继续运转。解释外壳的破损由此催生换壳；旧政治—组织生存逻辑继续被用来寻找新的生存位置。

所谓模型，不是一张知识项目越列越多便越高级的清单，也不是力求把所有现象装进去的全景地图。现实包含的维度近乎无限，组织若要持续行动，就必须把无限的现实压缩为有限的任务、资格、层级、资源和敌我分类：人口被压缩成身份，资源被压缩成项目，复杂关系被压缩成资格，历史冲突被压缩成敌我，未来承诺被压缩成目标。压缩本身不是缺陷，而是行动的条件。一个组织若把所有维度都留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便无法决定先处理什么、牺牲什么、保护什么；它不能让每项要求同时成为最高要求，也不能让每个对象同时占据中心。现实治理因此必须作出选择，选择又必须形成权重。没有权重，模型只剩材料，没有方向；没有方向，组织便只能靠临时命令和情绪动员。行动能力恰恰来自对少数高效维度的选择：什么是主要问题，什么是次要问题，哪些对象交给哪一套程序处理，这些选择决定组织能否形成方向。

一个大模型里面只有几个维度是有效的，不是所有维度都是有意义的。^{[1]}模型能不能工作，不取决于它把现实分得多细，而要看它有没有抓住真正改变结果的少数维度。这里所说的“有效”，与一个维

度听起来多么重要、在文本里出现多少次，或能否被包装成宏大价值无关；它必须保住对象之间的差异，让现实判断继续发生。一套有限的治理模型，至少得回答几件实际问题：谁拥有组织位置，谁能动员人员，谁决定资源流向，谁有资格被纳入，谁会被排除，哪些对象被定义为敌人，哪些行为得到奖励或惩罚。人民、发展、秩序、平等、安全，许多模型都会谈。真正拉开它们差别的，是这些词最终接到哪一种组织、资源、程序和后果上。口号相同，资源分配未必相同；名称相同，人事权重也可能不同；宣称同一目标的理论，可能把完全不同的对象放在优先位置。有效维度正是把这些差别保留下来的判别线。

这里所说的“维度”，不是个人属性清单，也不是技术变量清单。它指的是现实中能够被组织采用、能够改变判断和后果的区分方式。一个新维度进入模型以后，如果没有改变任何现实判断，它可能只是补充说明；如果它改变了某项资格、某种资源、某个组织位置或某条敌我边界，它才可能具有现实有效性。反过来，大量新维度若只增加说法，却让所有对象都可以获得同等解释，它们就在消耗模型的压缩能力。模型失效，不是因为信息太少，而是信息与权重之间的关系遭到破坏。

没有进入高权重位置的维度，并不因此毫无意义。它在某个模型中没有决定作用，不等于它在现实中完全不存在；一个对象在某个时期不处于主要位置，也不等于它永远不会改变结果。维度是否有效，取决于它所处的关系、时段和组织。模型的压缩还会产生时间结构：某些维度在一个时期构成生存条件，换到另一个时期可能退入背景；某些对象原先不是组织的主要问题，后来却因资源、人口或传播的变化进入中心。有效维度不是一成不变的清单，而是能够在具体时期保持真正差异的关系。正因如此，必要的模型修正必须说明：新增的东西改变了什么，原有高权重是否仍能发挥作用，新分类是否让现实更清楚，而不只是让文本更厚。

新增维度本身不是问题，模型也不能拒绝它。没有新增维度，模型就不能面对新事实；新事实出现以后，如果不作必要修正，旧模型就会把已经变化的现实硬塞回原有分类。加入过去未被看见、但确实改变组织关系或资源后果的维度，可能是在提高判断精度；把新的对象纳入观察，也可能是在补旧模型的盲点。这些都不能直接称为恶意加维。必要修正会让模型看见原先遗漏的差异。它可能增加模型负荷，却不一定削弱判别力。只有新增了真正有效的判别，或者补上过去遗漏、又确实改变现实判断的关系，增加维度才算修正。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维度本身的增加，而是新增维度被用来冲淡原有判别，使原来能够决定方向的少数因素被埋入一片看似丰富的平面之中。

二、新增维度与恶意加维的界线

恶意加维走的是另一种方向。它不是朝着更接近现实去修正模型，而是不断添入低权重、低判别力乃至干扰性的维度，让原本清楚的高权重关系退到背景。能够分辨方向的差异，被埋进越来越多的分类、身份、例外和相互抵消的说法中。模型看上去更周全，实际却在失去切割现实的能力。“恶意”在这里是政治判断，不是外部材料可以自动测量的心理事实。外部文本能够显示某一时期新增了哪些分类，政策目标和适用范围怎样变化，也能显示这些变化怎样接到人事、资源、组织和敌我后果上；仅凭词

语增加，却不能证明制定者主观上怀有恶意。理论判断与史实证明必须分开：恶意加维是这里的理论命题，具体历史文本能够证明的，只是它实际呈现出来的变化。

社会产生新问题，组织必须处理新的技术、产业、地区、身份和风险，这种复杂化本身不能一概算作恶意加维。判断的界线，要看新增维度究竟做了什么：它是让现实中的区分更准确，还是把原有区分磨掉；是让资源和责任更清楚，还是让一切都能被重新解释；是补足实际关系，还是把决定性因素稀释得无法追问。恶意加维把差异一层层埋进表面项目，使高权重维度在包围中失去高权重。其目的性结果，是任何对象都可以被重新归类，任何失败都可以由另一个新维度解释。此时，模型的复杂不再是现实的复杂，而是对判断责任的逃逸。如果所有对象都能借新维度获得解释，原有判别便会被说成过于简单；每一种结果若都能再添一个维度，高权重因素也只剩“众多因素之一”的位置。等所有因素被铺在同一张平面上，真正决定行动方向的关系便不必单独指出。恶意加维由此不是增加知识，而是改变什么可以被称为主要问题。

模型危机不能归结为因素变多，核心在于维度之间的权重关系被改写。模型要能工作，就必须分出主次和先后：高权重关系能够解释结果，低权重因素则构成背景。这里的高权重不是道德上更高尚，而是它在现实中更能够改变组织方向、资源流向和行动后果。低权重维度当然可以被看见，但看见它们不等于把它们放在同一位置。组织可以承认经验各不相同，同时指出哪些关系真正决定人事和资源；理论也可以记录许多现象，而把少数关键维度留在解释核心。只要主次关系没有被抹平，维度增加仍可能服务于判别。恶意加维改变的正是这种主次秩序。

低权重维度不断增加，又被放到与高权重维度近似相同的位置，模型看上去公平，实际却开始失真。真正决定结果的因素，被要求与只提供背景或修辞的因素共同承担解释责任。于是，高权重关系总能被说成“不完整”，明确判断总能被说成“忽略了其他维度”，责任则被摊进一张没有中心的清单。新的解释项被不断添入，并被要求获得近似相等的注意力：明确的敌我关系降为众多身份关系中的一项，直接的资源配置退成背景，决定组织方向的权力关系也只剩多种叙事中的一种。模型越是声称自己兼容一切，越可能失去指出谁真正拥有现实权重的能力。

“让这些维度等效”，并不主张数学上完全相等的权重。固定维度目录、统一量尺、跨时期阈值、逐项权重计算和严格证明，现有材料都没有提供。严格数学等权要求可定义的对象、可比较的指标和可重复的测量；“近似等权”强调的是政治和解释实践中对重要性差异的压平。它可以通过文本中分类的并置、制度中任务的叠加、敌我边界的变化和资源后果的重新安排得到有限观察，但不能由词频、篇幅、口号次数或文本复杂度直接推出。方程、向量、统计估计或模型训练等形式化结论，缺乏所需的数学定义、计算与证明支持；恶意加维的实质在于压平主次、消解判别，并把失败转作政治摧毁与重建的理由，这与单纯增加认识维度的普通复杂化存在根本区别。^{[2]}

在近似等权的作用下，原本权重悬殊的因素在表达中被处理得仿佛同等重要。新的身份、历史、利益、创伤、文化、环境和例外被不断塞入，并要求获得相似的解释地位。两个原本不同的模型经过持续加

维和等效处理，在坐标表达中就会越来越相似。所谓“区分消失”，不是说资本主义社会、奴隶制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在现实结构上从来没有差别，更不是说现实对象已经严格同一。现实仍然可能存在制度、资源、组织和暴力上的差别，消失的只是模型把它们区分开的能力。当模型不再把决定性差异保留在高权重位置，它就无法再将现实中的制度与权力差别转译为可执行的判断。只要任何差异都能被另一组新增维度抵消，它就不再具有决定意义。

模型一旦失去判别力，容纳得越多，危险反而越大。差异虽然都被收录进来，却说不清它们怎样作用于资源、组织和行动。批判可以被另一个因素平衡，制度后果可以改由另一种身份解释，权力关系也能被更大的复杂性包围。恶意加维与近似等权所摧毁的不是信息量，而是差异的排序和方向。最后，模型不是解释一切，而是让任何解释都无法承担决定性责任。

三、为什么“更多解释”会反过来保护失败

模型失效后，解释并不会自动减少，反倒往往增加。组织不能公开承认自己已经不能判断，只得不断给出新的说明，证明自己仍然掌握现实。失败总可以再补一个新原因，反常总可以再添一个新条件；每一次政策后果，也都可以重新寻找承担它的对象。原本清楚的资源安排，可以被说成历史、文化、地区、身份、技术、个体选择等多种因素共同造成的结果；组织决定可以被说成复杂环境中的被动反应，失败则可以被解释为旧维度不足，需要继续加维。解释越多，责任看起来越分散，追责对象失去了轮廓，既有权重结构却得到保护。恶意加维的政治价值就在这里。

解释越来越多，带来的不仅是理解上的困惑，更是在掩埋真正的权力和配置关系。资源由谁配置，组织由谁控制，传播由谁筛选，资格由谁授予，敌我又由谁划分？如果所有因素都取得近似相同的解释地位，这些追问就会被无限延伸的背景说明埋起来，真正能够改变现实的因素也不再显得特殊。模型看起来更体谅复杂性了，实际上却更不愿意承担判断。

必须把信息过载与恶意加维严格区分开来：信息很多，仍然可以排序；维度增加，也仍然可以指出主次。信息过载只是数量问题，恶意加维则改变了责任和权重。只有当新增维度被用来冲淡主次、取消差异、延缓追责时，才进入这一政治机制。多元视角仍可承认某些事实具有更高的现实后果，也能围绕高权重因素展开争论；恶意加维的结果不是让视角更多，而是让所有视角都被推到足以抵消决定性事实的位置，“还有其他因素”由此成了取消主要因素的常用方法。这一机制是对判别的实质消解，与多元视角之间的协调存在根本区别。

模型失效以后，组织还会试着把问题推回执行层：目标没有错，只是基层执行偏了；分类没有错，只是成员理解不够；制度没有错，只是敌人利用了漏洞。这些说法有时确实能描述局部事实，基层偏差或理解不足并非必定是凭空捏造，但局部的真实不能代替对模型本身的追问——高权重由谁设定，低权重维度由谁抬高，又是谁把不同后果摆在同一个解释平面上。

执行偏差一旦成了主要解释，模型本身便可以免于承担失败。组织继续增加培训、纪律、宣传和检查，判别力却没有恢复。越来越多的程序被叠到原有模型上，程序本身又制造新的维度；这些维度再被赋

予同等重要的姿态，模型因此更厚，却更难说明什么真正决定结果。恶意加维与组织加码由此接在一起：解释越细，真正的方向越可能被遮住。

四、摧毁旧模型成为答案

判别力还在时，组织至少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敌人可能认错，资源也可能放错位置，判断当然还会出错；但判别存在不等于判断全对，错误仍能被指出，敌我分类没有消失，资源与位置也仍可追踪。这样的模型有缺陷，却还可以成为修正对象。判别力一旦消失，问题就不再是判断出了错，而是连什么算判断都说不清。组织无法确定哪些差异和对象居于主要位置，也无法把后果归到相应关系上。于是，现实被说成过于复杂、过于多元、彼此交织，无法简单概括；模型不能解释，反倒被转述成现实本身不可解释。把模型的失败归咎于现实过于复杂，解释责任也就从模型身上转移到了现实。既然一切都复杂，清楚的判别便可能被指为片面；既然任何关系都与别的关系相连，高权重判断便可能被要求无限补充。模型不再承担切割现实的任务，反而要求现实为它的失效负责。

解释真空就在这时形成。旧模型给不出稳定区分，新模型又没有建立。旧语言仍在，却不再具有完整的说服力；旧敌我划分还能调用，却处理不了新的现实；旧合法性来源仍被重复，却回答不了组织为什么仍有权继续支配。人们面对的不是单纯没有答案，而是原来的答案已经失效，新的答案尚未取得位置。真空会把组织的不确定性继续放大：资源分配失去解释，失败无处归因，牺牲不再有意义，服从也得不到未来承诺。一个组织可以用命令暂时压住真空，却不能永远靠命令生产解释。它必须重新建立一个有限模型，用来选择对象、规定敌我、解释牺牲和分配机会。否则，任何方向都可以被质疑，责任可以不断转移，外壳也只能靠重复和强制维持。

这种解释真空有严格的理论边界，不能拿来概括所有历史困难。经济困难、权力更替、政策摇摆和社会冲突本身，都不足以证明它已经出现。只有当旧分类与旧合法性无法继续处理现实，而新分类尚未取得稳定位置时，才构成这里所说的危机。它发生在模型失去判别力之后，不能倒果为因，把历史上的一切危机都归结为同一种模型失效。

判别力已经消失时，摧毁旧模型会被提出作为答案。旧模型既然不能区分现实，问题就不再是修正其中几个维度，而变成旧模型本身必须被清除。“摧毁一切、重新建设、重新解释”由此成为一种政治行动。这不是普通的理论修订。一般修订会留下仍然有效的判别，只调整错误的部分；摧毁—重建却把旧模型的失效解释成旧秩序整体失效，把“不能判别”推成“必须清算”，还把新模型的建立同旧模型的废除绑在一起。旧模型越是无力分清差异，摧毁它的正当性就越容易被制造出来。复杂的解释失败被压成几句清楚的政治口号：旧的必须打碎，新的必须建立；旧语言不能再用，旧敌人必须重新命名；过去解释不了现在，过去就要承担责任。模型的失败不再只是认识问题，而成了动员力量、重新安排人员、资源、组织和合法性的现实理由。

资本主义社会、奴隶制社会等模型先被添入无数维度，这些维度又被处理得仿佛等效，原有差异便在坐标中消失；区分一旦消失，共产主义随即抛出“摧毁一切，然后重建”。这里的“摧毁一切”不是

温和的学术更新，也不只是换一套教材，而是把模型失效转译成政治清算的理由。外部历史文本能够证明某一时期发生过制度撤改、政治运动、组织重组或政策方向变化，也能证明某些旧概念遭到否定、某些新概念得到确立；它们却不能单独证明所有这些行动都由恶意加维造成，更不能把每一次重建自动接成同一条因果链。恶意加维导致判别力消失并进而引发政治清算，属于理论机制解释，与经验层面的普通模型更新存在本质区别；外部事实则约束着具体历史声称的经验范围，无法单独闭合整条因果链。

摧毁以后还得重建。没有重建，组织便无法处理资源、人员、资格、敌我和行动；它可以在摧毁旧模型时动员力量，却不能永远停在无模型状态。摧毁带来真空，重建则试图用新的有限维度填补真空。新模型从一开始便带着矛盾：它靠摧毁旧模型取得合法性，又必须承担建立新模型的治理责任。

这一危机的机制呈现出明确的因果走向：维度增加并近似等效，表达差异消失，判别力下降，旧模型被摧毁，重新解释中产生真空，真空最终形成危机。真空在旧判别失效、新模型尚未确立时即可出现，在摧毁与重建的过渡中也会延续或再次形成，并非只在摧毁之后才首次发生。外部材料如果闭合不了整条因果链，就只能说明其中局部的文本变化或制度后果，不能把零散变化拼成完整的历史因果。

五、取得统治以后仍然必须治理

共产主义可以靠摧毁旧模型动员，取得统治后却不能只靠摧毁继续存在。粮食、工业、财政、住房、人口、组织、教育、军队、边界和资源配置都要处理；谁能进入何种机构、谁能得到何种机会、哪些对象算作敌人、哪些牺牲被认为必要，也都要作出决定。这就要求它建立自己的有限维度现实模型。这套模型不可能让所有现实都占据同等重要的位置。治理总要作出选择：哪些目标优先，哪些组织拥有更高权限，哪些身份获得资格，哪些资源集中到什么方向，又有哪些风险必须压过其他风险。哪怕宣称代表全部人民，具体行动仍要把无限对象压缩成有限的任务、关系和等级。

摧毁者与治理者之间由此出现一道断裂。摧毁旧模型时，旧模型的每一道边界都可以被说成压迫；重建新模型时，新组织却必须重新划界。谁是人民、谁是敌人、谁拥有资源、谁服从何种纪律、什么理论可以解释现实，都要重新定义。旧模型被摧毁以后，有限现实并没有消失，它只是换了分类和权重。取得统治以后，共产主义不能永远只做否定者。它必须用自己的观念解释世界，成为现实的组织者，把一套有限维度放进国家、机构和日常生活，使现实按照自己的模型重新分类。模型一旦进入治理，就不再只是文本，而会连接到资源、资格、组织和敌我方向。

正式文本为观察这种累积提供了一个有限窗口。以 2022 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为例，多代指导思想被并列为行动指南，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国家安全、组织纪律和敌我关系，也同时进入同一份治理文本。由此能够确认的经验事实，是多代表述、多类任务和多种制度分类在正式模型中的并置与累积；但单凭这份文本，不能证明这些维度是被恶意加入的，不能证明它们在现实中已经严格等权，也不能证明完整的代际因果循环。

文本并置绝不等于现实中的权重平等：发展、改革、人民、纪律、文化和安全可以并列出现，但现实中的先后次序必须由预算、干部、组织、传播和执行程序来排定。写在同一份文件里，只能说明这些表述取得了合法表达的位置；哪一项在具体时刻获得资源与执行优先，仍需从现实功能中分别核对。恶意加维、近似等权、判别力消失和解释真空，在理论链条中展现为不同层次的机制关系，绝非表层词语的简单替换；单一文本无法单独闭合整条因果链。^{[3]}

治理模型建立后，还会经由教育、干部训练、组织生活和宣传传给下一代。这种传递并非机械复制，变化也不等于真正的模型修正；同一套组织可以在传递中保留若干核心维度，同时不断增加新的目标和解释。代际传递的关键，在于上一代模型留下的有限秩序怎样被下一代重新命名、重新排列并重新赋予合法性。

新维度一旦进入制度文本，也会进入成员的日常估价。成员要判断什么表述更安全、什么身份更有机会、什么解释更接近组织中心；组织则用资格、奖惩和传播，反过来强化某些维度。模型的变化因而不只写在理论文本里，也发生在成员与组织的来回调整中。若这种调整不断增加表面维度，却不能恢复主要差异，解释危机便会从文本层进入生存层。

治理模型建立以后，流动的现实会被固定为制度语言。对象被归入某种身份，身份接到资格，资格再接到组织位置，组织位置最后接到资源和惩罚。有限维度至此不只解释世界，也开始生产世界里的“可进入”与“不可进入”。它既让组织知道如何行动，也让成员知道自己只能以什么方式被看见。

加入新维度，改变的也不只是理论描述。它可能重新规定谁属于重点对象，谁有资格获得保护，谁必须承担风险，哪一种传播可以进入公共空间，哪一种话语会被判为危险。一个维度越能牵动这些制度后果，就越不能被当成文本上的附加项目。正因为它能够改变现实位置，才需要问它是否确实增加了判别，还是借新增分类把原有高权重关系隐藏起来。

组织若不断增加身份和目标，却不说明它们之间的先后，成员就只能根据风向判断哪些维度今天有效。治理模型表面上扩大，实际却把权重决定从公开规则转移到临时关系和隐性位置。模型的失效会先表现为组织内部的不确定：同一行为在不同位置得到不同解释，同一身份在不同阶段获得不同资源，同一句口号落到不同权重者手里，也会产生相反后果。

六、重建为什么总带着下一次危机

下一代领导会往上一代领导的模型里面也加无数的维度，因为下一代也有自己的观念。“下一代”在此指抽象的代际位置，未指定具体人物姓名、起止年代或逐人对应关系；具体人物的对应需要专门的经验材料支持。前一代建立起模型，也就把其中的有效维度同一套组织秩序绑在了一起。新的领导层接手时，会面对新的现实、利益、继承关系和合法性需求，并把自己的观念带进原有模型。新增内容起初未必无效：它或许在处理旧模型没有处理的对象，或许想改变原有的资源和组织关系。问题出在新增维度不断累积，又被要求与原有维度近似等效；走到这一步，旧模型的判别力便会再次下降。

上一代的模型原本还能区分某些现实，下一代却把更多对象、更多解释放进同一张坐标图。旧模型的边界随之变得模糊，原来的高权重因素也被重新解释成众多因素中的一个。改变的不只是对上一代秩序的评价，连它内部的次序也被重新排列：过去能够标出主要问题的因素，被新维度层层围住以后，便不再有资格规定什么是主要问题。代际变化会在这一过程中被包装成“新的解释”。新一代会说，上一代模型已经过时，遗漏了新的维度，也处理不了新的现实。这种说法可能包含真实变化，也可能借“补充”遮住模型权重的改动。新维度若不断进入，并取得近似相等的位置，上一代模型保留下来的差异便会再次被压平，最终重回不能判别、不能解释的状态。

代际循环的危险，在于每一代都可能把自己的动作理解成修正前代，而同一动作也可能正在制造下一次模型危机。新维度的加入可以被叫作发展、补充、完善、纠偏，也可以被叫作新的实践要求；如果它最终冲淡了原本能够保持差异的高权重维度，模型就会在“增加解释”的同时失去解释。它的失败不是内容太少，而是内容越来越多，能够决定方向的部分却越来越少。

将单次危机视为孤立事件的考察方式，不同于观察代际重演的反复过程。每一轮重建都得重新划出边界：什么是主要问题，敌我怎样分类，组织按什么原则运行，资源依什么秩序分配，又用什么语言说明合法性。新模型靠这些有限维度取得现实能力，也靠它们同被摧毁的旧模型区别开来。下一轮加维却会扩展、稀释并重新解释这些边界。原来用来区分旧模型与现实的少数有效维度，会逐渐被更多维度包围，直到再次无法承担决定意义。

这套机制会造成持续的不稳定。旧模型被摧毁后，新的组织仍必须继承人口、机构、资源和技术，也必须使用某些旧的行政能力和社会接口。重建因而不是从空白开始。新组织不能把现实全部清零，只能在旧身体和新观念之间重新组合。新的有限模型要宣布旧模型失败，却又要调用旧模型留下的现实能力。它因此既是断裂，也是继承。摧毁和继承、否定和调用、换壳和续命，就这样同时存在。

为证明自己不同于上一代，新模型会增加新的理论、分类和合法性；可要治理现实，它又必须保留某些能够让组织运转的旧维度。这种矛盾因而进入新模型内部。新增维度如果能够明确说明新的现实关系，模型会获得新的判别。如果增加维度只是为了区分自己与上一代，或为了吸收越来越多的要求，这些维度就可能开始冲淡原有高权重。代际加维首先是一种结构性诱因，并不是机械的“新一代更坏”故事。

上一代模型最终被宣布失败，往往是因为它不再能承载新一代的全部解释要求，而不是因为它完全没有现实能力。新一代把自己增加的维度当作现实的新复杂性，又把前代的有限性当作前代的错误。差异被重新压平以后，新一代又反过来说前代不能解释一切。摧毁因此再次获得正当性，重建又一次开始，下一轮加维也随之被埋下。有限模型与不断加维之间的冲突反复出现，构成危机的周期性。它不是某一位领导人的私人心理，也不是某一个年代的偶然失误。抽象机制的阐明与具体人物、时期是否构成完整例证属于不同的证明层次；具体例证尚未完全闭合，并不等于机制本身不存在，也不能反向推论经验已获充分证实。

解释真空出现在这种循环的过渡处。旧模型已经说明不了现实，新模型又没有完成重建；旧组织仍在运转，新的合法性尚未稳定；旧敌人还被提起，新的敌我边界仍在寻找。资源也没有停止分配，只是分配理由越来越依赖临时解释。所谓真空，并非没有任何语言，而是缺少一套能把语言、组织、资源和后果稳定连接起来的有限模型。

七、模型危机与换壳的双向关系

解释真空会进入组织的实际选择，问题不只在于思想家没有答案。缺少稳定模型时，组织不能确定怎样分配机会，成员不能确定怎样表达忠诚；基层不能确定什么行为会被奖励，精英也不能确定哪一套语言可以保护位置。每个人都开始重新估价，组织内部的旧权重因此出现松动。在真空中，最容易扩散的并不一定是最严谨的理论，而是最能迅速提供归属、敌人和行动方向的解释。它可以把复杂现实压缩成一组简单的身份、危险和承诺，可以让成员知道自己站在哪里、谁需要被责备、什么行动能够证明忠诚。它未必恢复真正有效的模型，却能先填补等待中的空间。模型危机因而容易产生新的叙事外壳。外壳的首要功能是把失散的对象重新排列，而不是证明自己逻辑完美。它可以提供新的共同语言和新的敌我对象，也可以把旧失败转译成新牺牲、把旧资源包装成新合法性。旧政治生存逻辑只要能够进入这套重新排列，就可能在真空中获得延寿。

模型是通过组织外壳进入现实的。外壳包括名称、制度、口号、仪式、干部资格、教育体系、法律形式、敌我语言和历史叙述。只要模型仍然能够提供有限判别，外壳就能把这些维度组织起来，使成员知道该如何服从、竞争、分配和解释。外壳不只是包装，而是模型与日常行动之间的接口。模型失去判别力后，外壳首先会出现内部不一致。成员还被要求遵守旧语言，旧语言的失败却不断由新维度来解释；旧目标仍被宣称有效，资源和资格的实际分配却又被改动。旧敌我划分继续受到维护，同时又必须寻找新的对象承载动员。外壳还在，内部却越来越难以用同一套维度说明。

外壳破裂并不意味着组织立即消失。组织仍可以凭借纪律、资源和强制继续运行，也可以把裂缝解释成成员不够忠诚、敌人破坏或执行不力。这些解释只能暂时维持外观，不能恢复模型的判别力。若组织不能重新找到高权重维度，旧外壳对表演、临时敌人和反复改写过去的依赖便会越来越深。真空也使组织更容易接受相互矛盾的维度。成员急于获得解释，组织急于恢复服从，新的语言可以先被使用，内部矛盾以后再处理。只要某种语言能够暂时填补合法性缺口，它就可能被接纳进外壳。等到新的维度继续增加，模型再次失去判别力，新的危机便在旧危机尚未真正解决的地方重新出现。

真空可能充满口号、解释、身份和动员，却缺少能够把这些内容与现实权重稳定连接起来的模型。它不等于“没有思想”，也不是空白，而是多种解释争夺高权重位置的过渡空间。谁能够把语言、资源、组织和敌我重新连接起来，谁就可能在真空中获得现实影响。模型危机一旦出现，组织首先需要恢复可解释性。它必须让成员知道什么还有效、什么已经失效，也必须重新说明自己为什么存在、责任由谁承担、谁属于敌人，以及什么目标值得牺牲。旧语言若承担不了这些任务，就需要新语言；原有主

义若给不出整体说明，就需要新的主义。旧有敌我划分失去动员力时，需要的是新的敌人；原有合法性来源一旦失效，也需要新的合法性来源。

模型危机与换壳的功能连接就在这里。换壳不是改个名称，而是替已经失效的模型寻找一种能够重新组织现实的外部形式。新外壳能够提供新的词汇、道德承诺、敌我对象、历史解释和未来想象，原有组织、资源与捕获手段也由此得到重新包装的机会。旧理论外壳死亡，不等于旧政治—组织生存逻辑死亡。模型可能已经解释不了现实，掌握资源、资格、传播和组织关系的力量却还在；一种主义可能失去公开说服力，旧机构和旧人员仍可以被重新赋位。敌我分类也可能无法动员，新的敌人却仍然可以被制造。行动者等待的不是旧语言复活，而是一层新的解释外壳。

换壳之所以能续命，是因为它让组织把失败解释为外壳问题，而不是把内部捕获和权重结构一同清零。原有关系借新的语言继续存在，原有资源重新找到合法性，旧的政治生存逻辑也在新的主义和新的敌我划分中继续运转。模型危机制造换壳需要，换壳又为模型危机提供暂时的遮蔽和续命。组织借新外壳重新告诉成员谁值得相信、什么目标优先、哪些牺牲有意义，也重新说明谁应当被排除、什么资源可以集中、为什么旧失败不必追究。换壳在这时成为现实需要，目的在于重新安排差异，而不是让组织更漂亮；新的语言和合法性来源要承担恢复有限判别的任务。

新外壳也可能只是把同一个失效模型重新包装起来。若原有高权重关系没有变，换掉的只有名称、敌人和未来承诺，危机就只是被延后；若旧政治生存逻辑能够借新外壳保存组织、资源和资格，它获得的是续命，不能算作真正重建。换壳可能恢复判别，也可能遮蔽判别的继续失效；模型危机与换壳之间的张力就来自这两种可能。两者不是同一个概念，却形成循环：旧模型失效，组织寻找新外壳；新外壳重新安排合法性和敌我，新的安排又不断增加维度。权重被冲淡，模型再次失效。

这条双向关系使满清渔猎式政治生存逻辑获得跨外壳能力。外壳更换时，沿用这套逻辑的原有组织只需要保存能够改变现实的组织、资源、资格和传播接口。原有组织不必证明每一套新主义在理论上都与旧主义相同，也不必让每一个成员意识到旧关系仍然存在。外壳变化提供新名称，这套政治生存逻辑则被用来寻找新位置。组织可以把自身失败归还给旧模型，再以新模型的建设者身份出现；也可以借用新的敌我语言重新安排人员和资源；还可以把原有捕获关系包装成新的制度目标。

但这并不意味着每次换壳都必然成功，也不意味着新外壳一定由旧结构控制。新主义不能仅因出现在模型危机之后，就一律被判成交媾主义。新外壳的出现只能说明危机提供了空间和需求；旧的高权重结构是否已经进入其中并控制现实功能，还要另作功能判别。同样，一种新语言被组织采用，也不足以自动证明夺舍已经发生。换壳是否成功，要看新的语言是否取得传播，新的组织是否取得资源，新的敌我是否能稳定动员，新的合法性是否能连接到实际后果。借壳、换壳和夺舍描述的是政治生存逻辑怎样越过外壳继续存在；模型危机解释的则是外壳为什么在某些时刻失去解释力，并迫使组织寻找新的语言和合法性。组织能力与解释危机相互连接，却不互相替代。^{[4]}

八、问题不在维度多少，而在谁决定权重

旧模型失效以后，增加更多说明不能单独解决问题；必须重新辨认哪些维度真正改变组织行动。模型危机最终把问题推回现实。可是，模型失去判别力以后，现实并不会自动告诉组织哪几个维度重新有效。组织必须重新选择：什么因素真正改变资源，什么关系真正支配传播，什么位置真正控制人事，什么程序真正决定资格，什么对象真正被划为敌人，什么机会真正能够改变行动方向。

一个模型可以在文本上非常严密，却在现实中没有资源、组织、传播或资格后果；另一个模型可以在理论上并不严密，却能够决定谁获得机会、谁承担代价、谁被纳入组织、谁被排除。理论的自洽和现实的功能不必处于同一位置。一个维度是否有效，不取决于它在理论文本中听起来多么宏大，也不取决于它出现了多少次，而取决于它是否连接到现实中的资源、传播、组织、敌我和机会分配。谁能决定这些连接，谁就拥有现实权重；谁只能提供解释而不能改变现实，谁的理论源头就必须与功能源头区分开来。

现实功能重要，不能成为取消全部理论文本的理由；理论文本完整，也不能让现实功能自动归到它名下。谁解释文本，谁改变现实，必须分开辨认。否则，重新加维仍会把理论自述、组织功能、资源后果和敌我权重混在一起，新的模型仍然会失去判别。理论源头解释文本，功能源头解释现实。区分二者，并不是说文本毫无意义，也不是让现实功能取消理论，而是为判断设下一道门槛，防止模型再次把语言自述当成现实权重。

注释：

第二十二章　模型解释危机：恶意加维怎样摧毁旧外壳注释

[1] “少数有效维度”“加无数维度”“等效”“摧毁一切、然后重建”“下一代领导”“真空期就是危机”等表述属于理论命题，并非外部史料或统计事实。

返回正文

[2] “模型”“维度”“坐标”“权重”等词属于理论隐喻与分析语言，并非严格数学模型，未给出方程、数值权重、统计估计或形式化证明。

返回正文

[3] 《中国共产党章程》由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22 年 10 月 22 日通过，权威公开文本见共产党员网（2022 年 10 月 26 日发布）：https://www.12371.cn/2022/10/26/ARTI1666788342244946.shtml。其中关于指导思想、组织原则、党员资格、组织关系、纪律和行动方向的正式表述，仅说明多代表述、组织接口和治理分类在正式文本中的并置与累积；该文本不能单独证明主观恶意、严格等权、完整代际摧毁—重建循环或所有模型解释危机。

返回正文

[4] 模型危机与换壳之间构成功能性关系：旧外壳失去解释力，会制造寻找新语言、新敌人、新理论、新主义、新合法性来源和新外壳的需求；这一连接不自动证明具体组织已经发生夺舍或交媾主义。

返回正文

第二十三章　权重优先论：理论源头解释文本，功能源头解释现实

一、模型压缩与实际权重

新增维度可能补足现实，也可能冲淡原有的主要差异。解释可能增加，判别却可能下降；外壳可能更换，现实中的组织、资源和机会关系却未必随之改变。

社会是个大模型，它有数量无限多的维度，但不同维度的权重不同。这里的“大模型”不是一张把现实全部复制进去的表格。现实关系近乎无限，任何组织都只能从中挑选一部分进入行动，必须把人口压缩成资格，把复杂关系压缩成组织位置，把资源压缩成项目和分配规则，把冲突压缩成敌我，把未来压缩成目标和承诺。压缩本身不是问题，所有行动都必须经过压缩。关键在于压缩以后保留了什么差异：哪些关系被放到决定位置，哪些关系退到背景，哪些对象获得进入组织和资源流动的通道。没有权重，维度只是堆积；没有主次，模型只能容纳材料，不能组织行动。

一个词显得宏大，或者一个概念在文本中反复出现，都不构成权重。某个维度只有在现实中连接到资源、传播、组织、敌我或机会，并且能够改变对象的位置和行动后果，才可能拥有现实权重。口号很多，不等于口号控制资源；理论很完整，不等于理论决定资格；某个身份被频繁提及，也不等于这个身份能够改变组织位置。理论文本可以宣布某种价值最高，现实中的预算、任用、纪律、传播和机会却可能把另一种关系放到更高位置。判断权重，要问谁能使某种关系进入程序，也要问谁能使这种关系产生持续后果。谁让资源进入某个组织，谁决定什么语言得到传播，谁规定资格和纪律，谁划分敌我，谁控制进入路径和机会窗口，谁就在现实中占据了高权重位置，而不只是在提供解释。

二、理论源头与功能源头的区分

理论源头解释文本，功能源头解释现实；二者可以相互连接，却不能彼此冒充。后世出现了大量思想和主义。一个理论写得更严谨、更贴合某套主义，不能据此认定这个理论更原教旨；一个人的实际行

为更接近某套理论，也不能据此认定他就是原教旨者。理论的纯度、逻辑的一致和文本的自洽，都不能自动证明现实功能。原教旨在这里不是教义内部的纯洁竞赛，而是一个拆分工具。它把“文本是谁生产的、概念怎样形成”与“现实中谁取得资源、组织、传播、敌我和机会的高权重”分开。只有这样，理论自洽与现实支配才不会被混成同一个判断。^{[1]}

理论源头首先要回答文本从哪里来：概念由谁提出，在什么语境中形成，理论生产者怎样描述自己的目标，又继承了哪些旧思想、否定了哪些旧语言、组织出哪些新概念。理论生产者可以真诚地完善自己的概念，努力让每一条论证彼此衔接，把自身目标写得清楚而完整。文本怎样理解自己，也属于理论源头。一个 A 主义可以明确说明自己的理论是为了 A，并围绕 A 建立完整体系、培养真诚信徒，在内部形成严密的解释和道德承诺。后来现实功能即使偏离了 A，也不能因此抹掉这些文本事实。文本来源所能解释的仍然只是文本。至于谁配置资源、谁掌握组织位置、谁控制传播入口、谁决定敌我边界、谁分配机会，单靠文本回答不了。概念的起源与现实中的高权重可能一致，也可能分离；二者可能相互影响，也可能只是一前一后地并列出现。

把二者分开，也保留了理论本身的复杂性。理论并非只能在“真诚”和“伪装”之间二选一。真诚的理论可以进入由别的高权重关系塑造的现实；文本也可以保留自身意义，同时被组织、资源和机会结构重新赋位。个人的主观真诚不等于生成目的具有独立性，缺少共同预谋也不能否定既有环境对理论生成的参与；但是否在形成时期便面向 B，仍须依据形成时期的材料判定。不能用“后来被利用”反推“最初就是为了被利用”，也不能用“最初真诚”反推“现实功能一定由文本决定”。一个理论后来即使被某种更高权重关系利用，也不能据此断定理论生产者从未相信过自己的文本；不能把全部思想都视为伪装，更不能把所有理论生产归结为秘密中心的安排。

追踪功能源头，看的不是谁在概念上最会说，而是谁能够使现实朝某个方向变化。资源从哪里来，谁有资格进入，哪些人被任用，什么语言获得入口，谁承担纪律和敌我后果，哪些机会被打开或关闭，现实功能要从这些关系中辨认。功能源头并不是隐藏在所有事件背后的全知中心。它可以是一组制度规则、一套组织程序，也可以是若干彼此连接的资源与资格接口，或是在不同历史窗口中作用不同的关系。这里的“源头”指现实作用从何处产生，并不意味着所有行动都由一个主体预先设计。

功能判断必须有事实箭头。某种思想最后使某方受益，仅凭这一点不能认定受益者就是它的功能源头；口号相似，不足以证明两个组织功能同源；传播广泛，不能据此认定传播已经被同一主体控制；组织存在，也不能据此认定组织已经被某种关系夺取。现实功能必须落实到对象、规则、行动和结果上。一条最低限度的功能链，需要说明对象由谁掌握，行动依据什么规则，具体改变了什么，结果能否观察。没有对象和结果，功能源头只是猜测；没有时间关系，也无法判断功能源头与理论源头的先后。

只看资源、组织和后果，理论文本会被压成无意义的包装。反过来，只看理论自述，现实功能又会被文本的自我说明遮蔽。文本不是装饰。概念怎样被表达、信徒怎样理解自己、组织怎样说明合法性、新外壳能够提供哪些承诺，都由文本决定。但文本的现实作用仍须通过传播、组织、资格、资源和机

会进入现实，不能凭文本自身的严密程度直接实现。判断现实方向时，自述和后果不能被当作具有同等证明力；权重优先区分的是二者的证明力，并不取消文本。理论源头仍然重要，因为没有文本层，就无法理解 A 主义怎样形成，也无法知道它怎样为自己提供意义、招募信徒和建立合法性。功能源头仍然优先，因为没有现实后果，就无法判断某个理论在社会大模型中究竟占据什么权重。

三、资源配置与组织行动的现实转化

资源是现实权重最容易观察的接口之一，却不是一切。工厂、铁路、设备、岗位、住房、财政、项目、培训和组织保护都属于资源，进入这些资源的资格也包括在内。资源的现实权重不在名称上，而在谁配置它、它按照什么规则流动、哪些对象因此获得或失去资源，以及这种变化产生什么后果。组织权重关心的是谁能把关系固定下来。资格决定谁能进入，人事决定谁得到位置，纪律决定谁能保留位置，执行程序决定命令怎样变成行动。组织不是一个名称，而是一套把成员、位置、资源和后果连接起来的关系。

1945 年以后满洲的接收与修复，并非发生在同一时间，接收主体也不相同：资源委员会接收工厂，受损的鞍钢经过修复恢复生产，铁路管理转入新的体系，旧职员、技术人员和工人则被分类留用、培养并重新安排岗位。铁路军运表明，资源只有进入行动，才取得现实功能。铁路修复、铁路总局的统一管理同军运任务相接，列车和装卸站段的组织使部队和军需能够进入前线，军工生产和维修进入补给体系，人员和组织名称发生重新编组，部队来源形成组织化行动。这些变化不是抽象的“影响”，而是资源和专业能力进入新的岗位、机构、编制和行动程序。这不足以把全部战果归因于铁路或工业，也不足以把局部节点外推到整个满洲。^{[3]}^{[4]}

1949 年前后形成的中央政府党组、分党组和政府机关党组织，显示了政治组织进入国家机关的历史节点。后来的组织工作、党组、机关基层党组织和干部教育条例，则显示组织资格、人事、培训和执行接口在正式制度中的展开。这些材料可以支撑特定的组织关系和制度节点，不能据此断定所有机关都同日同型，更不能把每一个现代机构机械地等同于历史满城。^{[5]}

组织的存在本身不能证明组织控制。个人进入组织，未必有能力改变组织方向；机构设有党组织，也不能据此认定全部业务都由同一条关系直接决定；制度规定了资格，更不意味着每一次资格后果都受同一主体操控。只有位置、人事、资源和执行形成连续链条，才足以对组织权重作出具体判断。资源权重优先于理论自述，是说现实判断中的资源后果不能被口号替代，并不意味着资源决定一切。把资源接口当成唯一原因，仍会制造出一种僵硬模型，再次落入加维和偷换。

四、传播筛选与敌我分类的程序后果

谁说得响亮，并不决定传播权重。传播权重取决于谁能决定内容进入什么入口、以什么形式受到筛选和分发，以及最后产生什么组织后果。传播得广，只能说明内容到达了更多对象，不能据此认定入口和筛选过程都由同一主体控制。判断传播权重，要追踪四个环节：入口由谁掌握，内容由谁筛选，什么语言获得扩散，扩散是否进入组织行为、资格、资源或敌我后果。若只能证明内容被广泛阅读，就不足以证明功能源头；若能证明某种语言被正式纳入组织程序，并改变成员的可见性和行动资格，才接近现实权重。

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规定了对象范围、领导格局、党委职责和相关工作部门定位；党组、组织工作和机关基层组织规则，又把组织语言、资格、培训和执行关系连接起来。这些制度文本可以显示传播和解释接口的存在，也可以说明某些语言如何通过正式组织入口进入治理，以及传播与组织任务之间的接口关系。算法推荐管理规则把排序、精选、检索、过滤和分发明确列为制度对象，同时保留了用户关闭和选择等边界。这可以证明平台分发并非纯粹的自然流动，规则会影响内容的可见性和进入路径。但单凭这些规定，无法证明具体平台的全部权重都由一个政治主体决定；有分发规则，也不能直接推出完整的现实控制。^{[5]}^{[6]}

口号本身不足以判断敌我权重，必须追踪分类怎样进入行动。某个对象由谁规定为敌人，这种分类经过什么程序进入资格和纪律，又使哪些对象获得保护、哪些对象承担代价，构成了判断它现实分量的依据。正式组织文本能够呈现分类语言与纪律后果之间的接口。党章及相关组织规则把成员资格、组织义务、执行关系、纪律处分和组织方向连在一起；模型危机中的正式文本例证还显示，多代指导思想、发展任务、文化社会生态安全和组织纪律等分类，可以在同一份治理文本中并置和累积。这些内容写在同一份文本里，既不能证明它们严格等权，也不能证明主观恶意。一个文件可以同时写人民、发展、改革、纪律、文化和安全，现实中的先后仍要通过预算、干部、组织、传播和执行程序排出。敌我分类只有进入资格、纪律、资源和行动后果，才具有可观察的现实权重。^{[2]}

两个组织反对同一对象，并不足以判定它们功能同源。共同敌人可能来自相似环境，也可能服务于不同的资源和组织方向。判断敌我权重，仍要把对象、规则、行动和结果接起来；口号相似代替不了事实箭头。

五、机会权重：进入路径与依附位置

机会权重决定谁能进入某个位置，谁能获得第二次机会，以及谁能通过资格改变自己的组织位置和依附关系。它与资源相连，却不是资源本身。个人即使尚未拥有资源，也可能通过资格和窗口取得进入资源的机会；机构即使没有立即分配财物，也可能通过岗位、培训和组织保护改变成员未来的位置。

在满洲接收过程中，技术人员、老工人、旧职员和新干部被分类留用，岗位也被重新安排。这些安排显示了机会怎样同专业能力、组织位置和资源恢复连接起来。岗位不只是普通的工作安排，还把旧能力翻译成新体系认可的位置。机会也因此成为重新赋位的重要接口。^{[3]}

户籍、住房和项目政策从资格一侧显示资源怎样流动。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推动 1 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6〕72 号）中，政策把落户条件与公共服务、住房保障、租赁补贴、公积金、教育和医疗等接口连接起来，也把部分财政奖励与吸纳落户数量等条件相连。这些政策接口能够说明资格怎样打开资源路径。现代组织制度中的党员资格、干部培训、组织工作、机关基层党组织和统战对象范围，同样说明进入路径并非自然存在。落户、住房、教育、医疗和公积金等政策接口，反映出身份和居住条件对机会窗口的影响。这些材料只能支撑局部制度关系，不能据此断定全国资源都由户籍决定，也不能外推全国所有机会都由单一中心分配。^{[6]}^{[5]}

反例会约束机会权重的判断。前述政策中包含放宽落户和衔接公共服务的内容，若只截取门槛，就会把这种政策误判为封闭控制；算法规则保留了用户关闭和选择权，只看排序机制也推不出无限支配。组织培训提供进入路径，却不保证每个受训者都取得相同位置。机会权重必须落到具体对象和实际后果上。^{[5]}^{[6]}

六、五类接口不能机械合并

资源、传播、组织、敌我和机会，是观察现实权重的五类接口；它们不是固定公式，也不是五个分数。现实中可能先出现资源和组织，随后才出现传播和敌我；也可能由传播先形成可见性，再由机会把可见性转成资格。五类接口可以相互加强，彼此之间也可能存在张力；不能机械地规定，它们必须在同一时间全部由同一主体掌握。

传播可以改变什么进入公共空间，组织可以改变谁取得资格，敌我分类可以改变谁承担惩罚，机会可以改变谁进入位置。资源、传播、组织、敌我和机会之间存在相互作用，但不能把它们压缩成单一经济决定论。资源本身也需要组织和资格才能流动。铁路能否用于军运，不只取决于存在铁路，还取决于管理、维修、调度和组织行动；住房和公共服务能否成为机会，不只取决于政策文字，还取决于资格和执行；传播能否产生现实后果，不只取决于内容到达，还取决于组织如何采用、筛选和连接。权重优先并不意味着“谁有钱谁决定一切”，也不是把现实功能全部解释成资源占有。各类现实接口需要分别追踪，再考察它们怎样连接。一个接口不能替代其他接口，“多因素共同作用”也不能成为抹平主次关系的理由。

不同历史时期留下的材料，能够用于观察的现实权重接口各不相同，不能拼成一条未经证明的统一行动链。1945—1949 年的满洲接收、铁路军运、军工、人员重编和入关行动，用于观察资源、组织和行动结果；1948 年及此后的中央组织节点和正式制度，用于观察组织、传播和资格接口；2016—2022 年的户籍、住房、项目和算法分发规则，用于观察机会、资源与传播规则。三组材料各有边界，不是同一个案例拆开的五个断片。模块化并不降低证据要求，它拒绝的是虚假的完整性。一个案例若只能证明资源和组织，结论就不能越过资源和组织；另一个案例若只能证明传播规则和资格接口，也不能替它补上其余环节。把三个案例的箭头拼成一个统一主体的连续行动，再声称五类权重已经在同一历史对象中完全闭合，结论就超过了证据。

七、A 主义与 B 权重结构

A 主义可以有一套完整的 A 理论。但 A 理论的存在，并不自动说明 A 决定了现实功能。现实中可能存在一个权重很大的 B 维度。B 不必先以某种主义的名称出现，也不必由一群人预先策划。社会大模型因为这个高权重维度而产生某种 A 主义，A 主义随后获得自己的文本、组织和信徒。在分散创作、组织选择、传播放大与现实回报的反馈机制下，B 维度的实际需要逐步进入理论的问题设置与行动方向，从而塑造其生成脉络。A 文本本身可以是真诚的，A 的现实功能却可能被 B 的资源、组织、传播、敌我和机会结构塑造。

A 主义并不因此都是伪装，也不能由此认为所有文本生产者都知道 B 结构，更不能认定 B 必然由一个全知中心统一设计。概念命名与现实权重可能不在同一时间出现，理论源头和功能源头也可能分离。A 理论解释文本，B 权重解释现实方向；二者的关系仍须通过时间、组织、资源和后果逐案追踪。B 结构可能在 A 概念得到命名以前就已存在。资源和组织关系可以先形成，传播和机会结构可以先稳定，后来才出现一个能够为它提供合法性和未来承诺的新主义名称。在另一种真实路径中，A 的目的独立产生，后来才与既有 B 结构结合并被捕获、重新赋位；独立起源不等于 B 必须晚于 A 出现，即使 B 在 A 形成时作为环境刺激或反对对象，也不等同于 A 在起源上为 B 服务。无论理论名称出现早晚，都不能直接等同于生成目的必然独立；具体属于哪一种路径，要由材料决定；不能预先认定所有案例都属于前一种，也不能用时间关系无法闭合的材料支撑模型。同时，起源上的独立并不能取消后期实际参与解释、动员与正当化的现实责任，但在缺乏具体参与材料时，也不能预设独立的理论必定承担此类后果。

判断时间先后，至少需要六方面的材料：A 概念何时形成，文本怎样自述，B 结构何时可以观察，B 是否改变资源、组织、传播、敌我或机会，A 是否因此取得特殊现实位置，以及是否存在反证和张力。只有这些方面得到最低限度的材料支持，“B 早于 A 并塑造 A”的判断才能成立；否则，二者的关系只能停留在并列、相接或尚待核验。最早观察到 B 介入的时间，不自动等于 B 结构开始存在的时间；B 在时间上的先在性以及实际发生的塑造，也不能单独证明 A 在形成时期就是为了 B 而生成，要证明结合已构成理论内部的构成目的，仍须依赖形成时期核心命题、判断次序与行动要求的相关材料。用

社会大模型中的高权重 B 维度解释 A 主义的诞生，并不等于诉诸阴谋论。B 维度可以使 A 主义获得某种现实方向，这种解释却不需要假设一群人从一开始就秘密设计了全部文本、组织和传播。

不预设一个全知中心，并不等于否认行动者、利益和责任。功能源头仍要追踪现实中的配置者、组织者、传播入口、资格授予者和敌我划分者，但不能把所有人合并成一个阴谋主体。这些人与 A 的关系可能各不相同：真诚地相信 A，利用 A，只是在 B 结构提供的机会中行动，或者在行动以后改变 A 的现实位置。

阴谋论把复杂关系压缩成一个全知全能的中心，权重差异也随之消失。它不再区分资源怎样分配、组织怎样接纳、传播怎样筛选、资格怎样获得、敌我怎样执行，而把所有结果一概归给秘密计划。这样的解释看似锋利，却不能证明现实功能究竟由哪些关系产生。权重优先于自述，A 文本不能自动决定 A 现实；功能源头优先，现实后果必须追溯到具体接口。这样的追问仍受证据边界约束：不能把未知补成全知，也不能把局部连接扩成统一计划。

八、三层比较、同源门槛与原教旨责任

理论自述和现实功能不能等量齐观。理论文本和现实后果不能放进同一张表里求平均，比较要分成三个层次。文本层关心概念从哪里来、目标怎样表述、理论内部如何连接；功能层追踪谁取得位置、谁获得资源、谁控制入口、谁划分敌我、谁改变机会；接缝层辨认文本与现实之间究竟是直接一致、间接连接、被捕获、被重新赋位，还是目前只能并列观察。

一个组织可以在文本中宣称为了人民，但如果资源和资格通过某些组织关系集中，文本本身不能取消这些后果。一个理论可以真诚地反对某种结构，却在现实中进入由该结构控制的资源和机会接口；这种真诚不能自动证明功能由理论决定。理论与功能之间的冲突不能在比较中被抹平。理论可以抵抗功能，功能也可以反过来改写理论，二者还可以在某一阶段暂时一致。整齐的结论不能以消除这种张力为代价。

功能同源不能凭相似语言判定。名称相近、口号相似、人物身份相近、传播时间相邻、某方从结果中受益，或者两个主义都反对同一对象，都不足以证明它们由同一个现实功能源头产生。需要纳入核查的证据范围包括：共同的组织接口或可追踪的连接，资源和机会的流动关系，传播筛选或采用的过程，敌我分类进入行动的后果，以及时间上的先后和反证。资源、传播、组织、敌我与机会这五类接口并非在每个案例中都必须全部齐备，但任何关于具体功能同源的判定，都必须证实其关键的实际连接，不能免除充分的事实证明；同时必须清楚说明哪条事实箭头被哪份材料证明，哪条箭头仍只是理论连接。

两个组织都使用某种语言，若材料只能证明这一点，结论就只能是语言相似。在此基础上，若还能证明它们共享组织位置和资源接口，便可以进一步判断存在组织连接。传播、资格和现实后果也形成闭合关系时，才可能讨论功能同源。这是依据材料层层递进的分析路径，并不意味着所有案例都遵循相同的发生顺序，更非必须先有相似口号。功能同源须由关键实际连接的证据裁定，不能凭理论直觉或

共同节点自动认定。同一案例内部的连续性尤其重要。不能用清初官署调用证明现代组织已经夺舍，不能用现代条例证明 1945 年工业接收具有后来理论名称，也不能把铁路军运、党校制度和平台分发拼成一个主体的秘密行动。不同案例可以模块化说明权重接口，但必须保留案例边界。

原教旨的观察方向由此发生改变。一个理论家可能写出最严密的 A 理论，却没有改变现实功能；一个不善于理论表达的权重者，却通过组织、资源和机会把现实推向某个方向。二者不能用同一把“理论是否纯正”的尺子判断。权重者并不因此获得道德豁免。现实权重越高，现实责任就越不能被文本自述遮蔽。理论的自洽程度再高，也不能凭漂亮的文本自动取得现实正当性。原教旨作为一个批判性概念，要打破的正是文本纯度对现实后果的遮蔽。

理论源头与功能源头分离以后，还留下一个更深的问题：旧的高权重结构是否在 A 完成命名和理论建构以前，就已经通过旧网络中的节点参与了 A 的问题设置、节点关系与收束生成？一个理论为什么可以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思想内容，其生成方向却仍可能指向既有的权重结构？要回答这个问题，既不能只观察 A 形成以后旧结构对它的进入、占位或功能接管，也不能把这些关系预设为必然依次发生的阶段；还要追溯 A 诞生以前的问题设置、节点关系与收束过程。旧结构怎样借新主义取得新的文本和合法性外壳，形成后的进入、占位与功能接管又怎样与持续的新主义生态相连，仍须依据具体机制和材料分别判断；这些关系彼此关联，却不能互相替代。这样的追问不自动等于秘密计划，也不允许把所有新主义一概判成交媾主义；权重判别本身还不能替代对生成、进入、占位、功能接管及人物和媒介连续线的具体核查。

第二十三章　权重优先论：理论源头解释文本，功能源头解释现实注释

[1] 社会大模型、不同维度权重、理论严密不等于现实原教旨、权重者优先以及 A 主义与 B 权重结构，属于理论分析命题：理论源头解释文本，功能源头解释现实；权重优先于自述展现的是实质权力结构的支配性，而非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一般中性差距。

返回正文

[2]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 2022 年 10 月 22 日通过，权威公开文本见共产党员网，2022 年 10 月 26 日发布：https://www.12371.cn/2022/10/26/ARTI1666788342244946.shtml。其中指导思想、组织原则、党员资格、组织关系、纪律和行动方向的正式表达，用以说明文本分类和组织接口的存在；该文本不能单独证明主观恶意、严格等权、完整代际循环或功能同源。

返回正文

[3] 工厂接收、鞍钢修复复工及旧人员留用编组，参见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鞍山钢铁厂早期建筑》（第十二章注 1）、新华社《一曲壮丽的钢铁史诗——鞍钢与共和国风雨同行 70 载实录》（第十二章注 2）与党史文献研究院《陈云在东北的革命贡献》（第十二

章注 4）；铁路接管与调度运转参见党史文献研究院《陈云与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财经工作》（第十二章注 3）及吕正操《回忆辽沈战役中的铁路运输》（第十三章注 1）。相关材料支持对应的对象—行动—结果箭头，局部节点不能外推为全部工业，接收事实亦不能直接等同于夺舍。

返回正文 1 · 返回正文 2

[4] 战时军运调度见吕正操《回忆辽沈战役中的铁路运输》（第十三章注 1）；军工生产、修械保障与武器来源见《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的东北军事工业》（第十三章注 2）与郭永学《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东北部队武器来源考》（第十三章注 5）；二线兵团组建与兵员输送见《罗荣桓》（第十三章注 3）；部队思想动员见《谭政》（第十三章注 4）；战役进程、军委急电与入关接管见《辽沈战役》（第十三章注 6）、《平津战役》（第十三章注 7）、《1948 年 11 月 17 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提早进行平津战役的指示电》（第十三章注 8）与《北平为什么能够和平解放？》（第十三章注 9）。材料证实了铁路、军工、兵员与战役行动的支撑链条。但战争进程受战略指挥、战场缴获与各方动员等多重条件共同塑造，工业基础并非单一决定因素；文献记载的经验过程亦不替代正文的理论论证。

返回正文

[5] 中央统战部 1948 年 9 月改名见《毛主席口中的“天书”是如何炼成的？》（第十六章注 2）；1949 年 11 月中央政府及部委设立党组见《新中国请示报告制度的历史考察》（第十六章注 3）与《毛泽东执政党建设思想述论》（第十六章注 7），所引均属后出历史叙述。相关组织设置、干部教育培训与监督程序等制度接口，见 2019 年《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第十六章注 10）、2019 年《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第十六章注 11）、2019 年《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第十六章注 13）、2020 年《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第十六章注 8）、2021 年《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条例》（第十六章注 14）及 2023 年《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第十六章注 12）。上述现代规范性文本未作截至 2026 年的全量效力核查，不能倒推为 1949 年原貌。具体条文或历史节点能够证明组织、传播和资格接口的存在，但不足以建立逐机构对应的满城结论。

返回正文 1 · 返回正文 2 · 返回正文 3 · 返回正文 4

[6] 落户门槛、居住年限及挂钩的财政奖励、城镇用地、公租房、租赁补贴、公积金、教育、医疗和项目补贴等配套政策接口，见国办发〔2016〕72 号通知（第十七章注 1、第十八章注 1）。该文公开页面标注失效，具体失效日期与依据未核，仅作为 2016 年历史政策文本使用；文件设立的激励与配套规范，不能证明相关利益在现实中已完全兑现。政策接口不证明全国统一资源控制。信息推送、检索过滤、排序精选和调度决策等技术治理规则，见 2021 年公布、2022 年施行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第十七章注 2、第十八章注 2）。此类规章属

于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规范，与正文阐释的政治比喻具有不同属性；规章层面的管理要求本身不能证明各平台在实际运行中落实的具体程度，亦不能直接推论平台拥有无边界的实际权重。

返回正文 1 · 返回正文 2 · 返回正文 3

第二十四章　交媾主义——旧权重怎样进入新主义

一、交媾发生在终点之前：A 为什么会以这种形式出生

设想这样一种在思想理论与政治结构中出现的类型化情形：一种带有全新名称、提出独立概念体系的新主义 A，出现于由既有主导体制或旧有支配力量所构成的高权重结构 B 之中。在现实运作中，A 的倡导者、阐释者与组织力量，可能借助 A 的名称、原教旨原则以及理论自洽性，为 B 提供解释、社会动员或正当化论证；然而，一旦这一结合过程导致了严重的社会伤害、挫败或其他需要承担的现实后果，理论解释者与相关组织便可能退回理论本体，将这些后果解释为外部误用、实践背叛或不可抗的外部捕获，宣布“真正的 A 从未参与”，其原初内核始终保持清白。借由这种在理论自洽与具体实践之间来回切换的退路，A 的相关组织与解释者得以在名义上维持清白、修复受损声誉，并在理论外壳掩护下保存力量，进而可能在适当时机再次与 B 结合。

这种免责说辞即便在修辞上达成自洽，或者在信奉者群体内部获得心理接受，也绝不意味着实际发生过的解释、动员与正当化责任在客观上归于消解。但如果仅仅将这种现象解释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一般差距，或者视作思想在传播中遭遇的后期扭曲，就会忽略其更深层的生成关系。免责回路所提出的核心问题在于：这个自称独立、纯粹的 A，究竟为什么会以这样一种特定的理论形态出现？

在通常的理解中，思想的依附往往被视为一种终点现象。人们往往假设，A 最初是在完全自主的脉络中被完整创造出来的，拥有不受污染的原初形态；只是在成形并进入现实之后，才由于外部诱惑、权力干预或利益交换，被既有的高权重结构 B 所利用、统战或接管。在这种理解下，“结合”仅仅发生在终点，是外在于理论生命的后期偶发事件。然而，真正需要审查的核心类型恰恰颠倒了这一观察次序：交媾并非始于理论成熟后的外部遭遇，而是发生在理论成形以前的生成过程之中。

核心类型的关键在于：在 A 完成命名、形成系统理论、成立独立组织或宣告精神独立以前，B 的需要是否就已经实质参与了 A 的孕育。若 B 所面临的解释困境、正当性危机、动员瓶颈或组织障碍，在思想尚未凝聚成型时就已经进入了理论的问题设置、价值排布与行动方向，那么，即便该理论随后拿出了全新的概念文本、完整的原教旨教条以及外观上独立的组织建制，这些外在独立性表象也根本不足以自动证明其生成目的与实际判断的独立。外壳的形态无论多么崭新，都不能单凭形态本身切断其深嵌于旧网络中的形成史与责任链。

因此，这一类型不能与通常意义上的思想融合、文化杂交、普通联盟、临时合作、组织统战或后期功能接管直接画等号。思想融合意味着两套概念体系在文本层面的相互启发与范式整合；文化杂交指不同传统在符号与生活方式上的混合；普通联盟是不同行动者为了有限、阶段性目标而展开的公开协同，合作的存续并不决定它是否演变为长久的功能控制；临时合作可以在具体任务完成后告终；组织统战是一个组织对另一个既有组织进行争取、吸纳或管理；而后期功能接管则发生在既有形态定型之后，意味着其现实方向与结算权在后续运行中持续发生转移。交媾主义所指向的核心生成机制则截然不同：当新主义尚未定型、仍处于创生阶段时，旧的高权重结构便已通过旧网络中的现实关系进入其内部，直接参与筛选其关注的问题、理论内容与演进脉络。在这种机制下，新的名称、独立创作的真实理论体系乃至真诚信徒都可以客观存在，但旧权重所带来的生成性收敛，早已内化为新主义形成过程本身的一部分。它并不是等新主义定型后才从外部介入并改造其实际功能，而是从一开始就嵌入其中，在形成起点上规定了它的生成方向。至于这一生成方向在定型后如何转化为具体的现实功能，则留待后续关于现实接口的章节再作展开。

高权重结构 B 并不必然需要通过公开压制来延续自身，也无须将自己的旧概念原封不动地搬进新文本。相反，它能够通过自身维系的社会网络，在新主义外壳孕育之际便介入其筛选过程，使新主义在未完成确立前便向契合 B 之需要的方向收敛。要理解这种发生于终点之前的结合，就需要将目光投向理论生产之前的社会网络，剖析分布于旧网络中的节点，是在何种权重视野下提出问题并确立核心方向的。

二、旧网络、旧节点与 B 的高权重

思想的提出者、理论体系的加工者以及最先响应学说的群体，在着手构建新理论之前，首先是处在既有社会辨异网络中的具体节点。所谓旧节点，不等于 B 的组织成员，更不等于 B 的自觉支持者。在可以观察的机制中，旧节点通常指身处旧有制度关系、受制于既定语言环境、依靠特定资源分配渠道，并在日常经验中感知既有秩序压力的行动者。行动者主观上反对 B、批评 B，并不意味着其现实关系已经自动脱离了孕育其思想的旧网络。

若将社会理解为一个拥有无限多维度的大模型，各维度的权力与影响分布从来不是均等的。B 主义在该模型中长期占据高权重维度，它不是思想文本列表中并列的普通观点，也不是行动者可以任意剥离的抽象理论。高权重表现为一种关系场，决定着现实运作中的阻力与推力：哪些词汇更容易获得合法身份，哪些表达更容易跨越制度入口，哪些诉求更容易调动资源，哪些组织形式更容易获得安全庇护，而哪些敌我界线更容易被公共权力所确认。

高权重并不预设每一个行动者主观上都崇拜 B，现实中也未必存在一个能够随时命令所有人的指挥中心。这种权重的运作往往是非人格化与弥散的，主要表现为结构条件与成本收益的落差：在旧网络中，某些类型的理论提问更容易打开机构与社会入口，而另一些提问方式则面临阻隔；某些立场的阐发能够在现实评价中获得传播支持，而另一些立场哪怕逻辑完整，也容易面临资源匮乏与制度排斥。高权重维度正是通过这些日复一日的差别机制，在理论生产完成前，对网络中的节点施加了引导。

高权重先于 A 而存在，思想生产的选择条件在起点处便已受到结构性影响。旧节点在现实中所遭遇的矛盾感与匮乏感并非均匀分布。当 B 面临某种制度梗阻或治理困难时，某些矛盾会被急剧放大。理论生产者在试图寻找解决路径时，其所使用的概念工具箱、所能参考的语言材料以及预判方案可行性的现实参照，往往来自旧网络的供给。高权重不是在文本写成之后才挑选成果，而是在思想最初确立问题意识、排列价值次序、界定行动边界的萌芽时期，就通过改变思想生产的条件，影响了哪些方案能够持续发展，哪些方案难以维系。

这里有四个不能直接画等号的层次：

第一，个人主观动机，特指创立者或理论生产者个人的意图、心理动机与自我期许；

第二，生成条件，指涉 A 在历史上赖以形成、展开并获得现实立足点的具体社会与制度环境；

第三，构成目的，特指那些实质进入该理论核心命题体系、价值判断次序以及行动要求的方向性设定；

第四，实际功能，即理论在介入具体社会关系与历史进程中所产生的客观作用与后果。

这四个层次相互关联，但在论证逻辑上绝不能直接画等号。唯有掌握确凿的创立文本、明示立场或具体的组织建制材料时，才能对个人主观动机展开实证判断，断不可在材料不足时预设所有参与者共同知情。个别行动者的真诚信仰，不能直接用来证明理论在结构上的独立性；反之，若个人意图缺乏直接依据，分析的重点必须落实于材料所呈现的社会收束初衷与构成目的，绝不能依据后期的实际功能反向推断所有参与者一开始就怀有共同的私人预谋。

生成条件的广泛性并不等同于构成目的的依附性。B 在时间上的先在性，以及 A 孕育于 B 所支配的网络环境这一事实本身，不足以单独推导得出“A 必然为 B 而生成”的结论。在完全相同的旧网络与高权重环境下，同样可以产生激烈反对 B、旨在瓦解 B 之合法性基础的思想脉络。因此，时代共存、处于同一语言氛围、借用相似词汇，乃至事后发生过单次合作，都不能构成判定 A 之构成目的依附于 B 的充分依据。

要确立旧高权重结构确实参与了新主义的核心生成，必须越过泛泛的环境描述，拿出具体的机制证据，指认出：B 所面临的具体解释困难、正当性危机、动员瓶颈或组织障碍，究竟通过何种可复核的中介路径，被网络中的节点吸收，并转化为 A 的核心命题、行动规范与敌我边界。若无法建立这条具体的因果桥梁，依附的断言就只能停留在理论假说层面。

三、生成性收敛：A 尚未完成时，方向如何形成

从旧网络中的分散节点，到最终形成一套冠以 A 之名称、具备自洽逻辑体系的成熟学说，经历了一个生成性收敛过程。收敛不是在 A 完整形成之后被动接受的修剪，而是在 A 尚未完成命名、未完成系统化与组织化之前，就已经在理论体内展开的定向过程。

这一生成机制不以密室中的总导演为前提，其展开往往是分散的。起初，面对 B 的高权重结构所带来的社会危机，散布于网络各处的节点基于自身处境提出形形色色的表达、方案与抗议。在初始阶段，

思想表达通常杂多且互有分歧：有的主张退回更早的形式，有的试图建立激进断裂，有的则在既有秩序缝隙中寻找修补空间。然而，分散的表述若要摆脱自生自灭的状态，就必须争取公共可见性、寻求组织化可能，并获取维系运作所必需的生存资源。

此时，旧网络中由高权重所决定的筛选机制开始发挥作用。其因果链条表现为几个相互交织的层面：

首先是问题维度的收敛。在众多社会矛盾中，哪些问题被确立为核心议题，受到现实环境的深层塑造。B 所面临的现实匮乏具有强烈的牵引力。例如，当 B 在解释体系上遭遇危机，需要新的动员与整合语言时，那些呼应这种需求、将注意力引向 B 所许可之议题的提问方式，更容易获得制度入口与传播资源；而那些直指 B 核心利益前提、试图彻底瓦解 B 之合法性的提问方式，则更容易遭遇制度阻碍与资源匮乏。分散的思想首先在问题优先次序的选择上面临 B 之现实环境的筛选。

其次是内容与方案的竞争收敛。针对筛选出的问题，不同的理论雏形会提出不同解答。在竞争过程中，方案能否延续，不仅取决于文本逻辑是否严密，更取决于其面对现实反馈时的生存能力。若某些方案坚持完全不妥协的对抗立场，在现实中可能失去活动空间与资源支撑，面临传播受限与组织萎缩；而另一些版本在核心表述上进行了权衡，创造出一套新词汇，既保留了批判姿态以吸引支持者，又在关键行动逻辑上避开了对 B 根本秩序的实质冲击，甚至能够替 B 承担某些原体系难以完成的社会整合功能。这类版本更容易获得安全空间与资源支持，从而在组织化竞争中逐步胜出。

最后是核心命题与行动方向的固化收敛。随着获得现实回报的版本持续扩散，分散的思想表述经由理论阐释者的系统化整理，逐步被固定为 A 的核心教条。在这一固化过程中，那些在前期尝试中被证明具有高风险或难以兑现资源的命题，往往被实质删除、推迟或降格为无关紧要的局部修辞；而那些能够换取合法性与支持的表述，则被置于核心位置。当 A 最终完成命名、宣告独立成立时，这一理论体系实际上已经在生成过程中完成了向 B 之根本利益的收敛。

节点、问题、内容、生成方向和现实功能上的收敛并非一回事，可以从五个层面分别观察：

其一，节点收敛，指多个行动者在某一社会辨异维度上受外力影响彼此靠近，呈现为宏观上的集体投影，但这不等于所有行动者具有共同的主观意图；

其二，问题收敛，指分散思想越来越集中于某些被高权重环境放大的优先议题，但这不等于这些议题仅因时代共存而天然重要；

其三，内容收敛，指某些特定概念与价值判断在反复筛选中进入核心体系，但这不意味着新理论只是旧文本的简单复制；

其四，生成方向收敛，指不同表述在冲突与取舍中，最终将行动要求与敌我划分导向了有利于 B 维系其秩序的方向，但这不能单凭事后的客观受益来直接倒推；

其五，功能收敛，指 A 在成形并投入实践后，其客观效果与 B 的既有秩序发生咬合，但这一后期结果不能倒因为果地等同于起源目的。

在交媾主义的核心生成类型中，有一项强命题：“A 的所有内容都会在 B 造成的环境收束。”这里的“所有”涵盖 A 体系中的全部内容，从核心命题、伦理规范和概念建构，到局部批评与议题取舍；它们都处于 B 造成的环境收束之中，最终朝 B 的根本需要、敌我边界与利益次序归拢。这里说的是生成方向和内容取舍，不等于 B 独自创造每一项思想，更不表示 B 在幕后预写 A 的每句话或全知控制。A 的理论创造可以真实，论证可以严密，信徒也可以真诚；这些事实与 A 全部内容在社会生成方向上向 B 收束，并不矛盾。

这一机制首先作用于问题设置的边界。哪些现实困境被感知为必须回应的核心命题，哪些经验被降格为无关紧要的边缘材料，在思考展开前就已受到 B 造成的处境与敏感边界的塑造。A 的思考者正是在这个经过剪裁的问题场域内，展开概念推演与体系建构。在此边界内部，不同派别完全可以就理论路线、概念语言、行动时机展开激烈争论，甚至公开批评 B 的局部做法，形成互相对立的解释方案。尽管具体竞争过程仍受学理逻辑、人员交互等多维因素的共同作用，无法简化为单一的资源或传播关系，但 B 造成的环境持续影响着各版本的发展机会与淘汰、固化方向：来自现实环境的反馈能够直接改变思想的传播通道、组织形态、资源条件与持续空间。理论探索者面对这些实际边界，往往依据 B 的现实反馈调整重心：凡是能够顺应 B 设定的环境要求、兑换合法资格并化解生存风险的阐发，便更容易获得顺畅的传播条件、组织承载与持续累积的解释权；凡是偏离这一方向、无法兑换甚至带来组织代价的创造，即便逻辑自洽，也极易被删除、推迟、改写、降格为无约束力的附缀，或在缺乏资源与响应的孤立中被逐渐淘汰。随后，A 的组织程序与解释规则会跟进固定胜出的版本，通过文本编纂、概念界定或正统追认，将派别竞争的结果确立为体系的标准内容，并不断剔除越出边界的异端枝蔓。

即便 A 内部保留下来的局部批评与自我修正，也必须经过同一套机制的筛选与定型。这就要求严格区分两类性质截然不同的批评：一种是修补型批评，它仅针对 B 在具体运行中的局部瑕疵，客观效果是替 B 提供化解危机的替代方案，实质上构成了维持秩序运转的内部调节；另一种则是约束型批评，它直击 B 的核心权力前提，试图确立独立的行动边界并在实践中切实限制 B。将修补型批评直接视作独立的证据，或是武断地把一切约束型批评断定为策略伪装，都会偏离事实判断。

一旦争论触及 B 的根本目标，真正的检验便在于冲突节点上的取舍：体系究竟允许谁作出让步？关键在于，A 究竟是为保全 B 而修改原则、重释材料、重新划定敌我，使判断重新回到 B 的方向，还是 A 凭借自身原则真正限制或改变了 B。如果材料显示，面对潜在冲突，解释程序所做的是调整 A 的原则表述、重新解释相关文本与经验材料，并依照 B 的政治需要重新划定敌友，从而将本可构成实质约束的伦理要求降格为无害的抽象修辞，保全 B 的根本诉求与垄断地位，这就证明收束已经渗入理论核心。相反，反向路径必须保留同等的判断效力：若有确凿的经验材料证明，A 的伦理原则在特定阶段切实构成了刚性边界，真正限制了 B 的权力行使或改变了 B 的行动方向，就必须据此承认其真实自主，并严格限定依附判断的适用时期。

从问题设置、资源与传播反馈，到组织程序与冲突节点的取舍，B 所构成的高权重环境并非在 A 定型后才从外部介入，而是从其萌芽、问题形成、节点互动、取舍筛选直到理论命名与定型都持续在场。

在交媾主义的核心生成类型中，A 的所有内容都会在 B 造成的环境里收束，并朝 B 的根本需要、敌我边界与利益次序汇聚。不过，这种收束方向并不等于 B 独占了每项具体思想的创造来源，也不意味着 B 逐字预写了文本、实施了全知控制，或所有行动者都在统一密谋与共同知情中行事；相反，具体历史对象的判定，仍须依赖其形成时期的文本、决定、关系链与行动取舍证据。正因如此，A 完全可能包含真实的理论独创、激烈的派别争论、尖锐的局部批评以及真诚的信徒，这便引出了一个更深的问题：A 为什么能够作为真正的 A 而存在，却依然从起点上朝向 B。

四、A 为什么是真正的 A，却仍从起点朝向 B

在前述生成机制下，存在这样一种结构状态：就核心生成类型而言，新主义 A 可以拥有真实的独创性与理论自洽性，信徒也可以发自内心信奉，但它在社会层面的生成方向与构成目的，却在起点处就已经朝向高权重结构 B；至于它在后续历史进程中实际承担的现实功能，则是在进入具体社会关系与制度运作后产生的作用，二者密切相关，却属于必须分别核验的不同层面。

理论文本的自述无法自证其现实源头。理论源头解释文本的概念取向，功能源头解释学说立足于现实的权力支点。后来出现的 A 主义完全可以使用一套全新的词汇，构建内部自洽的理论体系，在价值宣示上与既有意识形态拉开距离，甚至在文本中明确否认与 B 主义有关；从文本生产层面看，A 主义的理论确实是 A，也是为了 A。

理论自洽不等于现实控制力。完善了 A 主义语言的理论家，未必决定该学说在社会中取得何种位置；信奉 A 主义的群体，也未必掌握其赖以生存的资源配给、传播加权与组织许可。但在因果判断上，必须严格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接口事实：一种是在 A 尚未完成命名、理论尚未定型之前，B 所支配的接口就已经介入了节点存续、问题筛选与核心命题的塑造；另一种则是 A 在形成之后，在现实存续与扩展中围绕 B 所支配的接口运行。前者属于能够证明起源生成方向与构成目的的形成期证据；后者则直接证明相应历史时期的现实依赖与功能关系，绝不能离开形成期材料，仅凭现在的接口依赖就单独倒推其起源生成方向必然依附于 B。

因此，不能将功能依附简单等同于主观虚伪。交媾主义不预设新主义的理论家必然在说谎，也不认定信徒的信仰一定是伪装。新主义完全可以拥有真诚信徒：他们真诚地相信其理论，践行其伦理，为理想付出代价，并真诚地反对 B 所表现出的现实弊端；理论家在推演概念时，也可能完全沉浸于纯粹的理论探索。

主观真诚回答的是信仰与动机层面的真实性，但不能直接证明该学说在现实中的功能权重来自何处，不足以证明新主义在结构上完全独立。不能用主观层面的真诚取消宏观层面的结构功能；反之，也不能为了强调结构功能，而将行动者的主体经验统一抹黑为虚伪的阴谋。真诚与工具性、理论的独创与功能的从属，可以在分层的现实中同时存在。信徒的真诚往往能够产生纪律、牺牲与动员力，从而使 A 具备了可被旧权重调用的现实能力。

正是在这一核心生成类型中，存在这样一种结构状态：

“A 主义的理论是 A，也是为了 A；但 A 主义的初衷和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与 B 主义交媾，与它在理论中的描述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这句话的前后两部分具有严密的层次区分：

前半句“A 主义的理论是 A，也是为了 A”，肯定了理论在文本层面的自洽性、概念生产的独创性，以及理论家在主观追求上的内部目标，排除了将所有新思想一律斥为粗陋傀儡的庸俗预设；

而后半句“但 A 主义的初衷和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与 B 主义交媾，与它在理论中的描述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则是对该核心类型之社会生成方向的强判断。

这里的“初衷”，不是指某个理论家或组织者的私人意图，也不预设参与者之间存在共同知情的阴谋。它指 A 在社会收束中显现的起始方向：B 造成的环境使分散节点从一开始便围绕某些问题、价值次序和行动方向展开思考，并在现实反馈中相互筛选。把这种起始方向改写成某个人私下策划，是对这一理论的误读；把它当作生成条件、构成目的或实际功能的替代名称，同样会混淆不同的证明层次。个人主观意图需要创立文本、明示立场或组织安排等直接材料；构成目的要由形成期核心命题、判断次序和行动要求中的定向让步来认定；实际功能则须依据客观后果另行判断。

相应地，原句中“A 主义的理论是 A，也是为了 A；但 A 主义的初衷和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与 B 主义交媾，与它在理论中的描述根本没有任何关系”所说的“最终目的”，同样是针对这一核心生成类型在社会生成层面的强判断：它不是指参与者预先知晓未来的一切历史细节并按私人剧本行事，也不是事后实际功能或某次事后受益的同义词，而是指在 A 的形成过程中，这种同社会收束的初衷相贯通、向 B 收束并与 B 交媾的生成方向，已经作为终向内置于其核心命题、价值次序与行动要求的构造之中。只要这一核心构造在起点上如此定型，其内在生成方向所锚定的社会终向就是与 B 结合，而不取决于它在后续某一次具体历史冲突中呈现为何种固定的实践结局。要认定某一具体对象在起点上具有这一内置的最终目的，依然必须拿出形成期核心构造如何被定向塑造的材料，而不能仅凭后期的客观功能结果逆向指认。

正因如此，“与它在理论中的描述根本没有任何关系”这一断言，并非指理论文本中的具体命题与行动号召不能参与解释、动员与现实后果——相反，理论正是凭借这些内容来动员人群并介入现实的。该断言所否定的，是理论表层宣称自身具有纯洁起源、绝对独立性与道德清白自述的效力；文本的自我描述不能决定其现实生成方向，也不能洗掉其现实依附与历史责任。

思想可以互相借鉴，概念可以互相影响，理论家可以阅读彼此的文本，这些现象本身不能证明旧高权重结构已经进入新主义并改变其现实功能；文化外观、语言混合和符号重组都可能出现，但它们同样没有回答谁获得现实加权，也没有回答谁决定组织位置、资源路径、敌我边界和机会后果。共同敌人、共同口号或共同利益只能作为待查线索，不能自动构成交媾主义；“最终受益”也不能直接等同于交媾主义。一个结构得到好处，既可能是过程造成的结果，也可能只是意外；不能因为它受益，就倒推出它从一开始设计了全部过程。更强的判断要靠功能源头和权重接口来证明，不能只看利益最后归了

谁。对于某一原本并非如此生成的思想，在成形之后才在现实接口中被高权重结构纳入、塑形或实施功能接管，则属于与之相关但性质不同的后期现实关系。判定核心生成类型，终究要追查形成期的因果链条、功能源头与现实接口；对于后期捕获、塑形或接管等不同形态的现实关系，无需在此强行裁定广义或狭义的定义之争，而应依据相应时期的材料另行核验，不与核心生成类型直接混同。

新主义的自主性不是非此即彼的开关。通过上述过程，新主义往往在既有高权重结构中完成“占位”。所谓“占位”，并不意味着新主义已经完全停止变化，而是指它在现实结构中取得了一个持续位置。这个位置可能带来传播优势、制度合法性、组织保护、资源供给或道德高地。取得占位之后，新主义仍可以继续写作、争论和发展，理论家也可以相信自己正在独立创造，社群内部也可以保有特定的伦理实践与建制形式；但它已不再只是文本中的可能性，而是在既有权重场域中承担现实功能。也正因如此，占位本身以及成形后的接口依赖，只能说明该主义在相应结构中的现实位置与功能状态，不能独自证明其起源阶段的生成目的；而旧权重的需要究竟怎样在终点之前介入新主义的孕育，并在其成形取得持续位置后继续转化为现实能力，则需要进一步落实到五类具体的现实接口中展开考察。

五、五类接口：从思想生成到现实延续

高权重的旧结构进入新主义，既不表现为旧文本对新文本的逐字覆盖，也不依赖一个能够命令所有行动者的中心。旧权重是通过具体的现实通道发挥作用的，这些通道体现为五类现实接口：资源、传播、组织、敌我划分以及机会分配。五类接口不能被简单缩减为新主义成形之后从外部临时借用的工具；若把接口仅仅理解为理论完成后的现实化手段，就会忽略旧社会网络在思想形成期即已展开的筛选与塑造。

接口贯穿了新主义从潜在萌芽到现实延续的过程。在思想的生成期，接口作为条件先在存在，影响着旧网络中哪些节点能够持续从事理论劳作，哪些现实问题被优先确立为理论必须回答的核心议题，哪些概念表述能够在竞争中保留下来，以及何种伦理边界在理论构架中被逐步确立。当新主义完成命名、建立自洽逻辑并形成群体认同之后，这五类接口又作为现实通道，为其动员人群、介入体制、配置资源与处理分歧提供实际能力。生成期的筛选与形成后的调用彼此关联，却不是一套固定的五阶段演变程序。在具体脉络中，接口可以交错展开、局部缺失乃至中途断裂；但正是这些接口在不同环节上的具体铺设，构成了旧网络将新主义引向生成性收敛与现实结合的通道。

资源接口

思想的生产并非脱离具体条件的抽象活动。一种思想主张要从分散的表述凝聚为成体系的理论，乃至进一步凝聚为具有稳定行动能力的群体，需要依靠可以调用的现实承载条件。这些条件构成了具体的资源接口：从事思考与写作人员的生存供给、专业岗位、体制资格、聚会场所、社会身份、技术支持、安全边界、资助以及维系群体交往的纽带。审查一种新主义为何呈现出特定的理论面貌，不能仅停留在文本内部的概念推演，还需考察是谁提供了让理论生产者留存下来的条件，是谁使其在竞争中获得

持续讨论的机会，又是谁为其组织信徒、深化论证提供了现实环境。资源接口的存在表明，新主义的存续与扩大不仅取决于逻辑的自洽，也受到社会资源配置结构的约束。

在思想尚未完成命名与系统定型的生成期，资源接口首先通过筛选哪些思考节点能够维持持续生产，介入了 A 的孕育。面对 B 所经历的解释困境或治理危机，旧网络中原本散布着指向各异的初步探讨；但理论构想若要从零散议论沉淀为成体系的概念框架，离不开岗位、场地、资助、出版通道与人身安全边界的支撑。当这些基础条件按照旧权重的容忍度与需求次序分布时，那些直指 B 之根本权力前提的探索，往往在草创阶段便因失去教席、缺乏载体或承受生存压力而中断，难以完成概念锤炼与同道聚合；相反，那些能够回应 B 的现实焦虑、将问题限定在既有秩序可承受范围内的节点，则更容易获得稳定的治学时间、研讨空间与协作网络，在反复讨论中淘汰高风险表述，将适配资源边界的命题固化为核心教条。及至 A 完成理论定型并确立学派标识之后，这套资源接口便进一步转化为维持其团体日常运转、吸纳追随者与扩大再生产的持续供给链。

交媾主义所依托的持续资源链，不能与普通赞助混为一谈。普通的社会赞助通常是有限、单次、局限于具体技术事务或特定目标的资助行为；赞助完成之后，赞助者与理论生产者之间并不必然形成结构性的支配关系。交媾主义所依托的资源接口，改变的则是新主义得以持续再生产的基础条件。旧高权重结构未必直接以公开名义向理论生产者发放指令，往往只需将新主义引入一条业已按照旧权重次序排定的资源链条之中。在这一链条内，岗位的获得、课题的设立、刊物的准入、研讨的资质以及安全边界的确认，均与某种方向性偏好相联系。新主义可以使用全新的批判性词汇，可以对现实体制的某些低效与弊端展开指责，甚至可以在文本中否认与 B 主义有关；然而，只要维持其学派延续、群体聚合、文本传播的关键资源来自这套由旧权重主导的网络，旧权重便已经进入理论的现实依托之中。

这种资源给予的方式，在深层塑造了行动者之间的主人—依附关系。新主义如果只能依赖旧权重所衍生的制度空间与物质供给来获取存在资格与安全保障，其现实能力就会受到资源主人的结算逻辑制约。主人—依附关系不一定表现为直接命令，在很多情形中表现为条件化服从。置身于旧网络中的理论生产者，通过求职、申报、审核与交往反馈，能够体会到哪些论题更容易获得支持，哪些阐释策略能够减少阻力，哪些根本边界不宜触碰。这种适应过程完全可以表现为学理自觉或策略调整。行动者主动避开可能导致资源链断裂的方向，将理论边界限定在旧结构所能容纳的区间内。这种主动适应并不意味着理论家是在伪善演戏，但表明旧权重已经作为关键条件参与了思想生产的环境构建。

资源接口的客观存在，并不否定新主义内部真诚信仰与理论独创性的真实性。理论家可以真诚地坚信自己提出的原则具有普遍意义，信徒也可以将获得的活动场所、经费视作践行理想的必要工具，并在主观上认为自己是在利用外部条件推进正当事业。然而，功能分析需要考察客观的关系与后果：相同的资源是否向不同立场开放？获得资源保障的前提，是否包含了某种特定的态度表达或对既有秩序的服从？当理论原则与资源提供方的根本逻辑发生冲突时，究竟是理论促使供给者改变，还是理论解释者通过修改表述以维系资源的持续结算？真诚的主观信仰不能直接等同于功能上的独立；同样，识别出资源依附，也不等于可以把理论生产直接还原为主观阴谋。

资源接口还会影响新主义内部不同理论版本之间的竞争。在学派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多种主张：有的版本擅长将资源接口的规制转化为自身学说的策略阐释，从而既保留理论的形式，又维系生存资源的流入；而另一些版本可能坚持严格的原则边界，拒绝接口妥协，结果在缺乏支持与阵地的情况下难以扩大影响。然而，在经验判定中，不能将“在资源竞争中胜出”直接断定为功能篡夺，也不能将“在资源匮乏中边缘化”直接认定为绝对纯正。性质的判定取决于资源链条具体如何重塑了理论的敌我边界、组织程序与行动归宿，必须依据形成时期的材料对理论版本的关系作出具体判定。

传播接口

思想若要走出有限的范围，形成具有广泛社会动员力的潮流，需要越过传播接口的门槛。传播接口不仅是传导渠道，还影响着哪些内容能够在公共空间中获得高频次的反复出现，由哪些群体接收，又在何种语境中被阐发与理解。即便某种新主义拥有自己的文本与传播者，其在整个社会场域中的可见性次序，依然可能受到由旧高权重结构所影响的媒介机制制约。在这一机制的作用下，某些局部批评可能被允许公开讨论，而那些触及权力垄断、资源分配实质与旧网络根本利益的批判，则可能受到限制，难以进入主要的公共视野。传播范围广，并不自动意味着传播受到操纵；被广泛看见，也不等于被完全控制。

在 A 尚未凝聚为统一学派的生成期，传播接口通过初始可见性的差异分配与公共议题的筛选，直接参与了理论原型的淘汰与定型。散落于旧网络中的早期论述往往杂多而分歧，哪些提问方式能够走出小圈子、被确立为值得严肃对待的中心议题，取决于既有刊物、讲坛、学术评价与公共媒介的准入尺度。那些在批评姿态下恰好能够替 B 分担解释压力、将公共注意力引向体制许可议题的理论雏形，更容易获得反复发表与公开讨论的机会，在高频次呈现中汇聚回应者、吸引早期信徒，并借由公共反馈不断修整自身的概念边界；而那些拒绝这套语境规训、触及旧权重核心禁区的早期版本，则往往在尚未形成稳定概念群之前就被阻隔在低可见度状态，因缺乏公共交锋与迭代空间而难以进入正在成型的正统谱系。待到 A 的名称与基本教义正式确立，传播接口便由生成期的定型筛网延展为放大特定阐释、实施话语再编码并调度社会动员声量的现实通道。

重复本身能够改变认知与接受度。当一组概念、一套话语模型在公共媒介中被反复使用，受众容易赋予其重要性；一个原本存在争议的理论预设，在长期的重复呈现下容易被接受为无需多辩的前提；而被反复命名的批评对象，也容易在认知中被固定为理应受排斥的目标。高权重 B 未必需要直接删改新主义的原始文本，只需通过传播可见性的调节，让新主义中有利于自身正当化、有利于动员的部分获得更多展现，同时使可能威胁自身地位的论断处于低可见状态。现实功能的偏移，往往正是在这种可见性的差异分配中逐步发生。

新主义进入传播接口后，往往伴随着两个平行的过程：一方面，新主义运用自身的概念建构叙事、生产理论以表明自身的主体性；另一方面，传播结构依据既有权重对这些概念展开再编码。再编码通常表现为语境调整：新主义具有批判性的多义概念，在传播机制中被剥离对抗性内核，被重构为可以在

既有体制内流转的改良方案、文化符号或道德表达。理论家可能反对这种简化，但在社会层面，产生动员效能并转化为实际影响的，往往是那个经过再编码、易于兑换认可与资源的简化版本。

这种传播筛选同样会影响新主义内部的学理竞争。理论生产者的分歧表面上是概念严密性与逻辑说服力的比拼，但在现实中，往往也涉及对传播渠道、发表阵地与公众注意力的竞争。那些在表达方式上亲和旧高权重话语系统、善于运用既有习惯表述、将体制矛盾转化为安全议题的理论版本，通常更容易传播；而坚持原则且对抗意味浓厚的理论形态，即使论证严整，也可能停留在低权重状态，难以转化为现实行动。但必须注意，传播上的优势并不自动构成旧权力全面控制新主义的充分证据。广泛传播可能源于媒介环境的偶然变化，也可能源于思想本身的表达感染力。传播机制改变了不同版本的现实收益率，这是一个可以观察的机制；但要断定是否形成功能控制，仍须结合组织实体与资源配置的具体结果予以审查。

传播接口还包含时间延迟的特征。在一种新主义外壳初次出现的历史阶段，其在传播中的扩展可能被视作思想潮流或学术创新，其深层的政治与社会后果未必立即显现。然而，随着传播所带来的可见性、认同者与社会联系积累到一定程度，一旦外部环境发生变动，这套已被广泛接受的语言符号就可能被调用至现实的观念划分与利益结算之中。不能因为某种新主义在早期传播阶段未曾显露依附性后果，就否认其后来被旧权重借用的演变过程；同样，在缺乏经验证据时，也绝不可凭空倒推，将后期的传播结果断言为从一开始就已确立的预谋。

组织接口

文本即便获得了资源供给与广泛传播，若不能转化为稳定的组织形式，依然难以形成持久的行动。新主义唯有通过组织接口，进入学校、研究机构、媒介实体、社团组织或行动网络，才能将思想转化为持续的现实力量。思想一旦进入组织化阶段，就必须处理一系列程序规则：成员资格的认定门槛、领导人员的产生机制、内部层级与纪律规范、日常资源的分配权限、对外代表权的归属，以及发生学理分歧或行动失误时的裁决程序。新主义可以保留其独创的组织名称、仪式与共同体认同，但组织接口要求审查的是：在具体的制度情境中，究竟是谁掌握着该实体的最终决定权。

在分散思考向成熟学说过渡的生成期，组织接口通过规训早期聚合形式与裁定正统解释权，塑造了 A 得以成型的制度骨架。一种思想在未定名、未定型之前，往往并存着多个非正式讨论圈与竞争性的理论草稿；究竟哪一派阐释能够成为公认的“真正的 A”，哪一套文本能够升格为共同体纲领，需要依靠具体社团、教研室、编委会或行动网络的程序确认。在旧权重主导的制度环境里，那些在章程设计、骨干遴选与日常联络上顺应既有管理程序、对外部治理要求留有协调接口的早期团队，更容易取得合法注册、固定阵地与结社许可，进而凭借组织化优势垄断经典编纂、词义裁定与成员吸纳的标准，将拒绝程序妥协的激进或独立分支排除在正在固化的核心体系之外。当 A 依靠这套程序完成建制并宣告自立后，组织接口便顺势延续为日常纪律维持、代表权垄断以及在关键时刻与旧权重对接行动指令的实体架构。

当新主义完成组织化并投入实际运作后，交媾主义揭示了一种不同于普通合作的共生机制：新主义的组织实体成为旧权重可以调用的现实接口。普通的组织合作只是两个独立主体围绕特定目标展开的协同，权利义务明确，合作可随目标完成而结束；而交媾主义中的组织接口，则意味着新主义的动员网络、归属感与执行力量在关键功能上被纳入了旧权重的运行轨道。这并不要求旧权力直接撤换新主义名义上的负责人，也不要求公开干涉其内部事务。新组织的负责人可以继续主持会议、发表独立阐述、依据内部章程发展成员；但在关乎成员资格审查、立场站队、资源划拨等关键节点上，该组织所执行的可能正是旧权重的优先次序。这种自主感与功能依附的并存，使得交媾主义不同于直接的行政吞并。

在这一组织机制中，真诚信徒的信仰不仅不是借用外壳的阻碍，反而可能成为维系这种关系的条件。真挚的信仰能够激发成员的付出精神、组织纪律、传播热情与互助支持，组织由此聚拢起具有行动力的人群。信徒越是坚信自己正在为独立的理想奉献，在执行组织决定时往往表现得越坚定。而这种行动能力一旦在组织接口上被少数掌握协调权力的环节对接到旧权重的目标上，就会产生明显的现实作用。将真诚信仰贬低为主观伪装是不符合实际的，而把组织的结构性借用直接等同于全员知情的密谋也是缺乏证据的；真诚的信仰主体与被重排的组织功能属于不同维度的现象。

将任何进入既有制度或寻求合法生存空间的组织行为一概判定为功能依附，是理论分析中必须防范的简单化倾向。任何思想若要在现实中立足，不可避免地需要获取合规资格、场所与沟通渠道。判定组织接口是否演变为功能接管，必须依据具体的程序证据，核验关键指标：何种立场的人能够进入决策核心；对外代表资格与交涉权归属于谁；组织积累的资源在关键时刻流向何处；当理论原则与旧权重的实际利益冲突时，由谁的解释终结内部争议；在危机发生时，组织程序是保护原则还是保全外部通道；以及组织的成员构成与实际取向是否呈现出朝向旧权重的持续调整。

与此相对，组织完全保有主动拒绝接口的可能。某些新主义组织在获得合法空间与外部资源后，依然通过程序与内部原则抵御外部权力的干预；它们可能在具体事务上达成有限妥协，但在关乎核心纲领、成员保护与独立判断的防线上保持自主。这种组织抵抗是检验交媾主义边界的重要依据。不能把一切现实接触都判定为功能依附；只要组织在关键结算环节依然能够维护自身的自主决定权，且未在客观上成为旧权重的动员臂膀，依附的判断就不能成立。

敌我接口

任何新主义要确立自身的定位，不仅要阐述自身的主张，还需界定批评与反对的对象。怎样界定反对者，将哪些立场或群体划入可疑、落后乃至应当被排除的范畴，直接构成了该主义的重要现实功能。旧高权重结构进入新主义外壳时，容易借助敌我接口发挥作用。资源接口的妥协可以被解释为现实生存策略，传播接口的妥协可以被视为扩大影响的方式，而敌我接口则直接关系到责任归属、资源剥夺与权利边界的划定。当新主义运用新的道德语言界定现实中的群体时，其分类标准会在客观上影响到谁受到保护、谁承受代价。

在思想尚处孕育阶段的生成期，敌我接口通过预先导入旧网络的风险排序与排斥禁忌，从内部锁定了 A 的批判矛头与伦理边界。处于旧网络中的理论生产者在尝试建构新概念以解释社会危机时，首先面对着高权重环境关于“谁是主要威胁、何种界线不可触碰”的强力暗示。如果早期思考者在确立问题意识时承接了这套先在的排斥次序，将理论火力集中倾泻于 B 原本就意图防范或打击的对象，而在概念推演中绕开或豁免 B 自身的垄断地位，那么在激烈的内容竞争中，这种既具道德批判锋芒又不触犯根本禁忌的方案便最容易获得安全通行与制度默许，并被逐步锤炼为 A 划分善恶、界定友敌的基础教义。一旦这套内嵌了旧排斥偏好的伦理体系随 A 的成形而固定下来，敌我接口便会在后续实践中直接运转起来，以新主义的道德语言为旧秩序识别异己、正当化排他处置提供现成的判准。

这种机制在实践中体现为旧秩序关切的“道德再合法化”。旧高权重结构在长期维续过程中，其原有的辩护语言可能因为僵化或导致历史问题而失去动员力，直接以自身名义进行排除容易引发质疑。交媾主义所涉及的敌我接口，在客观上分担了解释压力：新主义使用具有吸引力的新锐道德辞藻，对旧有的敌我区分展开了重述。原本出于体制维护的排除，在新主义的论述中被表达为纯洁理念、顺应历史规律或纠正错误的行动。新主义未必直接沿用旧名单，甚至可能批评旧方式的不彻底；但在实际效果上，被其集中批评的，往往依然是威胁旧权重稳定的力量，而受到维护的，依然是既有秩序的核心部分。

敌我接口的现实运作，通常从思想批判延伸至具体的制度与社会后果。起初它表现为理论文本中的概念界定与学理批评；随后在舆论传播中，某些观点被判定为错误甚至有害；进而这种评价可能作为依据，进入考核、资格审核与组织排除等实际环节。新主义的语言体系保持着理论的自主表述，但产生的现实作用，却是为旧权重的排他性实践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交媾主义不要求新主义成为旧理论的复制品，它只需通过新主义的道德语言，使旧有的分类与排除在新的语境中获得接受度。

在分析这一接口时，必须注意信徒主观动机与客观后果的分离。许多参与其中的人，其内心的信念可能是真诚的，真诚地认为理论所批判的对象确实存在弊端，甚至愿意为此付出个人代价，并未意识到自身的表达在客观上契合了旧网络的排斥需求。然而，个体的不知情不能取消现实后果的客观存在；主观上的善意，不能抹去客观上产生的排除作用。在考察敌我接口时，必须将主观信仰、组织规则、传播话语与现实处罚这四类不同性质的事实严格区分开来：既不通过推断动机将普通信徒全部视为自觉作恶者，也不能因为信徒信念的真诚而忽视敌我接口所造成的实际排除后果。

同时，决不能将新主义所包含的一切批判语言与敌对划分统统断定为旧权重的翻版。任何严肃的理论体系在面对现实问题时，都必然具备批判指向，必须指出问题所在的根源。区分一种敌我划分究竟属于新主义的独立伦理创造，还是沦为了旧权重的依附接口，关键在于核验该划分在面对核心权力时的表现：当理论所指向的问题触及旧权力自身的根本利益时，新主义究竟能否坚持原则，对旧权力提出实质性批评与约束，还是在触及根本底线时回避退让，转而将批判集中在体制允许或鼓励的对象上？如果理论的批判焦点始终回避根本的权力机制，而对外部批评者保持高度的攻击性，那么无论其语言如何新颖，敌我接口的实质依附就具有了经验支撑。

机会接口

一种思想即使构筑了系统理论，获取了一定的资源，并建立了初期组织，如果缺乏适宜的现实条件，依然可能长期处于边缘状态。新主义何时、以何种方式进入更广阔的社会舞台并转化为具有显著影响的现实力量，取决于机会接口的开启。社会历史运行中存在着阶段性变动：政策调整、体制重组、经济社会问题、公共议题聚焦、人事更替乃至普遍社会情绪的变化，都可能在既有结构中产生新的空间。这些变动构成了现实的机会窗口。对于新主义而言，机会接口是将理论潜能转化为制度认可、公共资质与现实影响的重要条件。

在 A 尚未成形的生成期，机会接口以特定体制危机或政策缝隙所构成的现实窗口，决定了哪一种潜在思想方案能够被激活并加速固化。旧网络中平时或许潜伏着多种异质思考，但在常规状态下往往停留在零散的私人议论；当 B 遭遇突发解释危机、治理瓶颈、人事更替或结构调整而敞开特定需求窗口时，针对这一缺口的制度召唤可能骤然增强。那些恰好能够贴合这一窗口期迫切需要、为当下的秩序修补或动员转换提供新语汇的理论尝试，会在短时间内获得破格关注、集中研讨与快速试错的条件，从而跨越漫长的自然积累，迅速淘汰其他未能对接窗口期的竞争性构想，围绕该现实契机将自身的概念框架与行动方案定型为成熟的 A 主义。而在 A 借此窗口完成命名与建制之后，机会接口又继续作为外部阀门，决定着该主义在随后的政治周期中何时被推向前台扩展影响、何时又因窗口关闭而面临收缩。

理论成形之后，新主义在机会接口中的策略调整不能简单归结为投机心理。行动者根据现实条件的变化调整策略、争取发展空间，是社会实践中的常见行为；交媾主义所关注的，不是理论生产者的个人动机，而是新主义是否在利用机会窗口的过程中，改变了自身的内部权重与主人位置，将其存在基础实际绑定在了旧权重的利益秩序之上。在这一过程中，互动的时间长短本身并非决定性标尺：短期的窗口接触若已促成内部权重的倒置与主体性让渡，便不因其短暂而排除依附；长期的持续周旋或资源往来若未改写其核心自主性，也不自动证明控制已经完成；单次接触或合作本身固然不足以坐实结构性绑定，但长期依赖同样不构成绝对的时间门槛。在机会窗口开启的时期，某些新主义组织通过利用政策通道、经费支持或舆论空间迅速扩大影响，这种借助外部窗口的扩张若伴随内部权重的改写与实际依赖的加深，就表明自主性正在让渡：当外部特定窗口关闭或旧权力调整方向时，新主义究竟能否保留独立的组织体系、传播网络与批判能力以维持自身存在，还是因内部主人位置早已转移、随着外部支持的撤回而丧失现实功能并退回低权重状态，才是检验机会接口是否演变为结构性依附的枢纽。

体制主动开放机会接口，不等于预先统筹了全部过程。高权重结构 B 在面对现实问题时，其决策往往受到认知局限与应对压力的制约；其主动开放机会接口、吸纳某种新主义，最初的考虑可能只是为了应对眼前的具体困难，例如缓解某种社会矛盾、借用一套新的话语进行对外沟通，或者在内部协调中寻求新的动员手段。开放接口的决策者未必能预见到新主义后续会扩展到何种程度，通常也不存在预先设计好的完整方案。与此同时，进入该接口的新主义行动者，也可能真诚地认为自己是在利用体制提供的机会推进自身的理想。双方在初始阶段都可能低估接口确立后所带来的结构调整：当新主义的

组织力量与旧权重的运作机制结合在一起之后，现实发展的方向就会受到两者的共同影响；即便缺乏统一编写的剧本，新主义的现实功能与旧权重的维续需求依然在这场互动中完成了事实上的收束。

在事实核验中，主动开放属于入口层面的初始事实，而功能控制与现实后果属于后续发生的事实，主动开放接口并不直接等同于完成了最终控制。行动链条中缺乏事先的完整剧本或统筹计划，并不能免除参与者各自行为带来的客观责任，而追究责任则依赖于厘清不同主体所处的具体位置：利用既有权力开放偏向性特许接口的开放者、为自身利益将理论降格为服务工具的利用者、在具体过程中实施排他性行为的执行者，以及从最终功能结果中获利的受益者，在链条中承担着不同性质的作用；单纯从结果中受益，并不自动等同于参与了共同策划，也不意味着承担同等责任。将分散的生成机制、不同的行动位置与具体的现实后果区分清楚，不是为了替参与者推卸责任，而是为了避免用抽象的时代环境或笼统的共谋想象来模糊具体的责任归属。

五类接口不是各自孤立的环节，而是贯穿在思想生成与现实延续的全过程之中。在具体的运行中，它们相互交织、彼此转化。五类接口在现实中的相互转换，改变着谁掌握最后的结算权，也使新主义的自主性随时间移动。

六、接口转换、现实主人与变化中的自主性

资源、传播、组织、敌我与机会这五类接口并非孤立静止的制度通道，更不是所有历史对象都必须逐一齐备或按固定顺序演进的五步循环；它们构成了一张开放且可逆的转换网络，在一种新主义的形成期与形成后都可能从任意一处启动、交错推进，亦可能在某处缺失或随时中断。若仅以其中一条常见的传导路径为例：某种新主义起初或许只是传播接口上的新颖修辞或道德呼吁，一旦在既有高权重场域中获得可见性，便可能汇聚追随者并向组织接口转化，确立起成员资格、骨干梯队与联络网络；组织化积聚的集体能量继而为其叩开资源接口，换取稳定支持、实体场所、工作位置乃至制度性的合法身份庇护；凭借组织实体与资源条件，该主义又能将其特有的价值序列落实为具有现实排他力的敌我接口，把特定群体指认为正当盟友，将另一些群体划定为应当压制、排除或剥夺发言资格的异质对象；而当社会危机、政策调控、人事更替或公共情绪引发外部震荡时，这种已具动员能力的外壳便能在机会接口敞开的窗口中跃升为不可忽视的现实力量，回过头来巩固并强化其他接口的运转。当然，这一链条同样可以倒转或跳接——例如先由制度庇护与资源配置催生组织，或借外部危机直接激活敌我划分，再反哺传播声势与资源汲取——关键并不在于形式上是否走完固定流程，而在于不同接口在具体情势中如何相互借力，将判断权与资源支配权一步步收拢为具有现实强制力的运转机制。

五类接口相互衔接、彼此转换，并不意味着任何交媾主义的具体形态都必须完整具备五个环节的严密闭合。在实际的社会机理中，接口转换的链条完全可能在某一中间环节遭遇阻断。例如，某些新主义可能在极短时间内获得了高权重结构在资源层面的注入与合法性认可，却因其理论语言过于晦涩或脱离大众心理，始终未能有效打开传播接口，最终局限于脱离社会基础的附庸性建制；某些新主义可能在传播接口上掀起了巨大的声浪与广泛的符号认同，但在试图迈入组织化建制时遭遇高权重结构的程

序阻遏或风险剥夺，致使其始终无法将舆论声势结算为稳定的行动网络；亦有某些外壳在建立起严密的内部组织后，断然拒绝在敌我划分上屈从于旧结构的既定排序，或者在外部机会窗口关闭后迅速失去生存基础，退回边缘甚至失能。因此，在分析交媾主义的现实形态时，绝不能将完整的五步闭环预设为判定依附关系的先决门槛，更不能仅凭某一个孤立维度的偶然借用、表面词汇的相似或短暂的策略性协同，就断言功能接管已经完成。判定的真正支点，在于考察关键结算时刻的权力属性：在资源存续受到威胁、传播许可面临撤销、组织代表权产生根本争议、敌我划分触及体制底线或机会条件发生逆转的节点上，究竟由谁来做出具有最终效力的裁决，这种裁决最终又是沿着何种维度的利益次序得以执行。

正是这种以关键结算为轴心的接口运转，深刻重构了“谁是现实主人”的判断维度。在表面现象中，新主义的名义主人往往拥有显赫的声誉与理论代表权：他们是撰写长篇著作的理论开创者、创立教派或团体的核心领袖，或是公开宣讲某种宏大愿景的发言人。他们在内部被尊为精神导师，其著作被奉为经典，其言论构成了信徒日常理解世界的核心文本。然而，名义主人的理论自洽与言辞声望，并不能直接兑换为现实控制力。理论的完善者未必掌握该主义在社会大模型中所处的位置，信奉该主义的追随者亦未必决定资源向何处配置。当新主义的核心运作被深深嵌入由旧高权重结构维系的生存网络时，真正的现实主人往往隐匿于文本与名义领袖之后。现实主人不一定拥有理论创作者的名号，其组织名称甚至不必在理论文本中留下痕迹；现实主人是那些在关键接口面临关闭、重开、重排与价值结算时，真正拥有最终否决权与定向引导能力的结构掌控者。如果一个新主义的持续生存取决于某一外部结构所给予的资格认证与安全庇护，其传播范围由特定规则的权重排序隐蔽规定，其组织领导层的合法性依赖于外部权力的认可，且其在现实中排除异己的行动完全指向外部力量所指定的敌人，那么无论该主义的文本如何强调自身的崇高起源与独立品格，其现实主人都绝非那些挥舞理论旗帜的名义领袖，而是掌控关键结算阀门的旧权重本身。

将现实主人与名义主人区分开来，并不等于可以把新主义的所有维度都判为虚无。自主性也不是一个非黑即白、非全有即全无的二元开关。在真实的社会关系中，自主性呈现出复杂的层级分布与结构张力。一个主义完全可以在理论文本的生产与概念推演层面保持极高的自主性与原创性，构建出逻辑严密、概念新颖且在形式上自给自足的思想体系；它也可能在内部组织的日常管理、仪式规则、基层伦理与生活实践中维系着高度的自治，形成真实而深厚的人际温情、牺牲奉献与内部互助；但与此同时，在决定其社会生存底线的资源结算与风险化解上，它却可能表现出对旧高权重结构的依附；在公共空间的可见性与话语表达上，它可能不得不接受传播规则的深层剪裁与过滤；在政治实践的敌我划界与现实惩处上，它更可能将旧结构的秩序偏好内化为自身的道德裁决。正因为自主性在理论、组织、接口与功能各个层面存在这种深刻的分离与错位，真诚的信仰、富有独创性的思想构造与结构依附才能够并存于同一个社会实体之内。分析的重点绝不在于给某一新主义贴上“真”或“假”的道德标签，而在于冷静剖析它究竟在哪些层面上维系了理论与组织的自主，又在哪些关键接口上出让了结算权力，进而在功能层面上被旧结构完成了现实赋位。

更为重要的是，自主性的分层状态绝非亘古不变的静态本质，而是伴随着历史进程与现实力量的消长而发生持续的动态位移。在时间轴线上，新主义的接口关系与自主程度往往经历着深刻的变化。一种轨迹是，新主义在萌芽时期仅仅是出于有限的现实考量，暂时性地借用旧结构的某些资源入口或安全通道，但在随后的演变中，凭借其理论所激发的社会动能与组织扩张，逐步摆脱了原初的庇护网络，建立起属于自身的独立资源链、自主传播渠道与组织建制，最终在关键结算中夺回了主导权，实现了从依附向真正独立的跃迁；另一种完全相反的轨迹则是，新主义在产生初期保持着鲜明的独立意志、纯粹的理想主义追求甚至对旧秩序的尖锐反抗，然而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制度化生存压力的增加，或者在面对严峻的政治与经济危机时，为了捕获由外部力量打开的机会窗口，理论解释者与决策层开始逐步在敌我划分、资源获取和传播策略上向既有高权重结构妥协，将自身的关键接口一步步拱手相让，最终退化为旧秩序维系自身运转的现实工具。

因此，任何关于新主义依附与自主的定性分析，都必须严格限定于具体的历史时段与具体的现实关系之中，绝不能将某一特定时点上观察到的接口状态机械地推论为该主义贯穿始终的固定本质。尤其不能以后期历史中显现出来的接口依附、功能重排或名义主人向现实主人的让位，反向倒推该主义在生成时期的原初构成目的。后期在现实接口中发生的功能接管与结构依附，固然是考察该主义现实政治走向的核心依据，但它本身不能替代对该主义最初如何在旧网络中孕育、节点如何被动员、核心问题如何被设立的起源史核查。如果在缺乏形成期确凿证据的前提下，仅凭后期观察到的某种利益重合、资源结算或政治结盟，便断定该主义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为了服务于旧主人而量身定制的产物，那么这种分析便跌入了倒果为因的错误机能主义推论。

七、真正独立的起源、后期责任与原教旨退路

为了廓清交媾主义的理论边界，必须在分析框架的最深处划定两条根本不同的生成脉络：其一是这里所说的交媾主义核心生成类型，即在理论尚未成形、组织尚未确立之前，B 的根本需要便已实质嵌入其问题设置、概念筛选与价值排序，通过旧网络内部的生成性收敛而诞生的新主义；其二则是真正具有独立起源的新主义在历史演进中与既有高权重结构 B 发生的后天结合。这两者在生成机理上有着质的区别，绝不能混为一谈。

高权重结构 B 作为一种先在的历史环境、一种制度性的现实，抑或作为理论创立者所直面的反对与批判对象，其客观存在并不自动等同于 B 的需要已经进入了 A 的构成目的。在同一个具有压迫性的社会环境与高权重压力之下，完全可以内生出针对该结构的彻底否定与激烈反抗脉络。因反对 B、揭露 B 的危机而引发的思想探索，在逻辑与事实上完全可以具有与 B 密切相关的生成条件，却绝不包含任何服务于 B、向 B 妥协的构成目的。所谓生成目的上的真正独立，并不要求该主义在真空中降生、脱离外部历史现实，而仅指其在构建自身的核心命题、伦理法则与行动指向时，未曾将迁就 B 的需要、保全 B 的核心前提作为内在的组织原则。在此，必须坚决摒弃一种过度还原的倾向：绝不能因为某一主义在其历史起点上展现出了概念的独创性、建制的自治性与反抗的真诚性，就武断地将其判定为起

初就是蓄意伪装的产物。在缺乏形成时期确凿材料证明其核心命题早已面向 B 而发生定向收敛的情况下，必须对“真正独立起源”这一分析范畴予以完整的承认与保护，将其确立为交媾主义核心类型的边界与对照项。

然而，承认真正独立的起源，绝不意味着赋予该主义在后继历史实践中免除政治与伦理责任的特权。这是两个处于完全不同维度、必须分别予以独立判断的论据链条：生成起源的独立性，解决的是“该主义为何而生”的历史事实问题；而后期的实践参与，解决的则是“该主体在现实中造成了何种后果”的行为责任问题。否定了自始依附的交媾起源，丝毫不能自动勾销其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向旧权力让渡接口、为旧秩序提供理论辩护、动员追随者参与压制所造成的客观危害。早期起源的独立，只能证明该主义并非专为 B 而铸造的工具，却根本无法证明它在后来的演变中未曾为 B 的压迫行为提供正当化论证，未曾将其组织网络转化为体制的控制触角，未曾将异质群体推入惩戒机制之中。一个曾经真正独立的思想流派，在遭遇现实诱惑、生存危机或外部压力时，完全可能将其最具感召力的道德资源出让给既有权重结构，从而在实际功能上成为旧体制的合作者。在此情形下，以早期的独立起源来为后期的责任进行开脱，或者反过来因后期的结合而全盘抹杀早期的独立事实，都是在思想分析上不可接受的逻辑混乱。

正是这种起源与责任的复杂张力，构成了现实中经常可以观察到的意识形态免责机制——即所谓“误用”辩解与原教旨退路。当某一新主义深度卷入现实权力运作，导致严重的社会伤害、制度性溃败或群体权益受损之后，其理论阐释者与组织掌控者往往会迅速启动一整套模式化的免责程序。他们高举该主义奠基时期的经典文本，极力强调某些词句的崇高寓意，将现实中发生的一切损害、压迫与越界统统定性为执行者的“误用”、个别人的“背叛”或外部力量的“恶意捕获”。他们向公众宣告：现实中的一切问题都与这套理论的崇高本体无关，“真正的 A”不仅从未参与作恶，反而恰恰是这场历史灾难中最大的受害者。

这种诉诸原教旨纯洁性的免责说辞，在思想分析中必须受到严密的双向核查。首先必须厘清名称借用与实质论证的区别。在现实中，确实可能存在某些外部行动者仅仅借用了 A 的旗号、采用了 A 的个别流行词汇，其实际行径却在逻辑与原则上与 A 的核心命题发生彻底冲突；在此类情形下，仅凭外部的名称借用，自然不能将全部责任归咎于理论体系本身。然而，在另一些具有实质破坏性的情形中，情况恰恰相反：正是该主义自身的核心理论命题，为现实中的排他性处置、权益剥夺或强制压迫提供了最关键的正当化论据；正是其对历史走向的独占性解释，剥夺了被支配者的抗辩空间；正是其构建的严酷敌我边界，使针对具体个体的损害获得了道德许可。在此类情形下，理论的核心论述已经实质构成了相关行动的理由与认知支撑，事后轻描淡写的“误用”二字，非但无法切断理论结构与客观后果之间的紧密关联，反而是对思想生产责任的推卸。

进一步而言，必须看清“理论文本”这一非人格化盾牌的掩护。理论文本本身固然不具备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格，纸张上的文字不会自行思考，不会主动在现实中采取行动，亦不会自行组建执行机构或推行强制性政策。然而，理论绝非悬浮于真空中的抽象概念，其命题能够为行动者提供极其强大的理由，

其理论范式能够为特定的制度安排赋予合法性。理论的现实落地，必须经由具体的人、具体的组织实体以及制度化的解释与执行程序才能完成。因此，追究交媾责任绝不能抽象化为对文字本身的道德谴责，而必须精准落实到现实中的责任链条：究竟是哪些权威理论家在特定历史时刻对文本做出了服务于权力的注解？是哪一级组织机构正式通过决议将这些命题转化为动员指令？又是哪些执行者借由此种理论修辞损害了他人的权利并从中获取现实利益？更重要的是，当严重后果已经显现之后，那些居于关键位置的解释者们，究竟是在继续为体制的合法性进行修补辩护，还是在实质性地反思其理论的结构性缺陷？

在此，原教旨退路的深层风险显露出来：它往往成为理论与权力结合者在遭遇挫折时，用以获取名义清白、修复社会声誉、掩护核心骨干、保存组织力量并准备再次与高权重结构结合的路径。这并不意味着思想运动中的一切反思都是伪装；但当某一次行动遭遇惨败或引发广泛批评时，采用 A 的组织往往会通过一场精心安排的“纠偏”，撤换几个处于风口浪尖的具体执行人员，修改几条引起争议的激进表述，甚至宣布更改组织的公开名称，随后以虔诚的姿态重申对“原教旨”的忠诚。只要他们依然保留着那套赋予自身支配正当性的核心论证框架，依然维系着将异己分子排斥化的敌我分类逻辑，依然原封不动地保留着旨在动员权力的模式，这种所谓的“退回本体”就缺乏实质性的理论反省，在客观上起到了切割历史账目、免除体系责任的效果，也可能在有意识的策略中被用来规避责任、完成组织休整。通过宣布“真正的 A 从未失败，失败的只是不合格的执行者”，他们将自身从具体的历史现场抽离出来，在道义上洗脱干系，将那套产生过严重后果的理论体系完整地保存下来，借机休养生息，以待条件成熟时再次与旧体制的高权重结合。

当然，批判这种原教旨免责回路，绝不意味着武断地认定所有反思与调整都只能是伪装。如果某一主义的理论传承者与组织群体，在目睹了灾难性后果之后，确实在根本目标、解释规则、组织建制与现实行动上做出了实质性改动，那么就必须尊重这些新材料的出现，并根据其真实的演进轨迹重新评估其功能性质，绝不能以其过去曾经陷入依附状态，就判定其背负着不可更改的永久本质。

检验相关人员与组织是否真正做出纠正，必须核验四项表现：其原则能否在实践中实际约束自身对 B 的支持、服从与接口开放；面对不利事实与历史材料时既有判断能否被实际改变；主体是否承认并切实处理自身参与造成的后果；以及能否切断同类机制的再次结合。脱离并不以主体能够迫使整个 B 发生改变为前提。停止正当化论证、拒绝附带条件以及承担相应代价，均可支持特定范围内的脱离；但这既不意味着必须先承受损害才能退出，也不自动等同于全部脱离，更不免除过去的参与责任。口头上的纯洁声明不等于实际改变，局部的调整也不等同于整体关系的解决。

必须看到，这种脱离依附的过程并不以该主义拥有颠覆或改造整个庞大旧体制的现实力量为前提。思想流派完全可能在自身能力所及的局部范围之内，通过坚决停止正当化论证、断然拒绝附带妥协条件的资源支持、主动承受来自体制的排挤与制度性边缘化，从而实现特定维度与局部的真正脱离。然而，承担局部代价并不等于可以自动宣告全局性的彻底独立，局部表述的微调亦绝不能等同于整体依附机制的瓦解，更无法追溯性地消除其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参与责任。

在理论的自述与实践的严酷后果之间，不存在含糊其辞的空间。思想批判必须坚守底线原则：A 不能借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来回切换，把作用归给自己，把后果永远归给别人。当理论激发起动员能量并收获声誉与现实收益时，解释者们将其归功于理论的正确与深刻；而当同样的理论逻辑在现实中导致排斥、剥夺与伤害的后果时，他们却试图缩回不染尘埃的原教旨概念中，将一切责任推卸给现实的偏离与执行者的背叛。这种在理念与现实之间回避责任的特权，必须在理论审视中被彻底瓦解。

八、证据边界、反证与旧网络再生产

将交媾主义作为一种揭示思想生成与现实依附的理论模型确立起来，必须在方法论层面保持对经验事实边界的高度自省与严格约束。思想理论的穿透力，取决于其拒绝将自身降格为无所不包、无法证伪的玄学断言。在具体对象的经验核查中，必须时刻警惕一种将结构性推论偷换为实证既成事实的逻辑跳跃。理论机制的成立，绝不等于每一个处于待查状态的历史案例都已经获得了确凿的事实证明；反之，在个别案例中经验证据的暂时缺失，也绝不意味着整个理论模型的分析框架归于无效。

审查具体历史对象时，三层材料须分开：

第一个层次是已获证明的经验事实材料。这包括明确可查的文本修改记录、确凿的资源调配渠道、制度性的任免与否决程序、被证实的组织隶属关系，以及在特定历史时间点上公开推行的政策与行动。这些材料构成了经验分析的坚实基础。若关于某一对象的材料仅仅显示其在特定媒介上获得了较高的可见度，那么在缺乏后续因果链条支持的情况下，事实结论就必须严格限定为“该对象具有传播可见性”，而绝对不能在没有进一步证据的前提下，轻率地推论出“该对象的可见性必然是由旧结构统一部署的操纵结果”。同样，如果在某一时期仅能查明该主义在口号与修辞上与体制存在某些重合，但既无组织人员的直接互通，又无实质性资源往来的痕迹，那么研究者就必须克制断言的冲动，将定性止步于“存在语言风格或议题维度的表层重叠”，而绝不能凭空虚构出一套隐蔽的秘密输送网络。

第二个层次是结构层面的理论解释。这是思想理论展现其分析能力的核心空间。处于具体环境之中的行动者与思想创立者，其个人认知往往受到自身视野乃至主观信念的限制，他们在日记、书信或宣言中所留下的自我陈述，往往主要反映其主观层面的认知意图。如果思想史研究仅仅重复历史当事人的自我标榜与主观辩解，那么批判性研究便将丧失其深度。从资源流动、传播加权、组织建制、敌我划分以及机会捕获这五类现实接口的系统性互动出发，理论研究者完全能够提出超出当事人自认范畴的更强解释，揭示出分散的个体行动是如何在既定权重场的作用下，客观上汇聚为面向旧统治秩序的生成性收敛。然而，必须在逻辑上严加防范的是，这种在结构与功能层面构建的理论解释，具有自身独立的论证属性，绝不能在行文中被偷换为历史人物或当事组织“已经在主观上自觉承认了自身对旧权重的依附”。理论解释揭示的是客观机理，当事人自述表达的是主观经验，两者的证据职能不可互相僭越，更不可用抽象的理论自洽来伪造微观进程中的直接因果链条。

第三个层次是尚待经验检验的因果假说与反证空间。交媾主义理论并不拒斥反例，也不是在逻辑上自我封闭的体系。在严谨的个案核查中，必须明确列出该判定在何种经验事实出现时将被实质性限制、

修正乃至推翻。若某一对象在形成时期的材料被发现后，证实其在构建核心价值序列时，曾发生过对旧结构根本前提的实质排斥，并且这种排斥在后来的组织章程与实际行动中切实演化成了对体制要求的坚决抵制；若经验材料表明，该主义在面对资源断绝与外部压力的极端危机时，宁可承受组织解体与严重代价，也坚决拒绝按照旧结构的偏好修改其敌我边界，那么针对该对象在该特定历史阶段的依附判定就必须被撤销。将反证条件清晰地确立为审查的前提，不仅不会削弱交媾主义批判的力度，反而能够将其与那些将一切思想现象都武断归入旧体制变体的泛化宿命论彻底区分开来。

旧网络的延续不只依靠赤裸裸的强制暴力与教条灌输。若旧体制仅仅依赖其原初那套丧失道德吸引力的旧理论，它很快就会在社会矛盾的发展与大众心理的疏离中走向合法性的枯竭。维持支配地位的深层形态，在于将自身权重的逻辑织入社会生存网络之中，使自身的延续转化为一种具有选择机制的生态环境。

在这个由旧秩序占据主导的社会模型中，高权重的 B 维度通过长期影响资源的流动方向、掌握合法地位的授予条件、主导大众媒介的传播排序，以及确立“何为正当、何为异端”的话语权，从而在整个思想生态中确立起一套现实的激励机制。身处这一网络之中的行动者与思想创作者，即便主观上怀着对理想的追求、对苦难的关切甚至对现实缺陷的批判，但当他们试图将自身的思想观点转化为成体系的学说，试图走出私人领域去介入公共生活、建立行动网络时，他们就必然会面对这套客观存在的权重结构。

分散的思想节点在不同的处境中各自进行探索，可能提出多种多样的应对方案。然而，网络的选择与淘汰机制在持续发挥作用：那些试图从根本上颠覆旧结构权力垄断、拒绝在敌我划分上迁就体制需要的思想，在萌芽阶段就容易在传播接口上受限，在组织接口上难以取得合法身份，在资源接口上失去持续维系的条件；而那些避开了旧结构核心禁区、将批判限定在体制可承受的修补范围之内，或者将道德关注引导至体制所允许的外围议题上的新表述，则更容易在现实中获得生存空间——它们相对容易取得出版与传播的通路，其倡导者更容易获得机构支持、学术位置与安全保障，其建立的社团更容易获得生存空间，并在外部环境变动时获得发展窗口。

正是在这种持续的分散激励与逐步筛选之中，生成性收敛在特定条件下得以展开。这一过程不需要一个处在密室中的总指挥去直接起草每一篇新主义的宣言，也不要求存在一个全知中枢向每一位作者下发行动指南。分散的思想生产者在各自的探索中，为了使自身的学说更具说服力、更能获得现实回响、更能取得生存立足之地，在打磨理论的过程中，可能自发地调整问题的切入角度，淡化某些触碰根本的命题，强化那些能够被体制安全消化的概念。最终，一套套在外观上不同于旧教条、拥有全新概念词汇、展现出原创性特征，且被真诚信徒视作崭新出路的新主义，便在这样的机制中被塑造出来。

它们在理论文本中可能明确声明自己与旧体制毫无关联，其学者甚至就某些运行瑕疵展开激烈的批评；然而，当真正决定方向的关键时刻到来，当这些新主义进入由资源、传播、组织、敌我和机会构成的现实接口进行结算时，可以观察到的是：这套新思想所激发的道德热情、所组织起来的行动力量、所设立的排他边界，最终在功能上汇入了维系旧网络主导权重的方向。旧有的权力结构通过这套全新的

思想外壳，不仅在客观上淡化了自身的历史问题，更以适应新时代语言的姿态，在社会变革的压力下实现了机能的延续。

旧网络因此可以在不复制旧教条的情况下延续自身。它可以通过议题设置、资源扶植和组织介入主动推动某些思想，也可以通过改变资源回报、传播可见性、组织位置、敌我划分正当性和机会窗口，使分散节点沿可存续的方向调整；主动制造、结构筛选和无意识生成可以并行、交错或中断，不能被排列成固定顺序。

这些机制是否在特定对象上形成了交媾主义的核心生成关系，仍须回到形成时期的内容取舍、关系链与现实接口；不具备这种起点关系的后期捕获、换壳或功能接管，也要按各自的事实链条判断。

第二十五章　新主义生态——制造、筛选、捕获与换壳

一、生态不是孤立外壳的总和

旧高权重结构既可能在旧网络节点的生成性收敛中参与一个新主义从起点形成，也可能在新主义形成以后进入、捕获或重排其现实功能。无论属于哪一种关系，新主义都可能拥有自己的名称、理论、理论家和真诚信徒，现实功能仍须从资源、传播、组织、敌我和机会五类接口观察。问题并不止于某个单独的新主义究竟是什么：这种外壳为什么能够持续出现，为什么某些版本比另一些版本更容易获得位置，为什么理论越写越完整以后，反而可能越来越看不见它最初所处的权重场。许多思想简单并列在一起，并不构成新主义生态。新主义要出现、成长、扩散、取得合法性并进入现实功能，需要一组现实条件。生态中的每个行动者可以有自己的目标，每个理论家也可以真诚地相信自己的理念；但资源从哪里来、传播怎样被加权、什么对象更容易进入组织、什么表达能取得安全位置，仍然由社会模型中的权重结构共同塑形。

满清共产主义不只是等待现成主义与自己交媾。它还会主动制造适合交媾的主义，或者推动某些思想发展成可以与自己交媾的形态。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吸收，也不是对外来思想的简单改良，而是把新主义外壳本身纳入统治技术的繁殖能力。它可以开放空间，让某些议题得以提出，让某些组织或表达获得接触资源的机会；也可以在多个版本中，使更容易与现有权重兼容的版本获得更多传播、组织、职业和合法性资源。主动性体现在结构具有选择和推动能力，并不要求有一个人能够预先写完所有结果。

旧结构不一定要从零发明一个完全不存在的问题，也可以选择哪些矛盾被命名、哪些版本被放大、哪些表达得到组织位置、哪些现实后果被允许发生。具体材料如果只能证明放大、重组、框架化或再编码，既有证据便不足以断定对象纯属凭空捏造。对象受到制造的理论判断仍然成立，究竟涉及哪些具体事实，则要逐案核验。

社会矛盾是新主义生态的重要供给。真实的不满、身份冲突、阶层压力、文化焦虑和公共失败可以产生新的表达需要。高权重结构不必虚构这些材料，也可以通过命名、筛选、传播和组织化，把它们转成适合自身接口的外壳。由此生成的新主义可能有真实经验基础，也可能承担旧权重的现实功能。这一区分避开了两个相反的错误：一是把所有新主义都说成凭空制造，抹掉真实经验和理论创造；二是只要发现真实经验，就断定现实功能必然独立。经验来源解释人们为什么会接受一种表达，接口和权重则解释这种表达为什么能够取得某种社会位置。两个层面都需要理论判断和事实证据，不能用其中一个取代另一个。矛盾也会制造版本竞争。有的版本强调个人救赎，有的强调组织秩序，有的强调敌我纯度，有的强调媒介可见性。不同版本都可能回应同一个真实问题，但只有一部分能在旧高权重环境中持续获得资源。生态并不只是传播既有思想，它也在选择什么样的解决方案能够留下。

主动制造、行动者责任和对远期后果的认识，不能混成一件事。一个高权重结构可以在制度上主动开放空间，却未必意识到某个新主义最终会形成夺舍。中共在特定历史节点主动让相关力量进入，却在当时没有意识到夺舍正在发生，属于有待在具体对象上分别核验的解释判断。主动性描述入口和制度选择，意识描述行动者对远期演化功能的认识，二者可以同时存在，不能互相取消。

当 B 成为高权重变量，社会激励函数随之改变，原本存在的不同认知倾向、表达方式和组织能力便获得不同的回报率，结构筛选由此发生。它不要求 B 像一个人那样逐一挑选每个 A 主义，也不要求所有新主义生产者被召集到同一个中心。在这种回报结构中，更依赖权威排序、更擅长阵营表达、更能使用高权重语言、更容易适应组织入口的思想形态，可能比其他形态更容易获得资源和位置。A 主义者即使很聪明，也可能只是在既定权重场中完成理论化表达。他们能够把文本写得越来越严密，却不会因此成为结构生成的唯一源头。文本生产者可以是表达者、加工者和完善者，权重结构则决定哪些表达更容易从众多可能性中收敛出来。

结构筛选不能被当作生物筛选，也不能用来断定某种人天生更适合某种主义。它改变的是行为和表达的回报结构：哪些会得到奖励，哪些会受到保护，哪些会被放大，哪些会被视为危险，哪些会被排除在合法空间之外。长期运行以后，社会中原本存在的差异可能被放大，某些类型的行动者更容易上升，某些类型的纠错方式则更容易失去位置。

有些东西会在以共产主义为高权重的社会模型中被制造出来，这种制造可以在无意识中发生。无意识生成与主动制造并不冲突，它补上的是生成机制的另一层：旧高权重结构不必在每个节点都进行清醒策划，社会成员、媒体、组织、平台和制度却可能在同一权重场中行动，最终使某些议题和新主义自然收敛出来。无意识生成并不排除人的行动，也不需要某个人或某个中心拥有全部意图。每个行动者可能只是在处理眼前问题、寻找资源、遵守规则、使用已经被认可的语言，或者追逐能够带来安全和收益的表达；这些行动却共同受到同一高权重参数影响，结果可能反复生成相似的议题结构。

这类生成从外部看很像制造：议题集中出现，表达方式高度同构，价值指向相互呼应，敌我边界迅速成形。可是，外部的人工感不能单独证明存在一个人工总导演。高权重模型本身就是生成器。它决定什么更容易被放大，什么更容易被分类，什么更容易被命名，什么更容易取得道德正当性和制度注意。

结构筛选、主动制造与无意识生成之间没有固定比例，也不存在必然顺序，不能被排成一条机械流水线。主动开放空间为筛选提供入口，筛选使特定版本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取得优势的版本进而吸引理论家与信徒补充其伦理、逻辑与自我叙述。在具体对象中，可能某一主义仅有传播条件被结构塑形，并无主动制造的材料证明；也可能行动者确实主动推动了议题，但结果超出其预期，最终收敛为无意识生成的后果。

因此，无意识生成不能用来取消主动制造，主动制造也不能吞掉无意识生成。前者会把制度主动开放和推动新主义的现实过程误读为纯粹的自然演化，后者则会把高权重结构自然收敛的机制曲解为万能操控论。直接行动、结构回报与无人完整设计的收敛属于不同机制，任何一种生成方式都不能包办全部过程。

并非任何新主义都会在这种生态中被旧结构捕获。高权重结构能够制造或推动适合交媾的环境，使部分新主义更容易出现、被看见、被筛选、被放大和被重新赋位；但捕获是否真正完成，仍须由具体对象和具体证据判断。生态概念不能代替事实判断。

二、生态中的版本竞争

新主义生态要持续，必须获得某种现实能力；它的筛选不是抽象的自然选择，而是资源、传播、组织、敌我和机会五类接口共同改变现实回报率的过程。相同的思想可以有不同版本、不同组织方式和不同传播能力。资源筛选首先表现为生存条件的差异：某些对象比同类对象更容易得到资金、岗位、项目、场所、资格、关系、组织支持和安全边界，从而更容易留下并形成稳定队伍。传播筛选则改变可见性，使某些表达更容易进入可见渠道、获得反复转载、取得公共关注或成为合法讨论对象，进一步决定哪些版本能够反复出现，哪些表达能够成为公共语言。

组织接口筛选谁能持续行动，把可见性变成位置，要求成员资格、纪律、领导、分工和对外代表能够承载增长。敌我接口筛选谁能获得道德保护，把增长转化为正当性，使某些外壳通过攻击对象获得内部凝聚。机会接口则筛选谁能在政策、危机、媒介热点和人事变化的窗口出现时迅速扩张。这五类接口可以由不同机构、不同媒介和不同层级分别完成，并不需要一个中心向所有对象发号施令；它们长期叠加以后，会使某些外壳比另一些外壳更适合旧高权重结构继续生存。

被放大不等于被完全控制。平台可以通过规则、流量、审核和推荐改变表达的可见度，具体内容却仍可能由创作者自己生产；组织可以提供位置和资源，也不能据此断定所有参与者都知道组织的长远功能。相关证据必须交代接口、行动者、时间和结果，不能拿概念相似代替来源。资源和传播并不是新主义的全部内容。一个新主义可能拥有真实的理论生产和真诚信徒，同时仍依赖旧高权重结构提供现实位置。不能因此把理论内容全都说成由资源决定。生态分析还要分清：哪些内容能够取得社会加权，哪些版本能够持续，哪些功能被放大，哪些反例被压低。

生态不是只负责放大，也负责压低。某些新主义得到资金、位置、传播和保护，另一些新主义则在进入组织之前就被排除，在获得公共语言之前就被降权，在遭遇敌我分类后失去资格。压低不一定表现

为公开禁止，也可能表现为没有机会、没有场所、没有推荐、没有合法解释位置。正因为这种压低可以不显眼，生态判断不能只寻找公开命令，还要观察不同对象在接口上的持续差异。放大也不必等于完全设计。一个平台为了流量放大某种表达，一个组织为了短期稳定吸收某种人，一个制度为了处理危机开放某种入口，行动者可以只看到局部收益；当这些局部选择反复叠加，某种新主义就可能获得超过单次决定的现实能力。这里既存在责任，也存在不可由单一意图解释的结构后果。没有总导演，不等于没有筛选；有筛选，也不等于所有人共同策划。

新主义不是生成一次就固定不变的外壳。它会产生不同版本：有的更适合公开传播，有的更适合组织纪律，有的更适合获得资源，有的更适合进行敌我分类，也有的坚持理论纯度，拒绝接口。生态通过五类接口改变各个版本的生存机会，使其中一些迅速成为代表，另一些则被压低为边缘声音。高权重环境可能奖励对权威语言的熟练使用，奖励能把复杂矛盾压缩成敌我判断的表达，奖励能把组织要求翻译成伦理义务的叙述。得到放大的版本随后又会吸引新的理论家，为自己补充历史、概念和道德语言，从而显得越来越独立。生态的作用不是直接写好全部文本，而是改变哪些文本拥有成为“主流版本”的机会。

版本竞争不等于谁更真实。筛选并不表示留下来的对象没有思想，也不表示被压低的对象一定更真实；生态解释的是现实回报率，不是理论价值判断。一个低权重对象可能拥有完整文本，却没有传播、组织和机会；一个高权重对象可能理论粗糙，却因接口顺畅而迅速扩张。文本质量、主观真诚和现实加权必须分层，不能用其中一层替代另外两层。

一个版本被放大以后，其他版本也可能反过来改变它。真诚信徒的实践、组织冲突、传播竞争和资源压力都会重新塑形外壳。旧高权重结构即使能够筛选，也不能预先决定新主义的全部变化。生态是约束和选择环境，不是万能剧本；具体理论创造和结构加权不能相互取消。

新主义生态中会存在大量低权重内容。它们可能在文本中占据很大篇幅，可能被信徒反复讨论，也可能具有很强的个人意义；但如果它们不能进入资源、传播、组织、敌我和机会的关键结算，就不能决定现实方向。文本数量不等于功能权重，信徒人数也不等于现实控制力。反过来，某些内容在文本中只占很小部分，却可能因为进入制度程序、组织纪律或敌我划分而拥有更高现实权重。判断现实权重，不能只看哪个口号最响亮，而要看哪些内容能够兑换位置、资源和保护，哪些内容能够改变谁被允许、谁被排除、谁能够继续传播。低权重内容的存在并不意味着理论没有意义，只是它不能自动解释最终功能。低权重内容并不因此被宣布为虚假。权重优先论与五类接口共同解释文本篇幅和现实权重之间的差异。生态把某些内容从文本层推入现实层，把另一些内容留在低回报位置。最终方向是接口结算的结果，不是篇幅和自述的简单结果。

三、新主义为何会越来越看似独立

新主义会被后来者不断补全，源头也最容易在这个过程中被遮蔽。第一代外壳可能只有粗略议题、明显的政治功能和有限的理论表达；第二代人进入以后，会为它补充逻辑、伦理、历史叙述和学术语言；

第三代人只看到一套已经完成的理论，于是开始争论谁更纯、谁更原教旨、谁最符合文本。在这个过程中，文本生产者未必是在伪造。他们可能确实相信自己在创造，确实希望把理论写得更好，也确实反对旧有意识形态。分散的文本创作、选择性传播、现实利益回报以及后续的理论完善，构成了一种生态收束，但这并不是每个理论演进都必须走完的固定阶段。理论越来越自洽，并不能自动证明权重越来越独立；思想可以被修补，现实加权仍然取决于谁提供资源、谁控制传播、谁决定组织位置，以及谁把某些判断转化为现实后果。

真正的“初衷”可能早于新主义的命名。这里所说的初衷，并非具体人物隐秘的私人意图或主观心理，而是在社会结构收束下形成的起始功能方向。文本上的祖先可以是 A 理论家，政治功能上的先在条件却可能来自 B 已经建立的高权重结构。主观初衷、生成条件、构成目的与实际功能各自具有明确内涵，可能相关却不可相互替代，在社会结构收束下形成的起始功能方向也并不等于其中任何一层。然而，同一环境完全可能催生反 B 思想，因而旧结构环境的先在存在，本身不足以证明新理论旨在服务该结构。只有在形成时期的材料能够证明与 B 结合的目标已实质进入核心命题、判断次序或行动要求时，才可断定这种结合已构成理论内部的构成目的，而后来的结合也才是这一既有目的的展开。同样，后期的多次依附与合作不能直接倒推初始目的；但形成时期的功能定向一旦被证实，该关系便不能视为后来的偶然利用。

这种判断绝不能被扩展为所有参与者都清楚知晓外壳功能。真诚信徒的存在与非阴谋论的分析边界并存，二者都不能被取消。生态机制能够解释外壳怎样生成、怎样被筛选并承担现实功能，却不能据此推断每个参与者都具有相同的认知，更不能假定所有行动者共同知情或密谋。理论形态的日益完备，既不能遮蔽其生成条件与责任归属，也不能反过来变成判定所有人皆具恶意的依据。

名义、组织或表述上的独立，并不等同于生成目的层面的真正独立。既不能因为存在表述和程序层面的自主，就断言其起源没有依附性，也不能在缺乏证据时把真正的独立起源妄断为起初的假装独立。捕获也不是一个瞬间完成的动作。早期可能只有资源接触，中期出现传播和组织依赖，后期才在敌我和机会接口上形成稳定重排。某个对象在早期可以保留较强自主性，后来因持续依赖而改变功能；另一个对象可能在传播上被放大，却在组织上保持独立。时间层次不是固定阶段，而是对接口变化的描述。最终功能与旧权重相容，不代表早期每个行动从一开始就出于同一目的；早期存在独立性，也不能用来否认后来发生的捕获。这两道限制并不取消同源机制，但具体对象何时只是接触、何时形成依赖、何时出现方向重排，仍须由事实材料说明。没有日期时，可以交代机制顺序和事实边界，但不能补造具体年份。

时间层次还解释了为什么新主义的自我叙述可能长期保持稳定，而现实功能已经变化。外壳沿用旧宣言，信徒沿用原始仪式，理论家继续修订文本；与此同时，组织中的关键位置、资源来源和敌我结算已改向。文本延续和功能变化不是互相排斥，而是换壳得以持续的条件。

四、捕获与换壳

当一个新主义在生态中获得资源、传播、组织和合法性位置以后，意识形态捕获才有可能持续发生。捕获不是把新主义的理论内容一扫而空，而是使旧结构能够利用新外壳所提供的语言、信徒、组织形式和道德能量，使之进入旧高权重结构的结算体系。被捕获的新主义看起来更现代、更温和、更时髦，可以继续使用新的概念，形成真诚的内部伦理，甚至可以公开批评旧共产主义的某些错误或旧制度的某些现象；这不妨碍它继续承担旧高权重结构需要的政治功能。

捕获的结果常常不是公开宣布“旧功能进入新主义”，而是当外壳需要资源、传播、组织、敌我和机会时，旧权重可能把这些需要转化为现实方向。新主义由此逐渐学会什么语言更容易获得保护，什么敌人更容易获得共同谴责，什么组织形式更容易取得位置，什么机会更值得追逐。行动者可能把这种适应理解为现实主义、策略或生存需要；它也可能确实是局部合理的选择。但当这种适应不断累积并改变功能方向时，换壳便跨过了旧理论的死亡：旧文本已经失效，旧功能却在新外壳中继续存在。

新主义生态承接交媾主义所揭示的形成关系，并把观察范围扩展到多种新主义的持续供给、筛选、捕获与换壳。形成期的生成性收敛、形成后的捕获以及换壳并非同一种机制，但可以在同一现实进程中相互作用。换壳所描述的是旧政治生存逻辑跨越外观变化继续延寿：一个旧理论可能在公开语言上失去解释力，旧的合法性来源可能破产，旧组织名称可能失去吸引力甚至成为负担；但旧高权重结构仍然拥有捕获、资源偏置与排序、传播加权、组织嵌入、敌我划分和机会捕获能力。只要生态持续生成可用外壳，这些能力就可以进入新的外壳，旧功能就不必随旧文本一起死亡。新外壳越能够自我完善，越能够吸引真诚信徒，旧功能就越可能在不被直接识别的情况下继续存在。

换壳不是简单改名，也不是每一次概念变化。它要求功能跨越外观继续存在，并在新的资源、传播、组织、敌我和机会接口中获得现实能力。新外壳可以真诚，理论可以自洽，信徒可以反对旧名称；这些事实解释外壳为什么有吸引力，却不能单独证明旧功能已经消失。反过来，看到相似功能也不能直接反推旧理论家预先设计了新外壳。

夺舍比换壳更强：外壳仍在，现实权重、组织功能和方向却已经被另一结构接管。“主动开放空间、却未意识到后果”的情形说明，夺舍不必来自某个中心预先写好的剧本，但夺舍同样不等于普通融合、一般继承或单纯影响。是否达到夺舍，必须观察资源权重、组织位置、敌我划分和现实后果，不能仅凭语言相似或最终受益作出判断。捕获、换壳和夺舍不是必然依次出现的三个阶段，而是彼此关联的机制。它们在具体对象中怎样连接，仍须根据案例材料逐案判断。捕获使旧结构取得新外壳接口，换壳使旧功能跨越外观变化继续延寿，夺舍则描述现实控制方向发生更深改变；这组解释关系不能被直接推成普遍的历史规律。

捕获结果和换壳深度不同。意识形态捕获至少有几种不同结果。第一，外壳被放大，但没有取得稳定组织和资源，旧功能只获得短期传播。第二，外壳取得资源和组织位置，开始承担旧权重的部分功能，

但内部仍保留多方向竞争。第三，外壳在关键结算上被重新赋位，现实方向发生持续改变，接近功能接管。不同结果不能用一个“被利用”概括。

换壳具有不同的运作深度，且各深度之间并不存在必然递进的台阶关系。词汇、修辞或传播形式的改变本身尚不足以构成换壳；浅层换壳要求新外观在实际上接过了旧有的政治或社会功能；中层换壳表现为组织和机会接口重新接续；深层换壳则使旧政治生存逻辑跨越理论本身的死亡，继续支配资源调配、敌我划分和组织结算。一个具体对象究竟处于哪一层，只能由严格的事实材料确定；生态环境的客观存在，绝不能作为直接判定深层夺舍已经发生的证据。

五、生态反馈：被筛选者也会改变筛选环境

媒介并非只负责传播既成的新主义。媒介可以选择议题、改变节奏、制造可见性、组织情绪和划分敌我，从而参与外壳的生成。某种表达如果能够迅速引发共同情绪，就更容易获得传播和组织位置；某种复杂理论如果无法在媒介节奏中被压缩，可能在文本上成立，却难以取得现实权重。情绪不等于虚假，也不等于纯粹操纵。真实的不满、恐惧、希望和屈辱可以成为新主义生态的材料；结构可以把它们命名、集中、放大和导向。情绪接口一旦与资源、组织和敌我结合，就可能把个人经验转成集体身份，把身份转成资格和排除。

媒介还会造成时间压缩。一个新主义可能在很短时间内获得大量注意，却没有形成稳定组织；也可能长期在低可见性中积累，直到机会窗口出现才迅速扩张。传播峰值并不等于捕获已经完成，暂时沉寂也不等于理论已经死亡。可见性是否转换成成员、程序、资源和后果，才是生态判断的依据。

机会捕获是新主义生态中最容易被误解为阴谋的环节。一个新主义在危机、政策变化、组织重组或媒介热点中获得入口，可能出于主动制造，也可能来自不同行动者局部选择的叠加。机会被捕获以后，外壳可以迅速扩大；这种扩大本身并不能证明某个中心事先设计了完整路线。生态还会产生错配。某个结构可能希望利用新主义，却发现新主义形成了自己不能完全控制的组织；某个信徒群体可能希望保持独立，却因为资源和机会依赖而逐渐改变功能；某个媒介可能只追求注意，却帮助某种敌我语言获得现实位置。错配说明生态具有反馈和反作用，也说明不能把主动制造直接等同于最终夺舍。

新主义生态并不是单向的上层施加。被资源、传播、组织、敌我和机会筛选出来的外壳，会反过来改变这些接口。一个外壳得到传播以后，能够制造新的注意和新的成员；成员扩大以后，能够提出新的资源要求；资源增加以后，组织可能形成自己的纪律和代表；组织一旦拥有代表，就可能重新定义敌我并争取下一轮机会。生态因此具有反馈性，筛选不是一次完成便结束的选择。

反馈性也说明结构筛选不等于中心全知。高权重结构可以改变回报率，却不必知道每个外壳怎样利用回报率。被筛选的行动者会学习、模仿、抵抗、谈判和重新包装自己的语言，甚至会把原本为旧权重服务的接口转成自己的组织能力。是否发生这种转换，必须根据具体材料判断，不能从生态概念自动推出成功或失败。反馈还可能产生反向后果。一个外壳被放大，是因为它能够稳定某种情绪或敌我；但放大以后，它也可能生成超出原先预期的凝聚力。一个组织被允许进入合法空间，是因为它看似可

管理；但进入以后，它可能重新解释合法性。一个媒介被用来推动某种议题，是因为它能控制注意；但注意本身也可能形成新的权重。生态中的入口、选择和后果必须分开，不能把原始目的直接等同于最终功能。

六、责任、受益与知情不能混为一谈

无意识生成不会让责任消失。即使不存在中心策划，制度责任仍然存在；即使人们并不共享同一个意图，具体行为的后果仍要由相应行动者承担。“不是阴谋论”排除的是万能密室叙事，不能因此把现实中的选择、开放、保护、执行和受益全部抹平为自然现象。结构生成、制度责任和个体责任必须分别讨论。生态解释绝不能把所有行为都推给抽象结构。结构筛选固然改变了不同路径的回报率，但行动者依然切实作出了对语言、组织成员、资源使用和敌我对象的具体选择。主动制造的责任、结构筛选的责任以及无意识生成中的制度责任各有其界限，彼此不能相互替代，更不能相互取消。

没有统一计划，不等于无人作出具体决定；有人作出具体决定，也不等于所有后果都在预见之中。主动开放完全可以与未预料的后果并存。一个中心可以主动打开入口，却不知道新主义最终会取得什么位置；行动者可以为短期目标提供资源，却无法完全预见长期方向；信徒可以真诚参与，同时又在结构中承担旧功能。真诚信仰与功能接管可以并存。至于具体个人是否知情，没有材料就不能替当事人补写心理结论。

新主义生态中的责任至少包括入口责任、筛选责任、执行责任、受益责任和传播责任。打开空间的人未必设计全部结果，但对入口负责；筛选和加权的人未必创造理论，但对回报结构负责；执行者未必知道终局，但对具体排除和组织行为负责；受益者未必发出命令，但从功能方向中获得位置；传播者可能追逐注意，却仍然改变了可见性。

受益责任同样必须依据具体行动链条加以追查。受益者从功能方向中获得位置，并不等于发出了命令；单纯获益本身，也不能自动证明当事人参与了策划、执行或构成既有过错。分析受益责任，需要查明获益同实际选择、保护或维护相关接口及其现实后果之间的具体关系：既不能离开事实依据要求受益者承担同一种责任，也不能在存在具体参与、保护或配合证据时，以未直接发令为由自动免责。

知情程度构成了另一条独立的分析轴线。在现实中，知情状况往往呈现分化：有人可能清楚接口的短期用途，却无法预见长期后果；有人可能坚信自己的理论具有完全独立性，却未曾察觉背后的资源依赖；还有人清楚自己在利用旧有权重，但将这种依附解释为现实策略。责任与知情不能简单划等号，认知上的局限也并不构成自动免责的绝对理由。然而，无知不能免责并不意味着可以脱离行为的具体事实依据而随意归责。当事人可能没有意识到最终后果，既不能取消其既有行为的责任，也不允许分析者凭空拟制一个全知全能的操盘中心。

行动者绝不能被抽象理论压缩成没有意志的工具符号。每个人的理论建构、实际行动、组织位置及其产生的现实后果，都必须分开独立判断。生态分析不能替代具体的人物证据，更不能在材料展开之前，就预先为任何历史或现实人物分配既定的责任类型与动机定性。

七、生态研究的最低证据链

相似的语言可能来自共同经验，也可能来自传播模仿、文化资源、组织借用或独立理论创造。相似结果可能来自相同的高权重环境，也可能只是表面形式相近。生态理论不能把任何相似都纳入捕获，更不能因为某对象最终与旧结构同向，就反推出其理论源头必然相同。具体对象还可能存在其他解释：独立理论来源、短期合作、偶然传播、组织自我发展、外部环境变化，或者真正的方向分歧。这些解释也要接受事实检验，并由此划定理论适用于具体对象时的边界。

新主义生态必须有反证，否则就会变成无论材料怎样都能吸收的万能结构。某种传播可能是广泛扩散而非权重控制；某个结构可能最终受益但没有主观策划；某个外壳可能确实改变了现实功能，而不是被旧结构接管。缺少个案材料并不自动推翻生态理论的合理性，但当确凿的反证直接触及机制的适用条件或理论预期时，就必须对相应的解释范围作出修正，绝不能使理论自身处于免于检验的封闭状态。

对具体新主义作出较强判断，至少要形成若干可回查的证据链：第一，来源链说明理论、组织或经验从哪里来；第二，入口链说明谁提供了资源、传播、组织、敌我或机会接口；第三，过程链说明接口怎样持续、重排或反馈；第四，结果链说明谁获得位置、谁承担代价、现实功能怎样改变。四链不必每次都完整，但缺哪一链必须明确，不可用抽象理论补齐事实。缺失关键证据链时决不能强行得出全局性结论。来源链和功能链不能混为一谈。理论家没有说过某个功能，不等于功能不存在；现实功能出现，也不等于理论家早已策划一切。入口链和结果链也不能直接相连：一次资源合作不自动产生夺舍，一次传播放大不自动产生功能接管。生态分析要追踪中间过程，不能从入口直接跳到结果。事实不足时，日期、数字、组织关系和具体因果关系只能保持未定，未经证明的推断不能直接当作经验事实成立。

五类接口是联合观察的不同维度，并不意味着每一个案例都必须五项齐备闭合。与此同时，接口卷入的时长也不能替代对支配方向的性质判断。证据链也要容纳反例和中断。对象可能获得资源却拒绝敌我重排，可能传播很广却没有组织能力，也可能进入组织却没有改变机会结算。这些中断构成生态理论的事实边界，使它不能变成无论什么结果都能解释的万能法。

同样，不能把“无中心”当成“无结构”。没有统一总导演，仍然可能有制度筛选、资源偏置、传播加权和组织接口；但这些结构作用需要事实材料，不能从无中心这个逻辑判断直接推出。相反，也不能把“存在主动选择”扩展成所有结果都有统一计划。

八、从生态进入连续人物史

一种新主义如何在旧网络中从起点形成，旧结构如何在其成形后进入或捕获既成形态，以及更广生态为何持续产生可供利用的新外壳，彼此相关，却不是同一个机制。前者要追踪旧节点、高权重和生成性收敛；后两者涉及既成新主义的现实捕获，以及主动制造、结构筛选、无意识生成、版本竞争和换壳。它们可以在同一生态中交错，却不能互相替代。人物与媒介连续线之所以必须从生态进入，是因

为人物不是孤立的姓名，而是外壳、接口、组织和传播在具体历史节点上的聚合。一个人物可能把理论变成组织能力，另一个人物可能把组织能力转成媒介传播，媒介又可能把情绪和敌我转成新的机会窗口。

落实到具体的人物和媒介链条，毛泽东是这条连续线上的确定节点，人物原话、事实材料和既定理论判断共同用于说明该节点怎样承载全国化政治核心、组织动员、资源重排与外壳转换；王洪文如何承载特定组织位置，张宏堡和李洪志如何进入这条连续线，《意林》《读者》怎样形成媒介接口，张雪峰和周丽峰怎样进入人物—媒介关系，网络主播“斯奎奇大王”怎样成为后续的结构节点，各自的具体功能与承载方式仍须依靠对应材料分别确立，不能预先设定其理论角色。

人物不是生态理论的装饰，不能被压缩成生态理论的一组例子，也不能把每个人都当作单一固定机制的代号，《意林》《读者》同样不是人物之间的过渡符号。生态条件进入具体节点以后，每个人物和媒介都有自己的材料问题：它以什么外壳出现，进入了什么资源和组织接口，如何获得传播位置，如何处理敌我和机会，现实功能是否发生改变。对每个节点的判断，需要将原始论述放回其完整上下文，再同后来形成的修正和公开事实相互核对。单个节点的材料可能证明某些接口，却未必能够证明全部接口。生态机制提出问题，具体人物和媒介的材料决定答案。这些抽象关系还要落到已经排列的人物节点上，但具体人物不能反过来吞掉生态理论。

理论关系的连续并不等同于具体事实的直接连结，理论问题的逻辑编排也不等于严格的历史年代顺序。人物排列顺序本身无法证明师承、直接指挥或组织继承；即便人物在传播媒介上相邻或呈现连续位置，也不能自动推断出控制关系。在理论演进的链条中，前一节点并不自动制造后一节点，各节点的材料来源、实际事实与具体功能必须分别确立，绝不能脱离事实证据，将生态中的媒介关联径直判定为确凿的组织史。

新主义生态可以解释外壳为什么出现、为什么被筛选、为什么被放大和为什么可能被捕获，却不能由此直接推出满洲反噬。反噬属于终局判断，并不是所有新主义生态必然抵达的结果。生态提供的是供给条件、筛选条件和换壳条件；是否形成更大范围的反向功能，仍须经过人物、媒介、组织和中心失去对政治生存逻辑的垄断的连续论证。

第二十六章　从政治核心到日常媒介：人物与传播的连续线

一、毛泽东：始作俑者与后清第一皇帝

<!-- sources: MC026-P001,MC026-P002 -->

毛泽东是这条人物连续线的起点，也是始作俑者。这个起点不按姓名出现的先后来算，而在于一个政治核心第一次把捕获、重新赋位、组织动员与国家最高权重连成一体，并把这种连接推进到全国尺度。

此前的政治力量可以借用旧有制度、聚集追随者，也可以在局部形成支配；毛泽东则把公共语言、干部组织、军队、宣传、群众动员和敌我分类合成了一种可持续的全国性政治能力。说他是始作俑者，不是指简单的发起者，也不是说他独自制造了全部历史条件，而是说后来的制度安排、人物上升与政治清除，都在不同程度上继承了他首先完成的那种权力组织方式。

<!-- sources: MC026-P001,MC026-P002 -->

他把一个原本处于国家竞争场域中的政治组织，塑造成可以代表人民、解释国家、规定历史方向并调用强制资源的中心。组织不再只是参与国家的团体，而被改造成国家身体的核心；国家不再只是需要争取的外部容器，而成为组织可以重新编排的整体。身份怎样被编入，位置怎样被赋予，资源怎样被集中，最高权重怎样由个人—组织复合体占据，也由此成为后来每个节点都绕不开的结构问题。

<!-- sources: MC026-P003 -->

毛泽东其实就是满洲国的风格。到毛泽东这里，“满洲国风格”第一次在全国尺度上展开。它不只表现为工业、军队或行政技术，更在于政治核心能够捕获可用的语言、机构、人员和资源：旧有外壳仍然保留，却被重新置于新的最高权重之下。国家、政府、人民、共和国等名称可以继续使用，机构仍可承担行政、教育、宣传和生产功能，人员也可以在新秩序中继续工作；真正发生转换的是这些名称的解释权、人员归属的决定权和资源分配权。毛泽东把这种捕获推进到组织—国家的整体关系：党、军队、干部、宣传和群众组织互相咬合，使政治核心既能进入社会，也能把社会重新编排成自己的国家身体。

<!-- sources: MC026-P004 -->

毛泽东用民国体制语言做大，然后夺权。民族、国家、人民、民主、救亡、代表、政府、共和国等词，都是民国政治空间中可以被识别、争夺和传播的公共语言。毛泽东没有把自己置于这些语言之外，而是在语言内部重新安排主体关系：谁代表人民，谁有资格解释民族，谁能够以政府名义行动，谁才是共和国的真正主人。语言构成进入国家的接口，组织构成接口后的承载结构。政治核心借助这些词获得可见性、合法性和动员范围，再以干部、军队、宣传和纪律把这种可见性固定为实际权力。

<!-- sources: MC026-P005 -->

“做大”不能只理解为宣传成功或队伍扩大。所谓做大，是把组织身份、政治纪律、资源调度、群众动员和历史解释权变成可以持续运转的现实结构。要形成这样的结构，组织必须能在不同地区复制自身，把人员从地方关系中抽出并重新编入，还要把生产、征收、战争、教育和宣传纳入同一套政治分类。只有在这种结构中占据中心，一个人或一支队伍才可能从政治竞争者变成国家最高权重的承载者。毛泽东先以民国公共语言取得国家接口，再以组织能力扩张接口，最后让组织的最高中心夺取国家身体的最高解释权和配置权。

<!-- sources: MC026-P006 -->

夺权不是普通职位的更替，而是国家身体内部最高权重的转换。旧有的名义、机构和公共词汇不必消失，甚至可以继续沿用；真正改变的是它们的归属。国家仍然称为共和国，人民仍被置于正统中心，政府仍以现代行政形式运转；决定忠诚、敌我、资源和历史方向的权力，却集中到个人—组织复合体中。毛泽东不仅居于这个复合体的顶端，还把这一位置塑造成后来所有人物节点都必须通过的赋位中心。

<!-- sources: MC026-P007,MC026-P008 -->

在毛泽东的统治结构中，包衣与主人—依附关系表现为身份与位置被重新编排。工人阶级是毛泽东政权的包衣。政权把“工人阶级”置于政治正统中心，通过代表、组织和动员将其纳入国家身体，却不把最高权重交给具体劳动者。工人被赋予中心身份，进入权力结构时却仍是被代表者、被组织者和被调用者。

<!-- sources: MC026-P007,MC026-P008 -->

主人—依附并不只意味着上对下的命令，它还包括身份赋位和资源位置的分配：谁被称作先进阶级，谁能够进入干部序列，谁获得教育、编制、住房、荣誉和政治信用，谁的劳动与牺牲被转化为组织的正当性，谁则只能在被代表的位置上提供力量。毛泽东的统治结构把这些不同资源接到同一中心，使工人阶级既成为合法性来源，也成为组织可调用的社会身份。包衣是制度归属：被纳入正统，却不占据最终的主人位置；被赋予象征中心，实际位置却仍依附于能解释和分配这一象征的政治核心，这就是包衣关系的张力。

<!-- sources: MC026-P009 -->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是后清的第一个皇帝。这个命名不是旧式王朝法统的复原，也不是把现代国家简单改称古代帝国，而是指出一种新的结合：现代组织技术、党军体系、宣传网络、群众动员和行政机构，与皇帝式的最高权重结合。国家身体仍以现代词汇和组织形式运行，社会仍被纳入公共制度，人民仍被宣布为政治主体；然而，忠诚、资源、敌我与历史方向最终都由个人—组织复合权力决定，这种权力也从这个中心向全国传播。

<!-- sources: MC026-P010 -->

“第一个”同样具有结构意义。毛泽东第一次把这种最高权重组织成全国性的制度现实：党能够制造干部和身份序列，军队能够承担国家暴力，宣传能够把解释权扩散至全国组织，群众动员能够把社会各单位接入政治中心，组织纪律能够把异议转换为归属问题。宣传与全国组织承担的不是单纯的信息传播，而是把同一套身份、口号、会议、学习、表彰、清除和资源分配机制复制到不同地域与单位，使国家各部分以同一中心的语言相互识别。由此，个人权威不再停留在个人魅力，而被嵌入一套能够自我扩展的党军宣传和全国组织机器。

<!-- sources: MC026-P011 -->

毛泽东由此把人物连续线的基本问题摆了出来：后来的节点如何从这个中心获得身份与位置，又如何在同一结构中上升、失位或被清除。王洪文不是毛泽东的简单复制。他来自工厂，经由上海政治入口上升；这样一个人如何被推进到全国制度位置，并在最高权重结构中呈现出自己的节点形态，需要单独考察。

二、王洪文——第二节点与满洲渔猎风格

<!-- sources: MC027-P001,MC027-P002 -->

王洪文是人物连续线的第二节点。这里的“第二”不只是先后次序。毛泽东开启的组织—国家结构，到王洪文这里开始从另一种人物入口显现：一个来自工厂、以工人身份进入上海政治运动的人，被政治核心捕获、重新赋位，继而被推进到全国党的制度中心。这个节点不是一份履历所能概括的，也不是毛泽东的缩小复制；它呈现的是同一套连续结构在新入口上的运作。王洪文也是满洲渔猎风格的。这里的“渔猎”不是性格比喻，而是政治核心对已有身份、运动能量与社会位置的捕获方式。渔猎式权力不必先消灭对象原有的全部特征，而是把可用的身份和力量从原来的关系网中提取出来，重新放入核心设定的序列。王洪文的工人身份、上海工厂经验和运动入口没有被抹除，反而成为他获得政治可见性的重要材料；但这些身份一旦进入最高层，便不再由工厂或地方关系自行决定意义，而由政治核心重新规定其代表什么、能够占据什么位置、可以调用哪些资源。

<!-- sources: MC027-P003,MC027-P004 -->

王洪文首先从上海工厂进入这条连续线。现有公开材料能够确认：他原是上海工厂保卫干事，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上海工总司头目，并由此进入中央选拔视野。这些经历并不说明他天然代表工人。它们显示的是一次身份转换：工厂岗位和社会身份经过政治运动的集中化，被转译为可以进入全国权力结构的政治资本。上海不是抽象背景，组织、工厂、群众运动和城市资源在这里连接起来，构成运动与城市组织的现实支点。王洪文并非沿着既成的中央官僚履历进入，而是从社会单位和城市运动的入口被捕获。捕获之后，他的工人身份被提升为全国政治叙事中的象征资源，上海运动经验则被转译为中央层面的政治资格。这种赋位不等于他已经拥有全部最高权力，也不意味着个人路线就此自动成立，而是使他在会议、报告、党章和领导机构中成为能被识别的正式声部。

<!-- sources: MC027-P005,MC027-P006 -->

这一身份转译在中共十大的准备工作和正式程序中有了制度表现。公开党史材料记载，十大准备过程中由王洪文主持修改党章；1973 年 8 月 24 日至 28 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王洪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这份报告不是履历上的装饰，它本身就是位置变化的证据：党章修改由他主持准备，报告也由他向全国党的正式会议作出，地方身份由此进入制度语言，运动能量也进入党章程序。这份报告足以确认王洪文已经获得制度性发言位置，可以在最高层的公开程序中承载党章问题；但它不足以证明报告代表一条由他个人独创的完整路线，更不能据此认定他已经成为必然接班人。制度位置所反映的是组织赋位，不能拿来推测他的全部思想、心理动机或私下关系。

<!-- sources: MC027-P007,MC027-P008 -->

1973 年 8 月 30 日，党的十届一中全会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王洪文列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这个正式制度位置，把一个来自工厂、经由上海运动入口上升的人编入最高层领导机构。他的上升既不能归结为个人声望，也不能只看作地方运动的余波，而是通过身份赋位、组织程序和最高权力位置的连续转译完成。工人身份成为可被调用的正统资源，十大党章报告带来全国制度发言权，副主席位置再把这种发言权提升为最高权力体系中的正式席位。副主席这一正式位置把最高权力赋位的两面同时摆了出来：政治核心能够把一个新人物推入既有权力结构，政治秩序也借此显示出制造新代表性中心的能力；可是，副主席的名义不等于资源、军队、干部和解释权都已由王洪文独立掌握。名义权重与实际可调度能力之间仍有距离，他被赋予了最高位置，却依然处在那个能够赋予、也能够收回位置的核心关系中。

<!-- sources: MC027-P009,MC027-P010 -->

王洪文的上升和失位方向相反，却发生在同一结构之中。上升时，工厂身份和上海运动能量先被捕获，再通过党章报告、中央发言和副主席席位获得新的政治位置；失位时，此前形成的政治身份又被同一套组织机制重新命名为归属问题，并经正式决议撤销其位置。前者不能只解释为个人成长，后者也不是制度之外的私人失败。1977 年 7 月 16 日至 21 日，党的十届三中全会通过有关“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永远开除王洪文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有公开制度材料可核，决议本身已经构成结构事实。同一个全国组织曾把王洪文从工厂和上海运动入口推入副主席位置，后来又以全会决议收回他的党内外位置，将第二节点从最高层制度中正式清除。席位的合法性从未脱离政治核心的最终裁量；最高权重始终可以重新安排身份、位置和资源，身份归属、组织程序和最高权重配置始终是同一套机制，只是作用方向从赋位转向了收回。

<!-- sources: MC027-P011 -->

王洪文之后，人物连续线转入改革后的张宏堡和李洪志两个节点。两人的位置不能压成同一种功能。公开传播、组织形式、身体实践、文本、关系转折与媒介外壳，在他们身上分别呈现出不同形态。张宏堡构成下一个节点，体制语法如何回到社会并形成新的归属秩序，也从这里展开。

三、张宏堡：借壳生蛋、墙内拆梁与神志清醒状态下撒酒疯

<!-- sources: MC028-P001,MC028-P004,MC028-P005,MC028-P006 -->

张宏堡的出现，不能只用“神秘人物”来概括，也不能简单归入反共人物名单。改革开放并没有把所有人从旧秩序中直接带入稳定的现代生活。他所进入的，是改革以后逐渐扩大的一个缺口：旧的强制动员开始退潮，单位、福利和原有归属不再提供完整秩序，新的公民伦理、制度信任和公共仪式却没有及时补上。面对疾病、迁移、失业、家庭压力、身份变化和意义空洞，人需要的不只是解释世界的

道理，还需要一套能够安排身体、时间、关系和希望的秩序与仪式。制度如果不能同时提供可信边界、可预期责任和可参与的公共形式，秩序需求就会转移给更近、更快、更能给出确定感的组织。

<!-- sources: MC028-P001,MC028-P004,MC028-P005,MC028-P006 -->

气功、讲习、出版、展会和组织网络，正是在这个缺口上获得现实入口。气功在这里不只是身体练习，它把身体经验、健康愿望、传统语言、教师权威、集体练习和日常纪律连接起来。一个人先以治病、强身或改善状态进入，随后在固定时间、固定话语、固定动作和固定关系中获得共同体感。身体实践因此可以成为组织的入口；组织又可以把身体经验翻译成文本、课程、仪式和归属。现场之外已经存在需求场；一个敢于占据中心、敢于提供完整解释的人，正是借此把个人姿态变成社会力量。组织只要能够同时提供身体实践、解释、关系和仪式，就可能暂时补上制度留下的空位。

<!-- sources: MC028-P007 -->

现有可核对的材料显示，张宏堡是中功的创立者，中功在 1987 年前后形成，随后通过公开展示、课程、讲习和出版扩大传播，也形成了商业化运作。Dui Hua Foundation 与《洛杉矶时报》的材料，为人物、组织、年代、传播和后续经历提供了可以核对的线索。至于组织规模，各来源的转述并不一致，其中一些数字来自组织自报；三千万、三千八百万等说法因此不能当作客观统计。

<!-- sources: MC028-P008,MC028-P009 -->

这条事实线并不回答气功是否科学，它显示的是气功当时能够进入哪些公共接口。健康、讲习、展会、出版和社会关系都可以成为入口；单位松动以后，气功还可以提供低门槛连接。中功借用体制提供的语言和程序，在这些公开接口中建立自己的课程、文本和关系。从课程到出版，传播获得了脱离单次现场继续运行的能力；从展示到组织，个人练习获得了可观看、可复制、可加入的形式；从身体到文本，体验获得了持续解释自己的语言。中功因此不是孤立的个人表演，而是身体、权威、课程、出版、商业和关系网络彼此咬合后的组织形态。

<!-- sources: MC028-P002,MC028-P003 -->

张宏堡、李洪志都是满洲国文化，这绝对不是偶然。满洲国文化训练出的，不是对抽象秩序的忠诚，而是对强弱、风向、外壳和现实权重的敏感：体制强盛时使用体制语言，体制出现裂缝时又能把同一套语言反过来调用。张宏堡的传播形式，正把这种机制显露出来。逻辑和理性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大胆和厚黑。严密论证需要时间、共同知识和制度信任，大胆断言却能迅速制造中心、气场和追随。神志清醒状态下撒酒疯，正是明知自己在做什么，却把现场感、夸张姿态和归属感置于逐句论证之前。共产主义不是撒酒疯？大跃进不是撒酒疯？当宏大承诺、集体热情和服从机制绑在一起，理性不再承担纠错功能，反而成为动员完成后的解释外壳。

<!-- sources: MC028-P010,MC028-P011 -->

张宏堡这个节点的尖锐之处，在于“有秩序的组织”与“非理性的姿态”同时存在。外部看上去夸张、神秘，甚至像是已经失控，内部却可能有清晰的课程、等级、收费、传播和关系安排。神志清醒状态下的极端姿态，表面上推高了情绪、奇迹与个人权威，内部则利用这种强度来制造服从、记忆与归属。这里的逻辑不是不存在，而是可以替换。面对健康问题时使用身体语言，面对传播时使用科学或传统语言，面对组织时使用纪律和师徒语言，面对公共场合时使用文化和群众语言。语言随着接口改变，核心权威和组织关系却可以继续保持。逻辑成为外壳，连续性由权威、仪式、文本、纪律和归属维持。

<!-- sources: MC028-P012 -->

大胆和厚黑在这里有了现实作用。大胆的人抢先占据解释中心，别人便不得不进入他的坐标回应；厚黑的组织不必先证明每一个命题，只要把课程、文本、关系和现场先建立起来，追随者就会在参与中获得身份。论证由此被组织经验替代，怀疑被归属感包裹，个人体验被编入共同体。

<!-- sources: MC028-P013,MC028-P014,MC028-P015,MC028-P018 -->

张宏堡并不是一个完全来自体制之外的异物。他呈现的，是体制语法被社会组织重新调用之后发生的变形。组织可以借用国家认可的健康、文化、科学或群众语言，先取得可见性，再建立自己的课程、文本、关系和纪律。在这个过程中，同一套语言进入不同的权重关系，改换了支配它的主人；原有外壳则被新组织用来生产自己的归属。这正是“借壳生蛋”与“墙内拆梁”的运作方式：借壳生蛋的关键不是外壳被偷走，而是既有外壳、熟悉名称、通行语气和可识别的合法性仍然继续工作，让新内容能够在旧接口中孵化；墙内拆梁的关键也不是一场秘密行动，破坏不总从制度外部撞进来，而是组织权重在既有分类和传播渠道内部发生转移。人还在原有社会里，语言还像原有语言，仪式却已为新的中心服务。

<!-- sources: MC028-P013,MC028-P014,MC028-P015,MC028-P018 -->

墙内拆梁拆掉的不是所有梁柱，而是原有梁柱之间的权重关系。旧政治的语言、组织经验和群众动员技术，可以在新权威手里继续运行；换壳以后，过去的政治外观不再是唯一外观，旧政治生存逻辑却可以存活。一旦原本用于维持秩序的接口仍在运转，而决定其现实方向的内部最高权重和归属已经换了主人，夺舍便由此发生。不过，这指的是组织权重切实完成转移时的机制判断；就本节所涉的公开传播材料而言，尚未连成某个具体旧机构在人事、资源与决策权上已被成功完整夺舍的个案证据链。

<!-- sources: MC028-P016,MC028-P017 -->

最后反共反得最厉害的，最初和中共关系密切，甚至是体制内的。这不是外部文明突然闯入，而是熟悉体制语言、组织程序和权威接口的人，反过来调用体制教给他的那一套。反共并不自动意味着从体制外部诞生。许多最有力的反共姿态，可能来自熟悉体制语言、组织程序和权威接口的人。他们知道如何把官方词汇转成新的正统，让原来的忠诚形式服务于新的主人，又如何在旧秩序的裂缝里建立自己的解释权。关系转折以后，外壳可以翻转，敌我语言可以倒置，组织也可以宣布自己已经离开旧中心；但它仍然携带着旧体制训练出的组织记忆。

<!-- sources: MC028-P020 -->

这条人物连续线随后延伸到李洪志。他把公开传播推进到更完整的课程、文本、协会和展会。同样是在改革后的气功公共环境中，身体实践与权威文本形成共同体，公共接口与组织秩序彼此借力；此后，国家处理和关系翻转又使换壳与夺舍的问题显现出来。

四、李洪志：公开传播、借壳、换壳与夺舍

<!-- sources: MC029-P001 -->

两人不能被合并成同一个人物，却可以放在同一个时代缺口中观察：旧的强制性归属正在松动，新的制度信任、公民伦理和公共仪式尚未稳定。张宏堡凸显了组织化和体制语法的重新利用；李洪志则把这条线推进到公开传播、课程、文本、展会、协会和关系转折。

<!-- sources: MC029-P003 -->

1992 年 5 月，长春出现早期公开讲习。随后，讲授在多地展开，课程和文本逐步形成，传播也有了可复制的形式。身体练习、传统语言、健康经验和日常不安，被压缩成可以讲授、也可以带走的课程；固定时间、固定话语、文本和师徒关系，又使个人体验获得了组织的最小形态。公开传播不能只归结为个人魅力，它把身体、解释、权威和归属装进了同一套可复制的接口。

<!-- sources: MC029-P004,MC029-P005 -->

九十年代气功活动并不只存在于私人空间，它可以通过讲习、协会、出版、健康展会和公共活动获得可见性。这些公开接口给新组织提供了合法语言、可见场所和传播渠道。李洪志的传播同时占用了两种资源：一方面是体制允许流通的健康、文化和传统语言，另一方面是个体在风险社会中对身体、解释、归属和仪式的需求。

<!-- sources: MC029-P006,MC029-P007,MC029-P008,MC029-P009 -->

早期传播通过健康、协会、出版、展会和其他制度与市场接口，逐步形成可携带的组织形式。课程组织身体；当课程被文本固定下来，解释便得以固定，传播也获得了脱离现场继续运行的能力；展会把个人修炼变成可观看的公共展示，制造可见性；协会则提供既有分类，把零散活动嵌入其中。新的共同体就在这些旧接口里生长。面对不同场合，组织可以以健康、文化、传统或修炼的面貌出现，而核心关系仍围绕教师、文本和共同体展开；当这些新的文化与组织外观在旧接口失效后仍能实际承接原有的动员与归属功能时，组织便获得了换壳能力。

<!-- sources: MC029-P006,MC029-P007,MC029-P008,MC029-P009 -->

借壳生蛋、墙内拆梁、换壳与夺舍并非每个案例都必须依次走完的固定阶段，而是组织在不同条件下对既有接口的调用与改写：先使用既有气功环境、健康语言、出版和公共活动接口，让新的共同体在可识别的外壳中形成，并在既有分类和传播渠道内部改写归属。如果旧接口留下的形式进一步被新的

权威、文本和归属关系重新占据，使原有接口内部的最高权重转交给新的权威和归属，就会构成夺舍；但仅凭公开活动接口的使用，尚不能直接等同于已经完成对某个具体旧机构的夺舍。到了 1999 年，原先能够公开运转的接口与国家之间发生正面翻转，讲习、文本和共同体不再只是健康与文化空间中的活动，而进入公开政治冲突。最后反共最激烈的那些人，最初同中共关系密切，甚至身在体制之内：关系越靠近，越熟悉它的语言和漏洞；翻转以后，同一套组织能力也越容易被反向调用。

<!-- sources: MC029-P010,MC029-P011 -->

李洪志这个节点留下了三个不能绕开的问题：公共健康与传统文化接口中的传播者，为什么能够在短时间内形成强烈共同体？当制度提供的解释和仪式不足时，个人文本、讲习和组织纪律为什么会变得有吸引力？关系转折以后，原本开放的接口又为什么会被重新解释为威胁？前文说过，在这种动员机制中，逻辑被降格为可替换的外壳，真正稳定组织的是权威、仪式、文本和归属。李洪志的公开传播是公开接口时代的一次组织实验，也是对改革后解释、归属、秩序和仪式需求危机的一种回答。

<!-- sources: MC029-P010,MC029-P011,MC030-P017 -->

沿着这条连续线再往前，论证便由这种高能的组织化接口，转向《意林》《读者》那种温和、文明、去政治化的叙事。这里的推进同样是功能意义上的接续，而非创刊时间的先后——《读者》早在 1981 年便已创刊，早于 1992 年的公开讲习与 1999 年的关系翻转。

五、《意林》《读者》：成瘾、安抚与满洲生存理性的文明包装

<!-- sources: MC030-P026 -->

前面的高能组织形态把身体、讲习、文本、权威和共同体连接起来；到了两刊这里，同一条线转入长期发行、家庭阅读、学校阅读和日常生活。它不再要求一个人进入严密组织，而是让人每天在故事里练习顺应、忍耐、体面、判断风向和自我修正。

<!-- sources: MC030-P001,MC030-P002 -->

改革开放以后，赤裸裸的暴力叙事不再适合承担全部社会动员功能，投毒没有终止，只是换了形状。很多人误以为《意林》《读者》是在偷偷传播西方文明、给体制添堵；实际上，《意林》《读者》从来不是体制的对立面，它本身就是体制的一部分。在中国，不存在所谓民间主流媒体。所有能公开发行、长期存在、全国铺开的媒体，无一不是被严格控制、筛选、校准过的产物。它怎么可能是漏网之鱼？它是被精心设计的叙事窗口。

<!-- sources: MC030-P001,MC030-P002 -->

“精心设计”并不等于某个部门逐字编写每一篇故事。一个媒介节点能够进入全国发行、家庭书架、学校阅读和公共文化市场，本身就是制度筛选、出版秩序和长期校准的结果。依据期刊出版管理规定与年度核验等行政制度，从主管主办审批、办刊宗旨与业务范围限定，到编辑责任制、事后审读以及决定能否继续出版的准入和退出机制，出版秩序始终在划定安全边界；行政规范的存在虽不能替代对

具体每期采编过程的经验考证，却确凿地决定了媒介的存续条件。它可以用故事、文摘、人物、心灵、励志和生活经验作外壳，窗口的边界却由三件事决定：什么能够公开流通，什么能够反复流通，什么能够获得体面包装。偶尔出现西方人物或异域故事，并不是最值得警惕的地方。真正要看的是，它把什么样的世界留在读者面前，又把什么样的问题从阅读中拿走。^{[刊制]}

<!-- sources: MC030-P003 -->

它们的政治价值正在于不像政治。它们不要求读者参加集会，不要求读者公开表态，不要求读者学习一整套抽象教义；它们只需要每天提供一个可以接受的故事、一种可以模仿的生活、一句可以重复的格言和一种可以带回家庭的情绪。体制窗口不必总是高声命令，低冲突的可持续叙事同样能够安排社会的想象边界。

<!-- sources: MC030-P017 -->

《读者》1981 年 4 月创刊于甘肃兰州。按照官网自述，它由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主办、读者杂志社编辑出版，并用“博采中外、荟萃精华、启迪思想、开掘源深”等语言说明自身定位。后来，它又进入出版传媒集团、上市公司和新媒体平台这几类接口，成为长期公开发行、全国传播并进入日常阅读的媒介节点。

<!-- sources: MC030-P018,MC030-P019 -->

“启迪思想”的自我说明不等于真正启蒙。选取外国故事、名人轶事或不同文化材料，本身不能回答启蒙问题；关键在于这些材料怎样被剪裁、转述和情感化。文摘和故事把世界压缩成可以快速理解的片段，把文明变成可携带的格言，把复杂冲突变成一个人的选择。它让读者接触经过筛选的世界，却不让读者获得追问制度、边界和责任的工具。《读者》的低冲突力量恰在于它像一本温和的家庭读物。它可以被放在书桌、单位、学校和客厅里，不以政治命令的面貌出现，却持续提供关于体面、善良、忍耐、成功和幸福的解释。读者接收的不是“你必须服从”的直接命令，而是“成熟的人应该如此生活”的柔性规范。命令被改造成品格，服从被改造成修养，适应被改造成文明。

<!-- sources: MC030-P020 -->

在这个意义上，文摘并不是脱离体制的西方窗口，而是经过筛选的外部世界：可以让人看见建筑、人物、职业、爱情、奋斗和异域生活，却不必让人沿着这些图景追问权利如何建立、制度如何约束权力、边界如何保护个人。它把世界变成可观赏的文明样板，把政治冲突留在阅读之外。

<!-- sources: MC030-P021 -->

按公开口径，《意林》2003 年创刊，由长春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征订材料又用“一则故事，改变一生”和“励志、感动、启迪、提升”说明自身定位。这些宣传语直接写出了它要完成的转换：故事不只是故事，而是一个人的人生工具；阅读不只是阅读，而是一次自我改造。

<!-- sources: MC030-P022 -->

2015 年第 1 期的“成长视窗”“成功之钥”“励志人物榜”“心灵鸡汤”，把成长、成功人物、机会、绕行和自我调整放在同一阅读结构里。2020 年第 1 期的“励心小品”“心灵关键词”“十八而志”“青春智囊”，继续把情绪、成长和青春选择组织成可消费的生活指南。2025 年第 24 期的“励心小品”“幸福讲义”“成功开讲啦”“成才辩论会”“未成年解忧杂货店”，则把幸福、成功、成才和心理问题进一步连接到代际、AI、历史记忆和社会观察的新语境。

<!-- sources: MC030-P023,MC030-P024 -->

这些栏目和标题不是简单的成功学标签，而是一套持续要求个体修正自己的语言。成功之钥要求你找到正确姿态，励志人物要求你从他人身上提取可复制的品质，心灵鸡汤要求你把痛苦转化为可以吞咽的情绪，幸福讲义要求你把生活重新整理成可以学习的课程。即便现实问题进入视野，最后仍常常被安排为个人如何理解、如何调节、如何选择和如何继续。这种“过不去，就绕一下”式的叙事尤其清楚：它不要求你拆除阻挡你的墙，也不要求你追问墙是谁建的；它要求你调整路线、修正姿态、保存体面，继续寻找能通过的缝隙。绕行被包装成智慧，顺应被包装成成熟，自我修正被包装成成长。个体越能适应，故事越可以宣布自己成功；制度越不必回答，个人越被要求证明自己有韧性。^{[样本]}

<!-- sources: MC030-P004,MC030-P005 -->

《意林》《读者》等期刊在当时扮演了某种文明样板的角色。它们的功能是成瘾与安抚，与启蒙没有半点关系。文明样板首先提供一幅可以被个人模仿的生活图景：干净的街道、体面的职业、稳定的家庭、整洁的语言、懂得礼貌和分寸的人，以及个人奋斗最终得到回报的故事。它不是现实制度建设本身，却被包装成个人只要调整姿态、提升修养、坚持努力就能够抵达的生活。社会结构被缩成一个人的选择，公共问题被缩成一个人的心态，制度边界被缩成一个人的情商。

<!-- sources: MC030-P006 -->

故事在这里完成了一次系统转译：它把复杂的社会关系翻译成一个主人公，把长期的制度条件翻译成一次机会，把阶层位置翻译成一次坚持，把不平等翻译成尚未完成的自我修正。读者看到的不是谁拥有资源、谁制定规则、谁承担责任，而是谁忍耐、谁努力、谁在逆境中保持体面。文明的外观因此变得可消费：不必改变制度，只要学会像文明人一样说话、工作、微笑和等待。

<!-- sources: MC030-P008,MC030-P009 -->

阅读怎样成为成瘾？不是因为每一篇文章都具有同样内容，而是因为故事提供了短期秩序感。复杂世界在几页文字中被整理成因果清楚的道德剧：善良得到回报，努力获得机会，坚持迎来转机，受伤的人通过自我调整重新站起来。读者获得的不是对现实权力结构的认识，而是一种“世界仍然有道理”的安慰。今天读一个逆袭故事，明天读一个励志人物，后天读一段关于幸福、宽容和坚持的短文；每

一次阅读都让人暂时恢复文明感，仿佛只要保持善良、勤奋、克制和体面，就仍然属于一个有秩序的世界。故事越短，重置情绪越快；情绪重置越快，越不需要追问秩序为什么会失效。

<!-- sources: MC030-P010,MC030-P011 -->

启蒙要求人看见权利、制度、边界、责任和现实中的权力关系，文明化的镇静剂则让人先把自己修整到可以继续忍受的位置。它给人的不是公共判断，而是私人镇定；不是改变世界的能力，而是继续适应世界的姿态；不是追问主人是谁，而是学习怎样成为一个体面、懂事、有效率的依附者。故事把文明压缩为个人品格，把公共伦理压缩为不麻烦别人，把责任压缩为先把自己做好。这样一来，一个人越认真消费这些故事，越可能把结构性苦难理解成自身修养不足，把对边界的追问理解成不够成熟，把对权利的要求理解成不够懂事。

<!-- sources: MC030-P012,MC030-P013,MC030-P014,MC030-P025 -->

但这种叙事刻意回避了大量制度性的内容。它从不讨论权利、制度、边界与责任，只反复强调——“只要努力工作，就能过上好日子。”这并不意味着具体篇目里连社会题材或制度词汇都见不到；文摘完全可以触碰现实议题，但提及现实甚至出现体制字眼，与追究权力责任、确立权利边界根本不是一回事。只要文本最终仍把一切遭遇和出路收束为个人修养、意志与自我调整，制度追问就依然被彻底消化。反之，若真有文本让制度约束构成其归因落点，便不能被强行纳入这一模式。

<!-- sources: MC030-P012,MC030-P013,MC030-P014,MC030-P025 -->

整套机制都围绕这种个人归因展开：它把不公解释成个人没有充分努力，把剥夺解释成耐心不足，把制度责任转成个人修养，把社会边界转成情商和适应能力。一个人失去工作，不必追问劳动关系和资源分配，只需要反省自己是否足够坚韧；一个家庭承受教育、住房和医疗压力，不必追问制度如何分配风险，只要相信努力仍会带来下一次机会。个人奋斗被用来填充一切解释空白。故事不再问谁拥有决定权，只问主人公有没有坚持；不再问规则为什么对不同的人不同，只问主人公有没有学会绕过去；不再问责任如何分配，只问受挫者能否保持乐观。社会成员被训练成自己的项目经理、风险管理员和情绪保姆，制度则从解释中隐身。

<!-- sources: MC030-P012,MC030-P013,MC030-P014,MC030-P025 -->

《意林》并非没有社会生活议题，年轻人、睡眠、AI、代际、历史和社会观察都可以进入其版面，但这反而让文明窗口更有效。题材的出现并不等于追问体制责任；它没有完全隔绝现实，只是把现实重新安排到个人阅读、个人消化和个人修正的尺度，社会进入了故事，制度追问却仍被故事的情绪结构吸收。

<!-- sources: MC030-P007,MC030-P015,MC030-P016 -->

这种图景特别适合经济上升预期。只要未来仍被想象为不断扩大，个人努力就可以被当作通往好日子的通行证，结构性问题则被推迟到未来兑现之后。故事不是在解释现实，而是在维持对未来的信任，

让人把眼前的剥夺、压力和不公理解成成长过程中的暂时考验。经济上升预期在此发挥着吗啡作用：未来的好生活像一只悬在眼前的瓶子，要求人现在忍耐、加班、竞争、克制和等待；只要人仍相信饼会变大，眼前的不公就可以被说成暂时；只要个人还没有成功，失败就可以被说成个人尚未完成。对未来生活的幻象由此换取了对当下问题的沉默。然而，一旦经济不再持续上行、饼无法兑现，镇静剂就会失效。吗啡叙事失灵之处，正是人物化、口语化新媒介重新争夺解释权的入口。

<!-- sources: MC030-P027,MC030-P028 -->

满洲式“顺应强权、自我修正”被翻译成温和的中产叙事。把《意林》《读者》只当成普通成功学来批评，还不够。普通成功学只谈努力和回报；这里还涉及谁定义文明、谁规定体面、谁让个体把制度问题吞回体内，以及谁把依附关系包装成成熟的生活方式。满洲生存理性首先判断风向：什么话可以说，什么问题不要追问，什么姿态能让强环境接受自己；接着它启动自我修正：改变语言、改变目标、改变情绪、改变路线，只要能够继续生存和获得一点位置；最后，它把这种顺应包装成文明——不是因为你没有权利，而是因为你懂事；不是因为制度不承担责任，而是因为你足够成熟；不是因为边界被强者决定，而是因为你应该学会适应。

<!-- sources: MC030-P029,MC030-P030 -->

《意林》《读者》就是满洲生存理性的文明包装版。它们把顺应强环境、自我修正、在缝隙中求活，翻译成干净、体面、温柔、努力、幸福和中产生活方式。暴力动员的粗糙口号被换成故事，政治服从被换成品格修养，资源依附被换成职业选择，制度沉默被换成个人乐观。形式变文明了，关系没有消失；语气变温和了，权重仍然存在。这条政治—文化连续线从高压政治进入组织化信仰，再进入公开媒介的文明安抚。外壳一路变化，生存逻辑仍在工作。毛泽东、王洪文、张宏堡、李洪志、《意林》《读者》、张雪峰和周丽峰，并非只是一串名字。这些人物和媒介节点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同一条满洲式夺舍方法论却在其中连续展开。

<!-- sources: MC030-P031,MC030-P032 -->

媒介条件已经不同：纸面文明模型向口语化、人物化、短视频化的解释模型移动；顺应、选择、自我修正和情绪安抚，也开始以更高能、更戏剧化、更直接的方式重新出现。但解释层的迁移仍然沿着同一个方向：把复杂现实交给一个能够替你说话的人，再把制度问题转成个人选择、个人态度和个人命运。

六、张雪峰、周丽峰：丛林降维、红旗打红旗与语言超限战

<!-- sources: MC031-P001,MC031-P002,MC031-P003 -->

《意林》《读者》把成功、选择、适应和自我修正放进故事与栏目。纸媒不再垄断日常解释后，这套功能转到人物的声音里，进入短视频切片、直播现场和口语化表达。故事缩成一句话，栏目缩成一个

人，读者也变成围观者、粉丝和模仿者。人物传达的不只是观点，语气、姿态和现场感本身也直接占据解释位置。

<!-- sources: MC031-P001,MC031-P002,MC031-P003 -->

这一媒介迁移并不意味着断裂。捕获注意力、重排现实权重、借用合法语言以及改写归属关系的生存逻辑，依然在新的载体中持续运转。短视频时代本质上是注意力博弈场。话术就是诱饵，语言就是陷阱。谁能用最短的表达命名风险、机会和猎物，谁就能把分散的焦虑转成流量、信任和现实影响。张雪峰和周丽峰就是在这片社会森林里布置语言陷阱的顶级猎人。

<!-- sources: MC031-P004,MC031-P005 -->

体制建立在科层、逻辑和流程之上，丛林经验却只问什么能够活下来、什么能够换来位置、什么能够成为猎物。张雪峰的力量不在于建立了多么精密的教育理论，而在于把教育从宏大叙事和理想主义的遮羞布下拖出来，直接降格为生存成本博弈。高考分数、专业、就业前景、家庭资源和上升通道被赤裸裸地摆到桌面上。对于高考三百分的人来说，逻辑不重要，生存和上升通道最重要。大学不再天然等于理想，专业不再只是知识分类，选择也不再是抽象的自我实现；它们首先被还原成成本、回报、概率和位置。

<!-- sources: MC031-P006 -->

这就是“只要猎物，不要口号”。官僚体系用精英叙事、理想工程和道德外衣维持教育的神圣性，丛林经验则直接追问：读完以后能不能工作，家庭承担不承担得起，哪条路能让人活下去，哪一个位置是真实的上升通道。口号一旦失去现实兑换能力，就只是遮羞布。

<!-- sources: MC031-P007,MC031-P008 -->

张雪峰动摇教育体制，正是因为他完成了去神圣化。他不跟官僚话语在同一个抽象层次上纠缠，直接把它拖回猎场结算。流程、头衔和精英想象撑起来的神圣语言，一碰到就业、收入、家庭承受力和现实机会，就会发生降维崩塌。丛林经验对官僚逻辑的降维打击，不靠更复杂的理论取胜；它让理论接受生存结果的审判。《意林》《读者》曾经告诉人，只要修养、努力和忍耐，就能接近体面的生活。到了张雪峰这里，温和的成功故事被拆成一张生存账本。一个人不再只被劝告努力，而被迫计算努力投向哪里、哪条路还有猎物、什么承诺已经无法兑现。纸媒的文明包装进入人物化解释，语气更粗粝，结算也更直接。^{[张雪峰]}

<!-- sources: MC031-P009,MC031-P010 -->

周丽峰的成功，本质上是“超限战”在言语层面的体现。红旗打红旗，不是从外部反驳体制，而是把体制自己的正能量、主旋律和忠诚话术推向荒诞极致。渔猎者知道，在森林里最安全的伪装，是长得

像环境本身。语言也可以成为伪装：不说任何表面上错误的话，只把正确说得过度，把服从表演得过满，把口号重复到失去严肃性。

<!-- sources: MC031-P011,MC031-P012,MC031-P013,MC031-P014 -->

体制最怕的是“不服”，但它完全无法处理“太服了”。对不服从者，审查、惩罚和隔离都有现成分类；对一个比官方更官方、比口号更口号的人，分类系统却会发生逻辑死锁。封杀他，就像封杀自己的口号；不封杀他，他又在用你的口号消解你的权威。防御性拟态在此走到了极致，成为低级红、高级黑的高阶版：它不靠外部合法性，也不用另立一套公开敌对语言，它占据的正是现成合法性。一个口号既是盾牌，也是诱饵；一句忠诚表态既能保护自己，也能把审查者拖进矛盾。体制若接受这种过度正确，就必须承受其对严肃性的腐蚀；体制若拒绝它，又必须解释为什么自己的正能量话术不能被完整执行。语言不再只是表达立场，而是在制度分类中布置陷阱，将“正确”本身做成了无法正常处理的对象。谁回答，谁就被迫进入陷阱预设的地形。

<!-- sources: MC031-P012,MC031-P013,MC031-P015,MC031-P016 -->

语言超限战不守普通论辩的边界。证明某个命题只是其次，制造识别困难、迫使对方走进自己布下的陷阱才是首要目标。这种“两面人”的巅峰表演，让体制的话语体系变得廉价和滑稽。它比直接反驳杀伤力更大，因为直接反驳仍然承认对方是一个值得正面争论的对象；红旗打红旗则从内部消耗权威与信仰，不需要先夺走口号，只需要把口号使用到失效，使权威无法维持稳定表情。口号越响亮，信仰越容易在笑声中被掏空。短视频的形式恰好承接了这种言语超限战：语气、表情、节奏、夸张动作和可重复短句协同运作，一面展示忠诚，一面拆解意义。表演性人格不再只是高压环境中的自我保护，还能用来捕获注意力、测试边界和重排话语权重。

<!-- sources: MC031-P017,MC031-P018,MC031-P019 -->

张雪峰用丛林经验降维教育官僚话语，周丽峰用红旗打红旗制造合法性死锁。一个把宏大教育叙事拖回生存成本，一个把正能量话术推向荒诞极致；一个追问猎物在哪里，一个把语言本身做成陷阱。他们不需要构成组织，也不需要彼此师承，便可以在同一片社会森林里表现出满洲渔猎的媒介能力。这种能力首先判断风向和强弱，然后选择最有效的语言外壳：面对教育焦虑，它使用成本、回报和上升通道；面对体制话术，它使用过度忠诚、低级红、高级黑和逻辑死锁。逻辑不是最高裁判，现实结算和话语权重才是。从《意林》《读者》到张雪峰、周丽峰，解释从温和故事进入人物现场。纸媒要求个体修正自己，人物媒介则把猎场规则直接说出来，或利用规则本身布置语言陷阱。满洲生存理性不再只穿文明包装，也可以穿上粗粝实用主义和表演性忠诚的外壳。^{[周丽峰]}

<!-- sources: MC031-P020,MC031-P021 -->

张雪峰和周丽峰之后，这条连续线来到网络主播“斯奎奇大王”。此前的人物化媒介已经能把现实压缩成生存结算，也能把合法话术变成语言陷阱。到了他这里，经济上升预期已经失效，这条线随之进

入新的叙事形态。《意林》《读者》的吗啡式安抚如何失效，构成了这一媒介节点的入口。入口另一端连着他自带的渔猎风格、合成毒品叙事及其被体制纳入的过程。人物化媒介走到这里，不再只是解释选择或测试话语边界，而开始直接处理现实落差造成的挫败感。

七、“斯奎奇大王”：合成毒品、渔猎叙事与情绪转向

<!-- sources: MC032-P002,MC032-P003 -->

当经济不再持续上行，当饼无法兑现，吗啡就会失效。人仍然承受现实落差，却无法再从“未来会更好”中得到镇痛。叙事于是转向，不再主要承诺未来生活，而是提供即时情绪补偿：不用改变现实，只要马上证明自己站在正确一边；不用解释制度，只要找到一个可以贬低的外部对象；不用获得真正的权利，只要获得廉价的优越感。“斯奎奇大王”处于这个节点。其叙事不是《意林》《读者》的简单续集，也不是同一种叙事的音量放大。吗啡让人继续忍耐，他的合成毒品叙事则让人在现实落差中继续兴奋。它把挫败翻译成立场，把损失翻译成比较，把无法兑现的未来翻译成当下可以重复消费的口号。

<!-- sources: MC032-P004 -->

到了这一阶段，虚构民族主义成了补偿机制。失去历史，失去未来。所谓“中华民族”，本身就是一个高度抽象、历史上并不存在的整体性民族。中共在清末学者提出的概念上混入大量苏联制度，形成了这个合成品；如今，它却被当作情绪修复工具反复调用。这一论断是对其官方话语构造成分的定性批判，概念本身在晚清思想史与苏联制度输入层面的具体历史因果，尚待进一步的完整考证。^{[思想史]}

<!-- sources: MC032-P005,MC032-P006 -->

这种叙事从不真正解释结构性问题，而是通过贬低资本主义的现状缓解现实落差：“虽然我们过得不怎么样，但你看美国也烂透了。”它保留少量现实观察，却混入大量偏见、情绪和选择性事实，像半合成毒品一样，让人暂时感觉心理平衡，却更加依赖叙事本身。外部世界在这里不是被研究的对象，而是被加工成猎物。只要能够证明别人更惨，自己遭受的剥夺就可以被暂时压下；只要能够找到一个外部失败案例，现实制度就不必回答眼前问题。比较不再为了认识世界，而是为了获得情绪结算。

<!-- sources: MC032-P007,MC032-P008,MC032-P009 -->

该主播的叙事、被虚构出来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情绪化站队，成了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它们不再追求逻辑自洽，甚至不试图解释现实，只剩下立场宣誓和情绪宣泄。一个人不必知道问题怎样形成，只要知道该嘲笑谁、贬低谁、站在哪一边。事实上，网络主播“斯奎奇大王”本人就自带渔猎风格。这种风格不把世界理解为稳定制度、长期建设和公共责任，而把世界压成谁猎杀谁、谁被谁坑、谁活得更

惨、谁能在比较中占到便宜。语言的任务不是建立共同事实，而是寻找猎物；叙事的任务不是解释因果，而是完成一次快速围猎。

<!-- sources: MC032-P010,MC032-P011 -->

《意林》《读者》还要求人把自己修整成体面的工蜂。到了他的叙事，这层文明外观也不再需要。粗鄙、偏见、选择性事实和情绪化判断都可以直接进入传播，只要它们能够迅速制造立场快感。文明包装撕开以后，渔猎生存逻辑就直接露了出来：识别弱点、寻找猎物、放大伤口、完成比较结算。它不再讲逻辑，讲的是“猎杀”。外部世界的苦难被切割、放大和重复展示，用来制造“幸存者”的虚假快感。现实没有改善，观看者却可以在别人的失败中暂时确认自己没有输；权利没有恢复，观看者却可以在口号中确认自己属于胜利的一边。

<!-- sources: MC032-P012,MC032-P013 -->

合成毒品不是完全虚构。它必须保留一点现实观察，才能让人产生“我很清醒”的感觉。无论是一桩犯罪、一场灾难，还是某种经济困难、一段街头影像，都可以成为原料。经过选择、剪裁、重复和情绪包装，局部事实就被拿来代替整体解释。它也不是普通谎言。普通谎言只需要人相信某个错误事实，合成毒品则要求人不断回来消费同一种情绪。事实可以换，猎物可以换，口号可以换，兴奋机制不变：寻找外部失败，制造比较优势，确认立场正确，把个人挫败暂时排出意识。

<!-- sources: MC032-P014,MC032-P015 -->

这种叙事让人获得廉价的智力优越感和虚假的集体归属感，同时失去对现实苦难的感知。他不再关心身边倒下的亲友，也不再意识到自己的权利正在被侵蚀；只要不断重复口号，就能确认“我站在正确的一边”。吗啡把制度问题转成个人努力，合成毒品则把制度问题转成外部猎物。前者让人责怪自己不够努力，后者让人嘲笑别人更加失败；前者用未来幻象换取沉默，后者用即时兴奋换取麻木。两者外观不同，现实问题都从解释中心消失。

<!-- sources: MC032-P016,MC032-P017,MC032-P018,MC032-P019 -->

现在经济出了问题，该主播的合成毒品叙事便被体制纳入，用来缓解民众因现实落差而产生的挫败感。到了媒介层面，借壳和换壳披上的是网络黑话、粗鄙口语、戏谑表演和亚文化外观。外壳变了，进入这具新媒介身体的仍是旧政治功能。

<!-- sources: MC032-P016,MC032-P017,MC032-P018,MC032-P019 -->

传统叙事失去镇痛作用以后，能够制造即时情绪收益的新外壳便进入了权重更高的传播接口。求是网在 2026 年 1 月 4 日刊发的评论《“斩杀线”上的美国政治困局》，便直接将该网络词汇作为分析隐喻，引入对美国政治困局与制度逻辑的批判中。网络流行话语由此被接入了更高层级的官方舆论接口；这一接口的开放并不意味着官方直接发表了“斯奎奇大王”本人的文字或采纳了其全套说辞。体制能

够纳入猎犬，却不能让渔猎逻辑永久忠于自己。^{[求是]}

<!-- sources: MC032-P020,MC032-P021,MC032-P022,MC032-P023,MC032-P024 -->

“合成毒品”正在破坏社会的底层逻辑。当一个人不再关心身边的苦难，只追求口号带来的集体快感时，这个社会就彻底失去了自愈能力。一旦外部供能——经济利益——断绝，这种情绪成瘾会瞬间转向内部。〔见第二十八章注 1〕

<!-- sources: MC032-P020,MC032-P021,MC032-P022,MC032-P023,MC032-P024 -->

“斯奎奇大王”在现实中确有其人，而牢 B、牢 C 则是为了分析反噬机制而设想的推演对象。如果他是体制雇佣的猎犬，那么牢 B、牢 C 就是潜伏在猎犬群中、随时准备在主人虚弱时咬断其喉咙的野狼。他们使用的是同一种话术、同一种捕猎逻辑。

<!-- sources: MC032-P020,MC032-P021,MC032-P022,MC032-P023,MC032-P024 -->

“斯奎奇大王”不是这条连续线的终点，而是当前节点：吗啡失效以后，合成毒品被纳入；合成毒品继续失效以后，同一种捕猎逻辑便开始转向内部。中心失去对这套政治生存逻辑的垄断的入口就在这个转向里。

章末史料说明

毛泽东：始作俑者与后清第一皇帝

1. “毛泽东就是始作俑者”“毛泽东其实就是满洲国的风格”“用当时的民国体制语言做大，然后夺权”，构成了人物连续线起点的结构判断。
2. “后清第一个皇帝”描述个人—组织复合体占据现代国家最高权重的结构，不是对清代法统的直接继承主张。

王洪文——第二节点与满洲渔猎风格

3. 王洪文的上海工厂入口、在中共十大所作党章修改报告、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以及 1977 年被撤销党内外职务，均属于公开制度事实。
4. 这些事实承载身份捕获、重新赋位以及组织收回位置的结构分析，王洪文不是毛泽东的缩小复制。

张宏堡：借壳生蛋、墙内拆梁与神志清醒状态下撒酒疯

关于中功创立者、1987 年前后的形成、公开传播与商业化、国家处理、关岛 / 美国阶段以及张宏堡 2006 年死亡等事实，主要依据 Dui Hua Foundation 的回顾分析（Zhonggong: The Subversive Business of Qigong，2014 年 8 月 14 日）；张宏堡 2001 年在关岛获释及当时的移民假释身份，则依据 Anthony Kuhn 在《洛杉矶时报》的报道（Anthony Kuhn, Chinese Guru Is Released by U.S. in Guam, *Los Angeles Times*, 2001 年 4 月 18 日）。两份来源对张宏堡离境及辗转顺序的

记载不一；涉及组织规模的数字具有组织自报性质，不同来源之间存在差异，并非客观统计。政府定性、组织自述、新闻报道和非政府机构材料各自承担不同叙述责任。张宏堡、李洪志两个节点，以及“神志清醒状态下撒酒疯”“借壳生蛋”“墙内拆梁”“换壳”“夺舍”等概念，共同构成这条理论主线。

李洪志：公开传播、借壳、换壳与夺舍

1992 年长春早期传播、九十年代气功公共环境和 1999 年国家处理，分别参考组织自述、学术研究、人权材料、政府文件与新闻记录。关于公开接口与关系转折，具体参考了人权观察报告（Human Rights Watch, Mickey Spiegel, Dangerous Meditation: China’s Campaign Against Falungong, 2002 年 1 月，第 II 章“What Is Falungong?”）与学者 David Ownby 的讲演记录（Falungong as a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Movement: An Historian Looks at Contemporary China, 2000 年 10 月 20 日）。上述文献系基于公开报道、组织自述及官方材料的回顾性整理，引述的官方通告等亦经文献转引，而非直接核验原始挂靠批件。文献显示其曾获官方气功科研会接纳为分支并在地方举办讲习，但 HRW 亦指出双方终止关系的确切顺序与原因尚不清楚。五十六期讲习、具体奖项、出版社隶属、活动场地和人数存在不同口径。

《意林》《读者》：成瘾、安抚与满洲生存理性的文明包装

关于《读者》创刊时间（1981 年 4 月）、创刊地兰州、主办出版单位（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读者杂志社）及新媒体平台形态，依据其官方网站自述（https://www.duzhe.com/ ）；其实际采编、导向审读与校对流程，进一步参考《经济日报》2022 年 8 月 2 日的采访报道《读者直行》（徐立京等采写，人民网转载，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2/0802/c1001-32492047.html ；读者传媒次日以《你还是〈读者〉的读者吗？》同文转载，http://m.duzhepmc.com/pcarticle/1845 ），该报道记载了选稿、复审、决审、签前会及对政治导向、价值取向的评审环节，展示了期刊运作的一般流程，但新闻采编自述不等于每期文本的逐篇政治指令，亦不能推导为全体受众均产生同质心理效果。关于《意林》创刊时间（2003 年）、主办单位（长春市文联）及宣传口径，依据公开发行征订材料，权威登记与原刊版权页交叉仍待核实；文中所引栏目核自“意林杂志网”在线转录网页之 2015 年第 1 期（https://www.yilinzazhi.com/2015/2015_01/index.html ）、2020 年第 1 期（https://www.yilinzazhi.com/2020/2020_01/index.html ）与 2025 年第 24 期（https://www.yilinzazhi.com/2025/202524/index.html ）目录，该网系阅读转录入口而非原刊影印，目录样本仅用于呈现栏目演化与标题风格，不作全量内容统计。

[刊制] 参见新闻出版总署 2005 年 9 月 30 日公布、2005 年 12 月 1 日施行，以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2017 年 12 月 11 日修订的《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网页发布于 2021 年 12 月 9 日，https://www.nppa.gov.cn/xxgk/fdzdgknr/zcfg_210/bmgz_213/202112/t20211209_442155.ht

ml）第 2 条、第 3 条、第 9 条、第 10 条、第 24 条至第 27 条、第 45 条、第 46 条及第 48 条至第 52 条，该规章确立了主管主办单位资质、办刊方向、编辑责任制、重大选题备案、事后审读与年度核验等准入及续存要求；以及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的《关于开展 2025 年度期刊核验工作的通知》（国新出发电〔2026〕9 号，2026 年 6 月 5 日印发，网页发布于 2026 年 6 月 9 日，https://www.nppa.gov.cn/xxfb/tzgs/202606/t20260609_993258.html），该通知明确了全量信息填报与重点抽检样刊相结合的核验程序，重点检查期刊出版情况、主管主办履职、内容导向（包括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出版质量及经营活动，并依规实施暂缓核验、不予通过乃至依法撤销许可证的退出机制。上述法规与通知展示的是期刊赖以出版存续的行政制度框架，不能倒推为两刊创刊初期的历史依据，法定义务亦不能替代对各刊具体采编实践与读者实际心理效果的逐篇实证考查。

返回正文

《意林》2015 年第 1 期“心灵鸡汤”栏目载有秦湖署名短文《“过”不去，就“绕”一下》（据“意林杂志网”网页转录：https://www.yilinzazhi.com/2015/2015_01/yili20150166.html，未核原刊影印）。该文系一则以楚庄王欲改高马车底座、令尹孙叔敖建议以防洪为由令民加高门槛迫其自行改车为情节的治理寓言，篇末赞许孙叔敖避免强硬行政、善用迂回的“绕”的智慧。文中故事未经核实为古代史实；其情节主体为统治者的驭下与诱导策略。“‘过不去，就绕一下’式叙事”是对劝导个体遇阻折返、自我调适、顺应环境之叙事类型的概括批判，并非复述秦湖该篇的具体情节与行事主体。

返回正文

张雪峰、周丽峰：丛林降维、红旗打红旗与语言超限战

关于张雪峰针对高考专业选报与新闻学就业等言论的报道，参见九派新闻 2023 年 6 月 16 日报道《张雪峰吃传播饭砸传播锅？本人回应教授怒怼》（津云转载，http://www.tjyun.com/system/2023/06/16/054023378.shtml ）及观察者网 2023 年 6 月 19 日综合报道《张雪峰回应厦大新闻学教授：跟黄渤共情了》（https://www.guancha.cn/politics/2023_06_19_697387.shtml ）。报道显示其从普通家庭成本、就业现状与承担后果角度主张务实选报。“高考三百分”与“只要猎物，不要口号”属于理论概括，而非经核验的张雪峰逐字原话；所据为新闻报道，未核验其完整直播。关于其言论影响的量化实证研究，参见范子英、赵欣仪、韦佳妤《自媒体的公共信号与高考志愿报录——基于“张雪峰新闻事件”的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5 年第 43 卷第 3 期，第 58—77 页，特别参见第 63—65 页及第 73—75 页，DOI:10.16382/j.cnki.1000-5560.2025.03.006，全文 PDF：https://xbjk.ecnu.edu.cn/CN/article/downloadArticleFile.do?attachType=PDF&id=11171；落地页：https://xbjk.ecnu.edu.cn/CN/10.16382/j.cnki.1000-5560.2025.03.006 ）。该研究利用 90 所“双一流”高校 2019 至 2023 年录取位次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报告了该事件对新闻传播学

类相对其他专业录取位次的负向影响。此处引用的是原研究报告基于特定样本的经验估计值，未作独立复算；关于张雪峰动摇教育体制的论述属于理论判断，超出该局部研究所能证成的范围。

返回正文

周丽峰以“红旗打红旗”制造合法性死锁与语言超限战的论述，是对特定网络话语机制的理论推演，其与张雪峰分属不同路径，无需同一组织或师承关联。所指人物及其网络身份已有公开报道证实：凤凰网《专访周丽峰·妙瓦底生死 36 小时》（2025 年 1 月 19 日发布，1 月 21 日更新，https://fo.ifeng.com/c/8gI8JcozhB8 ）页面简介明确载有“周丽峰，知名博主，网名峰哥亡命天涯”（此依据仅核验页面简介，未包含访谈全片）；新加坡《联合早报》专栏报道《下午察：峰哥又要亡命天涯？》（2025 年 10 月 8 日，https://www.zaobao.com.sg/realtime/china/story20251008-7635689 ）公开导语亦确认周丽峰即网名“峰哥亡命天涯”。该报道全文及图注见于香港 01 次日授权转载的《纪录底层生活曾称“中国社会足够宽容” 网红峰哥又要亡命天涯？》（2025 年 10 月 9 日，https://global.hk01.com/中国观察/60283819/纪录底层生活曾称-中国社会足够宽容-网红峰哥又要亡命天涯； 二者属同一来源链，非两份独立报道）。上述转载正文转引其 2025 年国庆前直播中“买国产汽车，用小米手机”等言论，图注则记其在直播中呼吁“买 A 股生宝宝”，并转述部分网民将其理解为“反话”。上述材料为“过度正确”话术与受众反讽理解的分析提供了有限的新闻依据，但仅凭媒体转引与页面简介，尚不足以替代对原始直播与完整语境的核验，亦不能将图注记载或网民解读等同于其本人对反讽策略的承认；消解话语权威的论述系机制推演，报道虽记有封禁等事件，但该套话术在现实中究竟引发何种官方反应、具备多大动员规模及产生何种客观效果，仍属有待核实的经验问题，不能由既有事件直接倒推因果。

返回正文

“斯奎奇大王”：合成毒品、渔猎叙事与情绪转向

网络主播公开网名“斯奎奇大王”与原材料及网络流传中所称外号“牢 A”的对应关系，见观察者网官方澎湃号 2026 年 1 月 19 日发布的报道《“斩杀线”提出者“牢 A”：美加留学生办身份证件一定不要勾选“捐赠”》（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2418800）。这仅确立传播称谓的对应关系，被报道言论的事实内容未经验证，个人身份信息亦未经核实。关于求是网引入相关话语的论述，依据求是网 2026 年 1 月刊发的具体评论文章，该篇目并不能证明其本人存在直接投稿或雇佣关系。

[求是] 求是网刊发的具体篇目见钟言《“斩杀线”上的美国政治困局》（文末标明“执笔：周璐铭”），发布于 2026 年 1 月 4 日 22:09:47（https://www.qstheory.cn/20260104/0a091946537a4ea789a07bd4e40253b3/c.html），该文将网络词汇“斩杀线”引入对美国政治与社会困境的评论，证明网络流行话语进入了求是网的评论接口，但不证明《求是》纸刊刊发、“斯奎奇大王”本人署名投稿或存在雇佣关系。另见求是网

2026 年 1 月 29 日 08:58:21 转载自浙江宣传微信公众号的评论《对留学祛魅更需理性》（https://www.qstheory.cn/20260129/dfe7b11625704eb3b2e392059a63194b/c.html），该文虽提及网红“牢 A”及“斩杀线”，但核心旨趣在于批评借极端个案和侮辱性标签污名化留学生的非理性倾向，表明官方传播平台对该类话语的引用与评价存在不同面向与限定。

返回正文

“中华民族”为抽象建构及其包含苏联制度输入的判断，属于对官方民族话语构成的定性批判。在清末文本层面，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见维基文库公开转录文本，https://zh.wikisource.org/w/index.php?oldid=2629679，未核原刊影印）第二章第二节“论诸家之派别”论齐一段中有“我中華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齊”之语；该文本仅显示此用词在近代文本中的出现，单凭该词自身不能推导为古代已存在统一的政治民族实体，亦不足以据此断定其早期发明的思想史全貌。在制度层面，1931 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见维基文库公开转录文本，https://zh.wikisource.org/w/index.php?oldid=2599555，非档案原件）第十四条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有民族自决权乃至脱离并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规定列举的各民族有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建立自己自治区域的自由，而非规定已经实行联邦或自治；第十七条宣告苏联“是它的巩固的联盟”，系对既有革命阵线身份的声明，而非新设结成联盟的义务；该条文规定本身不能直接证明共产国际与苏联理论的传入途径与完整因果，亦不可与后来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直接等同。学者马戎在《中国的民族问题与 20 世纪 50 年代的“民族识别”》（《西北民族研究》2012 年第 3 期，第 13—28 页，特别参见第 17—18、21 页；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PDF：http://www.shehui.pku.edu.cn/upload/editor/file/20171123/20171123162237_3627.pdf）中论述了斯大林民族理论及苏联模式对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民族识别与制度构建的影响，同时指出中国学者在实际识别中对标准的灵活变通。从晚清用词出现，到具体制度采纳，再到整体官方话语的合成，其完整的传递因果考证在现有材料中仍未完成，该官方话语具有建构属性。

返回正文

第二十七章　中心失去对政治生存逻辑的垄断：全国化渔猎与胜利路径的延时引信

一、从位置改写到现代入关：捕获能力如何取得国家规模

政治核心取得胜利，依靠的不只是一套写在纸上的主义，更是高权重的捕获能力：识别可以利用的国家躯体、组织接口、人口、工业、军队、话语和身份，再将这些资源重新赋位到自己的核心周围。捕获不是简单占有。普通占有只改变所有者、只回答“东西现在归谁”；捕获—重新赋位则改变一切资

源在秩序中的位置，要回答的是另一组问题：这个人、这个组织、这座城市、这套工业设备、这批技术人员和这套旧制度，进入新的权重结构以后，究竟被安排到什么位置，服务于谁，承担什么功能，获得什么安全，又失去什么自主空间。一个人原来属于旧国家、旧单位、旧军队或旧社会关系，进入新的分类体系后，可以被重新命名、重新排序、重新动员；一个组织原来承担另一种功能，进入新的权重结构后，外壳可以保留，方向却已被改变。

这种高权重能力从一开始就不是把所有外部对象消灭，而是识别其中哪些对象能够被保留、哪些能力能够被调用、哪些身份需要重新命名、哪些关系需要重新排列。经过捕获，对象的旧形态可能仍然可见，旧技能可能仍然有用，旧组织甚至可能继续运转，但它们不再决定最高政治方向，因为最高权重已经转移。正是这一区别，决定了满清共产主义为什么不依赖纯粹同质化：它可以把不同来源的人口、不同历史的军队、不同性质的机构放进同一个组织秩序；也可以让旧国家继续提供铁路、城市、行政、教育和工业能力，却把这些能力重新赋位到新的政治核心周围。捕获不是把对象抹成空白，而是把对象从原来的关系中抽出，再接入新的主人关系、资源关系和忠诚关系。

在具体运作中，捕获包含三个可观察层面：第一是入口，决定谁有资格被接收，谁被挡在外面，谁被标记为有用、可改造或可清除；第二是重排，决定被接收者在组织中获得什么身份，原有技能是否保留，原有关系是否被改写；第三是结算，决定资源、安全和机会最终由什么新的权重分配，谁对对象拥有解释权和处分权。进入现代国家以后，入口、重排和结算便不再只发生在战争和政权更替中。干部档案、单位关系、户籍身份、学校资格、组织考察、项目审批、媒体可见度和平台流量，都可以成为捕获的入口。重新命名、重新编组和重新排序由此成为日常制度，资源与忠诚的绑定，也成为社会成员必须反复学习的结算规则。

在进入全国日常制度之前，这套能力与满洲的现代工业外骨骼相结合。满洲国工业外骨骼的意义，不是给历史增加几个铁路、工厂和城市名词，而是说明一种原本依赖政治核心、军事组织和渔猎判断的力量，怎样获得现代国家规模的运输、生产、通信和管理能力。渔猎政治生存逻辑固然可以识别机会、判断强弱、迅速捕获对象，但如果没有工业外骨骼，它的行动范围、持续时间和组织密度都会受到限制。满洲国留下的铁路、军工、城市、技术人员、科层结构和工业人口，使这种政治生存逻辑能够从局部军事行动转化为大规模政治—军事组织能力。火车把人口和物资送到前线，工厂和军工把战争所需的装备和维修能力固定下来，城市把技术人员、行政人员和组织人口集中到可以持续调用的节点，科层则把命令拆成可以重复执行的程序。

外骨骼没有改变渔猎政治生存逻辑的核心方向，改变的是它的射程和重量。中共进入满洲时，面对的并非一块空地，也不是一个只提供粮食和兵员的后方，而是一个已经被现代国家技术加工过的社会身体。这个身体的政治主人可以更换，满洲国留下的工业设施、技术人员、运输线路、城市节点和组织化人口却可以继续被调用。判断风向、捕获窗口和主人—依附关系依然重要，但这些动作如今可以依靠现代铁路系统实现远距离调动，借助军工与行政系统维持连续作战，并通过城市与科层把临时捕获

变成稳定组织。旧能力不必全部重建，只需改变其最高权重和组织用途，捕获—重新赋位由此获得了现代速度。

满洲国工业与东北野战军因此不能拆开：工业外骨骼提供运输、装备、技术和组织化人口，东北野战军在这条链中承担的是转换功能。它不是单纯一支人数更多的军队，而是把满洲的工业、城市、人口、技术和政治组织重新编成能够向关内推进的力量。工业不是战争之外的背景，军队也不是工业之外的偶然使用者，二者共同构成政治核心向国家躯体推进的能力转换器。军队内部的人员来源可以复杂，原有身份可以不同，经验和技术也可以不一致，但通过编组、训练、政治命名、组织纪律和资源供给，差异被重新安排到同一军事方向之下。

这与八旗、汉军和归附者的结构关系形成历史上的接缝。不同来源的人并不因为进入新组织就自动变成同质对象；他们被重新赋位，原有能力被保存或改造，新的政治身份压到旧身份之上，资源与忠诚被连接到新的组织核心。现代军队把这一机制扩大到工业化战争条件中。东北野战军的强，并不只来自某一种自然性格，生活史中的渔猎经验也不能替代组织分析；冬季、雪地、森林和东北地理可以成为军事环境，却不是独立决定战争结果的魔法因素。工业外骨骼的解释力，正在于谁能够把政治—组织生存逻辑与环境、现代设备、运输、军工、人口、科层和命令接成一条可以持续执行的组织链。

当东北野战军向关内推进时，满洲已不再只是一个地区，而成为能够向外输出政治核心、军事组织和现代国家能力的起点。因此，现代入关不能被简化为“从东北打到全国”的地理行军：它意味着政治核心先在满洲完成捕获、接收、重编与能力聚合，再将这套依托工业外骨骼成型的推进与扩张能力投射出去，最终占据更大的国家躯体。捕获、重编、动员、入关，由此构成了现代胜利路径。

二、把人工森林写进日常制度：规模治理与生活入口的绑定

夺取全国政权以后，一个曾依靠少数高识别能力者、军事组织和紧密忠诚夺权的政治核心，不能永远依赖核心成员的个人判断。要管理不断扩大的国家身体，让全国人口、资源和组织持续围绕自己运转，就必须把原先由少数政治核心集中掌握的能够改变最高政治方向、组织配置和国家资源调用的捕获能力，转化为日常制度。制度化首先要应对规模：面对全国人口，中心不可能亲自识别每个人、亲自判断每个项目，也不可能亲自决定每所学校和每个单位的全部位置。它必须建立一套装置，使人口分层、组织接入、资源分配和忠诚检查都能反复执行。干部档案、组织考察、政治身份分类和资源配置，由此成为把核心政治生存逻辑复制出去的技术。

制度化其次要解决持续性与代际传递的问题。一次捕获不能保证对象以后永远按照中心方向行动；要维持稳定，中心就需要把新身份、新关系和新资源绑定到制度程序，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遇到同一种判断：什么可以获得，什么必须展示，什么会被排除，哪个节点拥有最终解释权。制度由此把一次政治胜利转化为长期环境，把核心的特殊能力转化为社会成员每天必须学习的规则。同时，核心成员会老去，战场会结束，政治口号也会变化，政治生存逻辑的传承因而不能只靠核心成员。组织必须让下一代在进入学校、单位、城市、媒介和职业时，就已经处在一片按照中心权重制造的森林里；新

成员不必知道最初的捕获过程，只要知道怎样在当前制度中获得安全、资格和机会，这套政治生存逻辑就已经完成了代际复制。

党组织、单位、户籍、学校、媒体、宣传、身份分类和资源配置，由此成为政治生存逻辑全国化的装置。这些装置在分工中各司其职，又相互咬合：党组织把人事、资源、敌我和机会的分配直接连接到政治中心；媒体负责信息传播，并决定什么可以被看见、什么能够成为公共语言。中心原来依靠捕获取得胜利，胜利以后又把捕获写进制度。制度不是在森林之外管理森林，而是制造森林本身：谁拥有入口，谁被排除；哪一句话能够换来可见度，哪一种姿态能够获得信任，整个国家由此成为人工渔猎环境。然而，中心把这种决定最高政治方向与资源配置的支配能力写进日常制度，也就无法阻止这套方法在社会中扩散。制度越成功，这套政治生存逻辑越普及；越多行动者学会理解入口、识别权重、判断风向、表演忠诚和转换身份。中心在获得全国执行力的同时，也亲手培养了全国性的拟态和捕获能力。

在这片人工森林中，单位是最重要的日常节点之一。它不只是一个工作场所，还可以连接工资、住房、档案、福利、医疗、子女教育、身份评价、晋升、组织关系和社会安全。当单位结构扩展到全国，个人面对的是一组把工作与身份、安全、资格和家庭生活绑定起来的高权重节点。一份工作、一个编制、一次调动、一个住房指标或一个项目位置，都是具体的捕获窗口；一个人进入什么单位、由谁评价、能否获得住房和编制、是否被列入某类人员，往往比抽象规则更直接地决定其现实位置。

单位因此把国家权重变成可以感知的日常入口。人们在其中学到的不是一套纯粹的书面规则，而是怎样理解领导、组织、人事、指标、政策和关系，怎样判断谁能提供资源、谁能决定评价、谁在当前阶段具有更高权重。工作能力当然存在，但它必须通过单位的身份、关系和评价体系，才能兑换为工资、住房、晋升和安全。同时，单位也训练表演性忠诚：公开表态、参加学习、执行运动、理解政策和展示积极性，成为进入资源分配的通行语言。一个人是否真诚并非中心能够直接测量，中心能够测量的通常是表态、履历、服从记录和组织关系。于是，最会把自己呈现为“正确的人”的人，更容易通过制度筛选；真正忠诚者、策略服从者和等待转向者共享同一套表面接口。

户籍把人口的空间位置、公共资源和社会资格连接起来。它可以决定一个人进入什么城市、享受什么教育和医疗、获得什么住房机会、在哪里工作以及如何被行政系统识别。学校传授知识，同时进行分类、筛选和资格生产，并将这种身份分类提前到成年以前，通过考试、档案、推荐、专业、资格和就业出口，把人分配到不同位置。身份分类的政治效果，是让资源分配呈现为一套可以持续运行的程序，而不再表现为一次偶然选择。人们由此形成清晰的预期：某些身份能够打开入口，某些身份会增加成本，某种表态会改善评价，某种关系能够改变位置；身份因此既是对过去的记录，也是对未来机会的预测。

学校和单位共同训练社会成员理解权重。什么课程有用，不只由知识本身决定，也由它能否兑换工作；什么专业有价值，不只由名称决定，也由它在就业、编制、城市和行业中的现实位置决定。社会成员于是学会把宏大叙事翻译成猎场结算：这个身份能否换来机会，这个资格能否避开风险，这条路径是

否仍然有资源。当身份分类与宣传、组织、人事和资源分配结合时，政治人格便不再是少数核心人物的特征。每个人都在学习如何呈现自己，如何选择进入哪个组织，如何避开低权重位置，如何靠近高权重节点。主体民族满清化正是在这种长期环境中发生：名称和家庭记忆可以保留，行动者却在人工森林的训练下形成了渔猎化的生存逻辑。

三、机会捕获、积累中断与主体民族的渔猎化

制度制造森林以后，社会成员首先学会的，不是一套稳定规则，而是怎样判断风向。规则写在纸上，资源却通过层级、窗口、关系、运动、政策和权重重新分配。真正要紧的已不只是“规则是什么”，还包括“现在谁强”“谁掌握入口”“哪个口号正在升值”“哪个身份能够换到资源”。人在这种环境里学会寻找强者、主子、组织和资源位置。上级讲话、政策变化、人事调动、宣传口径、运动方向和资格标准，都成为判断风向的线索；谁能够更快识别变化，谁就能更早调整姿态、语言和关系。人工森林把渔猎从局部生活方式变成全国政治人格。森林不是自然生成的，猎物也不是自然存在的；制度不断制造稀缺入口，再让人围绕入口追逐、竞争和依附。中心借此获得控制，也训练出越来越多熟悉捕获逻辑的人。

在人工渔猎环境中，工作不是长期职业秩序，而是可以被捕获的资源位置。住房也不是稳定财产权，它是由单位、政策、关系和资格共同决定的入口。编制通往福利、身份和安全，是高权重猎物，不是单纯岗位。项目、补贴、牌照和审批，则是在政策窗口中出现又消失的机会。

市场化以后，猎物没有消失，只是增加了新的外壳：项目、政策、资格、资本接口、平台流量、粉丝、热点和关系，都进入同一套捕获逻辑。一个人不必长期建设一套稳定能力，只要能够抓住窗口、占据位置、借用话语、连接强势节点，就可能在短期内改变权重。这就是“有机会就捕获机会”。机会不再只是长期积累自然形成的可能性，而是稍纵即逝的猎物。窗口打开时必须立刻进入，风向变化时必须立刻转向。长期规则越不稳定，短期捕获越理性；短期捕获越普遍，长期积累越难形成。

“有机会就捕获机会”首先改变的是时间观。长期积累要求规则稳定、产权和边界可预期、承诺能够跨越风向变化，需要相信未来是一种连续建设；机会捕获则要求行动者把未来当成下一次需要抢先判断的猎场，必须在窗口打开时迅速进入，在权重下降前退出。人工渔猎不断证明：位置可能比能力重要，窗口可能比积累重要，关系可能比规则重要，及时转向可能比长期坚持重要。人工森林持续制造不确定窗口以后，行动者最理性的短期选择可能变成：先拿到位置，再考虑长期；先保住关系，再考虑原则；先使用当前语言，再保留下一种语言；先占据流量，再决定真正相信什么。

这些选择不一定来自个人品格缺陷，而是来自环境对短期捕获的回报。于是，企业追逐政策风口，机构追逐项目和资格，个人追逐编制、流量和强势平台，组织追逐能够提供资源与合法性的上级。一次次捕获都可能带来短期成功，长期合作和社会信任却在反复捕获中不断削弱。

短期理性汇总起来，会打断长期积累。被打断的并不只是财富积累，规则信誉、职业伦理、组织忠诚和公共信任也无法稳定积累。规则信誉需要人们相信今天的承诺明天仍有价值，职业伦理需要人们相

信专业标准不会被一次风向替换，组织忠诚需要人们相信组织不会在下一轮运动中重新命名自己，公共信任需要人们相信合作对象不会在资源变化时立即换壳。然而猎场需要的是敏锐、转向和抢先进入，不需要对一个已经失去权重的承诺保持忠诚。财富可以被重新分配，信誉可以被一次运动清零，职业标准可以被政策口径替换，组织忠诚可以被重新估价，公共信任则在每个人都知道别人可能换壳时失去基础。中心得到的是更快的调动和更强的服从表象，社会失去的是跨越风向的连续性。

原本真实存在的主体民族会被满清化。主体民族仍然存在，民族名称没有消失，家庭关系、语言、地域记忆和历史叙述可以继续存在；发生满清化、也就是渔猎化的，是政治人格和社会生存逻辑。这种变化不是一个瞬间发生的文化改名，也不是把全国人口变成一个新的血统名称，更不要求人人有相同的心理。民族变化在这里不等同于血统变化；它改变的是全国社会中哪些能力最有回报：看风向、找强者、依附组织、保存可替换外壳、捕获稀缺位置。一个人仍然使用原来的民族名称、地域身份和家庭记忆，却在现实中学会按照人工森林的规则行动，把政治拟态和身份切换当成广泛的生存技术。

这一人格塑造依靠制度中多项机制的交织展开。资源入口被组织化：工作、住房、教育、医疗、编制、项目、城市资格和关系网络被放在不同权重节点上，行动者必须识别谁能打开入口。忠诚被表演化：行动者发现，公开的正确姿态比无法验证的内心更容易被制度识别，于是学会用语言、履历、态度和关系证明自己属于当前高权重。

身份被工具化：身份不再只表示你是谁，也表示你能进入什么位置、获得什么保护、避开什么风险。机会窗口化：行动者被训练成在政策、运动、人事和媒介热点出现时迅速捕获。

运动、清洗和大叙事也因此属于满清渔猎。运动制造猎物，清洗重新划定边界，大叙事为围猎提供正当语言。每一轮行动都可能重新命名自己人和外部人，重新分配安全、资源与道德位置：谁在某一轮运动中成为自己人，谁被推出边界；谁能够快速换用新语言，谁继续使用已经贬值的旧语言；谁能从重新分配中取得位置，谁成为被分配的对象。主体民族在这种环境中学习的不只是如何服从，更是如何避免成为猎物、如何在边界变化前转换身份、如何把自己放进新的保护关系。中心通过这种满清化获得高度动员能力，也把自己的核心政治生存逻辑教给了全国。

四、媒介可见度与公共语法的扩散

市场化和网络化没有消灭人工森林，只是让猎物有了新的形式。媒体版面、平台推荐、热搜位置、粉丝规模、账号权重、广告机会、机构背书和公共议题的可见度，都成为可以捕获的资源。纸媒时代，某篇文章能否被刊登、某种生活方式能否被反复传播、什么内容被包装成普遍经验，已经涉及传播权重。网络时代，平台推荐和流量把这种权重进一步量化，但量化并不等于透明；创作者仍然需要判断平台方向、受众情绪、审核边界和热点窗口，才能把表达转化为可见度与收入。

媒介外壳的变化证明，政治生存逻辑已经离开最初的政治核心，可以进入组织大师、文明生活刊物、教育升学讲解、红旗式表达和情绪民族主义短视频。不同媒介有不同的内容、形式和受众，行动者追

问的却仍是：什么话更容易被看见，什么姿态更容易获得保护，什么对象能够成为共同猎物，怎样在正确外壳中取得权重。

毛泽东、王洪文、张宏堡 / 李洪志、《意林》《读者》、张雪峰 / 周丽峰、“斯奎奇大王”构成一条连续线。毛泽东节点显示政治核心如何把捕获、组织、群众语言和国家目标连接起来；王洪文节点显示政治身份、工厂经验和组织跃迁如何进入高权重政治；张宏堡和李洪志节点显示组织真空、气功接口、借壳生蛋和墙内拆梁如何借助合法空间展开。夺舍所需的最高权重转移则属于进一步的机制变化，不能仅凭公开活动接口的占据直接推论。

《意林》与《读者》把生存理性包装为文明生活和未来安抚；张雪峰把教育神圣语言拖回就业和生存结算，周丽峰以“太服了”的语言形式制造红旗打红旗；“斯奎奇大王”则把镇痛失效后的落差转译为即时情绪补偿。这些节点共同说明，政治生存逻辑已经不需要保持原来的名称，它可以从国家组织转入宗教与气功组织，从组织转入纸媒，从纸媒转入升学咨询和语言超限战，再转入短视频情绪动员。

这条连续线始终受两道边界约束：外壳不同并不证明机制相同，机制相连也不证明人物之间存在实际的组织关系。这条线不是一份组织传承表，既不能把每个人机械归入同一个角色，更不能据此认定人物之间存在师承或同一组织命令。事实必须逐人核验；组织传承尚未得到证明，也不足以否定这条理论连续线。这条理论连续线所支持的判断，只证明政治生存逻辑全国化的一件事：捕获、拟态、表演忠诚、借壳和换壳，已经成为不同媒介都能够调用的公共能力。中心曾经把这些能力当作自己的高权重工具，后来却把它们扩散到社会和媒介环境中。〔注 1〕

五、局部入口、权重稀释与组织生存逻辑

中心把政治生存逻辑写入制度以后，社会成员面对的并非一个抽象的中央，而是大量具体节点：地方政府、单位领导、学校部门、项目评审组、平台规则和媒介账号，都可能成为资源入口。中心的全国性权重由此被拆成无数可以接近、揣摩和利用的局部入口。行动者由此不必理解整个中心，只需识别当前节点的权重。地方可以揣摩上级，机构可以揣摩部门，个人可以揣摩单位，媒介可以揣摩平台。每个层级都在执行中心的语言，也在局部重新解释中心的目标。生存逻辑越向下复制，解释权越不可能全部返回中央。

中心因此获得了灵活执行，却也失去了单一解释。下级为了完成任务，会把中央语言翻译成自身资源目标；中层为了保住位置，会把上级要求包装成自己的组织利益；基层为了获得机会，会学习哪些表态能够被上报、哪些信息应该被隐藏、哪些困难可以被转译成政治成绩。表面上大家都在向中心汇报，实际上每一层都在重新结算。这种变化不能被归结为简单的地方主义，也不能被当作普通的信息失真。它是捕获逻辑进入组织链后的结构结果：每个节点都在寻找更高权重，同时把下一级变成自己的猎场。中心越依赖层层传导完成全国治理，越需要相信这些节点已经把中央意图完整执行；但节点越熟悉传导规则，越能够在信息、资源和身份之间进行再编排。

当外部供能充足时，这种局部再编排可能被中心的资源增长遮蔽。上级有新的项目、职位、投资和荣誉，下级就有动力把再编排的结果继续归功于中心。资源流动把多层捕获暂时绑定在同一个方向上。中心看见的是全国服从，社会实际运行的却是一组不断围绕入口重新估价的局部猎场。中心失去对这套政治生存逻辑的独占，并不会使它突然变成普通节点。变化在于，中心不能再把自己的方法当成只有自己会用的秘密。过去，中心可以把捕获、分类、拟态、忠诚表演和组织嵌入作为自己的能力；全国化以后，任何能够进入制度、媒介和组织的人，都可能学习这套方法。

政治生存逻辑全国化还会造成权重稀释。中心原来发布一句话，所有下级都把它当作最高指令；后来同一句话被不同节点重新包装，变成项目语言、绩效语言、招商语言、流量语言、个人品牌语言和情绪语言。表面上中心的话传播得更广，实际上它的含义被更多节点占用。语言占用不是单纯误读，它会产生现实利益：谁能把中央口号翻译成自己的项目，谁就能取得资源；谁能把自己的利益包装成中央任务，谁就能提高合法性；谁能把私人情绪表达成公共立场，谁就能获得传播。中心的语言越成为公共资源，中心越难凭借语言本身判断谁在执行自己、谁在利用自己。

早期拟态者需要模仿中心。政治拟态从核心扩散到社会以后，中心语言成为所有行动者都可以调用的接口。调用者不必真正掌握中心，只要掌握进入接口的格式，就能让自己的行动看起来属于中心。合法性由此从中心的专属财产变成围绕中心竞争的公共猎物。

主体民族满清化并不止于个人趋炎附势。个人行动是入口；同一套判断经过单位、学校、媒体、企业、协会和地方组织的反复使用，就成为组织生存逻辑。组织会判断哪个部门更强、哪个政策更有前景、哪个上级值得依附、哪个议题可以带来资源、哪个身份能够获得合法性。组织会主动调整名称、领导、口号、项目方向和对外关系，以便在新的权重结构中保持位置。组织的“忠诚”因此也可能是表演性的：它不是完全没有行动，而是行动方向随强势节点重新估价。

组织生存逻辑比个人行动更有持续性。个人换壳，可能只影响自己的位置；组织换壳，则可以把人员、档案、场所、媒体、资金和关系一起转移。借壳、换壳、夺舍之所以能够成为全国性反噬的基础，不是因为每个人都已经成为阴谋家，而是因为组织已经被训练成在外部权重变化时保护自身连续性的机器。中心在上升期欢迎这种组织适应性。它需要地方快速执行，需要机构在不同环境中保持政治正确，需要媒介把命令翻译成受众能接受的语言，需要企业和单位追逐政策窗口。可是同一能力一旦脱离中心的资源绑定，就会成为寻找新主人、转移旧功能和重新组织资源的能力。

六、识别危机、表态机制与结构幻觉

中心需要两面人式能力来维持制度运行：下级要理解没有写完的命令，干部要揣摩风向，组织要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单位灵活执行，媒介则要把同一口号翻译成不同受众能够接受的语言。纯粹机械服从无法管理复杂社会，中心必须奖励能够在外壳内完成转换的人。但这种能力一旦全国化，就会反过来破坏中心的识别。中心看到的是服从记录、正确表态、组织履历和执行结果，却无法直接看到行动者在

不同权重之间怎样重新计算。两面人未必在今天就反对中心，也未必已经准备夺舍；问题在于，中心训练出来的适应能力已经不再只属于中心。

当资源和机会掌握在高权重节点手里，忠诚首先成为取得入口的语言。领会官方话语、表现绝对服从、揣摩上意、拉一派打一派、红旗打红旗，都是在人工森林中生存的能力。表演性忠诚并不要求行动者内心相信一切口号。它要求人在正确的时间使用正确的表情、语言和身份，把自己呈现为最适合当前权重结构的人。中心越依赖公开忠诚来筛选人员，社会越会提高忠诚表演的技术。拟态因此扩散。下级模仿上级语言，机构模仿政策目标，个人模仿组织期待，媒介人物把正确推向“太服了”的极端。真正相信者、策略服从者、等待换壳者和准备借壳者，开始使用相同外观。中心曾用拟态和组织嵌入击败旧秩序，胜利以后却不得不面对全国性的拟态社会。

在靠表演服从接入资源的行动逻辑中，中共在满洲获得的，从来不是稳定的忠诚，而是一批比它更早理解“如何与强权共生”的人。人工渔猎全国化以后，这种关系不再局限于满洲人口，而成为全国政治环境生产的生存逻辑。在上升期，中央掌握最多资源、最强组织和最高合法性，忠于中央与忠于资源位置暂时重合。表演性秩序看起来像牢不可破的忠诚，高执行力和高动员效率也因此能够迅速出现。但这种忠诚的真实对象，是资源、机会和当前强势节点。只要中心仍然是最大猎场的主人，人们便围绕中心排列；一旦资源紧缩、合法性动摇、地方或新组织提供更现实的入口，忠诚就会迅速贬值，中心也会被重新估价。人工森林训练的是强弱判断，不是永久信仰。中心可以暂时成为最强者，却不能要求掌握渔猎生存逻辑的人停止比较强弱。〔注 2〕

政治生存逻辑全国化以后，中心遭遇识别危机。真正忠诚者、政治拟态者、两面人、借壳者和等待换壳者，都能够说同一种正确语言，展示同一种服从姿态，执行同一种表面任务。中心越提高忠诚表演的标准，拟态者越会提高表演精度。审查越依赖语言、表态和身份，越容易筛选出最善于使用语言、表态和身份的人。结果是，两面人并未被消灭，反而成了最能通过识别系统的人。

“红旗打红旗”把这种识别危机推到极致。体制可以处理“不服”，却无法处理“太服了”；封杀像封杀自己的口号，放行又让口号在过度重复中变得廉价。中心的合法语言成为别人可以占用的公共武器。当全国社会掌握捕获、拟态、表演忠诚、借壳、换壳和夺舍，中心就失去了对政治生存逻辑的垄断。

识别系统于是出现悖论：越要求统一语言，越容易得到统一表演；越强调忠诚的公开形式，越容易把真正忠诚与策略服从压缩为同一个外观；越依赖高权重节点筛选，越会吸引最懂节点、最会调整姿态的人进入。中心不是突然失去所有信息，而是失去区分信息真伪和方向的垄断能力。上述识别困境还不等于满洲反噬的全过程。它只说明，中心已经不能把社会成员的表面服从直接等同为永久忠诚，也不能把制度执行直接等同为中心对生存逻辑的独占。只有当同一套政治生存逻辑开始被用来重新选择主人、猎物和方向，满洲反噬才真正发生。

当社会成员长期处在人工森林中，中心可能试图通过更强的表态要求恢复信任：要求更完整的忠诚声明、更严格的身份筛查、更密集的学习、更统一的语言和更明确的站队。但这些措施首先会提高表演技术，而不一定恢复真实的跨期承诺。因为表态是中心最容易观察的接口，也是行动者最容易调整的接口。中心如果只增加表态强度，行动者就增加语言精度；中心如果扩展审查范围，行动者就扩大拟态范围；中心如果要求更长的忠诚履历，行动者就把履历变成可交换的政治资本。识别系统不断增加形式，真实方向却更加隐藏。

公共信任需要行动者相信：规则不会因为新的强势节点出现而被随意改写，今天的合作不会在明天被重新命名，专业能力不会因为一次风向变化而全部失效，组织承诺不会只在资源充足时有效。人工渔猎却让人们不断看到，真正重要的是谁拥有重新命名和重新分配的权力。因此，中心越把信任问题翻译成忠诚表态，越可能把信任继续推进表演领域。它能够获得更响亮的统一，却不能由此获得更稳定的长期积累。中心失去的不是一条口号，而是把口号自动转换成真实信任的垄断能力。

中心把执行结果看成忠诚，把资源增长看成认同，把表态一致看成方向一致，把组织规模看成政治控制。这个误认并非简单的领导者个人判断错误，而是政治生存逻辑制度化后的结构幻觉。制度确实能够让大量命令得到执行：项目完成了，学校开课了，单位表态了，媒体转发了，军队行动了，地方提交了报告。执行如此广泛，中心便容易相信，社会已经把中心的目标内化成自己的目标。人工森林中的行动者却也可能只是把中心目标当作当前资源路径，把完成命令当作取得位置的必要动作。当资源和中心重合时，这种区别被遮蔽。忠于资源看起来像忠于中央，忠于强势节点看起来像忠于组织，忠于当前合法语言看起来像忠于政治核心。中心因此把自己最成功的资源分配能力误认成永久忠诚生产能力。

误认一旦形成，中心便会通过更大规模的制度继续复制这种结构幻觉。执行同样表态的单位、学校、媒体和组织越多，中心越相信政治生存逻辑已经被社会内化；越相信这种内化已经发生，越会放松对真实功能方向的区分。政治生存逻辑全国化因此同时制造出控制能力和识别盲区。

七、方向独占性的丧失与反噬的条件

同一条因果链同时产生上升期的优势与终局的条件。此前，满洲工业外骨骼让政治核心获得现代战争能力；东北野战军把工业、人口、技术和组织编成推进力量；现代入关使中华苏维埃政治—组织核心占据中华民国大陆国家躯体。胜利以后，中心又借助单位、户籍、学校、媒体、宣传、身份分类和资源配置，把捕获旧国家躯体、重编人口和组织、拟态合法语言、忠诚表演和资源结算的政治生存逻辑制度化并推向全国。每一步都增加了中心的规模、速度和控制范围，也把原先属于核心的政治生存逻辑向更广泛的人口与社会组织扩散。

在上升期，这种制度扩散表现为高执行力、高动员效率和高度服从的表演性秩序。中心能够迅速调动资源，社会成员能够迅速执行命令，媒介能够迅速统一语言，组织能够迅速重排身份，中心看见的是胜利路径的实际收益。然而，中心无法只获得执行力而不传播政治生存逻辑。正是在这种制度训练下，

社会成员逐渐掌握了中心的识别逻辑：知道什么是高权重，知道怎样靠近强势节点，知道怎样把私人目标包装为公共任务，知道怎样在合法语言中保留替代方向，也知道怎样把旧组织外壳变成通向新权重的入口。

胜利路径本身因此成为一枚延时引信。“延时”在于，政治生存逻辑不会在中心最强时立即爆炸。中心强盛时，资源和合法性仍集中在中心，忠诚与资源仍然重合，社会成员即使掌握政治生存逻辑，也更有动力把它用于靠近中心。然而，中心训练全国人口在人工森林里判断风向、寻找强者、捕获资源和改变外壳，也就无法要求他们永远不把中心本身放进强弱判断；接受满洲遗产带来的不是单向收益，而是必将到来的代价。在资源紧缩和合法性动摇时，这种机制会自动转化为内部竞争、忠诚贬值和对权力中心的重新评估。这种自动反应本身并不要求行动者已经转向寻找可替代的主人，也并非社会在此刻才突然掌握强弱判断——这套能力在上升期早已练就，改变的只是比较的对象与运用的方向。从围绕中心捕获资源，到重新估价中心乃至寻找替代主人的延时过程，受资源紧缩、合法性动摇及外部供能减弱等结构条件驱动，但重新估价、寻找主人与改变实际行动彼此不能等同，这些压力也不是所有反向表现必须按序经过的统一阶段表。〔见第二十八章注 1〕

中心对方向独占地位的最终丧失，是制度扩散与社会学习所导向的一项结构判断。这并不等于中心已经崩溃，不等于所有人都已经公开反抗，也不等于中心已在某一突发事件中被推翻。中心在失去对这种政治生存逻辑的垄断后，仍然可能拥有国家资源、组织能力、宣传系统和强制力量，可以继续维持表面秩序，继续得到大量执行，继续拥有高于其他节点的资源体量。真正改变并被破坏的，是中心对方向的独占性：中心不再是唯一能够判断入口、制造拟态、占据外壳和改变权重方向的行动者。

在这一关于失去独占的结构判断下，政治生存逻辑的全国扩散，并不妨碍它仍然可能继续大量服务于中心，但中心不能再把“服务过中心”当成“只能服务中心”。社会成员知道怎样捕获资源，组织知道怎样借用合法外壳，媒介知道怎样把政治语言转换成流量和情绪，地方节点也知道怎样在多重上级之间重新安排信息。所谓被全国掌握，指明的是这套逻辑已在全国尺度上具备了跨场域的公共可调用性；曾归中心掌握并被视为自身能力的这套手段，如今中心虽仍掌握，却已不再能够独占使用。中心无法再保证每一次捕获、每一次拟态、每一次忠诚表演和每一次换壳都返回到自己的最高权重，无法再保证同一套语言只能表达中心的意图，也无法保证进入旧组织的人和新主义最终只会加强中心。

上述独占性的终结，在现实机制上根源于长期的制度运行与社会学习，正是这一过程使政治生存逻辑沉淀为公共常识。当行动者知道使用什么词汇能够取得资格、调动什么关系能够减少成本、披上什么身份能够得到保护、在什么时机必须迅速公开表态时，他就不再只是被动接受制度，而是在掌握制度的操作语法。公共常识的改变比一项正式命令更深：人们开始把资源入口、强势节点、身份转换和窗口捕获当作现实本身来理解，不再把它们当成需要额外说明的政治技术。政治生存逻辑一旦成为公共常识，就从中心的专门能力变成所有节点都能调用的社会语法。

中心因此面对一个无法通过增加命令数量解决的问题：它可以继续规定目标，却不能阻止社会成员学习怎样利用目标；可以继续发布身份，却不能阻止组织比较不同身份的收益；可以继续制造猎物，却

不能保证猎物永远只被中心围捕。增加命令无法收回扩散的操作语法；中心失去的不是一件设备、一项政策或一条宣传口号，而是对政治生存语法的唯一解释权和唯一使用权。

失去垄断并不等于反噬已经发生。全国化、制度化和媒介化削夺了中心的垄断地位，第一次使反噬成为同一套政治生存逻辑内部的现实可能；但这种扩散本身并不能直接推导出异向调用的事实，原本的助力怎样演化为吞噬，也不能凭“扩散”二字自动成立。反向机制此时仍未完成。这套政治生存逻辑在中心内部、边缘网络、新组织、新主义和媒介人物等不同作用位置重新得到依托，外部供能断绝后情绪围猎转向内部，抑或借壳、换壳和夺舍从中心的续命技术转变为吞噬中心的技术，这些具体表现不必全部同时出现，也并不因各自单独出现就自动证明反噬已经成立。这些反向动作共同依赖的决定性转移在于：只有当同一套政治生存逻辑开始被用来重新选择主人、猎物和方向，满洲反噬才真正发生。

第二十七章注释

一、政治生存逻辑全国化是基于制度复制、社会学习、跨域调用以及中心丧失方向独占所提出的理论判断；典型人物与媒介节点体现该逻辑在不同外壳中的功能连续与可调用性，其本身不充当全国覆盖面的实证记录。在关于制度接口与抗争方式的研究中，Kevin J. O’ Brien 在“Rightful Resistance”（World Politics 49[1], 1996, pp.31–55）中分析了行动者如何利用国家官方政策、法律承诺和体制认可的价值反向提出诉求（pp.31–35），并讨论了抗争在基层的展开与传播（pp.36–44）。该研究基于诊断价值与多样性选取案例（p.35 及注 13、14），其实地调查涵盖 1992 至 1995 年间 22 个村庄、十余个乡镇县城、三个省会及北京，并非全国代表性普查；文中许多实例表明抗争者依然承认执政权威并主动寻求中央支持（pp.44–45），不能将此类依规诉求直接等同于反噬或夺舍，该文亦未涉及该逻辑源自满洲的论证，不能用以证明全国人口均已掌握相应策略或中心已丧失全部控制。行动者的局部学习运用，与制度在全国范围的扩散、方向独占的丧失、实际反向操作乃至对国家躯体的接管，属于不同的分析层面；要证实全国化与方向分化的实际广度，需要依赖具有跨域制度规模、跨期连续追踪及独立使用方向的经验材料。

二、“中共在满洲获得的，从来不是稳定的忠诚，而是一批比它更早理解‘如何与强权共生’的人”属于类型化判断，分析的是依靠表演服从接入资源的行动逻辑。其中“更早”涉及具体历史时间的对比，需要同时考察具体人员或组织在何时掌握相关共生实践，以及作为比较对象的中共在何时掌握相应方法；在缺乏双方在相应时期的文本、行为记录及相互印证材料前，不能以后期展现的体制嵌入倒推其历史起点。在当代体制内人员行为研究中，Kevin J. O’ Brien 在“China’ s Disaffected Insiders”（Journal of Democracy 28[3], 2017, pp.5–13）中分析了基层警察（pp.6–7）、军转干部（pp.8–9）及被抽调劝阻亲属的公职人员（pp.9–10），指出部分军转干部在利益受损后会利用体制身份和政策文件请愿，但同时指出大量不满者仍选择常规服从或日常敷衍，且敷衍与不满在事实上不等于脱离体制或叛变（pp.10–12）。该研究所揭示的受损、不满、敷衍与抗争的分化，不构成

满洲时期历史先后关系的证明，亦不能以此否认真实信仰的存在。确证这一判断的历史有效性，需要依托具体人物与组织在当时的历史文本、行为记录、资源依附关系及确切的时间序列材料。

第二十八章　满洲反噬：人工森林中猎犬与野狼的转向

一、识别死锁与忠诚的重新估价

满洲反噬不能简单归结为一次叛乱。作为一种分析模型，普通叛乱仍然把中心和对手分开：对手在中心之外组织，使用与中心不同的标识，提出不同的主张，具有清楚的敌我、组织和边界，中心可以通过边界识别、组织追踪和强制手段把对手标记出来并调动力量处理。满洲反噬却不是先有一个清楚的外部敌人再向中心发动攻击；它首先发生在中心自己推广的政治生存逻辑已经进入全国所有接口之后。识别系统失效是反噬展开的通道与隐蔽条件：所有人都使用中心的语言，所有组织都展示中心要求的忠诚，真正的方向却越来越难从外观判断。

因此，满洲反噬不是一般治理失败，也不是普通合法性危机。一般治理失败表现为政策错误、行政低效、腐败、信息失真或资源不足，这些现象可能存在，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同一套捕获、拟态、借壳和夺舍能力会转向中心本身。普通合法性危机可能表现为支持下降、信仰减弱或公开不满；满洲反噬更深，因为反向使用者仍然能够占据合法语言和合法组织。中心越试图以合法性语言修复自己，越可能把能够被反向占用的语言再提供一次。中心仍然拥有国家机器，却不再独占国家机器内部的政治生存手段。

人工渔猎全国化以后，中心必须依靠政治身份、组织履历、公开表态、执行记录、关系位置和敌我标签来识别人。这些可见接口在中心强盛时具有较高筛选能力，因为资源、命令和惩罚都集中在中心，行动者必须围绕中心调整自己的外观。然而，这些接口同时成为拟态工具。规则越明确，表演越容易校准；口号越统一，越容易成为公共伪装；忠诚越被要求公开展示，越难区分信仰、策略和等待机会。行动者知道怎样填写履历、怎样选择表态、怎样证明执行、怎样进入关系链、怎样把自己放在安全的敌我位置。识别接口没有消失，反而被所有人学习得更熟练。中心看到的信息更多，真正能够区分方向的信息却更少。

面对这种局面，中心若提高审查密度，行动者就提高伪装密度；中心若扩大忠诚测试，行动者就扩大忠诚表演的场景；中心若要求组织层层签字，行动者就把签字、会议、学习和报告变成新的资源路径。中心以为自己在加固识别，实际是在训练更多人熟悉识别系统的内部格式。识别死锁不是因为中心完全失去信息，而是因为信息已经被掌握生存逻辑的人反向格式化。中心要求行动者证明自己属于中心，行动者就把“属于中心”的证明做成可以交换、复制和转移的政治资产。

表演性忠诚的关键不在于行动者是否虚伪，而在于中心只能通过可见形式识别忠诚。一个人可以真诚地相信中心，也可以策略性服从中心；一个组织可以确实完成任务，也可以把任务当作获得资源和扩大自身网络的机会。表面结果相同，实际权重方向可能不同。中心如果把表面一致当成实际一致，就会把策略性服从者当成永久忠诚者；如果把所有偏差都当成敌对，又会迫使行动者提高拟态技术。两种选择都扩大识别困难：前者放宽了借壳入口，后者提高了借壳者的伪装收益。

这构成了识别死锁：不用官方语言的人容易被识别为外部敌人，过度使用官方语言的人却会逼迫中心面对自己的语言。中心能够处理“不服”，因为不服提供了明确对象；中心无法稳定处理“太服了”，因为太服可能是执行，也可能是讽刺、占位、借壳或等待中心失势后的再利用。这就是中心从内部培养反向使用者的方式。中心需要懂政治语言、懂组织程序、懂资源配置和懂社会情绪的人；这些人一旦掌握全部接口，中心就不能再假定他们的能力只会向中心回流。

表演性忠诚在中心强盛时最有效。人们领会官方话语、表现绝对服从、揣摩上意，把自己的目标包装成中心目标；组织也用同样方式争夺项目、编制、资格、政策接口和传播权重。由此形成的履历资本，使一个人过去越会使用正确语言，越容易被认为具有可靠政治资格；一个组织过去越能完成表态和动员，越容易获得新的资源。

两面人不是制度偶然漏掉的少数人，而是人工森林持续筛选出来的高适应者。中心需要他们迅速判断风向、把命令转成行动，却又害怕他们凭同样的能力看出中心的裂缝。越会执行的人越懂接口，越懂接口的人越知道怎样换壳。一旦中心失势，原来证明忠诚的履历也可以被重新解释：它可以证明这个人最熟悉中心，也可以证明这个人最懂得怎样借用中心。

这种秩序能够制造惊人的执行表象，却不能制造稳定忠诚。在资源上升期，忠诚、机会和中心资源暂时重合。服从中心可以获得工作、项目、住房、编制、流量、保护和未来预期，行动者即使首先忠于资源，也会表现出对中心的忠诚。中心因此容易把资源绑定误认成信仰绑定。然而，这种秩序训练的是怎样让上级相信，而不是怎样在资源消失以后继续服从。忠诚一旦成为取得资源的技术，就会随着资源方向改变而重新估价。

资源紧缩以后，绑定关系开始松动。项目减少，岗位变窄，住房和教育成本上升，平台流量难以兑换收入，未来承诺无法继续提供镇痛。行动者仍然可能使用旧语言，但他们会重新估价：中心还能提供什么，哪个地方节点更有资源，哪个组织能够提供替代机会，哪个媒介能够制造即时情绪补偿。合法性动摇会加速这一过程。只要中心仍然能够把损失解释成暂时困难，表演性忠诚就可以继续运转；当解释越来越难以兑换为现实收益时，忠诚的交换价值便下降。行动者不必马上公开反对中心，无论是减少投入、保存替代关系，还是转移资源、改变外壳，只要实际的资源或依附方向发生改变，就已经开始把中心从唯一主人降为候选主人。

对权力中心的重新评估不是一个统一决定。地方、机构、个人、媒介和新主义会在不同时间、不同资源位置上完成自己的比较。反噬因此不是一声命令引发的同步行动，而是许多行动者在同一人工森林中使用同一套强弱判断，逐步把中心纳入猎场。

中心看到的是高度一致，内部运行的却是不断重新评估强弱、资源和机会的渔猎逻辑。中心与反噬者使用同一种语言，进入同一种组织，争夺同一种资源，展示同一种忠诚，甚至引用同一套敌我分类。区别不再存在于外观，而存在于最高权重已经转向哪里：一个人可以继续执行中心命令，却把执行变成自己的资源；一个机构可以继续挂着旧牌子，却把人员、信息和机会重新排列到另一个方向；一个媒介可以继续使用官方词汇，却让官方词汇失去原来的封闭解释权。

识别失效并不等于反噬已经发生，但满洲反噬正是从这种失效中获得通道：中心再也不能可靠地判断谁是猎犬，谁已经变成野狼。只有当运用相同手段的行动者开始实际改变主人、猎物和方向时，反噬才真正确立。

在此过程中，中心的外部边界仍然存在，国家仍然可以区分外国、国内、敌对和友好，强制力量仍然可以处理公开越界者。但真正改变中心命运的不是外部边界上出现了什么，而是内部接口已经被大量行动者熟悉。外部敌人需要穿越边界，内部反噬只需要重新安排边界：一个机构不必宣布反对中心，只需把某个内部失误命名为中心问题；一个媒介不必放弃正确语言，只需重新解释谁代表真正的正确；一个地方不必公开独立，只需把资源、信息和执行顺序重新排列。反噬发生在中心原本用来传导控制的管道里。

正因为它经过内部接口，中心不能靠加高外墙解决。墙越高，墙内的节点越重要；检查越密，熟悉检查的人越有价值；语言越统一，掌握语言边界的人越能够控制何时过量、何时不足。中心面对的不是边界被突破，而是边界本身已经成为可以占据和重写的组织资源。

二、合法语言的反向使用与代表权争夺

红旗打红旗，是防御性拟态的极致，也是反噬进入语言系统的方式。表面上没有反对，只有比官方更官方；没有拒绝口号，只有把口号执行到荒诞极致。红旗打红旗不是普通讽刺，讽刺可以站在外部观看，红旗打红旗则进入内部合法性格式，把官方语言推向中心无法轻易处置的极端，成为反向占位的工具。中心的合法性依赖某些词语、姿态和价值判断；反向使用者不必拒绝这些词语，只需让它们在具体语境中相互碰撞，使中心的处置行为看起来像在处置自己的原则。

体制最怕的是“不服”，但它完全无法处理“太服了”。直接反对可以被标记、封锁和惩罚，因为不服提供了明确的外部边界；太服了却占据内部格式，让审查陷入逻辑死锁。太服的人可以比中心更热烈地赞美中心、更彻底地执行中心、更严密地追问谁才真正符合中心。中心陷入两难：封杀他，就必须说明自己为什么害怕一个最正确的人，这就像封杀自己的正能量；放行他，他又会把正确推进到荒诞，在重复中消解口号的严肃性，使正确语言的筛选能力降低。

中心把合法性集中到统一语言、统一身份和统一历史叙述中，原意是减少解释竞争。可一旦所有资源都需要通过这套语言才能进入现实，掌握语言的人就取得了更高的入口价值。一个行动者越能证明自己代表中心，越可能获得组织、媒体和资源位置；一个组织越能证明自己比别人更正确，越可能获得道德高地。于是，合法性集中反而为内部竞争提供高收益目标。反噬者不需要另造合法性，只需争夺“谁才是真正的中心代表”。

红旗打红旗的反噬效应有三个观察维度。第一，它争夺解释权：谁有资格定义真正的正确。第二，它争夺处置权：谁有资格判定哪一种忠诚过量。第三，它争夺公共注意力：原本只服务中心的语言，被转化成所有人都能进入的表演舞台。它把反对变成资格竞争，把质疑变成忠诚审查，把语言冲突变成对中心代表权的争夺。中心如果拒绝对方，就必须证明对方不够正确；中心如果承认对方，就等于把自己的代表权分割出去。反向占位比公开反对更危险，不是因为它必然成功，而是因为它直接进入中心最依赖的合法性接口。中心的语言在外部可以是边界，在内部却是争夺中心的公共资源。

周丽峰式言语超限战显示出，合法语言不只属于中心。全国社会学会了官方语法以后，可以用同一种语法布置语言陷阱。中心过去用口号划定敌我，反噬者则用口号遮蔽敌我；中心用红旗取得合法性，反噬者便用红旗打红旗。周丽峰的言语超限战可以作为这一接口的媒介节点，说明“太服了”与逻辑死锁的机制。这种机制分析并不能证明周丽峰属于某个秘密组织；一个媒介人物只要掌握官方语法的边界，就可能让官方语法暴露出自身的封闭性。

三、借壳、换壳与最高权重的转移

借壳生蛋不是在墙外推墙，而是在墙内拆梁。借壳的第一步不是直接发动攻击，而是进入既有的合法空间。新组织、新主义和人物化媒介不必先公开宣布自己要替代中心，而是寻找已经存在的健康、文化、教育、传统、媒体、单位、平台、协会、项目、政策倡议或社会服务等具体接口。它们使用中心能够识别的词汇，接受中心规定的形式，尽量把自己的特殊组织关系隐藏在这些合法外壳之后。

合法空间之所以能够成为入口，是因为中心本身需要填补秩序空窗。在意识形态强制动员退潮以后，中心需要新的信仰、道德、文化或情绪资源来维持社会秩序；它无法让所有资源都由中央直接生产，因而必须允许某些外部力量在有限空间内活动，甚至调用民间动员力来安抚社会。

在这类历史节点上，存在一个有待在具体对象上分别核验的解释判断：“中共主动让他们夺舍”与“中共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夺舍”两个判断同时成立。主动性体现于中心主动开放空间、调用力量和引入接口；无意识则在于中心在当时没有识别出新力量正在改变组织的最高权重。主动让其进入，并不等于主动同意未来被其替代；但当时未意识到演化后果，也绝不等于中心没有作出造成这一入口的制度选择。

借壳的力量就在于外壳仍然有效。人们进入的是熟悉场所，听到的是合法语言，使用的是既有分类，归属却逐渐转向新的中心。

借壳者利用的不是中心的失误本身，而是中心的成功经验。中心过去就是通过进入旧国家、保留旧组织和调用旧语言完成现代入关。借壳者学习的是同一个结构：不要先摧毁外壳，先进入外壳；不要先宣布新主人，先让原有程序替自己提供合法性；不要先夺取全部资源，先占据能够改变资源流向的接口。因此，借壳不是普通社会参与。它要求新力量在旧语言和旧程序内建立自己的文本、关系、权威和归属，直到人们仍然在旧外壳中行动，却越来越依赖新的解释中心。

当外壳失去吸引力之后，掌握这套政治生存逻辑的行动者并不会为旧壳殉葬。组织能力不会随着外壳的衰败而自动消失，行动者会重新判断哪一种主义、身份、媒介和情绪拥有更高权重，进而把组织能力转移过去，寻找新的现实位置。换壳并非必然阶段，借壳、换壳、夺舍也不是所有历史对象都必须依次经历的固定三步。但在反向运用的机制中，换壳提供了一项关键能力：它让组织不必与已经失效的理论名称一同死亡。理论文本可以被宣布过时，组织功能却能够通过新的词汇和新的人物继续获得现实位置。换壳的重点不在于名称变化，而在于旧权重能否在新外壳中继续获得资源和组织位置。

一个组织可以从政治语言转向文化语言，从文化语言转向健康语言，从健康语言转向民族语言，从民族语言转向反精英语言；外壳不断更换，人员、关系、动员方式和猎物识别却可以继续存在。每一次换壳都可能让旧组织逃过一次识别，也可能让新一代信徒真诚地以为自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共同体。

新主义生态正是换壳得以持续发生的供应环境。主动制造、结构筛选和无意识生成不断提供可用外壳。交媾主义的机制表明，理论文本的纯洁自述并不能决定其现实生成方向，也不能洗掉其现实依附与责任；理论命题、价值概念与论证依然参与动员和正当化。新的主义可以保留名称、理论家和真诚信徒，现实中的资源、传播、组织、敌我和机会分配却被旧权重结构捕获。

主观初衷、生成条件、构成目的与实际功能存在严格区别：理论家的主观初衷不能与其在社会结构中所承担的实际功能直接等同；旧结构环境的先在存在或后期的依附合作，本身不足以直接倒推其初始的构成目的；但形成时期的材料一旦能够证实理论旨在服务旧结构，该关系便不能被降格为后来的偶然利用。满清共产主义不断制造或推动生成交媾主义与自身交媾，正是因为换壳能够让旧的统治功能获得新的语言身体。

然而，新主义生态绝非只朝有利于中心的一个方向单向运行。中心固然能够筛选、放大和捕获新主义以实现自身延寿，但新主义中的行动者同样能够学习中心的权重接口，利用合法外壳反向嵌入既有组织。一旦中心失去了对这套政治生存逻辑的独占，换壳就不仅是中心延续统治的技术，也同时成为新力量绕过审查与识别系统的技术。原本用于为主导结构续命的能力，同样可能由新的外壳反向转移至中心的裂缝之中。

借壳强调进入，换壳强调跨外观延寿，夺舍则强调最高权重改变。旧名称、旧机构、旧程序、旧档案和旧口号可以全部保留，但真正决定资源、敌我、解释和行动方向的中心已经换了。夺舍不是普通改名。人们仍然在旧组织中行动，旧组织却开始为新的关系网络、思想中心或资源集团服务。

夺舍发生时，外观的连续性反而会遮蔽内部变化。人们仍在同一场所开会，仍然使用同一套文件，仍然沿用同一组织名义，仍然引用同一政治词汇；但谁能够决定什么被看见、谁得到位置、谁被排除、什么议题具有正当性，已经发生转移。

这种转移可以通过人员网络完成，也可以通过资源路径完成，还可以通过解释权完成。一个新中心不必立即控制所有人，只要控制能够解释规则、分配机会和命名敌人的关键节点，旧外壳就会逐步为新方向服务。内部人员最熟悉组织程序、语言边界和权重接口。他们知道怎样让新方向看起来像旧命令，怎样让利益集团穿上政治任务的外衣，怎样在中心仍以为自己控制外壳时，逐步转移实际权重。

中心过去的现代入关本身，就是夺舍机制的历史模板：政治—组织核心嵌入更大的国家躯体之中，旧有的人员、铁路、工厂、城市和科层继续运转，国家躯体得以保留，但其最高权重已经转移给新的主人，方向也随之改变。历史材料所支持的政治核心占据国家躯体，构成了这一机制判断的经验依据；它揭示了保存既有能力、转移最高权重并重新规定其与新主人关系的结构机制，绝非空洞比喻。但这一定位与具体机构内夺舍的成立有着明确界限：正如第二十一章所厘清，公开接管即使能够改变内部任命、印信、命令与最高权力，也不能凭接管结果跳过该组织内另一套关系取得控制的过程与接口证据，直接宣布夺舍已经完成；一个具体组织是否被夺舍，必须依据其内部位置、资源、解释与敌我决断发生实质变动的独立证据逐案检验。

捕获—重新赋位并调用国家躯体的模板一旦被全社会所掌握，中心就无法保证夺舍永远只由自己单向使用。夺舍不是一种仅仅用于解释张宏堡、李洪志或某个媒介人物的隐喻，而是满清共产主义的基础能力在全国化以后出现的反向用途。在中心已经取得国家躯体、而这套基础能力失去独占条件之后，社会中的组织力量与新主义同样可以学习这套机制，在中心躯体内部改变最高权重。

四、猎犬与野狼：供能断绝与情绪围猎的内转

网络主播“斯奎奇大王”采用的合成毒品叙事被体制纳入，首先承担的是镇痛和兴奋功能，用来缓解现实落差造成的挫败感。在经济上升期的未来承诺失效以后，现实中的工作、收入、住房、医疗、教育和权利损失无法继续被“以后会更好”结算。这一媒介角色充当了猎犬：使用外部贬低、虚构民族主义、情绪站队和廉价智力优越感，把不满引向指定猎物，从而提供即时补偿。

体制“雇佣”猎犬是一种媒介功能比喻。功能相合并不自动证明存在正式雇佣合同或直接指令，参与者也未必意识到自己正在被使用；但没有合同，同样不能断定控制关系不存在。它意味着这种媒介功能能够为体制提供外部猎物、情绪排放和合法性补偿，因此被纳入、容纳或利用。“斯奎奇大王”的现实作用在于把吗啡失效后的社会落差加工成合成毒品，而不是提供可以修复现实的政治组织。

它之所以是猎犬，不只是因为它攻击外部对象，而是因为它把社会成员的挫败转译成体制可利用的情绪方向。个体不必获得真正权利，只需证明自己站在正确一边；不必解释制度，只需找到一个可以贬低的外部对象；不必改变现实，只需获得一次集体情绪快感。猎犬功能将现实损失重新包装成身份收益。失去工作，可以被转译成看不起某种人；失去未来，可以被转译成拥有某种民族身份；无法获得

公共权利，可以被转译成对外部对象的智力优越。情绪受众因此不再要求制度解释，只要求可以重复消费的敌我和口号。

“合成毒品”正在破坏社会的底层逻辑。当一个人不再关心身边的苦难，只追求口号带来的集体快感时，社会就失去了自愈能力。合成毒品必须依赖外部供能。只要经济增长、就业预期、消费改善或未来承诺仍然能够提供某种补偿，情绪猎场就可以把不满导向外部：资本主义、美国、外国人、城市精英、文化敌人或其他被指定对象。

当外部供能断绝，外部猎物的镇痛效果下降。一个人失去收入，却被要求继续为宏大身份感到兴奋；一个家庭承担住房、医疗和教育成本，却被告知只要站队就已经获得尊严；一个年轻人看不到上升通道，却被要求把现实损失转译成外部敌人的失败。时间越长，外部对象越不能解释内部落差。由此形成关于情绪内转的突变预测：一旦外部供能——经济利益——断绝，这种情绪成瘾会瞬间转向内部。〔注 1〕

外部猎物不能永远提供足够兴奋。现实损失持续扩大以后，贬低美国、资本主义和外部世界不再足以完成补偿。既然围猎机制已经存在，情绪受众已经形成，话术和媒介接口已经准备完毕，受众已经习惯以敌我划分获得快感，新的猎物就会在内部寻找。地方节点、中央人物、机构、不同派别、旧猎犬和新的背叛者，都可能被纳入围猎。

但猎犬和野狼使用的是同一种话术、同一种捕猎逻辑。如果“斯奎奇大王”是体制雇佣的猎犬，那么设想推演中的牢 B、牢 C 就是潜伏在猎犬群中、随时准备在主人虚弱时咬断其喉咙的野狼。

牢 B、牢 C 属于结构推演的设想对象，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不能当作已经完成的客观组织事实。这种推演不提供成员名单、平台、时间表和准军事网络的现实史料依据。但同一套外部贬低、身份站队、敌我围猎和廉价快感，也可以被新的行动者反向使用，把猎物从外部对象改成内部中心。

野狼与猎犬的差别不在语言，而在主人。猎犬把中心指定的对象作为猎物，野狼使用相同的围猎技术，却等待中心衰弱后重新决定谁是猎物、谁是主人。它不必发明新语言或新主义，只需要继续使用猎犬已经训练好的围猎、站队、敌我划分和情绪动员，把猎物从外部世界改成内部人物、组织和中心。

这说明中心最危险的不是有人拒绝使用自己的语言，而是有人熟练使用自己的语言，却不再承认中心拥有最终解释权。猎犬已经训练了受众如何站队、如何贬低、如何寻找敌人和如何从情绪中获得归属；野狼只需接管这些受众的方向。昨天证明忠诚的话术，今天可以成为重新划分敌我的工具；昨天用于维稳的围猎技术，明天可以用于围猎主人。

这不是一次单纯更激烈的舆论转向，而是捕猎方向与供能方向的改变。原来中心提供猎物，后来中心本身变成可以被围猎的对象；原来民族主义承担补偿功能，后来不同版本的民族主义互相争夺解释权；原来廉价优越感指向外部，后来它可以用于证明某个内部节点比另一个内部节点更有资格成为主人。中心制造了围猎能力，却失去了规定猎物的垄断；中心提供了敌我语言，却失去了永久解释敌我的权力。

猎捕逻辑包括识别对象、命名敌人、制造围猎、分配归属、奖励跟随和惩罚偏离。中心用它来组织国家和社会，“斯奎奇大王”用它来组织情绪，野狼用它来组织反中心，思想游击队用它来跨接口移动。外壳变化，动作结构没有变化。当中心能够决定猎物时，捕猎看起来像秩序；当中心失去决定猎物的垄断时，同一捕猎看起来像互相围猎。每个节点都拥有部分命名权、部分传播权和部分组织权，社会于是进入多个猎场叠加状态：中央仍然制造总体敌我，地方和媒介却在其中添加自己的局部猎物。

这会使中心面对一种反向信息：任何对外部敌人的成功围猎，都可能训练受众熟悉如何围猎；任何成功制造的集体快感，都可能成为新的动员资源；任何被允许使用的正确语言，都可能在下一次权重转移时被重新指向中心。满洲反噬不是捕猎消失，而是捕猎方向改变。中心并没有创造一套只能向外的武器，它创造的是一套可以沿着资源、语言和归属关系移动的政治生存逻辑。

经济供能断绝以后，许多人仍然需要归属、解释和敌我。现实组织无法提供工作、住房、医疗和上升通道时，情绪组织可以提供更快的替代：一个口号、一种身份、一个共同敌人、一场直播、一套优越感和一次集体围猎，就足以形成即时归属。“斯奎奇大王”采用的合成毒品叙事，其体制功能在于把这种情绪组织控制在外部猎物方向；满洲反噬的风险则在于，情绪组织已经拥有独立的传播速度和重复能力。它不需要等单位、学校或正式组织批准，只需要找到足够强的情绪接口和可被贬低的对象。

情绪组织与现实组织的区别在于，它可以快速形成、快速换壳、快速转移猎物。现实组织需要场所、人员、档案和资源，情绪组织只需要语言、人物、平台和受众。正因为它轻，才容易在中心的缝隙中移动；正因为它依赖即时快感，才容易在外部供能停止后把方向转向内部。这不等于情绪组织会自动替代国家组织，也不等于每个网络受众都是反噬者。中心已经把捕猎逻辑普及到一个不需要正式编制即可运行的媒介环境中。中心失去对政治生存逻辑的垄断以后，情绪组织成为这套手段最快反向作用于中心的接口之一。

猎犬和野狼共享话术，因此中心无法只靠内容判断方向。相同的外部贬低可以是服从，也可以是等待转向；相同的民族主义可以是体制补偿，也可以是新主人寻找合法性的入口；相同的反精英情绪可以服务中心，也可以服务新的内部围猎。中心只能增加来源、关系、资源和行动结果的审查，但审查本身又可能被掌握。一个行动者如果熟悉中心的风险模型，就能把自己放在最安全的位置；一个组织如果熟悉中心的授权逻辑，就能让新功能伪装成政策执行；一个媒介如果熟悉中心的封禁边界，就能把最有效的反向信息控制在“太服了”的范围内。

猎犬群体中的野狼不需要持续隐藏全部方向。它只需要在中心强盛时提供可用服务，在中心衰弱时重新解释过去的服务。过去的忠诚履历于是成为双重资产：既可以证明自己曾经是中心的人，也可以证明自己最了解中心的弱点。这正是满洲式政治生存逻辑的可转移性。它不要求行动者拥有纯粹身份，只要求行动者能够在不同主人、不同猎物和不同权重之间保持可行动状态。

五、新主义、思想游击队与反向组织

新组织看中的不是一个完整而强盛的中心，而是中共内部的裂痕。思想游击队描述的是一种结构可能，并非一个已经存在的统一组织：行动者不先占领固定机构或固定阵地，而是在不同主义、媒介、组织接口和情绪群体之间移动，寻找裂缝、借用外壳和捕获注意力。

它的优势不在于拥有更完整的理论，而在于能够把同一套高权重接口拆开使用。一个平台提供传播，一个组织提供合法性，一个情绪群体提供受众，一个新主义提供道德语言，一个人物提供权威外观。思想游击队不必同时控制全部资源，只需在不同节点之间建立可转移的关系。

中心过去依靠高权重集中把这些节点串在一起，思想游击队则利用中心之间的缝隙进行跳转。它可以在官方语言中出现，也可以在反官方语言中出现；可以借用民族主义，也可以借用无神论；可以借用反腐、反精英、反外部、反传统或任何具有即时动员能力的词汇。关键不是它最终相信什么，而是它能否在新的猎场中取得位置。

牢 B 与牢 C 是设想的推演对象而非现实存在，思想游击队和未来新组织则属于结构推演，其具体形态尚需另有事实才能确认。行动者将这套政治生存手段反向使用，并不要求反噬者先建立一个与中心完全不同的制度；这一机制判断不能代替有关现实组织的事实证明。

逆转版本的“斩杀线”教、设想推演中的牢 B 与牢 C、新的无神论法轮功，指向这条结构推演中的一种未来形态。逆转版本的“斩杀线”教是结构推演中的一种可能外壳：它把现实生存压力、收入门槛、阶层边界和被淘汰感组织成具有共同体色彩的猎场叙事。新的无神论法轮功则说明，不需要宗教神学，也可以借助生存竞争、围猎情绪、绝对归属、人物权威、情绪净化、敌我划分和捕猎逻辑建立新的共同体。这两个名字所指的形态，尚不能确认为已经存在、已经完成的客观组织。它们指出的是，中心输出的现代外壳不只能够制造传统信仰，也能够制造不承认神、却要求绝对归属的情绪组织；不只能够制造民族主义，也能够制造把生存竞争神圣化的斩杀叙事。

如果一个新的组织使用网络主播“斯奎奇大王”采用的同类话术，却把猎物从外部转向中心；如果一个新的主义使用中心的绝对语言，却把中心定义为最大的敌人；如果一个新的媒介共同体把外部贬低、廉价优越感和集体快感重新组织成反中心信仰，那么同一套政治生存逻辑就已经开始回流。

这里的“新”不意味着理论真的从零出现。它可能由旧权重捕获、主动制造、结构筛选和无意识生成共同提供外壳。交媾主义的反向接口就在于：中心能够捕获新主义，新主义也能借助中心留下的权重语法进入中心裂缝。交媾主义通常被理解为旧高权重进入新主义，但在满洲反噬中，接口可以发生方向转换。新主义先借用中心提供的组织、资源、媒介和合法语言，再把这些接口重新赋予新的功能；它保留外壳的公共可见度，却改变最高权重的归属。

这不是说中心创造的一切新主义都会反噬中心，也不是说真诚信徒都在等待夺舍。结构上只要存在同一套资源、传播、组织、敌我和机会接口，反向调用就成为可能。新主义仍可是真诚的，行动者仍可

相信自己的理论；但它的现实能力来自中心曾经制度化的接口，因此也可能在中心衰弱时成为中心裂缝的放大器。

新主义生态提供的是多种可用外壳。主动制造可以让某种外壳出现，结构筛选可以让它获得更高回报率，无意识生成可以让它在没有统一计划时自然收敛。中心在上升期将这些外壳作为意识形态空窗的补充，中心衰弱时，这些外壳却可以承担重新组织情绪、资源和敌我的功能。因此，反向交媾不是一个新理论名称，而是既有权重关系被重新使用。中心越把新主义当作自己的补充，越可能忽略新主义正在学习自己的接口；越把借壳者当作可管理的资源，越可能给出足够的组织、语言和传播训练。

中心过去能够利用气功、传统文化、文明纸媒和网络民族主义填补秩序空窗，新行动者同样可以利用中心留下的合法语言和社会裂缝。意识形态捕获开始反向运行：旧权重捕获新主义，新主义也借壳进入旧权重结构。张宏堡、李洪志所在的节点显示，公开接口曾为新组织的形成提供通道，例如人权观察所记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对法轮功研究分会的接纳及地方分支对讲习的协助。作为结构解释，这呈现了中心在意识形态强制动员退潮后，试图调用气功、传统文化与组织真空来填补信仰空间；中心期待借用新的权威、仪式和归属，行动者却在这些接口内建立起自己的文本、关系、传播和组织。

《意林》《读者》显示，纸媒可以把政治生存理性包装成文明生活和未来安抚；张雪峰与周丽峰显示，教育结算和合法语言可以在新的媒介中获得更强穿透；“斯奎奇大王”显示，经济上升吗啡失效后，情绪合成毒品可以把失去历史和失去未来转成即时站队。

这些节点不是同一种组织；上述接口关系也不能证明它们之间存在组织传承。它们的连续性在于接口变化：气功接口、纸媒接口、教育接口、语言接口和情绪接口，都可以承担归属、敌我、资源和权重再分配功能。中心越依赖接口来续命，越可能让社会学会怎样在接口中建立新的权威。反噬因此不是从某一个节点突然跳出，而是既有接口被反向学习的结果。谁能够进入接口，谁就能够理解接口；谁能够理解接口，谁就能够在中心衰弱时重新安排接口的方向。

中心最难处理的地方，是新组织可能在结构上越来越像中心，却在政治方向上越来越反中心。它们同样重视核心人物、同样划定敌我、同样制造归属、同样筛选忠诚、同样使用媒介和情绪动员。中心可以指责它们不服从，却很难指责它们不会组织。这种同构不是偶然相似，而是共同处在人工渔猎环境中的结果。中心把高权重组织技术推广出去，新组织在同一环境中学习，必然会采用能够获得资源、保护和受众的动作。它们或许反对中心的名称，却不必反对中心的组织办法。

“新的无神论法轮功”的结构意义，在于一个不承认神的组织也可以拥有绝对归属、人物权威、仪式化语言和情绪围猎。这并不意味着未来的新组织一定复制某个宗教形式。中心不能因为新组织不使用传统宗教词汇，就认为它没有夺舍能力。

六、反向调用的通道与多重结果

满洲反噬的展开，意味着中心推向全国的政治生存手段开始沿着此前建立的体系通道反向回流。这一反向作用至少通过四种通道发生。这四个通道不必同时开启，行动者也不必形成同一个组织。它们共同指向同一个结构事实：中心曾经把这套政治生存逻辑推向全国，其他行动者因而掌握了同一套手段，使这些行动者获得了离开中心、在不同节点之间移动并重新选择主人的能力。

第一是下级通道。地方、单位和中层组织掌握中心的语言与资源接口，在中心权重下降时重新排列信息和忠诚，把原本向上的执行能力转成自保和争夺能力。第二是边缘网络通道。被中心允许进入合法空间的组织、媒介和新主义，掌握了部分传播、情绪和归属资源，在中心出现的裂缝中扩大自身的解释权。

第三是新主义通道。交媾主义和新主义生态提供新的外壳，使旧的权力权重可以继续运行，也使新的行动者能够使用中心已经训练好的接口。第四是社会成员通道。全国人口掌握同一种适应手段之后，社会成员个人不必成为正式组织成员，也可以通过身份切换、流量表达、情绪站队、资源捕获和关系转移参与方向重估。

反噬发生，并不等于新的主人已经完成国家接管。这套政治生存逻辑的反向调用，首先改变的是中心的控制和识别能力，改变的是谁能够调用资源、语言和组织接口；它不自动提供一个稳定的新国家、新主义或新组织。牢 B、牢 C 是设想的推演对象而非现实存在；思想游击队、无神论法轮功和逆转版本的斩杀线教则是用于推演反向调用的结构对象，并非已经完成的历史组织。它们可以帮助说明反噬会使用什么外壳，却不足以证明现实中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政治实体。

中心可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表面统一，多个反向节点也可能彼此竞争、互相围猎。满洲反噬的关键不是新主人替代旧主人后秩序立即稳定，而是旧中心已经不能独占决定主人、猎物、语言和资源方向的能力。因此，反噬具有同源性，却不保证统一性。中心推广的是同一种适应手段，回流以后形成的可能是多重节点、多种外壳和不同猎场。统一的不是组织名称，而是捕获、拟态、借壳、换壳、夺舍和围猎的共同逻辑。

七、同源代价与兴亡的结构闭环

体制越推广渔猎政治生存逻辑，越难保证这套逻辑只服务自己。在表演性依附与策略服从这类关系中，中共在满洲获得的，从来不是稳定的忠诚，而是一批比它更早理解“如何与强权共生”的人，以及一套能够在强权之间寻找位置、保存能力和转换外壳的生存机制。看风向、依附强者、表演忠诚、捕获窗口、借壳、换壳和夺舍，在中心上升期表现为高执行力、高动员效率和高度服从的表演性秩序；在中心衰弱期，则制造内部竞争、忠诚贬值、重新估价和权重转移。〔见第二十七章注 2〕

在资源紧缩、合法性动摇和外部供能断绝以后，这套机制自动转化为另一种形态：内部竞争加剧，忠诚迅速贬值，对权力中心重新评估。这里的“自动”不是自然规律或生物本能，而是制度长期训练出的回报结构发生了方向变化。过去靠近中心最有收益，后来寻找替代节点、保存多重关系和切换外壳更有收益，行动者就会重新调整。中心不能把这种转化归因于少数叛徒，因为中心本身依赖这套能力运行全国；也不能把它归因于外部敌人，因为反向调用发生在中心的内部接口、合法语言和社会媒介中。吞噬者不是从满洲遗产之外凭空出现，而是从中心曾经依赖的能力中生成。〔注 1〕

反向吞噬中心的，正是中心从满洲遗产中取得、又推广到全国的政治生存技术。它不是外部敌人带来的一般政治危机，也不是某一次偶然治理失败。中共在满洲获得的从来不是稳定忠诚，而是一套如何与强权共生、如何在裂缝中换壳、如何在外壳内部夺舍的能力。中心强盛时，它是助力者；中心衰弱时，它必然转化为吞噬者。中共接受了这份满洲遗产，就必将得到这样的代价；帮助中共在满洲获得胜利的，正是最后能够反向吞噬中共的那套能力。〔见第二十七章注 2〕

满洲反噬不是一个外部敌人突然冲入中心，不是一次普通治理失误，也不是某个地方的地理叛乱；它是中心推广的满洲渔猎政治逻辑在全国化以后失去垄断，并在资源紧缩、合法性动摇和外部供能断绝时，被内部人员、新组织、新主义、媒介人物和表面忠诚者反向调用。中心过去以捕获—重新赋位、组织嵌入、借壳、换壳和夺舍取得国家身体，后来同一套能力被更多行动者掌握；中心过去用表演性忠诚筛选可用人员，后来表演性忠诚成为所有人进入中心的共同接口；中心过去用红旗建立合法性，后来红旗可以被用来反向锁死中心的识别系统；中心过去用猎犬把情绪引向外部，后来猎犬群中出现使用同一话术的野狼。这就是接受满洲遗产必将得到代价的具体机制。

这一代价不是一项偶然政策的副作用，也不是历史评价中的抽象负债，而是同一套政治—组织生存逻辑在现代化、制度化和全国化以后发生方向转移。

中心以满洲渔猎政治生存逻辑取得满洲国工业外骨骼、东北野战军和现代入关的胜利路径；满洲国工业外骨骼和东北野战军帮助政治核心完成现代入关；捕获—重新赋位帮助政治核心调用旧国家躯体；单位、户籍、学校、媒体和组织把捕获、拟态、忠诚、借壳、换壳和夺舍等政治生存手段写进全国社会；表演性忠诚和拟态使中心获得高执行力；借壳、换壳和夺舍让旧功能跨外壳延续；交媾主义和新主义生态提供新的语言身体；媒介和情绪接口则继续制造外壳。而在资源紧缩和合法性动摇时，中心已经失去了对这套政治生存手段的独占地位。

但每一项助力都同时训练了未来的反向能力。工业化扩大了动员规模，制度化扩大了掌握这套生存逻辑的人口，媒介化扩大了传播速度，情绪化扩大了猎物生产，换壳化扩大了组织转移能力。中心越成功地把这些能力接入自身，越不能保证它们永远只为中心服务。所以，满洲式成功能力不是在某一天被外部力量夺走，而是在自身扩散后成为可转移能力。中心强盛时，它被称为执行力、动员力、组织力和政治忠诚；中心衰弱时，同一能力被重新命名为反抗、揭露、清算、替代和新主人寻找。

所判定的“必将”和“必然”，属于对统治结构终局的理论论断，并不意味着具体灭亡日期、事件剧本或时间表已经得到确定。反噬展开的结构条件包括：资源紧缩、合法性动摇、外部供能断绝、中心识别失效、全国政治生存逻辑普及和新接口成熟。这些条件不是一张预测日历，也不构成每种反向行动缺一不可的统一阶段表，而是判断这套能力何时从助力转为吞噬的结构指标。具体事件如何发生、哪些节点先行动、中心如何反应、不同地区和组织怎样分化，都不能仅凭这些条件加以断定。然而，理论终局论断不同于经验时间表：具体日期与节点事件尚未确定，绝不等于终局只是“可能衰退”；反噬尚未以某种公开事件完成，也不等于必将承担的代价只是常规治理挑战；具体经验事实的未决，不等于这一统治结构的终局推论已被推翻。

被普及的生存手段沿着下级、边缘网络、新主义和社会成员四路回流，反向施加于中心。红旗打红旗、借壳、换壳、夺舍、猎犬、野狼、思想游击队、无神论法轮功和斩杀线教等，构成这一反向调用的结构推演。它们不必先变成一个已经完成的客观组织，便能说明同一套话术、同一种捕猎逻辑怎样被行动者用来重新选择主人和猎物。因此，帮助中共在满洲取得胜利的能力，正是最后反向吞噬中共的能力。

这一历史结构的兴亡闭环由此在机制上接通：从后金政治核心、八旗、入关与满城，到中华苏维埃、满洲国工业外骨骼、东北野战军、现代入关、后清、人工渔猎、中心失去垄断，直至满洲反噬，兴起机制与灭亡机制来自同一个满洲源头。

第二十八章注释

一、情绪内转的“瞬间”转向，属于基于情绪机制与落差所作出的突变预测，不同于渐进演化的描述；第七节所述之“自动”转向则是指长期制度塑造下的回报机制发生方向变动，并非脱离制度条件的自然或生物本能。从情绪产生落差、重新评估权力中心，到实际展开反向行动，存在着不同的行动表现，个人与组织均可反向调用，但不能将情绪成瘾的内转扩大为经济断供必然导致全体受众立即同步落实为实际反噬。正如 Kevin J. O’ Brien 在“China’ s Disaffected Insiders”（Journal of Democracy 28[3], 2017, pp.10–12）中所指出，体制内成员在面对失落与不满时存在继续服从、日常敷衍等多重表现，且这些现象不能作为经济危机引发政权崩溃的证据。所设想的野狼等对象属于展示话术与动员逻辑可被反向使用的结构推演，并非现实中已经完成的实体；确证经济供能变动对反向行动的实际触发，仍需要依赖针对同对象在供能变化前后的时间窗口、行动目标及实际组织资源调用的具体材料，反向证据与实际检验始终保持开放。

第二十九章　兴于满洲，亡于满洲

一、小核心怎样取得并调用更大的身体

如果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完成的国家形态回看中共兴起，满洲就会被压缩成一个战场、一个后方或一个偶然的资源地区。这样一来，就解释不了后金、八旗、入关、满城、中华苏维埃和满洲国工业外骨骼为何处在同一条兴起链上。

满清共产主义并非两个互不相干的对象在各自成立后再行拼接或寻找相似。它是一个不可拆分的政治对象：满清渔猎政治被共产主义现代化，共产主义又被满清渔猎化。

这一机制的早期形态是后金的小型高组织度政治核心。该核心并非在成形的现代民族国家中自然长大，而是在国家身体之外保持自身的高权重。后金不是一开始就拥有与明朝等量的国家资源，它的力量不只来自内部繁殖，更来自在战争、依附、归附、捕获和重新赋位中，不断把外部人口、军事能力、资源和组织转化为自己的力量。

小核心的优势不是规模，而是权重集中。它能够更快决定谁是自己人、谁可以被吸收、谁需要被压制、谁的技能值得保留以及谁必须被重新命名。相比之下，大型旧国家虽然拥有更大的身体，却可能在最高权重、组织动员和忠诚排列上被小核心穿透。后金的兴起因此确立了此后反复出现的行动链条：识别、捕获、编组、赋位、依附与调用。

后金政治核心由此形成了一套取胜办法：它不要求所有人拥有同一来源，而是通过编组把不同来源的对象纳入不同层级的主人—依附关系，放进同一权重秩序之中。谁是主人，谁是依附者，谁先进入，谁后归附，谁能够获得更高资源位置，谁被安排到边缘，都由政治核心通过重新赋位来划定，从而把差异人口转化为可动员的力量。

在这套体系中，八旗不是普通军事编制，编旗也不是单纯登记或普通户籍。编旗把一个人的社会位置、组织位置、军事义务、资源分配、忠诚以及主人关系固定在同一体系内。其中，包衣体现了主人—依附结构如何进入日常生活；汉军和归附者则显示出外部对象如何在保留部分技能与组织能力的同时被重新赋位。这表明政治核心不必等待同质人口自然聚集，就能吸收外部力量，且无须放弃自身的权重中心。

先来后到的层级差异正在于此。不同时间进入政治核心的人，不仅在时间上有先后，也可能在信用、信任、资源、待遇和主人关系上处于不同位置。后来的归附者可以成为有用力量，但“可用”并不等于“与早期核心拥有同样权重”。这种编组技术使政治核心一方面能迅速扩大规模，把外部人员转化为军队、行政和生产能力；另一方面能够保存内部的高权重，防止新进入者立即改写核心方向。捕获不是无差别收容，重新赋位也不是平等融合，而是将对象安排进具有特定等级、关系和功能的位置之中。

捕获与重新赋位是这一体系的基础机制。被捕获者不是简单消失，而是保留一部分旧技能、旧身份和旧关系，再被置入新的位置之中。旧资源因此可以继续使用，政治方向却已被根本改变。这种能力使满清政治不必等待一个纯粹共同体自然成熟，而是在扩张中制造共同体，依靠捕获增加人口，再以重新赋位扩大组织能力。谁能够被调用，谁就能成为新秩序的一部分；谁掌握最高权重，谁就决定所有组成部分的现实功能。

小核心是这条兴起链条的起点。没有小核心，就无法解释后来为何能够由特定的政治核心占据国家躯体；没有捕获和重新赋位，就无法解释异质人口、旧组织和旧国家能力为何能够被保留并转向服务于新主人；没有主人—依附与先来后到的秩序，也无法解释为何进入同一秩序的人仍然拥有不同的权重。

早期入关并非一个地域集团简单搬迁至关内，而是小型政治核心获得了旧国家的最高权重，进而调用更大的国家躯体。关内的城池、人口、官僚、税收、土地、交通、文化与制度外壳没有全部消失或清零，相反，它们被作为国家身体继续调用。旧国家身体保存得越多，政治核心越能凭借较小的内部组织来管理更大的主体社会，以掌握能够决定方向的接口实现对旧秩序主人的替代。

这就是满城的意义。少数高权重政治力量嵌入主体社会，不必让所有人都加入核心，只要在关键城市、军事节点、行政体系和资源入口维持自己的组织边界与主人关系。满城不是一般驻军的总称，而是政治核心把自身钉入大国身体的方式。它既是空间结构，也是权重结构：新的主人保持组织边界，又通过旧社会的资源、人员和制度运行全国。政治核心不必把所有旧外壳摧毁，只需掌握能够决定方向的接口。

入关与满城相结合，形成了早期的国家调用形态：小核心掌握最高权重，旧国家提供身体，嵌入节点提供持续控制。这一模型与普通王朝更替不同，它不要求新核心从零生产一切国家能力，也不要求旧社会在文化上完全消失。它可以保留旧机构、旧人员和旧技术，同时改变了最高政治方向。早期入关就是这样一种夺舍：国家躯体继续存在，政治核心已经更换；旧秩序的技术被保留，旧秩序的主人被替代。这种国家易主作为夺舍机制的历史模板，揭示了政治核心占据国家躯体并转移最高决策权重的结构机制；后来的历史实践所重复的，正是这种捕获、嵌入和调用旧国家躯体的政治生存逻辑。

二、既有现代核心怎样在满洲取得工业与军事能力

中华苏维埃及其延续下来的党、军队、干部、根据地、宣传、敌我分类、资源体系和组织纪律，构成了现代链条中的政治核心。在取得全国国家躯体以前，这个核心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组织内核、合法性来源与内部权重秩序。

中华苏维埃因此不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普通历史前身，而是后来进入全国国家躯体的政治—组织核心。它与后金面临着同一结构性问题，即如何在旧国家和主体社会之外先行建立高组织度的独立中心，如何组织军队、干部、宣传与资源，以及如何在尚未占有全部国家身体时先掌握决定方向的政治权重；进而像后金一样，从小而紧凑的中心出发，不断捕获人口、军队、资源、地方组织和合法语言。但这绝非后金模式的简单复制，而是该结构在现代条件下的展开。

共产主义给这种核心提供了现代组织技术、阶级分类、动员语言和全国革命外壳。满清渔猎政治生存逻辑则让它更擅长识别强弱、捕获机会、重新赋位人口、调用旧结构。满清渔猎政治由此被共产主义现代化，共产主义也在现实运行中被满清渔猎化。

中共兴于满洲，并非抽象的地域修辞，也不是因为地理环境天然偏爱某种政权，而是因为伪满洲国留下的遗产发挥了历史遗产转换器的功能。它把满洲的地域、人口、工业与组织条件，转换成了可供调用的军政能力。伪满洲国留下的铁路、军工、工厂、城市、技术人员、科层结构、工业人口和军事组织，在这一历史承继判断中，给这些渔猎群体的后裔装上了工业外骨骼，使其政治生存逻辑不再局限于山林和边疆环境，而获得了现代工业的速度、规模与组织力。〔注 1〕

这套工业外骨骼并非静态的空设备，它实际承载着生产、运输、维修、通信、档案管理、人员集中以及命令的持续执行。此外，满洲国遗产还包括已被现代制度训练过的人口：技术人员通晓设备运转，铁路人员掌握运输调度，工厂人员熟悉生产流程，行政人员具有处理档案、物资和公文的经验。政治核心所接收的，正是这样一套包含设施、人员、操作程序和科层经验的组合。

缺乏这些工业物质条件，捕获仍可能发生，但只能局限于较小范围；有了这些条件，捕获—重新赋位可以覆盖军队、城市、工厂、铁路和行政系统，政治核心可以把局部优势转化为跨地区推进能力。因此，中共进入满洲不仅是接收旧设施与人员，更在于打破其原有的政治依附，将其重新编入战争、行政与组织序列。满洲国工业由此成为历史遗产的转换场，将区域工业资源转化为现代军政能力。

东北野战军完成了这条兴起链中的军事转换。中共由各根据地进入满洲，吸收当地的人口、军队、技术和工业资源，把多种来源重新编入自己的组织，最终发展为解放战争中最重要的主力部队之一。尽管具体的人员比例和来源数字仍有待进一步考实，但这一客观脉络十分明确：工业外骨骼、组织化人口、政治核心与军队在特定历史窗口内紧密结合，形成了从满洲向关内推进的军事力量。

东北野战军的组成具有特殊性，涵盖不同来源的农民、士兵以及具备近代军事经验的人员，无需将其简化为单一阶层或民族背景。在此过程中，诉苦运动、阶级兄弟与政治命名分别发挥了重新赋位的作用。旧体制下的身份、旧军队履历与原初社会位置并未被彻底抹去，而是通过新的叙事、组织与纪律重排了权重，被重新编入中共的军政秩序之中。

东北野战军既非工业外骨骼的被动使用者，亦非脱离政治核心的自主军队。它是政治核心、满洲遗产与现代战争技术结合的产物：工业提供装备与运输，城市提供人口与技术，组织确立命令与身份，政治核心则赋予其行动方向。训练、技术、后勤与政治命名均在此获得了具体的组织承载。

东北野战军由满洲向关内的推进，标志着现代入关在军事上的完成。它与早期满清入关并非普通类比，而是同一套捕获—重新赋位的政治生存逻辑在不同技术条件下的重现：早期满清依靠传统小核心入主中原，而现代中共则以中华苏维埃建立的政治—组织核心为轴心，在满洲吸纳工业与军事外骨骼，进而将聚合而成的庞大力量推向全国，向更大国家身体推进并进入接管过程。军事入关的完成与随后全

国国家躯体接管过程的落实并非同一完成时点，后者的完成仍取决于各类机构、城市和交通网络内部控制关系的具体确立。

三、三种不同的身体如何结合为后清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中华民国在大陆的自然延续。“两个国家”的表述准确概括了这一对接结构：一方是由中华苏维埃演进形成的政治—组织核心，另一方是中华民国留在大陆的现代国家躯体。中华苏维埃的核心掌握着党、军队、干部、宣传、敌我分类和严密纪律；中华民国的大陆遗存则提供了领土、城市、铁路、学校、工厂、行政机构、法律形式、财政接口、人口分类和专业体系。二者在新的最高权力支配下结合，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后清”的基本形态。

满洲国的工业外骨骼并非国家躯体本身，中华苏维埃不等同于全部国家能力，中华民国留在大陆的国家躯体也绝非政治核心。历史的实际逻辑是：政治核心依托满洲阶段建立的现代军政能力，全面接管并调用了民国留下的国家躯体。旧国家的领土、城市、科层、学校与制度体系未被全盘推倒，而是被纳入新的敌我秩序与资源序列中重新赋位，在最高统治权转移的前提下继续运转。

这正是国家层面的现代“夺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留了现代国家的外在形式，而以党组织作为最高决策核心；它沿用了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名义与动员体系，但在实际运作中承袭了主人—依附、捕获—重新赋位以及满城式嵌入的政治生存逻辑。国家层面的易主是识别夺舍机制的历史模板，但这种命名和机制判断不能凭国家易主直接证明某一具体机构被夺舍。具体机构是否被夺舍，必须依据其内部关系、实际最高决策权以及人事、资源、解释权与敌我方向变动的独立证据逐案检验，不因出现任命变动就直接成立。

称其为“后清”，并非指代时间线上的王朝续作，亦非对其全部制度的法律定性，而是指出其在政治生存结构上的内在连续性：通过借壳、换壳与夺舍，将旧国家作为躯体加以调用，并在党政体制下维持主人—依附关系与节点的深度嵌入。

这种结合也表明共产主义并非简单的外来附着物。党组织、宣传动员、现代军队、工业科层、户籍与单位制度，为渔猎式的政治生存逻辑提供了全国性的调控规模；与此同时，这种政治生存逻辑也将共产主义改造为服务于捕获、编组、身份划分与忠诚管理的治理技术。满清渔猎政治被共产主义现代化，共产主义被满清渔猎化。二者在后清中不是两个并排的模块，而是同一个政治—组织对象的两个机制来源。

四、国家制度怎样使捕获成为社会生活

政治核心占据国家身体后，将其改造成持续生产捕获机会的人工森林。党组织、干部体系、政治成分、单位、户籍、学校、人事、档案、组织考察以及资源配置机制，将原本属于小型核心的编组方式现代化。这一网络不仅持续界定谁进入核心、谁留在外围、谁获得资源、谁需要表演忠诚，也决定了成员的旧身份是否保留，以及现实功能如何被重新定义。

在这片人工森林内部，社会生活中的各类关键资源被重塑为强节点所控制的入口。工作、住房、编制、教育、医疗、项目、政策、资格、关系、流量乃至身份，不再只是独立的社会生活领域，而是被收束在各级权力卡口之后。个体若要在森林中获取资源、规避倾轧，就必须时刻保持对风向的敏感，判断哪个节点掌握实质裁决权，识别何种语言正在升值，从而主动寻找依附对象，将自身接入资源入口。这种机制构成了满洲式政治生存逻辑在现代国家中的展开：昔日是政治核心捕获外部人口和资源，如今则是制度把社会成员放进必须不断进行强弱判断与机会捕获的猎场环境之中。

这一制度化进程在确立全国执行力的同时，完成了政治生存逻辑的社会化。社会成员在工作、学校、媒体、身份和资源接口中反复经历制度结算，逐步习得两面拟态、忠诚表演与揣摩上意的生存经验。当行动者无需中心专门指引便能理解规则时，围绕稀缺入口的捕获技术便内化为普遍的社会能力。〔见第二十七章注 1〕

人工森林改变的不只是资源分配，也改变社会的时间结构。长期积累要求行动者相信规则、关系、职业、组织和公共承诺能够跨越未来；机会捕获要求行动者在窗口打开时迅速进入，在强势节点变化前及时转向。

中心通过政策、运动、资格、编制、住房、项目和媒介流量不断制造窗口。窗口越稀缺，越需要快速判断；判断越重要，越会削弱对稳定规则的依赖。行动者开始先问哪条路径能够立刻取得位置，再问这条路径是否能够形成长期能力。

有机会就捕获机会，取代长期稳定积累。机会捕获不仅影响财富。规则信誉、职业伦理、组织忠诚和公共信任，都需要跨期积累；如果每个人都知道下一轮风向可能重新命名自己，今天的承诺就很难成为明天的可靠基础。短期捕获可能使个人活下来，却使社会越来越难形成跨代连续性。

主体民族的“满清化”，正是在这一时间结构的重塑中逐渐显现。所谓主体民族满清化即渔猎化，不是血统改变，民族名称和外壳依然存在，家庭和地域记忆依然延续；然而，其内在政治人格已经被训练成寻找强者、依附组织、捕获窗口、表演忠诚和切换身份。行动者在感知权力、安排投入、理解安全和面对同类的方式上，便逐步适应了在现代人工森林里穿行求存的渔猎逻辑。

五、解释失效后旧功能的换壳与新身体

满清共产主义不能只靠资源和组织维持，它还需要不断解释自己。人工渔猎环境不能提供稳定解释，只能不断重新分配权重。旧理论无法解释现实时，模型解释危机随之出现。恶意加维把大量低权重维度加入模型，让它们近似等权，旧模型因而失去区分能力；对旧外壳的摧毁，又被包装成新的答案。

这种恶意加维的实质，是通过引入低判别力的碎片化概念来掩盖原本具有高权重的关键结构。当大量次要解释被宣称同等重要时，真正决定权力分配的高权重维度——谁掌握资源、谁把持组织、谁划定敌我——便被遮蔽在繁琐的概念迷雾之中。现实中的失误可以被归咎于新加入的低权重维度，而对旧

外壳的摧毁与重构，又被精巧地包装成新的答案。行动者在模型危机的掩护下，一方面模糊了现实责任，另一方面则为旧权力结构在全新理论外壳下的延续铺平了道路。

权重优先论明确划分了两重维度：理论源头解释文本，功能源头解释现实。理论源头包含文本来源、概念演变与理论家的自述；功能源头则是实际配置资源、组织、传播、敌我与机会的制度程序，并非全知全能的单一实体。

纯洁的理论自述无法取消客观上的功能依附，具体理论仍可参与动员与合法化过程。

在生成依赖已有材料支持的核心类型中，满清共产主义不断制造交媾主义，或者推动它生成，再与它交媾。交媾主义并非单一自上而下的产物，而是主动制造、结构筛选与无意识生成并存的演化结果。分散创作、组织选择、传播放大与机会反馈交织发生，外部激励持续作用于形成过程，使理论表述在动态调整中逐步锚定体制的现实需求。

思想环境的先在性与后期的客观功能，都不单独构成其生成目的的证据。唯有形成时期的材料能够证实政治结合目标已实质进入核心命题、判断次序或行动要求，其构成上的依附才告确立；独立产生而在后期被吸纳重组的思潮则属于另一演进路径。保留独立名称、专属理论家与真诚信徒，并不能使其自动免除捕获判定；但单纯接触亦不等于已被捕获。资源、传播、组织、敌我与机会这五类接口属于联合观察范围，并非五项齐备缺一不可的门槛；判定控制或依附必须依据具体关系材料，检查究竟是哪些接口实际改变了判断权与功能方向，进而切实改变了其运作功能，依附关系才告成立。

这种对生成关系与后期捕获的区分，绝不意味着理论文本与现实后果脱钩。单纯的文本接触、后期利用或理论家与信徒的主观真诚并不自动等同于共同责任；然而，当理论命题实际提供了正当性理由并被权力系统采用，切实进入了动员、划界、围猎、资源配置以及实际后果链时，便绝不能以“被误用”为由洗脱其参与及相应责任。正是其文本所提供的范畴与逻辑，为现实权力的行使提供了操作抓手，在客观上完成催化与背书。

因此，理论死亡不是政治死亡。满清共产主义的统治技术之所以“优越”，正是因为它能够让外壳死亡而让功能继续，让旧名称失效而让权重关系换壳，让一种主义被反对以后，另一种主义仍然承担同一套现实功能。

这一换壳与寄生的机制，在一条由典型人物与传播媒介构成的历史连续线上表现得极为清晰。这条连续线不是人物之间的单线师承或组织派系传承，而是同一套政治生存逻辑在不同媒介条件下不断寻找新身体的过程。连续性存在于机制外壳：中心化组织、组织大师、纸媒、教育媒介、语言超限战和情绪短视频，都可以承载捕获、拟态、归属、敌我和资源结算。

毛泽东是始作俑者，他身上呈现的正是满洲国的风格。他将政治核心、战争状态、群众动员、严密组织与国家目标连接起来。王洪文展示了工业人口、工厂、政治身份与群众话语如何被政治生存逻辑捕获，进而进入高权重中心。

到了改革年代，原有控制机制留出局部组织真空，气功狂潮中的张宏堡、李洪志相继登场。两人的公开传播与自建组织，为观察借壳生蛋、墙内拆梁、换壳与夺舍提供了现实节点。这四种关系并非两人必须依次经历的固定步骤；尽管他们确实进入了体制开放的公开接口，但目前的公开材料还不能证明某个旧机构的最高权重已经被其切实接管。这一节点所呈现的，是既有外壳如何在合法形式下被借用来建立组织，原有的制度与传播接口又如何在日常运转中容纳新的权威与归属。

当社会进入相对平稳的世俗发展阶段，《意林》《读者》等大众纸媒接过了外壳功能。这批媒介将满洲生存理性包装成文明生活指南、个人修养与未来安抚，充当了经济上升期的吗啡，引导大众在回避制度反思的前提下追求微小的世俗确定性。

随着经济上升期的放缓，现实生存的严酷法则催生了新的媒介节点。张雪峰以实用主义姿态，将官僚机构的教育神圣语言直接拉回就业成本、编制变现与家庭止损的现实结算；周丽峰则精熟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正确音节，以神志清醒状态下撒酒疯的姿态，将极左口号推向极端，以红旗打红旗的方式展开言语超限战。

在经济上升吗啡失效、现实落差扩大的当下，这一逻辑推进到了网络主播“斯奎奇大王”这一媒介节点。他将大众在现实落差中积累的幻灭感与挫败感，定向加工成虚构民族主义、外部贬低与即时情绪补偿，制造出专供精神麻醉的话语合成毒品，以草莽攻击力和廉价智力优越感吸引受众，填补心理落差。

贯穿其间的核心主线始终未断：大胆厚黑、清醒伪狂、表演忠诚、布设语言陷阱与情绪围猎，都在争夺解释权、组织权与现实权重。这套政治生存逻辑早已脱离了最初的核心边界，演变成社会与媒介在面对权力与生存压力时可以随时调用的技术，在一次次理论破产中换壳延寿。

六、从普及到失去独占，再到实际反向使用

中心若不推广这套政治生存逻辑，就无法实现现代国家规模的统治；中心一旦推广，就无法继续独占。这里的矛盾不是外部道德评价，而是政治—组织结构自身的张力。一个小核心可以保持内部知识和忠诚的稀缺性，现代国家却必须把组织程序、语言、身份和资源规则复制到亿万人口中。

这种大规模复制带来了控制，也赋予了这套生存逻辑充分的可学习性。社会成员在长期的奖惩、排除、命名、审查与资源再分配中，逐步理解整套机制的运转规则。行动者不仅学会了如何依从指令，更掌握了如何在不同场合证明自身合规、如何在表态中隐藏真实意图、如何进入体制开放的接口、如何捕捉政策窗口，以及如何在风向转变时变换外壳。中心的制度架构越完备、规训越深入，社会对中心机制的可读性与掌握度就越高。中心每一次动员与扩张，实质上都在把原本属于政治核心的专门手段，转化为全国社会的公共生存技术。推广这套生存逻辑是维系现代统治规模的必要手段，但这种制度化扩散本身，瓦解了中心对该手段的垄断。

中心的成功不会立刻带来终局，它制造的是终局所需的能力规模。它越成功地建设单位、户籍、学校、媒体、组织、身份分类和资源分配，就越能训练社会成员理解这些接口；它越成功地让全国人使用同一套政治语言，就越难阻止语言被重新占位；它越成功地把组织和新主义纳入自己的生态，就越会给新组织提供借壳、换壳和夺舍的训练。

失去垄断不是中心已经崩溃。它指的是中心不再是唯一能够决定政治生存逻辑运用方向的主体。地方节点、组织、媒介、新主义和社会成员都掌握同一套接口，中心仍然可以拥有资源和强制，却不能保证每次表态、每次捕获和每次换壳都只加强自身。〔见第二十七章注 1〕

上升期里，资源仍集中在中心，这些生存手段主要向中心回流；资源紧缩和合法性动摇以后，行动者开始把中心本身放进强弱判断。

工业外骨骼、东北野战军、现代入关、后清、人工森林和政治生存逻辑向全国扩散，在上升期提供胜利；当中心失去垄断以后，同一条路径也提供反向调用的条件。

中心衰弱不等于社会突然获得一种全新的道德。中心衰弱意味着资源、合法性、未来承诺和强势位置不再自动重合。行动者已经掌握寻找强者、捕获机会、表演忠诚和借壳换壳的能力，于是会把这些能力用于新的比较。

上升期的高度服从，在资源紧缩和合法性动摇时转化为内部竞争、忠诚贬值和对中心的重新评估。在策略服从与资源依附的逻辑中，人们忠于资源位置和当前强者，却不会稳定地忠于中央；真正忠诚者、拟态者、两面人和等待换壳者使用相同外观，中心因而失去识别能力。

中心衰弱时，过去的忠诚履历反而可能成为反向能力。最懂中心语言的人最知道怎样突破语言边界，最懂组织程序的人最知道怎样在程序内拆梁，最熟悉资源分配的人最知道哪些位置能够改变权重。中心培养出来的执行者、传播者和组织者，不必全部变成反噬者，但他们共同的优势，是比外部敌人更熟悉中心的接口。

然而，失去独占与识别困难只是提供了反向调用的条件，并不等同于反噬已经实际发生；反噬的出现，也并不意味着新的政治力量已经完成对国家躯体的接管。反噬的发生，必须以具体行动者实际改变主人、猎物与行动方向为标志。

一个人不必先接受某种完整反中心理论，只需发现中心已经不能提供过去的资源；一个组织不必先公开宣布夺舍，只需保存多重关系、转移信息和调整项目方向；一个媒介不必放弃官方语言，只需把外部猎物转成内部猎物；一个新主义不必否定所有中心遗产，只需占据中心留下的合法性接口。这些动作展现了反向调用的不同路径，但反噬的实际发生，始终要求具体行动者改变实际资源、依附或行动的运用方向；单纯的认知觉察、关系保存或接口占据，本身并不等同于反噬已经发生。

在演变链条中，红旗打红旗使中心的合法语言成为公共武器；借壳使新力量从合法空间进入；换壳使组织能力跨越理论死亡继续存在；夺舍则使旧机构在名称和程序不变时改变最高权重。作为猎犬的“斯奎奇大王”与设想推演中的野狼牢 B、牢 C，表明同一种捕猎话术可以更换主人。

根据推演，当外部供能断绝后，情绪成瘾便转向体制内部。思想游击队、无神论法轮功以及逆转版本的斩杀线教均属于结构推演，说明新力量无需复制中心既有国号，也能直接调用中心留下的政治语法，在制度裂痕中实现借壳、换壳与夺舍。〔见第二十八章注 1〕

因此，同一能力转向中心不是一次突发心理叛变，而是生存手段的对象重新选择。过去中心是最强主人，今天中心被放进强弱比较；过去外部对象是猎物，今天中心的裂缝成为猎物；过去官方语言是边界，今天官方语言成为争夺中心代表权的工具。

满洲反噬不是一个外部地区的军事事件，也不是普通制度风险。它是中心从满洲遗产中获得的捕获、编组、重新赋位、拟态、表演忠诚、借壳、换壳和夺舍能力，在全国化以后被内部人员、新组织、新主义、媒介人物和表面忠诚者反向调用。

中共接受了这份满洲遗产，就必将得到这样的代价。帮助中共在满洲获得胜利的，正是最后能够反向吞噬中共的能力。中心过去用这套能力占据国家身体，后来社会在同一人工森林中学会这套能力，中心就不能再要求它永远只服务中心。这就是兴亡同源的核心。灭亡机制不是后来从外部附加上去的，正是兴起机制全国化以后产生的反向用途。

七、两次赋位怎样构成兴亡同源

如果兴起只是因为满洲偶然提供了一个战场，灭亡又只是因为后来发生了某个偶然危机，那么“兴于满洲，亡于满洲”就只是一句修辞。连接兴起与灭亡的，是同一组机制。

兴起和灭亡共享深层的同源机制：二者都不是简单的资源增减，而是对象被重新赋位。后金把外部人口赋位为旗人、包衣、汉军、归附者与各级依附者；现代政治核心把工业、铁路、城市、技术人员、军队和国家机构赋位为自身能力；全国制度则进一步把普通社会成员、组织和媒介赋位为捕获者、被捕获者、表演者、猎犬或潜在的换壳者。

兴起时，重新赋位集中在政治核心手中，由其单向决定谁被保留、谁获得位置、谁构成资源，以及谁能代表主人关系。而在反向演变中，被赋位的对象即便仍完整保留原有的体制外观与名义，定义关系的权力却已不再集中。地方不再单纯承接指令，而是将具体执行过程重新赋位为争夺自身排位与生存空间的政绩；组织把自己的忠诚重新赋位为资源；媒介把自己的正确重新赋位为流量。

与此同时，新主义借由占据中心接口，将其重新赋位为确立自身合法性的话语支点；社会成员也不再仅作为被动的位置接受者，而是将曾经判定一切的中心反置于利害得失与强弱判断之中，重新赋位为猎物。这种转变之所以属于重新赋位而非单纯的资源涨落，是因为它改变了关系定义权的实际归属。

这些行为单独出现并不自动证明反噬的发生，但它们表明，决定位置与从属关系的法则已从中心的单向赋予，转变为行动者基于自身存续对原有手段的自利化重构。

兴起需要把不同来源人口编入统一组织；灭亡则发生在同一组织技术把下级、边缘和新组织训练成能够重新编组自己的行动者。兴起需要表演忠诚来完成动员；灭亡则发生在忠诚表演无法区分信仰、策略与等待转向。兴起需要借用旧语言进入国家；灭亡则发生在旧语言被新的主人反向借用。

这一过程不是因果上完全相同的事件，而是同一政治生存逻辑在不同权重状态下的展开。中心强盛时，捕获和拟态向中心集中，用以夺取国家；中心衰弱时，捕获和拟态围绕中心重新分配，改变中心在国家中的位置。这两端都是政治—组织权重的重新安排，而非先是政治、后为舆论。

工业物质放大与国家制度向社会复制手段属于两个不同环节。最初，工业、铁路、军工、城市与技术为政治生存逻辑接入现代国家提供了物质骨架；随后，单位、户籍、学校、媒体和组织系统才将这套政治生存逻辑复制到全国社会。

中心接受满洲遗产并将其现代化、全国化、制度化，必然把最初属于中心的专门能力转化为社会可以调用的公共能力。这种全国扩散与独占丧失，为日后行动者将这套手段反向施加于中心提供了必要条件。但从具备反用条件到行动者实际改变行为方向，仍取决于中心资源供给的变化及各节点的利益重估。〔见第二十七章注 1〕

八、满洲的历史含义与终局判断

“满洲”不能缩成地图上的地点，也不是一个随时可以换成“东北”的中性标签。它是政治、组织、工业和现代入关链的共同源头。

后金小核心在满洲形成，八旗和主人—依附在这里完成高组织度编组；满洲国在这里提供工业外骨骼；东北野战军在这里把政治核心和现代战争接起来；中共由这里完成现代入关；全国制度又把由这里强化的政治生存逻辑扩散到整个国家。

满洲既是现实历史条件，也是这套理论中的机制源。把它只当作象征，会切断工业外骨骼、东北野战军和现代入关的历史箭头；把它只当作地理，又会切断捕获、编组、主人—依附和全国渔猎化的理论箭头。

因此，“亡于满洲”不是说终局必须发生在某一片地理区域，而是说终局所使用的政治生存逻辑仍然来自满洲形成的政治—组织源头。这一判断不预设亡的地域表现、时间和事件剧本，只确定亡的机制来源。

在此，“亡”指的是兴起机制反向作用的历史—理论终局判断，而非衰退、风险、隐患、挑战或治理困难等开放趋势。满洲在历史中并未凭空生成核心，而是使既有的中华苏维埃政治核心获得了与工业外骨骼、组织化人口及军事转换相结合的客观条件。当这套政治生存逻辑推向全国后，中心最终失去对其独占；在资源紧缩与合法性动摇的现实压力下，具体行动者实际改变原有手段服务的主人、猎物

和方向，促成反向作用的展开。这一论断不预设具体的终结时间与剧本，但具体时间与形态的未定并不将既有的终局论断还原为开放的衰退或风险判断，其具体因果环节仍对经验材料和反向证据保持开放，接受现实依据的持续检验。

终局无须依赖预设的救世人物、新组织或外加的终局主义解释，但这并不意味着取消具体行动主体与历史事件的实际承载。外壳可以持续变化，功能可以持续换壳，主人可以在接口中重新选择。当中心失去对捕获—重新赋位能力的独占，随着资源基础与合法性条件的变化，身处接口中的行动主体实际改变运用方向，同一套能力便会在既有结构中发生回流。因此，改革方案、纠错机制或自我更新路径都不是这条终局因果的出口。把“亡”改写成开放的治理问题，只会使问题重新落回中心内部的修补逻辑。另一种政治希望也不能取代已经形成的兴亡判断。

“兴于满洲，亡于满洲”不是两个地理判断拼在一起，而是一个政治—组织对象的起源与终局。

兴于满洲，亡于满洲。

第二十九章注释

一、“这些渔猎群体的后裔”属于历史承继命题，并不意味着将满洲工业人口或军队力量全员定义为该群体的后代，亦不能替换为抽象的纯文化后裔。要将这一承继关系在经验层面完全确立，需要具体的人口流动、家族谱系、职业转换及岗位承接证据。第十三章所引关于铁路调度、器材随军入关以及东北军工接收与统一调用的研究材料，能够支持满洲技术设施、工业遗存与组织化人员对军事推进的客观支撑，但具体工业与行政遗存的利用不能直接等同于全体人员血缘谱系的证明，掌握工业技术与枪炮操作亦不等于具备特定的政治忠诚或生存策略。满洲工业外骨骼对政治生存逻辑构成物质支撑，而该承继判断在人口与人员链条上的实证广度，仍须依据更为确凿的历史档案与人员名册检验。